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怎么办？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译序

《怎么办？》的作者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是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的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一代新人的思想领袖。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曾把他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盗天火予人间的英雄，称他为“俄国文学中的普罗米修斯”。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一八二八年出生在萨拉托夫一个牧师家庭。一八四二年进入萨拉托夫正教中学。一八四六年五月，考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在大学期间，接近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并逐步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八五一年，回到萨拉托夫，在中学任语文教员。一八五三年，重返彼得堡，开始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后又应涅克拉索夫的邀请到《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在《现代人》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如《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等。他还积极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一八六一年撰写了革命传单《告领地农民书》，并指导过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为俄罗斯公认的革命领袖和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到反动派的敌视和仇恨。一八六二年六月，《现代人》杂志被勒令停刊八个月。七月七日，反动当局捏造罪证，逮捕了他，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将近两年。在狱中，他以惊人的勇敢和顽强的毅力继续着革命的写作活动。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开始，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怎么办？》。

一八六四年二月，沙皇政府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矿场服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他在监禁、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了整整二十一个年头，始终保持着崇高的气节，坚守着革命的阵地。在流放期间，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序幕》等。一八八九年他才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居住。长期的苦役和流放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同年十月二十九日，他与世长辞。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是矗立在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

如前所述，它是作者在被幽囚于彼得保罗要塞期间写成的。从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八六三年四月四日，作者用了一百零十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部文学巨著。他是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去创作的。小说的思想和形象使他激动不已，以致有时他不得不去演算一些微分学的习题，心情才能平静下来。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这位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艺术升华。小说最初发表在一八六三年第三期到第五期的《现代人》杂志上。不久被沙皇政府查禁。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当时俄国的进步青年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且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的文学批评家 N·H·特卡乔夫在小说《怎么办？》一八八一年法文译本的序言中指出：“当时在青年小组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办的。要把国家从卑劣的政治和经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从这种制度使之陷入的崩溃的绝境中解救出来该怎么办？要把铭刻在青年心中的道德

和社会主义理想贯彻到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去该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中谈到了这一切问题……。”著名的民主主义批评家 D·N·皮沙列夫指出：“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创造性的纲领，因此它成为了年轻一代的旗帜……。”著名画家列宾亲切地回忆道：“在文学作品中有两个主人公作为供人仿效的楷模在大学生中占了优势，即拉赫美托夫和巴扎洛夫。《怎么办?》这本书使人入迷，不仅仅是那些被读烂了的破旧不堪的书籍一册册在人们中间流传，还有手抄本……。”普列汉诺夫认为，“在每一个出色的俄国革命家身上，都有过许多拉赫美托夫气质。”实际上，这部作品不仅被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青年奉为“生活的教科书”，而且被后世誉为“代代相传的书”，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都曾从这部小说中吸取过“精神力量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杰出的保加利亚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季米特洛夫就说过：“我应该说，在过去和后来一直都没有另一部文艺作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这样使我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革命导师列宁也十分喜爱这部作品。他热情赞扬“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在它的影响下，成百成千的人变成了革命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怎么办?》一书的时候，正是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期（一八六--一八九五），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占据了社会斗争的前台。

《怎么办?》的副标题就是“新人的故事”，它所描写的正是六十年代的正面典型--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当时，这种典型才诞生不久，但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象征”，他们的力量正在成长壮大起来。

小说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俄国。在这个时期，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及其残余作斗争。围绕着对待农奴制的态度，俄国出现了两种历史力量和两种历史倾向，即贵族自由派和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斗争。贵族自由派不能容忍农奴制度，可是又害怕革命，害怕能够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他们希望“从上面”来解放俄国。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则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一八六一年的“农奴制改革”实质上是农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是对农民的一次残酷的掠夺。广大农民用“骚动”来回答沙皇所恩赐的“改革”。平民知识分子青年则用层出不穷的“学潮”来响应农民的骚动。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思想领袖很快就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他除了利用《现代人》杂志这个合法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外，还亲自撰写了《告领地农民书》的秘密传单，揭露“二月十九日法令”给农民带来的惨痛后果，号召各地农民积蓄力量，准备革命。沙皇政府用残酷的镇压手段来对付群众的革命要求。一八六二年下半年，俄国形势急转直下。“光明时期”转瞬即逝。

沙皇政府向革命发动了进攻。在反革命恐怖统治的高压下，农民骚动暂时趋向消沉，反动派重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自由派日益公开地表示拥护沙皇，而不坚定分子则纷纷离开斗争。“怎么办?”这就是当时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问题。

其实，一些优秀的俄国贵族作家也早已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罗亭》、《前夜》及其中

篇小说《阿霞》的主人公在一生的紧要关头都曾提出过“怎么办？”的问题，作者又都没有找到答案。《谁之罪？》中的女主人公柳鲍芙·克鲁齐费尔斯卡娅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克鲁波夫医生问别尔托夫：“那该怎么办呢？”别尔托夫的回答是“不知道”。充满着对新生活憧憬的娜塔丽雅·拉松斯卡娅询问罗亭：“您看，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罗亭回答：“向命运屈服”。在长篇小说《前夜》中叶连娜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她不知道在俄国该怎么办，所以她不能回俄国。当人们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刻，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自己作品《怎么办？》回答了人们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从阴暗的牢狱中，他向人们发出了革命的召唤。

《怎么办？》的基本情节很简单。从表面看，它似乎是欧洲的一个传统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只是它给予了这种故事以一个新的结局而已。作者本人就说过，在这里，“不会有极为夸张的冲突，事情结束时没有暴风雨，也没有雷鸣和电闪”。这个故事的梗概如下：房产管理人的女儿韦拉在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的帮助下拒绝了父母包办婚姻的企图，脱离家庭，与原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结合并创办了一所实行社会主义原则的缝纫工场。两年后，韦拉与洛普霍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相爱，洛普霍夫感到韦拉与基尔萨诺夫性情相投，他们在一起生活会更幸福，于是毅然出走，假装自杀，使他们能够结合。以后，洛普霍夫受职业革命家拉赫梅托夫的委托，出国进行革命活动，数年后由美国回到彼得堡，与波洛佐娃结婚，并同基尔萨诺夫和韦拉重新会面，两对夫妇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共同进行着他们所热爱的事业。

作者认为，这是些“善良、坚强、诚实、能干的人们”。他向他们敞开心扉，说：“你们刚刚在我们中间出现，但人数却已不少，并且还在迅速增加”。由于“读者还不是都像你们那样，因此我还需要写作，也有可能来写作。”对此，他的一个同时代人曾经这样指出过：“被反动派幽囚而与世隔绝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在利用这个形象从阴森的监狱中对我们说：‘这就是俄罗斯现在特别需要的真正的人。效法他吧，如果能做到，就走他的路吧，这是引导我们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唯一道路。’”普列汉诺夫说：“《怎么办？》获得空前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因为这本小说对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了生动的，大家都能理解的回答。”

作为“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韦拉、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所具有的一种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改造俄国社会的决心。他们都出身于小市民、小官吏。如基尔萨诺夫的父亲就是一个县级法院的文书。他们在贫困中长大，社会地位低下。他们“没有门子，没有熟人，凭着个人的奋斗给自己开拓了未来的道路。”他们饱尝生活的艰辛，对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满腔憎恨，对于人民群众的痛苦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改造俄国社会的要求。他们在当时的俄国“眼睛看到的尽是些不愉快现象”，看到的是“只有那些又不诚实又恶毒的人才能过好日子”。但是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环境造成的。正如洛普霍夫对玛丽娅所说的那样：“现在您在干坏事，因为您的环境要求您这样，给您另一个环境，您也会乐于做个无害甚至有益的人。”因为在精良的泥土上，有真实生命的泥土上“产生出的新的东西也全部是健康的，因为基本元素都是健康的”。而在腐朽的泥土、不实用的泥土上“植物不可能长得好”，因为这块泥土的“元素本身不健康”，所以产生出来的其他东西“全部都必定是不健康的、劣质的”。这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社会上的那些“不愉快的现象”，

就必须要把腐朽的、不实用的泥土改造为有真实生命的泥土，即把恶劣的社会环境改造为良好的环境。他们用“未婚妻”来隐喻革命。洛普霍夫对韦拉说：“愿世界上不再有穷人”，“这正是我的未婚妻致力于做的。”他们对革命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洛普霍夫说，他的“未婚妻”“很有力量，她的力量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人。”“但愿不再有穷人，这个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的，因为我们迟早总会安排好生活……。”无疑地，在当时，作者不可能从正面来描写革命。但是，从字里行间，人们还是可以感受到革命的信息。比如第章第二十二节所描写的郊游，实际上就是当时革命青年的一个秘密的政治集会。集会的中心人物是“穿丧服的太太”，她的丈夫已被捕了。人们议论着恶劣的政治形势，并且断言说，形势越坏就越好，“否极泰来”，因为形势越恶劣，革命也就越临近了。他们盼望着拉赫梅托夫回国，认为“现在是他回国的时候了”，因为伟大的斗争正需要他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将是残酷的：“我是荒野绿林中的一个居民；我的生活充满着危险”；但是，他们还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样一条斗争的道路。在庄严的气氛中，“穿丧服的太太”借用一个苏格兰民歌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决心：“月亮升起了，宁静又安详；一个年轻的战士，即将赴战场，骑手将子弹上了膛，姑娘对他讲：‘听天由命吧，再勇敢些，我的情郎！’”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夫妇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们感到，她的选择也正是他们应当作出的选择。他们坚信，尽管斗争是艰苦的，但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光明、温暖和芳香，迅速地驱赶开黑暗和寒冷；腐朽的气息愈来愈弱，玫瑰的芬芳愈来愈浓……”。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在给这个美好的未来作准备”；他们认为，能够去从事这种准备工作，是一种幸福。

“新人”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具有言行一致的实干精神。作者写道：“他们每个人都很勇敢，不动摇，不退缩，能够承担工作，只要承担下来就会紧紧抓住它。这是他们的特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每个人都诚实得无懈可击。”他们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特性，是因为，作为平民知识分子，比之贵族革命家，他们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群众的联系也开始密切起来了，从人民群众的身上，他们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强大的力量，因此，他们成了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与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无所作为的“多余人”不能同日而语。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不仅以严肃的态度进行医学科学的研究，而且还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组织了启蒙活动的小组。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批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很尊敬洛普霍夫，把他当做彼得堡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们认为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谈谈话于自己有益。”他们创办星期日夜校，与年轻人交朋友，还组织朗诵活动，郊游活动……通过一点一滴的工作，在不懈地向群众灌输着革命思想。无论个人生活中经历了多大的不幸，事业上遭遇了多大的挫折，他们都没有退缩过。比如洛普霍夫在失去韦拉的爱情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俄国到美洲去，而他一到美国，就立即成为了废奴主义拥护者，因为他认为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和俄国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是遥相呼应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确实具有崇高的思想，而且还“拥有使它圆满实现的足够力量”。

“新人”的第三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行动都遵循着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并把献身于崇高的事业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他们认为“人的行动总是服从于利益的考虑”，所以他们信奉“利益计算的理论”。洛普霍夫在与韦拉最初所进行的谈话中，就向她宣传了这种

理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每个人考虑最多的是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他看来，高尚的人与卑下的人的界限就不存在了。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于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利己主义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也不一样。韦拉的母亲玛丽娅，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她的最大的快乐是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的私利，为此，她可以不惜损害他人，她“想出的办法是卑劣的，对别人有害的”。新人们则认为，“假定有谁能使别人快乐，自己又没有什么不愉快……他从自身的利益要求出发，能使别人快乐，因为他自己也将从中得到快乐。”他们所想出的办法“是合理的、对别人有益的”。正是从为了获得“内在的快乐”、即“崇高的快乐”以及为了“使他们所尊敬的人把他们当做高尚的人”这些“利己主义”的考虑出发，在必要时，他们可以自觉地舍弃个人利益，可以自愿地为别人和事业去作出极其崇高的行动。比如为了帮助韦拉获得自由，洛普霍夫决定中途辍学，与她结合，而当他发现韦拉已经不自觉地爱上了基尔萨诺夫以后，他又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动退出舞台，以假装自杀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坦然地、合法地结合。这个行为在人们看来，无疑是高尚的，但洛普霍夫却说：“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所做出的举动，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举动也有高尚的一面，但做出这举动的动力却是我自己天性中希望有利于自己的欲望。”这也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们不是背负着沉重义务感的苦行者，对于他们来说，服从于周围人的利益和集体事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心灵上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即使他们为别人、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也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合理的利己主义者来行事的，因为我看得很崇高的利益驱使我为了伟大的整体而恰恰采取了这种战斗的行动方式，对整体的爱成了我的人格的主要本质。”这种“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观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按照人本主义的思想，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最主要的特征，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对于利益的追求。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左右人们行动的动机时，就可以知道，原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所有的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贱的、英勇的和胆怯的事情都来自一个源泉：怎样做更愉快，人就怎样做……。”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仁义道德和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虚伪说教确实可以起到揭露作用。按照这个理论，被压迫阶级对于自身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的追求也是合理的。

国家有责任满足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把这一理论引申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用革命的手段去争取它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了。

但是，历史地分析，这种道德观仍然是以历史唯心论为指导的，因为它把“合理利己主义”看作是从抽象的人性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永恒的道德，而没有看到道德本身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种理论，从所谓同一人性出发，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原则界限也抹煞了。这样，就发生了一种极其明显的“逻辑错误”。因为“从人关于自己的想法永远离不开‘自我’的意识这一点，还决不能做出结论说，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利己主义的。”

总的来说，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言行一致的作风和遵守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特征。

除了这种“平常的正派人”以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塑造了“新人”中的“特别的人”拉赫梅托夫的形象。就觉悟程度和活动范围而论，他都高出“平常的正派人”。

如果说前者是一处简单的普通的房子，那么后者就是一座宫殿。而小说中落笔不多的关于拉赫梅托夫的描写，则恰似画面上出现的宫殿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拉赫梅托夫是一位职业革命家。这种典型“已经跟共同的事业融为一体，共同的事业是贯穿在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它甚至代替了他们的个人生活。”

拉赫梅托夫出身贵族，到彼得堡时，他只是一个平常、正直而善良的贵族青年。不久，他结识了基尔萨诺夫，并在基尔萨诺夫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当他掌握了革命的理论体系和实质以后，他就立刻着手去实践。为了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走出了学校，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他种过庄稼，做过木匠，摆渡的船夫以及各种对健康有益的行业中的工人；有一回他甚至作为一名纤夫走遍了伏尔加河流域。”拉赫梅托夫用卖掉田产的钱来供七名大学生念书。他自己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虽然他是精美食品喂养大的，口味很高”，但他吃得很坏，目的是为了至少能稍稍体会一下贫苦人民的生活。他甚至睡在扎有几百枚小钉的毡毯上，弄得浑身是血，为的是锻炼自己的意志，以便一旦被捕时能经受得住严刑的考验。除了运动、锻炼体力的劳动和读书之外，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工作。“他都在于别人的事，或者干那不是专属任何人的事。”他一个月难得用一刻钟浪费在娱乐上。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阴沉沉的怪物”，其实，他是一个“又可爱又愉快的人”。他有着火一样的热情。但是，他为了事业决心牺牲个人的爱情。他向自己所爱的女人说道：“我应该抑制住我。心中的爱情，对您的爱会拴住我的双手，就是不恋爱，我的手也不能很快地松开，已经给拴住了。但是我一定要松开。我不应该恋爱。”在拉赫梅托夫身上，概括了那个时代的革命战士和领袖的优秀品质：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改造世界观的高度自觉性。作者把这样的人称作“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

作者认为，无论是“平常的正派人”，还是“特别的人”他们都是祖国的希望所寄托的人。作者确信，这种正派人将与日俱增。如果人们都来效法他们，“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也会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好。”

不待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确实是具有与“多余人”迥然不同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全新的典型。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是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莫夫这样一些“多余人”的形象。他们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去改变现实，既不愿与贵族统治集团同流合污，却又不能与贵族社会的生活环境彻底决裂，更无法挣脱贵族阶级的种种偏见的束缚，于是陷入矛盾、痛苦之中。这种“多余人”属于那个已经逝去的贵族革命时代。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斗争舞台，俄罗斯文学中也开始出现了他们的形象。比如波缅洛夫斯基的小说《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中的主人公莫洛托夫，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等。但是，由于受到世界观的局限，作家们并没有描绘出这些人物的准确的肖像。

比如屠格涅夫笔下的“新人”巴扎洛夫，一方面他是贵族制度的坚定的不妥协的否定者，与贵族知识分子相比，他在精神上的优势和性格上的雄健坚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有社会理想、不关心群众痛痒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对农民的处境是否将得到改善，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他曾说：“唔，就算他（指农民）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从我的身上（指自己的墓地）长出牛蒡来--以后又怎么样呢？”一次情场失意的经历竟然使他对生活感到“厌倦跟愤怒”，工作热情迅速消退，甚至真理是否存在也成为值得怀疑的了。由于作者属于自由主义营垒，他的思想感情是旧的，他还是既不能充分了解“新人”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勇气去支持他们的社会理想。因而他也就没有能力确切地把这类“新人”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他所描绘的这种人物性格也就不能不缺乏应有的明确性和一贯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则不同。他不仅同“新人”们血肉相连，熟悉他们的生活，赞成他们的观点和愿望，而且他本身就属于“新人”的营垒，又是这种“新人”的精神领袖。因此，他也就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把“新人”的典型确切地描绘出来了。卢那察尔斯基在比较了巴扎洛夫和拉赫梅托夫这两个形象之后评论说：“……巴扎洛夫是更生动的人物，可是拉赫梅托夫却以无比的感情力量和明确的目的性吸引了我们。这些特点终于使他成为六十年代所创造的最高典型。”这是一个极为中肯的评价。

但是，对于这部小说的艺术性，在当时进步营垒的作家和后来苏联的评论家中，也有人持否定的意见。例如当时著名作家列斯科夫在肯定小说的思想意义的同时却说什么从艺术方面看，小说“值不得评论”，“它简直可笑”。赫尔岑也对其艺术性表示过非议。苏维埃时代的评论家斯卡夫提夫竟认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中，一切都是以抽象的逻辑表达出来的。”因此，“不能把它和严格意义下的文艺作品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和评论”。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也曾一度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不属于文学之列”。这些看法都不免失之于偏颇。小说的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小说之所以有着巨大的鼓舞教育作用，“新人”形象所具有的高尚思想和无瑕品德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新人”形象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者自己说过：“这部小说的全部优点在于真实。”在创作中，他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首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孤立地描写人物性格，而是十分注意揭示性格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环境对于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来介绍“新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崇高的思想和言行一致的实干作风，都是同他们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

但是，他也没有机械地把性格本身完全归结于人物所生长的环境。这明显地反映在对拉赫梅托夫这个形象的描写上。事实上，拉赫梅托夫的性格不仅与其社会出身、生活环境完全相悖，而且导致了他与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生活传统、精神传统的彻底决裂。

作者科学地解释了拉赫梅托夫性格形成的原因。他强调除掌握革命理论外，还需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在群众中自觉地进行改造和锻炼。因此，他把“平常的正派人”仅只放在自己人的环境中，即平民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来描写，而却把“特别的人”放在更广阔的人民的生活的背景上来表现。

虽然作为一个具有启蒙主义观点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

拉赫梅托夫所以变成“特别的人”“主要的当然还是天性”。他却并没有用纯启蒙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的天性问题。他认为，虽然“根据天性来说，人总是倾向于真、善的”，但如果社会制度不合理，人性善的倾向在现实中也仍然不能在一切人的身上表现出来；而人的天性中的优点要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也有赖于社会历史条件。具体说，若不是五十年代中期形成的俄国历史条件，“新人”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塑造“新人”典型时，总是十分注意“新人”典型的个性化描写。

“新人”的共性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并不是从一个模式中刻制出来的。例如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这两个曾长期共同生活的挚友，都属于当时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基尔萨诺夫崇尚科学活动，属于学者型。当时俄国出现了一批进步的唯物主义学者，例如生物学家皮罗果夫、谢切诺夫和化学家门德烈耶夫。而洛普霍夫则倾向于社会教育和政治活动，属于那种直接参加解放斗争的革命的启蒙主义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等人的行列。作者还通过多方面的描写来表现其迥异的性格。比如在表达爱情的方式上，基尔萨诺夫是缠绵细致，洛普霍夫却更富有理性。总起来说，洛普霍夫性情平和、内向，喜欢离群索居，严肃有余，而基尔萨诺夫的气质却热情奔放，喜好社交活动，更为开朗，富有生活情趣。

车尔尼雪夫斯基细腻的心理分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是“新人”形象真实感人的重要原因。他运用了“心灵辩证法”描写出了人物“怎样从一些思想、感情中引申出另一些思想感情来”，甚至连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也没有遗漏。例如在韦拉身上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感情上的转移，但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她只想到：“我又得整晚整晚地独坐家中了。可是这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随后她又问自己：“为什么我丈夫不常常陪我去玩呢？”这表明，她的潜意识中已经产生了对他的不满，但她马上又为他解释：“我的亲爱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我的亲爱的的是在为我工作啊。”

作者不仅注意表现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他尤其注意抓住现代人心理思维的特点，强调了在心理活动中思想作用的提高。他特别重视思想的力量，在他的“心灵辩证法”中总是强调理智是不可战胜的。在韦拉的第三个梦中就可以看到他对韦拉感情变化所作的严密的逻辑推理。

她在日记上写着：“我多么爱他（指洛普霍夫），他把我从地下室救出来了。”“我爱他难道就为的是他把我救出地下室吗？”然后她又想否定自己的怀疑：“每个妇女都会爱上他这样的人。他多聪明，多高贵，多善良！”但她还是不能否定这种怀疑：“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是我的救星。但高尚只能使人产生敬重、信赖、友情、合作的心愿，对于救星只能回报以感激和忠诚。……我需要恬静缠绵的爱情，需要在温柔的感情中甜甜地入梦乡。”接着她的疑问以更明确的形式被提出来了。“他知道我的需要吗？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需要都一致吗？”“他是不是心里总想着我？我是不是一心挂念着他？”最后她终于得出了结论：“不，我对他的感情不……”在这里，作者不是在自发的辩证发展中来展现人的心理活动，而是在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理性分析的过程中展现人物的这种心理活动的本质的。

除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生动性之外，政论性也是这部作品

的一个主要艺术特点。小说的结构安排得非常巧妙。在故事情节之外，作者的插叙占了大量的篇幅。

作者通过这些插叙对所描写的生活进行了理论性的概括。如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赞》一书中作者着重阐述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品质和性格起决定性影响的规律。又如在“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波洛佐娃的信”一节中，作者用数字和统计材料来总结缝纫工场的发展情况，论证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劳动的优越性。她写道：“你知道她们为什么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她们干活靠的是自己出的本钱，她们自身就是老板，她们得到了本来该留给老板的那份利润。可是还不止于此，她们用自己的本钱为自己的利益干活时，原料和时间都节省得多：干得更快，花得却更少。”在小说中作者还采取了和主人公，广大读者谈话的形式，讲述了许多深刻的哲理。在这种谈话中，既有庄严的号召，又有亲切的教诲；既有尖锐的批评，又有诚恳的交心。话题广泛多样：有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作者鼓励广大的读者：“你们完全能够跟我描写得极为充分的那三个人达到同样水平”），有对于真正的爱情的理解（他指出：“你必须拥有一颗纯洁的心和一个诚实的灵魂，具有人权的现代的观念，能够尊重那个与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有关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的看法等等；作者与“敏感的男读者”的对话，驳斥了贵族自由派的谬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这部作品是在囚禁中创作的，作者不能不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思想不为敌人所察觉，因此，小说运用了大量的暗示和比喻。例如作者通过女主人公韦拉的梦境宣传革命思想。第一个梦表现了韦拉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以及对个人解放与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和理解。第二个梦谴责了寄生阶级，揭示了他们腐朽堕落的原因，指出了改造社会的必要性以及通过劳动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去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第四个梦寓意很深，不仅展示了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地位，还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辉灿烂的远景，指明这才是人类的永恒的欢乐。作者热情的召唤人们：“那对于所有的人都永远是春天和夏天，永远欢乐无穷。”“未来是光明美好的。爱它吧，向着它奔去，为它工作，使它尽快到来，使未来成为现实吧！”

无疑地，《怎么办？》首先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的“可以用来充实读者的那些新思想”。但是，《怎么办？》本身的艺术性也是不容抹煞的。事情很明显，如果它只是革命思想的图解，而不是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又怎么可能被千千万万的先进读者当作是“自己的福音书”，激动着一代又一代的先进青年的心，推动他们思考，奋起，走上斗争的道路呢？

《怎么办？》的这一个译本，是根据苏联真理报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的版本以及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经过校勘考订后的新版本翻译的。

早在五十年代，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就曾阅读过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蒋路同志翻译的《怎么办？》，并由此激起了对研究本书的浓厚兴趣。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九四年，蒋路同志又先后出了《怎么办？》的两个新译本。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工作时，这两个译本我也都认真地阅读了。

蒋路同志是俄国文学翻译界的前辈。他对《怎么办？》有着深刻的理解，译笔准确、流畅。我在重译本书的过程中，曾经从蒋路同志的几个译本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蒋路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还要对译林出版社的负责同志章祖德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深切的谢意。

魏玲

一九九七年九月

— 一个傻瓜

在彼得堡，通往莫斯科的铁路的车站附近有几家大旅馆。一八五六年七月十一日早晨，其中一家旅馆的茶房们陷入了莫名的困惑之中甚至有几分惊恐不安。头天晚上八点多钟，有一位手提皮箱的先生来旅馆开了个房间，接着交出身份证登记，还要了茶和肉饼，然后吩咐说晚上别惊动他，因为他太累了，要睡觉；可是明早务必在八点钟叫醒他因为他有急事。他锁上了房门，只听见刀叉的响动，茶具的响动，过一会儿就悄然无声了--大概是睡着了。早晨八点钟，茶房敲昨天那位来客的房门，客人不吭声；茶房敲得越发使劲，使出了很大的劲--客人还不答话。看来他是太疲劳了。茶房稍等了会儿，过了一刻钟又去叫，仍旧叫不醒。于是他跟别的茶房和餐饮柜台的领班商量起来。“他不会出什么事吧？”--“应当把门砸开。”“别砸，这样做不合适，砸门得有警察在场。”大家决定再使劲地叫他一次试试。如果他这回还不醒，那就去找警察。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仍然叫不醒，于是才派人去找警察了。现在等着警察来，跟他一起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午将近十点钟的时候，来了个警官，他先亲自敲门，又命令茶房敲--结果跟原先一样。“没别的办法了。砸门吧，伙计们！”房门给砸开了，屋子里空无一人。“看看床底下，”床下也找不到那客人。警官走到桌旁，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的字又粗又大，这样写着：

我于晚间十一点钟离去，不再返回，午夜两点到三点之间

在利坚桥上能听到我的动静，千万不要怀疑任何别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事情才算清楚了。不然，怎么也搞不明白。”警官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伊凡·阿方纳希耶维奇？”餐饮柜台的领班问。

“端茶来，我再讲。”

警官的故事被人们兴奋地转述着，议论着，成了长时间以来旅馆里的一个热门话题。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午夜两点半，那是一个多云的漆黑的夜晚，在利坚桥中央突然有火光一闪，并传来了手枪声。护桥的值班人员都闻声奔去，几个行人也聚拢了过去。在那传来枪声的地方，竟没见一个人，也没看到任何东西。可见这不是他杀，而是自杀。有几个自愿下去潜水的人，没过多大会儿就拖来了几根钓竿，连渔网也拿过来一副。他们钻到水下摸找，打捞，结果只捞上来了五十来块大木片，却没能把尸体找到，捞上来。怎么能找得到呢？夜里黑极了，况且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恐怕尸体早已漂到了人海口。要找，到海里去找吧。这时又出现了一批激进分子，推翻了原来的假设：“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尸体，或许是个醉鬼，或许干脆是个捣蛋鬼，为了开开心，放一枪就溜了，

也说不定这位当时正站在忙乱的人群里边，观赏着自己一手制造的这场虚惊，暗暗地窃笑呢！”

然而大多数人在慎重地做判断时，总是保守的，他们坚持原来的看法。“开什么心，朝自己的脑门开枪，这就是全部的事实。”激进分子被击败了，然而获胜的一派照例在得胜后，马上又出现了意见分歧。自杀，是自杀，但为了什么呢？“是醉鬼呗，”一些保守分子这样认为：“因为败光了家产，”另一些保守分子断言：“不过是个傻瓜而已，”有人如是说。“不过是个傻瓜而已，”在这点上大家的看法一致了，连那些否定他是自杀的人也同意的。的确，是醉鬼自杀呢，还是败家子自杀，或者这捣蛋鬼根本就没自杀，而只是耍了个小把戏，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是个极其愚蠢的，只有傻瓜才会干的勾当。

夜里桥上发生的事到此就中止了。第二天清晨，在通往莫斯科的铁路附近的旅馆中才发现，傻瓜不是逗乐子，而是自杀。但是事情的结局中有一点共识，就连失败者也能接受的，那就是：即使他不是闹着玩，而是自杀，他也还是个傻瓜。这个大家都满意的结论，正因为获胜的是保守分子，便更能站得住脚。假如他只是在桥上放枪开开心，那么实际上还是不能确定，他是个傻瓜呢，或者不过是个捣蛋鬼。但是他却在桥上自杀了。

谁会在桥上自杀呢？怎么能在桥上自杀？干吗要在桥上呢？在桥上自杀太蠢了！可见他毫无疑问是个傻瓜。

一些人又产生了疑问，他在桥上自杀，而人们都不在桥上自杀，可见他并没自杀。

但到傍晚时，旅馆的茶房们被传到警察分局验看一顶从水里捞上来的被子弹打穿孔的制帽，大家都认出来了，正是客人戴过的那顶。这么说，他无疑是自杀了。否定分子和激进分子一下子全都泄了气。

大家一致同意那是个‘傻瓜’，可突然大家又议论起来：在桥上自杀可真是个好主意！这么一来，即使一下子没能击中要害，也不会长时间的痛苦下去。无论伤势如何，他都得掉到水里去。不等清醒过来，人就憋得透不过气了。是的，在桥上……聪明。

现在简直使人全糊涂了：又是傻瓜，又聪明。

二 傻瓜案件的初步调查

正是那天上午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在石岛上一座三间一套的小别墅里，一位年轻的太太边做针线活，边低声哼唱着一支活泼而雄壮的法国歌曲。

彼得堡众多的岛屿之一。

指法国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歌曲《Caira》歌词的原意为“一切都会好”或“一切顺利，车尔尼雪夫斯基译作“这事业一定会成功”。

“虽然我们穷苦，”歌中唱道，“却有结实的双手，我们大家都是工友。虽然我们都是文盲，但我们并不愚妄，我们渴望看到光明。我们要学习再学习，知识能使我们获得解放；我们要劳动多劳动，劳动能使我们充实、富有。

这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活着，必将看到它成功。

Ca ira,
Qui vivra, vch.

这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活着，必将看到它成功。

“我们野蛮粗鲁，为此我们吃尽苦头，我们的头脑被塞满偏见，再由我们自己为此来承受痛苦，我们对这已深有感受。我们要寻求幸福，一定能把人道寻觅到手。我们将变得善良宽厚。这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活着，必将看到它成功。

“没有知识，劳动收不到果实；他人不幸，我们还能谈何幸福。我们受了教育，才能充实而富有；我们将会幸福，因为大家都亲如手足。这事业一定会成功，我们活着，必将看到它成功。

“我们要学习和劳动，我们将相亲相爱，永远歌唱。地球上会出现天堂，我们将生活得快乐舒畅。这事业一定会成功，很快就能成功，我们要看到它成功。

Denc, vlvons
Ca bien vite ira
Ca Vendr,
Nous tous le Verronsn.”

所以我们要活下去，
这事业一定会成功，
很快就能成功，
我们要看到它成功。

这是一首雄壮活泼的歌，曲调十分欢快，虽也夹有两三组忧伤的音符，但却被整体的明快的曲调所淹没，消失在重复的主旋律之中，消失在终了的最后一个小节之中，至少应该是被淹没消失掉的。如果那位太太处在另一种心境中，它们也就消失掉了。可是现在经她一唱，这为数不多的几个忧伤的音符听起来反而更为清晰。她觉察到这个，身子仿佛抖动了一下，就在这里压低了嗓音，然而却更加用力地唱起紧随着的欢快的曲调来。但是她的思路又从歌曲转向了自己的心事，忧伤的调子重又占了上风。那位年轻的太太显然不喜欢伤感满怀，而忧伤显然也不肯离开她，不论她怎样地驱赶。不过把欢快的歌唱得忧伤也好，或者按照它应有的欢快来唱也好，那位太太做针线活却始终非常地投入。她可真是个好裁缝。

她的女仆、一个年轻的姑娘走进房来。

“您瞧，玛莎，我缝得怎么样？两个袖口都差不多缝完了，这就是我准备参加您婚礼时穿的。”

“哎呀！这上头绣的花比您给我那件绣的可少多啦！”

“当然，在婚礼上新娘当然应该穿得最漂亮！”

“我给您带来一封信，韦拉·巴夫洛夫娜。”

韦拉·巴夫洛夫娜动手拆起信来，脸上掠过一丝迷惑不解的神情。原来信封上打着本市的邮戳。“怎么回事？他不是莫斯科吗？”她急忙把信打开，脸色变得苍白，拿信的那只手垂了下来。“不，不会是这样，我虽没能全读完，可信上根本不会写这的！”她又抬起了那只拿信的手。这一切都发生在两秒钟之内。在这一次重读信时，她的眼睛一动不动、长久地凝视着信上那不多的几行字。她的这双明眸顿时失去了神采，木呆呆的，信从她无

力的手中落到了缝纫桌上，她双手掩面，失声痛哭。“我干出了什么事！”

“我干出了什么事啊！”接着又大声地哭起来。

“韦罗奇卡，你怎么啦？难道你是个爱哭的女人吗？你什么时候这样哭过？你这到底是怎么啦？”

一个年轻男子疾步流星地走进屋来，但步子很轻，小心翼翼的。

“你读吧……信在桌上……”

她已经不再大哭了，只是一动不动、几乎屏息地坐着。

年轻男子拿起了信，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双手发抖。他久久地看着信，虽然信不长，总共才二十几个字：

我扰乱了你们的平静，我要退出舞台。不必怜惜我。我

是这样地爱着你俩，因此下了这个决心，也就心满意足了。

别了！

年轻男子久久地站着，揉着额头，然后捻起胡髭来，接着看了看自己的大衣袖子，最后总算才集中了思想。他朝那年轻女子身边走近了一步，她却照样一动不动、几乎屏息地静坐着，仿佛得了昏睡病一样。他拉起她的手：

“韦罗奇卡！”

但他的手刚一碰她的手，她就像是触了电似的、惊吓地叫着，跳了起来。她急忙躲开了那年轻男子，猛然地推开了他：

“一边去，别碰我，你满身是血，你身上有他的血！我不能再见你！我要离开你！”

“我要走，离开我！”她说，用力推着，推着那看不见的空气。突然她晃动了一下，歪倒在一把扶手椅里，双手捂住了脸。“我身上也有他的血！我身上！你没有错，错在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我干出了什么事！我干出了什么事啊！”

她哭得喘不过气来。

“韦罗奇卡，”他轻轻地、怯生生地说，“我的朋友！”

她深深地喘了口气，用平静的，但仍旧在颤抖的声音勉强说道：

“我亲爱的，现在离开我吧！过一个钟头再来，我就平静了。给我点水就走吧！”

他默默地顺从地做了，走进自己的房间，重又坐到了自己的写字台旁、一刻钟前他还曾经那样平静自得地坐过的地方。他重又拿起了笔……“在这样的时刻必须善于控制自己。我有意志力，一切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他无意识地在自己的一篇稿子当中下笔写道：“她经受得住吗？--可怕--幸福完结了……”

“我亲爱的！我好了，咱们谈谈吧！”听得见她在隔壁房里说。年轻女子的声音低沉，但是很坚定。

“我亲爱的，我们应该分手。我已然决定了。这是很痛苦的，可更痛苦的还是我们相互见面。我是害死他的罪魁祸首。我害死他是为了你。”

“韦罗奇卡，你到底有什么过错？”

“什么也不要说了，别为我开脱，不然我会恨你的。我，全都是我的错。原谅我，我亲爱的，我采取的决定使你很痛苦，我也痛苦，我亲爱的！但我不能不这样做，过些时候，你自己也会看出来：就该这样做，这是不能改变的，我的朋友。你听我说，我要马上离开彼得堡，远离这些使人回想起往事的地方会好过些的。我要卖掉我的东西，靠这些钱我可以维持一些日子。在

哪儿过？特维尔还是下诺夫戈罗德，我不知道，反正都一样。我想找份教唱歌的工作，大概能找到，因为要住，我就住大城市里。如果找不到，就去当家庭教师。我想我不会受穷的。如果真穷了，我就去找你。费心替我张罗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你也知道我有多种多样的需求和花销，虽然我是很节省的，取消这些不行。你听见了吗？我不拒绝你的帮助！我的朋友，用这好证明你还是我最亲的人……现在咱们该永别了！你进城去吧……马上，马上就走！我一个人留下来，会好过些。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那时候你再回来。我去莫斯科，到那儿再看，再打听，去外省哪个城市找教书的工作更有把握。我不许你到车站送我。别了！我亲爱的，握握手，告别吧，最后一次握你的手了。”

他想拥抱她，但她及时防止了他这样做。

“不，不要，不行！这是对他的侮辱。握握手吧。你瞧，我握得多紧！别了！”

他不放开她的手。

“好了，你走吧。”她抽出手来，他不敢违抗。“别了！”

她充满柔情地瞧了他一眼，随后迈着坚定的步子，再也没有回头看他，就离去了，她走进了自己的屋里。

他找了很久自己的帽子也没能找到。虽然有四五次他都把帽子拿到了手里，可是并没有觉察拿着帽子呢。他仿佛喝醉了酒。他终于才明白过来，他要找的帽子就在他的手边。他走到前厅，穿上了大衣。当他快走到大门口时：“谁在我后面跑？大概是玛莎……大概是她感觉不好了！”他转过了身，韦拉·巴夫洛夫娜扑过去，搂住了他的脖子，拥抱他，用力地吻他。

“不，我忍不住了，我亲爱的！现在，永别了！”

然后她往回跑，一下子扑到了床上，憋了这么久的眼泪泉涌般地流了出来。

三 序

“这部小说的内容是爱情，主角是个女人。这就好，即使小说本身写得不怎么样。”女读者说。

“说得对，”我说。

男读者不能满足于这种肤浅的结论，因为男人的思维能力天生比女人强，而且发达的程度也高得多。他说--女读者恐怕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她却认为无需说出来，因此我没有理由跟她争论--男读者说：“我知道这位自杀的先生并没有自杀成。”我抓住“我知道”这几个字来谈谈：你并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只能知道人家告诉过你的事情。其实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你甚至不知道，我这部小说就是从羞辱、贬损你开始写的。本来你不知道这，对不对？好，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吧。

是的，小说的头几页表明我把读者想得很坏。我使用了小说家惯用的手法，从小说的中间或结尾截取几个引人入胜的场面，作为全书的开端，再给罩上一层迷雾。读者啊，你们憨厚、善良，因此你们不会挑剔，也不善于

猜度。我不指望你们看完头几页书就能判断出小说的内容是否值得一读，你们的嗅觉不灵敏，需要借助于外界的帮助，而能借助的无非两样：或者是作者的名字，或者是引人入胜的手法。我给你们讲述的仅只是我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你们也还不能自己判断作者有没有艺术天才（可是你们却已经给如此众多的作家冠之以艺术天才了），我的署名还不足以吸引你们的注意，因此我必须用引人入胜的手法作诱饵来吸引你们上钩。别为此责备我，全是你们自己的错，你们那种傻里傻气的幼稚使我不得不屈就到这般庸俗的境地。不过现在你们已落入了我的掌心，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讲下去，想怎样讲就怎样讲，也不用耍什么花招。往下讲也没有神秘的色彩了，每个情节的结局你们总可以提前二十页看出来。我先把整部小说的结局告诉你们吧：故事的结尾皆大欢喜：又是喝酒，又是唱歌；既无引人入胜的场面，也无任何夸张的成分。作者顾不上夸张了，善良的读者，因为他尽在想着你们的头脑有多么紊乱，你们那异常混乱的观念给每个人带来这么多无谓的痛苦。我怜惜地看着你们，又感到可笑：你们头脑里充斥着无聊的念头，使得你们如此地虚弱，又如此地凶恶。

我生你们的气，是因为你们对人这么凶恶，而你们自己不也是人吗？你们为什么这样来对待自己呢？所以我骂你们。但你们的凶恶是由于智力上的孱弱，因此我骂你们的同时，我还应当来帮助你们。从哪儿帮起呢？就从你们现在所想的问题开始吧：“这位作家是谁呀？跟我们说话这么不留情面！”我告诉你们吧，我是个什么样的作家。

我没有丝毫的艺术天才，甚至连语言也驾驭不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读下去吧，最善良的读者！开卷有益嘛。真实性才是个好东西。作家服务于真实，真实就能来弥补作家的缺陷。因此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没有预先对你们说，那么你们也许以为这部小说写得很富有艺术性，以为作者的诗才很高。可是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我没有天才，所以现在你们也该知道了，这部小说的全部优点仅在于它真实。

不过，我最善良的读者们，我跟你们谈心，当然就得披肝沥胆，因为你们喜欢猜测人家尚未讲完的话，可又不善于猜测。我说我没有丝毫艺术天才，我的小说写得很差，你们可不许由此得出结论：好像我对你们讲过，我不如你们心目中的那些伟大作家；我的小说也不如他们的作品。其实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真正天赋才华的人们的作品来，我的小说写得很差。至于跟你们心目中的名家名作来比，就写作的优点而言，你们尽管放心大胆地把我的作品与之相提并论，就是评价得更高，也是决不会错的。我的小说中的艺术性还是超出了那些作品，对于这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你们要感谢我，你们不是爱向瞧不起你们的人行礼鞠躬吗，那么就向我顶礼膜拜吧。

可是在你们中间，读者啊，也还有一小部分我所尊敬的人，现在已变成相当数量的一部分人了。我对你们，对大多数人不留情面，不过只对你们大多数人这样，而且在这之前我都是只跟你们说话。我跟刚才提到的那些人说起话来，是谦和的，甚至还胆怯。

然而我跟他们说话无需解释。我看重他们的意见，不过我预先就知道他们是跟我一致的。

善良、坚强、诚实、能干的人们，他们不久前才在我们中间出现，但人数却已不少，并且还在迅速增加。如果读者都是他们那样的人，我就不需

要写作了；如果他们还没有出现，我又不可能写作。但他们已然出现在读者中间，却又不是全体读者，因此我还需要写作，也有可能来写作。

—

韦拉·巴夫洛夫娜所受的教养很一般，她在认识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之前，她的生活虽然已显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但并不特殊；而在她的行为举止方面当时就有些非同一般了。

韦拉·巴夫洛夫娜是在豌豆街上、在花园街和谢苗诺夫桥之间的一幢高层楼房里长大的。如今这幢房子已标上了按顺序它该有的门牌号码了。可是一八五二年还不兴这类门牌号码。只在墙上有个题字：“四品文官伊凡·扎哈罗维奇·斯托列什尼科夫的房屋”。

题字是这样写的。不过伊凡·扎哈罗维奇领托列什尼科夫一八三七年就已去世，他一死房东便是他的儿子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房契上这样注明的。但是房客们全知道，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只是房东的儿子，房东太太安娜·彼得罗夫娜才是房东。

这幢楼在当时来说是座大楼房，就如今看它也不算小了，有两道大的院门，四个临街的大门，往里头走是三个院子。一八五二年时，女房东和她的儿子跟现在一样，住在楼梯口正朝着大街的二楼楼上。安娜·彼得罗夫娜现在风韵不减当年，仍然是位气度不凡的太太。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现在是位身材魁梧的军官，当时是个又魁梧、模样又漂亮的军官。

从第一个院子里大楼的许多后门中最脏的那座楼梯往上爬，在四楼右首的一座住宅里，如今是谁住在那儿，我不知道。一八五二年时，那儿住的是房屋管理人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罗扎利斯基，一个健壮的、也很魁梧的男人同他的女人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一位精瘦而结实的高个子太太，还有他们的已成年的女儿，她就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和九岁的小儿子费佳。

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除了管理房屋外，还在一个局里任副科长。供职没有油水。

管房子却有油水，但是数量有限。要是换了别人，那钱可捞得多多了。而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却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有良心的。因此女房东对他十分满意。他经管房屋十四年，攒下了近万元的钱财，而从女房东钱袋里掏走的不过三千，其余都是从周转中积聚起来的，无损于女房东：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把钱拿去放债，专收细软做押头。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拥有一小笔财产。她告诉干亲家是五千左右，其实比五千要多呢。大约在十五年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靠着变卖自己那当官的兄弟身后留下的浣熊皮大衣、旧衣服和家具给这笔财产垫了个底儿。她卖得近一百五十卢布，把这笔钱也用来经营抵押放债。她经营起来，冒的风险比丈夫可大得多，好几次吃亏上当。有个狡猾的坏蛋用身份证作抵押，跟她借了五卢布，身份证原来是盗窃来的脏物。为了摆脱麻烦，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得不自己贴上了十五个卢布。另一个骗子抵押一块金表，借了她的二十卢布，那只表却原来是从被害的死人身上摘下来的。玛丽娅·阿列

克谢夫娜为了摆脱麻烦，又只得照规矩付款赔偿。尽管她所受的种种损失，她的那位小心谨慎地经营抵押放债的丈夫全都避免了，但是她的赢利却比丈夫来得快。她还找到了一些特别的捞钱办法。有一回，当时韦拉·巴夫洛夫娜还小，女儿成年以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不会再于这种事了，当时为什么不干呢？反正小孩不懂事！韦罗奇卡自己的确是弄不懂的，多亏厨娘给她讲解得明明白白。厨娘本不打算讲解的，因为这种事不该让小孩子知道。但她由于和姘夫饮酒作乐挨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一顿痛揍后（顺便说说，玛特辽娜的一只眼经常带伤，倒不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打的，而是姘夫给揍的。这也好，眼睛带伤的厨娘省钱！）心里实在忍不住，就给讲出来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有一次，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家里来了一位不寻常的、珠光宝气、盛装打扮的熟识的漂亮太太，她来到家里做客，安安静静地过了一个星期，只是总有那么一位长得也挺漂亮的文官来找她，他送给韦罗奇卡糖果，又送给她好几个漂亮娃娃，还送了两本都带插图的小书，一本书上印着野兽、城市风光的美丽图画；而另一本小书玛丽娅等那男客人一走，就从韦罗奇卡手中抢走了。这些图画韦罗奇卡只看过一次，还是他当面亲自指给她看的。那位熟识的太太这样住了一个多星期，家里一直挺平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整整一星期没走近过放伏特卡的食橱（开食橱的钥匙她从不交给任何人），而且她既不打玛特辽娜和韦罗奇卡，也不大声骂人了。可是后来有一天夜里，女客人发出了鬼哭狼嚎似的喊叫声，房子里的脚步声和乱哄哄的声音不断地吵醒韦罗奇卡。第二天早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走到食橱旁，比平日在那里多呆了一会儿，不停地说：“谢天谢地，还是运气好，谢天谢地！”她竟然把玛特辽娜也叫到食橱前，说：“随便喝吧，玛特努什卡，你也够辛苦啦！”接着她跟往日酒后大不一样，不打人不骂人，而是躺下睡觉了，睡前还吻了吻韦罗奇卡。后来家里又消停了一个星期，女客人也不再叫了，只是不出屋门，然后就走了。她走后过了两天，来了一位文官——可不是以前那一位文官——还领着一个警察，把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骂了好半天。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可也丝毫不肯让步，一再声明：“您的任何事情我都不知道。查查户口本，看是谁在我这儿住过！是普斯科夫的一个女客商，我的一个熟人萨瓦斯佳诺娃，这就是我能告诉您的一切。”那文官骂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总算走了，再没来过，这是韦罗奇卡八岁时看到的，九岁时，玛特辽娜给她讲了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事情只此一回，其他的事情形形色色，不过为数都不算多。

当韦罗奇卡是个十岁小孩时，有一回她陪母亲去旧货市场，在从豌豆街往花园街拐弯的地方，没料到挨了一个后脖儿拐，还遭了母亲的一顿训斥：“你尽盯着教堂看，怎么不往脑门上画十字呢？想必你也看得见，所有的好人没有不画十字的！”

韦罗奇卡十二岁进了寄宿学校，还请了个教钢琴的老师。这是个爱喝酒，心肠好的德国人，并且是位优秀的教师。但由于贪杯，他收费很低。

她不满十四岁就给全家做衣服了，好在家里人口不多。

韦罗奇卡快满十六岁了，母亲开始常常冲她这样喊：“洗洗你的脏脸吧，你这张脸简直像是茨冈女人，丑八怪。你洗了也不干净，生来就是这么个丑丫头，不知像谁。”韦罗奇卡由于脸长得黑，受了很多气，她已经很自然地把自己看作是个丑姑娘了。原先母亲给她穿的几乎是些破衣烂衫，现在却开始打扮起她来了。而韦罗奇卡打扮过后陪母亲去教堂时却想：“这些漂

亮衣服最好给别的女孩，我无论穿什么都一样——穿花布衫也好，绸缎裙也好，终归还是个丑茨冈。长得漂亮该多好。我多想长得漂亮啊！”

当韦罗奇卡满了十六岁，就不再跟那位钢琴老师学琴，也不再上寄宿学校了。她开始在母校授课，后来母亲又给她找了些别的课来教。

过了半年，母亲再不管韦罗奇卡叫茨阿女人和丑丫头了，开始比从前更精心地打扮她。韦罗奇卡听玛特辽娜说，（这已经是第三个玛特辽娜了，原先那个玛特辽娜左眼经常带伤，而这一个是左颧骨有伤，但不是经常有。）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的上司，一位脖子上挂着勋章的大官有意向她求婚。真的，局里的小官吏们都说，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的顶头上司处长开始对他赏识起来，处长对他的同僚们表露过这样的想法，说他需要娶个太太，没嫁妆不要紧，但得漂亮才行；他还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说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是个好官吏。

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怎么了结，但是处长确实处心积虑地谋划了很久，可是突然却出了变故。

少东家找房屋管理人来说，他母亲向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要不同种类的壁纸看看，因为母亲想重新装修她住的那套房间。以前这类命令都是由管家传达的。事情当然是再明白不过了，况且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和她丈夫都是深谙世事的人。少东家过来坐了半个多钟头，还赏光喝了一杯花茶。第二天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送给了女儿一只过了抵押期的带有漂亮扣环的项圈，又给她定做了两件料子极好的新连衣裙，光是衣料，一件值四十卢布，另一件五十二卢布，外加绉边、绦带和手工钱，两件连衣裙一共花了一百七十四卢布，至少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这样告诉丈夫的。韦罗奇卡却了解总共还不到一百卢布，因为订购时她也在场。但是就算是一百卢布，也完全可以做两件好料子的连衣裙了。韦罗奇卡喜欢连衣裙，也喜欢那项圈，而更使她满心欢喜的还是母亲终于同意去柯罗辽夫鞋店给她买鞋了：旧货市场上的鞋本来也太不像样子，而柯罗辽夫鞋店出的鞋穿在脚上却妙不可言。

连衣裙没有白做，少东家来房屋管理人家来得越发勤了，他自然是跟女儿谈得比跟管理人夫妇谈得要多，管理人夫妇自然把他奉为至宝。母亲还给了女儿一些劝导，总之该说的都说了，这都是尽人皆知的话，用不着来描述了。

有一天午饭后，母亲说：

“韦罗奇卡，好好穿戴穿戴，我给你准备了一份你意想不到的礼物——去看歌剧，我买的是二楼雅座的票，那是将军夫人才能坐的席位。全都是为了你，小傻瓜，为你把最后的一分钱都花掉我也不心疼。你父亲为了给你花钱，肚子都饿瘪了。光是上寄宿学校交给那女老师多少钱啊，一次又一次地交，还有给钢琴老师交了多少！你对这简直麻木不仁，不领情，不知恩，我看是丧了良心，真是无情无义呀！”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只说到这儿，再没骂过女儿，这哪里算得上骂人？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只不过这样和韦罗奇卡说说而已，她早就不再骂她了，自从处长求婚的传闻散布出来以后，她连一次也没打过她。

她们来到歌剧院。第一幕演完，少东家和他的两个朋友一同走进了包厢。一个是异常文雅的瘦弱军官，一个是比较敦厚的大胖军人。他们坐定后，不停地窃窃私语，少东家跟那文官谈得多，而跟那军人讲得很少。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用心听着，几乎每个同都能听清楚，可就是不大明白，因为他们

一直讲法语。在他们的谈话中，他只听懂四五个词：belle, charmante, amour, bonheur。这些词包含什么意思呢？belle, charmante(漂亮, 可爱)——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早就听说过人说，她的茨冈姑娘，又belle又charmante；至于amour(爱情)——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已经亲眼见到了，他完全陷进了amour里面；既然有了amour，自然是(幸福)了。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呢？他会不会很快求婚呢？

“韦罗奇卡，你对父母不领情，不知恩也就罢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小声地对女儿说，“你干吗不理他们？他们进来损害你什么了？傻瓜，人家这是给你面子呀。

“‘马辽日’是法国话婚礼的意思吧，是吗？还有，新郎，新娘和结婚，法国话该怎么说？”

韦罗奇卡说了。

“不对，好像没听见这样的词……韦拉你告诉我的这几个词恐怕不对吧？你可小心我！”

“不，我说得对。不过，这些词您从他们嘴里是听不到的。咱们走吧，这儿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什么？你说什么，混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气得两眼冒火。

“走吧！以后随便您想对我怎样都行，现在我可决不待了。我以后再告诉您理由。

妈妈，”她大声地说道，“我头疼极了，在这儿坐不住了。求您啦！”

韦罗奇卡站了起来。

骑士们一下子乱了手脚。

“就会好的，韦罗奇卡，”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威严而又彬彬有礼地说，“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到走廊上走一走，头疼就会好了。”

即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

“不，不会好的；我觉得头晕。快点，妈。”

骑士们打开门，想用手搀扶韦罗奇卡，混丫头却拒绝了！可他们还是亲手给她穿大衣，亲自送她上马车。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傲气十足地看看仆役们，心想：“贱小子，瞧瞧骑士们多有派头，这一位就快当我的女婿啦！将来我也要养一帮贱小子侍候我。你跟我使性子，摆架子，混丫头，看我收拾你！”别急，别急，她的女婿送这个自高自大的混丫头上车时，他对这可恶的丫头说了什么？sante大概是“身体”的意思，avoir——“探问”，visite，跟我们说的BMENT(拜访)一样，permet - tez——“请允许”。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并没有因听到这几个词而减少怨恨不满情绪；但是这些词是值得加以注意的。马车开动了。

“他送你上车时，对你说什么了？”

“他说，明天早晨来问问我的身体情况怎样。”

“真说是明天，你没瞎说？”

韦罗奇卡沉默不语。

“算你走运！”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忍不住，还是猛地拽了一下女儿的头发。

只拽了一下，而且没使劲。“好，我不碰你，不过明天你得高高兴兴的！好好睡一宵，傻瓜！不许哭，要是明天我看见你脸色苍白、眼睛红肿，你可小心点。以前我没管你……往后可决不饶你。我才不心疼你这张漂亮脸呢，

反正漂亮也是白搭，还不如让你知道知道老娘的厉害！”

“您知道，我已经好久都没哭了。”

“这才是啊，你还得跟他多说话。”

“好，明天我跟他谈谈。”

“这才是，你也该明白事理了。你得敬畏上帝，心疼娘，不害臊的丫头！”
过了十来分钟。

“韦罗奇卡，你别生我的气。我是因为疼你才骂你，盼你好。你不知道，孩子对于娘来说有多亲，你在娘胎里九个月呀，韦罗奇卡，你得知恩报恩，听娘的话，有一天你会明白是为你好，照我教的做，管保他明天向你求婚！”

“妈，您错了。他根本不想求婚。妈！他们说的什么话呀！”

“我知道。要不是说结婚，就是说谁都明白的那种事呗，他们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咱们可不是那种好欺负的。我非煞煞他的威风不可。我把他装在麻袋里运到教堂去，拽住他脑门子两边的头发，绕着念经台转圈儿，他还能乐得起来吗？好，没什么更多的可说了，我已经说得不少了。姑娘家本不该知道这些，这是为娘管的事。姑娘家什么都不明白，就该听老人的。那么，你会听我的话跟他谈谈吗？”

指姘居。

“是的，我会跟他谈的。”

“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你怎么像个木头疙瘩光坐着？你这个当爹的也说说，叫她听娘的话，说娘是不会教她学坏的。”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你是个聪明女人，不过这事很危险，你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了！”

“傻瓜！你说话真不知深浅，还当着韦罗奇卡的面！我悔不该惊动你！常言说得好：粪不搅不臭！哎，瞧你满嘴放屁。你别空发议论了，就说说，做女儿的该不该听娘的话？”

“当然该听，这还用说，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好，你这当爹的，也嘱咐几句吧。”

“韦罗奇卡，你事事都要听娘的。你娘是个聪明女人，有经验的女人。她不会教你学坏的。我作为爹这样嘱咐你。”

马车在大门口停下了。

“得了，妈。我跟您说了，我会跟他谈的。我很累了，需要休息。”

“躺下睡觉吧。不再打扰你。这样明天你才有精神，好好睡个大觉。”

他们上楼梯的时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果然一直沉默着。她耐了多大的性子，才强忍着不说话。当韦罗奇卡说不想喝茶，径直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又是耐了很大的性子，勉强地用温柔的声调说：

“韦罗奇卡，到我这儿来！”女儿走了过去。“我要在今晚你睡觉前为你祝福，韦罗奇卡。低下头来！”女儿低下了头。“上帝将为你祝福，韦罗奇卡，就像我现在为你祝福一样。”

她为女儿祝福了三遍，然后让她亲吻自己的手。

“不，妈。我早就跟您说过不再吻您的手了。现在让我走吧。我真觉得头晕。”

啻，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两眼又冒火了。但她克制住自己，温和地说：

“去吧，休息吧。”

韦罗奇卡刚一脱下衣服就收拾起来——不过这花了许多时间，因为她一直在想心事：她脱掉手镯，久久地坐着，手里还捏着它，她摘下耳环，又想得出了神。过了半天，她才想起来，她已经疲劳不堪了，当她吃力地走到自己的房间时，她连在镜子跟前站都站不住了，她已精疲力竭，瘫倒在椅子上。她想起她必须赶快脱衣睡觉，可韦罗奇卡刚上床躺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走了进来，她端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摆着父亲的大茶杯和一大堆面包干。

“吃吧！韦罗奇卡！随便吃！我亲自给你端过来的，你瞧，妈总是惦记着你！我坐在那儿，心里就想：韦罗奇卡怎么不喝茶就躺下睡觉啦？我自己一边喝茶，一边也想着，瞧，这不就端来了。吃吧，我的好闺女！”

韦罗奇卡觉得母亲的声音很奇怪，确实是又温柔又慈祥，这是从未有过的。她诧异地看了看母亲。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两颊排红，目光有点飘忽不定。

“喝吧，我坐在这儿看着你。喝完了，我再给你端一杯来。”

茶里倒上了一半浓浓的、香香的奶油，很引人食欲。韦罗奇卡用臂肘撑着欠起身子，喝了起来。她想：“新沏的浓茶，多加白糖和奶油真是好极了；淡茶加一小块糖，味道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喝起来叫人恶心。等我自己有了钱，我就喝今天这样的茶。”

“谢谢您，妈。”

“先别睡，我再去端一杯来。”她回来又端着一杯同样美味可口的茶。“吃吧，我再坐坐。”

她沉默了片刻，突然用一种有点特别的方式说起话来。她忽而说得极快，忽而拖长声音说得很慢。

“韦罗奇卡，你刚才谢我。我好久没听到你说谢谢了。你认为我心狠。对，我心狠，可是不能不心狠啊！你看我这虚弱的身子已经不行了，韦罗奇卡！是喝酒害的，还有我这把年纪，你又给我添乱，韦罗奇卡，你真叫我伤心透了。我的身子就这样垮下来了。”

我这一辈子真不容易，韦罗奇卡。我不愿意你再过这种日子了。但愿你能过上好日子。

我吃过多少苦，韦罗奇卡，哎，多少苦！你不记得，你爹还没当管房人的时候，我跟他怎么过日子！穷过，哎，那时候多苦啊，那时候我倒还是个老实人，韦罗奇卡！现在我可不老实了。可是，不，我不作孽，不在你面前撒谎，不说我现在还是老实人！哪儿还有老实人！老实的年头儿早过去了。韦罗奇卡，你有学问，我是个大老粗，可你们书上写的什么我全知道。书上写着：不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家说我：‘你不老实！’你爹是个十足的大傻瓜——他是你的爹，不是娜坚卡的爹——连他也来挖苦我，欺负我！好，我心一狠，说，你们看我不老实，我就不老实，结果生下了娜坚卡。呃，这又怎么样，生了又怎么样？是谁教我这么干的？是谁捞到了肥差？就这事来说，我可没他罪孽大。但是他们把她抢走了，送进了育婴堂，还不许我打听她的下落，这样就再没看见过她，也不知她的死活……恐怕不会活着了！嗯，现在我已经不那么痛苦了；当时真不好受。从此心变得更狠了，我就成了个狠心的人。这样一下子却都好起来了。你的父亲、这个大傻瓜弄到了份肥差，谁给他弄到手的？我弄到的；他被提拔当上了房屋管理人，是谁

提拔他的？我提拔他的。从此我们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什么缘故？因为我变得不老实了，变得心狠了。我知道，韦罗奇卡，你们书上写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又不老实又狠心的人才能过好日子。这是大实话，韦罗奇卡！现在你爹靠我供着，也有了几个钱。我也有钱，可能比他的钱还多，这都是我自己挣来的，我给自己准备了几块面包防老。你的傻老爹也才尊敬起我来，对我服服帖帖的。我把他调教出来了。早先他压迫我，欺负我。为了什么？不为别的，韦罗奇卡，只为我心不狠。你们书上又写着，韦罗奇卡，人不该这样生活。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书上还写着：要不这样生活，那么一切都应当重新安排，而照今天的习惯，就不能照书上说的那样生活。他们为什么不照新的办法来安排生活呢？唉，韦罗奇卡，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书上写的新办法是什么样的？我知道是好办法，不过我和你活不到那时候。老百姓太愚蠢，有这样的老百姓，怎么能采用好办法！我们还是照老法子过，你也照老法子过吧。而老法子于是怎么样？你们书上也写了：老法子无非就是抢人和骗人。这是大实话，韦罗奇卡，这就是说，没有新办法，就照老法子过：抢人、骗人。我因为疼你才说这些话，呼噜……”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打起呼噜来，倒下睡了。

二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知道他们在剧院里的谈话内容，可是还不知道这次谈话的后果。

正当她为女儿的事伤心，并在忧伤中往自己手里的混合甜酒杯里对了许多罗姆酒，早已呼呼酣睡的时候，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斯托列什尼科夫正在一家最时髦的饭店里同着去过包厢的另两位骑士一道吃晚饭。同席的还有第四位——和军官一起来的法国女人。晚饭快吃完了。

“斯托列什尼科夫先生！”斯托列什尼科夫心花怒放：吃晚饭时，这法国女人找他说话，已经有三次了，“斯托列什尼科夫先生！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这称呼听着悦耳，叫着上口——我没想到你们这一伙里只有我一个女的。我希望在这儿能见到阿岱莉，那该多快活，我难得见到她。”

“真不凑巧，阿岱莉跟我吵嘴了。”

军官想说什么，但却没说。

“别信他的，朱丽小姐，”那文官说，“他不敢对您说出真相，他认为，您要是知道了他为了一个俄国姑娘甩掉了这法国女人，您准会生气的。”

“我不明白，我们干吗上这儿来！”军官说。

“不，谢尔日，是约翰请我们来的！再说我也很乐意跟斯托列什尼科夫先生认识认识，不过，唉，斯托列什尼克，您的审美观我可不敢恭维！如果您抛弃阿岱莉是为了那个格鲁吉亚女人——您跟他俩去过她的包厢，我是决不会反对的。倘若用法国姑娘换个俄罗斯女人……我能想象出来！浅色眼睛，稀疏的浅色头发，呆板的无色的面孔，对不起，不是无色的，而是你们所说的血加奶油，也就是只有你们的爱斯基摩人才能放到嘴里吃下去的那种食物！约翰，把烟灰缸递给那背弃了美女子的罪人，叫他在自己罪恶的头上撒

些烟灰！ ”

俄罗斯人常用此话、即“血乳交融”形容健康的脸色。

古代犹太人在悲伤或忏悔时往自己头上撒尘土或炉灰，见《旧约·约伯记》第章第十二节。

“你说了这么多废话，朱丽，不该在他脑袋上，该你往自己头上撒灰，”军官说，“因为你以为是格鲁吉亚女人的那位，她正是一个俄罗斯女人。”

“你在开玩笑吧？”

“纯粹、地道的俄罗斯女人。”

“这不可能！”

“亲爱的朱丽，你以为我们的民族也跟你们的民族一样，只有一种类型的美，你这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你们那里，不是也有许多浅黄发的女人吗？朱丽，我们是多民族的混合体，从浅色头发的芬兰人（“是的，是的，芬兰人，”法国女人自言自语地说）到黑黑的，比意大利人还黑得多的鞑靼人，蒙古人（“是的，蒙古人，我知道，”法国女人又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在我们的血液中注入了他们的血液！你所讨厌的浅黄头发女人，只不过是各地的不同类型当中的一种，这一种最普遍，但不是占首位的。”

“这真奇怪！但是她太美了！为什么她不去演戏？不过，先生们，我说的也只是我已经看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她的脚怎样？据说，你们的大诗人卡拉孙讲过，走遍整个俄罗斯找不到五双小巧、秀气美丽的脚来。”

“朱丽，这话不是卡拉孙说的，应该叫做一卡拉姆辛，卡拉姆辛是位历史学家；而且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鞑靼人。你看，这又向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证明我们民族类型的多样性。讲到过脚的是普希金，他的诗在当时来说很好，但是现在就没有当时那么大的价值了。顺便说一句，爱斯基摩人居住在美洲，我国喝鹿血的野蛮人叫做萨莫耶德。”

卡拉姆辛（一七六六—一八二六）感伤主义作家、史学家，著有小说《苦命的丽莎》、《俄罗斯国家史》等。

见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章第三十节。

萨莫耶德为涅涅茨等俄国少数民族的旧称，他们居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西伯利亚的某些地区。

“谢谢你，谢尔日。卡拉姆辛是历史学家，普希金——我知道他；爱斯基摩人居住在美洲；俄国有萨莫耶德人。萨莫耶德，这名字听起来亲切人耳：萨——莫——耶——德！现在我记住了。先生们，当我和谢尔日单独在一起或者不跟你们大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叫谢尔日把这些事情都讲给我听。这是很好的谈话内容。而且研究学问是我的爱好；我生来要做斯泰尔夫人 的，先生们。不过这离题太远了，还是回到刚才那问题上来吧：她的脚怎样？”

斯泰尔夫人（一七六六—一八一七），法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

“如果您允许我明天去您那儿，朱丽小姐，我将有幸把她的鞋也带去给您看看。”

“带来吧，我也试试，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斯托列什尼科夫高兴异常，怎能不高兴呢？他好容易才攀上了约翰，约翰又好容易才攀上了谢尔日。而朱丽又是谢尔日圈子里的法国女人中属一流的人物——荣幸，莫大的荣幸！

“脚长得令人满意。”约翰肯定地说。“不过我是个务实的人，我感兴趣的是更重要的部位：我观察过她的胸脯。”

“胸脯很美。”斯托列什尼科夫说，由于他喜欢的女人受到了好评，他兴奋不已。

他打算对朱丽说几句恭维话，在这之前他还不肯：“她的胸脯很迷人，可是在这儿夸赞别的女人的胸脯当然是煞风景了。”

“哈，哈，哈！这位先生也想恭维我的胸脯啦！我不弄虚作假，不诓人骗人，斯托列什尼克先生。我不自夸，也不能容忍别人夸赞我的弱点。幸亏我还保留着相当多的真正值得自夸之处。可是我的胸脯，哈，哈，哈！约翰，您见过我的胸脯，您告诉他吧！”

您怎么不说话，约翰？把您的手伸过来，斯托列什尼克先生，”她抓起他的手：“您能感觉出来，这不是肉体吗？再往这儿摸摸，还有这儿，现在您知道了吧？我戴着假胸呢，就跟穿连衣裙、裙子，衬衫似的。这并非我喜欢——依我看，最好没有这些假玩意——而是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可是像我这样一个饱经世态炎凉的风尘女子——我从前过的什么生活啊，斯托列什尼克先生，跟从前相比，我现在就是圣女、苦行僧了——这样的女人保不住自己的胸脯！”她突然哭起来了：“我的胸脯！我的胸脯！我的清白！啊，上帝，就是为了干这个我才生下来的吗？”

“你们说谎，先生们，”她跳起来，用拳头打了一下桌面，喊道，“你们纯属诬蔑！”

你们下流透顶！她不是他的情妇！他想收买她！我看见她全然置之不理，怀着满腔愤怒和仇恨。这太卑鄙了！”

“是的，”文官伸着懒腰，说，“你吹牛，斯托列什尼科夫。你们的事还没结果呢，你却夸口说你已经跟她同居了，为了向我们证明此事确凿无疑，还扬言你甚至跟阿岱莉分手了。你给我们描写得挺不错，但是你描写的都是你尚未见到的。不过这不要紧，不是才一个星期吗，再过一个星期反正会到手的，你不要对自己凭想象描画出来的事情失望；你以后会发现事情甚至比你想象出来的更好呢。我观察过，你一定会心满意足的。”

斯托列什尼科夫气昏了：

“不，朱丽小姐，我敢担保您的结论错了。请原谅我敢于顶撞您，她确实是我的情妇。她不理我，那很平常，是在争风吃醋呐，因为她看到演第一幕的时候，我坐在玛蒂尔德小姐的包厢里——就是这么回事！”

“你瞎说，我亲爱的，瞎说。”约翰说着，打了个呵欠。

“我没瞎说，没瞎说。”

“拿证据来，我是个认真的人，没证据我不信。”

“我能给你提供什么证据呢？”

“瞧你往后缩了，暴露了你是瞎说的，什么证据？难道找不到？瞧我来告诉你：明天我们还要在这儿吃晚饭，请朱丽小姐带谢尔日来，我带我亲爱的贝尔特来，你带她来。

如果你能带来，算我输，晚饭就由我作东；带不来的话，你就会被驱逐出我们的沙龙，叫你脸面扫地！”约翰拽了拽拉铃，堂馆来了。“西蒙，劳驾明天给准备一桌六个人的晚饭，就跟我同贝尔特办的那桌喜酒一样，记得吗，圣诞节之前？还要那个房间。”

“哪能不记得？先生，一定办到。”

堂馆退下了。

“下流的东西！卑鄙的家伙！我在巴黎当过两年风尘女子，还在一个贼

窟里混了半年，就在那些地方，我也没有碰见过像你们三个这样的下流东西！我的上帝，我在上流社会都是同什么人交往啊！为什么我要蒙受这样的耻辱，我的天？”她跪下了。“我的天！我是个软弱的女人！饥饿我能忍受，但是巴黎的冬天那么冷，冷得那么厉害，各种各样的诱惑又是那样的奇妙！我要生活，我要爱，我的天，这本来不是过错，你为什么这样惩罚我？把我从这个圈子里拽出去，把我从这个泥坑里拽出去吧！赐我以力量再去巴黎当风尘女子吧，我不向你乞求任何别的什么，我也不配得到任何别的什么。只是把我从这些人中解救出来，从这些卑鄙的家伙中间解救出来吧！”她跳了起来，跑到军官跟前，“谢尔日，你也是这种人吗？不，你比他们好！（“比他们好”，军官漠然地说）难道这不卑鄙吗？”

“很卑鄙，朱丽。”

“那么你就沉默不语？你能容许吗？能同意吗？还要参与吗？”

“坐到我腿上来，我亲爱的朱丽。”他抚慰起她来，她才平静下来。“在这样的时刻，我有多么爱你啊！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可是你为什么不同意跟我结婚呢？我求过你多少次啦！答应我吧。”

“结婚？你要给我戴枷锁？你也有这样的偏见？我决不结！我不许你再跟我说这些蠢话。别惹我生气。不过……谢尔日，亲爱的谢尔日！不许他那样干！他怕你，你救救她吧！”

“朱丽，冷静点。这不可能办到。如果他不干，反正还会有别人干。你瞧，约翰已经想从他手中夺走她了。你要知道，像约翰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如果母亲要想出卖女儿，那谁也保护不了女儿。我们俄国人常说，脑门撞不破墙壁。可见我们是个明智的民族。朱丽，你瞧，我过得多么安定平静，就是因为我接受了我们俄国人的这个信条。”

“绝对不许！你是奴隶，法国女人是自由的。法国女人要斗争，跌倒了也要斗争！”

我不容许！那姑娘是什么人？她在哪儿住？你知道吗？”

“知道。”

“我们找她去。我要事先告诉她。”

“半夜十二点多啦，还去？我们还是睡觉去吧。再见，约翰。再见，斯托列什尼科夫。不用说，明天你们不要指望朱丽和我来同你们一道吃晚饭了：你们看她有多么忿怒。”

说真的，连我对这事也不感兴趣。当然，我的意见对你们无关紧要。再见吧。”

“好一个疯狂的法国女人，”军官和朱丽走后，文官伸着懒腰、打着哈欠说，“这女人很会挑逗人，可也太过火了。看着漂亮女人发火倒别有一番乐趣。可是让我和她相处，四个小时也不行，别说四年了。当然，斯托列什尼科夫，让她由着性子耍脾气去，咱们的晚宴可不能叫她给搅黄了。我带保罗和玛蒂尔德来顶他们的缺。现在该回家了。”

我要顺便去看看贝尔特，然后再去找那小迷人精洛特。”

“唔，韦拉，不错，眼睛没有哭肿。看来你已经明白了娘说得对，要不然你还在没完没了地跟我顶牛呢。”韦罗奇卡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那好，我不再说了，你别难过。昨天我就那样在你屋里睡着了，可能说了许多没有必要说的话。我昨天不大对劲儿。你听了那些酒后的胡话别往心里去。听见了吗？可别当真。”

韦罗奇卡又看见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原先的样子。昨天她仿佛是从兽皮下面露出了人的面貌，而现在又复原成了野兽，不过就是一头野兽而已。韦罗奇卡竭力克制自己心中对她的厌恶，但做不到。从前她只是恨母亲，昨天她想，她不再恨她了，只会怜悯她，现在她又感到憎恨她，但心中仍对她有怜悯之情。

“穿衣服吧，韦罗奇卡！他大概快来了。”她关切地仔细地看了女儿的装束，“如果你的举止能够应付自如，我就送你一对耳环——上面镶着大块的成色很纯的绿宝石。

耳环式样是旧一点，但如果改制一下，可以做成一个很好的胸针。一百五十卢布抵押进来的，加上利息，一共二百五，可实际上值四百多呢。听见了吗？我送给你。”

斯托列什尼科夫来了。昨天他有好长时间都不知道如何来对付他给自己出的那个难题，他从饭店步行回家，一边走一边琢磨。但回到家他已经平静了，因为路上他终于想出了办法，就连现在他也挺得意的。

他问候了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身体，“我还好。”她说。他听了很高兴，然后又扯到了不该枉费健康的身体的话题上面。“当然不应该。”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还认为“青春大好时光也不该枉费”，他完全同意，并且想到，要能够利用今夜良宵乘车到城外去玩玩该多么好：天气严寒，道路又非常好走。他想同谁一块去呢？“就我们三个人：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我。”既然这样，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就完全同意了。现在她需要去煮咖啡、准备小吃了，韦罗奇卡应该唱点什么。“韦罗奇卡，你唱点什么，好吗？”她用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说。——“我就唱。”

韦罗奇卡坐到了钢琴旁，唱起了《三套车》，当时这首歌词刚谱上了曲子。门外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认为这首歌很好，它叙述的是一个姑娘看上了军官。“韦尔卡，只要她愿意，准能成，她本来就机灵，心眼多！”韦罗奇卡唱了一会就停下来了，这也还是很得体，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是这么嘱咐的：唱一会，然后说说话。韦罗奇卡这就又说起话来了，不过她说的是法语，令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高兴。“好一个傻瓜，我竟忘了告诉她讲俄语。”韦拉说话很文静……还微微一笑。可见谈得不错，挺好。可是他干吗瞪着一双眼睛？不过傻瓜毕竟是傻瓜，他只会心神不定地眨巴眼睛。

而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最后她把手伸给了他。韦尔卡变机灵了，要夸夸她。

《三套车》为涅克拉索夫的名诗，发表于一八四六年，一八五二年由列昂诺夫谱曲，流传甚广。

韦尔卡，韦拉的卑称。

“斯托列什尼科夫先生，我必须跟您认真地谈谈，昨天您订了包厢，为的是把我当作您的情妇向您的朋友们进行炫耀。我不会对您说这是无耻的行径，因为如果您能懂得这点，您就不会那样做了。但我要警告您：如果您敢

于靠近我，不管是在剧院里，还是在街上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一定会给您一记耳光。母亲会折磨我，”（韦罗奇卡就是说到这里才微微一笑）“但是我不在乎，对我要下手就下手吧！今天晚上您会收到我母亲的一张便条，说我们的郊游取消了，因为我病了。”

他站在那儿，仍旧心神不定地眨着两眼，正如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到的那样。

“我现在跟您谈话，是把您当作一个毫无羞耻心的人。不过您也许还没有完全堕落。”

如果是这样，我就请求您不要再来我们家了。您能做到的话，我就原谅您对我的诬蔑，如果您同意，就让我们握握手吧。”她向他伸出了手。他握住它，自己也不明白在做什么。

“感谢您，您走吧，就说您急于准备郊游的马车好了。”

他又眨巴起眼睛来；她却转身走到了乐谱前，继续唱那《三套车》。遗憾的是没有行家在场，行家们定会很感兴趣的，大概他们也难得听到如此富于感情的歌声。甚至由于感情太丰富而忽略了技巧。

没过多大一会工夫，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进来了，厨娘用托盘端来了咖啡和小吃，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没有坐下喝咖啡，却向门口退去。

“您上哪儿，米哈伊尔·伊凡内奇？”

“我急着去准备马车，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还来得及，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但是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已经走出了门。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举着双拳，从前室冲进了客厅。

“你都干了什么，该死的韦尔卡？啊？”客厅里已经没有该死的韦尔卡的踪影了。

母亲又向她的房间冲去，可是韦罗奇卡的房门紧锁着。母亲用整个身子撞房门，想撞开它，但那门岿然不动。而该死的韦尔卡却在里面说：

“如果您再撞门，我就砸窗子喊救命。我决不会活着落进你们的手里。”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像疯了似地闹腾了好半天，门也没撞开。最后她喊得累了。

韦罗奇卡这时才说话：

“妈，以前我只是不喜欢您，从昨天晚上起，我还可怜起您来啦。您受过很多苦，所以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以前我没跟您谈过什么，现在想跟您谈谈了，等您不生气的时候吧。我们这回要好好谈谈，我们过去真没有谈过呢。”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当然并没有怎么把这些话当回事。疲惫的神经需要休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心里又开始盘算起来了：既然女儿这个混丫头已经完全不听话了，不如就和她进行谈判。因为没有她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总不能没有她还叫米什卡 这傻瓜来娶她！再说，还不知道她对他说了一些什么，他们不是还互相握手了吗？这是什么意思呢？

米什卡，米哈伊尔的爱称。

疲劳的玛丽娅正坐在那里考虑：是用武力解决，还是用计谋智取，门铃响了，来的是朱丽和谢尔日。

四

“谢尔日，她母亲会讲法语吗？”这是朱丽醒来的第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还没有打消这个念头吗？”

不，她没有打消。他们回想了一下剧院里的种种迹象，可以判断出来那个姑娘的母亲大概不会讲法语，所以朱丽带了谢尔日来当翻译。不过这也是他命该如此，即使韦罗奇卡的母亲是红衣主教梅位凡蒂，他也得去。他从不抱怨命运，情愿跟随着朱丽漂游四方，倒像是高乃依剧本中女主人公的心腹女伴。朱丽醒得晚，顺路去了一趟维尔曼商店，然后又去了四家商店购买所需之物，虽然都不顺路。因此当朱丽和谢尔日从利坚桥来到豌豆街时，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已经解释过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发够了脾气，并且已经坐了半天了。

梅佐凡蒂（一七七四—一八四九），意大利一大学教授，通晓五十来种语

高乃依（一六六一—一六八四），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

“我们来这儿用什么理由呢？呸，多脏的楼梯！我在巴黎也没见过这样的楼梯。”

“随便想个什么理由都行。她母亲是做抵押放款的，你就摘下胸针做抵押。也许这样做更合适：她教钢琴课，我们就说你有个侄女想学钢琴。”

玛特辽娜看见了谢尔日的军官制服、特别是朱丽的奢华装束，才生平第一次为脸上受过伤的颧骨害羞了：她还从未面对面地见过这样尊贵的太太。当玛特辽娜禀报说，NN上校携同夫人光临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同样感到诚惶诚恐和一种无法言传的惊奇，特别是“携夫人”这句话！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听到的有关最高层的流言至多也只是到四品文官这一阶层，而涉及真正的贵族圈子的流言在传到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之前早在半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此她只理解法律规定的“夫妻”涵义；而谢尔日和朱丽是按巴黎人的习惯互称“夫妻”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连忙整理好自己的衣服，跑着迎上去了。

谢尔日说，昨天有机会见面相识，非常高兴，等等，又说什么他妻子有个侄女等等，还说什么他妻子不会讲俄语，所以他才来当翻译。

“是的，我可感谢造物主的恩赐，”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韦罗奇卡在教钢琴方面是很有才能的。她若能到贵府上教琴，我以为不胜荣幸；可是不巧，我的这位教师近来不大舒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话声音特别大，好让韦罗奇卡听见并且知道出现了和解的转机。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尽管对两位客人满怀敬仰之情，但还是用眼睛紧紧盯着他们。“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出来给你们试弹一下。韦罗奇卡，我的孩子，你能不能出来呀？”

既然当着外人的面，不至于再吵架了，为什么不出去呢？韦罗奇卡打开房门，一眼就看见了谢尔日，又羞又恼，脸一下子涨红了。

即使眼光再迟钝的人也不会看不出这情形，何况朱丽的眼光几乎比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眼光还敏锐。法国女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亲爱的孩子，您看到这个人感到惊讶、难堪，因为昨天您受侮辱时他也在场，他本人恐怕也参与了对您的侮辱。我的丈夫轻狂浮躁，可是比起那些浪荡公子来还

好些。请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原谅他吧，我是怀着善意来看您的。给我的侄女教课只是个借口，不过还不能戳穿。您随便弹点什么，然后我们到您的房间里去再谈。听我的话，我的孩子。”

这就是在彼得堡的贵族青年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个朱丽吗？这就是开起玩笑来毫无分寸、连某些浪荡公子也要脸红的那个朱丽吗？不，这是位连一句粗话都没听过的公爵夫人。

韦罗奇卡坐到钢琴前试弹，朱丽站在她身旁。谢尔日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攀谈着，以便搞清她跟斯托列什尼科夫到底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分钟，朱丽就不叫韦罗奇卡弹了，搂着她的腰一同走过客厅，到她房里去了。谢尔日解释说，他妻子对韦罗奇卡的弹奏很满意，可是还想跟她聊聊，因为需要了解女教师的性格及其他方面的情况。接着他继续把话题引到斯托列什尼科夫的身上。这一切都做得那么恰到好处，然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却以越加警惕和怀疑的目光来看他了。

“我亲爱的孩子，”朱丽走进韦罗奇卡的房间，说道，“您母亲是个很坏的女人。”

但为了让我了解怎样来和您谈话，我请您讲讲：您昨天怎么会去剧院的？为什么要去那里？这些情况我已经从我丈夫那里了解了；可是我还想从您的叙述中来了解您的性格。

别对我存有戒心。”她听完韦罗奇卡的叙述，说道：“好啦，可以告诉您，您很有个性。”于是她非常慎重、非常委婉地向她讲述了昨天那场打赌。韦罗奇卡也把斯托列什尼科夫建议郊游的事讲述了一遍，作为回报。

“他是想骗您母亲呢，还是他俩合伙要阴谋算计您？”韦罗奇卡激烈地反驳说，她母亲还不至于是那种要阴谋的坏女人。“我这就能知道，”朱丽说，“您留在这儿，您没必要到那儿去。”朱丽回到了客厅。

“谢尔日，他已经邀请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今晚去玩了。告诉她昨天吃饭的情况。”

“我太太喜欢您女儿，现在只需谈妥学费就行了，我们大概不会在这事上出什么问题的。还是让我把咱们共同的那位熟人的事说完吧。您很赞赏他。可您知道吗，他是怎样介绍他和您家的关系？比方说，您知道他抱着什么目的邀请我们昨晚去您的包厢？”

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眼中，探询的神色消失了，而表现出这样的意思：“果不其然。”

“我不是那种爱造谣生事的人。”她不高兴地回答说，“我自己不去散布谣言，也不愿意去听！”这话不免有点挖苦人的意味，虽然她对来访的客人满心的敬意。“年轻人在一起嚼舌头的还少吗，没必要去管这。”

“那好，夫人，依您看，这是造谣生事？”他开始讲起昨天吃晚饭的经过。他刚一提到打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不许他说下去了，她一跃而起，狂怒地喊起来，根本不顾及有尊贵的客人在场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呸，他这个强盗！呸，他这个混蛋！他请我们去玩原来是为了这个！他想把我打发到城外送我归天，好去欺负这没人保护的姑娘！呸，他太恶了……”她又说了许多骂人的话，然后她感谢客人救了她的命和女儿的名誉。“是的，老爷，我一开头就琢磨着你们不是平白无故来的，教课归教课，你们还另有目的。可是我决没有想到会那样；我以为你们给他又找了个未婚妻，想把他从我们手里抢走。我这老不死的，错怪了你们，你

们宽宏大量些，包涵吧！真可以说，你们这辈子积了大德了……”咒骂、感激和道歉的话滔滔不绝于口，她语无伦次地讲了好久。

朱丽对这段冗长的话听了没多大一会，其间的意思从声调和手势中她就了了了。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刚说了几句话，法国女人就站起身来，回到韦罗奇卡的房里去了。

“对，您母亲不是他的同谋，现在她正满腔仇恨地骂他呢！可是我非常了解您母亲这类人。在他们心中没有任何一种感情能长久地抵挡住功利的考虑。她很快又会给您找个未婚夫来，结果会怎样？天晓得。总之，无论怎样，您都是要很痛苦的。最初她会让您安静一段时间的，但我告诉您，那时间不会长。您现在该怎么办呢？您在彼得堡有亲戚吗？”

“没有。”

“很遗憾。您有情夫吗？”韦罗奇卡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她只是惊讶地大睁着眼睛。

“抱歉，抱歉，显然您没有，没有就更糟。这表明您还没有一个安身之处。怎么办呢？好，您听我说，我并非您表面上看到的那种人，我不是他的妻子，我只是靠他来供养。

全彼得堡都认为我是最坏的女人，其实我是个正直的人。到我家去会有损您的名誉；我来这儿一次，您就要担风险了；再来第二次，非把您置于死地不可。但是我还必须和您再见面，也许要不止见一次呢，就是说，如果您信得过我，信得过吗？那么您明天什么时候有空？”

“十二点左右。”韦罗奇卡说。朱丽觉得有点早，但没有关系，她可以嘱咐人到时叫醒她，然后在客商市场、面对涅瓦大街的那排店铺里和韦拉会面。那排店铺最短，在那儿互相容易找到，而且也没有人认识朱丽。

“对了，还有个好主意：给我一张纸，我给那个坏蛋写封信，叫他逃不出咱们的手心。”朱丽写道：

斯托列什尼科夫先生：

您现在大概很为难，如果您想摆脱困境，晚七点来找我。

朱·勒泰利埃

“现在再见吧！”朱丽伸出手来，而韦罗奇卡却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又是亲吻，又是哭，后来再一次去亲吻她。朱丽当然更是难以控制了，因为她不像韦罗奇卡那样能忍住眼泪，况且她正在做着一件高尚的事情。她从中体验到喜悦和自豪，因而内心异常地激动。她简直达到亢奋状态，她嘴里絮絮不休地说着，还一边流泪，一边亲吻，最后她十分兴奋地说道：

“我的朋友，我亲爱的孩子，啊，但愿你永远也体验不到我现在的心情，多少年以来，我的嘴唇才第一次亲吻到纯洁的嘴唇。宁可死，也不要去吻你不爱的人！”

五

斯托列什尼科夫并非像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推测的那样，想杀害人。她按自己的习惯，赋予这事情一种过于原始的形式，但是事情的本质她是猜

到了。斯托列什尼科夫打算晚上迟些时候再带着这两位女客到举行晚宴的饭店去，到了那儿，她们自然是连冻带饿，需要取暖、喝茶，他可以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茶碗或酒杯中撒点麻醉药。

韦罗奇卡若看到母亲失去知觉，一定会惊惶失措，那么他就把韦罗奇卡领进那间举行晚宴的房间，他的这次打赌就算赢了。以后看情况再说。也许韦罗奇卡在慌乱中什么都不明白，同意在这伙陌生人中坐一坐。即使她立刻就走了，那也没什么，人们会谅解的。

因为她才刚踏上这条冒险家的路，初出茅庐自然会害臊。事后他花点钱安抚一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她也就没法儿闹腾了。

但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责骂自己在朋友面前夸口，责骂自己在突然遭到韦罗奇卡的坚决反抗时不能见机行事。他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他正在沮丧、难过时，收到了朱丽的信。这信是治愈创伤的神油，是茫茫暗夜中的一线希望之光，是沉入深渊时眼前展现的一条康庄大道。啊，她一定能帮我，她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她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最最崇高的女人啊！差十来分钟七点，他已经来到她的门前。“太太在等您呢，她吩咐我接待您。”

她是多么高傲地坐在那里，多么威严地注视着他！看到他鞠躬，她微微点了点头。

“见到您很高兴，请坐。”她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等着那劈头盖脑的厉声斥责吧。没关系，尽管骂，只要能救我。

“斯托列什尼科夫先生，”她用冷漠缓慢的声调开始说，“您知道我对于我们现在见面所谈的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也无需重新加以评论。我见过我们昨天所谈的那位姑娘，也听说了您今天去她家拜访过，因此我已经了解全部情况，我很高兴，这使我避免了一个大麻烦：我不必向您详细打听了。对于您的处境，我同样地一清二楚。（“老天，她还不如痛骂我一顿！”被告想道。）我以为，您没有别人的帮助，不能摆脱这种处境，您也不能指望除我以外还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有效的帮助。如果您有什么话反驳我，我欢迎。”停了一会，她接着说：“那么您也跟我一样，认为除了我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来帮助您。请听我说，我能够并且也愿意为您做些什么。如果您觉得有我的帮助就已经够了，那么我就说出我答应帮助您需要些什么条件。”

她仍然拉长声调、用公事腔调讲述。她说，她可以给约翰送一封信去，信中说她昨天发火以后再三考虑，还是愿意参加晚宴，不过今晚她没有时间，因此请约翰劝斯托列什尼科夫把晚宴推迟，以后她再跟约翰商定时间。她念了这封信，听起来信中有十足的把握，认为斯托列什尼科夫打的赌必赢无疑，他甚至还为推迟自己的胜利而恼火呢。有这封信就行了吧？当然。既然如此——朱丽仍然用拉得长长的公事腔继续说——她必须要有两个条件才发信，“您可以接受这两个条件，也可以不接受。您只有接受条件，我才发信；你拒绝接受，我就把信烧掉……”她这样没完没了地说着，求救者听得心烦意乱。最后她摆出了条件，共有两个：“第一，您完全停止追求我们所谈的那位女性；第二，您不许在谈话中提到她的名字。”“才这两点！”求救者想，“我想，她即使真的提出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了不起的要求，我也要答应。”他表示同意，这简单易行的条件使他喜形于色。不过朱丽的态度并未有所缓和，她还在拖延，还在解释……“第一个条件她需要，第二个她也需要，而对您来说更需要：我推迟晚宴一个星期，然后再推迟一个星期，这事情也就给忘了，但您要明白，只有您不再提起，也绝口不提那年轻女性的名字，其

他的人才能忘记……”一切情况都已查明，并得到证实，连那信能被约翰及时收到这一点也未遗漏。“我问过了，他正在贝尔特那儿吃午饭……他抽完雪茄就去找您……”她说着诸如此类的话，例如：“那么，信可以发出去了，我很高兴，劳驾再读一通信，我不信任别人，也不要别人信任我。您读完了，劳驾把信封上，给您信封。

我拉铃叫人。波莉娜 请您把这封信送去……波莉娜，我今天没跟斯托列什尼科夫先生见面，他也没有来过这儿，您明白了吗？”这场折磨人、可又是救人助人的谈话又持续了约一小时左右。信总算是发出去了，获救者这才呼吸得自在些了，但却已大汗淋漓，可朱丽还在继续说：

波莉娜，女仆名。

“再过一刻钟，您就应该赶快回家，好让约翰碰到您。不过，您还有一刻钟空闲时间，我想用来劝您几句；您听也罢，不听也罢，您都要仔细地考虑考虑。我不想谈论一个正直的青年对于被他诽谤过的姑娘应负有的责任：我太了解我们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了，不能指望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会有什么用处。但我认为，娶我们所谈的这位年轻女性做妻子，对您是有利的。我是个心直日快的人，我要十分透彻地向您说明我这个看法的根据，虽然其中有些话听起来不大人耳，您只要提示我一句半句，我就不说了。您这人性格软弱，有落到坏女人手中的危险，她会折磨您，玩弄您。那个姑娘善良而高尚，她不会欺负您。尽管她出身寒微，比您穷，但如果您娶了她，将如虎添翼，鹏程万里。以您的财产，加上她的才貌和坚强的性格，她进入上流社会的话，一定能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对于任何一个做丈夫的来说，由此而得到的好处那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除了任何别的丈夫从这样的太太身上所得到的那些好处之外，您，由于您天性上的特点，比别人更加需要协助，说得直率些，更加需要引导。我的每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都是根据对她的观察说出来的。我不要求别人信任我，不过我奉劝您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忠告。我毫无把握她能答应您的求婚，但万一她要是答应了，对您是很有利的。我不多留您了，您该赶快回家了。”

六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已经看出来，傻瓜米什卡完全不是什么傻瓜，他几乎连她都给蒙骗了，因此她对于韦罗奇卡拒绝郊游也就不再理会了。韦罗奇卡也才能安静地度日，第二天早晨十分顺利地去了客商市场。

“这儿太冷了，我不喜欢冷天，”朱丽说，“应该去别的地方。去哪儿好呢？等一等，我去一下这家商店，马上回来。”她给韦罗奇卡买回了一块很密实的面纱。“戴上吧，您就可以平平安安地上我家了。可别掀面纱，除非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波莉娜虽然人很老实，我也不愿让她看见您。我太爱护您啦，我的孩子！”的确，她自己就是穿着自己女仆的斗篷和帽子，还蒙着一块很密实的面纱。朱丽暖和过来了，听完了韦罗奇卡所拥有的新闻以后，讲了自己与斯托列什尼科夫会面的情况。

“我亲爱的孩子，现在他毫无疑问要向您求婚的。他们这路人若是追求女人不得手，他们反倒会更加痴情地迷恋上。我的孩子，您可知道，您对他

的样子，很像一个老练的打情骂俏的女人？打情骂俏——我说的是真正的打情骂俏，而不是拙劣平庸的忸怩作态：忸怩作态是令人厌恶的，正如对任何一件好东西的劣等仿制品似的——打情骂俏是用于男女恋情的悟性和灵活。因此天真幼稚的姑娘如果有悟性、又灵活的话，也会在无意中做得跟那些老练的打情骂俏的女人一样。我说的理由也许会对他有些影响，但是主要的还是您的坚定态度。无论怎样，他会向您求婚的。我劝您答应他。”

“您昨天不是对我说过，与其吻自己不爱的人，不如死掉吗？”

“我亲爱的孩子，这是我激动时说的，在激动的时候，这话是对的，好的！可生活是平淡无味，需要计算的。”

“不，决不，决不！他卑鄙，令人厌恶！叫他们吃掉我吧，我不会作贱自己的，我可以跳窗户自杀，可以去讨饭……但叫我嫁给一个卑鄙。下流的小人，不，那还不如死掉！”

朱丽开始解释嫁给他的好处：“您可以摆脱母亲的折磨。您现在有被出卖的危险，他并不是凶恶之徒，而只是个庸碌之辈，对于聪明刚强的女子来说，找一个平庸而不凶恶的丈夫是最上策，您就能成为家中的主人。”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些女演员和女舞蹈家的境况，她们在爱情中不是听命于男子，而是处于主宰的地位，“这是妇女在社会中的最佳的境况。除此之外，对妇女拥有独立和权利的这种境况，如果社会方面能够正式地确认其合法性，就是说如果丈夫对妻子也能像戏迷对女演员那样，就更好了。”她说得很多，韦罗奇卡也说得多，两人都有几分激动了。最后，韦罗奇卡竟慷慨陈辞起来：

“您叫我空想家，您问我对生活有什么想法。我不愿支配人，也不愿听命于人；不愿欺骗，也不愿装假。我不愿迁就别人的意见去追求别人向我推荐的、而我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我不习惯有很多钱财，既然我自己并不需要它，我为什么还要去寻求它呢？难道只因为别人认为大家都喜爱它，因此我也就必须喜爱它吗？我没有出入过上流社会，没有体验过荣华富贵，也不爱慕它，那我为什么要不惜做出牺牲去谋取它呢？难道只是为了别人的看法，别人喜爱它？我不会为我自己所不需要的东西做出任何牺牲的，不但不会牺牲自己，甚至连自己耍小脾气的任性习惯也不会舍弃掉的。我要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凡是我自己需要的，我就一定去争取，凡是我自己不需要的，就决不希求。”

我将来需要什么，我不知道。您说：我年轻，没有经验，总有一天我会变的。好，要变就变吧，可是现在，凡是我不要的，我决不希求，不希求。您问我现在有什么愿望？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想要爱一个男子？我不知道，比方，昨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哪里知道，我会爱上您。在爱上您之前几个钟头，我都不知道我会爱上您，也不知道爱上您是什么感觉。同样，现在我不知道爱上一个男子有什么感觉，我只知道我不愿屈从于任何人，我愿意自己是自由的，不愿意对任何人承担什么义务，我要使得没有人敢对我说：你有义务为我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只想于我所愿意干的事情，也希望别人都能这样做；我无求于任何人，也不愿限制任何人的自由，总之我自己想做个自由人。”

朱丽边听边沉思，沉思着并且脸红了。她怎能不脸红呢，身旁就是火炉子。她猛然站起身来，断断续续地开始说道：

“对，我的孩子，是这样的！我若是没有堕落，我也会有同感。我堕落

不是因为我不于过被称之为堕落女子所干过的那些事，也并非因为我有过那些痛苦难忍的经历，我堕落并非是因为我的肉体受过凌辱，而是由于我习惯于懒散和奢侈了，不能自立，需要靠别人，讨好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是堕落！别听信我对你说过的话，我的孩子！我教你堕落，我是多么痛心！我不可能在接触一个纯洁的人时而不去玷污他；离开我吧，我的孩子，我是个卑鄙的女人，不要想望上流社会！那里都是卑鄙的人，比我更坏。哪里滋生懒惰，哪里就会出现邪恶；哪里有奢侈存在，哪里就会有邪恶蔓延！离开吧，离开吧！”

七

斯托列什尼科夫越来越常考虑：假如我果然就娶了她，会怎么样？其实他遇到的事在生活中很平常，不仅对于像他这类没有主意的人，就是对于有着独立性格的人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甚至各民族的历史上也常有这样的事情，休漠和吉本、兰克和蒂埃里的著作都记载过许多。人们挤啊，尽往一个方向挤，只因没有听到说：“弟兄们，试着往对面挤”，当他们一旦听到了，就会向后转，往对面拥去。斯托列什尼科夫听说并且见过富家子弟给自己找穷人家的漂亮女孩做情妇的事，这样他也想方设法地使韦罗奇卡成为自己的情妇，他脑子里还没有想到过别的，后来他却听见另一句话：“可以娶她”，于是现在他就开始在“妻子”这个题目上动脑筋了；像以前他只琢磨“情妇”这个题目一样。

休漠（一七一—一七七六）英国哲学家、史学家，著有《英国史》等。

吉本（一七三七—一七九四）英国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等。

兰克（一七九五—一八八六）德国史学家，主要研究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政治史。其创办的“兰克学派”重视史料的辨析，但宣扬英雄史观。

蒂埃里（一七九五—一八五六）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著有《第三等级史》等。

这是共同的特点，就共同性说，斯托列什尼科夫身上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十分之九的人类历史。但是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说，在每一个个别的事实中，共同性的原因，由于时间、地点、种族和个人等的因素，而具有了“个性化”（用他们的话来说），重要的仿佛就是这些个性化的因素、特殊性的因素。也可以这样说，虽然所有的勺子都是勺子，但每一个人只用他的那一把，手中握着的那一把勺子来喝汤，而需要研究的恰恰正是这一把。为什么不该研究这一把？

朱丽说出了主要的一点（她似乎读过俄国小说，俄国小说总是经常提到这点的！）：你越是抗拒，他越是来劲。斯托列什尼科夫习惯于想象他如何“啮有”韦罗奇卡的情景。

我也像朱丽一样，爱用粗俗的语言对粗鄙之物直呼其名，其实我们大家几乎总是在用这样的语言来思维和谈话的。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斯托列什尼科夫都是在忙于想象着韦罗奇卡身体的千姿百态，他希望这些图景都能

如愿以偿。既然她不能以情妇的名分使之如愿以偿，那么就以妻子的名分吧。反正都一样，主要的问题不在名分，而在身体，也就是占有。卑鄙！卑鄙啊！“占有”，谁敢占有人？只能占有衣服，鞋子。纯属废话，几乎我们每一个男子都占有你们中的一个，我们的姐妹们。又是废话：你们哪里是我们的姐妹？你们只是我们的奴仆！虽然你们中有许多人都在支配着我们，这没有关系，因为有许多奴仆也可以控制自己的老爷。

观剧之后，有关千姿百态的身体的想象以空前的力量，在斯托列什尼科夫的脑海中翻腾起来。他让朋友们看过了他想象中的情妇，才发现这情妇要比他想象的好得多。因为美丽同聪明及其他优点一样，大多数人是要根据公众的评语才能准确地予以评价的。

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一张美丽的面孔之美丽处，可它到底美丽到何种程度，应当如何来判断，其等级还没有统一的证书来确定。如果韦罗奇卡坐在楼座顶层或池座后排，当然是不会有人注意她的；但当她坐在二楼包厢里时，就有许多望远镜对准了她；而当斯托列什尼科夫送她走后，返回休息厅时，听到了多少赞美她的言词啊！还有谢尔日呢？啊，这人审美品味极高！还有朱丽呢！不，碰上这种艳福，无需研究以什么名分去“占有”。

虚荣心跟情欲同时被激发出来了，但虚荣心又从另一个方面被刺伤了：“她未必肯嫁给您呢，”——怎么？不肯嫁给他？凭着这身制服和这样的家世！不，法国女人，你胡说，她肯嫁的，她这就会嫁的，一定会嫁的！

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因：斯托列什尼科夫的母亲当然反对这桩婚事，在这桩婚事上，他母亲是上流社会的代表，而斯托列什尼科夫至今还惧怕母亲，他自然也会为自己对她的依赖而苦恼。“我并不怕她，我有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思想对于那些意志软弱的人是颇具诱惑力的。

当然，他也有凭借着妻子飞黄腾达的愿望。

另外还需补充一点：斯托列什尼科夫很想见到韦罗奇卡，但他又不敢以原先的那种身份去见她。

总之，斯托列什尼科夫日益坚定地想结婚。过了一个星期，当玛丽娜·阿列克谢夫娜在星期日做完晚午祷回来，正坐在家中考虑怎样抓住他的时候，他自己却来求婚了。

韦罗奇卡没有出来，他只能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谈。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当然说，从她这一方来看，她认为这是莫大的荣幸，不过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她必须了解女儿的意见，她请他明天早晨来听回音。

“嘿，我这姑娘韦拉真了不起。”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对丈夫说，事情的急转直下使她喜出望外，“你瞧她怎么样把这小子抓到了手里！当初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出个什么主意才好！我原来以为，要再钩住他还得好一番折腾呢！我还以为事情叫她给弄糟了呢！可她，我这宝贝，结果不但没弄糟，反倒安排得好好的。她知道该怎么做。

真机灵，没有话说。”

“老天让这黄毛丫头长了见识。”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说。

他在家庭生活中很少起作用。但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严格维护各种好的传统，所以在向女儿宣布求婚消息这样隆重的时刻，她指定丈夫担任理应属于一家之主和家长的光荣角色。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像登上了隆重庆典的席位似的，在沙发上坐下了，然后才派玛特辽娜请小姐来拜见。

“韦拉，”巴维尔·康斯坦丁内奇开始说，“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给我们面子，他向你求婚了。我们回答说，我们做父母的心疼你，不能勉强，虽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很高兴的。我们一向认为你是个听话的好女儿，你要相信我们的经验，我们不敢向上帝祈求得到这样的好女婿。你同意吗，韦拉？”

“不。”韦罗奇卡说。

“你说什么，韦拉？”巴维尔·康斯坦丁内奇喊了起来，“事情已经这样明显，所以没问太太该怎么做，他就喊叫了。”

“你疯啦，傻瓜？你敢再说一遍，混账！忤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离座，举着双拳冲着女儿吼了起来。

“不行，妈，”韦拉说着，站了起来，“如果您敢碰我，我就离开家；您要关我，我就跳窗。我知道我拒绝求婚，您会怎样对付我，我已经想好办法。您坐下待着，不然我就走。”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又坐下来。她想：“我好糊涂，前门没上锁，插销一拉就开，抓不住她的，她会跑掉，她本来就是个性子。”

“我决不嫁他，我不同意就结不成婚。”

“韦拉，你疯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大声喘着气说。

“这怎么行？明天我们怎么答复人家？”父亲说。

“你们没有得罪他，是我不同意。”

这场争吵持续了两个钟头左右。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简直气疯了，她握紧拳头十几、二十回的吼叫，但韦罗奇卡总是说：“别站起来，不然我就走。”他们吵来吵去，毫无结果。最后还是玛特辽娜进来问开不开午饭，馅饼早已烤好，这场争吵才算告终。

“晚上以前再想想，韦拉，还是改变主意吧，傻瓜！”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随后向玛特辽娜低声叮嘱了几句。

“妈，您想背着我去搞什么名堂吧，拿下房门钥匙啦，或是诸如此类的事。什么名堂也别搞，搞了会更糟。”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只好告诉厨娘：“别搞了。”她想：“好凶啊，这个韦尔卡！”

要不是他为了这张脸孔才想娶她的话，我非打她个头破血流不可。现在在哪能碰她？一碰，这该死的，会自毁破相的！”

他们去吃午饭。午饭时都沉默不语。饭后韦罗奇卡回到自己房里。巴维尔·康斯坦丁内奇照例躺下睡午觉。但是他没有睡成：他刚要睡着，玛特辽娜就进来说，房东家仆人来了，女东家叫巴维尔·康斯坦丁内奇马上去见她。玛特辽娜像山杨树叶似地浑身发抖，她为什么事要发抖呢？

八

既然这个祸是她惹的，请问，她怎么能不浑身发抖呢？她刚一把韦罗奇卡叫去见爹妈，就马上跑去告诉房东家厨子老婆：“你们家少爷向我们家小姐求婚啦。”她俩叫来女房东的小丫头，骂她不仗义，至今守口如瓶。小丫头摸不着头脑，她挨骂是因为隐瞒了什么呢，她可从来没有隐瞒过什么，

等她们告诉了她以后，她说：“我压根没听说过。”由于冤枉了她，她们向她道了歉。她跑去把这消息告诉大丫头，大丫头说：“我也压根没听说过，这显然是他瞒着他妈偷偷干的，只要安娜·彼得罗夫娜知道了，我也一准知道。”接着就去禀报太太。这就是玛特辽娜干的好事！“我这根该死的舌头，把我害得够呛！”她想，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准会追查是谁走漏的消息，可是玛丽娅竟忘记了追查。

安娜·彼得罗夫娜和大丫头单独在一起时，唉声叹气，还昏倒两次，真是悲痛欲绝了。她派人去找儿子，儿子来了。

“米舍尔，我听到的消息是真的吗？”她用悲愤交加的声调说。

米舍尔即米哈伊尔。

“您都听到了什么，Maman？”

法语：妈妈。

“我听说你向我们管理人的那个……那个……那个……女儿求婚啦？”

“是的，Maman。”

“也不征求母亲的意见？”

“我想得到了她的同意以后再征求您的同意也不晚。”

“我想，你得到她的同意会比得到我的同意更有把握吧。”

“Maman，现在的规矩是这样：先征得女方的同意，然后再告诉自己的亲属。”

“你认为这是规矩吗？好人家的子弟要娶个不清不白的女人，做母亲的也得同意——恐怕你认为这也是规矩吧？”

“Maman，她可不是什么不清不白的女人。等您了解了她，您就会赞成我自己做主的这桩婚事啦。”

“等我了解了她！我这辈子不想了解她！‘我会赞成你的婚事’！我不许你再想这门婚事，不许你有任何的想法！你听见了吗，我不许可！”

“Maman，这不合现在的规矩。我又不是小孩子，得您牵着我的手走路。我自己知道何去何从。”

“唉！”安娜·彼得罗夫娜合上了双眼。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朱丽和韦罗奇卡面前早已甘拜下风，因为她们是聪明而刚毅的女人。可是在这里，论聪明才智，双方正好势均力敌，如果就意志力而言，母亲方面略占优势，但儿子脚下有着坚实的基础，虽然他至今还怀有惧怕母亲的习惯心理，但他们双方都牢牢地记得：女房东并非真正的东家，只不过是东家的母亲而已；女房东的儿子并不只是东家的儿子，而且是真正的东家。因此女房东才故意迟迟不说“我不许”这句决定性的话，她尽量拖延谈话，希望在进行真正的交锋之前，儿子能不战而退或被拖垮。可是儿子已经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了，他必须坚持下去才有出路。

“Maman，我向您担保，您不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媳妇了。”

“孽障！你是要妈的命！”

“Maman，让我们冷静地考虑考虑。早晚我都得结婚。结了婚的要比单身汉开销大。

我也许娶来了这样一个姑娘，全部的房租收入只够我俩的开销；可要是娶了她呢，她准是个孝敬您的媳妇，我们还可以照旧和您生活在一起。”

“孽障！你是要我的命！给我走开！”

“Maman，您别生气，我没有错。”

“要娶个下贱女人，还没有错！”

“好，Maman，现在我要走了，我不愿意当着我，人家用这类言词来称呼她。”

“你是要我的命！”安娜又昏过去了，可米舍尔却走了，庆幸自己能够鼓起勇气，闯过这关键性的首场交锋。

安娜·彼得罗夫娜看见儿子已经走了，便停止了昏厥。儿子完全不服管了！母亲说：“我不许，”他竟然回答：“房产是归他的。”安娜·彼得罗夫娜想了又想，然后向大丫头倾诉了自己的苦衷，面对此情此景，大丫头完全赞成女东家对管理人女儿的轻蔑态度，安娜·彼得罗夫娜跟她商量了商量，就派她去找管理人。

“我一向对您很满意，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可是现在发现了个阴谋，这很可能伤咱们的和气，尽管您未必参与了这个阴谋。”

“夫人，我没参与，我没过错，苍天在上。”

“我早知道米舍尔在向您女儿献殷勤。我没有干涉，因为年轻人不找点乐子就没法活。我对于年轻人的胡来能谅解，但是如果损坏了我们家族的名声，我可不能容忍。您的女儿怎么敢有这种非分之想？”

“夫人，她决不敢有非分之想，她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姑娘，我们教育她为人要谦恭。”

“那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夫人，她决不敢违抗您的旨意。”

安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难道会这么顺利？

“您应该知道我的旨意……我不能答应这门怪异的、可以说是不体面的婚事。”

“这我们知道，夫人，韦罗奇卡也知道。她就是这样说的，她说：我不敢惹夫人生气。”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夫人，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对我太太表示了他的想法，我太太跟他说：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明天早晨以前什么答复也不能给您。夫人，我和我太太本打算来见您，统统禀报给您听，可当时就像现在这么晚了，我们不敢惊动夫人。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走了以后，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韦罗奇卡，她说：我完全赞成爸爸和妈妈的意见，我们就连这种念头也不应该有。”

“那么，她倒是个通情达理的诚实姑娘？”

“可不是么，夫人，真是个孝敬的姑娘！”

“好，我听了很高兴，我们可以照旧友好相处了。为这事我要赏您的，我马上就赏您。从裁缝家旁边的前门那道楼梯上去，在二楼，不是有一套房子空着吗？”

“再过三天才能空出来，夫人。”

“您给自己住吧。您可以花一百来卢布装修装修。我还要每年给您加二百四十卢布薪水。”

“请允许我吻吻夫人的手吧！”

“好，好。塔吉雅娜！”大丫头走了进来。“把我的蓝丝绒大衣找出来。这件大衣我送给您太太，值一百五十卢布（实际上值八十五卢布）呢，我只

穿过两次（其实比二十次多得多）。这个，”安娜·彼得罗夫娜递给管理人一只小坤表，“我送给您女儿，我花了三百卢布（其实是一百二十卢布）买的呢。我有办法赏您，今后也亏待不了您。

我能谅解年轻人的胡来。”

让管理人走后，安娜·彼得罗夫娜又叫来塔吉雅娜。

“请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到我这儿来——不，还是我亲自去找他好。”她担心这位女使者把管理人禀报的消息内容先告诉儿子的仆人，由仆人再转告儿子，这样她那番话就不能原汁原味的让儿子来品尝了。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躺在那里，捻着小胡子，不免有那么几分得意。他一见母亲进屋就站起身来，他想：“她这又是干吗来了？我可没有治昏厥的嗅鼻药。”但是他从她脸上看出一种略带轻蔑的得意神色。

她坐下，说道：

“请坐，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我们来谈谈，”她面带微笑看了他半天，终于说道，“我很庆幸，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您猜我庆幸什么？”

“我不知道打那儿去想，Maman。您真怪……”

“您可以看到，一点也不怪。好好想想，也许您会猜着。”

又是长久的沉默。他困惑不解，感到茫然；她却得意洋洋，咀嚼着胜利的喜悦。

“您猜不到的，还是我告诉您吧。这很简单，很自然。如果您还有一点高贵的感情，您就能猜出来了。您的情妇，”上次谈话时安娜·彼得罗夫娜尽是闪烁其辞，现在已经不必了：对手用来战胜她的工具被她夺过来了，“您的情妇——别反驳我，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您自己到处宣扬她是您的情妇——这个出身低贱、教养极差、品行恶劣的人，连这个叫人看不起的丫头……”

“Maman，我不愿听人家用这类言词议论这位姑娘，她就要做我的妻子了。”

“如果我认为她会做您的妻子，我就不用那类言词了。我跟您谈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您讲清楚这事不成和为什么不成。让我把话讲完。讲完以后您觉得我哪些言词不得体，您尽可由着性子指责我，但是现在您让我讲完。我想说的是，您的情妇是个出身低贱、没有教养、没有品格、没有感情的人，可连她也来奚落您，连她都明白您的想法大不成体统……”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Maman？您说说！”

“是您自己打断我的。我想说的是，连她——您懂吧，连她！——也能了解并且尊重我的感情，她从她母亲那儿知道您求婚的事以后，就请她父亲来告诉我，说她不会违抗我的旨意，不会用她的坏名声来损害我们家族的声誉。”

“Maman，您在骗我吧？”

“您和我真是万幸，我没有骗您。她说……”

可是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已经披上大衣，出去了。

“拦住他，彼得，拦住他！”安娜·彼得罗夫娜叫起来了。彼得听到这个不寻常的命令，惊呆了，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早就跑下楼了。

“怎么样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见丈夫进来，问道。

“很好，我的老娘：她已经知道了，她说你们好大胆子！我就说，我们哪敢，夫人，韦罗奇卡已经谢绝了。”

“什么？什么？你就是这样头脑发昏，瞎说八道的吗，蠢驴？”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蠢驴！贱货！你害死我了！要了我的命！我给你来点厉害的！”丈夫挨了一记耳光。“给你来点厉害的！”又是一记耳光。“就该这样来教训你这傻瓜！”她抓住他的头发，连揪带扯起来。这堂课上的时间不短，因为，当斯托列什尼科夫在他母亲长久的训诫间歇之后，跑进这间屋子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课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呢！

“蠢驴，房门也不锁，生怕家丑不能外扬！你这蠢猪！也得有点羞耻心啊！”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只说出了这么几句话。

“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哪儿？我要见见韦拉·巴夫洛夫娜，马上！她难道真的拒绝我？”

情况是那么困难，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只能不管了，听其自然吧。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拿破仑也有过十分类似的遭遇，当时格鲁希元帅像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一样糊涂，拉法夷特又像韦罗奇卡一样瞎捣乱。拿破仑也曾苦心经营，创造过艺术奇迹，但还是全都落空了，只能听其自然了，他还说：我什么都可以放弃，谁爱怎样安排自己，请便！

谁爱怎样处置我，请便！”

“韦拉·巴夫洛夫娜！您要拒绝我吗？”

“您自己想想，我能不拒绝您吗！”

“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大大地伤害了您，是我的错，理应受罚，可是我实在受不了您这样的拒绝……”他还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

韦罗奇卡听他讲了几分钟；最终不得不制止他，听着叫人不好过。

“不，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够了；别再讲了。我不能答应。”

“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就只求您宽恕我。我侮辱您的事儿，您现在还记忆犹新……现在别给我答复，给我留点时间来得到您的宽恕吧！您认为我下流、卑鄙，不过您看吧，我也许会改好的，我凭借一切力量来洗心革面！请您帮助我，不要马上就推开我不管，给我时间，我一定事事都听您的！您会看到我是多么顺从；也许您还会在我身上发现一些优点，给我时间吧。”

“我可怜您，”韦罗奇卡说，“我看到了您真挚的爱情（韦罗奇卡啊，这根本不是爱情，只是各种污七八糟的脏东西和破烂的混合物。爱情不是那么回事。男子遭到女方拒绝而心中不快并非都是由于深爱女方的缘故。爱情全不是那么回事。但韦罗奇卡还不懂这一点，她被感动了），您希望我先不给您答复，那好。可是我预先告诉您，延期也不会有结果的。除了我今天的答复以外，我再也不会给您别的答复。”

“我会得到，会得到别的答复的，您可以挽救我的！”他抓住她的手吻起来。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走进屋里，在感情冲动之下，她竟想非正式地——就是说没有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在场——为这对可爱的孩子进行祝福，然后再把他叫来郑重其事地进行祝福。可是斯托列什尼科夫把她的兴致

扫掉了一半，他吻了吻她，解释说：韦拉·巴夫洛夫娜虽然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拒绝，只是要推迟回答。真糟，但是比起以前来，情况毕竟要好。

斯托列什尼科夫凯旋归来，家中又起争端，安娜·彼得罗夫娜只得又昏了过去。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理解韦罗奇卡。女儿的言行仿佛完全违背了母亲的意图，而女儿却战胜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无法应付过去的一切困难。如果从事情的进展来判断，韦罗奇卡的愿望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完全一致，不过她这个有心计、有学问的机灵鬼，在处理问题时另有一套路数而已。可是，既然是这样的话，她为什么不告诉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妈我想的跟您的一样，您放心吧！或许由于她跟母亲积怨已久吧？所以连这件本该由母女俩通力合作的事，她也想甩开母亲自己单独干。至于她拖延答复的原因，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倒是很明白：她想完全驯服未婚夫，叫他不致越雷池一步，并且叫安娜·彼得罗夫娜也得俯首听命。她显然比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更狡猾。这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经过自己头脑的一番思索得出的看法，可是她耳闻目睹的一切又恰恰证明与之相悖。同时，如果她的看法不对，如果女儿的确不愿嫁给斯托列什尼科夫，那又怎么办呢？她是一头不知如何才能驯服的猛兽，韦罗奇卡那贱货大概是不想嫁人了，这甚至是毫无疑问的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健全理智是太健全了，因此还不致于用“韦罗奇卡是个有心计的阴谋家”这种自作聪明的猜想来进行自我安慰。可是这个丫头安排的的确如此，只要她一旦出嫁（谁也不知道她脑子里想些什么，也许想的就是这个！）就可以完全主宰一切：丈夫、婆婆和全家。还能如何呢？等着瞧吧！再不可能有别样的生活了。现在韦罗奇卡还不愿出嫁，等她稍微习惯一些，不知不觉地就会愿意了。也可以吓唬吓唬她……只是要合时宜！现在只能等待过个时刻来临。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是在等待。但是被她那健全的理智否定过的，认为韦罗奇卡正在准备结婚这个想法，对她仍然富有诱惑力。除了韦罗奇卡的言行外，一切都证实了她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你瞧那求婚者对她已经是服服帖帖了！求婚者的母亲一连抗争了三个来星期，但是儿子凭着他的房产权把她击败了，她也开始屈服了。她表示希望跟韦罗奇卡认识认识，然而韦罗奇卡没有去看她。最初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想：要是她处在韦罗奇卡的位置上，她会做得更聪明些，一定去看一下，可她再一想，才明白不去看要聪明得多。啊，这个狡猾的东西！果然，过了两个星期左右，安娜·彼得罗夫娜借口瞧瞧装修过的新住所，亲自登门了，她神情冷冷的，客气中透着股尖酸味。她刚说了两三句刻薄话，韦罗奇卡便回自己房里去了。在韦罗奇卡没走的时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并不认为她必须走开，而认为应当用刻薄话来回敬刻薄话。可是她一走，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明白了：对，走才是上策，让儿子骂她去，这样更好！又过了两个星期左右，安娜·彼得罗夫娜再次登门，这次她没有找什么借口，直接说是来看望的，她也没有在韦罗奇卡面前说刻薄话。

时光荏苒。求婚人送了些礼物给韦罗奇卡。礼物由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经管，当然也像安娜·彼得罗夫娜所送的那块表一样，被她扣留了，不过她没有都留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把其中一些不大值钱的交给了韦罗奇卡，说是过期的抵押品：应当让求婚人看见，他的礼物中至少有几件是在姑娘那里。他看见了，就会相信韦罗奇卡已决定答应他，要不然她不会接受他的礼物。可是她干吗又要拖延呢？他自己明白，同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

娜也指出过：因为她要等到安娜·彼得罗夫娜被完全驯服……于是他就加倍起劲地调教他的母亲就范，这件事给他带来了不少乐趣。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干扰韦罗奇卡，反而总是讨好她。她厌恶他们像狗似的对她阿谀奉承，因此尽量地少跟母亲待在一起。当韦罗奇卡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的时候——她几乎整天待在那里，母亲也不敢再进去了——没有人去惊动她。她有时准许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进她房里，他跟她在一起，竟像小孩一样听话。她叫他读书，他就像是预备考试似的，十分用心地读。他从阅读中获益很少，但是多少也得到了。她尽量地利用谈话去帮助他，他也觉得谈话比书本好懂。他有了一些进步，虽然进步不快，也不大，可毕竟还是有了进步。他对待母亲也比从前讲点礼貌了，对她只是一般地加以管束，而不再悉心地进行调教了。

这样过了三四个月。这期间有时休战，有时很平静，但总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由于等待着痛苦的降临，韦罗奇卡的心仿佛要停止跳动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或者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便要强迫她答应，因为他们不会永远忍耐下去。

如果我想编造富有刺激性的冲突，我就尽可以给这段情节安上一个极为夸张的结局，而实际上不可能有这样的结局；如果我想设置个悬念吸引读者，我也不会现在就开始声称，从来也没有过此类事件发生。我写作时从不耍花枪，所以我预先说明，不会有极为夸张的冲突，情节结束时没有暴风雨，也没有雷鸣和电闪。

—

谁都知道，在以前，如果一个卑劣的家庭里有了一个出色的姑娘，事情会是怎样收场。人家强加给她的夫婿是她所不喜欢的大俗人，他本来就没有多大本事，而且越来越没出息，但是他死乞白赖地缠住了她，对她百依百顺，居然慢慢变得凑凑合合，不好不坏了。姑娘最初不肯嫁他，可是逐渐地习惯于对他颐指气使，并且她相信，要从这么一个丈夫和这么一个娘家中选择其一，两害相权，还是丈夫害处小些，所以她就成全了她的爱慕者。当她最初饱尝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的苦果时，她感到厌恶。但是丈夫对她百依百顺。“习于相忍，就会相爱，”她终于变成一个平平常常的好太太，即一个自身素质不错，可是流于世俗，活在世上只是混日子的女人了。从前出色的姑娘们的下场是这样，从前出色的小伙子们也是如此，他们也都变成了活在世上只是混日子的好人。这是早先的情况，因为那时正派人太少。从前这种人大概好比早先种的庄稼：“棵棵穗子分开长，彼此不闻说话声。”可是不论男女，都不能一辈子独身生活却又不凋萎憔悴。他们或者萎靡不振，或者就与世俗合流了。

现在越来越常见的却是另一种情况：正派人跟正派人开始相聚一起。既然正派人的数目年年增加，那么他们相聚一起的情况怎么会越来越常见呢？往后这势必非常的普遍，再往后就不会再有别种情况了。因为所有的人

都成了正派人。那时候会是很好的。

韦罗奇卡觉得现在就很好。因此我要谈谈她的生活（是在得到她同意的情况下），据我所知，她是最早能够把生活安排好的妇女之一。最早出现的事情具有历史意义。第一只飞来的燕子最使北方居民感兴趣。

自从下面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她的生活才安排得好起来：

韦罗奇卡的小弟弟该准备进中学了。父亲请同事们给找一名收费较低的教师。一位同事给他介绍了医学院学生洛普霍夫。

洛普霍夫来上过五六次课以后，韦罗奇卡和他才相互见到。他和费佳待在住所的这一头，她在另一头，在她自己的房里。后来由于医学院考期临近，他把教课时间从早晨改为晚上，这样他每天早晨好学习。他晚上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他们全家在喝茶。

沙发上坐着认识的两个人：学生的父母。母亲旁边的椅子上是学生，而稍微远些的地方有个陌生人，一位身材高高的、苗条的、褐色皮肤的姑娘，黑头发，一头浓密的秀发。”他想到），黑眼睛（“眼睛也美，甚至是很美”），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庞（“好像是小俄罗斯人”，也许还不如说是高加索人。挺不错的，脸也很美，就是神情很冷漠，这可不像是南方人了。身体很好，如果人们都像她这样子，我们学医的就可以减少些了！是的，她那红红的脸色看起来很健康，胸脯挺宽，它与听诊器素来无缘。她要是进入社交界，一定引人注目。不过我对她并不感兴趣。”）。

即乌克兰人。

她看了看走进来的教师。这位大学生年纪不算太轻，中等身材或者比中等身材略高些，长着深栗色的头发，相貌端正，甚至算得上是漂亮，样子倔强而果敢。她想：“长得不错，大概是个好人，就是过于严肃了”

她想到这儿时却没有再加上“不过我对他并不感兴趣”这一句，因为根本不存在她对他是是否感兴趣的问题。关于他，费佳难道对她不是讲得够多的了吗，她都听烦了。

“姐姐，他是个好人，就是不爱讲话。姐姐，我告诉他您是我们这儿的大美人，姐姐，可他说：‘呃，那又怎么样？’姐姐，我就说：大美人可是人人都爱呀。他却说：‘只有没头脑的人才爱呢。’我说：难道您不爱？他说：‘我没有闲工夫。’姐姐，我就问他：那您不想认识认识韦罗奇卡吗？他说：‘就是不认识她，我也有很多朋友了。’”费佳刚刚上完第一课，就喋喋不休地讲了这许多话。他后来讲的也是诸如此类的话。只是又作了种种的补充：“姐姐，今天我告诉他，不管姐姐您到什么地方，大家都看您。

姐姐，他说：‘啊，那很好嘛。’我问他：您就不想看看她？他说：‘总会看到的。’”或者后来又说：“姐姐，我告诉他，您的一双小手多秀气，姐姐，他却说：‘您很爱聊天，难道不可以聊聊别的更有意思的事？’”

凡是应该知道的有关姐姐的一切情况，教师都从费佳那儿知道了。他制止费佳谈论家长里短，可是你怎么能阴止一个九岁小孩向你泄露秘密呢，如果你不把他唬住的话？即使你来得及在他说第五句话时就打断他，那也太迟了，因为小孩总是开门见山，不用开场白。教师听到在关于各种家事的讲解中穿插着这样一些有头无尾的话：“我姐姐有个求婚的，挺阔！妈说那个求婚的是笨蛋！”“妈尽讨好那求婚的！”“妈说的：姐姐很机灵，一下子就抓住了那求婚的！”“妈说的：我狡猾，韦罗奇卡比我还狡猾！”“妈说的：我们要把那求婚人的娘赶出家门去。”等。

两个年轻人在了解了彼此的这些情况后，就没有多大兴趣再相互认识了，这是很自然的。不过眼下我们只是知道从韦罗奇卡这方面来说是挺自然的。她老练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想用心计来征服“这类孤僻的男人”和“驯服这只熊”，再说她也顾不上那些，只要人家不来干扰她，她就满意了。她好比一个满身创伤、筋疲力尽的人侥幸能躺一下，把折断的手臂放安稳，让自己不感到腰疼，她怕动弹，唯恐关节痛老病复发。她还有什么心思去结交新朋友呢？何况对方也是年轻人。

的确，韦罗奇卡是这样的。那么他呢？照费佳的话判断，他是个孤僻的人，他满脑子尽是书本和解剖学标本，对于一个医学院的优秀生来说，这两样东西是愉悦心灵的最大乐事，精神食粮中的美味佳肴。或许费佳在诬赖他吧？

二

不，费佳没有诬赖他。洛普霍夫确实是个满脑子尽是书本和解剖学标本的大学生。

是什么书呢？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对他的藏书目录的调查中，我们就会看到的。至于解剖学标本，如果还没占有这方面的足够的知识，就不能当教授，而洛普霍夫正期望着当教授。因为我们看到洛普霍夫听了费佳介绍的关于韦罗奇卡的情况以后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她，由此推论，要真正了解洛普霍夫，还必须对费佳介绍的关于教师的情况加以补充才行。

就经济状况而言，洛普霍夫是医学院中极少数不靠官费维持生活的旁听生，他们还能维持温饱。而大多数学生何以为生，生活得怎样，那当然只有天晓得，人们是无从了解的。但我们的小说不想来描写那些无法糊口的人们。因此，关于洛普霍夫所处的这种不体面的境况也就一笔带过了。

况且他的困难时期不长，三年左右，甚至更短些。进医学院以前，他过得还是挺宽裕的。父亲是梁赞的小市民，照小市民阶层来看，生活是富足的，就是说，他一家人不光是星期日能喝上肉汤，甚至天天都有茶喝。他还能勉强供儿子进中学，儿子从十五岁起就自己在外教点课，减轻了他的窘况。要供儿子上彼得堡念书，父亲的财力是不够的，可是在彼得堡的头两年洛普霍夫每年还能从家里收到三十五卢布左右，同时他在维堡区警察分局一个派出所作为临时雇员抄写公文，从那儿几乎也能拿到同样多的一笔钱。

只是在这个时期他还较为穷苦。而巨那也是他自己的失误：他本来考取了官费，但是由于他吵了一次架，结果只好自立谋生，勉强糊口。当他上到三年级时，情况开始好转。

派出所的副所长请他去教家馆，后来他又找到一些别的家馆教，所以近两年来他的生活不再拮据，这一年多他住上了一套房子，而且不是一间一套，而是两间一套的，这表明他并不穷。跟他同住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基尔萨诺夫，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俩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早已习惯于凭自己的力量去开拓道路。总之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如果你只是分别碰到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看做是性格相同的人。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他俩都很庄重，很坦率，但是洛普霍夫比较拘

谨，他的同学较为外向。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要晚得多才能出场。

而如果不提基尔萨诺夫，只写洛普霍夫，你看到的只能是写到基尔萨诺夫时必然要重复的雷同的东西。例如，现在洛普霍夫最关心的是毕业以后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他跟基尔萨诺夫一样，离毕业只有几个月工夫了。他俩未来的计划也相同。

洛普霍夫确实知道，他将担任彼得堡一家军医院的医师——这被认为是很幸运的事——而且很快能在医学院任教，当教授。他不愿开业行医。这是一个新奇的特点。最近十来年，在医学院中出现了一些决心在毕业之后不去开业的高材生，虽然学医的只有开业才能有钱过富裕的生活。而且他们一遇到机会就把医学放下，去研究医学的某些辅助性学科如生理学、化学之类。他们本来人人都知道，开了业，他在三十岁上便能名声显赫，到三十五岁，一辈子生活都有了保障，到四十五，就能发财致富了。但是他们另有一番道理：您看到了吗，现在医学还处于蒙昧时期，现在该做的还不是治病，而只是给未来的医生学会治病积累资料。他们非常热衷于嘲骂医学，却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奉献给医学。为了他们所心爱的医学，他们舍弃钱财、连温饱的生活也不要，待在医院里进行有益于科学的观察，解剖青蛙，每年还要解剖几百具尸体，只要有机会就建立化学实验室。他们为实现这崇高的决心能奉献到什么程度，当然还要看他们的家庭生活境况如何。假如无需供养亲属，他们决不开业，就是说，宁肯自己近于赤贫。但如果由于家庭的生计所迫，他们就根据家庭的需要，酌量开业，就是说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只医治那些真正有病而凭今天可怜的科学水平的确还能够医治的人，也就是对他们来说根本无利可图的病人。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就是这样的学生。他们应该在那一年毕业，他们宣布要直接参加（或者像医学院的人说的：报考）医学博士学位考试。目前他俩都在写博士论文，已经消灭了大批青蛙。他俩选定的专业都是神经系统，他们实际上是在一起干的。但是就论文的形式而言，他们有所分工。一个人把两人共同在这一问题上发现的事实作为资料写进论文；另一个就在自己的论文中利用在另一问题上两人共同发现的事实作为资料。

现在，可该单独说说洛普霍夫了。他曾一度好喝酒，那是他喝不上茶或者穿不上靴子的时候。这种时候没有比喝酒更好了，不光是想喝酒，并且也有承受能力，喝酒比吃穿都便宜。他也不过就是穷得难熬时，喝口酒解解心烦罢了。现在早就没有人过着比他更为严格的生活了，这不单是就喝酒来说的。早先洛普霍夫有过许多风流韵事。例如有一次发生这样一桩事：他迷上了一个外地来的舞蹈演员。那该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就上她的住所找她去了。“您有何贵干？”——“一位伯爵派我送来了一封信。”仆人根据他的大学生制服，毫不犹豫地把他当作了一名文书或者什么特殊的勤务兵。“信交给我。要等回信吗？”——“伯爵吩咐要等的。”仆人满脸惊讶的神色转回来了。“她吩咐了叫您进去。”——“原来是他，是他呀！他总是给我大声叫好，我就是在化妆室也能听出是他的声音。您那样发疯似的给我叫好，让警察带走过好多次吧？”——“才两次。”“太少了。呃，您到这儿来干吗？”——“来看看您。”——“太好了。还有别的事吗？”——“不知道。看您想干吗了。”——“哦，我知道我想干吗。我想吃早饭。您看餐具都摆好了。您也请坐吧。”仆人又送上一份餐具。她笑话他，他也笑话自己。他年轻，

长得不错，人也不笨。真妙，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快活快活呢？她跟他快活了两个来星期，然后说：“滚开吧！”“我自己也早就想撤了，可是不好意思！”“那么咱们就友好地分手吧？”他们又拥抱了一次，于是圆满收场。不过这是很早以前，大约三年以前的事了，最近这两年他已经再也没有胡来了。

除了同学们和预言他会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两三位教授以外，他常见面的只有教课的几家人。但是他跟这几家人也只不过见见面而已，他怕跟人随随便便、亲密无间，就像怕火似的。除了他的那些年幼的男女学生之外，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持以冷漠无情的态度。

三

这样，洛普霍夫走进了屋里，看见了包括韦罗奇卡在内、正坐在茶桌旁喝茶的这一家人；而包括韦罗奇卡在内的这一家人当然也看到教师进屋来了。

“请坐，”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玛特辽娜，再拿一只杯子来。”

“要是给我的，那我谢谢您啦，我不喝。”

“玛特辽娜，不要拿啦。（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喝呢？喝吧。”

他看着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但是同时，好像有意地又瞧了韦罗奇卡一眼，也许真是有意的吧？也许他发现她微微地耸了耸肩吧？“他看出我的脸红了。”她想。

“谢谢您，我只在家里才喝茶。”

“他可完全不是那么一个孤僻的人，他一进来就微微地、潇洒自如地鞠了个躬。”她在桌子的这一边暗自思量。——“不过即使她是个学坏了的姑娘，至少也会为她母亲的俗不可耐害羞的。”他在桌子的另一边思量。

但是费佳很快就喝完茶，学习去了。所以这个晚上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知道她那缸白糖大概不会由于上课时间从早晨改为晚上而蒙受重大损失，便对教师产生了好印象。

过了两天，教师又碰到那一家人在喝茶，而且又谢绝了喝茶，这就使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完全放了心。可是这一次，他看见桌旁多了一张新面孔——一位军官，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尽向那人献殷勤。“哦，是求婚的！”

求婚人认为不仅要看教师，还要在看过以后用上流社会里人们习惯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怠惰目光，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这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和门第。可是他刚开始打量，就发觉教师并未也来打量他本人，而是更不礼貌：用目光直视着他，并且目光那么专注，求婚人打量不下去了，才开口道：

“洛普霍夫先生，干您这行可不易啊——我是说干医生这行。”

“是的，不容易。”他仍旧直视着他。

求婚人感觉自己的左手不知何故从上往下地摆弄起制服上第二和第三只纽扣来。唔，如果他都求救于纽扣了，那就表明他除了赶快喝完这一杯茶，请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再给一杯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慌乱了。

“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您身上穿的是什么团队的制服吧？”

“对，我在一个团里服役。”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答道。

“服役很久了吗？”

“九年了。”

“一开始服役就在这个团里吗？”

“对”

“您当上连长没有？”

“不，还没有。”（“他这样盘问我，仿佛我是他的传令兵似的。”）

“快有希望当上了吧？”

“还没有。”

“哦。”教师认为盘问够了，于是又朝那假想的传令兵看了看，也就不再盘问了。

“不过……不过，”韦罗奇卡想道，“这‘不过’是什么意思呢？”她终于想出来“不过”是什么了：“不过他的行为举止，就像那次带着好心的朱丽来这儿的谢尔日。

他哪是什么孤僻的人？可他对姑娘们为什么又持以种种奇谈怪论呢，说什么只有没头脑的人才爱美人呢？还有……还有……什么‘还有’？”她想起来“还有”什么了：“还有他为什么一点不愿听关于我的事，说是不感兴趣呢？”

“韦罗奇卡，你弹弹钢琴吧，随便弹点什么都成。我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想听听！”当韦罗奇卡把第二杯茶放到桌上的时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

“好吧。”

“您若能再唱点儿什么就更好啦，韦拉·巴夫洛夫娜。”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用奉承的口吻补充说。

“好吧。”

“不过这个‘好吧’听起来就像是说：‘成，只要我能脱身，’”教师想到，因为他已经在那儿坐了四五分钟，虽然没看她，却知道她除了刚才回答求婚人时，没有瞧过对方一眼，而她刚才瞧他这一眼，就像看着母亲和父亲一个样：冷冷地、毫不客气。这儿总有那么一点跟费佳说的不一样。不过她倒很可能真是一个傲慢冷漠的姑娘，她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去当女皇和明星，她现在心里所以不痛快，是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求婚人。可是尽管她看不起这个求婚的，却还是答应了他，因为再没有别的人能把她带到她所向往的地方。不过这件事倒挺有意思的。

“费佳，你尽快喝完。”母亲说。

“别催他，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如果韦拉·巴夫洛夫娜允许，我也想听一听。”

韦罗奇卡随手抓起了一本乐谱，甚至连是什么乐谱都没看，就又随手翻开一页，机械地弹奏了起来，反正弹什么也无所谓，只要能够尽快解脱。说也凑巧她翻到的是一支有意思的乐曲，是从一部不错的歌剧中挑出来的。姑娘的弹奏很快显得生机勃勃。弹罢，她想站起来。

“可是您答应唱歌的，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不嫌冒昧，想请您唱唱《弄臣》选段。”（那年冬天，“La donna e mobile”是一支流行的咏叹调。）

“好的。”韦罗奇卡唱完“La donna e mobile”便起身回自己房里去了。

“不，她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冷漠的姑娘。这倒很有趣。”教师想道。

“唱得好，是吧？”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已经是用平常的声调和教师说话了，并且也不再打量他。没必要和这种人搞坏关系，虽然他曾像盘问传令兵似的盘问过自己。为什么不可以随和点跟教师谈一谈，免得他生气呢？

“嗯，唱得好。”

“您懂音乐吧？”

“马马虎虎。”

“您本人就是音乐家吧？”

“算不上，只是懂一点。”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听完这段对话，计上心头。

“您玩什么乐器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她问。

“钢琴。”

“可以请您来给我们助助兴吗？”

“很乐意。”

他弹了一支曲子。他弹得不怎么样，很一般，也许还算是不错。

等他上完课，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走到他面前，说明天他们家有个小小的晚会，是给她女儿过生日，她请他光临。

显然是男舞伴不够，这种晚会一般都是这样。不过没有关系，他可以从近处来观察这姑娘，她自己本身或者与之相关的事情中定会有些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多谢您，一定来。”但是教师错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意图对她自己来说，要远比对那些跳舞的女郎重要。

读者，你当然会预料到，要交代在这次晚会上韦罗奇卡和洛普霍夫相爱了吧？自然是相爱了。

四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想在韦罗奇卡的生日时举行一次盛大的晚会，可是韦罗奇卡央求她别请任何客人。一个想拿求婚人来炫耀，另一个却觉得这种炫耀使她难受。结果双方商定举行一次小型晚会，只招待几位亲近的朋友。他们邀请了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的同事们（当然是比他官衔大和职位高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两个女友，以及三个跟韦罗奇卡最接近的姑娘。

洛普霍夫把参加晚会的客人查看了一遍，发现并不缺少男舞伴，每位姑娘身边都有个小伙子——准未婚夫或者正式未婚夫。可见洛普霍夫被邀请来不是做舞伴的。那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他想了一想，才记起在邀请他之前曾测试过他弹钢琴的技艺。因此他们邀他来是为了节省开支，免得雇琴师了。“好，”他想，“对不起，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然后走到了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跟前。

“怎么样，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该玩维斯特了吧？您瞧，老头儿们都闷得慌啦！”

维斯特，一种牌戏，近似桥牌。

“您要玩多大的输赢？”

“多大都行。”

牌局立刻就凑起来了，洛普霍夫也坐下来打。在维堡区，医学院是一个有着打牌的优良传统的机构。在那儿的任何一个房间（就是说，官费生的房间）里，连续打上三十六小时是常有的事。需要承认的是，虽然那里牌桌上的输赢数额远远不及英国俱乐部，但那里的牌友们却要技高一筹。洛普霍夫曾一度玩牌玩得很起劲，那是在他没钱花的时候。

英国俱乐部，当时彼得堡最著名的贵族俱乐部。

“Mesdames，怎么办呢？轮流弹琴吧，我们可就只剩下七个人啦，那末要跳卡德里尔舞就缺一个男舞伴或者一个女舞伴了。”

法语：小姐们。

第一圈牌刚打完，一个最为活泼的姑娘快步如飞地跑到洛普霍夫面前。

“洛普霍夫先生，您该跳跳舞了。”

“我可有个条件。”他说着，站起来鞠了一躬。

“什么条件？”

“我请您跳第一轮卡德里尔舞。”

“哎哟，我的天，第一轮我答应别人了，请跟我跳第二轮吧。”

洛普霍夫又鞠了一个大躬。两个男舞伴轮流弹琴。跳第三轮卡德里尔舞时，洛普霍夫邀请了韦罗奇卡。第一轮她是跟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跳的，第二轮他是跟那活泼的女郎跳的。

洛普霍夫观察着韦罗奇卡。他已确定无疑自己是误解了她，把她当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姑娘，以为她光凭利益的计算，就可以无所谓地嫁给他所鄙视的人。现在他看见自己面前这个年纪轻轻、平平常常的姑娘正在尽情跳舞、开怀大笑。是啊，韦罗奇卡也有该惭愧之处，我们只能称她是个喜欢跳舞的、平平常常的姑娘。她本来坚持绝对不开晚会，可晚会还是举行了，这是一个小型的、无炫耀之意的、因此也就不使她感到痛苦难堪的晚会。但她也决没料到，在晚会上她居然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在她那个年纪，人们是那样不愿愁眉苦脸，而那样愿意跑跑跳跳、嘻嘻哈哈、快快活活的。只要有一个极小的机会能使人忘掉痛苦，他们就会暂时忘掉。洛普霍夫现在对她产生了好感，但是对许多事情他仍然不理解。

他对于韦罗奇卡的奇怪处境颇感兴趣。

“洛普霍夫先生，我决没料到会看见您跳舞。”她先说道。

“为什么呢？跳舞这真是那么难吗？”

“一般来说当然不难，可对您来说，显然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对我来说就不容易？”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秘密——您和费佳的秘密：您看不起妇女。”

“费佳对我的秘密理解得并不完全正确。我不是看不起妇女，我只是躲避她们。您知道为什么吗？我有个爱吃醋的未婚妻，她为了使得我避开妇女，把她们的秘密告诉了我。”

“您有未婚妻啦？”

“嗯。”

“这可真没想到！还是大学生就订婚啦！她漂亮，所以您就爱上她啦？”

“嗯，她是个美人，我很爱她。”

“她的头发是黑的，还是浅黄的？”

“这我不能告诉您。这是秘密。”

“好，既然是秘密，您不愿说就甭说了。但是她到底对您揭露了妇女的什么秘密，竟使得您躲避她们，不跟她们来往呢？”

“她看出来我不愿使自己处于恶劣的心境之中，于是就悄悄地告诉了我妇女的一个秘密，使我见到妇女后，就不能不处于恶劣的心境之中，所以我要躲避她们。”

“您见到妇女后，就不能不处于恶劣的心境之中，您可真不擅于说恭维话。”

“怎么才能换个说法呢？可怜别人，就是一种恶劣的心境。”

“难道我们是那样可怜吗？”

“难道您不是妇女吗？只要我对您说出您的最隐秘的心愿，您就会赞成我的意见了。”

这是所有妇女的共同心愿。”

“您说吧，说吧。”

“这个心愿就是：‘唉，我多希望我是男人啊！’我从来没碰见过没有这种内心秘密的妇女。而且您多半不用查问什么，甚至也无需提任何要求，她就会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不论妇女由于什么原因而心绪不佳，您都可以马上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妇女真倒霉！’或者：‘男人和妇女就是不一样’或者索性这么说：‘唉，为什么我不是男人！’”

韦罗奇卡微微一笑：的确，这些话从任何一个妇女嘴里都可以听到的。

“您瞧，妇女多可怜，如果每个妇女的心愿都能实现，那么世界上连一个妇女也剩不下了。”

“嗯，也许是这样。”韦罗奇卡说。

“同样，如果每个穷人的心愿都能实现，那么世界上一个穷人也剩不下了。您瞧，妇女怎么不可怜！就像穷人一样可怜。有谁高兴看见穷人呢？自从我知道了妇女的秘密以后，我就像不高兴看见穷人一样地不高兴看到她们。妇女的这个秘密是我那爱吃醋的未婚妻在订婚那天向我揭露的。原先我很爱和妇女交往，但从那天起，未婚妻把我这兴致一下子就都打消了。”

“您的未婚妻是一位善良聪明的姑娘。对，我们的妇女是可怜虫，我们很不幸！”韦罗奇卡说，“不过您的未婚妻到底是谁呢？您是在卖关子。”

“这是我的秘密，费佳不能告诉您的。我完全赞同穷人的愿望——但愿不再有穷人，这个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的，因为我们迟早总会安排好生活，使世界上不再有穷人。可是……”

“不再有？”韦罗奇卡插嘴说，“我自己也想过将来不会再有穷人，但是怎样才能不再有，我想不出来。您告诉我，怎样才能？”

“我一个人不能告诉您的，只有我的未婚妻才能讲出来。她不在这儿，我一个人能够说的只是：她关心这件事，并且她很有力量，她的力量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人。但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她一个人，要谈的是一般妇女。我完全赞同穷人的愿望——愿世界上不再有穷人，因为这正是我的未婚妻致力于此的。可是我不赞同妇女的愿望——愿世界上不再有妇女，因为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凡是不可能的事情，我都不赞同。但是我有另一个愿望：我愿妇女跟我的未婚妻做朋友，因为她对妇女很关心，正像她对许多事情、对一切事情都很关心一样。如果她们跟她做了朋友，我就没有理由再可怜她们了。‘唉，为什么我生来不是男人！’这样的愿望也就不会再有了。要是能够跟她做朋友，妇女不会比男人逊色的。”

“洛普霍夫先生！再跳一次卡德里尔舞！一定！”

“您这样的态度值得称赞！”他泰然而庄重地握了握她的手，好像她是她的女友，或者她是他的男友。“跳哪一轮？”

“最后一轮。”

“好”

他们跳这一轮卡德里尔舞的时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在他们身边晃来晃去了好几次。

如果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偷听了这场谈话，她会怎么想呢？我们大家从始至终都听全了，我们会说，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话是很奇怪的。

最后一轮卡德里尔舞开始了。

“我们总是在谈我，”洛普霍夫先开口说，“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尽谈我自己是很不礼貌的。现在我要注意有礼貌，谈谈您了，韦拉·巴夫洛夫娜。您知道，我原先对您的印象，比您对我的印象要坏得多。可现在……嗨，以后再说吧。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总是回答不了，您来回答我：您快结婚了吗？”

“决不。”

“从我离开牌桌来到这儿的三个钟头里边，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为什么人家把他当做您的未婚夫呢？”

“为什么人家会把他当做我的未婚夫？我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不能对您说，难于说出口。还有一点是我可以说的：我可怜他。他爱我。您会叫我把我对我们这桩婚事的想法对他直说。其实我早就说过了；可是他回答我：别说啦，您这是不叫我活了，别说啦。”

“这是第二个原因，而第一个，就是您不能告诉我的那一个，我却可以对您说出来：您在家里的处境太恶劣。”

“现在还能凑合过。现在谁也不来折磨我，都在盼着，让我一个人待着，或者说几乎是让我单独待着。”

“但是不可能长久地这样过下去。他们还要来找您麻烦的。那时候怎么办？”

“没关系，我都想过了，也下了决心，到时候我不会待在这儿的。我可以去当演员，那是一种多么值得羡慕的生活啊！独立！独立！”

“还有人们为您鼓掌呐。”

“对，这也是挺愉快的。不过主要的是独立！于自己愿意干的事儿，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请示任何人，不向任何人要求什么，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也不需要！我愿意这样生活！”

“是这样，这样好！现在我对您有一个请求：我去打听这件事怎么能办到，需要找谁帮忙，行吗？”

“谢谢。”韦罗奇卡握了握他的手。“请尽快办吧，我恨不得赶快从这个卑劣的、难以忍受的、屈辱的境地中挣脱出来！我说：‘我很平静，还能凑合过，’果真是这样吗？难道我没有看见人家借着我的名义在于些什么？难道我不知道这里大家对我的看法？他们说我是阴谋家、小滑头，说我想发财，想钻进上流社会炫耀自己，说我会把丈夫踩在脚下，随意摆布他、诳骗他。难道我不知道大家对我有这样的看法？我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不愿意！”她沉思起来。“您别笑话我，我想说：我可怜他，他太爱我啦！”

“他爱您？他是不是像我这样看您的？他的目光是像我这样的吗？”

“您看我的目光是坦诚的、纯洁的。不，您的目光并不使我感到屈辱。”

“您要知道，韦拉·巴夫洛夫娜，这是因为……反正没有关系。他是这么看您的吗？”

韦罗奇卡脸红了，没有说话。

“可见他并不爱您。这不是爱情，韦拉·巴夫洛夫娜。”

“不过……”韦罗奇卡没说完就停下来了。

“您想说：如果不是爱情，这算什么呢？就算是都一样吧。但您将来自己会说，这不是爱情。您现在最爱谁呢？我说的不是男女爱情，我是说，在亲属和女朋友中您最爱谁？”

“好像还没有特别爱的。他们当中没有我热烈爱上的人。不过，也不是，最近我碰见了一个很奇特的女子，她告诉我她很坏，还不许我继续跟她来往。我们相识完全是由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偶然机会。她说，只有当我濒临绝境，走投无路时，才让我去找她，否则绝对不能去找。我已经狂热地爱上她了。”

“让她为了您去做她不喜欢做或者于她有害的事情，您愿意吗？”

韦罗奇卡微微一笑。

“这怎么可以？”

“不，假定您十分迫切需要她为您做件事情，她却对您说：‘做这事会使我非常痛苦的，’那么您还会再提一遍您的要求，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求她吗？”

“我宁愿死，也不会再去求她的。”

“瞧您自己已经表明了这就是爱呀。不过这爱只是一种很平常的感情不是狂热的激情。什么才是狂热的激情？狂热的激情和平常的感情有什么不同？区别在于程度不同。

那么，如果平常的感情，比狂热的激情弱得多的感情都能使您对人持以这种态度，使您能说：‘我宁愿死，也不愿给他造成痛苦，’如果平常的感情都能使您这样说，比它强烈千倍的激情又会使您说些什么呢？您会说：‘我宁愿死，也不允许——既不是要求，也不是请求——让一个人为我做他自己不高兴做的事。我宁愿死，也不允许他为了我不得不迫使自己去做什么事，或强制他自己去做。这种激情使您说出这样的话来，才是真爱。

而如果激情不是这样的，那只是情欲，而根本不是爱情。我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我也全都说完了，韦拉·巴夫洛夫娜。”

韦罗奇卡握了握他的手。

“再见。您为什么不祝贺我呢？今天是我的生日。”

洛普霍夫看了看她。

“可能是……可能是！如果您没说错，对我也是好事。”

五

“这事怎么来得这样快，这样突然啊，”晚会刚一结束，韦罗奇卡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想，“初次交谈过后就变得那么亲近！半个小时以前彼此还完全不认识，过了一个小时，却发现已经是那么亲近了！这多奇怪！”

不，一点也不奇怪，韦罗奇卡，洛普霍夫这类人会用磁石般的话语来

吸引受苦受难、受屈辱的人。这些话语是他们的未婚妻提示给他们的。韦罗奇卡，你居然这么平静。这才是真正令人奇怪的——不过你我并不觉得奇怪。人们一向认为爱情是一种令人激动不安的感情，你却像小孩似的静静地入睡，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的梦来扰乱你的平静，莫非还会梦见快活的儿童游戏，“方特”“逮人”，或者也许还会梦见跳舞，不过那些梦中的舞也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别人感到这事很奇怪，你并不知道这有什么奇怪，而我却知道这没什么奇怪。恋爱中的激动不安并非是恋爱本身，恋爱中的激动不安本不该有，恋爱本身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

“多奇怪啊。”韦罗奇卡想道，“他关于穷人、妇女以及应当如何恋爱等问题的想法，我自己也曾反复地思考过、体验过。我这都是从哪儿得来的启发呢？也许是从我读过的那些书本上？不，书上写的不同：在书上，要么对这些想法提出许多疑问，要么附加上那么些条件，并且这些想法仿佛都是很寻常、极不可信的。仿佛都是幻想，虽然十分美好，但却没法实现！而我却觉得这是很简单的，简单到无法再简单了，这又是最寻常不过的，寻常得无处不在、不可缺少。而且将来确定无疑会实现的，没有比它更确定无疑的了。可是我原来还以为那是些最好的书呢。就拿乔治·桑来说吧，她那么善良、高尚，而她书中写的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又比方我国的作家，不，我国的作家根本一点都没有涉及过这些。再比方狄更斯，他虽然写过，却似乎并没有指望这一切能够实现，他只是有一种由善良的天性产生的善良的愿望而已，不过他自己又认为这一切是不可能有的。他们怎么会不知道，非如此不可呢？确实必须这样做，必须做到消灭贫穷和灾难，这是一定能做到的。他们果真没讲到这点吗？没有，他们只会怜悯，他们认为将来实际上还是跟现在一个样——稍微好点，但是所差无几。他们没有讲到我想过的事。

如果他们讲过，那么我就会知道聪明善良的人都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我就总觉得只有我才这样想，因为我是个傻姑娘，除了我这个傻子，谁也不会这样想，谁也不会真正指望这个。可现在他却讲了，按照他的未婚妻对一切喜爱她的人所做的讲解，将来的情况跟我预感的一样，她讲解得非常明白，以致于他们也开始关心使这一切尽快地成为现实了。他的未婚妻何等聪明！不过她到底是谁呢？我要打听出来，一定能打听出来。是的，那多好啊，那时不再有穷人，谁也不强制谁，人人都快活、善良、幸福……”

韦罗奇卡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她睡得很香，也没有做梦。

不，韦罗奇卡，你反复思考这一切，并把它牢牢记在心中，这并不奇怪，你是一个幼稚单纯的姑娘，你连听也没有听过某些人的姓名，其实他们早已开始进行这方面的教导了，而且证明必须得有这样的理想，这理想一定会变成现实的，不可能不变成现实。

你能理解你的那些书本还不能向你明确介绍的思想，并牢记心中，这并不奇怪。当你的那些书本的作者学习这些思想的时候，那也不过还只是一些思想罢了，虽然这些思想看起来挺新奇，挺令人赞赏，但也仅此而已。可是现在不同了，韦罗奇卡，这些思想已经在生活里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与此同时又有别的人写了些别的书，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虽然很好，但是里面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可是现在，韦罗奇卡，这些思想飘散在空气中，正如百花盛开时节香气弥漫在田野上似的。它洋溢在四处，你甚至能从你的酒鬼母亲的谈话中听到它，她告诉你必须靠骗和抢来生活以及为什么必须这样生活，她本来是要反驳你的思想，结果却发挥了你的思想。你还从那个厚颜无

耻的、堕落的法国女人嘴里听到了它，她随身带着她的情夫，就像带着女仆一样，想要把他怎样就怎样，但是只要一清醒过来，她还能看出她没有自己的意志，不得不去讨好别人，强颜欢笑，这是很痛苦的。她好像是不愿跟她的谢尔日过下去了，虽然谢尔日善良、和气、温存，而她还是说：“连我这个坏女人也感到这种关系太丑恶。”现在，韦罗奇卡，要具有你那种思想并不困难。可是别人不把它放在心上，你却牢记心中，这很好，但也并不奇怪：你想成为一个自由幸福的人，这有什么奇怪呢？因为有这个愿望不是什么很费脑筋的发现，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业绩。

韦罗奇卡，奇怪的倒是有些人没有这种愿望，却抱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大概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你，我的朋友，在你恋爱的头一个晚上竟想着这些入睡，你从自己、自己的情人和自己的爱情想起，进而想到人人都应该幸福以及应该促使这想法尽快成真。

你不知道这有什么奇怪，我却知道这没什么奇怪，只有这样才合乎情理。这完全合乎人情：“我感到快乐和幸福，”也就是说“我希望人人都快乐和幸福”，从人情上来说，这两种想法完全一致，韦罗奇卡。你是个好姑娘，不是傻姑娘，不过请原谅我，我没有在你身上看出什么新奇的东西。我以前和现在认识的姑娘中，可能有一半甚至一大半——我没有计算过，况且计算起来她们人数也太多了——并不比你差，有些还比你更好，请你原谅我这么说话。

洛普霍夫觉得你是一个希奇的姑娘，的确是，他这样想并不希奇，因为他爱上了你！他爱上你，这也没有什么希奇，你的确可爱。而他既然爱上了你，自然就会这样想，也应该这样想。

六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在女儿和教师跳第一轮卡德里尔舞的时候，总在他们身边晃来晃去。可是跳第二轮时她再也没在他们附近露面，她作为主妇完全埋头于张罗忙活那顿像晚餐一样丰盛的小吃去了。等她忙完了，问起教师来，教师已经走了。

过了两天，教师来上课。茶炊已经端上来了——教师每次来上课都赶上他们喝茶。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去到教师给费佳上课的那个房间。本来都是由玛特辽娜来叫费佳的。教师想留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去，因为他不喝茶，而且想利用这段时间检查费佳的作业。但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请他赏光跟他们一起坐一会儿，她需要跟他谈谈。他去了，坐在了茶桌旁。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开始询问起他来：费佳的才能怎样？哪个中学比较好？是不是把孩子送进寄宿中学更好？这些问题提得合情合理，不过好像问得早了一点？这次谈话的时候，她请教师喝茶，态度那么热情可亲，以致于洛普霍夫答应打破他的惯例，拿起了杯子。韦罗奇卡过了好半天才进来，她和教师相互鞠了躬，仿佛他们中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仍然继续地谈论着费佳。后来她突然把话锋一转，盘问起教师本人来

了：他是什么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些什么亲属？亲属们有没有财产？他眼下怎样生活，还有什么打算？教师的回答很简短，却含糊不清的，说有亲属，他们住外省，都不富裕，他本人靠教家馆维持生计，将来想留在彼得堡当医生。总之，这些话一丝破绽也没有。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见他如此顽固，便直截了当地提问了：

“您说您将来想留在这儿当医生，谢天谢地，本地的医生日子过得还可以。您是没有想过成家还是已经有了意中人？”

这是怎么回事？教师已经忘了他自己杜撰的未婚妻，本想回答说“还没有意中人”。

但是他一下子想起来：“哦，她不是偷听过了吗！”他觉得可笑，“我当时于出的事多愚蠢！我干吗要来编造这样一个故事呢？其实完全没必要！可不是，你好好想想，人家都说，宣传有害，她的心地那么纯洁，不容邪念，那么宣传能对她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好，她偷听到了，而且明白了，可这又与我有何相干？”

“当然有了意中人。”洛普霍夫说。

“订婚没有？”

“订了。”

“是正式订婚，还只是两人私下说好的？”

“是正式订婚。”

可怜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她听到“我的未婚妻”、“您的未婚妻”、“我很爱她”、“她是个美人”这些话，就已经放心了，想必教师不会去追求她的女儿。于是在他们跳第二轮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就全力以赴忙着准备那顿像晚餐般丰盛的小吃去了。可是她还想要更详细、更确凿地了解一下这件令人宽慰的事情。她继续盘问下去，因为每个人都喜欢令人宽慰的谈话，并且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新奇有趣的，这一切本来就是新奇有趣的。教师认真地回答着，虽然照例说得很简短。“您的未婚妻漂亮吧？”“漂亮得非同一般。”“有陪嫁吗？”“现在还没有，不过她会得到一大笔遗产。”——“一大笔？”——“很大一笔。”——“大到什么程度？”——“巨大。”——“上十万？”——“远远不止。”——“到底有多少？”“这何必说呢？说它很多就足够了。”——“是现金？”——“也有现金。”——“可能还有田庄吧！”“嗯，还有田庄。”——“快有了吗？”——“快了。”——“快结婚了吧？”——“快了。”——“应当趁她还没得到遗产的时候结婚，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不然求婚的人会多得打破头啦。”——“一点不错。”——“为什么上帝让您交上这样的好运呢？为什么别人就捞不到呢？”——“是这样的，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她该得到遗产呐。”——“您倒是打听着了？”——“打听着了。”——“怎么打听着的？”——“老实说，我早就打听过，于是一下子就碰上这好运气了。”——“消息可靠吗？”——“那还用说，我亲自核实过字据呢！”——“亲自？”——“亲自。我第一步就核实字据。”——“第一步就核实字据？”——“那自然，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不看到字据决不轻举妄动。”——“对，决不能轻举妄动，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真是好运气！一定是上帝听到了您父母为您做的祷告吧！”——“可能是。”

暗示革命很快就要爆发。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本来就因为教师不喝她的茶而喜欢上他了，他从各方面都表现出是一个稳重可靠的人。他很少说话，这比较好，看来他不

轻浮。他不说则已，一说就说得恰到好处，尤其是谈到钱的时候。而从前天的那个晚上开始，教师在她看来简直是少有的难能可贵。他完全克制住自己不去追求他教书人家的姑娘，这种严格的自制能力在年轻人中间确实少见。现在她对他已十分满意。真的，他多么稳重！他从不夸耀他那有钱的未婚妻，他的每句话都得用钳子去拔才能拔出来。可是他又多么细心地搜寻查找啊，他大概早就想要觅得一个有钱的未婚妻了，你再瞧瞧，他是怎样地在往她身边靠！

嘿，这人很善于为自己谋划。他第一步就要核实字据，而且他说得多好！“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他说，“非看到字据不可。”一个少有可靠的年轻人！

起初韦罗奇卡勉强地掩饰住了过于明显的笑容，可是渐渐地她开始感觉到（她开始感觉到什么呢？——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洛普霍夫虽然在回答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但他并不是在对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话，而是对韦罗奇卡说呢。又觉得他是在戏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可同时却是严肃认真地对她韦罗奇卡一个人在讲真话，并且只讲真话。

这仅仅是韦罗奇卡的感觉呢还是确实如此，谁能知道呢？他知道，她已经听出来了，而我们也许无需知道，我们只需要事实。事实是，韦罗奇卡最初笑着听洛普霍夫讲话，随后却严肃起来，心里想：他这不是对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的，而是对她说的，不是戏谑，是讲的真话。至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从一开始便很严肃地听着洛普霍夫的话，后来才转向韦罗奇卡，说道：“我的孩子韦罗奇卡，你干吗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呆坐着？你现在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已经熟了，请他给你伴奏，你来唱个歌好吗？”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很敬重您，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我们愿意您成为我们一家的好朋友。你呢，韦罗奇卡，你见到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别那么躲躲闪闪的，我会告诉米哈伊尔·伊凡内奇，说他已经有了未婚妻，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不会为你去吃他的醋的。”这是对韦罗奇卡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说的。即使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心目中，他现在也不是什么“教师”，而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了。但是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本人看来，她的话还包含着最合乎情理和最实际的第三层涵义：“该待他好着点，等他这小滑头日后发了财，结识他说不定会有用处呢。”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来，这只是她的话的一般意思。除了这一般的意思之外，她认为还有一层特殊的意思：“待他好些，才能向他开口说我们不是阔人家，上一次课给一个卢布我们负担不起。”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话里居然有这么多的涵义！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说他就快上完课了。上完课他很乐意来弹琴。

在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

七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话中有着多层涵义，并且收到了同样多种效果。从这些话的特殊涵义，即节省学费开支这方面来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所取得的成功，超过了她本人的期望。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又来上过

两次课以后，她把话题引到了他们不是阔人家上面来，而他竟然讨起价来，他要价要得很高，久久不肯让步，一直坚持三个纸卢布上一次课（那时候还有三卢布面值的钞票，如果您还记得，那是相当于七十五戈比银币）。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本来对他能再让价已不抱希望了，可他却出人意料地减到了六十戈比一次课。她的话的特殊涵义——希望减低学费，看来是跟她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不是洛普霍夫，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看法相悖。她把他看做贪心的小滑头。这样一个财迷脑袋怎么肯在金钱上向我们穷人家让步呢，因此她该对他大失所望，看出他也是个轻率的、因而有害的人了。假若这是别人的事，她当然会这样去判断的，可是人往往是当局者迷，只要涉及到自己个人的事时，人总难以照一般的法则来判断，总希望着在涉及自身的利益时能侥幸破例才好。当十品官伊凡诺夫向六品官伊凡·伊凡内奇下保证，说要以全副身心为他效忠的时候，伊凡·伊凡内奇凭着自己的经验知道不可能期望任何人以全副身心来效忠，况且他还知道，伊凡诺夫曾贱价出卖过亲爹五次，超过了他本人伊凡·伊凡内奇，他只来得及出卖亲爹三次。可是伊凡·伊凡内奇仍然相信伊凡诺夫效忠于他，也就是说，不是相信他而是赏识他。虽然不相信他，却甘愿受他欺骗；这就是说，虽不太信，可还是要信。你说该怎样对待人类心灵的这个特点呢？这个特点不好，而且有害，遗憾的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没有去掉这个毛病，差不多所有的财迷、滑头、坏蛋都有这毛病。只有在道德品质上极端相反的两种人才能避免。

对于自己敬重的人，通常不称姓氏，而称名字和父名。

第一种是超级坏蛋，是世界第八奇迹，娴熟的骗术上的奇迹，例如亚尼纳的阿里—帕夏、叙利亚的吉扎尔—帕夏、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他们都很轻易地、像骗小孩似地欺骗过欧洲的外交家（吉扎尔还骗过拿破仑大帝）。当骗术像一副异常坚固的铠甲披在这种人身上时，要穿透它而触到人类的任何一种弱点——自负、虚荣、权力欲、爱面子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擅长于诈骗的英雄已十分罕见，在欧洲各国是遇不到的了，欧洲骗子的作恶技巧由于人类的许多弱点而无法付诸实现。所以，假定有谁指着一个狡猾的人对您说：“瞧，谁也骗不了这人的，”那么您尽可以大胆地押上十卢布赌一卢布，说您虽不是一个狡猾的人，但只要您愿意骗这滑头，就能骗得了他的。

您还可以更大胆地押一百卢布赌一卢布，说他会自我欺骗的，因为自我欺骗是狡猾的人性格上最常见的共同特点。这方面的能手恐怕要数路易·菲利浦和梅特涅，他们出众之处，是把自己从巴黎和维也纳骗到富饶静谧的地方，在那儿像欣赏一首田园诗般地欣赏起牧童放牛的图景来了。拿破仑一世是多么狡猾啊，他远比他俩更狡猾，据说他不仅狡猾，还拥有天才的智慧，而他却巧妙地骗自己到了厄尔巴岛，他还嫌这不够，还想走得更远，最终还是成功了，骗自己到了圣赫勒拿岛！这原是异常艰难、几乎不可能的事，他却能够克服重重障碍，到达了圣赫勒拿岛！请读读夏拉斯的《一八一五年战役史》吧，拿破仑自我欺骗时的劲头和手法实在妙极了！唉，连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没能戒掉这个有害的嗜好。

世界七大奇迹包括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等。

阿里—帕夏（约一七四四—一八二二），又名亚尼纳，阿尔巴尼亚封建主，一七八七年开始任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从土耳其苏丹统治

下争得事实上的独立。

按，“帕夏”为旧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称号。

艾哈迈德·吉扎尔—帕夏（约一七二—一八四），叙利亚大部分地区和巴勒斯坦的统治者（一七七八—一八四），以残酷著称，绰号“吉扎尔”（阿拉伯语的屠夫）。

穆罕默德—阿里（一七六九—一八四九），阿尔巴尼亚人，埃及总督（一八五—一八四八），曾出兵阿拉伯半岛，以武力对外扩张，一八二四—一八二七年参与镇压希腊独立运动。

路易·菲利浦（一七七三—一八五）法国国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逃亡英国。

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首相，欧洲反动神圣同盟的头子，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流亡英国。

厄尔巴岛在地中海，拿破仑曾在此流放（一八一四年五月—一八一五年二月）。

圣赫勒拿岛在南大西洋，一八一五年六月拿破仑二次退位后被放逐于此，一八一二年歿于其地。

夏拉斯（一八一—一八六五），法国军事家，一八五二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后被驱逐出境，在国外写了《一八一五年战役史》。

精于骗术、又能把骗术当作抵制诱惑的铠甲的人是很少的。

另有一种人拥有一颗单纯正直的心，用它做铠甲能可靠地抵制诱惑，这样的人是相当多的。据维杜克和凡卡·该隐之流证明，没有比哄骗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再困难的事了，只要他还有一点思考能力和生活经验的话。一个正直又相当聪明的人单独是不会受诱惑的。但是他们有另一个同样有害的弱点：他们容易受周围人们的诱惑。骗子无法欺骗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但当他们作为一伙人时，却常常自觉自愿地受人支配。而单独一个骗子易于受骗，可作为一个团伙是不会受人欺骗的。世界历史的全部秘密便在于此。

维杜克（一七七五—一八五七）法国侦探、冒险家。

凡卡·该隐，即伊凡·奥西波夫，十八世纪上半叶一俄国侦探。

可是我们去钻研历史完全多此一举，既然写小说就写小说吧。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那一番话的第一个效果是学费减少了。另一个效果是，由于教师（其实已经不是教师，而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减收学费，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更加深了对“他这个踏实可靠的人”的好印象，甚至确信韦罗奇卡跟他谈谈话会受到好的影响，会促使韦罗奇卡愿意跟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结婚——这个结论显得很一般，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单凭自己的才智还得出这个结论来，可是她得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证据，使她不能不看到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对韦罗奇卡的有益的影响。至于她怎样得到的这个证据，我们马上就可了解了。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那番话的第三个效果自然是，在她的许可和鼓励之下，韦罗奇卡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能够在一起度过相当多的时间了。八点钟左右教完课以后，洛普霍夫还要在罗扎利斯基家待上两三个钟头，跟这家的母亲、父亲和求婚人玩玩牌，聊聊天，有时他弹钢琴，韦罗奇卡唱歌，或者韦罗奇卡弹琴，他听着。偶然他也跟韦罗奇卡谈谈话，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妨碍他们，也不用猜疑的眼光看他们，虽然可想而知她没有放松监视。

啊，她自然不能放松，因为尽管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俗话说“东西放好，小偷不扰”，是有道理的。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无疑地是个小偷，这里并非贬意，倒是褒意，否则为什么要尊敬他，把他视为好友呢？难道你会跟傻瓜结交吗？当然，如果有利可图，那么傻瓜也该结交。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目前还一无所有，因此，跟他交友只是看在他的那些长处，就是说看在他的智慧、他的踏实可靠、善于谋算、精明能干。但是如果说任何人肚里都有自己的鬼心眼，那么这样的一个聪明人更不待说了。所以必须要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加强监视。于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便用心地监视起他来。但一切观察只能证实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可靠和善良。

比方说，从什么地方可以立刻看出男女之间有无私情呢？从他窥视对方胸衣的目光。当韦罗奇卡弹琴的时候，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总是站在一边听着，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注意他是否把目光移向她的胸衣。不，他连想都没想过！有时候他根本就不看着韦罗奇卡，而是看着随便的什么地方。有时他虽然也看她，却只是看着她的脸，况且目光又毫无表情，叫人一望而知他看她不过是出于礼貌，心里却在想着自己未婚妻的那份陪嫁，他的眼睛不像米哈伊尔·伊凡内奇那样欲火中烧。再说，还可以从什么地方看出男女之间的私情呢？从情话。但是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任何情话，而且他俩很少私下交谈，他倒是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谈得更多一些呢。还有你瞧，他开始给韦罗奇卡带书来了，有一次韦罗奇卡出去找女友，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正巧待在这儿。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便拿了那些书去给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看。

“看看吧，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法文书我自己倒可以看懂个大概意思：《客厅》——这是本社交指南吧。德文书我可一点也看不懂。”

“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这不是《客厅》，这是《Destinee》——《命运》。”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孔西德朗（一八一五—一八九三）的《社会之命运》（一八三八）一书。书中发展了自由劳动协作社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思想。协作社下面又按工种分成若干专业劳动单位，即“队”，俄文音译“谢里叶”（cePnr），这词又作“国库券”解；因而才引出了下面对话中的误会。

“到底这《命运》是什么呢？是一部小说的名字，还是一本算命书，解梦书？”

“从书的内容就可以知道，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翻了几页，“书里讲的尽是关于国库券的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一本学术著作。”

“国库券？这很好。那么一定是讲怎样进行资金周转罗。”

“对，尽是这些，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唔，那德文书呢？”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慢慢地念道：“《宗教》，路德维希作——路易十四，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路易十四的著作。他是法国国王，玛丽娘·阿列克谢夫娜，他的儿子后来也当了国王，不过王位叫现在的拿破仑给占去了。”

作者的原意是指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一八五一),受到当时审查条件的限制,他避免说出费尔巴哈的姓名。俄文的“路德维希”和“路易”很近似。

此处的拿破仑指一八五二年称帝的拿破仑三世(一八一八—一八七三)。

“那么是一本宗教书?”

“是宗教书,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这很好,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我其实早就知道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是个可靠的年轻人,但是不管对什么人都得时时刻刻注意才行。”

“他当然不会有那种非分之想,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可我还是感激您能这样监视他,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不能不注意呀,米哈伊尔·伊凡内奇,保住女儿的纯洁是做母亲的责任,至于韦罗奇卡,我可以向您担保。不过我在想,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法国国王是信什么教的?”

“自然是天主教。”

“那他在书上没有叫大家信天主教吗?”

“我想没有,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如果是天主教的高级僧侣写的书,那他在书上会叫大家去信天主教的。当国王的不会管这个的,他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和政治家,他只要叫人们虔诚地信宗教就行了。”

也许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能不看到,米哈伊尔·伊凡内奇尽管智力有限,判断事情倒很可靠,但她还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过了两三天,她跟洛普霍夫和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玩“择优”时,突然对洛普霍夫说:

“择优”一种牌戏,近似桥牌。

“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我想问问您:前一个法国国王,就是现在的拿破仑占去了他的王位的那个国王——他的父亲下过命令叫大家都信天主教吗?”

“没有,没下过命令,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天主教好不好,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好。我出红方块七。”

“我是因为好奇才问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我虽然是个没有知识的女人,我倒都想了解了解。您捞回不少分了,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不该捞不回来,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我们在医学院学过的。医学院的学生必须会玩牌。”

为什么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要知道菲力浦·平等是否下过命令叫大家信天主教,对洛普霍夫来说,至今还是个谜呢!

路易·菲力浦是奥尔良公爵菲力浦·平等(一七四七—一七九三)的儿子。

那么,经过这些事情以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停止严密监视了,免得使自己太劳累,这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吗?他既不看对方的胸衣,脸上又毫无表情,给她读的还是宗教书——这似乎足以叫人放心了。可是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并不满足于监视,她还做了一次试验,我从前读到能背的那本《逻辑学》仿佛她也曾读过似的;《逻辑学》上说:“我们对于各种自发现象的观察,必须靠根据镇密的计划所做出的实验来加以证明,以便深入地来理解这类相互关系的奥秘,”于是她做了这样一个试验,好像她读过萨

克逊·格拉马蒂克的著作一样，书中讲的是人们如何在森林里用一个姑娘去考验哈姆雷特。

萨克逊·格拉马蒂克（一一四—约一二八），丹麦编年史家。他的《丹麦史》开头九卷收录了许多民间故事和传说。这里指他在历史书中讲的一个故事：哈姆雷特决心为亡父复仇，便装疯，以免引起仇人猜疑。为了考验哈姆雷特是否真疯，仇人故意让他跟他所爱的姑娘在林中会面，哈姆雷特事先知道了这个阴谋，终于骗过了仇人。

八

哈姆雷特式的考验

有一天，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喝茶的时候说她头痛得厉害。她又分别给斟了一次茶，锁上了糖缸，就去睡了。韦拉和洛普霍夫仍待在喝茶的房间，这房间就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卧室旁边。过了几分钟，这位病人就喊费佳过去：“告诉姐姐，说他们在那儿谈话叫我没法睡，让他们离远点，免得吵我。不过可要好好说，别得罪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你瞧，他是多么关心你呀。”费佳出来讲了母亲的请求。“上我的房里去吧，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那儿离她的卧室远，这就不会吵她了。”这自然正中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下怀。过了一刻钟，她没穿鞋，光穿一双袜子，偷偷地走近韦罗奇卡的房门。房门虚掩着，房门和门框之间凑巧有那么一道招人喜欢的缝儿，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把眼睛贴近了那缝儿，竖起耳朵用心地听。

她看见下面的情形：

韦罗奇卡的房间有两个窗户，两窗之间放着一张写字桌。韦罗奇卡坐在桌子一头儿的窗旁，正在遵照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吩咐，正襟危坐，给父亲织一条毛线胸巾。

洛普霍夫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另一个窗户旁，一只臂肘支在桌上，手里拿着雪茄，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他和韦罗奇卡之间的距离至少有两俄尺。韦罗奇卡多半看着她的毛线活，洛普霍夫多半看着雪茄。这样的位置部署，叫人完全放心了。

一俄尺合 .七一米。

她听见下面的话：

“……应该这样来看待生活吗？”这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听到的头一句话。

“是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应该这样看待。”

“那些冷酷的讲实际的人认为人只受利益考虑的支配。这么说，他们讲的是实话？”

“他们讲的是实话。在总的生活进程中，所谓崇高的感情、充满理想的追求——这些比起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从根本上来看，这些本身就包含着那种对利益的追求。”

“那么您，比方说，难道您也是这样？”

“还能是什么样呢，韦拉·巴夫洛夫娜？您听我说说我全部生活的主要

动力是什么吧。今天以前，我的生活的主旨是学习，是准备当医生。很好的前程。父亲为什么送我进中学呢？他一再叮嘱我：‘好好学习，米佳，你学成了，就能当官，可以供养我和你母亲，对你自己也好。’这就是我学习的目的。如果不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父亲也不会送我上学，家里本来需要人手呢。再说，我自己虽然好学，可是假如我没有想过花了时间能得到更多的报偿的话，我也未必肯花时间来学。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说服父亲让我进医学院，而不去当官。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和父亲都知道，当官我只能当个科员，最多升到科长，而医生的生活比他们优裕得多。您看，我进医学院并且一直留在那儿的原因，就是想找个金饭碗。没有考虑到对我有利，我不会进医学院，更不会留在那儿。”

德米特里的爱称。

“可是您念中学的时候不是很好学吗？后来您不是又爱上了医学吗？”

“对，这为我增添了光彩，也有益于事情的成功。但是通常一件事往往可以无需外在的光彩，而如果没有考虑到对我有利却不行。对科学的爱好只是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原因只有一个：利益。”

“就假定您是对的，嗯，您是对的。可我所能理解的一切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

不过这理论不是太冷酷了吗。”

“理论本身就应该是冷酷的，理智应该冷静地判断事物。”

“不过这个理论太残酷了。”

“它对那些空虚而有害的幻想才是残酷的。”

“不过它像散文一样的平淡。”

“对科学来说，诗的形式并不适用。”

“这样说来，按照这理论，人们都注定要过冷漠无情的平淡生活？虽然对这理论本身我也不能不认可……”

“不，韦拉·巴夫洛夫娜，这个理论是冷酷的，可是它能教人获得温暖。火柴是冷的，擦火柴的火柴盒面是冷的，木柴也是冷的，但是它们却能够生火，给人做出热乎乎的食物来，并且使人暖和。这个理论虽然是无情的，但人们只有奉行它，才不至于成为众人怜悯的对象，去接受那无用的同情。柳叶刀 不该是柔软易弯的，对病人不该手软，病人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怜悯而减轻痛苦。这个理论虽然像散文一样的平淡，却揭示了生活的真正动因，而诗正包含在生活和真实之中，为什么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作品里生活的真实比别的诗人的要多，骗人的幻象要少。”

柳叶刀，外科医生使用的一种手术刀。

“那么我也要变得残酷起来了，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劄，”韦罗劄卡微笑着说，“您别把我相象为曾是您的利益计算理论的一个坚定的反对者，而现在又把我看成了您的理论的新的信奉者了。其实我自己早就有过那种想法，跟我从您的书本上读到的和听您说过的一样。但我过去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聪明、有学问的人不会这样想的。

因此我总是犹疑不定。我从前读过的那些东西往往写的全是相反的观点，书中对于我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所看到的实情没完没了地辄以指责和讽刺。自然、生活和理性把我引向这一边，书本却告诉我那是丑恶低贱的，又把我往另一边拉。您知道，我自己也觉得我对您的反驳有点可笑呢！”

“是可笑，韦拉·巴夫洛夫娜。”

“不过，”她笑着说，“我们的相互恭维太古怪了。我对您说：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请您别太自负。您又对我说：你的怀疑真可笑，韦拉·巴夫洛夫娜！”

“那有什么，”他也微笑一下，说道，“客套我们没有必要，所以我们不来客套。”

“好，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人都是利己主义者，难道真是这样吗？您刚才谈过您自己，我也想谈谈我自己。”

“应该这样。每个人考虑最多的是自己。”

“好。我们来看看，在有关自己个人的问题上我能不能理解您。”

“看吧。”

“一个有钱人向我求婚。我不喜欢他。我该不该接受他的求婚？”

“算计算计，怎样对您更有利。”

“怎样对我更有利！您知道我很穷。一方面我不喜欢他这个人，另一方面我可以控制他，获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金钱，一大群崇拜者。”

“两方面权衡权衡，哪方面对您更有利就选择哪方面。”

“如果我选择了丈夫的财富和一大群崇拜者呢？”

“我会说，您选择了您认为比较符合您自身利益的方面。”

“人家会怎样说我啊？”

“如果您能理智地考虑，冷静地行动，那么人家该说您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您将来大概也不致于后悔可惜。”

“不过，我的选择该受到指责吧？”

“爱说各种无聊闲话的人尽管让他们说去，而对生活持以正确观点的人却会说应当这样做，如果您这样做了，那就表示您是这样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您不可能不这样来做；他们会说您的行为符合事物的必然性，说您实际上已别无选择。”

“我的行为没有一点该指责的地方吗？”

“面对存在的事实，谁有权利来指责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您个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这就是事实。您的行为是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您根据事物的本质所做出的结论。您不用对这些行为负责，而指责它是愚蠢的。”

“您倒是没有违背自己的理论。那么，如果我答应了那个人的求婚，也不该受您指责吗？”

“要是我指责您，那就太蠢了。”

“这么说，您容许，或者竟然赞成，或者甚至于直接劝告我像我所说的那样去做罗？”

“劝告永远只有一个：算计算计怎样对您有利。只要您尽快地照这劝告去做，我都赞成。”

“谢谢您，现在我个人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回到开头那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来吧。”

我们是从这里谈起的：人是依照必然性来行动的，他的行动取决于对它施加的种种影响，比较强大的影响会抵挡住其他的影响。这时我们就得出了结论，假如一种行为关系着切身的利害，那么完成这行为的动机就叫做利益，它对人所起的作用就是使人注意对利益的考虑，因此人的行动总是服从于利益的考虑。我这样来表达您的思路对吗？”

“对。”

“您看，我可真是您的好学生。现在这个有关切身利益的行为的特殊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还有些疑难。您的书上说，人是依照必然性来行动的。但有的时候似乎是凭着自己的性子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比方说，我弹琴时翻乐谱。我有时用左手去翻，有时却用右手。假定刚才我是用右手翻的，难道我就不能用左手去翻？这不是全凭我一时的性子吗？”

“不，韦拉·巴夫洛夫娜，如果您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用哪只手去翻，那么您觉得哪只手方便，就会用哪只手去翻，这并不是凭一时的性子。如果您事先想过：‘让我用右手去翻吧，’您才会在这个想法的影响下用右手去翻，但是这个想法并不是凭一时的性子出现的，而是由于别的原因必然产生的……”

到此为止，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再听下去了，她想：“好，现在他们研究起学问来了，这不关我的事，无需听了。多么聪明可靠的年轻人，可以说挺高尚的！他教给韦罗奇卡的规矩真是顺乎情理！有学问的人就妙在这儿：一样的话，我对她讲她就不听，还要生气。我没法合她的口味，因为我不会讲得那么深奥。而只在他讲得挺深奥，她就听而且认为对，还表示同意。的确，怪不得常言说：学了心里亮，不学两眼黑。如果我是受过教育的人，难道还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以把丈夫提拔成将军，在军粮部门或其他类似的部门给他找个肥缺。唔，当然啦，我得自己跟承包商打交道，到哪儿他都是成事不足！那样的话我就不会盖这样的破房子，也不至天就买进一千农奴了，现在我还不行。我得先到将军们的圈子甲露露脸。但是我怎么才能露脸呢？我不会讲法国话，他们讲的哪种外国话我都有懂。他们准说：她没有派头在干草广场 骂骂街还凑合。我不配去露脸，不学两眼黑，一点不假：学了心里亮，不学两眼里”

干草广场一带是彼得堡的贫民区。

正是这场偷听来的对话，使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深信不疑：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交谈对韦罗奇卡不仅没有危险——她从前也是这样看的——甚至还会对女儿有益处，可以帮助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了却这个心愿：让韦罗奇卡抛掉那些愚蠢的、幼稚的、小姑娘才会有的想法，尽快地跟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结婚。

九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对洛普霍夫的态度好像是在演一出滑稽剧，因此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本人也显出一副可笑的样子。这两点完全违反了我的原意。如果我想顾及到我们这里所谓的艺术性的话，我尽可以不提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态度，因为讲述这个就使小说的这一部分带上了通俗笑剧的性质。不提倒容易。即使不提，我也能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即使教师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毫无交情，他有时候——虽然很难得——也能找到机会跟他教书的那个人的姑娘谈上几句，这有什么希奇呢？难道非得说上千言万语，才能滋生出爱情吗？有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促进，

就根本不需要以韦罗奇卡和洛普霍夫会面来作为结尾了。但是我讲故事时并不关心怎样才能为自己赢得一个艺术家的好名声，而是要讲述实情。我写了几页混同于一般通俗笑剧的东西，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为此感到难过。

我有意来展示实情，而不图讲述起来便当——这就又给我招来了新的不快：我很反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表现出的那副可笑的样子，我厌恶她凭想象给洛普霍夫臆造出来个未婚妻，毫无根据地猜测洛普霍夫带给韦罗奇卡的书籍的内容，还奢谈什么“菲利浦·平等是否叫人们改信天主教”和“路易十四写过什么著作”。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可如果一个人来评判他完全不理解的事物，那么他的错误会是很荒唐的。不过要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荒唐的过失中就推断出：她对洛普霍夫的好感全是由于她有这些荒谬透顶的想法才产生出来的，那也不公正。不，如果她在洛普霍夫的行为和言谈中发现了一丝可疑之处，那么，什么有钱的未婚妻，什么虔信宗教的菲利浦·平等，这种种假想统统失灵，绝对迷惑不了她那健全的头脑的。但洛普霍夫的为人确实无懈可击，就是连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来，也只有像她自己这种人才能达到如此的境界。可是他年轻轻的、精力旺盛，却从不去偷看那位漂亮姑娘的胸衣，也不对她紧追不舍，他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玩牌时从不推托，没说过：“我还是陪韦拉·巴夫洛夫娜坐坐吧”，玛丽娅又觉得他谈论起事情来却和她自己的风格相同。像她一样，他说世上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利益，当骗子行骗的时候，你无需义愤填膺，也不要大声疾呼告诫这骗子该遵守诚实的原则。骗子之所以成为骗子并非无缘由的，从他的环境来看，他必得做这种人，他若不当骗子——还不用说不当不可能——从他那方面看倒是不尽情理的事，照直说就是愚蠢的。是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得对，她在洛普霍夫身上找到了许多同她相似之处。

我理解，由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同情洛普霍夫的思想方法，在有教养的读者心目中他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了。可是我不愿姑息任何人，我不能掩盖这个如此损害洛普霍夫声誉的情节，虽然我已证实了，我能够隐瞒洛普霍夫和罗扎利斯基一家人关系中这坏的一方面。我甚至想一不做二不休：我亲自负责说明，他是该受到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青睐的。

确实，洛普霍夫跟韦罗奇卡的谈话表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之流，可能比那些维护各种卓越思想的雄辩家更容易对洛普霍夫的思想方法给予好评。洛普霍夫看到的事物的那些本质特征恰恰跟广大的人类看到的一样，那些卓越思想的倡导者们除外。如果说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能够欣然赞成他在斯托列什尼科夫求婚问题上给韦罗奇卡的劝导，那么他也会在她酒后向韦罗奇卡吐露真言时欣然命笔写上一个“对”字，他们的观念的一致是这样明显，以至于有教养的至尊的小说家们、杂志编辑们以及我们的读者的其他导师们早就宣称说：“洛普霍夫这种人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一丘之貉。”假若如此有教养和至尊的作家们都这样来理解洛普霍夫这种人，难道我们还能责备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在洛普霍夫身上只知道我们最优秀的作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对于他这类人的看法，除此别的什么也观察不出来？

指自由主义的空谈家。

当然，如果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懂得这些作家所懂得的一半那么多，她就会恍然大悟，明白洛普霍夫不是她的好伙伴了。且不说她是个没文化的女人，她还有别的理由来原谅自己的错误的：因为洛普霍夫跟她谈得不透彻。他是一位宣传家，不过他不像卓越思想的提倡者那样，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

赞赏的崇高观念灌输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们。他很明智，要拉直一棵五十年的老树他是决不会干的。他和她对事实的理解相同，也交谈过。他作为一个有理论修养的人能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之流却不会。这些人除了个人日常关心的琐事和体现着全人类中平民百姓智慧的流行格言、谚语、成语以及诸如此类老掉了牙的古老箴言之外，什么也不了解。但是他俩谈的问题还没有到做结论这一步。比方说，如果洛普霍夫解释一下他跟韦罗奇卡所谈的“利益”是什么意思，那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也许要皱眉头了，因为她会发现这个“利益”和她的“利益”不是一回事。可是洛普霍夫没有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解释这个，在他跟韦罗奇卡的谈话中也没有关于“利益”的说明。因为韦罗奇卡知道在他们谈论的书本里，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也是实情——洛普霍夫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酒后吐露真言时写上一个“对”字后，他还补充说：“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因为您自己承认新规矩比老规矩好，所以我决不允许别人设法去建立新规矩，只要他们自己满意就行。至于您认为老百姓愚蠢无知，妨碍了新规矩的建立，那倒确实是有碍于事情的进展。但是有一点您却是不能争辩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一旦人们发现变聪明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会很快变聪明的，从前变聪明的必要性未被人发现呢。您也得同意：从前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大概是会利用的。”可是他并没有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谈这个想法，甚至不是由于谨慎才不谈，而只是为了不违反常理和考虑到礼貌才不去谈的，正像他懂得不该跟她讲拉丁语，不应用他自己感兴趣的、关于医学最新成就的议论去打搅她的视听一样：他有理智、讲礼貌，不会用人家理解不了的话语去烦人的。

但是我所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疏忽——她未能及时了解清楚洛普霍夫其人——来辩白，而决不是给洛普霍夫其人辩白。给洛普霍夫辩白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你从下文是可以看出来的。有人不替他辩白、只想仁慈为怀原谅他算了，那是原谅不了的。比方他们原谅他说，他是医科学生，研究自然科学，这就使他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来原谅他很不好。难道促使人接受这种观点的学科还少吗？数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种种。难道所有的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政论家以及其他各类学科的学者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吗？远非如此。所以洛普霍夫是无法为自己推卸罪责的。不替他辩白，但同情他的人也可能原谅他说，他还没有完全失去某些值得称赞的优点：他曾经自觉地毅然决然舍弃一切世俗名利，为了去从事有利于他人的工作，他认为从这项工作中得到的乐趣才是他追求的最高的利益；他看他所爱慕的漂亮姑娘时目光是那么纯洁，即使手足兄弟也未必都能用这等目光去看自己的姊妹。但是要反驳对唯物主义的这种原谅的态度，我们应当说，一般讲，毫无优点的人是有的，而无论什么样的唯物主义者总归还是个唯物主义者，这点就决定和证明了他们是不道德的下流坯，是不该原谅的，因为原谅他们就意味着纵容唯物主义。这样一说，不替洛普霍夫辩白而想原谅他是不可能的。不过替他辩白也不合时宜，因为卓越思想的崇尚者和高雅志趣的维护者们，那些宣称唯物主义者是不道德的下流坯的人，最近已经在一切正派人——不管是唯物主义者——眼前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智能和人品的低劣，以致为他们所否定的人物去辩护竟成了多余的事，理会他们说的话竟成为有失体面的事情了。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間，俄國各保守派和自由派雜誌以卡特科夫的俄國導報》與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國紀事》為首，發起了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圍攻。

十

韋羅奇卡和洛普霍夫談話的主要內容，自然並不是什麼樣的思想方法才算正確的問題，他們彼此之間一般說的話都很簡略，只是偶然才進行長談，談的也是些不相干的題目，諸如思想方法之類的话题，因為他們知道有兩隻警覺的眼睛在監視他們。所以對於他們關心的主要話題，他們每次只能交換寥寥數語，通常是在他們翻動樂譜準備彈琴和唱歌的時候。而這個主要話題在他們那難得才有的長談中占着這樣小的位置，甚至在簡短的談話中也只占一個不顯著的位置，這個話題倒不是他們相互的感情，不，他們在生日晚會上，在他們初次交談中含糊其辭地開了個頭後，就從未再提到過感情：他們沒有工夫談論這個。在他們選定來交換意見而無需擔心有人偷聽的那兩三分鐘內，那另一個話題還未必顧得上談，哪有時間和興致去表白感情呢！他們急于考慮的是韋羅奇卡何時和如何能夠擺脫她那可怕的處境的問題。

跟她初次談話後的第二天早上，洛普霍夫就去替她打聽當演員的事該怎麼着手進行。

他知道，一個女孩子在通往舞台的道路上面臨着許多麻煩、風險，但是他認為憑着她的堅強性格，她能夠闖出來，走上一條康莊大道。其實不然。過了兩天他來上課，卻對韋羅奇卡說：“我勸您打消做演員的念頭。”——“為什麼？”“因為當演員您還不如嫁給那個向您求婚的人。”談話到此為止了。這是他和韋羅奇卡拿過樂譜、分頭彈唱之前說的話。韋羅奇卡低着頭，好幾次離了譜，雖然她唱的是一支很熟悉的曲子。一曲告終，他們談起了該選個別的什麼職業來，韋羅奇卡搶先說：“我本來以為那是一個最好的職業，所以聽您說不行，我挺難受。但是沒有關係，儘管以後的日子會更難，但我總還是能過下去的。我去做家庭教師。”

過了兩天他再來的時候，她對他說：

“我找不到人給我介紹家庭教師的工作。您費心幫我找找吧，德米特里·謝爾格伊奇，除了您沒人可托了。”

“可惜我的熟人中管用的很少。我從前教過書和現在正在教的人家都不富裕，他們的熟人也幾乎個個如此。但是我們不妨試試看。”

“我的朋友，我浪費了您的時間，實在沒有辦法。”

“韋拉·巴夫洛夫娜，既然我是您的朋友，就不必提我的時間了。”

韋羅奇卡微微一笑，臉也紅了：她自己也沒注意到，她竟然用“朋友”這個詞代替了他的名字“德米特里·謝爾格伊奇”。

洛普霍夫也笑了。

“您本來不想這樣稱呼的，韋拉·巴夫洛夫娜。如果您後悔沒叫我的名字，可以重來。”

韋羅奇卡又笑了：

“太晚啦，”她又红了脸，“而且我不后悔。”她的脸更加红了。

“如果您需要我，您会看出我是一个忠实的朋友。”

他们彼此握了握手。

你们看，这就是那个晚会后他们头两次谈话的全部内容。

过了两天，《警察报》上登出一则广告，说：“某位品德高尚之小姐能操法语及德语……欲觅一家庭教师职位……有关详情可询科洛姆纳区某某街某某宅某某官员。”

现在，洛普霍夫真的不得不为韦罗奇卡的事花费许多时间了。他每天早晨从维堡区到科洛姆纳去找广告上写明住址的那个熟人，而且多半都是步行。路程很远，但是在维堡区附近像这样的熟人又找不到，因为这种人必须具备综合条件：像样的住宅，良好的家境，威严的仪表。一间陋室会引发人给家庭教师提供不利的条件；介绍人如果缺乏威严和明显可见的和睦的家庭生活，人家对被介绍的姑娘也不会给以好评的。当然，洛普霍夫决不能在广告上登他自己的地址：人家对于除了一个大学生就没有任何人关心的姑娘会怎么想啊！因此洛普霍夫就只好以步行来健身了。他从那位官员处拿到洽聘家庭教师的人家的住址后，又继续去奔波了：那官员称自己是姑娘的远亲，只是个中间人，她有一个外甥，明天将亲自驱车前往详谈。可外甥并未驱车而是步行前往这些人家的，不用说，他对大部分人家不满意。有一家太傲慢；另一家的母亲好，父亲是个傻瓜；第三家正相反，等等。有的人家还凑合，可是他们提的条件韦罗奇卡达不到：或者需要讲英语，而她不会讲；或者他们想请的其实不是家庭教师，却是保姆；或者呢，人各方面都好，就是太穷，家中没有给家庭教师住的房子，只有一间育儿室，里面已经住了两个大孩子、两个婴儿，一名保姆和一名奶妈。可是广告还在《警察报》上继续刊登，也不断有聘请家庭教师的人前来，洛普霍夫仍抱着希望。

在寻觅工作中过了两个星期。找工作的第五天，当洛普霍夫在彼得堡四处奔走过，回来躺在沙发床上时，基尔萨诺夫对他说：

“德米特里，你在论文方面成了我的坏搭档啦。你天天上午都不知去向，十天里总有五个晚上不露面。你揽了一大堆课来教，是不是？现在还是揽课教的时候？我连现有的都想辞掉呢。我还有四十来卢布，毕业前这三个月足够了。你存钱更多，有一百卢布吧？”

“不止，将近一百五。我不是忙于教课：除了一家外，所有的课我全辞掉了。我有事。等把事情办完，你就不会埋怨我在论文方面比你落后了。”

“到底是什么事？”

“你听我说，我没辞掉课的那一家是个很不好的人家，可家里却出了一个正派姑娘。

她为了离家出走，想去当家庭教师。我就是替她找工作。”

“是个好姑娘？”

“好姑娘。”

“噢，这就好。去找吧。”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唉，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两位先生，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可你们并未领悟到何为特别好！就算你们所说的“好”也真的是好，但基尔萨诺夫并没想到要问姑娘长相好不好，洛普霍夫也没想到提这一点。基尔萨诺夫并没想到要说：“老兄，你日夜奔忙为她操心，该不是爱上了她吧？”洛普霍夫也没想到要说：“老兄，我对她很感兴趣，”或者，即使他不愿说出这点，

却也没想到为提防这种猜测而去挑明：“亚历山大，你别以为我爱上她啦。”您要知道，他俩都认为，当问题涉及到从逆境中救一个人的时候，那就与这人长相好坏毫无关系了（虽然那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什么爱不爱了。他们甚至不到自己会有这种想法。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察觉不到自己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这不是对敏感型的读者们（即大多数正宗文学审判官们，因为他们就是由最敏感的先们构成的）表明了，我说，这不是对他们表明了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是两个枯燥乏味、缺乏审美细胞的人吗？不久前，“审美细胞”在志趣高雅的美学家中间还是一个时髦的用语，或许现在也仍然是他们中间常说的时髦用语吧，我不知道，我很久没见到他们了。年轻人只要还有一点情趣，内心尚存稍许感情，在谈到一位姑娘时，对她的容貌却无动于衷，这合乎常理吗？当然，这是毫元艺术感觉（审美细胞）的人才如此。还有一些人比我们那帮美学家更富于美感，人们研究过这个圈子里的人性以后认为，年轻人在此种情况下必定要谈论女性，甚至是从纯肉体方面去谈论。那是过去的情况，现在不同了，先生们。其实现在也时有发生，不过不是在被称为现代青年的那一部分年轻人当中。先生们，这是些奇怪的年轻人啊。

十一

“怎么样，我的朋友，还没有找到工作吗？”

“还没有，韦拉·巴夫洛夫娜。不过您别灰心，会找到的。我每天去两三个人家，最终不会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您安身的好人家。”

“唉，我的朋友，您若是能知道我待在这儿有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当我还没有看到在近期内能摆脱这屈辱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倒能勉强保持像死人似的麻木状态。而现在，我的朋友，在这腐臭恶劣的空气中再待下去，就太令人窒息了。”

“忍耐，忍耐，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们会找到的。”

这类谈话持续了约有一个星期：

星期二——

“忍耐，忍耐，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们会找到的！”

“我的朋友，我给您添了多少麻烦，让您花费了多少时间！我该怎样报答您呢？”

“我的朋友，您不生我的气，就是报答我了。”

洛普霍夫说完就感到不好意思了，韦罗奇卡看看他。不，他不是没话说了，而是不想往下说，他在等她回答。

“为什么生您的气，我的朋友，您做了什么事？”

洛普霍夫更加不好意思，而且仿佛很伤感。

“您怎么啦，我的朋友？”

“嗯，您都没有注意到。”他说这话时相当地伤感，可是后来却又开怀大笑起来。

“唉，我的天，我多笨，我多笨！原谅我，我的朋友！”

“哎，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您已经报答我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您真是个怪人！那么好吧，您就称我为‘朋友’吧。”

星期四是哈姆雷特式的考验，照萨克逊·格拉马蒂克的方式。过后的几天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稍事休息，暂不监视了。

星期六喝完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查点洗衣女工送来的衣服去了。

“我的朋友，事情大概快办妥了。”

“是吗？如果这样……唉，我的天……唉，我的天，快点儿！再拖下去，我恐怕要死了。什么时候能办妥？怎样才能办妥？”

“明天定下来。差不多、差不多是绝对有把握的。”

“找到了什么事？怎么找到的？”

“镇静点，我的朋友：人家会察觉的！您乐得差点儿都要跳起来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不定有什么事马上驾到。”

“您自己可好！笑呵呵地走进来，怪不得我妈看了您半天。”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告诉她我为什么开心，我看出必须对她说明一下，于是就说：‘我找到一份好工作。’”

“真受不了，受不了！您总是警告我，到现在什么也没说清。怎么样，总该说了吧？”

“今天一清早，基尔萨诺夫——您知道，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姓基尔萨诺夫……”

“我知道，真受不了，受不了，我知道！快点儿说，别讲这些废话。”

“是您自己打断我的话啊，我的朋友！”

“唉，我的天！总是责备我，该谈的又不谈。我不知道拿您怎么办。我要罚您下跪，这儿不行，我叫您回家在您屋里下跪，让您的基尔萨诺夫看着您，还要他给我送一张字条来，证明您确实跪过——我就拿您这么办，听见了吗？”

“好，我跪就是。可是现在我不说。等我受完罚，得到了饶恕，我才说。”

“我饶恕您了，不过您得说出来，真受不了。”

“我感谢您。您自己有错，反倒来饶恕别人，韦拉·巴夫洛夫娜。是您自己总打岔呀。”

“又管我叫韦拉·巴夫洛夫娜？这是怎么啦？您那‘朋友’到哪儿去啦？”

“嗯，这是我罚您，我的朋友。我是一个气量又小又苛刻的人。”

“罚我？您敢责罚我？我不想听您说了。”

“不想听了？”

“当然不想听。还有什么可听的呢？因为您都说了：事情差不多成功啦，明天就定下来啦，您看，我的朋友，可今天您自己却又一无所知。还有什么可听的？再见吧，我的朋友！”

“听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您听我说呀！”

“不听啦，走啦。”但她又返回头。“快说吧，我不打岔。唉，我的天，可惜您不知道您叫我多高兴！让我们握握手。您看，我握得有多紧，多么紧。”

“为什么掉眼泪了？”

“谢谢您，谢谢您。”

“今天一清早，基尔萨诺夫给了我一位太太的住址，她定好让我明天去

找她。我自己并不认识她，可是常听我们一个共同的熟人，也就是中间人，讲到她。她的丈夫我倒认识，我们在我的这个熟人家曾多次见过面。根据这一切来判断，我相信您可以在她家待下去。她把住址交给我的熟人，托他转给我的时候，说她相信会同意我的条件。因此，我的朋友，事情可以说是差不多完全成功了。”

“嘿，这可多好！我多高兴！”韦罗奇卡反复地说。“不过我希望早点知道结果，尽可能地早。明天您能直接就从她那儿来我们家吗？”

“我，我的朋友，这会起怀疑的，因为我平日只有上课的时候才来你们家。我们可以这么办：我由市邮局寄一封信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我星期二不能来上课，想把课挪到星期三。如果我写的是挪到星期三早晨，那就表示事情成功了。挪到星期三晚上就是没能成。但差不多确定无疑地是挪到‘早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会把这事告诉费佳、您和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

“信什么时候能寄到？”

“明天晚上。”

“等这么久！不行，我等不了。再说，我能从信上了解到什么呢？只了解到一个‘成’，然后一直要等到星期三！这是折磨人！如果‘成’，我就尽快去这位太太家啦。”

我要马上知道。怎么办呢？我想这样：我在街一上等着您从这位太太家出来。”

“我的朋友，这比我来你们家更不慎重。不，还是我来好。”

“不，这儿恐怕连谈话都不行。妈妈无论如何会怀疑的。不，最好是照我的主意办。”

我有一块很密实的面纱，戴上就谁也认不出我来。”

“那好吧，也许真可以这样办。让我想想。”

“没工夫想啦，妈妈随时可能来的。这位太太住哪儿？”

“战船厂街，桥旁边。”

“您几点到她家？”

“她定的是十二点。”

“从十二点起，我在近卫骑兵林阴道高桥近的那一边最末的一张长凳上等您。我说过，我要戴一块密实的面纱。我再给您做个暗号：我手里拿一卷乐谱。万一我没赶到，那就是说我有事给耽搁了……那么请您坐在那张长凳上等等。我可能迟到，但是一定会到。我出的主意多好！我真感激您！我会多么幸福！您的未婚妻怎么样啦，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已经从‘朋友’被降为‘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了。我多高兴，我多高兴！”韦罗奇卡跑到钢琴前，开始弹奏。

“我的朋友，您把艺术贬损到了什么程度！您的趣味降低到了什么地步！您把歌剧抛开不弹，却弹起加洛泼舞曲来了！”

“我偏不弹歌剧，偏不弹歌剧！”

过了几分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走进来。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跟她俩人玩了会“择优”，最初他赢了，后来却让她捞了回去，自己甚至输掉三十五戈比，这是他头一次让她获胜，所以他离开时她甚为满意。不是那一点钱，而是胜利本身让她心满意足。

沉浸于唯物主义的人也有纯精神的享乐，这也足以证明，用唯物主义

来说明生活，是远远不够了。

十二

韦罗奇卡的第一个梦

韦罗奇卡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自己被关在一间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忽然房门打开了，于是韦罗奇卡来到了田野上，她跑来跑去，蹦跳嬉戏，心里想道：“我怎么会没有死在地下室呢？这是因为我没有见过田野。如果见过了，我一定会死在地下室里了。”然后又跑来跑去，蹦跳嬉戏。她梦见自己瘫痪了，心想：“我怎么瘫了呢？得这种病的通常是老头儿和老太婆，年轻姑娘里面可不多见。”——“不少见，常见的，”一个陌生的声音说，“不过你马上就会好，只要我碰碰你的手，你看，你已经好了，起来吧。”这是谁在说话？我一下子就松快了！病全没了。于是韦罗奇卡站了起来，走着，跑着，又来到了田野上，又是嬉戏蹦跳，跑来跑去，心里又想：“我怎么能忍受得了瘫痪呢？这是因为我生来就是瘫痪，从来不知道走路和跑步的滋味。如果知道，我就受不了啦！”然后又跑来跑去，蹦跳嬉戏。这时田野上走过来一个姑娘。真奇怪！她的面孔、步态以至她整个人都在变化，不断地变化。她时而是英国人、法国人，时而又是德国人、波兰人；她时而又变成了俄国人，时而又成了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可为什么她总是同一副面孔呢？本来英国人不像法国人，德国人也不像俄国人，而她的面孔虽然有变化，但总还是同一副面孔，多奇怪！她的面部表情也不断地变化：她多温顺，又那么怒气冲天！她一会悲伤，一会快活，尽在变！但她总是善良的，连愤怒时也还是挺善良，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过她可真是一个美人！无论面孔怎样变化，总是变得越来越好看。她走到韦罗奇卡跟前问道：“你是谁？”——“他原先叫我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叫‘我的朋友’。”——“哦，原来是你，就是对我产生了好感的韦罗奇卡吧？”——“对，我很喜欢您。不过您究竟是谁？”——“我是你的未婚夫的未婚妻。”——“什么未婚夫？”——“我也不认识。

我不认识我那些未婚夫。他们认识我，我却不可能认识他们：他们人太多了。你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个做未婚夫吧，你只能从他们，从我的未婚夫中间挑选。”——“我选中了……”——名字我不需要问，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你只能从他们，从我的未婚夫中间挑选。我愿意只在我的姐妹们和未婚夫们之间互相挑选。你被关过地下室吧？瘫痪过吧？”——“是的。”——“现在得救啦？”——“对。”——“这是我放你出来、给你治好的。

你记着，还有很多人没放出来、没治好呢。你放他们出来治病。你能办到吗？”——“能。不过您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很想知道。”——“我有很多名字，各种各样的名字。

谁需要怎么样叫我，我就告诉他一个怎么样的名字。你可以叫我‘人类爱’。这是我的真名。只有少数人叫我这名字。你也就这样叫我吧。”然后韦罗奇卡在城里转了一遭，她眼前是个地下室，里面关着姑娘们。韦罗奇卡轻轻地碰了一下锁，锁就掉了，她说：“走吧。”她们便出来了。她眼前又出

现了一个房间，房里躺着瘫痪的姑娘们，她说：“起来”，她们便站起来也走到了田野上，跑来跑去，蹦跳嬉戏，嘿，多快活！跟她们在一块，比单独一个人要快活多啦！嘿，多快活啊！

十三

最近洛普霍夫没有工夫跟医学院的熟人见面。可基尔萨诺夫还仍不断地跟他们见面，他们问起洛普霍夫来，他总回答说洛普霍夫有件什么操心事，于是如像我们已经知道的，他们一个共同的朋友便把洛普霍夫正去看望的那位太太的住址交给了他。

“如果这事成功了，往后的安排就会很顺利的，”洛普霍夫在去她家的路上想，“再过两年，最多再过两年半，我会当上教授。那时候完全可以生活下去了。暂时她就安心在B家待着，只要B确实是个好人，对这点是根本无需怀疑的。”

洛普霍夫果然看出B太太是个聪明善良的人，她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从她丈夫的职位，从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亲属关系来看，按说她是本可以有许多要求的。她那几条件优越，家庭环境会使韦罗奇卡感到很安适，一切都像洛普霍夫期望的那么圆满。B太太对洛普霍夫关于韦罗奇卡性格的回答也挺满意，事情很快就成功了。谈了半个钟头，B太太说：“要是您那位年轻的姑妈同意我的条件，就请她搬到我这儿来，越快我越高兴。”

“她同意，她委托我代她表示同意。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我应该向您说明一点，在我们决定之前，是没必要说的。这个姑娘不是我的亲戚。她是一位官员的女儿，我在他家教书。除我之外，她找不到别人可以替她奔走张罗啦，不过我跟她完全没关系，是外人。”

“这我知道，洛普霍夫先生。您、N教授，”她说出那位转交住址的熟人的姓，“还有您那位跟他谈讨您的这件事的同学了解彼此都是纯洁无瑕的人，所以你们之间才能相互谈论你们中间的一个跟一位年轻姑娘的友谊，而没有影响另外两个人对姑娘产生不好的看法。N对我也是同样的看法，他知道我在物色家庭教师，他认为自己有权告诉我，那位姑娘不是您的亲戚。别责备他不慎重，他很了解我。我也是个正直的人啊，洛普霍夫先生，请相信，我懂得该尊重什么人。我相信N同相信我自己一样，而N相信您如同相信他自己一样。不过N不知道她的名字，现在我或许可以问问她的名字了。因为我们谈完了，她今天或者明天就要进入我们的家庭了。”

“她叫韦拉·巴夫洛夫娜·罗扎利斯卡娅。”

“现在我这方面要做点解释。您也许觉得奇怪，我既然关心孩子，为什么在还没见过那位对我的孩子将发生密切关系的小姐，就敢跟您把事情最后定下来。不过我非常了解您的圈子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如果你们中间某位对一个人抱有这样友好的同情态度，那么，在一个希望女儿真正向善的母亲看来，这人一定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觉得面测是多余的、不得体的行为。我不是恭维您，倒是恭维我自己呐。”

“现在我为罗扎利斯卡娅小姐高兴极了。她的家庭生活使她痛苦难熬，

能到任何一个哪怕可以凑合的人家，她都会感到自己很幸运了。我却没想到居然能给她找到像您家里的这种真正美满的生活。”

“是的，N对我说过，她在家里过得很糟。”

“很糟。”于是洛普霍夫开始讲起B太太必须知道的一切，以便她跟韦拉谈话的时候，能够避开那些会引起这个姑娘想起往昔烦恼的话题。B太太满怀同情地倾听着，最后她与洛普霍夫握了握手，说：

“不，别讲了，洛普霍夫先生，我会极为动情的。说来可笑，我这年纪，都快四十了，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心平气和地听人说起家庭中的暴虐行为，因为我自己年轻时候也受过虐待。”

“请允许我只再说一点，这对您无关紧要，也许无需告诉您。不过还是预先说一下好：她母亲正强迫她嫁人，现在她可以逃婚了。”

B太太沉思起来。洛普霍夫瞧瞧她，也沉思起来。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件事对您来说，不像我当初想的那么无关紧要吧？”

B太太看来心绪十分不佳。

“请原谅我，”他看到她完全茫然不知所措，便继续说道，“请原谅我，我看您挺为难。”

“对，这件事十分严重，洛普霍夫先生。违反亲人的旨意离家出走，这当然预示着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了，但是我对您说过，这还不算什么。假如她只是躲避他们的粗暴和虐待，不管怎样同他们是和解的，至多花上几个冤枉钱，他们也能过得去了。”

这倒不算什么。可是……这样的母亲强迫她嫁的那个人，必定是个有利可图的阔人。”

“当然。”洛普霍夫用失望的语调说。

“当然，洛普霍夫先生，当然是阔人，正是这点叫我不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母亲决不会示弱的。您是知道父母的权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充分使用那些权力。他们会起诉，把官司打到底。”

洛普霍夫起身告辞。

“那么，我只好求您把我刚才说过的话忘掉。”

“不，再待一会儿。让我至少在您面前稍微辩白几句吧。我的天，在您心目中，我该是多么糟！每个正派人都要表示同情和挺身维护的事，竟使我退缩不前了。啊，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人呐！”

看上去她确实可怜，没有装假。她确实难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她说话语无伦次，她是那样于心不安。后来她的思想才开始清晰有序了。不过，语无伦次也好，清晰有序也好，她跟洛普霍夫说话已经没有什么新内容了，而且他自己心里也很乱。他是这样看重她向他吐露心曲这一事实本身，对于她所讲的内容却没能听进去。等她痛快淋漓地讲完以后，他说：

“您讲的这全部情有可原的理由都白说了，我待在这儿不走，只是怕失礼，怕您以为我在责备您或者生您的气。可是不瞒您说，我并没有听您讲话。如果我不知道您是对的，倒好；如果是您不对，那也好说。我只要告诉她我们谈条件没谈成或者我不喜欢您，就行了！我和她还能指望碰见其他获救的机会。但是现在我跟她怎么说呢？”

B太太哭了。

“我跟她怎么说呢？”洛普霍夫下楼时不断重复说。“这叫她怎么办？这

叫她怎么办？”他心里想着，这时离开了战船厂街，走上了一条通往近卫骑兵林阴道的大街。

自然，B太太并非绝对对，并非像给小孩子证明用手摘取不到月亮的人那样绝对地对。

凭她的社会地位，凭她丈夫那些相当重要的职务上的关系，如果她一定要韦罗奇卡住到她家里，那么，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既不能从她手中把韦罗奇卡夺走，也不能对她或她丈夫做出令人太不愉快的事情，情况很可能如此，甚至毫无疑问会如此。如果起诉，她丈夫将是正式的被告，她就是替他担心。但B太太毕竟要碰到许多麻烦，也许还有一些烦人的谈话。她不得不为了别人的事欠下人情，这笔人情债不如留着为自己办事好。有谁就一定不像B太太这样做呢？哪一个明智的人不愿这样做呢？我们无丝毫权利责备她。

可是洛普霍夫也没有错，他对于搭救韦罗奇卡不抱任何希望了。

十四

韦罗奇卡早就坐在约定的长凳上等他了。有好几次，只要拐角处一露出制帽，她的心便急剧地跳动起来。“终于来了！他！朋友啊！”她连忙起身，跑过去迎接他。

他本来可以强打精神走近那张长凳的，不料竟在他预期露面之前突然跟她相遇，他满面愁容。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我的朋友。”

“不是挺有把握的吗？怎么又没有成功？究竟为什么呀，我的朋友？”

“我们回家去吧，我的朋友，我送您。我们谈谈。过一会儿我再告诉您为什么没有成功，现在让我想一想。我还是不能集中思想。需要想个什么新办法。我们不必灰心，能想出办法来的。”说到最后几句话，他已经提起精神来了，不过还是不行。

“快告诉我，我等不了啦。您说该想个什么新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原先想的全白搭了吗？我也当不成家庭教师了吗？我真不幸，真倒霉！”

“干吗骗您呢？是的，是当不成了。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可是，忍耐，忍耐，我的朋友！您要坚强！谁坚强，谁就成功。”

“唉，我的朋友，我很坚强，可也真痛苦啊！”

他们沉默着，走了几分钟。

这是什么？对了，她手里拿着一件东西，藏在大衣底下。

“我的朋友，您拿着一件东西。让我来拿吧。”

“不，不，不需要，不重。没关系的。”

他们又沉默着，走着，走了好久。

“我可是高兴得到两点还没睡着，我的朋友，我睡着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我仿佛从一间憋闷的地下室里出来，得到了解放，仿佛瘫痪过又复原了，我跑出来，到了田野上，跟我一起跑出来的还有许多女友，她们也像我

一样从地下室逃出来，瘫痪过又复原了。我们在广阔的田野上跑来跑去，我们真快活，真快活！可是梦没能成真！我还以为再也不用回家了呐。”

“我的朋友，让我替您拿包袱，现在已不是秘密了。”

他们又沉默着，走着。走了好久还不说话。

“我的朋友，您看我跟那位太太谈出了什么结果：您不能违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旨意离家出走。这是不应该的--不成，不成，我们挽着手走吧，不然，我为您担心。”

“不，没什么，只是我戴着这块面纱憋得慌。”

她摘下面纱。“现在好些啦，好啦。”

“（她的脸色多苍白！）不，我的朋友，我说的话您别去想了。我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无论如何能安排好的。”

“怎么安排呢，我亲爱的？您这样说只是安慰安慰我罢了。什么办法都没有。”

他一声不响。他们沉默着往前走。

“（她的脸色多苍白！多苍白！）我的朋友，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我亲爱的？”

“等您能略微平静一点，我才能告诉您，我的朋友，您需要冷静地考虑这件事。”

“您这就说吧！您不告诉我，我是平静不了的。”

“不，现在您太激动了，我的朋友。现在您不能够做什么重要的决定。过些时候再说。快了，瞧，到家门口了。再见，我的朋友。只要看到您能冷静地回答，我就告诉您。”

“那要到什么时候呢？”

“后天我来上课的时候。”

“太久了！”

“我明天特意来一趟。”

“不，再早点！”

“今天晚上。”

“不，我不让您走。跟我一块进去。您说我不平静，您说我不能做出判断，那好，在我们家吃午饭吧，您会看到我平静下来的。吃过饭就睡觉，我们就可以谈谈了。”

“可是我怎么进你们家呢？如果我们一块进，您妈又要起疑心了。”

“起疑心！我不管！不，我的朋友，要是为了避免起疑心，您还是进去一下好，因为一路上，我都是撩着面纱的，我们可能被人家看见了。”

“您说得对。”

十五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见女儿跟洛普霍夫一块进来，非常惊讶。她用最专注的目光打量起他们来。

“我顺便来告诉您一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后天晚上我有事，改到明天来上课。让我坐一会，我很累，心里又很乱。想休息一下。”

“您真的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瞧您脸色很难看。”

他们刚才是谈情说爱去了，还是偶然碰上的。要是谈情说爱去了，他应该很快活的。

如果她不依他，幽会的时候两人吵过嘴，他准会不高兴的，要是他们吵过嘴，他就不会送她回来了。再说，她直接回自己的房里去了，连瞧他都没瞧，可又看不出来吵过嘴。

不，他们大概是偶然碰上的。可是谁知道他们呢？应当留神提防着点儿。

“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过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脸色好像很苍白。也许只是我的感觉？”

“韦罗奇卡么？她常这样的。”

“也许只是我的感觉吧。不瞒您说，我心里边思绪万千，脑袋都晕了。”

“到底怎么了，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该不是跟未婚妻吵架了吧？”

“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我对未婚妻还满意。我倒是要跟我父母吵一架呐。”

“您这是怎么啦，小老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怎么可以跟父母吵呢？我真没想到您是这样的人，小老弟。”

“不能不吵，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那样的一个家庭啊。非要人去办力所不能及的事。”

“这是另外一回事啦，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不能人人都给赏钱，总得有个轻重缓急，这话很对。要是这样，要是为了钱吵架，我就不能责怪您啦。”

“恕我莽撞，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我心烦意乱，需要在可亲可敬的人们中间休息一下，可除了在您家里，这样的人哪儿也找不到。请允许我不客气地要求今天在您这儿吃午饭，还请允许我托您的玛特辽娜办点儿事情。这附近好像有家邓凯酒店，虽说那里的酒不怎么好，不过还行吧。”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听说要吃午饭，顿时满脸不快，等到他提到玛特辽娜，那分明的怒容才消失，流露出一种企盼的神情来：“亲爱的，我们看你能添点儿什么吃的？邓凯那儿，大概会有好食品的！”可是亲爱的根本没有看她的脸，却掏出了烟盒，从里面放着的一封信上撕下了一小块纸，又拿出铅笔，写了起来。

“斗胆问您一句，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您喝什么酒？”

“我的小老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说实话，喝酒我可不行，我几乎不会喝。

喝酒本不是妇道人家的事。”

“从你那张脸上，一眼就看得出你不会喝！”他心中想，口上却说：

“当然是这样，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过连姑娘们都喝酸樱桃酒呢。能让我写上吗？”

“这是什么酒，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可以说根本就算不上是酒，而是糖浆。”他掏出一张红钞票。“大概够了吧？”他看了看字条，“再拿去五个卢布备用吧。”

面额十卢布的钞票。

这是他三个星期的收入，一个月的费用。但是又非得这样不可，他必

须好好贿赂贿赂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眼睛湿润了，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甜腻腻的笑容。

“你们这儿附近还有糕点铺吗？不知能不能买到现成的核桃馅饼，这是最合我的口味的好吃的馅饼，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要是没有这种，那么有什么就买什么。将就吃吧。”

然后他到厨房派玛特辽娜上街去采购。

“今天咱们要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我要喝得把跟父母吵架的愁事忘得一干二净。

干吗不喝呢，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我和未婚妻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往后就不会像这样生活了，要无忧无虑地过，对吗，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对，我的老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怪不得我看您这样大手大脚地花钱，真没想到您这样稳重可靠的人也居然会这样。您大概是收到未婚妻的陪嫁钱了吧？”

“没有收到陪嫁钱，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可要是有了钱，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陪嫁钱算什么，这里的问题与陪嫁钱无关。为什么要指望陪嫁钱呢？做事情应当开诚布公，不然的话会引起猜疑，况且那也太粗俗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太粗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实在太粗俗。依我看，做什么都得体体面面的才是。”

“您说得对，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这类关于体面的种种话题构成了饭前最为亲切愉快的谈话内容，这谈话延续了半小时至三刻钟左右。这时节，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在一种袒露胸臆的冲动之下，顺口说出了他的婚期临近的消息。他问：“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婚礼准备得怎么样？”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能回答，因为她不能强迫女儿。--那当然。可是，根据他的观察，韦拉·巴夫洛夫娜很快就会拿定主意出嫁的。她对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有眼睛啊。

“本来么，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您我都是老麻雀啦，轻易是不会受骗上当的。我虽年轻，也是个老麻雀、老滑头，对不对，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对呀，小老弟，是老滑头，老滑头！”

总之，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愉快的谈心使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兴奋起来，把忧愁都抛置脑后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从未见过他如此快活过。他是个狡猾的骗子、十足的滑头！他从未婚妻身上捞到的钱决不止一千卢布，可是当他父母听说他腰包已经塞得鼓鼓的，要求他出点钱时，他却对他们说：不，爹，娘，我这做儿子的是愿意孝敬你们的，不过，你们要钱，我可没有。瞧这滑头！跟这号人谈谈天也挺愉快的，而使她特别感到愉快的还是，她听见玛特辽娜回来时，借口说上自己的卧室去拿手绢，却跑进了厨房，看到买来了十二个半卢布的酒--午饭时只能喝掉三分之一--还看到从糕点铺买回来的一个半卢布的馅饼--这买饼的钱可以说是白扔了！好在馅饼也还能剩下，可以用它代替果酱来招待干亲家了。她还是没吃亏，而是省下了一笔钱。

十六

这时韦罗奇卡正坐在自己的房里想心事：

我非叫他来，这妥不妥呢？妈那么注意地看着他。

我这是把他放在火上烤！他怎么留下吃饭呢？

我的天，我这倒霉蛋还会出什么事啊？

他说他有办法。没有，我亲爱的，绝对没有！

不，有办法了，这就是跳窗户。如果太痛苦了，我就跳下去。

我真可笑：“如果大痛苦，”难道现在还不痛苦？

跳窗的时候就像人很快地飞起来了，仿佛不是掉下去，而真是在飞。

这大概很惬意。

只是后来摔到了人行道上，哎呀，可真硬！疼吗？不，我想还顾不上疼，只觉得很硬！

因为这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不过这之前，空气就像柔软的羽绒，那么轻柔地向两边铺开……太妙了……

是的，可这之后呢？大家都来看。人摔得头破血流，满脸伤痕，全身污泥……不，假如能在这个地方撒些干净的沙子就好了--这儿连沙子都是脏兮兮的……不，要撒上最白、最干净的……那就好。人就不会搞得满脸伤痕，脸干干净净的，不会吓着人的。

巴黎的穷家姑娘用煤气自杀，这是个好办法，好极了，而跳窗不好，还是用煤气好。

他们说话的声音真大，可他们说什么呢？--不，什么都听不见。

我要留一张字条给他，统统都写上，我原来对他说过“今天是我的生日”。当时我的胆子真大，我怎么会那样呢？因为当时我是冒傻气呢，当时我不懂事。

是的，巴黎的穷家姑娘多聪明！好吧，难道我就不会变聪明起来？你看，那该多可笑：他们一进房里，什么都看不见，只闻到煤气味，空气发绿，他们可吓坏了：怎么回事？韦罗奇卡哪儿去啦？妈冲着爸爸喊：“你还站着干吗？把窗子打破呀！”他们打破了窗子，才看见我坐在梳妆台旁边，脑袋耷拉着趴在梳妆台上，两手捂着脸。“韦罗奇卡，你煤气中毒啦！”--我不回答。--“韦罗奇卡，你干吗不说话？”--“哎呀，她中毒死啦！”他们这才哭喊起来。嘿，这该多可笑，他们是会哭的，妈还会讲起她如何地疼爱我呢！

是的，他可倒是真的会怜惜我的。那么，我可以留一张字条给他。

是的，我要见机行事，就像巴黎的穷家姑娘那样做。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不害怕。

而且这又有什么可怕的？这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要等等，看他有什么办法。不，绝对没办法。他只不过安慰安慰我罢了。

干吗要安慰我呢？根本没必要。既然帮不上忙，难道能安慰得了吗？他本来是个聪明人，也这样做。他干吗要这样做？没有必要。

他到底在说什么？好像很高兴，说得那么高兴！

难道他真的想出办法来了？

不，绝对没有办法。
如果他没想出来，难道他还会高兴吗？
他到底想出什么办法来了呢？

十七

“韦罗奇卡，来吃饭吧！”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叫道。

的确该吃饭了，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已经回家了，馅饼也早就熟了——不是从糕点铺买来的，是玛特辽娜做的，馅儿用的是昨天烧汤的牛肉。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您从来没在饭前品尝一杯伏特卡吗？这是很有益处的，尤其是这种苦味的酸橙伏特卡。我是作为一个医生来对您说的。请尝尝吧，不，不，一定要尝尝。我是作为一个医生下忠告：请您品尝。”

“要不是因为必须听医生的话，我决不尝它。尝也只能来半杯。”

“不，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半杯没有效果。”

“可是您自己怎么样，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年纪大了，不再荒唐啦。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我发誓戒了。”

“确实，喝了仿佛浑身发暖！”

“好就好在能使身体暖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看他多高兴，真的！难道他真有办法啦？他怎么跟她那么亲呢？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啊，他多狡猾！”韦罗奇卡想。

大家入了座。

“我跟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喝这个吧，喝吧。麦酒跟啤酒一个样，反正不比啤酒劲儿大。尝尝，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既然您说跟啤酒一样，那就喝吧。啤酒干吗不喝呢！”

（“老天，有多少瓶啊！唉，我真傻！原来这就是他们亲近的原因啊！”）

（“你瞧这小滑头！他自己倒不喝麦酒，只是用嘴唇抿了抿。这麦酒好极了，好像带点克瓦斯味道，而且有劲儿！很有劲儿。等我给米什卡跟她办婚事的时候，我就不喝伏特卡啦，专喝这种麦酒。哼，这个家伙不会醉的！你起码也得喝一点呀，鬼东西！”）

可是这对我更好。他要是想喝，说不定真能喝一气呢。”）

克瓦斯，一种清凉饮料。

“您自己也随便喝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哎，我这一辈子已经喝得够多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喝下去就储存起来了，可以顶好长时间！没事干、没钱花的时候就喝喝酒，有事有钱也就不想喝了，不喝就够快活的。”

午饭一直这样进行着。仆人端上来从糕点铺买回的馅饼。

“亲爱的玛特辽娜·斯捷潘诺夫娜，馅饼应当用什么配餐？”

“这就上，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这就上，”玛特辽娜拿着一瓶香槟转来。

“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没喝，我也没喝。现在让咱们来干一杯吧。为我的未婚妻和您的未婚夫的健康干杯！”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指那个？”韦罗奇卡想。

“愿老天赐福给您的未婚妻和韦罗奇卡的未婚夫，”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我们当老人的，就盼着老天保佑让我们早日看到韦罗奇卡办喜事。”

“没问题，很快就能看到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吗，韦拉·巴夫洛夫娜？是的！”

“难道他真是说的那个？”韦罗奇卡想。

“是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当然是啦。您说声‘是’吧。”

“是。”韦罗奇卡说。

“好，韦拉·巴夫洛夫娜，不要无缘无故地叫妈疑心。说声‘是’就行了。那么现在该干第二杯啦。祝韦拉·巴夫洛夫娜早日结婚！喝吧，韦拉·巴夫洛夫娜！没关系，会有好运气的。碰杯，祝您早日结婚！”

他们碰了杯。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谢谢你，韦罗奇卡，你让我晚年有了安慰，韦罗奇卡！”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一边说，一边擦眼泪。英国麦酒和酸樱桃酒使她多情善感起来了。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连连说着。

“我们真谢谢您，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饭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您在我们家请我们吃饭，我们酒足饭饱啦，简直可以说，您是办了一桌节日酒席！”她的眼睛看人时，不那么虎视眈眈了，显得比前轻松、愉快多了。

一个人圆滑行事，可后果往往超出本意，显得十分奸诈。洛普霍夫买酒的时候并没指望得到上述的效果，他只想讨好一下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免得他因为自动要求留下吃饭而失去她的好感罢了，她是否该当着一个人人大喝起酒来呢？她虽然在各方面都挺怜惜他，可是对他并不信任，因为她认为谁都不可信。况且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会这样速战速决，她原打算把这场实惠的享受推迟到喝茶以后。但人人都有弱点。对于伏特卡和其他常见的好食品她可以无动于衷，可是麦酒和诸如此类的美味佳肴却使她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垂涎三尺了。

午餐像模像样，富有贵族气派，因此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吩咐玛特辽娜摆上茶炊，就像贵族午餐后照例应有的那样。不过享受这风雅氛围的只有她和洛普霍夫两人。韦罗奇卡说她想喝茶，回自己房里去了。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是个缺乏教养的人，他一吃完最后一道菜，就像往常一样立刻去睡午觉了。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慢悠悠地喝着茶，喝完一杯又来一杯。这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已经无力支持，她抱歉说她从一清早就觉得不舒服，客人请她不必拘礼，结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喝完第三杯，就在扶身椅上打起瞌睡来，照玛特辽娜的判断，他大概也跟我们的那位活宝一样，给灌醉了。

可是那位已打起鼾了。大概是这鼾声吵了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当玛特辽娜收拾完茶炊和茶杯，终于回到厨房的时候，他醒来了。

“请原谅我，韦拉·巴夫洛夫娜，”洛普霍夫走进她的房间，说道（他轻声说着，声音发颤，但是吃饭的时候他却大喊大叫，并且也不叫她“我的朋友”，而叫“韦拉·巴夫洛夫娜”，“原谅我刚才太莽撞了。你知道我说过：夫妻是拆散不了的。那么您自由了。”

他们打算进行“假结婚”。当时一些俄国姑娘为了摆脱父母的管束，离家出走，自谋生路，往往采取此办法。如果没有这类合法证件，就要受到警察局惩处，更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我亲爱的！你看到，你进来的时候我哭啦，我是高兴得哭啦。”

洛普霍夫吻了她的手，连连地吻着。

“我亲爱的，你把我从地下室里释放出来，我自由了，你是个多么聪明、心地多么好的人啊。你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

“还是我跟你跳舞的时候就想出来了。”

“我亲爱的，当时我就看出你心地好。你释放了我，给了我自由，我亲爱的。现在我愿意忍耐，现在我知道我就要离开地下室了，我也不再觉得那么憋闷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能出去了。可是我究竟怎样离开呢，我亲爱的？”

“这样吧，韦罗奇卡，现在是四月底，我七月初从医学院毕业，我们要能维持生活，必须等我毕业。我一毕业你就可以离开地下室。只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忍一忍吧，甚至要不了三个月，你就能离开。我会得到医生的职位。我的薪水不高，但是也只能凑合。我可以用些时间开业，开业多少，根据需要再定，我们是可以维持生活的。

“啊，我亲爱的，我们的需要非常少。不过我不愿意这样，不愿靠你的钱生活。我现在本来也在教课，可到那时候我可能会没课教了，因为妈准会去对大家说我是个坏女孩。但是我可以找另外的人家去教课。我能生活下去的。是的，不是应当这么做吗？我不是不该靠你的钱生活吗？”

“这是谁告诉你的，我亲爱的朋友韦罗奇卡？”

“哼，他还问是谁告诉我的！这不都是你自己讲的吗？还有你的那些书呢？书上整整有一半都是讲的这个。”

“书上讲过？我对你说过？这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韦罗奇卡？”

“啊唷，什么时候！是谁说过一切都建筑在金钱上面？这是谁说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好吧，谁说的那又怎么样？”

“你以为我那么笨，不会照您书上说的那样，从前提中得出结论吗？”

在关系亲密的平辈之间，通常以“你”或名字相称。但在彼此产生不满或表示态度郑重时，也会又改称“您”或名字加父称。

“究竟是什么结论呢？无知道你说的什么，我亲爱的朋友韦罗奇卡。”

“哼，这个滑头！他想做专制君主，想叫我当他的奴隶！不行，这做不到，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懂吧？”

“只要你一说我就懂了。”

“一切都建筑在金钱上面，这是您说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谁有钱，谁就拥有权力和权利，这是您的书上说的。可见一个女子靠男人养活的时候，她就得依附于他，对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认为我不懂这个，认为我会当您的奴隶，不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我不允许您做专制君主来统治我。您想做一个善良仁慈的专制君主，但是我不愿这样，德米特里·谢

尔格伊奇！好啦，我亲爱的，我们还要怎样来生活呢？你去给人家断臂截肢，灌他们喝苦药水，我去教钢琴课。我们还要怎样来生活呢？”

“对，对，韦罗奇卡。该让每个人都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不依附于任何人，即使是深爱的人和极为信赖的人。你说能做到做不到，我不知道，可是这几乎无关紧要了。

人只要下定这样做的决心，他差不多就已经给了自己一种保障。他能感觉到：如果需要的话，他靠自己能生活下去，不要依靠别人；能有这种情怀也就足够了。我俩真可笑，韦罗奇卡！你说：‘我不愿靠你养活，’我却为此而夸奖你。有谁这样说话呢，韦罗奇卡？”

“可笑就可笑呗，这关我们什么事，我亲爱的？我们要有自己的活法，怎样觉得好，就怎样过。我们还要怎样生活呢，我亲爱的？”

“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就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向您提出建议，您却用您的计划把它完全推翻了，还叫我暴君、奴隶主。那么请您自己想想，我们关系中的其他方面该怎样安排呢！我认为提出我的想法也是徒劳无益的，那同样也会被您全盘否定的。我的朋友，韦罗奇卡，你自己说说你想怎样生活。我该说的恐怕只有一句话：我亲爱的！她考虑一切问题都充满了睿智！”

“这是什么话？您要对我说客气话了吗？您要献殷勤吗？我可了解得很清楚：人们阿谀奉承，为的是装出一副驯顺的样子来支配别人。请您以后说话直截了当吧！我亲爱的，你夸赞起我来了！我很惭愧，我亲爱的。不，别夸我，免得我要飘飘然了。”

“好的，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就要对您讲些不客气的话了，既然您觉得这样愉快。

在您的天性中，韦拉·巴夫洛夫娜，太缺少女性味，您要发表的大概是男性十足的观点。”

“哎呀，我亲爱的，你倒讲讲看，这‘女性味’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女人嗓音高，男人嗓音低一些。那有什么关系？反复谈论嗓音高，有必要吗？用得着为此来央求我们吗？干吗还总是对我们说，要我们保持女性味，这不是毫无意义吗？我亲爱的？”

“毫无意义，韦罗奇卡，而且极为庸俗。”

“那么，我亲爱的，我不再管什么女性味不女性味了。好吧，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关于我们以后的生活，我有些纯男性的观点要对你说。我们会成为朋友。不过我希望做你的第一名朋友。哦，我还没对你说呢：我恨透了你那亲爱的基尔萨诺夫！”

“不应该恨他，韦罗奇卡，他是个很好的人。”

“可是我恨他。我不许你跟他见面。”

“好厉害的开场白，她哪里是害怕我专制，是要把丈夫当玩偶！我们住在一块，怎么可能不见面？”

“是呀，你们总是搂着待在一起。”

“那当然。喝茶和吃饭的时候就是这样，不过手里有东西，不便于搂着。”

“你们整天形影不离。”

“也许是吧。他差不多总是不离开他的房间，我也不离开我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能完全不跟他见面呢？”

“因为我们处得好，有时想谈一谈，要是彼此不觉得有负担，我们就聊一阵。”

“你们总待在一起，搂搂抱抱，吵吵闹闹。我恨他。”

“你根据什么这样说，韦罗奇卡？吵闹我们可从来没有过。我们差不多就是分开住的，可处得挺好，这都是实话，这又有什么相干？”

“啊哈，我亲爱的，你上了我的当，我很巧妙地叫你上了当！你不愿对我说我俩将来怎样生活，结果你自己却都讲出来了！你上了我的当！听我说，照你的讲法，我们该怎样生活：第一，我们要有两个房间，一间归你，一间归我，还有第三间，我们在那里喝茶、吃饭，招待客人，客人一般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不是专来找你或者专来找我的。

第二，我不进你的房间，免得你厌烦。正是因为基尔萨诺夫不进你的房间，你们才没吵过嘴。你也别进我屋里。这是第二。现在讲到第三，嗨，我亲爱的，我忘了问这一点：基尔萨诺夫干预你的事或者你干预他的事吗？你们有权利相互查问吗？”

“哦，现在我才知道，你谈这个基尔萨诺夫是什么用心了！我不说啦。”

“不，我还是恨他。你不说就不用说了，我自己知道：无论什么事你们都无权相互查问。所以，第三，我也无权查问你，我亲爱的。如果你愿意或是需要对我说说你的什么事情，你就自动来对我说。我也同样这样来对你。这就是约法三章。还有什么呢？”

“韦罗奇卡，第二条需要解释一下。我跟你见面，只能是在“中立房间”里喝茶和吃饭的时候。现在你设想这种情况：我们喝完早茶，我就待在自己的房间，往你房里探头都不敢，那么，我到吃中饭才能见到你，不是这样吗？”

“当然。”

“好极了。一个熟人来对我说，两点钟的时候，另一个熟人来看我。但是我一点钟得出去办事。我可以请你把必要的答复转告那位两点钟来访的熟人吗，我可以求你干这事吗，如果你打算待在家里的话？”

“当然可以求我，至于干不干却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不干，你可不能强求，也不能查问我干不干的缘由。但是，问问我是否愿意为你效劳，问问这是可以的。”

“好极了。不过喝茶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发生这事，现在又不能进你的房间，我可怎么问呢？”

“老天啊，他头脑多简单，简直是个小孩子！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就请说吧！您可以这么办，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走到‘中立房间’，叫我一下：‘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在自己房里答道：‘您要干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说：‘我要出去。’

我不在的时候有位 A 先生（您讲出您那位熟人的姓名）来找我，我有些事情要请人转告他。

我可以不可以请您呢，韦拉·巴夫洛夫娜？’如果我回答说‘不行’，我们的对话就告终结。如果我回答说‘行’，我会走到‘中立房间’，您就告诉我应该转告您那熟人的话。现在您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小孩子？”

“对，亲爱的韦罗奇卡，开玩笑归开玩笑，要知道，照你说的那样生活，的确再好不过了。可是你这套思想是从哪儿得来的？我倒是还熟悉，我记得在什么书上读到过。

但是这些书我没带给你，我带给你的书上又没有这类具体的细节。是听谁说的？不可能有人对你说，因为你碰见的头一个正派人大概就是我了。”

“哎，我亲爱的，想到这类细节难道困难吗？要知道，我观察过家庭生

活--并非指我的家。我的家太特殊了。我不是还有些女朋友吗，我常去她们家。我的天，他们夫妻之间闹过多少不愉快的事啊，你是想象不到的，我亲爱的！”

“得了吧，我倒是能想象到，韦罗奇卡！”

“你知道我怎么看吗，我亲爱的？人不应该像他们那样生活：老待在一块，待在一块。夫妻见面只应当在有事情或者准备一同休息、娱乐的时候。我经常观察和思考：为什么每个人对外人都那样有礼貌？为什么在陌生人中间大家都竭力显得比在家里好？而在外人面前往往也确实好些。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对自家人反而比对陌生人坏，虽然心里更爱自家人？我亲爱的，你知道我向你请求的是什么：永远像你在今天之前那样来对待我。因为这并不妨碍你爱我，我跟你还是最亲的亲人。到今天为止你的行为举止如何？你回答我的时候不礼貌过吗？申斥过我吗？没有！人们认为，怎么可以对一个外边的女人或姑娘不讲礼貌呢，怎么可以申斥她呢？好，我亲爱的，现在我是你的未婚妻，并且将要做你的妻子，你还是像对待外人那样对待我吧。我的朋友，为了持久的和睦，为了永葆爱情，我觉得这样做更好。对吗，我亲爱的？”

“我不知道怎样看你才对，韦罗奇卡。你早已让我刮目相看了。”

“我亲爱的，你想夸奖我！不，我的朋友，这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难于理解。这种想法，不止我一个人有，很多姑娘和年轻妇女都有，我亲爱的，而她们也跟我一样普通，但是她们不能把她们的想法告诉自己的未婚夫或丈夫，她们知道，人家会因此而把她们看做是没有道德的。而你却不这样看，我亲爱的，我就为这才爱上了你。你可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是我过生日那天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当你说起妇女多么不幸、多么值得同情的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我又是什么时候爱上你的呢？我已经说过也是那一天，不过在哪一刻呢？”

“你真好笑，亲爱的！你说不应该猜不着，可我猜着了，你又来夸奖我。”

“你还是猜一猜吧。”

“显然是那一刻，当我问你是否真能使人们过上好日子的时候。”

“为此我应该再吻吻你的手，韦罗奇卡。”

“得了，我亲爱的，我不喜欢妇女被人家吻手。”

“到底为什么，韦罗奇卡？”

“哎，我亲爱的，你自己知道为什么，干吗还问我？别这样盘问我，我亲爱的。”

“是，我的朋友，你说得对，不应该这么盘问。这不好。只有当我确实不知道你想说什么，那时才可以问你。你刚才想说的是：任何人的手都不应当吻。”

韦罗奇卡哈哈大笑起来。

“现在我可以原谅你了，因为我达到了嘲笑你的目的。你看，你想考我，可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吻手不好的主要原因。任何人的手都不应当吻，这是对的，但我本不想说这个，我不是泛泛地谈，我只说男子不应该吻妇女的手。我亲爱的，这对于妇女应当说是一种很大的屈辱。这表示男子不把她们当作同等的人看待，男子们以为一个男子决不可能在妇女面前降低自己的尊严，因为她比他低得那么多，以致于无论他对他怎样俯首屈膝，他还是跟她不一

般，而是比她高得多。你本来并不这样看，我亲爱的，那么你干吗要吻我的手呢？你听我说说我的感觉，我亲爱的：我和你似乎不像一对未婚夫妻吧？”

“嗯，你说得对，韦罗奇卡，是太不像了。不过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呢？”

“天知道，我亲爱的，也许我们倒更像一对老夫老妻吧。”

“没错，我的朋友，这话倒也对。两个老伴儿，依然如故。”

“只有一点已是今非昔比了，我亲爱的：现在我知道我从地下室走出来，自由了。”

十九

未婚夫妻之间初次谈话竟然如此这般，是有点奇特。他们这样谈了一会，然后相互握握手，洛普霍夫便独自回家去了。韦罗奇卡送他走后，亲自上了门，因为玛特辽娜还一直坐在一家酒馆里，企盼着她的那个活宝能再酣睡一阵子，果不其然，她的那个活宝又睡了好一会儿呢。

洛普霍夫六点多钟到家以后，就想着手写论文，但是久久也开始不了。论文怎么也不入脑子；脑子里还是他从谢苗诺夫桥旁到维堡区这条长长的路途中所想的事。当然还是那爱情的梦想？不错，是的，不过并不全是爱情，也不都是梦想。穷人家活着，有其平淡、务实的需求，洛普霍夫考虑的正是这种需求。事情是显而易见的：唯物主义者只考虑实利，他也就总是考虑实利。他的头脑中没有诗意、高雅、美丽的梦幻；却充斥着只适于粗俗的唯物主义者才具有的爱情的梦想。

“她的头脑里几乎总也抛不掉‘牺牲’的念头。这很不好。当你认为自己必须对人家感恩戴德的时候，你对他的态度就已经有几分不自然了。她总会知道的。朋友们准要告诉她，我本来会有多么远大的前程。即使他们不说，她自己也能猜到：‘我的朋友，你为了我，竟然舍弃了你所期望的前程，’假定她暂不提钱--无论是朋友们或者她本人都不至于这样来说我--好在她还不会想：‘为了我，他仍要受穷，如果没我，他早富了。’她不会这么想。不过她会知道我原先希望获得科学家的声望，并且也可能如愿以偿的。

她将要为此而难过：“唉，他为我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啊！我可没想过牺牲。我从来没有傻到要去做出牺牲，但愿永远也不会。怎样对我有利，我就怎样做。我不是一个肯于做出牺牲的人，而且这种人是没有的，谁也不肯做出牺牲。‘牺牲’是一个虚伪的概念，是瞎说。人总是怎样愉快就怎样做。那么你来解释解释。在理论上那倒容易懂，但一到事实面前，感激之情却油然而生，说道：‘您是我的恩人啊。这里不是已经有一种种瓜得瓜的味道了吗？’你把我从地下室放出来了，’她说，‘你对我多好啊。’我很需要把你放出来，这是我自己乐意做的事情。你以为是我放了你？要不是由于释放了你，我自己能得到快乐，你哪会得到我的关心！也许是我释放了我自己吧。对，无疑地是释放了我自己：我自己想生活，想恋爱--你懂吗？--是我自己想，我不管做什么都是为自己。

要想设法不使她心中的这种已然成为负担的、有害的报恩感情发展下去才好。总会有办法的，她挺聪明的，能领悟到这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本不打算这样做。我曾想过，如果她能及时离家出走，就可以把婚事推迟两

年左右。这期间我当上了教授，经济情况也能维持一般水平了。可结果呢，却无法延期。好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当我在考虑必须首先保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状况时，难道我想的是我自己吗？这对一个男子来说，有什么呢？对男子不算什么。钱不够用对女人才会有影响。有靴子穿，袖子没洞，能喝上菜汤，屋里暖和，这就足够了，还有什么奢求呢？而这样的生活我能达到。既然如此，这对我有什么损失？但是对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说，却是不够的。她需要娱乐，需要社会的承认。可是她却没钱用于此处。当然，她不会意识到她缺少这个，她是一位聪明正直的姑娘，她会想：这不值一提，这是毫无意义的虚荣，我对此不屑于一顾；她也定会对此不屑于一顾的。不过，一个人不知道他缺少什么东西，或者甚至相信他并不需要这东西，难道就管用吗？这是错觉、幻想。天性被理智、环境和自尊心所压抑，它缄默着，虽不对意识发出信号，可还在悄悄地起作用，暗暗地蛀食着生活。一个青年女子不该这样生活，一个美人更不该这样生活。她若是不能像别人那样穿戴得考究，又由于经济拮据而不能打扮得光彩照人，是不合理的。该同情你，可怜的姑娘，我曾想过，结婚总会使你的处境好一点。而这对我有什么呢？其实，我还是占了便宜：两年以后，她嫁不嫁给我，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她肯嫁……”

“德米特里，来喝茶吧。”

“来了。”洛普霍夫走向基尔萨诺夫的房间，边走，边继续思量，“我总是把自己居于首位--从自己开始，以自己告终，这样考虑问题本来是必然的；而从‘牺牲’这点开始考虑，那纯属骗人，仿佛我想舍弃学者的名望和教授的地位，这全是瞎说。我反正不是还要同样地工作，同样地获得教授的地位，同样地为医学服务么。人，作为理论家，看到利己主义在实践中怎样支配自己的思想，还是颇为愉快的。”

我事事都预先提醒读者，因此我要告诉读者，不要认为洛普霍夫这段独白包含有作者的神秘的暗示，暗示这是洛普霍夫与韦拉·巴夫洛夫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可能有奢华的服饰，又缺乏在社会上风光、露脸的机会，但这无损于她的生活。她跟洛普霍夫的关系也不会被报恩这“有害的感情”破坏。我不是那种在字字句句中都埋下伏笔的作家，我讲述人们的所思所行，也仅此而已。假如某一种行动、谈话或者思想的独白对于描写一个人物或一种情境十分必须，我便把它叙述出来，即使它对我这部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不起任何作用。

“亚历山大，现在你不会埋怨我在论文方面落在你后边了。我能赶上去的。”

“怎么，你为那位姑娘的事忙完啦？”

“完啦。”

“去B家当家庭教师？”

“不，不当家庭教师。另有安排。现在她还可以在家里暂时忍耐忍耐。”

“好，这样好，当家庭教师本来也不容易。老兄，我现在完成了视觉神经部分，着手下一个课题了，你写到哪儿啦？”

“我该写到……”

接着一连串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术语脱口而出。

二十

“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他说他将在七月初毕业--假定是十号，这可已经不算月初了。可以假定为十号，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假定是十五号，最好还是十号，那么还剩下多少天？今天一天没必要算了，只剩五个钟头啦。四月份剩下两天，五月是三十一天，加上两天是三十三天；六月有三十天，加上三十三天是六十三天，再加上七月份的十天，总共只有七十三天。七十三天，日子多吗？到那时我就自由啦！走出这间地下室啦！啊，我有多幸福！我的亲爱的人，他想得多聪明！我有多幸福！”

这是星期日的晚上。星期一他有课，是从星期二挪过来的。

“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我多高兴，又和你在一起了，哪怕只待一小会儿！你知道，我在这间地下室还要待多长时间吗？你什么时候能毕业？七月十号以前能完事吗？”

“能完事，韦罗奇卡。”

“那么现在我在地下室里只要待七十二天，再加今天这一个晚上就行了。我已经划掉了一天，我照中小学生那样制了一张表格，划天数，划掉一天可真高兴！”

“我的亲爱的韦罗奇卡，我亲爱的！是的，你在这里熬不了多久啦，两个半月转眼而过，你很快就自由了。”

“啊，那时该多么快活呀！可是，你，亲爱的，根本不要理我，也别瞧我，我们不要在每回你来时都弹钢琴，我也不要每回都出来看你。不，我忍不住，我总要出来的，只待一小会儿，再冷冷地、毫无表情地看你两眼。现在我要马上回屋去了。再见，我亲爱的，什么时候再来？”

“星期四。”

“三天！太久了！可到那时就只剩六十八天了。”

“少算几天：七号左右你就可以逃离这里了。”

“七号？那么现在只有六十九天了？你真叫我高兴！再见，我亲爱的！”

星期四

“我亲爱的，只有六十六天待在这里了。”

“是的，韦罗奇卡，时间过得很快。”

“快吗？不，我亲爱的。唉，日子变得多么长啊，这三天抵得上平时整整一个月了。”

再见吧，我亲爱的，我们不该谈得时间太长，我们不是挺狡猾，是不是？再见。唉，我还得在地下室待六十六天！”

（“唔，唔。我自然不会注意到时间，工作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况且我又不在地下室里，唔，唔！对。”他想。）

星期六

“唉，我亲爱的，还剩六十四天了！唉，在这里真难熬！这两天比那三天还长。唉，多么难熬！这里是多么令人厌恶，你要是知道就好了，我亲爱的。再见，我亲爱的，我的小鸽子，星期二见。往后这三天会比那五天还要长。再见，我亲爱的。”

（“唔，唔！对！唔！她的眼睛不漂亮。她不爱哭。这并不好。唔！是

这样！”他想。)

星期二

“唉，我亲爱的，我已经不再计算日子了，时间不动了，完全停下来了。”

“韦罗奇卡，我亲爱的朋友，我对你有个要求，我们需要好好谈谈。你急切地渴望着自由，那就给自己些许自由吧，咱们不是也需要谈谈了吗？”

“需要，我亲爱的，需要。”

“我请求你做的是：明天，在你方便的时候--随便哪会儿都行，只要你告诉我一声--还是去近卫骑兵林阴道，还是那条长凳。去吗？”

“去，我亲爱的，一定去，十一点钟，是吧？”

“好，感谢你，亲爱的朋友。”

“再见，我亲爱的，啊，我有多高兴，你能想出这主意来！我自己就想不出来，真够笨的。再见。咱们谈谈；我也总能呼吸呼吸自由空气了。再见，亲爱的，十一点钟，不见不散。”

星期五

“韦罗奇卡，你这是打算到哪儿去？”

“妈，我吗？”韦罗奇卡脸红了，“去涅瓦大街，妈。”

“那我跟你一起走，韦罗奇卡，我要上客商市场。韦罗奇卡，你说是去涅瓦大街，怎么就穿这么件衣服！去涅瓦大街，得穿得漂亮点，那儿净是人。”

“我喜欢这件衣服。稍等一下，妈：我回屋里拿件东西。”

她们出发了，在大街上走着，到了客商市场，然后朝着离涅瓦大街拐弯处不远、沿着花园街的那排店铺走去，一下子就来到了鲁扎诺夫的小铺。

“妈，我有两句话要跟您说。”

“你怎么啦，韦罗奇卡？”

“再见，妈；我不知道能不能很快跟您见面；要是您不生气，那就明天见啦。”

“什么，韦罗奇卡，我有点糊涂了。”

“再见，妈。我现在去丈夫那儿。我跟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前天就结婚了。车夫，去商队街。”

“二十五戈比，小姐。”

“好，要快。他今天晚上来看您，妈。您可不要生我的气，妈。”

这两句话刚刚能让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听清。

“不去商队街，我刚才只是这么一说，就是要赶快离开这位太太，也免得你多想。”

往左，沿着涅瓦大街走，我要去的地方可比商队街远得多，是瓦西里耶夫岛第五道街，要过了中街才到，好好地赶，给你加点钱。”

“嘿，小姐，您在糊弄我！得给五十戈比才成。”

“赶得好才给。”

二十一

婚礼举行得比较简单，可也不太一般。

在他们确定了未婚夫妻关系以后，头两天韦罗奇卡因为即将获得解放

而满心欢喜，第三天，她开始觉得她所命名的“地下室”比以前加倍讨厌，第四天她哭了一场，她本不爱哭，只哭了一会儿，第五天加长了哭的时间，第六天她已经不再哭了，不过却烦闷得睡不着觉了。

当洛普霍夫发出“唔，唔”的内心独白时，他看了看她，当他发出“唔，唔！对！

唔！”的内心独白时，他又看了看她。他的第一次独白表明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表明什么。在第二次独白中，他向自己解释了第一次独白究竟表明些什么。“向一个人展示了自由，却仍然把他留在不自由的境地中，是不妥的。”之后他思考了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是在从谢苗诺夫桥到维堡区的路上，半个小时是在他的沙发床上。头一刻钟他只是思考，并没皱眉头，其余的一小时零三刻钟他是皱起眉头思考的。两小时刚一过，他就打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还说：“我连果戈理笔下的邮政局长都不如，蠢牛！”他看了看表。“才十点还行。”于是便走出了寓所。

见《死魂灵》第二五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头一刻钟，他没皱眉头，他这样想：“这都是瞎扯，毕业干吗？没有文凭也饿不死人，我不需要它。教书、翻译不会少于当医生的收入，说不定还要多呢。不要紧的。”

真是无需皱眉头，问题原来并不那么棘手。一部分原因看来是：从上次去上课以来他就预感到自己会产生类似的想法，现在他明白了这点：如果他忆起他当时一开始就曾想过“牺牲”这题目，最终还想到了她的服饰，那么完全可以给他说明：从那时起他已经就预感到会产生类似今天的心境。因为，不然的话当时他怎么会产生“舍弃学者前程”的想法呢？当时他以为可以不舍弃，而本能已提示他：“你舍弃前程，婚期才不会拖延。”如果责备务实的思想家洛普霍夫的“不舍弃前程”的想法极不妥当，那么他作为理论家却会兴高采烈地说：“瞧，这又是提供给你们的一个新的例证，证明利己主义是怎样支配我们的思想！我本应看到那想法不妥当，但是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存心不愿看到。另外还证明利己主义是怎样支配我们的行动，否则，为什么还要迫使那姑娘在地下室多待一个星期呢！其实当时就应当预见到，并立即就把婚事办妥。

不过这一切他根本没有忆起，也没想起。因为他必需紧锁眉头来考虑“谁给我们主持婚礼”的问题，他考虑了一个小时零三刻钟，答案就只有一个：“没人会给我们举行婚礼！”突然，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姓“梅察洛夫”，代替了“没人会给我们主持婚礼”的想法。他立刻打了自己脑门一下，还合乎情理地责骂了自己一句：开头怎么没想起梅察洛夫来呢？这却也有点不尽情理，因为类似主持婚礼的事，他一般不会想到梅察洛夫的。

在医学院里有形形色色的许多人，顺便说一句，也有正教中学的毕业生，他们在神学院里有熟人，通过他们，洛普霍夫也结识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虽不亲密，但关系还不错--一年前毕了业，当了神父，住在瓦西利岛上一座有长长走廊的大房子里。现在洛普霍夫正往他那儿去，由于事情紧迫，时间又晚了，他甚至乘上了马车。

梅察洛夫一人在家，正在阅读一部什么新书--不知是路易十四 的还是他那个朝代别的什么人的著作。

“路易”仍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是这么样的，这么回事，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我知道，这事要让

您担很大的风险；如果我们能跟她的父母和解，那当然好，而如果他们要打官司，那您也许就要倒霉啦，必定要倒霉的。可是……”可是怎样，洛普霍夫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理由来。真的，怎么能够说服一个人，让他为了我们把脖子套进绞索里去呢！

梅察洛夫想了好久，也在寻找“可是”后面的理由，好让自己去承担这等风险，但是他同样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冒险。

“这可怎么办呢？我本来是愿意的……您现在要办的事，我一年前就办完了，从此也就身不由己了，您往后也会这样的。真也惭愧：着实该帮您的忙，可人有了妻室以后，就有点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了。”

“你好，阿辽沙，我们全家向你问候，您好，洛普霍夫；我好久都没见到您了。”

你们是在谈论妻子吧？反正在你们看来，有错总是怨妻子。”一个十七岁左右、漂亮活泼的浅黄头发的女郎说道，她刚从娘家回来。

阿辽沙，阿列克谢的爱称。

梅察洛夫告诉了妻子事情的原委。年轻太太的小眼睛闪起了亮光。

“阿辽沙，他们又不会吃掉你！”

“有风险的，娜塔莎。”

“有很大的风险。”洛普霍夫证实道。

“好，怎么办呢，你就冒冒风险吧，阿辽沙，我求你啦。”

“你若不怪罪我，娜塔莎，说我忘了你，自己去冒险，那么就可以说定了。您想什么时候结婚，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由此看来，没有什么困难了。

星期一早晨，洛普霍夫对基尔萨诺夫说：

“你知道吗，亚历山大？我大概要把我们论文中由我分担的那一半送给你了。把我的材料和实验标本拿去吧，我不要了，我快离开医学院了，瞧，这是申请书，我要结婚。”

洛普霍夫三言两语讲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如果你是傻子或者我是傻子，我就会对你说，德米特里，这是疯子干的事。可是现在我不说。种种非议你大概都考虑过，比我考虑得更周全，即使没有考虑过，反正不是大局已定了么。你的行为是愚蠢还是聪明，这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自己不会去做那种蠢事：明知劝阻不了，还偏要劝阻。现在你需要不需要我帮你干点什么？”

“我需要在房租便宜点的地区找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我还得到医学院跑跑，让他们快点开证明，最好明天。那你帮我去找房吧。”

星期二洛普霍夫领到证明，便去找梅察洛夫，告诉他，明天结婚。

“对您来说，什么时间更方便些，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对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来说无所谓，反正他明天一整天都在家。“不过我想，我能来得及叫基尔萨诺夫预先通知您一下时间。”

星期三，十一点钟，洛普霍夫来到林阴道，等了韦罗奇卡好半天，开始焦急不安起来，可就在此刻，她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韦罗奇卡，我的朋友，你没有出什么事吧？”

“没有，亲爱的，没有事，我迟到只因为睡过头了。”

“这么说，你几点才睡着的？”

“亲爱的，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是早晨七点钟，亲爱的，因为我总在想

事；不对，还要早一些，是六点钟。”

“我有件事想求你，我亲爱的韦罗奇卡：我们应当赶快结婚，好使两人都安下心来。”

“对，亲爱的，应当这样做。应当赶快。”

“那么再过四天，再过三天……”

“啊，要是这样，亲爱的，你可真是够明智的。”

“再过三天，我大概就能找到住房了，买上些日杂用品，到时候我就可以和你搬到一起住了。”

“可以，我亲爱的，可以。”

“不过，可先得结婚。”

“哎呀，亲爱的，我都忘了先得结婚。”

“那么，今天也可以结婚，我想求你的就是这件事。”

“亲爱的，去结婚吧；你怎么一下子把什么都安排好了？你多聪明，亲爱的！”

“路上我再告诉你，走吧。”

他们坐车到达以后，走过通往教堂的长走廊，找到了看门人，叫他去通知梅察洛夫；梅察洛夫也住在那座有长走廊的房子里。

“现在，韦罗奇卡，我对你还有个请求。你不是也知道，在教堂里，人家要逼着新郎新娘接吻吗？”

“知道，我亲爱的；不过这有多不好意思！”

“那么，为了到时候别太不好意思，现在我们接个吻吧。”

“那行，我亲爱的，我们接个吻，难道非这样不可？”

“在教堂里不这样不行，我们来准备准备。”

他们接了个吻。

“亲爱的，还好，我们及时做了准备，瞧，看门人已经回来了，现在我们在教堂里就不至于那么窘了。”

但是来的并非看门人--看门人去找诵经士去了--来的却是在梅察洛夫家等候他俩的基尔萨诺夫。

“韦罗奇卡，这就是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基尔萨诺夫，你所憎恨的，还想禁止我跟他见面的那个人。”

“韦拉·巴夫洛夫娜，为什么你想让我们这两个情投意合的朋友相互疏远呢？”

“就因为情投意合。”韦罗奇卡说道，同时把手伸给了基尔萨诺夫，并且还在微笑着。她沉思起来：“我能像你一样爱他吗？你不是很爱他吗？”

“我，我除了自己谁都不爱，韦拉·巴夫洛夫娜。”

“连他也不爱？”

“我们住在一起，没有吵过嘴，也就仅此而已。”

“他也不爱您吗？”

“我什么都没有注意，不过我们倒是可以问问他：怎么样，德米特里，你爱我吗？”

“我没有特别恨过你。”

“好，既然这样，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我就不会禁止他跟您见面的，连我自己也会爱上您的。”

“这样要好得多，韦拉·巴夫洛夫娜。”

“瞧，我也准备好了，”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走了过来，“我们夫教堂吧。”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喜气洋洋，还尽未玩笑，若是婚礼一开始他的声音就有点发颤了；要是真打起官司来呢？娜塔莎，你就去投奔父亲吧，丈夫不能供养你了，丈夫在世，却要靠父亲的面包为生，那日子可也不好过呐！不过，讲了几句话以后，他又完全镇定自若了。

仪式进行到一半时，娜塔莉娅·安德列夫娜，或按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的称呼，娜塔莎赶来了。婚礼一结束，她就邀请新婚夫妇去她家，她准备了一餐便饭；大家去了，快活了一番，甚至还跳了两次卡德里尔舞，有两对舞伴参加，后来甚至还跳了华尔兹。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不会跳舞，就给他们拉提琴。一个半小时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婚礼十分愉快。

“我想，家里在等我吃午饭，”韦罗奇卡说，“现在我该走了，我亲爱的，我在地下室还要呆三四天，或者更长些时间，无需苦恼啦--可现在我却又又要苦恼起来了，我本来现在该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不，你别送我，我一个人走，不要让人家看见。”

“不要紧的，他们又不能把我吃了，先生们，别觉得对不住我。”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一边说，一边送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走出来，他们多逗留了几分钟，好让韦罗奇卡先离开。“我现在很高兴，因为娜塔莎鼓励了我。”

第二天，从开始寻找住房起，过了四天，总算在瓦西利岛五道街的尽头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住房。洛普霍夫一共有六十卢布的积蓄，洛普霍夫跟自己的朋友商议决定，由于他和韦罗奇卡现在还无法考虑购置日用杂品、家具、食具，所以就租下了一套带家具、食具的三居室，还可以向二房东、一个小市民包伙。二房东老头在一道街和二道街之间的中街摆摊，出售纽扣、绦带、别针等物品，白天就在栅栏旁的摊位上平平静静地度过，晚上就跟老伴聊天。老伴白天织补破旧衣服，经她手织补好了的衣服有几百，几千件，这些都是人家从旧货市场上成批成批地给她送来的。房东夫妇还身兼仆人的职务，仆人也就是房东自己。这一切费用加在一起，每月总共才三十卢布。当时--十来年前，按彼得堡的标准，还是物价偏低的时代。这样来安排的话，三个月的生活费用是足够了，四个月大概也够了。就是每月再增加十卢布的茶水钱也够了。洛普霍夫希望在这四个月里找些课来教教，做点文字工作，哪怕到什么商号里找点事情，干什么无所谓。那天，终于找好了房子，房子的确挺不错，为找房子用了不少时间，可总还是找到了。那天是星期四，洛普霍夫照例去上课，他对韦罗奇卡说：

“明天搬家，我的朋友；这是地址。现在我不多说了，别叫人注意到。”

“我亲爱的，你可把我救了！”

现在该怎样离开家？告诉他们？韦罗奇卡也曾想过，但是母亲会扑过来打人，还可能把她锁在房中。韦罗奇卡考虑决定留下一封信在自己的房里。当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听到女儿要去涅瓦大街，并说自己要跟她一起走时，韦罗奇卡就转回房里拿了那封信，她觉得还是跟母亲当面说更好，也更光明磊落。母亲不至于在街上打人吧？不过说话时，该站得离她远一些，好能赶快坐上马车跑掉，给她来个措手不及。

于是就出现了在鲁扎诺夫小铺旁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二十二

可是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这一幕的一半。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万万没有料到会发生此等事，她站在那儿呆若木鸡，过了一分钟，也许还不到一分钟，她竭力地想弄明白却怎么也无法明白，女儿到底说的是什么，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是这样？过了一分钟，也许还不到一分钟……她猛地抖擞起了精神，破口大骂起来，可是女儿已经坐上马车往涅瓦大街去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朝那个方向跑了几步，她得要辆车，于是又奔向人行道：“马车！”--“您上哪儿，太太？”她叫车上哪儿？她刚才听见女儿说“到商队街”，但女儿又往左边拐，朝着涅瓦大街去了。她到底叫车上哪儿呢？“去追那坏蛋！”“去追，太太？您说清楚点儿，上哪儿？不讲好价钱怎么去，去到哪儿也不知道。”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怒不可遏，竟然骂起车夫来了。“你喝醉了，太太，我看出来了。”车夫说完就走开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还追着他骂了一通，然后去叫别的马车，她四面乱窜，跑几步停下来，挥动着两手，总算是又在柱廊下面站住了脚，在那里捶胸顿足，暴跳如雷。而这时她的四周已经有四五个小伙子围上来了，他们是在客商市场的圆柱附近卖杂货的。小伙子们欣赏着她，交头接耳议论着，话语之间流露出几分不恭。他们对她讲了些颇为俏皮的恭维话，倒也不乏善意的忠告：“真行，太太，才这晌就喝醉啦，好样的太太！”--“太太呀太太，买我五个柠檬吧，柠檬解酒最好啦，我便宜卖给你！”--“太太呀太太，别听他的，吃柠檬也没用，还是再喝几杯，用酒解酒吧！”--“太太呀太太，你骂得好凶，我们来打赌，看谁骂过谁！”在讲话的人当中，离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最近的是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小伙子，他向她吐了吐舌头，态度还不算太失礼。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自己却忘乎所以了，揪他的耳朵，把他的帽子也打飞了，顺手又抓住了他的头发。这使得其余几个讲话的人别提多高兴了。“真行，太太，撂倒他，太太！”有的人却说：“费季卡，你倒还手啊！”但是大多数讲话的人都坚定地站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一边：“费季卡要打过这位太太还差得远呢！撂倒他，太太，撂倒费季卡，对他这个坏蛋就该这样。”这时候除了那些讲话的人，还涌过来一大堆看热闹的：马车夫啦，小铺掌柜啦，过路的行人啦。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仿佛刚刚清醒过来，用了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抓住费季卡的头，把他推操出老远，自己却穿过马路，迈着大步走了。那几个讲话的小伙子给她大声地叫好，喝彩声伴随她远去了。

当她过了贵族子弟军官学校的大门，才发觉自己是在往家走，她叫了辆马车，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来开门的是费佳，她在家门口就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朝食橱奔了过去，玛特辽娜听见吵嚷声，探了个头看看，也遭她一顿打。她又冲向食橱，再奔往韦罗奇卡房中，过了一会还是跑回到食橱跟前，接着重又冲进韦罗奇卡的房间，在那儿停留了老半天。随后她在几间屋子里来回地走动，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但是已经没人可打了：费佳跑到脏兮兮的楼梯上，玛特辽娜从韦罗奇卡房间的门缝往里偷看，发现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正要起身过来，也慌慌忙忙地跑掉了，她没回厨房，径直钻到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卧室的床底下，躲了起来，直到听见一声温和的呼唤，方知是平

安无事了。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在几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来回走着，骂声、喊声不断，到底闹腾了多久，玛特辽娜无法确定。不过时间一定不会太短，因为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都已经下班回来了。连他也经历了那一番，身心无一处幸免。可凡事都得有个了结，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终于召唤道：“玛特辽娜，开饭！”玛特辽娜知道暴风雨已过，才从床底下爬出来开饭。

吃午饭的时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果然不再骂人了，只是吼叫了几嗓子，她已没有任何进攻的动机，只不过自己随便发发狠而已。饭后她要想躺，没躺下，却坐下，独自待在那儿，沉默一阵，抱怨几声，后来她也不再抱怨了，一直沉默不语，终于喊了一声；

“玛特辽娜，叫醒老爷，把他给我叫来。”

正在待命的玛特辽娜既不敢上酒店，也不敢去别处，立即就执行了命令。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也是随叫随到。

“上女房东那儿去一趟，就说女儿是按照你的意愿嫁给那魔鬼的。你说：我反对过我老婆。你说：为了让您高兴，我才这么办的，因为我看到，您不愿意让您家的少爷娶我家的姑娘。你说，这都是我老婆的过错，我是服从您的旨意的。你说，是我亲自把他俩撮合到一块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你这样处理很精明。”

“好，去吧！就是碰上她吃饭，你也照样叫她出来，让她离开一下饭桌。现在趁她还不知道内情。”

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义正辞严，讲的话语简直掷地有声，即使他不具备极富说服力、令人叹为观止的演说才能，女房东也会相信他。何况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的口才又是富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即使他拿不出明显的证据，来证明他一贯反对他的妻子，并且为了不致让米哈伊尔·伊凡内奇结一门不体面的亲事而有意撮合韦罗奇卡与洛普霍夫结婚，那么女房东也会原谅他的。“他们到底怎么能结婚呢？”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说他没有吝惜陪嫁，他给了洛普霍夫五千现金，结婚和购买日用品的费用也都是由他出的。他说他还为他们传递情书，他们约会的地点在他的同事菲兰捷夫科长家，科长是“有妻室的人。夫人，别看我是个渺小的人物，可把女儿的贞操，夫人，视为至宝，他们约会都有我在场。我们本不富裕，哪有闲钱给小孩子请家教，可是为了给他个事由来我家，夫人……”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用最恶毒的贬词来揭穿妻子的不良居心。

怎么能不信任、不谅解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呢？而主要的是他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意外的惊喜！喜悦使人心肠变软。女房东开始发表她的赦罪演说，不厌其烦地述说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种种卑劣的思想和行径，起初她要求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把妻子从家中赶走，但是他一再央求她，况且她自己说这话的时候也主要是为了显显威风，其实并未当真，所以最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继续留任做管理人，临街的一套房子得收回，他搬到后院去住，不至于在前院。女房东眼光所及之处有他妻子的身影出现，而且她必须从离女房东窗口远的那个院门出人；每月二十卢布的额外津贴中有十五卢布被取消，留下的五卢布算是对管理人能尽心尽力执行女房东旨意的奖赏，同时也作为他女儿结婚费用的贴补。

二十三

洛普霍夫晚上来的时候，该如何对待他呢？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心中有几个方案。

最为有效的方案是叫两个看院子的藏到厨房里，让他们按照指定的信号朝洛普霍夫扑上去，痛揍他一顿。最富悲剧色彩的方案是向不孝的女儿和那个强盗来亲口郑重宣布作父母的诅咒，还要说明这诅咒有效力。谁都知道，就连土地也不肯接纳受过父母诅咒的人的尸骨。可是这正像女房东想要让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和他的妻子离异一样，纯属幻想。这两个方案犹如五色缤纷的幻想，制造它们出来并非为了实践，而只是为了愉悦心灵，它们成了她独自遐想玩味的题目，而且使她日后谈起来可以解释说：“我本来想这样干，而且也能干成，但是我心肠好，怜惜了他们。”

殴打洛普霍夫和诅咒女儿的方案，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思想感情中理想化的一面。她的智慧和灵魂中现实的一面，却具有并不那么崇高而是比较实际的倾向，这是人类的本质弱点必然造成的矛盾。当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在贵族军官学校旁边恍然大悟、明白女儿真的已经无影踪、嫁了人、离她而去时，这个事实在她的意识中是以如下的内心呼叫的形式出现的：“挨劫啦！”一路上她在内心中不断地呼叫着，有时竟喊出声来：“挨劫啦！”因此，由于向费佳和玛特辽娜宣泄内心的悲伤而耽搁了几分钟以后--此类弱点人皆有之：因过分热衷于表露感情，以致感情冲动而忘掉了眼前的实际利益--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跑进韦罗奇卡的房间，奔向梳妆台和衣柜，打开抽屉和柜门，急匆匆地瞄了一眼。不，全部东西似乎都在里面？接着她又仔仔细细查看了一遍，要证实一下这个使她放心的印象。结果所有的衣物确实全在，除掉韦罗奇卡离家时戴的一对普通的金耳环，一件细纱料的旧连衣裙和一件旧大衣之外。就这个问题的现实动向而言，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估计韦罗奇卡会交给洛普霍夫一张自己所有物品的清单，叫他来索要，她下定决心：金器和其他类似物品一律不给，只给四件比较普通的连衣裙和几件最破旧的內衣。一件不给也不成，体面的礼俗不容许，而玛丽娘·阿列克谢夫娜一向严格恪守体面的礼俗的。

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女房东的关系。我们已经看到，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成功地解决了它。

现在还有第三个问题：怎样来对待女儿和那个硬凑上来的女婿这一对混账男女呢？诅咒吗？这并不难，但是只适于当做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的办法只能是：递状子，打官司，交法院审理。最初，在感情激动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颇为理想化。从理想化的观点来看，它似乎很有吸引力。但是激愤使她疲惫不堪，由于疲劳她的心态逐渐地趋于平和了，而这时，事情也就显出了另一种样子。玛丽娜·阿列克谢夫娜比谁都清楚：打官司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打这种具有理想化魅力、能愉悦其心灵的官司，更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并且还得拖延很长的时间，而不得不掏许多钱出来，却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在旧俄，凡以结婚为目的而诱拐未婚女子者，虽被拐人事先同意，也须受法律制裁。

那么怎么办呢？最终她只有两件事可做：痛骂洛普霍夫一顿，解解怒气，再有就是防范他索要韦罗奇卡的衣物；防范的手段是以告状来威胁。不过骂人也得骂得个狗血喷头，痛快淋漓。

可是她没能办成。洛普霍夫一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我和韦罗奇卡请求你们，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和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原谅我们没有征得你们的同意……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在这儿打断了他的话：“我诅咒她，没出息的东西！”

但是她没能说完“没出息的东西”这个词，只来得及说出“没出……”因为洛普霍夫高声地喊道：“我不要听您骂人，我是来谈正经事的。您发火，不能平心静气地讲话，那我就跟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单独谈吧，等您平静下来，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再派费佳或是玛特辽娜叫我们好啦。”他边说，边拉着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走出客厅，朝书房去了。他说话声音大，竟然无法压过他，所以她也只好到此住口了。

他把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拉到客厅门口，停住脚，转过身来说：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要不我现在就跟您谈谈，不过得平心静气地谈问题才行。”

她又打算叫嚷，可是他又打断了她：

“好，您还不能平心静气地说话，那我们只好走了。”

“你干吗也要走，傻瓜？”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朝丈夫喊道。

“是他在拉我呀。”

“如果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也不乐意冷静地谈谈，那么我恐怕也要走了，反正我倒无所谓。但是，为什么您，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竟容许人家用这样的名称来叫您呢？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明事理，她大概以为对我们叮以为所欲为，而您是一位官员，您该懂得处事之道。您告诉她：现在她拿韦罗奇卡已毫无办法，就更不用说我了。”

“这个坏蛋知道我拿他毫无办法。”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心里想，于是对洛普霍夫说：她作为母亲，起初急昏了头，而现在能够冷静下来谈话了。

洛普霍夫和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才回过头来坐下。洛普霍夫请求她，听他把话说完，她有话往后尽可以说呐，于是他就说起来了，只要她一想打断他的时候，他就使劲地提高嗓门，总算是顺利地讲完了自己的一席话。他说：“要拆散我和韦罗奇卡是办不到的，因此，跟着斯托列什尼科夫去打官司不会有任意的结果，你们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不必庸人自扰，不过，还是随你们便：你们若有闲钱，我甚至都劝你们不妨试一试。

其实你们也没有什么可难过的，因为韦罗奇卡根本就不愿嫁给斯托列什尼科夫，所以您心里也清楚，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这桩婚事是绝对不可能成的。而一个姑娘无论如何总得出嫁，这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件赔本的事情：需要给嫁妆，并且婚礼本身也要花费很多钱，但主要还花费在嫁妆上。所以，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和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你们倒该感谢女儿，她没叫你们损失一文钱就出嫁了！”瞧他就是这么讲的，还讲了些诸如此类的话，他细致入微地讲了足有半小时之久。

他讲完以后，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到跟这个强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就索性谈论起感情来。她说真正使她伤心的是韦罗奇卡未征求父母的同意就出嫁，这在她一个做母亲的心里是很不好受的。而当问题涉及到母

爱和母亲的悲伤心情时，谈话使双方都感到兴趣，这主要在于人们认为按照礼俗的要求是不能不谈的，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谈开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她作为一个慈母，曾是很伤心的；洛普霍夫说，她作为一位慈母，也大可不必伤心。他们谈了，符合了礼俗。当他们很有分寸地完成了礼俗的要求，用适当的时间谈论了感情之后，又转向了礼俗所要求的另一点上，一方说：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另一方回答说：这当然是无需怀疑的事。他们就这一点又说了好半天，达到了礼俗所要求的时间，方才开始告别；告别时又照体面的礼俗所要求的互相解释了好一会。这结果是，洛普霍夫体谅到母亲心绪不佳，没有向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请求马上就与女儿见面，因为马上见面可能会使母亲心里更加难受。而等到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将来有一天听到韦罗奇卡生活很幸福--这当然始终都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唯一的愿望--她做母亲的就能完全放心了，因此到那时再跟女儿见面也就不感到难过了。

他们就这样商定好，然后客客气气地分别了。

“呸，强盗！”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送走女婿后，骂了一声。

夜里她甚至做了这样一个梦：她坐在窗日，看见街上驶过来一辆轿式大马车，十分豪华，马车停下来，从里面走出一位雍容华贵的太太，陪同太太的还有个男子。他们走进了她的房间，太太说：“您瞧，妈，我丈夫把我打扮得多漂亮！”这位太太就是韦罗奇卡。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到，韦罗奇卡身上穿的衣服料子是十分昂贵的，韦罗奇卡说：“光是料子就值五百卢布，这在我们算不上什么，妈，这类衣服我有整整一打。

这儿，妈，这玩意较为值钱，您往我的手指上瞧瞧！”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看韦罗奇卡的手指，手指上戴着几枚镶有大钻石的戒指！“这枚戒指值两千卢布，妈，这枚还贵呢，妈，值四千卢布，再往我的胸口瞧瞧，妈，这枚胸针还要贵，值一万卢布！”而那男子也说起话来了，那男子原来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这些都还算不上什么，亲爱的妈妈，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在我的口袋里，您瞧，亲爱的妈妈，这个钱夹子有多厚，里面装的全是一色的一百卢布的钞票，这个钱夹子我送给您，妈，因为这在我们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这个更厚的钱夹子，亲爱的妈妈，我就不能送给您了，因为里面不是钞票，全是银行证券和期票，每一张证券和期票比起我送给您的全部钞票来都要更值钱，亲爱的妈妈，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亲爱的儿子，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为我的女儿和我们全家造福不浅呢。不过，亲爱的儿子，您是打哪儿搞到这么多钱财的？”--“我去当包税商啦，亲爱的妈妈！”

从十五世纪末叶起，俄国政府将酒税、盐税等主要税收包给商人，包税人向政府预先垫付税款后，即可在政府保护下对纳税人超额征收，因此都成了巨富。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醒了以后，暗自思量：“真的，他能去当包税商就好了。”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赞

您不再是韦罗奇卡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跟您分手之际，本书作者请求您别抱怨，在您退出舞台时结局对您虽有几分不利，可也不必抱怨。您别以为，由此您就失去了人们的尊敬。您始终是在被人愚弄，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我们对您的智慧的评价，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您的错误并不证明您不行。您遇到一些您先前不经常遇到的人，您还根据您以往的经验来进行判断，以致于看错了他们，这并不怪您。

您以往的全部生活使您得出了一个结论：人分为两类-- 傻子和骗子。您认为“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而且必定是骗子，只有傻子才可能不骗人。”这种看法很正确，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就是到眼下也是完全正确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您遇见过许多人，他们说话都说得很好听，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您能看出他们这些人，一无例外地，不是用甜言蜜语哄骗人的滑头，便是不谙世事、什么都不会干。一味冒傻气的大孩子。

所以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相信甜言蜜语，把它当作痴人说梦或欺人之谈，您没有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当您把人分为两类的看法已经形成以后，您才碰见第一个既非傻子也非骗子的女性，这时您感到困惑不解，疑虑重重，不知该怎样看她，怎样对待她，这自然是可以谅解的。当您对人的这个看法已经完全形成以后，您碰见第一个高尚的男子，他不是天真无邪、令人怜爱的小孩，他深谙世事，在这点上不次于您，判断能力不比您差，他办事那份认真劲儿也不亚于您。您错误地把他看作跟您一样地工于心计，这也是可以谅解的。这些错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并未减少我对您这个聪明能干的女人的尊敬。您帮丈夫摆脱了贫困，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得到了保障，这都是值得称道的，这又是费尽心力的事。您的手段卑劣，但是您的环境不允许您采取别样的手段。您这些手段应归罪于您的环境，而不该归罪于您个人，因此而造成的耻辱也不该加在您的头上，荣誉理应归于您的智慧和您的坚强性格。

我承认了您的这些优点，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您满意吗？您当然心满意足了，因为您从未有过这种非分之想：竟有人说您可爱或善良。您自己曾在无意之中敞开心扉承认您又心狠又不诚实，您却并不以心狠和不诚实为耻，您证明，在您的生活环境中，您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所以我称赞了您的智慧和您的坚强性格后，并未再进一步称赞您的美德，您也不大在乎。您并不认为自己具有美德，而且不认为具有美德是个长处，倒不如把它看作“傻子”的专利品。因此除了原有的称赞以外，您也不再希求别的什么称赞。但是我还可以说句恭维您的话：在我所不喜欢，并不愿打交道的那些人们中间，我还是比较乐意跟您打交道。为了您的利益需要冷酷的地方，您当然会冷酷。不过，假如损人而不利己，您是不会由于愚蠢的冲动去损人的，您会盘算，您不值得去白白地浪费时间、劳力和金钱。您自然乐意把您女儿和她丈夫放在火上慢慢烧烤，可是您能够克制住报复心理来冷静地考虑问题，您明白您无法置他们于死地。而善于审时度势，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这正是一大长处！既然知道无济于事，您也就不打官司，打官司害不了惹您生气的人们。您估计到，您由于打官司造成的麻烦而给他们带来小小的不愉快，远远不及您自己遭到的麻烦和损害，所以您不打官司。如果不能够战胜敌人，如果只能使敌人遭受微小的损失，却给自己造成较大的损失，那么何苦来开展斗争。您明白这一点，您具有知其不能而不为的健全思维和勇气魄力，不肯徒劳无

益地损人害己，这也是一大长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是的，跟您还可以打打交道，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因为您不愿为作恶而作恶来害己，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极大的长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对己和对人都比您更有害的人岂止千百万，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虽然他们不像您有着那样可怕的外表。您在坏人中间还算比较好的，这正是由于您不缺乏理智，脑筋也不迟钝的缘故。我盼着把您从地球上消灭，但是我又尊敬您：您没有破坏任何事情。现在您在干坏事，因为您的环境要求您这样，给您另一个环境，您也会乐于做个无害甚至有益的人，因为，假如不是为了钱，您也不愿作恶，只要于您有利，不论什么您都可以去干，所以，如果需要，您也能诚实而高尚地行动。您是有能力做到的，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您的这种能力还没有得到表现，那些相反的能力倒给表现出来了，这不怪您。可是您具有这种能力，并非所有的人都具有。没用的人什么也不能做，您不过是个坏人，还不是没用的人。就道德方面而言，您也高出于许多人。

“您满意吗，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我有什么可满意的呢，我的小老弟？我的处境有点不大妙吧？”

“这才绝妙呢，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

韦罗奇卡离开地下室，已经有三个月了。洛普霍夫夫妇的境况还算不错。他有几处家馆可教，报酬也颇丰，还在一个书商那儿谋得一份工作——翻译地理课本。韦拉·巴夫洛夫娜也有两处家馆教，待遇虽不令人羡慕，可也不算太差。他俩月收入已有八十来卢布。用这些钱过日子是相当拮据的，但是他们毕竟未到受穷的地步，他们的财产渐渐地略有增加，他们估计再过四个月或者用不了四个月，他们便能自己来添置一些日用品了，后来也真的添置成了。

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没有全照着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她那不平常的订婚日半真半假地说的那样安排，可还是十分的近似。他们的房东老夫妻，私下里常常谈论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有多么怪异，他们仿佛根本就不是新婚夫妇，甚至也不像夫妻，而确实说不清是谁跟谁。

“那么，就我亲眼所见的和听你所讲的来看，彼得罗夫娜，可以说像是这么回事：她是他的妹妹，或者他是她的哥哥。”

“你真会打比方！兄弟姐妹间没那么多礼，可他们怎么样？男的起床后，穿好外衣，正襟危坐等你把茶炊送去。他烧好了茶，就叫女的，女的也是穿好衣服才出来。这哪是兄妹、姐弟？你该这样讲：手头拮据的人，因为穷，往往两家合住一套房——这比方还沾点边。”

“这是怎么回事，彼得罗夫娜？丈夫不能进老婆房里，就是说，女的不穿好衣服，男的就不得进去。这像什么话？”

“你还是说说他俩晚上怎样分手吧。女的说：再见，亲爱的，晚安！分开后，两人各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男的还要涂涂写写。你听我讲件事，有一回，女的已经上床，躺着看书呐。我却听见隔壁有响动——不知怎么了，我也睡不着——听见她起床了。”

你能想到吗？我听见她在镜子前面停下来，就是说，她梳起头来了。嘿，瞧，简直像是准备出门做客似的。我听见她走出来了。得，我也就进了走廊，站到椅子上，隔着玻璃往男的房里看。我听见女的走近了：‘可以进来吗，亲爱的？’男的说：‘马上就可进来，韦罗奇卡，请稍等。’他也已经躺下了。他把衬衣外套统统穿好，我想：瞧下面该打领带啦。没有，他没打领带，就整了整衣服说：‘现在请进吧，韦罗奇卡。’女的说：‘这本书有一处我看不懂，你给我讲讲吧。’男的讲了。女的说：‘好，对不起，亲爱的，打扰你了。’男的说：‘没关系，韦罗奇卡，我反正也是躺着，你没妨碍我。’好，女的就走了。”

“这么就走了？”

“这么就走了。”

“男的没怎么样？”

“没怎么样。女的走了倒不用奇怪，该奇怪的是她穿好了衣服才出来。男的说：你稍等。也是等穿好了衣服，才说：进来吧。你来理论理论，这是什么规矩？”

“是这么回事，彼得罗夫娜，看来这是一种教门，世上什么样的教门都有哇。”

“像是这么回事。瞧，还是你说得对。”

另一次谈话：

“达尼雷奇，关于他们的规矩，我已经问过那个女的了。我说：您别生气，我想问问您：您是信什么教的？——‘就是普通的那种俄国正教，’她说。——那您先生呢？——‘也是俄国正教，’她说。——你们没有人什么教门吗？——‘没有，’她说，‘您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是这么回事，女士（我不知怎样称呼您好，叫太太还是叫小姐）：您跟丈夫一起住吗？——她笑起来，说：‘一起住的。’”

“她笑起来啦？”

“她笑起来啦，说是‘一起住’。——那你们干吗有这样的规矩，您没穿好衣服就不见他，仿佛您不是跟他一起住似的？——‘这是因为，’她说，‘我不愿让他看到我衣衫不整的丑样子。这可不是什么教门。’——这又为什么呢？我问。——‘因为这样可以增进爱情，不闹别扭啊。’她说。”

“这说的倒确实像实情，彼得罗夫娜。就是说，时时都要保持整洁的外表。”

“她还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就是不相干的人我也不愿让他们看到我衣衫不整的丑样子，那么对于我最心爱的丈夫，我就更不该蓬头垢面的，在他眼前来回晃荡了。’”

“这说的也像是实情，彼得罗夫娜，为什么老婆总是人家的好？因为人家的老婆都是穿戴好了才让你看见的，而自己的老婆看到的却常常是邋邋遢遢的样子。《圣经》上的所罗门《箴言》也是这么说的。所罗门可是位绝顶聪明的国王。”

洛普霍夫家的日子过得不错，韦拉·巴夫洛夫娜总是高高兴兴的。可是有一回——这大约是结婚五个月以后了——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教家馆回来，发现妻子心情非同寻常，她神采奕奕，眼中充满自豪和喜悦。这时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想起来，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发现她脸上透着兴奋、怡然自得、自我陶醉的神情。

“我的朋友，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吧，为什么不同我分享呢？”

“也许有，我亲爱的，不过还得再等一等，有了准信再告诉你。还要等几天再说，这可要叫我高兴极了。你也会高兴的，我知道。基尔萨诺夫和梅察洛夫夫妇也都会喜欢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亲爱的，你忘了我们当初的约法‘不许查问’啦？有了准信再告诉你。”

又过了大约一星期。

“我亲爱的，我把我高兴的事给你讲讲吧。不过你要给我出出主意，因为这些事你都明白。你知道，我早就希望能做点儿什么事情。这样我才想到应当办个缝纫工场。这不是挺好的吗？”

“噢，我的朋友，我们有过一个约定，就是我不能吻你的手，那不过是指一般情况而言，遇到这种情况，约定就该取消了。请伸过手来，韦拉·巴夫洛夫娜。”

“等以后办成功了再吻也不晚，我亲爱的。”

“等到办成功了，你就不只让我一个人吻了，连基尔萨诺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和所有的人都要来吻了。现在暂时只有我一个人。你光是这想法也值得一吻呐。”

“强迫吗？我要嚷啦。”

“嚷吧。”

“我亲爱的，我很惭愧，也不想说什么。好像这有什么了不起似的！”

“是真了不起，我的朋友！我们大家总是在谈论来谈论去，却什么也不做，对这问题的思考你开始得要比我们大家晚，可是下决心着手干却比大家都早。”

韦罗奇卡把头紧贴到丈夫的胸口，不好意思地躲了起来。

“我亲爱的，你过奖了。”

丈夫吻了吻她的头：

“聪明的小脑瓜。”

“我亲爱的，别再说了，我简直不该告诉你。瞧你怎么这样。”

“我不说了，你说吧，我的好姑娘。”

“可别这么叫我。”

“那么：我的坏姑娘。”

“哎哟，你怎么这样，尽打岔。你安安静静地坐着，听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以为主要的是从开头、即精心筛选女工的时候起就得谨慎小心，要挑选出真正诚实、善良的人，她们不轻浮，也不随意变卦，坚定而又温柔，她们之间不会发生无谓的争吵，并已她们还要善于挑选其他合适的女工。对不对？”

“对，我的朋友。”

“现在我找到了三个这样的女工。我找过了多少人啊！我亲爱的。这三

个月来我常跑裁缝店，认识些人，才总算是找到了。真是出色的女工。我已经跟她们搞熟了。”

“她们必须是精于这一行的好手才行，因为干这一行靠自己的钱来周转，一切都得从经济效益出发。”

“唉，难道能不这样吗？本来就该这样啊。”

“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跟我商量的呢？”

“商量具体细节，我亲爱的。”

“你讲讲具体细节吧。不错，你自己大概全都深思熟虑过了，你能够顺应环境。你知道，在这里，原则是最重要的，还得有坚强的性格和才干。具体细节是根据各种情况的特殊条件自然而然确定下来的。”

“这我知道，不过还是经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把握了。”

他们议论了很久。洛普霍夫在妻子的计划中没有发现任何一点需要修改补充之处，而她本人认为，她的计划所以能够成熟和明晰起来，是因为她讲述了一遍的缘故。

第二天，洛普霍夫往《警察报》经理室送去了一则广告，上面写着“韦拉·巴夫洛夫娜·洛普霍娃承做女式服装”，“价格低廉”，等等。

就在这天早晨，韦拉·巴夫洛夫娜去找朱丽。“她不知道我现在的姓，”她想，就对佣人说：“请告诉她，说有位罗扎利斯卡姬小姐来找。”

俄国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

“我的孩子，您不戴面纱公开地到我这儿来，还告诉佣人您的姓名，您可真冒失，这是损害您自己呀，我的孩子！”

“可我现在已经结婚啦，哪儿都可以去，想干什么成。”

“可是您的丈夫——他会知道的。”

“他过一个钟头也要来这儿的。”

于是朱丽详细地询问起她是怎样出嫁的。朱丽高兴极了，拥抱她，吻她，还哭了。

一阵兴奋过后，韦拉·巴夫洛夫娜才开始谈她这次来访的目的。

“您知道，如果自己不需要，是不会想起老朋友来的。我找您是有件大事求您。

我打算办一个缝纫工场。请您照顾我些缝纫活，并且请把我介绍给您的熟人。我自己的缝纫技术不错，我还有一批好帮手，其中有一个您也认识。”

朱丽确实知道其中有一个很出色的裁缝。

“给您带来几件样品，您看看我的手艺。这件连衣裙是我亲手做的，您瞧穿着多合身。”

朱丽很仔细地看了看这件合身的连衣裙，又看看头巾和袖子的做工，她表示挺满意。

“我的孩子，您有手艺，又有眼光，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不过您必须在涅瓦大街有个像样的铺面。”

“对，到时候我要设个铺面的，这是我的目标。眼下我就在家里承接定货。”

两人一谈完正事，又谈论开韦罗奇卡结婚的事了。

“这个斯托列什尼科夫呀，他酗酒胡闹了两个礼拜，后来又跟阿岱莉重归于好了。

我非常为阿岱莉高兴：斯托列什尼科夫是个老好人；只是可惜阿岱莉

没个性。”

话题一进入自己熟悉的领域，朱丽便没完没了地谈开了，讲起阿岱莉的种种艳遇来：现在罗扎利斯卡姬小姐已经不是姑娘了，因此朱丽觉得再也无需乎有什么顾忌了。最初她说话还挺谨慎的，后来越说越忘情，完全陶醉在回忆之中了，她兴高采烈地描述酒宴的情景，说个没完。韦拉·巴夫洛夫娜感到很窘，朱丽却毫不察觉。韦拉·巴夫洛夫娜恢复了常态以后，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听她说，就像你在看一张原本很可爱、但却病得脱了形的脸时的心情那样。可这时洛普霍夫来了。朱丽马上就变成了一位端庄的贵妇人，言谈举止十分得体。然而这个角色她扮演得时间不长。她开始祝贺洛普霍夫娶了这么个美人当太太，就又兴奋地说起来：“不，你们新婚，我们该庆贺庆贺。”她吩咐佣人立刻开早饭、端香按上来。韦罗奇卡也只得喝了酒，半杯是为自己的新婚喝的，半杯为工场喝，还有半杯为朱丽本人喝的。她感到头晕起来，和朱丽一同叫喊、吵闹。朱丽掐了一下韦罗奇卡，站起身来，就跑开了，韦罗奇卡紧追不舍，她们满屋里跑着，在椅子之间跳着蹦着，洛普霍夫却坐在那里直笑。最后，朱丽突然想要炫耀炫耀自己的力气：“我用一只手就可以举起您来。”——“您举不动。”她们动手撕打起来，双双倒在了沙发上，就再也不想起来了，可是还在接着叫喊，哈哈地乐着，后来两人都睡着了。

这是洛普霍夫好久以来碰到的第一件使他伤脑筋的事，不知如何是好。叫醒她们吗？让这次愉快的会见落得个令人尴尬的收场，也是怪遗憾的。他小心站起身来，在房里转了转，看能否找到一本书。书是找到了，叫做《Chronique de l'Oeil de Boeuf》，连《福勃拉》跟它相比都要大为逊色了。他在房间另一头的沙发上坐下，开始读起来，书写得太无聊了，读了一刻钟，他也睡着了。

即《牛眼商纪事》，一部描写十七、八世纪法国宫廷生活的淫秽作品。

全称是《福勃拉骑士的艳遇》，书中无情地揭露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夜法国贵族社会的颓风。

过了两个来钟头，波莉娜叫醒朱丽：已经到吃午饭时候了。就座的只有他们三个，谢尔日没来，他是参加一个盛宴会了。朱丽和韦罗奇卡又嚷了一阵子，随后又郑重其事起来，临别时简直正经极了。朱丽忽然想起来——以前竟没有想到——要问问：韦罗奇卡干吗想办工场？如果她想挣钱，那么，她有这们样的好嗓子，做个演员，哪怕歌手呢，挣钱也容易得多。为此他们又坐下来，韦罗奇卡讲述了自己的想法，这使得朱丽又一次热情澎湃，她的祝福连连不断，中间还穿插这样的话：她朱丽·勒泰利埃是个堕落的女人——她还流了眼泪——不过她懂得什么是“美德”——接着又是流泪、拥抱和祝福。

大约过了四天，朱丽来找韦拉·巴夫洛夫娜，一下子就向她订了许多活，还留下了几位也可能来订活的女友的地址。她带着谢尔日一道来的，说他不来可不行：“洛普霍夫去看过我，你现在理应回访了。”朱丽举止端庄，虽然在洛普霍夫家坐了很长时间，却还是一丝不苟地保持着庄重的样子。她看见那里没有墙，只有很薄的隔板，她却能够顾及别人的面子。她并未愤慨不平，却是以超然世外的心情，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洛普霍夫家清苦生活的诸般细节，她认为人正是非如此生活不可，只有在简朴的环境中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她甚至对谢尔日说，她想同他迁居瑞士，在田野和山峦之间的湖畔

找一间小屋居住，相亲相爱，一块钓鱼，照看菜园子。谢尔日表示完全同意，但还要看看，三四个钟头之后，她又会说些什么了呢。

朱丽那辆精致的轿式马车的辘辘声和骏马的得得蹄声在中街和小街之间的第五道街的居民当中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印象，那里至少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若不是更早的话——就没见过这么好的车马。许多人目睹，这奇妙非凡之物怎样停到了一座有着七扇窗子的木制房屋的紧锁着的大门跟前，从那精美的马车中怎样走出来两位新颖的、更为精美的非凡人物，一位是雍容华贵的太太，另一位是卓然超群的军官，他的显要身份毋庸置疑。过了一会，大门开了，马车驶进院里，这就引起了众人的懊恼，因为在他们再次出门之前，这些心怀好奇的人已无望再次目睹军官的威严仪表和太太的更加威严的仪表了。这天达尼雷奇做完买卖回到了家，彼得罗夫娜跟他进行了谈话。

“达尼雷奇，看样子，我们的房客是两个大人物。今天有一位将军和将军夫人来看过他们。将军夫人穿戴得漂亮极了，简直没法说，将军身上戴着两枚星章。”

彼得罗夫娜怎么会在谢尔日身上看到了星章，可真是够离奇的。他并不曾有过星章，即使有过，恐怕也不致于在陪同朱丽出门的时候佩戴。但是她的确是看到了星章，她没弄错，也不是吹牛，这无须她来作证，我也能够替她担保：她看到了。我们都知道他身上并没有星章，可是他那副气派，使彼得罗夫娜认为不应该不在他身上看到两枚星章，她也就看到了星章。我不跟您开玩笑，她真的看到了。

“听差穿的号衣可真是没治了，达尼雷奇，一身的英国呢子，五卢布一俄民的。别瞧他脸色铁青，架子挺大，跟人答话的时候还蛮和气呐。他让我摸了摸他的衣袖，是上好的呢子。看得出钱少不了。他们待在咱们房客那儿足有两个来钟头，达尼雷奇，咱们这两位跟他们说话的样子很随便，就像我跟你一样，也不向他们点头哈腰，还跟他们有说有笑。咱们那男房客和将军坐在一块，两人都懒洋洋地倚靠在扶手椅上抽烟，咱们那男房客就当将军的面抽烟，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你猜怎么着？他的烟灭了，就从将军手里接过烟来接火。将军还亲了亲咱们那女房客的手，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简直没法说。

现在这件事应当怎么解释呢，达尼雷奇？”

“我寻思，什么事都是命中注定的，所以谁有什么样的亲戚朋友，这也是命中注定的。”

“不错，达尼雷奇，当然是命里注定的。可我想，要么，咱们那男房客是将军的兄弟，要么，就是将军夫人的兄弟；要么，咱们那女房客是将军的妹妹，要么，就是将军夫人的妹妹。老实说，我更相信她是将军的妹妹。”

“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彼得罗夫娜？不太像呀。要是这样，他们也会很有钱啦。”

“是这样的，达尼雷奇，那女的要不是她娘的私生子，就是她爹的私生子。所以她的脸也是另一副样子，他们确实长得不像。”

“可能就是私生子，彼得罗夫娜。常有这种事儿的。”

在彼得罗夫娜常去的小杂货铺中，她充当显要人物足足有四天之久；这家小铺整整三天不断地从斜对面那家小铺吸引来部分的顾客。在这些日子里，彼得罗夫娜为了心智的启蒙教育，满足人们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热望，竟然对自己的织补工作都不那么上心了。

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过了一个星期，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就去看望女儿和女婿了。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搜集了一些有关女儿和那个强盗的生活状况的情报，她并非经常悉心地去搜集，只是顺便、一般地搜集搜集，主要也是出于纯科学的求知本能。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于亲家，住在瓦西利岛上，干亲家受她之托，时不时地顺路打听打听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情况，那干亲家不断地给她送情报来，有时一个月送一回，有时还多，见机而行吧。据说洛普霍夫夫妇生活和睦，从不吵架。只是有一点：常有年轻人来找，全是丈夫的朋友，也都挺本分。他们生活得不算富裕，但是显然手头儿有些钱。因为他们并没去变卖东西，却添置了衣物用品。女房客给自己做了两件丝绸连衣裙。他们还买了两个沙发、一只放在沙发前的桌子、六把扶手椅子，全是偶然碰上的，一共才花了四十卢布，其实家具都不错，得值一百来卢布。他们已和房东夫妇打了招呼，让他们另招新房客，说：“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搬家了，搬进自己租的住宅里去。谢谢你们的关照。”房东夫妇也对他们表示了谢意。

这些传闻使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感到欣慰。这女人相当粗暴、卑劣，她折磨过女儿，她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惜杀掉她、害死她，在那个发财致富的计划由于她的缘故成了泡影以后，还诅咒过她。这确实是如此。但是应不应该由此就推论出，她对女儿毫无母爱呢？决不应该。既然事已至此，女儿已经逃离了她的掌心，再不回头了，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了，而女儿毕竟是女儿啊。现在已没有什么事是有损于韦拉·巴夫洛夫娜而能使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有利可图的了，所以做母亲的衷心盼着女儿好了，她也不是盼得那么尽心竭力，可这倒不要紧，至少她毕竟不再像密探似地监视女儿，死钉着不放了。她只是稍带着对女儿采取一些监视的措施，因为您得同意，她不能不监视。但是她也捎带着盼望女儿好，因为您得同意，女儿毕竟是女儿啊。为什么还不和解呢？再说，从各方面来看那强盗女婿是个正派认真的人，有朝一日说不定用得上他呢。因此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渐渐地想跟女儿恢复联系了。要达到这一步，恐怕还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无需着急，来日方长。但是关于将军和将军夫人的消息，一下子就把事情的进程缩短了一半。那个强盗确实是个机灵鬼。一个退了学的破学生，既无官位，又无钱财，居然跟一位年轻有为、有钱有势的将军交上了朋友，还让自己的妻子同将军夫人交朋友，这种人必定前程远大；或许是韦拉先交上了将军夫人，才叫丈夫去结交将军的吧？反正一样，那就是说韦拉的前程远大。

于是，一得到将军夫妇造访的情报，做父亲的刻不容缓地被派去向女儿宣布：母亲已经原谅她了，叫她回趟家。韦拉·巴夫洛夫娜和丈夫随着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一同前往，坐了半个晚上。这次见面很不热情，又不自然。大家谈来谈去，都是关于费佳，因为这个话题不那么敏感。费佳已在中学就读。他们劝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送他进寄宿学校，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可以去学校看他，节假日时，韦拉·巴夫洛夫娜还可以把他接到她家过。他们硬挨到了喝晚茶的时候，便匆忙告别，他们夫妇说，今晚家里有客人。

半年来韦拉·巴夫洛夫娜一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她已经再也不习惯那种沉闷的气氛，那里面充溢着虚情假意的话语，每个词都浸透着利己主义的考虑；再也听不惯那种种的欺人之谈和卑鄙的计谋了，她的地下室使她感到后怕。卑污、庸俗、各式各样的犬儒主义——这一切如今在她眼里变得无比的新奇，更加不堪回首了。

“先前我是从哪儿来的力量能够在如此齷齪窒息的环境中生活的呢？我怎么能在地下室里呼吸呢？而我不仅活下来了，甚至还很健康。这是奇迹般的、不可思议的。

我怎么能在这个地方长大，并还能怀着向善的爱心？真叫人无法理解，令人难以置信。”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回家的路上想。她感到自己像是离开了窒息的环境后身心正逐渐放松。

他们回家没一会儿，所等待的客人就聚齐了，都是当时常来的客人：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和娜塔莉妮·安德列夫娜、基尔萨诺夫。他们的晚会跟往常一样进行着。但是对韦拉·巴夫洛夫娜来说，这种充满着纯洁的思想、在纯洁的人们中所过的新的生活似乎倍加可喜可贺！照例既有关于过去种种回忆的愉快的谈话，又有放眼大千世界的严肃的谈话：从当时的历史事件（堪萨斯内战引起了这个小团体的注意，那是今天的南北大战的先声，也是超出美国范围之外的许多更伟大的事件的先声。现在人人都谈政治，可那时候对政治感兴趣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其中也包括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和他们的朋友们）谈到当时的种种论争：如有关利比希理论中的农业化学原理的论争，以及这类团体中的任何一次谈话都必得涉及到的有关历史进步规律的论争，还有关于区分现实的和不现实的愿望的重要性的论争，现实的愿望寻求满足，并且是会得到满足的，而不现实的愿望得不到，也无须得到满足，对于它，就像对在患热病时出现的荒唐的欲望一样，只有一个满足的办法，那就是治愈人的身体：不现实的愿望是由于身体的病态致使现实的愿望被扭曲而产生的；他们还谈到这种彻底分清的重要性，那是由当时的人本主义哲学昭示出来的；他们也谈到一切与这种问题相似和虽然不属于此种、但是属同类关系的问题。两位太太不时地听听这些朴素易懂的学术性争论，并插进一些问题，不过多半时间——自然，她们多半时间并没有在听，当洛普霍夫和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对矿物肥料的重要价值赞不绝口的时候，她们甚至给这两人泼冷水。可是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和洛普霍夫依然坚定执著地谈论他们的学术。基尔萨诺夫并不怎么帮他们的忙，他多半时间，甚至完全是随着太太们，他跟她俩一起玩游戏、唱歌、哈哈大笑，一直到深夜、他们筋疲力尽为止，这才最终把两个坚定执著地热衷于严肃谈话的人给分开。

三

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第二个梦

韦拉·巴夫洛夫娜过了一会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一片田野，在田野上行走的有她的亲爱的丈夫和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丈夫说：

“您很想知道，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为什么有的泥土能长出这么白、这么好、这么嫩的小麦，有的泥土却长不出来？这差别您自己马上就能看出来的。您瞧这株长得好的麦穗的根部：根旁是泥土，不过这泥土是新鲜的，可以说是精良的泥土。您闻到一股潮湿不爽的气味，但是它没有霉味，也不发酸。您知道，拿您和我信奉的那种哲学术语来说，这精良的泥土叫做实用

的泥土。它的确脏，可只要仔细地观察，你准能看出，构成这泥土的全部元素本身都是健康的。元素用这种方式化合，就构成了泥土，可是让原子的配置稍许改变一些，就会产生另一种东西，而产生出的新的东西也全部是健康的，因为基本元素都是健康的。而这种泥土所具有的健康属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请注意这片草地的情形：您看，这儿的水是流动的，所以这儿不可能存在腐朽的现象。”

“对，运动是真实的存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因为运动就是生命，而真实的存在和生命又是一回事。但生命的主要因素是劳动，所以真实的存在的主要因素也是劳动，真实的存在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具有实际的意义。”

“那么您看吧，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当太阳开始晒暖这泥土的时候，热能便开始逐渐地把泥土中的元素转化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化合物，也就是高级形态的化合物麦穗，在日照下从这泥土中长出了麦穗，它一定是一株健康的麦穗。”

“对，因为这是有真实生命的泥土。”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

“现在我们转移到这片草地上去。我们在这儿也来取一棵植物，同样地来观察它的根部。根上也有泥土。请注意这儿的泥土的性质。不难看出，这儿的泥土是腐朽的。”

“用科学术语说，就是不实用的泥土，”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

前面所说的“精良的泥土”或“实用的泥土”暗示劳动人民的生活，此处

“是这样的，这儿的泥土的元素处于不健康的状态。自然，无论这“腐朽的泥土”或“不实用的泥土”指寄生阶级的不劳动的生活。些元素怎样转化，也无无论有什么不同于泥土的其他东西产生出来，这其他东西全部都必定是不健康的、劣质的。”

“对，因为元素本身不健康。”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不健康的原因……”

“也就是造成这不实用的腐朽的原因。”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

“对，也就是这些元素腐朽的原因，这不难发现，只要我们注意到这片草地的情况。

您看，这儿的水不流动，因而淤滞住，并变腐臭了。”

“对，缺乏运动就是缺乏劳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因为按照人本主义的分析，劳动是运动的基本形态，它为所有其他的运动形态如消遣、休息、游玩和娱乐，打下基础，并赋予其内容，所有其他的运动形态若没有预先的劳动就不会具有实际的意义。而没有运动就没有生命，也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这是一种不实用的即腐朽的泥土。不久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怎样使这样的草地恢复生机，现在发现了一个办法——排水：让多余的水从沟渠里流出去，只留下必须的水，水流动起来，草地也就获得了实际意义。

但是在这个办法采取之前，这儿的泥土仍旧是不实用的，也就是腐朽的，它上面的植物不可能长得好。而实用的泥土上会有长得好的植物，但却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是健康的泥土。证讷，Q - u - e - a - a - dum，像拉丁语说的。”

证讷，证明数学定理的用语，其拉丁文缩写为 Q.E.D.

韦拉·巴夫洛夫娜听不清拉丁语的“证讷”是怎么说的。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您总喜欢用似通非通的拉丁语和空泛的推论来逗乐于。”她那亲爱的丈夫说。

韦拉·巴夫洛夫娜走到他们跟前，说道：

“够了，你们别再谈论自己的那套分析、同一性和人本主义了，先生们，请你们谈点别的让我也能加入你们的谈话，或者最好让我们来闲聊吧。”

“我们那就随便聊聊，”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我们来聊聊自己吧。”

“好，好，这一定很开心的，”韦拉·巴夫洛夫娜说道，“不过是您出的主意，就请您来做个示范吧。”

“好，我的妹妹，”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可是您今年多大了，我亲爱的妹妹？十八？”

“快十九了。”

“但是还没到十九，那么就算是十八，我们大家都谈到十八岁为止，因为条件要一律平等。我想说说我自己和我的妻子。我父亲是省城里的一个诵经士，还兼做装订书籍的手艺活，母亲在家收了几名正教中学生寄宿。父母整日谈论生计，为生计操劳奔忙。

父亲爱喝酒，但是只在穷得无法忍受了——这是一种现实的痛苦——的时候才喝，要不就是收入不错的时候，这时他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母亲，说：“喂，孩子他妈，靠上帝保佑，眼下这两个月你不至于受穷啦。我给自己留了半个卢布，喝口酒，找点乐子——这也是一种现实的快乐吧。我母亲常常生气，有时候还打我，那总是在碰上她所说的‘累得散了架子’的时候。因为她要搬盆打水，给我们五个人和五名正教中学生洗衣服，擦地板，地板总是被我们这十双不穿套鞋的脚踩得兮脏兮脏的，她还要侍养一头奶牛——这是无休止的过度的劳作所引起的恼怒。虽然她那样拼命干活，还是像她说的‘人不敷出’，就是说，没有钱给我们的哪个兄弟买长筒靴，或是给姊妹们买鞋穿，这时候她也要打我们。倘若我们这些傻孩子自动去帮她干活，或者做了别的什么聪明事儿，或者她遇到难得的机会能休息那么一小会，像她说的让‘腰腿松快松快’，她也会跟我们亲热的——这都是现实的快乐……”

“啊呀，够了，别再说你那些现实的痛苦和快乐了。”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既然这样，请听我来说说娜塔莎的事吧。”

“我不想听，其中又是讲那套现实的痛苦和快乐吧，我知道。”

“一点没说错。”

“不过，您也许有兴趣听我来谈谈自己。”谢尔日说。谁也不知道他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那看您说什么了。”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我父母虽然很有钱，可他们整天谈论的也还是钱，一辈子都在为钱奔忙。连有钱人也摆脱不了这件操心事……”

“您不会谈自己，谢尔日，”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善意地说，“您说说：他们干吗为金钱去奔忙？有哪些个开销会使他们操心着急？是哪些个需要他们还难以得到满足呢？”

“是的，我当然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问我，”谢尔日说，“可是让我们丢开这个题目，看看他们思想的另一面吧。他们同样要为孩子操心的。”

“他们的孩子吃穿都有保障吧？”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问道。

“当然。但是也需要操心的……”

“别谈自己了，谢尔日，”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我们了解您的过去。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这就是您成长的土壤，这是一种不实用的土壤。因此，您瞧瞧自己吧：您生来本不是个笨人，而且还是个很不错的人，您或许不比我们差，也不比我们笨，可是您到底适合于什么事，您能派什么用场？”

“我适合干的事是陪伴朱丽，她随便领我到哪儿，我都去。我的用场是供朱丽痛痛快快地吃喝玩乐。”谢尔日答道。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说，“不实用的或者不健康的土壤……”

“唉，您说的那个实呀虚呀的真叫人烦！人家早就明白了，可你们还没完没了地谈！”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那你愿不愿跟我也来谈一谈呢？”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道，谁也不知她打哪儿冒出来的，“诸位先生们，请回避回避，因为我们母女俩想说说话。”

所有的人都无影踪了，韦罗奇卡看见只有自己单独面对着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脸上显露出嘲笑的神情。

“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是一位有教养的太太，您这样纯洁，高尚，”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她愤恨得声音发抖，“您这样善良……我这个粗野歹毒的酒鬼怎配跟您谈话？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有个歹毒的坏母亲。不过请问您，太太，这个母亲操心什么事呢？是每日的口粮。用您那种文雅的语言来说，这种操心是现实的、真正的、合乎人道的，对不对？您听过粗鲁的骂人话，见过许多龌龊事和下流行为。但是请问，人们骂人、干坏事有什么目的呢？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的吗？不，太太。不，太太，无论您家的生活怎么样，总不会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生活。您看，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已经学会像您那样文雅地说话了。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母亲是个歹毒的恶婆子，您觉得难过、害臊吗？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愿意我变成一个诚实的好人吗？我是个巫婆，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会施巫术，我能满足您的愿望。请看，韦拉·巴夫洛夫娜，您的愿望实现了：歹毒的我没影了，您瞧这一对善良的母女。”

一间屋子。门口有个醉鬼在打鼾。他没刮脸，丑陋不堪。无法认出他是谁，他的脸有一半被手遮盖着，另一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一张床。床上有个女人。不错，就是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不过她挺善良！可她又是多么苍白、疲惫，她才四十五岁，就已老迈得很了！床边有个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那就是我自己，韦罗奇卡。不过我穿得破破烂烂的！这是怎么啦？我的脸色发黄，脸相粗陋，并且房间又有多么穷酸！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韦罗奇卡，我的亲人，我的天使，”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躺会吧，休息休息，宝贝，你看我干吗，我这么躺躺就行了。你可是两宿没睡了。”

“没关系，妈，我不累。”韦罗奇卡说。

“我的病还是没有起色，韦罗奇卡。我死了，你可怎么办？你爹薪水少，他是指靠不上的。你这姑娘长得漂亮，世界上坏人多如牛毛，将来就没有人再提醒你了。我真是放心不下你。（韦罗奇卡哭了。）

“我亲爱的，你别难过，我说这些不是责备你，而是提醒你：星期五，就是在我病倒的前一天，你为什么还要离开家？（韦罗奇卡又哭了。）

“他将来会骗你的，韦罗奇卡，你就甩掉他吧。”

“不，妈。”

两个月以后。怎么转眼之间两个月就过去了？一个军官坐在那儿。军官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瓶酒。军官的大腿上坐着韦罗奇卡。

转眼之间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一位太太坐在那儿，在太太面前站着她，韦罗奇卡。

“你会烫衣服吗，亲爱的？”

“会。”

“你是什么家庭，亲爱的，是农奴还是自由人？”

“我父亲是官吏。”

“那你是贵族家庭，亲爱的？那我可雇不起你。你当什么女仆啊？走吧，我亲爱的，我雇不起你。”

韦罗奇卡在街头。

“小姐呀小姐，”一个喝得有点醉的小伙子说，“您上哪儿？我送送您。”韦罗奇卡朝涅瓦河边跑去。

“我亲爱的，看够了吧？你要是有个好心的娘，你会是个什么样子？”原先的那个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我会巫术是好事吗？难道我没猜中？你干吗不说话？有舌头吗？你不敢说出口来，我非要把话从你嘴里硬挤出来！你到裁缝铺去过吗？”

“去过。”韦罗奇卡回答，全身直发抖。

“你看见了吧？听见了吧？”

“是的。”

“她们日子过得可好？可有学问？她们读书吗？考虑用你的新办法积德行善、普渡众生吗？她们是不是这样考虑？你说！”

韦罗奇卡不说话，却还在发抖。

“你不敢把话说出来。她们日子过得好吗？我问你。”

韦罗奇卡沉默不语，寒彻全身。

“你不敢说出来，她们过得好吗？我在问你话。她们好不好？我问你呐。你愿意做她们那种人吗？你不说话！掉过头来！你听着，韦尔卡。你有学问，可你的学问是靠我偷来的钱求得的。你一心向善，可我要是不恶，你连什么叫善也不会知道的。明白吗？全靠的是我呀，你是我的女儿，明白吗？我是你娘。”

韦罗奇卡边哭边发抖，寒彻全身。

“妈，您要我怎么样？我没法爱您啊。”

“难道我在央求你爱我？”

“我但愿哪怕能敬重您呐，可是就连这点我也做不到。”

“难道我需要你的敬重？”

“您到底需要什么呢，妈？您干吗来找我，说话这么吓人？您要我怎么样呢？”

“你该感谢我，你这忘恩负义的。你无需爱我，无需敬重我。我恶，我有什么可爱的？我坏，我有什么可值得敬重的？可你得明白，韦尔卡，如果我不是这样，你也不会有今天。有了我的坏，才有你的好；有了我的恶，才有你的善。你得明白这，韦尔卡，你该感谢我。”

“走开吧，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现在我要跟我姊妹谈谈。”

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没影了。

“未婚夫们的未婚妻，姊妹们的姊妹” 抓住韦罗奇卡的手。

即洛普霍夫的“未婚妻”。

“韦罗奇卡，我愿意永远对你好，因为你善良，我呢，跟我谈话的人怎么样，我也就会怎么样。你现在犯愁，你看，我也犯愁。你瞧瞧，我满面愁容还漂亮吗？”

“还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吻吻我，韦罗奇卡，我们一起来承受痛苦。你母亲说的是大实话。我不喜欢你母亲，但是她是我需要的人。”

“难道您缺了她不行吗？”

“往后没有她也可以，那时候人们不需要变得那么恶了。现在却不行。你看，好人自己还不能站住脚跟，恶人却挺厉害，挺狡猾。不过你知道，韦罗奇卡，恶人是形形色色的：有的需要世道每况愈下，还有的虽然也是恶人，却需要世道好起来，因为世道变好对他们有利。你知道，你母亲需要你教养，因为你教书可以挣钱，挣了钱她就好向你索。她希望她女儿给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就为这，她也需要你有教养。你看，她的动机坏，效果却有益于你。你不就是个受益者吗？还有一种恶人可不一样了。如果你母亲是安娜·彼得罗夫娜，难道你还能这样地学习，变成有教养的人吗？还能识别善，而爱善吗？不，人家不会容许你去识别任何美好的事物，只会把你变成一个玩偶，对不对？这样的母亲需要的是当玩偶的女儿，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玩偶，并且总是跟玩偶一起来玩玩偶。你母亲这人很坏，可她毕竟还是个人，她需要的是使你不做玩偶。你明白恶人是多么不一样了吧？有的恶人妨碍我，因为我希望的是：人都成为人，他们只希望人都变做玩偶，还有的恶人却有助于我。他们本不是存心愿意来帮助我，但是他们让人有成为人的可能，他们给人提供了一种成为人的条件。而我的需要也不过如此。是的，韦罗奇卡，现在我不能没有这些恶人，他们也会物极必反的。我的恶人固然恶，可是在他们的毒手下却生出了善。不错，韦罗奇卡，你该感谢你母亲。你无需爱她，她很恶，但是多亏了她才有你今天的一切，你要知恩呐，没有她也就不会有你。”

“将来永远会是这样吗？不，将来不会这样吧？”

“是的，韦罗奇卡，往后不会这样的。等到好人力量大了，我就不再需要恶人。这日子快到了，韦罗奇卡。那时候恶人将看到他们不应该当恶人。那些以往曾经是人的恶人将成为好人：他们作恶只是由于当好人会损害他们，他们知道善比恶好，那么到了可以爱善，而善又无损于他们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爱善了。”

“那些当玩偶的恶人会怎么样？我也可怜他们。”

“他们会玩别的玩偶，不过也只玩无害的玩偶而已。可是他们的孩子不会像他们那样，因为我们这儿的所有的人都将做人，我要教育他们的孩子不做玩偶，而要做人。”

“嘿，那多好！”

“是的，但是就连现在也很好，因为正在给这个美好的未来做准备。至少，那些给它做准备的人会觉得现在也很好。当你韦罗奇卡在帮厨娘做饭的时候，厨房里不是又憋闷，又冒油烟吗？而你不是也觉得挺好，憋闷和冒油烟也算不了什么？当大家坐下吃饭的时候感觉都挺好，而帮了忙做过饭的人

感觉更好，他们吃起来倍感香甜。你爱吃甜的，对不对，韦罗奇卡？”

“对。”韦罗奇卡等尔一笑，她爱吃甜饼和下厨做甜饼的嗜好，叫人家给说破了。

“那么还有什么可愁的呢？好在你已经不愁了。”

“您多么善良！”

“而且快活，韦罗奇卡，我总是快活的，就连犯愁的时候也还是快活。对不对？”

“对，我犯愁的时候，您似乎也犯愁，可您总是能立刻就把愁云驱散的。跟您在一起真快活，非常快活。”

“你还记得我那支小歌《Donc,vivons》吗？”

“记得。”

“我们来唱一唱。”

“唱吧。”

“韦罗奇卡！是我吵醒了你吧？可是茶都煮好了。我刚才吓坏了：我听见你在哼哼，等我走进来了，你却在唱歌唱歌呐。”洛普霍夫说。

“不，我亲爱的，你不吵醒我，我自己也会醒的。我做了一个梦，亲爱的，喝茶的时候再给你讲吧。你走吧，我好穿衣服。您怎么敢不经我许可就进我的屋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太过火了。你为我担惊受怕了吗？我亲爹的？过来，为了这，让我吻你一下。吻过了，走吧，走吧，我要穿衣服。”

“既然已经在这儿了，就让我做你的仆人，来侍候侍候你吧。”

“也好，亲爱的，不过这叫我多不好意思啊！”

四

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工场已经安排就绪了。它的基本原则很一般，最初甚至于一概得没什么可说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对第一批进场的这三名女裁缝简直什么也没说，只是讲到她给她们的工钱会略高出于一般裁缝铺的工钱。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裁缝们看到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是一个浅薄轻率的女人，所以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她的建议，在她那儿做工了：一个不大富裕的太太想办个缝纫工场，有什么可不好理解的呢？这三名女工又找来三四个人，全是按照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要求，经过审慎的挑选的。这些挑选的条件也没有一点可以引起怀疑的，就是说，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那个年轻谦逊的妇女希望工场的女工直爽善良随和、通情达理，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她只不过是愿发生争吵罢了。由此可见她办事明智，也就仅此而已了。韦拉·巴夫洛夫娜自己也认识这些选上的人，在她答应录用她们以前，她跟她们就很熟了，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仅只表明她是个踏实稳重的人罢了，没有什么好猜想的，没有什么可叫人怀疑的。

于是她们干了一个月，按时领到了事先谈妥的工钱。韦拉·巴夫洛夫娜经常待在工场里，她们对她已经十分了解了，知道她待人好，同时是个节俭、谨慎、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她得到了她们的完全的信任。这儿没有，也预计不到以后会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不过她们却能够看出这个老板是个好

老板，将来她一定会事业有成，因为她善于经营。

可是刚过一个月，韦拉·巴夫洛夫娜带着一本帐簿来到了工场，叫裁缝们暂停工作，听她讲话。

她开始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讲解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但是她的裁缝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不论是从她口中还是其他人的口中。

“现在我们彼此熟了，”她开口说，“我可以说你们都是好裁缝，好姑娘。你们也不致于说我是个傻瓜。那么现在我可以跟你们坦白地谈谈我的想法。要是你们觉得我的想法中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你们可以先好好地琢磨琢磨，不忙于马上就说我的想法太浅薄，因为你们知道我不是那种浅薄的女人。我的想法是这样：

“有些好人说可以办这样的一种缝纫工场，裁缝在那儿做工，比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些工场做工得利更多。我也想试一试。根据头一个月的情形判断，好像确实能办得到。你们准时领到了工钱，可是我要告诉你们，除了这笔工钱和其他一切开销，我手里还剩下多少赢利。”韦拉·巴夫洛夫娜念了一遍这个月的收支帐目。支出中除已付的工钱外，还列出了其他种种费用：房租、照明、甚至韦拉·巴夫洛夫娜因工场事务外出所花的车马费——约莫有一卢布。

“你们看，”她接着说，“我手里还剩下这么些钱。现在怎么来处理呢？我办工场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赢利归裁缝所有，那本是靠你们的劳动才赚来的，所以我想把这些赢利分给你们：头一回大家平分，每人一份。往后再看这样处理好呢，还是有什么别的对你们更为有利的办法。”她把钱分了。

裁缝们惊诧不已，过了好半天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开始道谢。韦拉·巴夫洛夫娜让她们充分地表达因得到钱而萌生的谢意。如果拒绝听她们的感谢的话，就像是不在意她们的意见和盛情似的，她们会难过的。然后她继续说道：

“现在我必须对你们讲件事。在我们讲民要谈的一切事情当中，这件最难讲清，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不过我还是需要讲一讲。为什么我不把这些钱留下归自己？如果不想赚钱，我干吗愿意来办工场呢？你们知道我和丈夫日子还不算穷：我们不是阔人，可是什么东西也都够用的。如果我缺少什么，只要对丈夫一说，就行了，其实连说也不用说，他自己就会看出我需要更多的钱，那么我也就会有更多的钱了。他现在干的工作不是收益比较多的，而是他比较喜欢的。不过我们彼此感情好，他最愿意做的事，一定是我最高兴的事，我对他也是一个样。所以，要是我觉得钱不够用，他准会去找一个比现在挣钱多的工作去干，而他也是能够找到的，因为他人很聪明机灵。你们对他不是也有几分了解了吗。他既然不这样做，就说明我和他现有的钱已经够我用了，这是因为我对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你们知道，人各有所好，不是人人都光爱钱：有的爱跳舞，有的爱打扮，或者打牌，这些人为自己的爱好甚至情愿荡尽家产，并且的确有许多人在这样做。没有人对这一点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爱好看得比金钱要宝贵。而我的爱好就是我和你们正在试做的这件事，我不但没有为我的爱好荡尽家产，甚至根本没有花费什么钱，我只是喜欢干这件事，赚不到钱也没什么。是的，我认为这一点也不奇怪：有谁从自己的爱好上来找钱赚呢？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爱好来花费金钱。我可不是那样，我不花钱。就是说，比起其他人来，我还是得了大实惠，我既满足了自己的爱好，给自己找到快乐，又无损于自己，其他人得到快乐

却要花钱。为什么我有这个爱好呢？这是因为聪明的好人写了很多书，书里讲到要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好，人在世上该怎样生活，据他们说，这儿最主要的是按新法来办工场。我就想看看，我和你们能不能定出一套可行的办法。这反正全一样：有人想盖一幢好房子，还有人想辟座好花园或暖花房供他来欣赏，我却想办一家好的缝纫工场，让人能心悦诚服地来观赏。

“当然，要是我每个月都能像现在这样给你们分红，也就很可观了。但是聪明人说，还可以做得好得多，也就是赢利会更多，而且使用起来生利更多。据说仿佛可以办得很好呢。那么我们再看吧。我要一点一点告诉你们，按照那些聪明人所说的，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你们自己仔细观察观察，也能有所发现，要是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好事可做，我们就逐步地、尽可能地试着去做。不过还必须对你们说，得不到你们的同意，我什么新办法也不会采用的。只有你们自觉自愿，才会出新举措。聪明人说，凡是自愿做的事才能做好。我也这样想。所以你们不必害怕新办法，除非你们自愿改变，一切照原样。

你们不愿意，什么都不动。

“现在我不征求你们的意见，最后一次以老板的身份下命令。你们看到，我们必须记帐，以防浪费。上月份是我一个人记的帐，现在我不愿一人来记了。请从你们中间选出两个人跟我一起管帐。没她们，我不管。钱是你们的，并不是我的，所以你们应该管。

现在这事从未干过，不知你们中间谁更合适管，最初必须先选两个人试一个短时期，过一个星期你们就会看出，是另选别人好，还是让原有的人留任好。”

这些不平凡的话引起了长久的议论。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已经赢得她们的信任，况且她没有说得天花乱坠，没有扯得老远，没有描画出什么特别迷人的远景来，这样的远景在造成短暂的轰动后即便令人生疑。因此女工们没有把她看作神精错乱，而最重要的也正是把她看作神精错乱。事情在慢慢地进行着。

当然得慢慢来。下面是工场在整整三年中的一部简史，在工场的这个时期，构成了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历史上的主要的方面。

那些成为工场骨干的女工是审慎挑选出来的，都是些好裁缝，同时，她们的切身利益跟工作成绩好坏有直接关系，所以工作自然进行得很顺利。几乎所有来工场试订过衣服的太太，都成了它的回头客。有几家裁缝铺和缝纫工场看了有点眼红，却并未产生任何的影响，只是使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得不尽快为工场取得正式的营业权，来排除种种挑剔。不久订的活越来越多，最早一批进工场的女工们已经忙不过来了，于是工场的人员渐渐增加，过了一年半，女工总数竟达到二十名，后来就更多了。

整个管理方面的决定权移交给裁缝们之后，最初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她们作了一项可以预料到的决议：女工们经管的第一个月便确定，韦拉·巴夫洛夫娜工作不要报酬是不妥当的。她们向她宣布这点时，她说这样做确实应该。她们想给她红利总额的三分之一。她把这笔钱放了一段时间，才向女工们解释说，这违反了她们的办法的主旨。她们久久地不能理解这一点，但是后来同意了：韦拉·巴夫洛夫娜谢绝了这份特殊的红利不是由于好面子，而是照她们的事业的本质来说必须如此。这时工场已经扩大了规模，韦拉·巴夫洛夫娜一个人来不及剪裁，需要再增加一个；她们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定

了跟另外那个剪裁师同样的薪金。先前放在她那儿的一笔红利，现在按照她的请求被放回到出纳室里去，只给她留下作为剪裁师的应得的那部分，其余的钱用来办了一个“金库”。

几乎有一年的光景，韦拉·巴夫洛夫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场里度过的，她的工作时间确实不少于其他任何人。当她看到有可能不用整天待在工场了，于是她就减少了工作时间，随之，报酬也少拿了。

怎样分红呢？韦拉·巴夫洛夫娜希望大家来平分。这一点直至第三年年中才实现，那以前她们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开始时是按工钱的比例来分红。她们首先认识到，如果一个女工因病或其他正当缘由缺了几天班，那么，为此就减少她那份红利是不对的，因为红利的获取不是仅在这几天里，而是在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并取决于工场的总体状况。后来她们还同意，剪裁师和其他管送订活和干别的活儿的女工已经拿了补贴，这笔额外的薪金收入用来作报酬，就足够了，要是比别人还多分红利，那就不公平了。没有兼职的普通裁缝很谦让，当她们发现原先定的办法不公平的时候，并没要求改变。而兼职者充分理解新办法的精神，本来受优待，自己就觉得过意不去，所以都谢绝了。不过应该说，在各项事业不断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暂时性的谦让——有人容忍，有人谢绝——算不上是特殊的功绩。最困难的倒是加强这种观念：普通裁缝应该得到同样多的红利，显然有的人挣钱比别人多；工效领先的裁缝已经得了较多的工钱来作为自身工效的报酬，就已经足够了。这是分红方面的最后一次变动，在第三年年中已然实现，当然全工场的人都明白：红利的获得不是对某个人的手艺的报酬，而是工场的总的性质的结果——是靠它的体制和它的宗旨，而这个宗旨便是尽可能使参加工作的全体人员同等享受工作带来的利益，不管她们个人的特点怎样；工作人员的分红取决于工场的这种性质，工场的性质、精神和办法又是靠全体人员的同心同德，而每个参加者对这点都同等重要：对于维持和发展有利于全体人员和整个事业成功的制度：一个最胆小或者最无能的人的默许，其作用不亚于一个最有魄力或者最有才干的人的积极奔忙。

我省略了许多细节，因为我不是要描写工场，而只是为记述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活动需要涉及到它时，我才多少讲一点。即使我提到某些细枝末节，那也仅仅为了表现韦拉·巴夫洛夫娜怎样行事、怎样一步一步地、耐心不倦地经营业务，怎样坚持她立的规矩：不下任何命令，光是劝告、解释、协助，在执行她的合伙人的决定时，助她们一臂之力。

每个月都分了红利。最初每个女工拿到红利后就各自分散地花掉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迫切需要，并且不习惯于统一行动。随着她们经常参与工场事务，养成了考虑工场整个工作进程的习惯，这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就叫她们注意到：在她们这个行业里，一年之中各个月份承接订活的数量多少不等，用旺季的红利来弥补淡季的不足，一定不错。

她们的帐记得很精确，女工们知道，如果她们当中有人离开工场，立刻就可以领出她的那份保存在出纳室里的红利。因此她们赞成这个建议。于是有了一笔不多的储备资本，数目还渐渐增加。她们开始探索利用它的各种形式。从最初起，大家就懂得可以使用它来进行借贷，为入股人解决燃眉之急。谁也不愿意在借款上加算利息：穷人有一个观念，认为最佳的经济援助是不要利息的。这个“金库”刚一创办，紧接着就设立了代购处。

女工们发现通过工场去购买茶叶、咖啡、食糖、鞋子和其他许多食物

要更合算，工场成批进货，所以比较便宜。过了不久，她们又前进了一步：她们考虑，用这个办法购买面包和其他食品，一定合算，这些东西一直都是每天在面包房和杂货铺买的。可是她们马上看到，为此大家必须靠近些住。她们便在工场附近租了几套住宅，集中在一起，几个人住一套。于是工场里就有了面包房和杂货铺的代销点。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几乎全体未婚女工都已经住进了一所大的住宅里，拥有公共食堂，用大庄户人家的办法储备食物。

一半女工是独身，其中有的女工有年老的女亲属——母亲或婶母；有两名女工供养着老父亲；许多人有年幼的弟弟或妹妹。三名未婚女工因有亲属关系不能搬进公共宿舍里住：一个女工的母亲不合群；另一个的母亲在官府供职；不愿跟粗人为伍；第三个的父亲是酒鬼。她们跟那些不是姑娘，而是已婚妇女的裁缝一样，只能享用代销点提供的服务。除这三人外，其余凡是要供养亲属的未婚女工都住公共宿舍。她们自己与亲属分开住，两三人住一间房，她们的男女亲属从各人的方便出发，得到了安顿：有两个老太太各住一间房，其余的老太太住在一起。小男孩们有自己的一间房，另有两间房住女孩。

按规定，男孩可以在这儿住到八岁，八岁以上的分别安排学手艺。

一切都经过很精确的计算，大伙都深信不疑：人人不吃亏，人人也不受损。单身女工的房租和伙食费简单易算。经反复斟酌后，确定向八岁以下的弟妹收成年女子费用的四分之一，向八岁到十二岁的女孩收三分之一，十二岁以上收二分之一，女孩如果没有找到别的工作，从十三岁起就可进工厂当学徒。按规定，她们从十六岁起可以成为工场的正式工人，只要被公认为熟练地掌握了缝纫技术。对成年家属的收费自然是跟裁缝一样多。住单人房间要支付特别的租金。所有住工场宿舍的老太太和三个老头儿，几乎都担负了厨房的活计和其他的家务，因此也得给他们计算报酬。

这一切口头上说起来很快，一旦就绪实际做起来也很容易、简单、自然。可是得慢慢来，才能安排妥当。每个新办法都需要经过多次议论，每个变革都是一连串忙碌奔波的结果。假如我也像谈论关于红利的分配和利用那样评详细细地来谈论工场其他方面的办法，那就太冗长，太枯燥了。有许多事情根本无需来谈，有的方面只稍稍提一下即可，以免惹人厌烦。比方，工场设立了代销点，卖那些在无人定货的淡季缝制的成衣，当时工场还不能有独立的门市部，不过已与客商街的一个铺子订了代销合同，还在旧货市场上设了个摊位，由两个老太太来经营代销。不过工场生活中有一个方面我必须稍微详细地来谈谈。

韦拉·巴夫洛夫娜从办场的最初的日子起，就开始带书来。她布置完工作以后，便开始朗读，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不是需要处理什么事，她是不会中断的。女工们听一会，休息休息，休息后再读，读后又休息。不必说，女工们从一开始便迷上了朗读，有些女工原来就对这爱好。过了两三周，工间朗读形式便固定了下来；又过了三四个月出现了几个朗读能手，于是决定由她们来代替韦拉·巴夫洛夫娜，每回朗读半小时，这半小时的朗读算工作。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朗读时还间或穿插讲解，等到她卸掉了朗读的任务后，讲解得更多更长了。后来讲解发展成为类似普及各门知识的简易讲座了。再往后——这是个很大的进步——韦拉·巴夫洛夫娜看到有可能正规上课：女工们的求知欲是这样的强烈，她们的工作又进行得如此地顺利。

她们决定在工作日当中，午饭之前安排一大段时间来听课。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有一次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梅察洛夫家中对他说，“我有件事求您，娜塔莎已经同意了。我的工场要变成传播各门知识的学校。您来当教授吧。”

“我能给你们上什么保呢？难道上拉丁文，希腊文，或者逻辑学和修辞学！”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笑着说，“我的专业本来就没什么意思，您是这样看，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看，我也知道这人是谁。”

“不，正是您这样的专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有您才表明我们的品行良好，教学方向端正，您能起保护伞的作用。”

“这倒也说得对。看来没我，你们就要有不轨行为了。那您就指定课程吧。”

“比方俄国史，简明世界史。”

“好极了，这我去讲，还把我算作专家，太妙了。身兼二职：教授和保护伞。”

娜塔莉妮·安德列夫娜、洛普霍夫、两三个大学生，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也都是他们所戏谑自称的“教授”。

除了上课，她们还安排了娱乐。她们举办晚会，进行郊游，一开始次数不多，后来钱多了，娱乐活动就更经常了。她们订了剧院中的包厢。第三年的冬天，她们在意大利歌剧院里长期包了十个边座。

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间，每个戏剧节（从秋季到次年初夏）意大利歌剧在彼得堡的米海洛夫斯克剧院（即今天的小歌剧院一八三三年创办）上演。

韦拉·巴夫洛夫娜有多快活，多幸福。同时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当然她也有痛苦。

工场里一名优秀女工的不幸遭遇不仅对于她，而且对于整个团体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萨申卡·普里贝特科娃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亲自挑选的三名裁缝之一。她长得不错，性情温和，她有个在官府供职的未婚夫，一个善良的好青年。有一次，天相当晚了，她在街上走，一位先生钉上了她，她加快脚步，他紧跟她，一下子抓住她的手。她猛地一冲，挣脱开了。但是她在挣脱时，手碰了他的胸口一下，竟把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的怀表打落在人行道上，发出当啷的声响。这道貌岸然的先生理直气壮地扭住普里贝特科娃，喊了起来：“小偷！岗警！”两名岗警跑了过来，把普里贝特科娃送进了拘留所。

工场里的人有三天都不知道她的情况；谁也想不出她会到哪儿去了。第四天，一个好心肠的勤务兵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普里贝特科娃写的一张字条。于是洛普霍夫便立刻去奔走斡旋。人们对他说了许多粗话，他也加倍地回敬了他们，然后就去找谢尔日。

这时谢尔日和朱丽正在远方参加一个盛大的野餐会，第二天才返回来。谢尔日回来两小时后，警察分局长就向普里贝特科娃道了歉，又乘车去找她的未婚夫道歉，但是他没有碰到未婚夫。原来未婚夫在头天晚上就到拘留所找普里贝特科娃去了，并从关押她的岗警处了解了那花花公子的名字，已去找他要求决斗了。花花公子还不知他要提出决斗，以戏谑自嘲的口吻认了罪，道了歉；而听到决斗要求后，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在官府供职的公务员说道：“这样的话，你可不能拒绝决斗。”立即打了他一个耳光，花花公子抓起

一根棍子，公务员就推了他胸口一把，花花公子跌倒了，仆人闻声赶来，老爷已命归西天。他在重重倒地的时候，额头撞在楼花桌子脚突出的尖棱上。公务员下了监牢，一场官司开始了，难以预料这场官司何时能结束。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也没有什么。不过从那以后，人们都不忍看普里贝特科娃了。

工场里还发生过几件事，虽不是这种刑事案件，却也叫人不痛快。事情平平常常，姑娘们为之长久动容流泪，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男子却当作是一时的解闷消遣。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在今天的观念和情势下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人们对女工怎样关怀，也无论女工自己怎样多加小心，都是永远不可能不出事的。这就像古人在学会预防天花之前，一定要生天花一样。现在谁再生天花，那就该怪他自己了，尤其该怪罪他的亲人们；而以前并非如此，谁都不该怪，除了可恶的流行病或可恶的城市和乡村，也许还有那种得了天花却去接触别人、在复原之前不去防疫站隔离的人，才是该怪罪的。现在发生这些事也一样，总有一天人们能避免生天花，避免的方法已经掌握，不过还是不愿采用它，就像从前人们很久很久都不愿意采用防治天花的方法一样。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这可恶的流行病必然会在城市和乡村蔓延，不断地把人的生命夺走，就连小心翼翼看护着的双手也挽留不住。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你的不幸不怪我，也不怪你自己，我的朋友”，那么这不也还是得不到什么慰藉吗。这每一件平常的事毕竟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更多得多的麻烦：有时她需要先探明原委好进行帮助，更经常的是无需追究，只要进行帮助就行：安慰安慰，振作她们的精神，找回她们的自尊，开导她们：‘别再哭了，只要止住哭，就会知道，真是没有什么可哭的。’

不过还是快乐多，快乐多得多！因为除了痛苦就都是快乐了，而痛苦只是个别的和少有的事：如今过了半年以后，你只是在为一个女工痛苦，同时却为所有其他的人而感到快慰，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又可以这个女工而感到快慰了。事业的日常的全部进程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使得韦拉·巴夫洛夫娜总是兴致勃勃的。而如果在进程中有时受到了痛苦的严重干扰，那么定会有特别的喜事来加以补偿的，而喜事还是比痛苦要多得多，比方说，把某个女工的年幼的弟弟或妹妹安置妥善了，第三年有两名女工通过了家庭教师资格的考试，这对于她们是多么幸运的事，还有过几件类似的喜事。而能引起整个工场的欢腾，使韦拉·巴夫洛夫娜感到快乐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举办婚礼。婚礼办得相当多，并且都很圆满，喜气洋洋的，婚礼前后多次举办晚会，新娘收到工场的女伴送来的各式各样带给人惊喜的礼品，还从储备金中提出钱来给新娘办嫁妆。不过这又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增添了多少麻烦啊，她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只是有一件事工场的人起初觉得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尽情理：第一个新娘请她做女方主婚人，没请动；第二个新娘又来请，还是没请动。而常做女方主婚人的是梅察洛娃或她的母亲——那也是个好的人。

韦拉·巴夫洛夫娜却从未做过主婚人，她只作为一个朋友，给新娘穿装打扮，伴送她上教堂。头一回，人们以为她不答应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其实不然。韦拉·巴夫洛夫娜乐意有这邀请，但是却不接受。第二回，大家才明白这完全是出于谦虚，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愿正式做新娘的保护人。况且一般来说，她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施加任何的影响，竭力把别人推向前台，叫别人出头露面，她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以致于许多到工场来订活的太太在

三名剪裁师中认不出她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向人家说明这整套制度都是由女工自己建立的，而且始终受到她们的支持时，深深感到，这才是她从工场中体验到的最大的乐事。她竭力用这些说明来使自己也相信那经常在她心里萦绕着的念头：工场缺了她也能运转，而且其他类似这样的工场自生自长也是有可能的。甚至根本无需裁缝以外的任何领导，凭着裁缝本身的思想才能就行，为什么不行呢？这该多好！比什么都好！这便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最珍爱的一个梦想。

五

自从工场建立以来，这样过了将近三年；如果从韦拉·巴夫洛夫娜出嫁的时候算起，那就超过三年了。这些年过得平静而又活跃，充满着祥和、欢乐，一切都那么顺遂如意。

韦拉·巴夫洛夫娜醒来以后，还久久地赖在床上。她喜欢懒懒地躺一躺，有点像打盹又不是打盹，而是在思量需要做什么。有时她就这样躺着，既不打盹，也不思量。不，她是在思量：“早晨赖在床上真舒坦，又温暖又软和！”她这么懒懒地躺着，直到她的丈夫，也就是她那“亲爱的”在“中立房间”——不，应该说在“中立房间”之一，现在他们已有两个“中立房间”，因为这已经是她出嫁后的第四年——里说道：“韦罗奇卡，醒了吗？”——“嗯，亲爱的。”这就是说丈夫可以动手烧茶（早茶由他来烧），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她在自己房里就不叫韦拉·巴夫洛夫娜了，而叫韦罗奇卡——要开始穿衣服啦。她穿了多长时间！不，她穿衣服倒快，一会儿就完，可是她洗浴的时间长，她喜欢洗浴，之后她又梳了半天头，不，其实她梳头的时间并不长，一会儿就梳好了，但是她久久地摆弄头发，因为她喜欢自己的头发。不过有时她也花工夫进行一项真正的化妆——穿鞋：她有些优质的鞋子。她衣装很朴素，却爱穿考究的鞋子——这是她的一大嗜好。

随后她出来喝茶，拥抱丈夫：“睡得怎么样，亲爱的？”她一边喝茶，一边跟他议论种种大事和琐事。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得叫韦罗奇卡：喝早茶时她也还是韦罗奇卡——与其说是喝茶，不如说是吃奶油，喝茶只不过是吃奶油的借口，一碗茶里一大半都是奶油，吃奶油也是她的一大嗜好。彼得堡难得有好奶油，韦罗奇卡却找到了真正优质的纯奶油。她梦想着自己有一头奶牛。那有什么，如果事业还照原先那样地顺利，再过一年就能办到。这时十点钟了。亲爱的要去教课或上班：他在一个工厂主的事务所供职。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她已经完全是韦拉·巴夫洛夫娜，直到第二天早上为止——都在忙活家务。她倒是有一名女仆，是个稚嫩的小姑娘，事事都需要指点才成，等她刚教会，又得调教新女仆来熟悉规矩了：女仆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家都待不长，总得嫁人，隔个半年或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你看吧，韦拉·巴夫洛夫娜又在给自己缝什么披肩或袖口，准备当女方的主婚人了。这时候她再也不能拒绝，“您怎么能拒绝呢，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样样事都亲自给我安排好了，除了您再也没合适的人啦。”的确，她为家务操了许多心。然后她要出去教课，她的课时相当多，每周十来个小时，课时

再多负担就太重了，而且也没工夫。上课前必须到工场待上一段时间，下课回来还得去看看。然后就跟“亲爱的”一块吃午饭。午饭时，常有客人来：一个，最多两个，再多可不成。即使有两个客人吃饭，已经需要多少地张罗张罗了，得添个菜才够吃。如果韦拉·巴夫洛夫娜回家时累了，午饭就更为简单。饭前她待在自己的房里休息，做成什么样子她不管，就照她当初安排好的那样做吧。要是她回家来还不累，厨房里就该忙碌起来了，她会给午饭添点什么饼干之类的——多半是就着奶油吃的，即可以成为吃奶油的借口的东西。午饭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又是讲，又是问，可是她讲的总比问的多。怎么能不讲讲呢？单就工场来说，该报告的新闻就有多少啊。吃完午饭，她还陪亲爱的坐上十五分钟左右，直到相互说“再见”，就各自回房了。韦拉·巴夫洛夫娜又倒在自己的小床上，看看书，懒懒地那么一躺，她时不时地还睡一觉，甚至经常睡，十天当中得有五天要睡，一睡就是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这是一种习惯，看来简直是一种恶习，但韦拉·巴夫洛夫娜饭后如能睡着的话，总是要睡的。她甚至乐意睡着，她对这个恶习的养成既不害臊，也不后悔。等她小睡或者懒懒地躺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她才起床穿衣，再去工场，在那儿一直待到喝晚茶的时候。如果晚上没有客人，喝茶时她就再给亲爱的讲讲，在“冲立房间”待半小时左右。然后说声“再见，亲爱的”，吻别后到次日早茶时再见面。现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干活、读书，有时她读得时间相当长，一读就是两个来小时，读书累了，弹弹琴来休息，钢琴摆在她的房里，不久前才买下的，原先只是租用。自己能买架钢琴也是件令人快慰的事，何况又便宜。那是架小的旧钢琴，埃拉尔牌，碰巧买上的，才花了一百卢布，修理费大约用去七十卢布。可是钢琴的音质确实很好。亲爱的偶然来听听唱歌，但只是偶然，他的工作太多了。到了晚上她也就是干活，读书，弹琴，唱歌，而主要是读书和唱歌，这是在没有客人的时候。可是晚上经常来客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比亲爱的年龄小，比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还小，其中也有工场的教员。他们很尊敬洛普霍夫，把他看作彼得堡的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或许，他们没看错，他们和洛普霍夫交往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吧：他们认为与洛普霍夫谈话自己获益匪浅。他们对韦拉·巴夫洛夫娜怀着无限的崇拜心情，她甚至让他们吻她的手，而且也不感到屈辱，她与他们在一起时，表现得好像比他们年长了十五岁，就是说，这是在她矜持正经时的态度，但是她确实难得矜持正经，她爱跟他们一起跑来跑去，嬉戏打闹，他们开心极了，她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跳加洛泼舞和华尔兹舞，一次又一次撒欢乱跑，无数次地弹钢琴，无数次地聊天，开怀大笑，而最多的恐怕还是唱歌。可是这一切活动，乱跑也好，大笑也好，丝毫不影响这些年轻人对韦拉·巴夫洛夫娜满怀着的无条件的、无限的崇拜的心情。他们尊敬她完全就像尊敬自己的大姐姐，就连做母亲的，哪怕是一位好母亲，也未必能总受到这样的尊敬。不过唱歌倒是聪明正经的活动，虽然有时也避免不了胡闹一阵。但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唱起歌来多半挺严肃，不唱歌只弹琴有时也挺严肃的，每逢那时听众都悄然静坐。年岁大些或跟洛普霍夫夫妇相仿的客人也不很少见，大部分是洛普霍夫的老同学或他的老同学的熟人，两三个青年教授，他们差不多都没有家室，几乎只有梅察洛夫夫妇例外。洛普霍夫夫妇不常出去做客，几乎只去梅察洛夫家和梅察洛娃的父母家。这两位善良淳朴的老人有好几个儿子，他们都在不同的衙门里任相当高的官职，因此韦拉·巴夫洛夫娜能在这两位生活颇为优裕的老人家见到人们的各种各样的、形形

色色的圈子。

韦拉·巴夫洛夫娜很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积极进取的生活，何况还能有几分享受：在温暖柔软的小床上懒懒地躺一躺，品尝品尝奶油和带奶油的烤制品。

世界上还有没有更好的生活了呢？韦拉·巴夫洛夫娜还没觉得有更好的生活。

在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时期的年轻人看来，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如果生活能够像现在的少数人、将来的一切人那样合理地安排，那么生活还会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好的。

六

快到夏末的一个星期天，女工们照例准备进行一次郊游，夏天她们差不多每个假日都要坐船到岛上去玩。韦拉·巴夫洛夫娜通常是跟她们一道去的，这一回连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也去，因此郊游更是非同一般：他很少跟她们结伴出游。那个夏天在他仅仅是第二次。工场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很高兴：韦拉·巴夫洛夫娜比哪次出游都快活，可以预料，郊游的人们兴致将格外高。有几个人星期天本来另有打算，结果也改变了计划，加入了准备出游的队伍。他们原先想租用四条船，现在需要再多加一条，还是嫌少，又租了第六条。这一行有五十人或者五十多个人：二十几名裁缝（只有六名裁缝没参加郊游）；三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和十来个孩子——裁缝的母亲和弟妹；三个小伙子——女裁缝的未婚夫，一个是钟表匠的徒弟，另一个是小商人，这两人的风度并不比第三个、一位县立学校教员逊色多少；还有五个身份各异的年轻人，其中竟然还有两名军官；此外是八名大学生和医学院学生。他们随身带了四只大茶炊、整堆整堆的各类面包、大批的冷冻小牛肉以及诸如此类：年轻人，活动多，又是在户外，可以想见到胃口差不了。

还带了六七瓶酒，五十人喝似乎不算多，况且其中有十五个以上的小伙子。

这次郊游确实办得圆满极了。真是样样俱全：有一次跳舞的有十六对，另一次仅只十二对，可是后来又增至十八对，有一场卡德里尔舞竟达到二十对。他们玩“逮人”游戏，参加者差不多有二十二对之多。他们还临时在树木之间搭了三架秋千。休息时他们喝茶，吃东西。有半时光景——不，没有，远远没有半小时——这一伙当中大概有一半竟然听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和两名大学生争论去了，在所有比他年轻的朋友中，这两名大学生是他最主要的朋友。他们彼此挑出个人身上的毛病：不彻底性啦、温和主义啦、资产阶级性啦。这是他们彼此间的指责，包括他们又给挑出了个人特有的毛病。一名大学生的毛病是浪漫主义，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是公式主义，另一名大学生是严肃主义。自然，这样的探讨苦超过五分钟，局外人是很难忍受的，即便其中的一个论争者，那位浪漫派，也没到一个半小时便忍受不住，逃往跳舞的人群中去了，不过他逃得还算体面。他气愤地骂一个温和派，大概也是在骂我呐，虽然我并不在场。他知道他发怒的对象年龄已经不小，所以高

声说：“你们干吗要谈他？我给你们引用一句几天前一个正派人——一位很聪明的妇女对我讲的话，她说：人只有在二十五岁前才能保持诚实的思维方式。”“我知道那位太太是谁，”活该浪漫派倒霉，正巧有个军官走近争论的人们，说道，“是N太太；她当着我的面也讲过这话。她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妇女，不过有人刚刚揭穿了她，说半小时前她还自夸是二十六岁呢，你记得她跟大伙笑了多久吗？”这时四个人都大笑起来，浪漫派便哈哈笑着跑掉了。军官代替他参加了争论，于是他们比原先闹得更欢啦，一直闹到喝茶的时候。军官比浪漫派更无情地揭露严肃派和公式派，同时他的孔德主义也遭到了有力的揭发。喝完茶后，军官宣布，目前他还处在具有诚实思维方式的年龄，他愿意加入同龄人的圈子。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学他的样子，严肃派也身不由己地模仿起来，他们并没跳舞，却玩起了“这人”游戏来。而当男子们心血来潮，想去赛跑、跳沟和摔跤的时候，三位思想家又表现出自己是男子运动的最热心的参赛者：军官得了跳沟冠军；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很有力气，但被军官扳倒后火冒三丈，他本来希望在这场竞赛中屈居严肃派之下而名列第二。严肃派顺顺当当地便把军官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一并举到空中又放回地面。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或军官并没为此而恼怒，因为严肃派已是公认的大力士，但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无论如何不愿给自己留下这样的耻辱，让人家说他“摔不过一个军官”。他跟军官较量了五次，五次全给撂倒了，虽然军官也颇费了一番力气。第六次较量以后，他俩都已筋疲力尽，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承认了自己确实是最弱的一个。三位思想家躺在草地上，继续争论。现在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已变成孔德派了，军官倒成了公式派，不过严肃派依然是严肃派。

孔德（一七九八—一八五七），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倡导利他主义伦理观。孔德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俄国民主青年中较有影响。

十一点钟他们启程回家。老太太和孩子们在船上就都睡着了；幸亏准备了大批暖和的衣服。可是其余的人还在不停地谈论，所有六条船上，大家一直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七

过了两天，韦拉·巴夫洛夫娜喝早茶的时候对丈夫说，她觉得他的脸色很难看。他回答说，的确，他头天夜里睡得不太好，从傍晚起就觉得不舒服，不过没什么关系，就是在郊游中——当然是赛跑和摔跤以后躺在地上的时间长了——得了感冒。他责备自己不在意，但是又劝韦拉·巴夫洛夫娜相信这不算什么病。他照常上班。喝晚茶时他说他似乎全好了，可第二天早晨又说他需要在家休息几日。韦拉·巴夫洛夫娜昨天就已忧心忡忡了，现在更是惶恐不安，她要求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请医生。“我自己就是医生呀，必要时，我自己也会治。现在用不着。”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推托道。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非叫他请不可，他就给基尔萨诺夫写了一张字条，说，病倒没什么，他请他来只是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

因此基尔萨诺夫并不着急，他在医院里待到了吃午饭才走，来洛普霍夫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哎，亚历山大，我还是该叫你的，”洛普霍夫说，“没危险，以后也不致于会有，不过我得了肺炎。当然，不找你，我也能治好，但还是请你来看看好。我不能不这样，免得心不安，我可不像你这单身汉啦。”

他们长久地互相摸着对方的两肋，基尔萨诺夫又听了听胸部，两人都认为洛普霍夫说得不错：没危险，以后也不致于有，可是肺炎不轻，必须躺它个把星期。洛普霍夫耽误了一点自己的病，可是还不要紧。

基尔萨诺夫只好跟韦拉·巴夫洛夫娜长谈了一次，叫她放心。她总算完全相信，他们并没骗她，他的病情大概不仅不危险，并且也不算重。但也只是“大概”而已，哪有那么多绝对有把握的事？

从此基尔萨诺夫每天来看病人两次，他俩都明白这病很普通，并不危险。第四天早晨基尔萨诺夫对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德米特里没有什么，他挺好。还有三四天不大好受，但是不会比昨天更难过，以后就会逐渐复原了。可是关于您自己，韦拉·巴夫洛夫娜，我想跟您认真谈谈。您这样做很糟糕：为什么天天夜里不睡觉？他完全不需要看护，其实也用不着我。您会损害自己的健康的，这完全没必要，现在您的神经就已经相当病态了。”

他开导韦拉·巴夫洛夫娜好久，可是无济于事。她总是说“决不成”、“无论如何不行”和“我自己倒乐意，但是做不到”，就是说，要她夜里去睡觉，把丈夫扔下不管，她做不到，最后，她又说：“您对我讲的这些，他早都对我讲过，而且讲过不止一次，您本来也知道。我要是听您的，当然不如听他的了，这说明我实在做不到。”

面对着这样的理由，无可争辩。基尔萨诺夫摇摇头，走了。

他晚上九点多来看病人，跟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起在病人身边待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说：“现在您去休息，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俩请求您。我留在这儿过夜。”

韦拉·巴夫洛夫娜觉得不好意思：她自己多少明白点，或者相当清楚地知道，整夜守着病人好像没有必要，而她却要强使基尔萨诺夫这位忙人浪费时间。实际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的，好像用不着吧？……“好像”，谁知道呢？不，不能把亲爱的一个人扔下，可能发生的事少不了。是啊，他总会觉得口渴，也许想喝点儿茶，可是他太明理知趣，不会去叫醒别人，所以就不得不有个人守着他。但是基尔萨诺夫无需留下，她不答应。她说她离不开，因为不太累，她白天休息得多。

“那么就请原谅我吧，我还是求您走，坚决求您走。”

基尔萨诺夫抓住她的手，差不多是强行拉她回她的房里去了。

“我在你面前真是不好意思，亚历山大，”病人说道，“你在扮演一个多么可笑的角色，你整夜守着个病人，而他的病情根本不需要你这样。可是我很感激你，因为我没法说服她请个看护，既然她不放心让我一人留下，那她把我托给谁都不会放心的。”

“托谁照顾你，她都放心不下，我要是没有看出这一点，当然就不会来这里受苦受累了。不过现在我希望她能睡好，因为我是医生，又是你的朋友。”

真的，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走到床边，倒头便睡着了。光是三夜不睡还不要紧，光是忧虑也不要紧。但是忧虑再加上几夜不合眼，白天又完全不

休息，那可确实很危险。

若再有两三个昼夜不睡觉，她一定会比丈夫病得更厉害。

基尔萨诺夫还跟病人一起过了三夜。他倒是没受什么累，这当然是由于他看护时满不在乎地睡大觉的缘故，为了防备韦拉看到他这样的满不在乎，他锁上了房门值夜。她也怀疑他值夜时睡觉，可她还是挺放心：要知道他是医生，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睡，什么时候不能睡。她为自己先前总放心不下、总打扰他而感到过意不去。现在他已经不再听她下保证：说什么即使他不在这儿她也一定睡觉。他说：“您有错，韦拉·巴夫洛夫娜，因此您该受罚。我不能相信您。”

但是过了四天，她已经看到病人几乎不再是病人，她那不相信人的错误太明显了：这天晚上他们三个一同玩牌，洛普霍夫已经能半坐起来，而不用躺着了，他说话时嗓子也好起来了。基尔萨诺夫可以停止在睡眠中值夜班了；他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您为什么完全忘了我，偏偏忘了我？您跟德米特里还是挺好，他常到您那儿去。可是您在他生病以前好像有半年没来我们家，真是好久没来了。

您记得吧，当初我跟您不是也挺要好的吗！”

“人都在变化，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也在拼命工作，这是我可以自夸的。我差不多谁家里也不去，没工夫，又懒。我在医院和医学院从九点干到五点，疲劳极了，回去以后，脱下制服，就换睡袍，一点劲都没了；我感到再走动一步也不可能了。友谊固然温馨，可请别生气，穿着睡袍，倒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要更温馨呐。”

确实，基尔萨诺夫已经有两年多几乎完全不来洛普霍夫家。读者在他们家的常客中看不到他的名字，就是在稀客中，他也早已成为十分罕见的人物了。

八

敏感的男读者——我只向男读者做解释，女读者聪明过人，从不以其心智悟性自诩而惹人生厌，因此我不向她们解释，我说到做到。男读者中间也有不少并不愚蠢的人，我也不向这些男读者做解释。但大多数男读者，几乎包括所有的文学家和末流文人在内，都是敏感的人，我永远乐意跟他们谈天。这样，敏感的男读者会说：我知道故事正在朝哪儿发展，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生活里，一个新的浪漫故事就要开场了，基尔萨诺夫将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我还知道得更多呐：基尔萨诺夫早就爱上韦拉·巴夫洛夫娜，所以他才中止去洛普霍夫家。啊，你多机灵，敏感的男读者，只要对你说点什么，你马上会表示：“这我知道了，”然后再夸耀一番你的敏感。我佩服你啦，敏感的男读者。

于是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经历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如果他还未被描写过的话，那是需要来描写描写的。当我讲到洛普霍夫的时候，我很难把他和他的密友分开谈，我几乎不能说出他身上有哪一点，是在谈基尔萨诺

夫时不需要重复提的。敏感的读者从下述基尔萨诺夫特征表上了解到的，都是洛普霍夫的特征的重复。洛普霍夫的父亲是个小市民，在他本阶层中还算富裕，就是说，他常有肉汤喝。基尔萨诺夫的父亲是个县法院的文书，也就是本该经常喝不上肉汤，事实上反而常有肉汤喝的人。洛普霍夫从少年时代，几乎从童年时代起就靠自己谋生了。基尔萨诺夫从十二岁起帮助父亲誊写公文，他也是从中学四年级起便开始当家教。他俩没有门子，没有熟人，凭着个人的奋斗给自己开拓了未来的道路。洛普霍夫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们在中学没有学好法语，德语也只学会了 der, die, das 的变化，还杜绝不了小错误。可是洛普霍夫进了医学院以后，很快便看出光懂俄语无法在科学上发展，于是他买了一部法语词典和碰巧见到的法文书和《忒勒马科斯》、冉莉斯夫人的中篇小说，以及我国出版的几期内容高深的杂志《RueEtrangere》，尽管这些书并不吸引人，他还是买了回来，而他自然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于是他对自己说：“在我还不能够自如地阅读法文书的时候，我决不打开任何一本俄文书；”不久他就能自如地阅读了。他学德语的方法可不同：他在有许多德国工匠居住的一套房子里租了一个小角落，那儿住处条件恶劣，德国人枯燥乏味，离医学院又远，但他还是根据需要在哪儿坚持住了下去。基尔萨诺夫却不同，他是依照附有词汇表的各种书本来学德语的，就像洛普霍夫学法语一样，而他学会法语用的却是别种方法：就靠一本连词汇表都没有附的书——他很熟悉的《福音书》来学的。他弄到一部《新约》的日内瓦译本，把它读了八遍，到第九遍就全都领悟了，这表示他已学成。洛普霍夫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这样的：有一天他身穿破制服途经石岛大街（他刚教完课，教一次课收费五十戈比。地点在离皇村学校约三俄里地）。一个正在散步的、派头十足的人朝他迎面过来，他照直朝洛普霍夫走去，不肯让路，以显示其十足的派头。那时洛普霍夫有个习惯：除了妇女之外，他决不首先给任何人让路。他俩的肩膀互相碰了一下，那人侧过身子，骂道：“你这蠢猪，畜生！”他还准备继续骂下去，可洛普霍夫却朝着那人转过身来，一把抱住他，小心翼翼地将他放进了沟里，然后站在沟的上边，对他说：“你别动，不然我就把你拖到前面更深的泥浆里去。”两个庄稼汉走过，瞧了瞧，夸了几句。一个当官的走过，瞧了瞧，没说话，却会心地微笑了。几辆马车经过，车上没有人探出头来瞧，因为他们看不见有人躺在沟里。洛普霍夫站了会儿，又拉起那人，这回是抓手而不是抱他，把他拉到马路上，说：“哎呀，先生，您怎么摔啦？希望您没有摔伤吧？我可以替您擦擦吗？”一个庄稼汉走过，帮着擦起来；两个小市民走过也帮着擦起来，他们把那人擦干净以后，便离开了。基尔萨诺夫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倒发生过另一桩事。一位惯于差遣别人干事的太太，突发奇想要给他那信奉伏尔泰的丈夫遗留下的藏书编份目录，丈夫是二十年前去世的。为什么偏偏过了二十年以后才需要编目，这就不得而知了。基尔萨诺夫是偶然碰上编目这差事的，可以得八十卢布的报酬，他干了一个半月。可那位太太又突发奇想，觉得不需要编目录了，她走进藏书室，说道：“您不必再费心，我改主意了。这是给您的酬金，”他付给基尔萨诺夫十卢布。“XX 夫人，”他称呼了那位太太的封号，说，“我已经编了一大半：总共十七柜书，我登记了十柜。”——“您认为我在钱上亏待了您吗？Nicolas，过来跟这位先生理论理论。”Nicolas 跑了进来。“你怎么敢冲撞我 Maman？”——“你这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从基尔萨诺夫方面说，这句话站不住脚：Nicolas 还比他大五岁左右呢，“你

得先把话听完呀。”——“来人！”Nicolas 喊道。——“哟，人呢？‘快来人’，我就让你瞧瞧！”话音没落地，太太一声尖叫，昏了过去，Nicolas 明白过来，他的两只手臂已经被基尔萨诺夫的右臂紧紧地夹在两肋，仿佛给铁箍箍住了似的，动弹不了。基尔萨诺夫用左手揪了揪他的头发，又掐住他的脖子，说道：“你瞧，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你掐死，”于是捏捏他的脖子。Nicolas 也明白掐死他确实不用费力，后来基尔萨诺夫的左手松开了点，让他可以呼吸，不过还是在捏着他的脖子。基尔萨诺夫又转向那些涌到门口的一彪形大汉，说：“站住！不然我就掐死他。让开！不然我就掐死他。”Nicolas 一下子就都领悟了，而且频频点头表示对方不是凭空说的。“老弟，现在你送我到楼梯口去，”基尔萨诺夫又转向 Nicolas 说道，他仍旧搂着 Nicolas，走出前室，下了楼梯，彪形大汉们远远地用佩服的眼光目送他离去。到了最后一级楼梯，他才放开 Nicolas 的脖子，把 Nicolas 推到一旁，自己去一家小铺买了一顶制帽，他原来那一顶已经成为 Nicolas 的战利品了。

冉莉斯夫人（一七四六—一八三〇），法国作家。

《外国评论》，一八三二至一八六三年间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法文刊物。

法语：尼古拉。

那么，你们说说，这些人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一切显著特点都不是个人的特点，而是一种典型的特点，这种典型跟你，敏感的男读者，所见惯的典型大不相同，其个人的差异都被其共同特征掩盖了。这些人置身于其他人当中，好比几个欧洲人置身于中国人当中，中国人看不出欧洲人彼此之间的区别，只看到一点；欧洲人全是“不知礼仪的红毛鬼子”。在中国人眼里，法国人也跟英国人一样，是“红毛”。中国人颇有道理，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一切欧洲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欧洲人，不是具体的个人，只是一种典型的代表。他们全都一样，不吃蟑螂和海蛆，不把人大卸八块，全都一样地喝伏特卡和葡萄酒，而不喝大米酒，甚至中国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唯一的与自己接近的习惯——喝茶，他们也完全不像中国人那样喝法：他们在茶里放糖，而不是光喝茶。同样，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所属的那种典型的人们在别种典型的人们看来也是一模一样。他们每个人都很勇敢，不动摇，不退缩，能够承担工作，只要承担下来，就会牢牢地抓住不放，使它不致从手中滑落；这是他们的特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每个人都诚实得无懈可击，以致于您脑子里根本不会出现“这个人能不能凡事绝对靠得住？”的问题。这是明明白白的，正像他用胸膛呼吸一样。当这胸膛还在呼吸的时候，它是火热的、忠实的，您尽可大胆地把您的头搁在上面，那是可以得到休息的。这些共同的特点过于突出了，以致于一切个人的特点都不那么明显了。

这种典型在我国产生不久，早先只有作为它的先声的个别人物。他们还是很特殊的人物，既然特殊，就不免感到自己孤独无力，因此他们无所作为，或灰心失望，或激情满怀，沉湎于幻想之中，就是说，他们还不可能具备这种典型的主要特点：冷静的务实的作风、稳健的、深思熟虑过的行动、积极而审慎的态度。他们虽然在天性上也属那一类的人却还没有发展成为这种典型，它，这种典型是不久前才产生的。在我的时代还不曾有过，尽管我并不很老，根本连老人也算不上。我自己未能成为这样的典型，我不是生长在这个时代。正因为我自己不是这种典型，我才能心安理得地表示我对它的敬意。

遗憾的是，当我谈论这些人、这些优秀人物时，我却不是在赞扬我自

己。

这种典型诞生不久，可是繁衍挺快。它是时代的产物，它体现时代的特征，不必说，它也将随着自己的时代，一个不长的时代，一同消逝。它那诞生不久的生命注定不会长寿。六年前 还见不到这些人，三年前他们还不为人看重，现在……但是现在无论人家对他们看法如何都没有关系。过几年，稍微过几年，一定会向他们恳求：“救救我们吧！”他们谈论的事情将由所有的人去完成。再过几年（也许不是几年，而是几个月），大家又要咒骂他们，他们在嘘声中受尽侮辱，然后被赶下舞台。好的，你们嘘他们，侮辱他们吧，轰赶和咒骂他们吧，你们从他们那儿却受益匪浅，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他们将在嘘声和雷鸣般的诅咒声中退出舞台，不卑不亢，不软不硬，一如既往。他们不再留在舞台上了吗？是的。没有他们会怎么样呢？糟糕！但是他们出现过以后毕竟要比没出现时好些。过几年，人们会说：“他们出现过以后是好些了，可还是不行。”一旦这么说，那就表示这种典型再度出现的时候到了。它再度出现时，人数将更多，形式将更完美，因为那时好人好事将更多，一切将好上加好，于是同一段历史又以新的形态重演，这样一直发展到人们说“啊，现在我们觉得好了”的时候为止。那时这种典型不再是个别的了，因为人人都属于这种典型了，他们将难以理解：怎么会有过那样的时代？——这种典型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典型，却不是一切人的共性！

即一八五七年。

九

欧洲人置身中国人当中，面貌和举止都是一个模样，这仅只对中国人而言，其实欧洲人之间的区别，远非中国人之间的区别所能相比。同样，在这个看似单一的典型中，由个性不同演变而来的差异，要比所有其余各种典型相互间的一切差异更多，也更明显。

这儿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什么享乐主义者、禁欲主义者啦，什么严厉的、温柔的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正如欧洲人在中国人看来，最残酷的也显得很宽厚，最胆小的也显得很勇敢，最淫荡的也显得很德行，那么他们当中最清心寡欲的认为一个人需要的享乐，比属于其他典型的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而他们当中性欲最强烈的在遵守道德法规方面，也比属于其他典型的道学家还要严格。他们似乎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设想这一切的：他们对道德、享乐、肉欲和善行的理解，有着一套特别的标准，他们大家的标准是一致的，不但他们大家一致，连这一切的本身似乎也是和谐统一的，因此，在他们看来，道德、安乐、善行和肉欲——这一切仿佛成了同样的东西。但这仍然只是就中国人的观念而言，在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却发现由于性格的差异彼此的观点大不相同。那么，现在怎样能看出他们彼此性格和观念上的这些差异呢？

欧洲人在交谈事务的时候，能表现出他们之间性格的差别，不过只是他们之间谈，不是跟中国人谈。同样，如果属于这种典型的人们相互之间发生事务联系的话，他们分明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只是他们相互之间发生

事务联系，并非他们跟外人之间。我们已经看到两个这种典型的人：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洛普霍夫，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确立起来的。现在又插进了第三者。我们就来看看，当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有可能与另外的两个人进行比较的时候，他们之间会显出一些什么差异来。韦拉·巴夫洛夫娜看见自己面前的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早先她没有选择的可能，现在却有了。

十

不过我还需要三言两语说一说基尔萨诺夫外貌的特征。

他容貌端正漂亮，如同洛普霍夫。有人认为洛普霍夫更漂亮，有人认
为他更漂亮。

洛普霍夫长得较黑，深栗色的头发，两只炯炯有神的、深棕色的、看上去几乎是乌黑闪亮的眼睛，鹰钩鼻子，厚嘴唇，略显椭圆形的脸盘。基尔萨诺夫长着褐色的头发，深蓝的眼睛，笔直的希腊型鼻子，小嘴，脸盘长方形、白得显眼。他俩身材都相当高，而且很匀称。洛普霍夫的骨骼略微大些，基尔萨诺夫更高一些。

基尔萨诺夫的外部条件相当好。他已经当上教授。本来大多数评委都反对他，不仅不给他教授职称，甚至毕业时不授予他博士学位，但是他们不授予又不行。从前教过他的两三位青年教授和一位不算年轻的教授都是他的朋友，朋友们早就对其余的人多次说过，仿佛世上有个叫韦尔霍夫的，他住柏林；有个叫克劳德·贝尔纳的，他住巴黎；还有几个一时想不起姓名来的类似人物，也是住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里。而这韦尔霍夫、克劳德·贝尔纳等等仿佛都是医学界的泰斗呢。这绝对都是不实之词，因为我们知道医学界的泰斗是保尔哈威、胡菲兰德；哈维也是一位大科学家，他发现了血液循环；还有勤纳，他教会人种牛痘。我们都知道他们，却不知道这些韦尔霍夫、克劳德·贝尔纳们，他们算是什么泰斗呀？只有天晓得了。正是这个克劳德·贝尔纳怀着敬意评价了基尔萨诺夫的著作，那时他还没毕业呢。评委们不评不行了，就授予了基尔萨诺夫博士学位，过了一年半左右，又给了他教授职称。学生们说，他一来，好教授的营垒明显加强了。他没有开诊行医，他说他放弃了实用医学。不过他常去医院，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有些日子在医院吃午饭，有时还留下来过夜。他在那儿干什么呢？他说他工作是为科学，不是为病人：“我不治病，只是观察和试验。”学生们证实了这一点，还补充说，今天只有庸医才给人治病，因为今天还无法治病。勤杂工们的看法却不同：“嘿，基尔萨诺夫把这个病人弄到自己的病房里去了，可见这病不好治呐。”他们互相谈论着，然后又对病人说：“你可有救了，很少有什么病这位医生对付不了的。他可是位高手啊。再说，他对你就像对亲生儿子一样。”

韦尔肖夫和克劳德·贝尔纳分别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代的法、德医学巨匠。

这四人分别为荷、德、英国名医。

十一

韦拉·巴夫洛夫娜结婚初期，基尔萨诺夫常来洛普霍夫家，几乎隔天来一次，说得更贴切些，差不多天天来，并且神速——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跟韦拉·巴夫洛夫娜特别要好了，好得就像跟洛普霍夫本人一样了。这样持续了有半年光景。有一次，三人都在座：他和他们夫妇俩。谈话像往常一样进行着，毫不客气。基尔萨诺夫讲得最多，可是他突然沉默起来。

“你怎么啦，亚历山大？”

“您干吗停下不说了，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

“不知为什么，觉得烦。”

“您还很少这样的，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要是没原因，我甚至永远不会烦的。”基尔萨诺夫用一种不自然的声调说道。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了，比往常走得早些，跟往常一样，随随便便地道了声再见。

过了两天左右，洛普霍夫对韦拉·巴夫洛夫娜说，他顺便去看过基尔萨诺夫，他觉得见面的情况相当怪异。基尔萨诺夫仿佛要对他客气起来，这在他们之间完全是多余的。

洛普霍夫瞧了瞧他，直截了当地说：

“亚历山大，你在生气。生谁的气？是生我的气吗？”

“不”

“是韦罗奇卡？”

“不”

“那么你到底是怎么了？”

“不，没什么。你干吗这样看？”

“你今天对我不好，你不自然，太客气了，看得出来，你是在生气。”

基尔萨诺夫开始极力地担保说，他一点也没有生气，而这恰恰确凿地表明他是在生气呐。后来他大概也觉得不好意思，他的态度才变得好些、自然些，正常起来了。洛普霍夫趁着他恢复了理智的时候，重又问道：

“喂，亚历山大，你说说，你到底为什么生气？”

“我没有想要生气。”他又令人厌恶的装模作样起来。

多么叫人费解啊？洛普霍夫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地方会得罪他，而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一向互相尊重，彼此友情甚笃。韦拉·巴夫洛夫娜也极力回想，是不是她有什么不检点，得罪了他，可她同样也想不出来，与丈夫的理由一样，她知道从她那方面也是不可能的。

又过了两天，已经连续四天没上洛普霍夫家了，在基尔萨诺夫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韦拉·巴夫洛夫娜甚至想到：他是不是病了？洛普霍夫去了一趟，看看他是否确实得了病。哪有什么病！他还在生气呐。洛普霍夫死乞白赖地盘问他。他支支吾吾了好半天，才开始胡扯起来，扯到自己对洛普霍夫和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感情，说他十分敬爱他俩。他按理应得出结论说：他们对他并不关心，可糟糕的是他没提，在他那番咬文嚼字的谈话里竟连这

样的一点暗示也没有。这位先生显然是有委屈要发泄。在洛普霍夫心目中的优秀人物基尔萨诺夫身上的这种表现，未免太不尽情理了，因此客人对主人说道：“听我说，你我本是朋友，你这样做，难道不觉得难为情吗！”基尔萨诺夫装得很有涵养的样子回答道，这从他那方面讲也许确实是计较小事，不过假如他受了许多委屈，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么到底是什么委屈？”他开始列举最近使他受辱的许多事例，全是诸如此类的：“你说一个人头发颜色越钱就越近乎平庸。韦拉·巴夫洛夫娜说现在茶叶涨价了。这是针对我的头发颜色说的讽刺话。这也是在暗示我把你们吃穷了。”洛普霍夫无可奈何；此人的自尊心强得有悖于情理了，或者说得确切些，他简直成了一个胡涂的庸人。

洛普霍夫回家的时候甚至挺伤心：他看到自己所挚爱的人身上的这一面，感到很痛苦。当韦拉·巴夫洛夫娜问起他了解的情况时，他伤感地回答说，这件事最好别再提了、基尔萨诺夫讲了些叫人不快的蠢话，他恐怕是病了。

过了三四天，基尔萨诺夫大概回过味了，知道他的怪话是多么庸俗不堪了。他来到洛普霍夫家，态度挺好，后来竟还谈论起了自己的庸俗。他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言谈中发现，她并未从丈夫那儿听到他的那些蠢话，他衷心感激洛普霍夫能大事化小，便自动地把一切都告诉了韦拉·巴夫洛夫娜，以此对自己进行惩罚，他感动得道了歉，还说当时他病了。然而结果又搞得一团糟。韦拉·巴夫洛夫娜试着劝他不要再谈这些，说这是小事。他却紧抠住“小事”这字眼，又像跟洛普霍夫交谈时那样俗里俗气，扯起小事没完：他很委婉、很巧妙地加以发挥，说这当然是“小事”，因为他深知自己在洛普霍夫夫妇心目中的地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他也不配得到他们的更多的注意，等等。所有这些话都说得很隐晦，很巧妙，是用最客气的充满敬意和忠诚的词句暗示出来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也跟先前她丈夫一样无可奈何了。他离开之后，他们才记起在他明显地变俗气以前好几天，他就有些怪异了。当时他们没有察觉，也不理解，现在，早先的这些怪话总算弄明白了，其实与现在的味道一个样，不过不那么明显罢了。

此后基尔萨诺夫倒也常来，但是原先那种单纯的关系已难以维持了。从一个正派人的面具后边伸出了那么长的一只驴耳朵，而且为时好几天，洛普霍夫夫妇对这位往昔的朋友的敬意几乎丧失殆尽了，即使这只耳朵能永远藏匿起来也无济于事，何况它时不时地还要露出来。虽然露得不那么多，并且急急忙忙就缩回去了，但毕竟是猥琐的、丑陋的、庸俗的。

不久，他们对基尔萨诺夫果然冷淡下来，而他确实也有错误，无法叫洛普霍夫夫妇欢迎他了，于是他不再上他们家了。

可是他在一些熟人家中碰到过洛普霍夫。过了些时候洛普霍夫对他的厌恶淡薄了：他还不错，还算正常。洛普霍夫开始去看望他。过了一年，他甚至重又来洛普霍夫家串门了，他依旧是原先那个出色的基尔萨诺夫了，还是那么单纯正直。但是他来得次数很少，显然是因为他不堪回首自己那段愚蠢的往事。洛普霍夫几乎忘记了这段故事，韦拉·巴夫洛夫娜也忘了。可是一度破裂的关系并没有恢复。表面上他和洛普霍夫仍然是朋友，而且洛普霍夫确实一如既往地敬重他，时常去他家里。韦拉·巴夫洛夫娜原先对他的好感也有所恢复，不过她很少碰到他。

十二

现在，洛普霍夫的病——还不如说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对丈夫的过分疼爱——却迫使基尔萨诺夫天天来洛普霍夫家，交往十分密切，这前后有一个星期之久。他懂得，当他为了抢着替韦拉·巴夫洛夫娜值班而决定和他们共度几个夜晚时起，他就踏上了一条对自己危险的道路。将近三年前，当他在自己心中发现了爱情的征兆以后，他倒能够坚决采取一切必要的办法制止它的发展，他为此而高兴过，自豪过。他觉得这样做的结果很好。当时有两三个星期，他心心念念着洛普霍夫家。不过即使在那段时期，他因意识到自己在斗争中的坚定性而获得的快乐，仍然大于失魂落魄的痛苦。过了一个月，痛苦完全消失了，就只剩下了对自己的正直态度的满足感了。他的内心是那么恬静，那么安溢啊。

现在的危险却比当时大。这三年，韦拉·巴夫洛夫娜在精神上当然成熟了许多。那时候她还是个半大孩子，可今非昔比，现在她所唤起的感情已不再像一个人对于自己喜欢同时又能逗乐的小姑娘那种开玩笑似的眷恋感情了。她不但精神上成熟了：如果说成年女子的美才是真正的美的话，那么，我们北方的成年女子更是永存美丽不减色，一年胜似一年。的确，这个岁数中的三年生活，会使人在灵魂里、眼睛中、面貌和整个人身上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成熟起来，只要这个人美好的，他的生活也会是美好的。

危险挺大，但仅仅对他基尔萨诺夫来说才有危险。对韦拉·巴夫洛夫娜有什么危险呢？她爱她的丈夫。基尔萨诺夫不至于浅薄和愚蠢到认为自己是洛普霍夫的危险的情敌，他并非出于一种假谦虚才不这么想。因为但凡认识他和洛普霍夫的正派人，都把他們同等看待。而在洛好霍夫方面却已有着一个无法估量的优势：他已经赢得她的爱，是的，他赢得了她的爱，他已经完全占有了她的心。她业已作出了选择，而且对这选择感到很满意、很幸福，她不可能有寻找一个更好的丈夫的想法。难道她还觉得不好吗？就是想到这一点都是可笑的。为她和洛普霍夫担心，这不过是来自基尔萨诺夫方面的荒唐的虚荣心作祟罢了。

那么，难道由于害怕造成一个荒谬绝伦的误会，为了不叫基尔萨诺夫泛问一个月，最多两个月——难道由于害怕误会，就让一个妇女心烦意乱，每夜守在病床旁边，冒着害重病的危险吗？难道为了使自己的平额生活免受短暂的小干扰，就让另一个同样可敬的人受到严重的损害吗？这未免不正派，而不正派的行为，比那场其实并不艰苦的自我斗争更令人难受得多，他必须坚持这场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他对自己的坚定性感到自满自足，这是没有疑问的。

基尔萨诺夫这样思考着，他决心赶走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叫她担任不必要的值夜班。

需要值夜的时期过去了。为了合乎情理，不因突然断绝往来而引人注目，最近基尔萨诺夫还需去看望洛普霍夫夫妇两三次，以后隔周去一次，再后隔月，再后就隔半年了。

然后便可推说工作太忙，使这种疏远具有充分的理由。

十三

基尔萨诺夫的一切都像他料想的那么顺利。旧情复萌，而且较前更为炽烈；不过他与这种感情作斗争时无需经受任何炼狱式的折磨，还是挺轻松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病愈后的一周当中，基尔萨诺夫这已经是第二次来访了，他将坐到九点钟左右，足矣，也合情合理。下一回他要过两周再来，也就差不多实现了预期的结果。现在却必须再坐个把钟头。本周内他已把激情的发展抑制了一半，再过一个月，一切就都会过去了。他很满意。他无拘无束地进行谈话，竟为自己的成功而窃喜，他自鸣得意起来，随之变得越发无拘无束了。

洛普霍夫头一次出门订在明天，因此韦拉·巴夫洛夫娜心情特别对，她似乎比病愈者本人更高兴，并且确实更高兴。他们谈到这次生病，对病很不以为然，用戏谑的口吻称赞韦拉·巴夫洛夫娜作为妻子的自我牺牲的美德，她为那不值得担忧的事而担忧，几乎搞垮了自己的身体。

“你们笑话我吧，笑话吧，”她说，“但是我知道，如果你们自己处在我的地位，也非这样做不可。”

“别人的关心对一个人影响多大啊，”洛普霍夫说，“当他看见人家为他担惊受怕的时候，连他自己也受到一定的迷惑，以为他不知要多么小心谨慎才行。其实两三天前我就可以出门了，而我还是继续待在家里。今早上我本想出去，为了更加保险，我就又推迟了一天。”

“对，你早就可以出门了。”基尔萨诺夫证实道。

“我把这叫做坚忍顽强，老实说，我对这都烦透了，恨不得马上跑出去。”

“我亲爱的，你坚忍顽强是为了让我安心啊。你既然那么希望能赶快结束隔离，我们真的现在就跑出去吧。我马上要去工场待半个小时。我们一道走，你病后第一次串门就去看我们那个小团体，真是对她们太好了。她们一定会觉察到的，而且对你的这种关怀感到非常高兴。”

“好，一道走。”洛普霍夫说，他那高兴的神情溢于言表，因为他今天便能吸到新鲜空气了。

“瞧我这个主妇办事有多得体，”韦拉·巴夫洛夫娜说，“我也没想想，您亚历山大·马特维伊奇也许根本就不愿跟我们一块去呢。”

“不，这蛮有趣，我早打算去了。您这主意好。”

韦拉·巴夫洛夫娜的主意确实好。女工得知洛普霍夫病后第一次串门就是来看她们，果然很满意。基尔萨诺夫对工场确实很感兴趣，具有他那种思维方式的人对它不可能不感兴趣。要不是有个特殊原因妨碍了他，他一开始便会成为工场中一名热心的教员。半个小时——也许是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韦拉·巴夫洛夫娜领着他到各个房间四处参观。他们从食堂回工作间的时候，一个原先不在工作间的女工向韦拉·巴夫洛夫娜走过来。那女工跟基尔萨诺夫对视了一下：“娜斯坚卡！”——“萨沙！”然后就拥抱起来了。

娜斯坚卡，娜斯塔霞的爱称。

萨沙，亚历山大的小名。

“萨申卡，我的朋友，我碰见你多高兴啊！”女工一直吻着他，又是笑，又是哭。

从狂喜中冷静下来以后，她才说：“不行，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我顾不上谈工作了。

我不能跟他分开。我们走吧，萨申卡，到我房里去。”

萨申卡，亚历山大的爱称。

基尔萨诺夫的高兴不亚于她。不过韦拉·巴夫洛夫娜发现，当他一认出她来，他那最初的一瞥就流露出深深的忧伤。这毫不足怪：那女工正害着第三期肺病。

克留科娃是约莫一年以前进工场的，那时她的病已经不轻。假如她还留在她原先待的那家铺子，她早就给缝纫活计给累死了。她在工场里才有可能多活了些日子。女工们完全不让她干缝纫活了，因为可以给她找到不少对她的健康无害的其他活计。工场中原来由大家轮流管的零碎杂事，她一个人就干了一半，她参与管理各种仓库，承接订活，谁也不能说克留科娃对工场的贡献比别人小。

洛普霍夫夫妇没有等到克留科娃和基尔萨诺夫会面结束，便走掉了。

十四

克留科娃的故事

第二天一清早，克留科娃就来找韦拉·巴夫洛夫娜。

“我想跟您谈谈您昨天看到的事情，韦拉·巴夫洛夫娜，”她说，然后犹豫了一会，不知该怎么讲下去，“我不愿您把他想得太坏了，韦拉·巴夫洛夫娜。”

“那是您自己把我想得太坏了，娜斯塔霞·博里索夫娜。”

“不，如果这不是我，而是别的女人，我就不会这么想了。您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

“不，娜斯塔霞·博里索夫娜，您没有权利这样说您自己。我们认识您已经一年，而且我们这个圈子里有许多人以前就认识您。”

“这么说，我看您对我的事一无所知吧？”

“不，我当然知道得不少。您当过女佣，最后这次是在女演员 N 家。她出嫁以后，是由于她公公的纠缠，您才离开她进了 N 裁缝铺，又从那边转到我们这儿。这我知道得非常详细。”

“马克西莫娃和舍伊娜知道我从前的情况，我当然相信她们不会说的，不过我还是以为总会间接传到您或者别人的耳朵里。啊，我真高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还是要告诉您，好让您知道他这人多好。我过去是个很坏的女孩子，韦拉·巴夫洛夫娜。”

“您，娜斯塔霞·博里索夫娜？”

“对，韦拉·巴夫洛夫娜，是很坏的。我过去还很粗野，不知羞耻，总是喝醉酒。”

我得这个病，韦拉·巴夫洛夫娜，就是因为我的肺部本来就弱，又喝得太多。”

韦拉·巴夫洛夫娜已经碰见过两三起这样的事例了。有些女工从跟她认识以后在行为举止上无可指摘，但是她们却告诉她，她们从前也有过一段丑恶的生活。她初次听到这样的自内感到吃惊，可是思考了几天，她推断说：“那么我的生活呢？我出身的那个污泥潭也挺丑恶，然而我能出污泥而不染，成千上万的妇女出身的家庭还不如我，她们也依然挺纯洁。如果幸运的机会有助于某一些人摆脱这种屈辱地位，使她们不致堕落，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她听第二篇自白时，对于向她自白的女工居然能保持着人的一切高贵品质，她已不再感到吃惊了，她们大公无私，对友谊忠诚，心地善良，甚至还保持着些许的天真。

“娜斯塔霞·博里索夫娜，您要说的话，我已经听过几次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双方都难受。现在我知道您经历过许多痛苦，我对您的敬重不会比以前减少，反倒只有增加，我就是不听也全明白。我们别再谈这个，您不必向我解释。我自己也在极度的痛苦中过了许多年，我尽力不去回想它，也不爱谈它，免得难过。”

“不，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却怀有另一种感情。我想告诉您，他这人有好多，我希望有人知道我多么感激他。但是，除了您，我还能告诉谁呢？我说出来好受些。我从前过的什么生活，自然没什么可说的，像我们这样的穷人过的生活都是一个样。我只想讲讲我是怎么认识他的。我真乐意谈他，再说，我要搬到他那儿去住，您也该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了工场。”

“您要是乐意讲，娜斯塔霞·博里索夫娜，我也高兴听。对不起，我要拿件活计来。”

“好，我可是连活计也不能做了。这些女工心眼真好，她们给我找了适合我身体的事儿干。我感谢她们大伙，她们每一个人。请您转告她们，韦拉·巴夫洛夫娜，说我请您代为感谢她们。”

“有一次我在涅瓦大街闲溜，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刚出门，天还很早。走过来一个大学生，我上去缠住他。他什么话不说，走到马路对面去了。他看看我，我又跑到他跟前，抓住他的手。‘不，’我说，‘我不叫您走，您这么漂亮。’--‘我可要请您离开我，别缠我了。’他说。--‘不，跟我一起走吧。’--‘没必要吧。’--‘好，那我跟您一起走。您上哪儿？我跟定您啦。’我就是这样不知羞耻，我比别人更坏。”

“娜斯塔霞·博里索夫娜，也许您实际上是个腼腆的姑娘，您害羞了”

“对，也许是这样。至少我见过别的姑娘是这样，当时自然不懂，后来才懂得的。

这样，他听我说非跟他走不可，他笑了起来，说道：‘您愿意，那就走吧，不过这是白浪费时间，’他想教训我，像他事后告诉我的：他叫我给缠烦了。我一边走，还一边跟他胡扯，他始终不说话。我们就这样到了他家。拿一个大学生来说，他当时就已经过得不错，他光教家馆，每月能挣二十卢布左右，又是光棍一条。我仰着倒在沙发上，说：‘喂，拿酒来。’--‘不行，’他说，‘我不给您酒，我们来喝茶吧。’--‘放上点潘趣酒。’我说。--‘不，不加潘趣酒。’我开始不知羞耻地胡闹起来。他坐在那儿看着，可是毫不在意，我觉得这太侮辱人了。现在这样的年轻人随处可见，韦拉·巴夫洛夫娜，从那时候起年轻人变得强多了，当时可太稀罕了。我甚至觉得这太侮辱人了，

就破口大骂起来：‘既然你是这么个木头人，’我骂他，‘好，那我走。’‘现在别走，’他说，‘请喝杯茶，女房东马上就端茶炊来。不过您别骂人了。’他对我仍用‘您’相称。

‘您最好对我讲讲，您是什么人？您怎么沦落到这一步？’于是我对他胡扯起来，瞎编了自己的身世：我们给自己编了各种各样的经历，因此人家对我们谁都不相信。其实有些人的经历不是瞎编的，我们当中也有高尚的、受过教育的人啊。他听完以后，说：‘不，您编得并不高明，我即使愿意相信也办不到。’这时我们已经喝完茶。他又说：‘您可知道，我从您的身体看出来喝酒对您有害，您的肺恐怕已经有病了。让我给您检查一下。’好，韦拉·巴夫洛夫娜，您简直不会相信，我居然害羞啦。我本来靠不知羞耻为生的，而巨刚才我还那么不知羞耻呢！他也注意到这个。他说：‘没什么，光听听肺部。’那时候他还在念二年级，但是已经深通医道了，在科学上也走在了前头。他开始听肺部。‘是的，’他说，‘您根本不适于喝酒，您的肺不好。’--‘我们哪能不喝酒？’我说，‘我们不能不喝’确实不能不喝，韦拉·巴夫洛夫娜。--‘那么您抛弃这种生活吧。’--‘我会抛弃的！可是这种生活才快活呐！’--‘得了吧，’他说，‘有什么快活的。喂，’他说，‘我现在可要干工作了，您走吧。’我走了，心里直冒火，一个晚上白搭了。再说，他那冷若冰霜的样子也太伤人了，我们也不是没有自尊心啊。

一个月后，凑巧我又到他住的附近去。我想，我顺便看看这个死木头，跟他玩玩。正赶上快吃午饭了，我睡了一夜好觉，又没有喝酒。他在看书。‘你好，木头。’--‘您好，有事吗？’我又于起蠢事来。‘别这样，’他说，‘我可要轰您走了，我跟您说我不喜欢这样。现在您没醉，能明白我的意思。您最好考虑考虑我的话：您满脸病容，比头一次见您还难看，您该戒酒啦。先把衣服整理好，然后咱们好好谈谈！’我的肺确实已经开始有毛病了，他又听过，说是比头一次更糟了，他说了许多话，我的肺真是有毛病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哭了起来：我可真不愿意死，可他老拿肺病来吓唬我。

我就说：‘我怎能改邪归正呢？老鸨不会叫我走的，我欠她十七个卢布呐。’他们总是用债务压我们，好让我们乖乖地听话。‘哦，’他说，‘我手头现在不够十七个卢布，那您后天来拿吧。’我感到奇怪，因为我完全没有找他要钱的意思。怎会料到有这等好事呢？我连自己的耳朵都不敢相信了，哭得却越发厉害了，我以为他是在耍笑我；‘您看着我哭，欺负一个可怜的女孩可是罪过。’他一再担保，说他的话是认真的，可我就是不相信他。您能想到吗？过了两天他真的凑足了钱交给了我。就在那会，我似乎还是不敢信以为真。‘您既然不愿意跟我来往，’我说，‘怎么还对我这样？这倒是为什么呢？’

‘我向老鸨赎了身，自己租了间房子。不过我还是没活干：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身份证，拿着这种身份证，怎么有脸见人呢？我又没钱。我就还像从前那样过，其实跟从前也不一样了，跟从前怎么比呢，韦拉·巴夫洛夫娜！只有熟客我才接待，只接待那些没有欺负过我的好人。我也不喝酒了。所以没法跟从前比了。您知道，比起从前来，我这已经好过些了。可也不尽然，我还是痛苦。我要跟您说的是：您会以为我痛苦是由于我的相好太多，有四五个人。不，其实我对他们几个都有感情。这倒一点没叫我痛苦。求您原谅我这样说，不过我坦白告诉您：我直到现在也还是这么想的。您知道我现在

不是挺注意的吗；现在除了最正派的话，有谁听说过我说过别的话吗？我在工场照看过许多小孩，他们都喜欢我，老太太们也不能说我没教孩子学好。不过我坦白说，韦拉·巴夫洛夫娜，我直到现在还这么认为，只要有感情，那就不怕，可别是欺骗，如果欺骗，那就该另当别论了。

“我就这么过了大约有三个月，在这个时期我可是休息足了，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了，虽说我也为自己的钱的来历感到羞愧，可是我再也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坏姑娘了。

“不过，韦拉·巴夫洛夫娜，这个时期萨申卡常来找我，我也去看过他。瞧，我又口到我该告诉您的那件事上了。不过他来找我和别人目的不同，而是为了监督我，怕我再犯老毛病，怕我喝酒。最初那些日子他确实帮了我大忙，因为我总想着喝酒。可是我觉得愧对他：万一他来正看见我喝酒多不好。若没他监督，我大概挺不住的，因为我的那些相好的--也都是好人，他们常说：‘我派人买酒去。’但是我觉得愧对他时，我就说：‘不，绝对不行。’不然的话，我哪儿受得了诱惑：只是想酒对我有害还是不够的。后来，过了三个星期左右，我自己也挺住了：酒瘾没了，我已经改掉喝酒的嗜好了。

我一个劲儿攒钱，好还给他，攒了两个来月就还清了。我还给他钱，他那份高兴就别提了。第二天，他给我带来薄纱裙料，还用这笔钱给我买了些别的东西。打这以后他常来，我还是像医生来看病人那样。我还清他账以后，过了一个来月，他又来找我，却说：‘娜斯坚卡，现在我开始喜欢上您了。’喝酒的确使人容貌受损害，而且一时不能恢复过来，而那天我的脸色好了，变得柔嫩起来，眼睛也变得亮晶晶。还是因为改掉了旧嗜好，我说话也规矩起来了，您知道，戒了酒，思想也不那么花哨了。但是一开口还是颠三倒四，有时样子大大咧咧，像早先似的满不在乎。可是这个时候我的言谈举止已经慢慢变得稳重些了。他一说他喜欢我，我就高兴得想扑上去搂他的脖子，可是我不敢，强忍住了。他却说：‘您看，娜斯坚卡，我不是没感情的人。’他说我变漂亮了、也稳重了，还跟我亲热起来。怎样亲热的呢？他拉起我的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又用另一只手抚摩它。他瞧着我的手，这时候我的手的确又白又嫩.....这样，他拉我的手的时候，您不会相信的，我居然脸刷地红了。在我有过那样的生活经历以后，韦拉·巴夫洛夫娜，我还能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姐似的，这真是叫人奇怪，可事实就是这样。不过，尽管我害羞--说起来都觉得可笑，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居然害羞了，但这是真的--我还是对他说：‘您怎么想起跟我亲热呢，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他说：‘因为，娜斯坚卡，现在您是个好姑娘啦。’他一说‘好姑娘’，我高兴得都掉眼泪了。他说：‘您这是怎么啦，娜斯坚卡？’然后就吻了吻我。您能想到吗？他这一吻不要紧，我的头都晕了，我昏了过去。在我有过那样的生活经历以后，居然还会发生这种事，怎么能叫人相信，韦拉·巴夫洛夫娜。

“第二天早晨我待着待着就哭了：现在我这个可怜的女人怎么办？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摆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了--跳涅瓦河。我感觉到，我不能再干那营生了，就是千刀万剐、饿死，我也不干了、您看，这就是说，心里早就爱上他了，可是他对我没有一点表示，我也不敢指望他会喜欢我，我心里的这份感情也就自生自灭了，连我自己也不会晓得心里曾有过这份感情。而现在，这一切全给说破了。当然，在你察觉了这份情感时，你的心中只有他，你怎么会再去左顾右盼呢，您自己有这方面的经验，您会意识到这绝对

不可能。除了你那心上人，刹时间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所以我待着待着就哭了：现在我怎么办？我没法活了。我确实想过这样做：先上他家跟他见上一面，然后就去跳河。我哭了整整一个早晨。可我突然看见他来了，他跑来吻我，说：‘娜斯坚卡，你愿意跟我同居吗？’我告诉他我所想的。于是我就跟他同居了。

‘这是一段幸福的时光，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以为有过这种福气的人很少。他总是那么欣赏我！有过好多次，我一醒来，他正在看书，然后走过来看着我，简直像是着了迷似的，一动不动地端详我。不过他很稳重，韦拉·巴夫洛夫娜。这是后来我才懂的，因为我开始读书了，我了解了小说里怎样描写爱情，我也能够判断了。不过他尽管很稳重，他欣赏我的时候，是多么地忘情！被爱人欣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滋味啊？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快乐。例如他第一次吻我，我甚至头直晕眩，结果倒在了他的臂弯里，看来那感觉该是够甜蜜了吧。但不是，还不完全是。您知道，当时血在沸腾，心里有点慌乱，甜蜜的感觉中似乎搀杂着点苦涩，我甚至觉得沉重，虽然，不必说，这是一种极乐的境界，人也许可以为了这瞬间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且的确有人在为它牺牲，韦拉·巴夫洛夫娜，可见这是至高的极乐境界。但还不是，完全不是的。这却仿佛是你独自坐在那儿幻想的时候，你只是思忖着：‘啊，我多么爱他，’这时，在这愉快中既无慌乱，又无任何苦痛，你只感到心平如镜。当爱人欣赏你的时候，你会有同样的感觉，你心平如镜，而不会感到心的悸动，不，内心已不再慌乱，你不会有慌乱的感觉，你的心只会越发平静而愉快，那么柔和地跳动着，你的心胸变得更开阔，呼吸更畅快，对了，这点确实确实感觉到了：呼吸很畅快。啊，多么畅快！因此，一个钟头、两个钟头飞也似地过去了，就像是一分钟，不，连一分钟都没有，连一秒钟都没有，根本不存在时间了，如同你一觉醒来：你才知道你已睡了好长时间，但这段时间是怎样过去的呢？连一刹那都不到！

你如同睡眠之后那样，不再有倦意，而却头脑清醒，精力充沛，仿佛你刚休息过；正是休息过。我刚才说‘呼吸很畅快’，这是最实在不过的一点。眼神中有着多么大的力量啊，韦拉·巴夫洛夫娜：任何其他的抚爱都不如眼神，叫人感到那样亲切、那样温存。

爱情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爱情更充满柔情蜜意了。

‘他总是在欣赏我，总是在欣赏我。啊，这是怎样的一种享受！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您可是懂得这个的，韦拉·巴夫洛夫娜。

‘他不知厌倦地吻我的眼睛和手，后来又开始吻我的胸、腿、全身，可我并不害羞，虽然当时，我改邪归正以后，我已经像现在一样腼腆了。您知道，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就是对着女人的眼光都要害羞的。我们的女工会告诉您，我有多么腼腆，所以她才单独住一间房。而当他欣赏我、吻我的时候，我却一点也不害羞，只感到那么愉快，呼吸起来那么畅快，这么奇怪，您不会相信。为什么我在女工面前害羞，而对着他的眼光却不害羞？我想，这是因为他对我来说已不是另外一个人了，我觉得我俩就是一个人。似乎不是他在瞧我，是我自己瞧自己；不是他在吻我，是我自己吻自己--我正是有这种感觉，我才不害羞。这您是知道的，不，不必再对您讲了。不过，只要我想到这件事，就无法离开这个念头。不，我得走了，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再也没的可说了。我只想告诉您萨申卡是个多么好的人。’

十五

克留科娃直到后来才给韦拉·巴夫洛夫娜讲完她的故事。她跟基尔萨诺夫同居了将近两年，她那肺病早期的症状似乎消失了。可是到了第二年末，春天来到的时候，肺病突然明显恶化。对克留科娃来说，跟基尔萨诺夫同居下去就意味着必定会加速死亡。如果断绝这个关系，她还指望她的病还能延缓一段日子。他们决定分手。从事一项久坐不动的工作也无异于自毁身体。她必须找个管家、仆役、保姆或诸如此类的差事，而且她的女主人不能给她派累活，更为重要的是别让她心情不愉快，这些条件相当苛刻。但是她还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基尔萨诺夫认识一批刚涉世的演员，通过他们的关系，克留科娃做了俄罗斯剧院一名女演员--一位出色的妇女的仆人。她一直要跟基尔萨诺夫分手，可总是分不开：“我明天去上工。”明日复明日，他们抱头痛哭，哭个没完没了。

一直拖到女演员亲自赶来找她，因为她了解这女仆求职的原因。女演员猜到女仆为什么久久不来，便把她带走了，推迟分手对她有害。

当女演员未脱离舞台时，克留科娃在她家的日子很好过。女演员待人和气，克留科娃珍惜自己的位置，再找这样一个位置可是不易。由于克留科娃从女主人那儿没感到过任何烦恼不快，因而对她十分依恋。女演员看出了这一点，待她也就更好了。克留科娃很安心，她的病情并没发展或者几乎没变化。可是后来女演员嫁了人，离开了舞台，住到了婆家。在那儿，正如韦拉·巴夫洛夫娜早就听说过的，女演员的公公缠上了女仆。

就算克留科娃的贞洁美德未受到玷污，可是家庭的不和却从此开始了：退休的女演员奚落老头，老头也常发脾气。克留科娃不愿成为破坏家庭和睦的原因，即使愿意，她留任原位也不会再有平静的生活了，所以她索性不干了。

这是她跟基尔萨诺夫分居两年半左右以后的事，这时她已经完全不和他见面。最初他常去看她，但是欢乐的会面对她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他从有益于她的健康考虑，征得她的同意后便不再登门了。克留科娃还试着在两三家当过帮工；但是却碰到许多恼人的事，她索性就去当了裁缝，虽然这无疑地会直接使她的病情很快的加重。但单是由于干活而累死也比招来许多烦恼却又无法幸免于难要好。一年的裁缝活干下来克留科娃给拖垮了。当她进入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工场时，在那儿担任常年医生的洛普霍夫想尽各种办法制止她的肺病发展，他取得的成绩不小，就是说，以他为获得那么点疗效所克服的困难相比较，他的成绩已不能算小，但是那个结局还是临近了。

直到最近，克留科娃还像肺病病人常见的那样执迷不悟，以为她的病情还不太严重，因此她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健康起见也不去寻访基尔萨诺夫。可是这两个来月她总是一再地追问洛普霍夫，她还能活多久。她没说明为什么她要知道这个。洛普霍夫也不认为自己有权向她坦诚宣布危险已然临近，因为他并未从她的提问中看出什么来，除了人通常对生命的留恋之外。他劝她放心。而她，正如经常见到的那样，放不下心来，只是克制自己不去做那件事，虽然它有可能带给她临终的慰藉。她自己知道她的日子不多了，这个思想左右着她的情绪，但是医生却说服她还应该保重自己。她知道她应该相信

他超过相信自己，所以她听从了他，没去寻访基尔萨诺夫。

人当然不可能长久地蒙在鼓里，随着那结局的临近，克留科娃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盘问起来。要么是她把想知道真相的特别理由讲出来，要么是洛普霍夫或韦拉·巴夫洛夫娜猜到她所以盘问是有某种特别的需要，再过两三个星期，也许再过几天，事情终归会揭晓的。由于基尔萨诺夫出乎克留科娃意料之外来到工场，这揭晓就略微提早了点。

现在，真相大白了，并非靠她的进一步盘问，而是由于出现了这个偶然的情况。

“我多高兴，我多高兴啊！我本来一直在打算找你，萨申卡！”克留科娃领她去她房里时欣喜若狂地说。

“是啊，娜斯坚卡，我比你还高兴呐：现在我们再不分开了。搬到我那儿去住吧。”基尔萨诺夫满怀着怜爱之情说。他刚说完立刻就想起：我怎么对她说这个呢？她恐怕本来还没料到危险临头了吧？”

不过要么是她起初没有明白他的话中透露的心声，要么就是虽然明白却顾不上在意它了。鸳梦重温的喜悦盖过了她面临死亡的悲哀，不管怎样，她只顾高兴地说：

“你多好，你还是像从前一样爱我。”

可是他走了以后，她却哭了。直到现在她才理解，或者才发觉自己早已理解了鸳梦重温的意思：“现在我已经没必要保护你了，你也保不住自己了。至少让你快活快活吧。”

她着实快活了一番。每天他必须在医院和医学院呆那么几个钟头，除此之外他连一分钟都不离开她。她这样过了一个来月。他们朝朝暮暮在一起，形影不离，多少次谈心，无话不谈，讲述离别期间各人的遭遇，回忆往昔的同居生活，此外还有多少快活事：他们一块游玩，每天黄昏乘着他雇的马车到彼得堡郊外观赏自然景色，大自然对人来说是如此可爱，连彼得堡郊外这样可怜的、不惹眼的、虽说价值千百万资金的大自然也能叫人看了满心欢畅。他们读书，玩“傻瓜”，玩“罗托”，她甚至学起下象棋来，仿佛她还有时间能学会下似的。

有好几次，韦拉·巴夫洛夫娜等他们游玩归来以后，在他们家待到深夜，不过她还是多半早晨去，免得克留科娃独自在家闷得慌。只有她俩在一起的时候，克留科娃满怀激情地给她讲冗长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只有一个：萨申卡多么好，多么温柔，他多爱她！

十六

过了约莫四个来月。基尔萨诺夫由于经常照顾克留科娃，后来又经常回忆起她来，于是产生了错觉，以为现在他对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思念是没有危险的了。不管她来拜访克留科娃也好，碰到了他、与他谈话也好，以致于后来她极力帮他摆脱痛苦也好，他都不回避她了。他伤悼克留科娃期间，在他意识到了的对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感情中，除了对她的关心所回报的友好的谢忱外，也确实没有什么别的了。

可是--男读者已经预先就知道了这个“可是”的意思，正如他对已读过的篇页后面的内容总是会预先知道的一样。可是--基尔萨诺夫在与克留科娃重逢时，对她的感情自然是与克留科娃对他的感情完全不同的，基尔萨诺夫心中对她的爱情早已逝去了，虽然对她还抱有好感，毕竟是自己曾经爱过的女人。其实往昔他对她的爱仅仅是出于年轻人想要爱上一个人（随便什么人都行）的一种强烈的愿望。克留科娃自然和他不般配，因为他们在自身素养方面彼此就不相称。等他过了青春期，他只是怜惜克留科娃，也只能如此而已；凭借回忆，充满怜惜地对她施些温存，也仅此而已。他对她的伤悼实际上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当那悲伤真的化为乌有时，他还总会记起那悲伤曾占据过他的心头。

而当他发现，他已不再悲伤，只剩下对悲伤的回忆时，他才看到了自己与韦拉·巴夫洛夫娜之间的异常关系，他才认定，他已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

韦拉·巴夫洛夫娜极力帮他摆脱痛苦，他也心说诚服地接受了她的关怀，认为自己已无危险可言，或者不如说，他已不记得，他本来是爱韦拉·巴夫洛夫娜的，也忘了她的关怀无疑会使他走入窘境。那么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帮他摆脱伤悼克留科娃的痛苦开始，已过去了两三个月了，现在情况怎样呢？没有什么新情况。在这期间他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待在洛普霍夫家，就是护送韦拉·巴夫洛夫娜到什么地方去，他常常和她丈夫一起护送，单独护送的次数更多，也就仅此而已。这不仅对他已心满意足，就是对她也觉得足够了。

现在韦拉·巴夫洛夫娜每天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傍晚之前和过去一样。可是到了六点钟呢。过去她通常在这时独自去工场，或者独自待在房间里干活。而现在，如果她傍晚需要去工场，那么头天晚上她就通知基尔萨诺夫叫他来送她去。在往返的不长的路途中，他们总是要谈点什么，通常是谈工场，基尔萨诺夫是她在工场事务中最为得意的一个助手。她主管工场事务，而他也有许多事情可干：三十名女工询问和托办的事情加在一起难道还少吗？由他来处理这些事是再合适不过了。办事间歇他就和孩子们待在一起闲聊，有几个女工也参加了这种天南海北的闲谈。他们还谈起阿拉伯童话《一千零一夜》是多么有趣，其中不少篇他已经讲过了。又谈到印度人所尊崇的白象，就像我们这里的白猫很是招人喜爱的。伙伴中有一半人认为，白象、白猫、白马--俗不可耐，这是患了白化病的一群病态动物，从它们的眼睛就可看出，他们不像有色动物拥有健壮的体格；另一半人却非说白猫好。“关于斯托夫人的生平您还知道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她的小说我们是听您讲过才知道的。”一个参加谈话的成年女工问。不，基尔萨诺夫暂时还不知道斯托夫人生平的更详细情况，但他会知道的，因为他自己对此也颇感兴趣。

眼下他倒可以讲讲霍瓦德，他差不多是跟斯托大人同样的人物。就这样，基尔萨诺夫时而进行讲解，时而跟伙伴们进行争论。伙伴中占半数的小孩始终抱成一团，而成年人却不断地有变动。韦拉·巴夫洛夫娜干完工作以后就同他一起回家喝茶，三个人喝完茶还要坐好半天。现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同坐的时间要比以往基尔萨诺夫不在时长得多。只要是他们三个人共度的晚上，准要安排一两个钟头的音乐节目：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弹钢琴，韦拉·巴夫洛夫娜唱歌，基尔萨诺夫坐在一旁静听；有时基尔萨诺夫弹钢琴，那么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就和妻子合唱。最

近常有这种情况：韦拉·巴夫洛夫娜从工场急匆匆赶回家来，以便换装去歌剧院，最近他们经常去歌剧院，或者是三人一块去，或者是基尔萨诺夫单独陪同韦拉·巴夫洛夫娜去。除此之外，洛普霍夫家的客人比以前来得更为频繁了。从前，年轻人不算数--年轻人算什么客人呢？他们不过是小字辈--几乎只有梅察洛夫夫妇常来做客。现在洛普霍夫家又与两三个像这样可爱的家庭交往密切起来。梅察洛夫家和另外两个家庭安排每周轮流举行一次小型舞会，只约圈内人参加，每次都能凑足六对、甚至八对舞伴。缺了基尔萨诺夫，洛普霍夫几乎从不去歌剧院，也不去熟人家，可是基尔萨诺夫却常常单独陪伴韦拉·巴夫洛夫娜外出活动。洛普霍夫说，他宁愿穿着大衣待在家里的沙发上歇着。因此，只有半数的晚上他们三个人一块度过，不过这些晚上他们三人差不多总是一刻不分离地待在一起。的确，当洛普霍夫家中除了基尔萨诺夫没有外人时，长沙发常常会把洛普霍夫从放钢琴的客厅吸引过去--现在钢琴已从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房里搬到了客厅--但是这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来说仍然无济于事：过一刻钟，最多过半小时，基尔萨诺夫和韦拉·巴夫洛夫娜也离开钢琴，起身坐到他的沙发旁。而且韦拉·巴夫洛夫娜也不在沙发旁久坐，她很快就挪到沙发上斜靠在那里，即使两人坐在一张沙发上，丈夫坐着也还是挺松快，因为沙发很宽。其实也并非太松快，可是她用一只手搂着丈夫坐，所以他坐着也不感到挤。

暗示作者对种族歧视的否定态度。

斯托夫人（一八一二——一八九六），美国作家，反映黑人悲惨生活的小说《汤姆大伯的小屋》（一八五二）的作者。此书的俄译本出版于一八五八年。

霍华德（一七二五——一七九〇）英国著名慈善家，主张改善监狱中囚徒的生活。

在俄国考察士兵生活时死于伤寒。

三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

田园诗当今已不流行，而且我自己也根本不喜欢它，就是说，我个人不喜欢它，正像我不喜欢游逛，不喜欢芦笋一样。我不喜欢的东西可不少，一个人本来就不可能喜欢所有的菜肴和所有的娱乐方式。但是我知道，这些虽然不合我个人的口味，可都是上好之物，它合乎绝大多数人的口味，或者可能合乎绝大多数人的口味。他们可比像我这样的宁可下象棋而不爱游逛、宁肯吃大麻油拌酸白菜而不爱吃芦笋的人要多得多。我甚至知道，不愿分享我下象棋的乐趣和情愿不来分享我爱吃大麻油拌酸白菜的乐趣的那大多数人，他们的趣味决不低于我。因此我要说，愿世上能有更多的机会游逛，愿大麻油拌酸白菜从世上消灭干净，仅剩下的就作为希罕的珍馐供我这样极少数的怪人来享用吧！

我确实知道，对于那丝毫不比我差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应当具有田园诗风味，于是我大声呼吁：让田园诗风味在生活中压倒其他一切的生活情趣吧。而极少数的怪人还达不到田园诗的境界呐，他们有着别种情趣。大多数人需要田园诗。说田园诗不流行、人们对它才毫无兴趣，这不能作为反证：他们对它不感兴趣，只是像寓言中的狐狸不爱吃葡萄一样。他们觉得田园诗式的生活无法企及，因此才说出这样的话：“叫它别流行吧！”

不过，说田园诗式的生活无法企及，那才纯属无稽之谈呢：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它不仅是美好的，而且也是可以达到的。要营造这样的生活没有

什么困难，不过不能够为一个人或者为了十个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为五个人排演一场意大利歌剧是不可能办到的，为全彼得堡来排演，正如大家看到和听到的，却是完全可能的。为十个人印一部《尼·瓦·果戈理全集》（一八六一年莫斯科版）是不可能的事。为全体读者来印，谁都知道，却是可能的了，价钱也不会贵的。但是当还没有给全城演出的意大利歌剧时，也只能开个随便什么音乐会来对付对付一些特别热心的歌迷们。在《死魂灵》第二部还没有为全体读者刊印出来的时候，只能由果戈理的少数特别热心的读者不惜力气分别为自己抄制个手抄本。手抄本和刊印的书不可同日而语，随便什么样的音乐会比起意大利的歌剧来更是差得远，不过有个手抄本和音乐会总比没有强。

十七

如果某个局外人来与基尔萨诺夫商讨如何对待基尔萨诺夫在醒悟过来时已看清的自己的处境，又假定基尔萨诺夫与其他几位当事人毫无于系，他就会对来者说：“用逃避来补救为时已晚。我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是对您来说，逃避或留下来是同样危险的，而对于您关心其安宁的那两个人来说，您逃避开恐怕比留下来更危险。”

自然，基尔萨诺夫只能对像他自己或者洛普霍夫这类性格坚强、诚实可靠的人说这些话。与其他人谈论如何对待这种处境问题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别人在这种境况下其行动必然是卑劣和鄙俗的：使女方的名声扫地，自毁声誉，再向自己的所有同伴们诉苦或吹牛，津津乐道于其具有的英雄好汉的美德或勾引女性的魅力。无论洛普霍夫还是基尔萨诺夫，都不爱跟这种人来谈论高尚的人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可是如果基尔萨诺夫对一个跟自己有着相同原则的人说，现在逃避恐怕比留下更糟，那么他就是对了。这里包含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留下时将怎样自处：绝对不流露自己的感情，因为只有这样，你即使留下来也不会变成坏蛋。你的任务是尽可能不去破坏生活已经好起来了的女方的平静。要使这份平静不受破坏，看来已经做不到了。跟她目前的身份不协调的感情恐怕--说什么‘恐怕’，干脆说，是‘毋庸置疑’--已经在她心中萌生，不过她还没有觉察而已。如果完全没有来自你这方面的挑逗，这种感情会不会很快向她自己显露出来，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你一疏远，准会刺激它显露出来。所以，你疏远的结果只能是使你希望避免的那件事来得更快。

然而基尔萨诺夫不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却是作为一个当局者来考虑这件事的。他觉得疏远比留下更为难，而驱使他留下的是感情，那么，留下不就是意味着向感情屈服，受感情的左右而迷惑了吗？他有什么权利竟能如此绝对自信，相信自己不会在言谈或眼神中流露内心的情感而挑逗对方呢？因此疏远更为妥当。当事情涉及到自己时，人就很难看出他的理智被矫情的诱惑左右到了何等程度，所以正直的人告诫说：抵制住诱惑，你才能有较多的机会去完成高尚的行动。这是从理论语言译成的日常口语。而基尔萨诺夫信奉的理论，却认为类似“高尚”这样冠冕堂皇的字眼模棱两可，含糊不清，

不如用自己的谜语来表达：“任何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也是。现在要问：什么对我更有利，是疏远还是留下？如果疏远，我只要抑制个人内心的情感即可。如果留下，我却要冒着损害自己人格的风险，因为一句不得体的话，或者痴迷的一瞥都会泄露天机的。个人的情感是可以抑制住的，过些时候我的平静就能恢复了，我又会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

要是我有一次行动矫情背理，那我就永远于心不安，也无法对自己满意，我将毁掉我的全部生活。我的处境是这样；我爱喝酒，而我面前正摆着一杯美酒，不过我怀疑这酒有毒。我又无法证实我的怀疑。我应该喝下这杯美酒还是免受它诱惑，倒掉它呢？我不能把我的决定叫做高尚的决定，甚至也称不上正当的决定，这些字眼过于铿锵作响。我只能称之为合算的、明智的决定：我倒掉这杯美酒。虽然我剥夺了自己的一份小小的乐趣，给自己造成了一点不愉快，但是我却保证了自己的健康，也就是保证我来日方长，可以大量地饮用那些我确实地知道没有毒的酒。我的行动不算蠢，这也就是我所得到的全部褒奖。”

十八

那么用什么方法疏远呢？如果使用老法子，假装受委屈，表现自己性格中庸俗的一面，借此来疏远，这已经不行了；两次都用同一套招术就骗不了人了。第二个同样的故事只能拆穿第一个故事的用心，表明他不仅是新故事的主人公，而且是老故事的主人公。

总之，快刀斩乱麻的任何做法都是不相宜的。虽然这样疏远比较省事，却过于张扬，会引起注意的，也就是说，那在眼下是庸俗的、卑鄙的（照基尔萨诺夫的利己主义理论，便是愚蠢、不合算）。因此只剩下一个最费事、最折磨人的方法：慢慢地、不露声色地悄悄地避开，使人看不出他在疏远。这件事有点棘手，极为复杂：人家在瞪大眼睛注视你，你却要逃离他们的视线，而又不让他们看见你的动作。但是别无出路，必须这么做。可是照基尔萨诺夫的理论，这并不痛苦，甚至还挺愉快，因为事情越困难，在你顺利完成它的时候，从自尊心出发，你便越发为自己的能力和机灵而感到欣慰。

他果然完成得很顺利，没有因为一句言犹未尽或失去分寸的话语，也没有因为一瞥目光而泄露自己的意图。他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的面前仍旧无拘无束地说笑逗趣，他跟她接触时仍然一如既往显得挺快活。不过他开始受到种种干扰，不能像从前那样经常去洛普霍夫家，像从前那样整晚上逗留在他们家，并且，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洛普霍夫比从前更爱抓住他的胳膊，要不然就是抓住他的礼服翻领，说道：“不行，朋友，你可不能马上退出这场争论。”因此基尔萨诺夫来到洛普霍夫家里以后，越来越多的时间不得不在他的男友的沙发旁度过。这一切都是渐渐形成的，以至完全觉察不到这种变化是在发展。干扰一来，基尔萨诺夫不但不加以强调，反而为受到干扰而表示惋惜（不过只是偶然表示表示而已，经常表示也不恰当）。干扰总是来得那么自然而且避免不了，就连洛普霍夫夫妇俩也往往赶他走，他们提醒他说，他忘了答应过今天在家待着，因为他摆脱不掉的某某熟人想去找他……或者他忘了，假如他今天不去看某人，那人就要怪他；或者他忘了，他必须在明

早之前完成一项至少需要四个钟头才能完成的工作，难道他打算今夜不睡觉？已经十点钟了，他别再说笑话了，该回去工作了。基尔萨诺夫对这些提醒也不一定都听从：他不去看这个熟人，让这位先生生气吧；还有，工作跑不掉，时间还有呐，他偏要在这儿坐上一晚上。可是干扰越来越多，一连几个晚上又都被学术活动占去了，这些学术活动越来越多地压在他的身上，他有时也流露出这样的想法：“但愿没有这些学术活动才好！”熟人们也越发爱纠缠他，他有时又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们怎么老是死死缠住我，真邪门，他们干吗总是拽住我不放！”这仅只是使他觉得奇怪，而洛普霍夫夫妇却一目了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有了名气，需要他帮忙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了。他不该忽视工作，他偷懒更是毫无缘由，老实说，过去几个月他完全变懒了，所以他打不起精神动手工作，于是他们催促他道：“应当工作了，亚历山大老兄！”——“该工作了，亚历山大回马特韦伊奇！”

装样子是很困难的，他必须把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拖足几个星期才行，他必须转动得那么缓慢，那么平稳，好像钟表的时针一样：无论您怎样聚精会神地望着它，您都看不出它是在走动，而它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事，从它原来的位置朝一边走动。不过作为理论家的基尔萨诺夫在欣赏实践中自我的灵活和机敏时，却感到多么愉快啊。利己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不管做什么，都只为了自己的快乐。是的，基尔萨诺夫也可以完全坦诚地说，他要这套计谋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他为自己的高明和勇敢而感到兴奋。

这样过了一个月或者一个月更多一点的时间，如果有人作了统计，那么就会发现，在这个月里，他与洛普霍夫夫妇的亲密关系丝毫也没疏远，但是他在他们家里度过的时间却减少了四分之三。而在这期间他和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起度过的时光的比例又减少了一半。最多再过一个月，朋友们就不会再常见面了，而友谊却是依然如故。事情也就可以收场了。

洛普霍夫的眼光很敏锐，难道他一点都没察觉？

没有，一点没有察觉。

韦拉·巴夫洛夫娜呢？韦拉·巴夫洛夫娜也一点没有察觉。她在自己心中也没有察觉什么吗？她在自己心中也没有察觉什么。不过韦拉·巴夫洛夫娜做了一个梦。

十九

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第三个梦

韦拉·巴夫洛夫娜做了一个梦：

喝完茶，跟亲爱的闲聊了一会，她就来到自己房里躺下了。并非睡觉，睡觉还早着呢，哪能睡觉，才八点半钟。不，她还没脱衣服，不过先这么躺着看看书罢了。她躺在她的小床上看书，可是书本却从她的视线中移开，掉落下来，于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想道：“为什么最近我时不时地感到有些烦闷呢？也许这不是烦闷，而是该当如此的吧？对，这不是烦闷，而只是想起今天本要去看歌剧，可这个马大哈基尔萨诺夫买票去晚了，他好像不知道，若是有博齐奥演唱，那么上午十一点就买不到两卢布一张的门票了。

当然，不能怪罪他，因为他一直工作到早晨五点钟，肯定是五点，虽然他不承认……毕竟还是他有错。不，往后我最好请我的亲爱的买票，看歌剧也跟亲爱的一起去，亲爱的决不会干出这等事，害得我连门票都没有，况且他总是乐意陪我去的，因为他对我太好了，我那亲人。而这个基尔萨诺夫却使我漏掉了一场《茶花女》，真遗憾！如果天天晚上有歌剧，我天天晚上都去看，随便什么歌剧都行，即使歌剧本身不怎么样，只要由博齐奥唱主角。如果我有博齐奥那样的好嗓子，我大概整天都来唱歌了。要是我认识了她呢？怎么能认识呢？那个炮兵跟汤贝利克有交情，能不能通过汤贝利克去认识呢？不，不能。多么荒唐可笑的念头！为什么要结识博齐奥？难道她会为我唱歌？她可得珍惜自己的嗓子啊。

博齐奥（一八三〇—一八五九），意大利著名女歌唱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在彼得堡演出。

《茶花女》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所作的歌剧，根据小仲马同名小说改编。

炮兵是参加郊游的两名军官之一。下文为“军官 NN”。

汤贝利克（一八二*—一八八九）意大利歌剧演员，十九世纪下半叶曾多次在彼得堡与博齐奥同台演出。

“博齐奥什么时候学会俄语的？她发音多纯正。但是歌词荒唐可笑，这样庸俗的诗句她是从哪儿发掘出来的？对了，她大概学过我学过的那本语法书，在那本书里，这些诗句被当成使用标点符号的范例。语法书引用这些诗句有多愚蠢，即使诗写得不那么庸俗。可是干吗去想诗句，还是听她唱吧：

快乐时光
莫放过，莫放过，
将韶华岁月
给爱情献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凭记忆引用普希金的诗《给阿岱莉》与原作略有出入。这首诗由格林卡谱曲。

“歌词荒唐可笑：又是古旧的词语‘韶华’，又是重音有误的‘岁月’！不过她的嗓子有多好，感情多投入！是的，她的嗓子比从前好得多，好得无与伦比，真奇怪！怎么能变化那么大呢？是的，我正不知怎么能结识她，她却自来看望我了。她是怎么了解了我的愿望的？”

“你早就叫过我了。”博齐奥用俄语说。

“我叫过你吗，博齐奥？我不认识你，怎么能叫你来？可是我见到你很高兴，很高兴。”

韦拉·巴夫洛夫娜掀开帐子，要伸手给博齐奥，女歌唱家却哈哈大笑，原来她不是博齐奥，更像是在《弄臣》里演茨冈女人的德·梅里克。不过只有笑声里的欢快情绪是属于德·梅里克的，嗓音还是博齐奥的嗓音。她问到一旁，藏到了帐子外边。多遗憾，这帐子把她遮住了，原本没有帐子，不知打哪儿来的。

《弄臣》，威尔第所作的歌剧。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然后又大笑着，像是德·梅里克，其实就是博齐奥。

德·梅里克（一八六七年卒），法国歌剧女演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曾在彼得堡演出过。

“你到底是谁？你不是德·梅里克吧？”

“不是。”

“你是博齐奥吧？”

女歌唱家哈哈大笑说：“你很快就知道，可现在我们应该谈一谈我来找你的原因。

我想跟你一块念念你的日记。”

“我没有什么日记，我从来不记日记。”

“你瞧，小桌上是什么？”

韦拉·巴夫洛夫娜一瞧，小床边的小桌上果然放着一个本子，上面写着《韦·洛 日记》。这本子从哪儿来的？韦拉·巴夫洛夫娜拿了过来，打开一看，本子上是她的亲笔字。什么时候写的呢？

“韦·洛”，“韦拉·洛普霍娃”的缩写。

“念最后一页。”博齐奥说。

韦拉·巴夫洛夫娜念道：“我又得整晚整晚地独坐家中了。可是这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

“只有这些？”博齐奥问。

“只有这些。”

“不，你没全部念出来。”

“这儿再没有写什么了。”

“你骗不了我，”女客人说，“这是什么？”帐子外面伸进一只手。这只手真美！

不，这只奇妙的手不是博齐奥的。它怎么能不掀开帐子，隔着帐子伸进来呢？

新来的女客人用手碰了碰纸页，手下新出现了原先没有的几行字。“念吧！”女客人说。韦拉·巴夫洛夫娜感到揪心，她还没有看这几行，不知那儿写些什么，但是她已经感到揪心了。她不愿意念新出现的这几行字。

“念吧，”客人又说一遍。

韦拉·巴夫洛夫娜念道：“不，现在我一人待着觉得烦闷。过去却并不觉得。为什么从前一人待着不烦闷，为什么现在却烦闷呢？”

“往回翻一页。”女客人说。

韦拉·巴夫洛夫娜翻回一页。“今年夏天，”有谁这样记日记的？--韦拉·巴夫洛夫娜想道。---应该写上：一八五五年，六月或七月，然后标上日期，可这儿却是：今年夏天。有谁这样记日记的？“今年夏天，我们照例去岛上郊游，这一次亲爱的也跟我们同去了：我是多高兴啊。”哦，这是八月间的事。八月几号？十五号还是十二号？对，对，大约是十五号，这是记那次郊游的，郊游以后，我可怜的亲人便病倒了--韦拉·巴夫洛夫娜想道。

“只有这些？”

“只有这些。”

“不，你没有全念出来。这是什么？”女客人说，她那只奇妙的手又是隔着没有掀开的帐子就伸了进来，触到纸页，纸页上又出现了新的字句，韦拉·巴夫洛夫娜又不情愿地念出这些新的字句：“为什么我的亲爱的不能更经常地来陪陪我们呢？”

“再翻一页。”女客人说。

“我的亲爱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我的亲爱的

是在为我工作啊。”这就是答案--韦拉·巴夫洛夫娜快慰地想道。

“再翻一页，”女客人说。

“这些大学生是多么正直高尚的人，他们对我的亲爱的又是多么地敬重。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快活，好像跟亲兄弟在一起似的，完全不拘礼节。”

“只有这些？”

“只有这些。”

“不，再往下念。”那只手又伸了过来，它触到纸页，纸页上又新出现了几行字，韦拉·巴夫洛夫娜又不情愿地念出这新的字行。

“八月十六日，”也就是岛上郊游后的第二天，那一次出游正是在十五号--韦拉·巴夫洛夫娜想道：“在全部的游玩时间中，亲爱的一直在跟这个拉赫梅托夫（或者像他们所戏谑称呼的‘严肃派’），还跟别的同学们聊天。除了我们并排坐在船上的那段时间以外，他在我身边未必待上有一刻钟。”不对，我想有半个钟头，是的，我确信，有半个多钟头--韦拉·巴夫洛夫娜想道。“八月十七日。那批大学生昨天在我们家坐了整整一晚上；”不错，这是亲爱的生病的前一天，“亲爱的跟他们聊了整整一晚上。为什么他能给他们花那样多的时间，给我却花这样少？他又不是全部时间都在工作，他自己也说过，他远非全部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不休息就无法工作，他说他休息得挺多，他琢磨事也只是为了休息。为什么他一人琢磨，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呢？”

“再翻一面。”

“今年七月，以及今年在亲爱的生病前，月月都是这样，去年和去年之前也是如此。

五天前那些大学生来过我家，昨天又来了。我跟他们瞎闹了好半天，这样挺快活。明天或者后天他们会来的，那时又该非常快活的。”

“只有这一些？”

“只有这一些。”

“不，再念下去。”那只手又伸过来，一碰到纸页，手下就出现新的字行，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情愿地念道：

“从今年年初，特别是从春末起。原先跟这些大学生在一块我挺快活，也仅仅是快活而已。现在我却常常想：这是儿童游戏，不过我会一直觉得好玩，也许，当我成了老太婆，当我过了适宜于游戏年龄的时候，我还会欣赏青年们的这些使人忆起童年的游戏。

可是现在我也只把这些大学生当小弟弟看，每逢我要休息摆脱一下认真的思考和劳动时，我并不总是想着一定要变回到韦罗奇卡去，因为我毕竟已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了。像韦罗奇卡那样玩乐有时候是快活的，但也不总是快活。有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希望有这样的娱乐，她仍然作为韦拉·巴夫洛夫娜来参加。这就是要跟阅历上旗鼓相当的人一起娱乐才成。”

“再往回翻几页。”

“几天以前我开了一家缝纫工场，去找朱丽订活。随后亲爱的也去了。她留我们吃早饭，还叫人上了香槟，硬灌我喝了两杯。我跟她开始唱啊，跑啊，叫啊，打啊，可真快活。亲爱的一面看，一面笑。”

“莫非只有这些？”女客人说，她的手下又出现新的字句，韦拉·巴夫洛夫娜又不情愿地念道：

“亲爱的只是一面看，一面笑。为什么他不跟我们一块玩闹呢？那样不

就更快活了吗！莫非他觉得难为情才不参加我们的游戏？要不然，他不会游戏？不，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而且他会游戏。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只是不妨碍我们，只是表示支持和高兴而已。”

“再往前翻一页。”

“今天我和亲爱的回娘家了，这还是我婚后头一趟。看见婚前那种使我感到压抑和窒息的生活，我真是难过。我的亲爱的！他把我从一种多么令人憎恶的生活中救了出来！”

夜里我做了一个噩梦，好像是妈妈骂我忘恩负义，还说出了实情，一个那样可怕的实情，我竟然哼哼起来，亲爱的听见这哼声，跑进我的房间，而我却在唱歌了（都是在梦里），因为我那位心爱的美人前来安慰我了。亲爱的充当了我的仆人。真是羞死人。可是他还挺稳重，只吻了吻我的肩膀。”

“莫非只写了这么一些？你骗不了我，念下去……”女客人手下面又出现新的字句，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情愿地念了出来：

“这简直像是在受屈辱。”

“往回翻几页。”

“今天我曾在新桥附近的林荫路上等候我的朋友德米特里，那儿住着一位太太，我想去她那儿当家庭教师。可是她没有同意。我和德十分沮丧地回了家。午饭以前，我在自己房里琢磨，与其像我现在这样活下去，还不如死了好。但是吃饭的时候德突然说：‘韦拉·巴夫洛夫娜，让我们为我的未婚妻和您的未婚夫的健康干一杯吧。’这意外的救援乐得我差点儿忍不住一下子当众哭起来。饭后我和德进行了长谈，谈我们今后的生活。

我多么爱他，他把我从地下室救出来了。”

德米特里·洛普霍夫。

“都念完了吧！”

“再也没有什么了。”

“你瞧。”女客人手下面又出现了新的字行。

“我不想念，”韦拉·巴夫洛夫娜心怀恐惧地说。她还没有看清这新的几行写的是什麼，但是已经害怕了。

“我命令你念，你就不能不念，念吧！”

韦拉·巴夫洛夫娜念道：

“那么，我爱他难道就是因为他把我救出了地下室吗？我爱的不是他本人，而是爱他把我从地下室解救出来吗？”

“再往回翻，念念第一页。”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跟德米特里第一次谈话时便爱上了他。我从没听人说过这样高尚、温馨的话语。他是多么深切地同情一切需要同情的人，愿意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他是多么坚定地相信人们是可以获得幸福的，而且也应该获得，仇恨和痛苦决不会永存，新的光明的生活正在迎面向我们奔来。当我听见一个严肃渊博的学者所做的这些保证时，我的心胸豁然开阔了，因为他证实了我的想法是对的……他是怀着怎样的爱心谈到我们这些可怜的妇女啊。每个妇女都会爱上他这样的人。他多聪明，多高尚，多善良！”

“好的。再翻到最后一页。”

“可是这一页我已经念过。”

“不，那还不是最后一页。再翻一张。”

“可是这一张上什么也没有。”

“念吧！你看那上头写着多少字。”女客人的手一碰，又出现原来没有的几行。

韦拉·巴夫洛夫娜心里冰凉。

“我不想念，我不能念。”

“我命令你念，你就得念。”

“我不能念，也不想念。”

“那么我来给你念，看你写了些什么。听着：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是我的救星。但高尚只能使人产生敬重。信赖、友情、合作的心愿，对于救星只能回报以感激和忠诚。他的气质也许比我热情，当他感情冲动的时候，他的爱情是热烈的。不过我有另一种需要，我需要恬静缠绵的爱情，需要在温柔的感情中甜甜地入梦乡。他知道我的需要吗？我们的性格和我们的需要都一致吗？他情愿为我死，我也情愿为他死。但是这就够了吗？他是不是。心里总想着我？我是不是一心挂念着他？我是怀着自己所需要的那种爱情去爱他的吗？从前我不知道我需要恬静、温柔的感情，不，我对他的感情不……”

“我不愿再听啦！”韦拉·巴夫洛夫娜愤怒地甩开日记本。“坏女人！狠心肠！你干吗来这儿！我又没有叫你来，滚开！”

女客人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善意的笑声。

“是的，你不爱他。这些字都是你亲手写的呀。”

“我诅咒你！”

韦拉·巴夫洛夫娜被这一声叫喊惊醒了，她尚未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梦并且已经醒来”，便霍然而起，跑了出去。

“我亲爱的，你快抱抱我，保护好我！我做了一个噩梦！”她偎依着丈夫，“我亲爱的，来跟我亲热亲热，对我温存点，保护好我吧！”

“韦罗奇卡，你怎么啦？”丈夫搂着她。“你浑身发抖。”丈夫吻着她。“你脸上有眼泪，你额头上出冷汗。你光着脚在冰冷的地上跑，我亲爱的。我来吻吻你的小脚，暖一暖它。”

“对了，跟我亲热亲热，救救我！我做了一个讨厌的梦，梦见我不爱你啦。”

“我亲爱的，你不爱我爱谁呢？不，这是一个无聊的荒唐可笑的梦！”

“对，我爱你，不过你跟我亲热亲热，吻吻我，我爱你，我愿意爱你。”

她紧紧地搂着丈夫，全身偎依着他，他的抚爱使她安静了下来，于是，她吻着他，静静地睡着了。

二十

这天早上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不用叫妻子喝茶了，她就在这儿，偎依着他。她还在睡觉。他看着她，想道：“她这是怎么了？她被什么惊吓了？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你待在这儿，韦罗奇卡，我把茶拿到这儿来。别起床，我的好朋友，我给你端水来，你不用起来洗脸。”

“好，我不起来，我再躺躺，我觉得在这儿挺惬意。你这事想得多周到，亲爱的，我真爱你呀。你看，脸洗完了，现在上茶吧。不，先抱抱我！”韦拉·巴夫洛夫娜搂着丈夫，久久也不肯放开。“嗨，我亲爱的，我真逗！我怎么跑到你这儿来啦！现在玛莎会怎么想呢？不，我们瞄着她，不叫她知道我在这儿睡过。你去把我的衣服拿来。跟我亲热亲热，我亲爱的，跟我亲热亲热，我愿意爱你，我需要爱你！我将更加爱你，远远超过以前。”

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房间空下来了。她不再瞒着玛莎，搬进了丈夫房里。她想到：“他多么温柔，多么温存，我亲爱的，我竟然能够胡思乱想，认为自己不爱你呢？我真逗！”

“韦罗奇卡，现在你已经平静下来，我亲爱的，告诉我，前天你梦见什么了？”

“啊，不值一提！就是梦见你对我不够温存，这我对你说过。现在我觉得好了。我们干吗不从一开始就这样住呢？如果一直这样，我也不会做这个讨厌的梦了，一个讨厌的噩梦，我不愿再想起它来。”

“可是你不做这个梦的话，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住了。”

“说的也对。我很感激她，那个坏女人；她不坏，她好。”

“她”是谁？除了原先那位美人，你还有新的女朋友吗？”

“嗯，还有个新的。有个女人来看我，她的声音那么迷人，比博齐奥的声音还要好听得多了，还有她那双手！啊，美极了，妙不可言！我只看到她的手：她本人躲在帐子外面，我梦见在我的床旁边，我又是在那床上做的这个梦，所以我不再睡那张床了。床旁挂着帐子，女客人躲在帐子外面。她的手真奇妙，我亲爱的！她歌唱爱情，并且向我暗示什么是爱情。现在我懂得了，我亲爱的。我过去真够傻的，居然不懂那个，那时我不就是一个小姑娘，一个小傻瓜吗？”

“我亲爱的，我的天使，万物都有自己的季节。我们从前那样住是爱，现在这样住也是爱。一些人需要那种爱，另一些人需要另一种爱。对你来说，以前那种爱就足够了，现在却需要另一种了。是啊，现在你长大成人了，我的朋友，以前你不需要的，现在开始感到需要了。”

过了一两个星期。韦拉·巴夫洛夫娜正在悠闲自在地躺着。如今只有当丈夫不在家或者当他工作的时候，她才待在她自己房里。也不尽然，他工作的时候，她也常常守在他的书房里。如果她看出她妨碍了他，发现工作要求他全神贯注，那么就走开吧，干吗要妨碍他呢，不过这样的工作在任何人那儿都不多，甚至学术工作也大多数是纯机械性的。因此他总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能看见妻子在身旁，他们有时还互相亲热亲热。她想出来只需要个新物件了：再买一张沙发，比男人睡的小点儿的。于是午饭过后，韦拉·巴夫洛夫娜便悠闲地躺在她的小沙发上，丈夫坐在小沙发旁边欣赏她。

“我亲爱的，你为什么吻我的手？你知道，我不喜欢吻手。”

“是吗？我已经忘了这使你觉得屈辱，可是往后我还会使你受屈辱的。”

“我亲爱的，你这是第二次救我了：你先把我从恶人手里救出来，又把我从我自己手里救出来！跟我亲热亲热，我亲爱的，亲亲我吧！”

过了一个月。韦拉·巴夫洛夫娜吃完午饭，悠闲自在地躺在她那张宽阔的、软软的小沙发上，沙发摆在她和丈夫共同使用的房间，也就是丈夫的书房里。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她搂着他，头贴着他的胸口，沉思着。他吻着她，她依旧在沉思，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了。

“韦罗奇卡，我亲爱的，你怎么老像有心事？”

韦拉·巴夫洛夫娜哭着，不回答。不，她擦掉了眼泪。

“不，别亲我啦，我亲爱的！好啦。感谢你！”她真诚温柔地瞧着他。“感谢你，你对我这样好。”

“对你好，韦罗奇卡？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这样说？”

“你对我好，我亲爱的。你是个好人的。”

过了两天。韦拉·巴夫洛夫娜吃完午饭，又悠闲自在地躺下来。不，不是悠闲自在，而只是躺着想事，这一次是躺在她自己房里的小床上。丈夫坐在她身边，搂着她，他也在想事。

“是啊，这不是那种感情。我心中没有那种感情。”洛普霍夫想。

“他真好，我真是忘恩负义！”韦拉·巴夫洛夫娜想。

这就是他们所想的。

她说：“我亲爱的，到你自己房里去吧，干干工作或者休息休息。”她想要打起精神、用平常的声调说出这些话来，她也能够做到。

“你为什么赶我走，韦罗奇卡？我在这儿也觉得很好。”他想要用平常的、愉快的声调说出这些话来，他也能够做到。

“不，去吧，我亲爱的。你为我做的足够了。去休息吧。”

他吻着她，她忘记了自己的思虑，呼吸起来又感到轻松畅快了。

“感谢你，我亲爱的。”她说。

基尔萨诺夫却十分幸福。虽然这一次斗争相当艰苦，但却给他内心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并且这种快乐不会随着斗争而消逝，它将长久地温暖着他的心怀，直到他的生命终结。他挺正直。不错。他使洛普霍夫夫妇变得亲密了。不错，确实使他们变亲密了。基尔萨诺夫躺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想道：“为人要正直，就是说，要好好计算计算，切勿失算，你得记住总数，记住总数大于部分，也就是说，人之情理比你的任何个别欲望对你更为重要、更为有力量，如果这两者发生矛盾，那么与其满足你的任何的个别欲望，不如顺乎人之情理，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住一切。简而言之：为人正直，一切都会圆满的。这个简单易懂的法则便是这门学问的全部成果，便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法典。

不错，那些生来就能懂得这个简单法则的人是幸运的。我在这方面也能够幸运了。当然，我多亏受教育多，我受惠于教育恐怕比受惠于天性之处更多。这个法则会逐渐发展为通用法则，这是由全部教育和整个的生活环境启示给人们的。是啊，那时候人人都会感到活在世上轻松自在，像我现在一样。不错，我挺满意。可是我应当去看看他们，我已经有三个星期左占没去了。应该去了，虽然这并不能使我感到愉快。我已经不想上他们家了，但是应该去。最近几天内我要到他们家待个半小时。难道不能推迟一个月再去？好像也行。不错，‘退却’圆满完成，表演业已结束。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他们不会注意我是三个星期还是三个月没去过他们家了。从远处来关心我以诚相待的两个人，倒也挺愉快。我对眼下的处境十分满意。

“人之情理”指对洛普霍夫的友谊，“欲望”指对韦拉的爱慕。

过了两三天，也是在午饭以后，洛普霍夫走进妻子的房间，抱起他的韦罗奇卡转回自己的屋里，把她放在她的小沙发上：“在这儿休息吧，我的朋友。”然后欣赏着她。

她微笑着打起盹来；他坐下看书。可是她却又睁开了眼睛，想道：

“他的房间收拾得真干净，不必要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不，他也有他的癖好：这一大盒雪茄还是我去年送给他的，可是至今完整无缺地搁着，等着人来享用它。对了，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他仅有的奢侈品就是这盒雪茄。不，他还有一件奢侈品：这位老人的照片。老人的外貌多么高贵，真是慈眉善目，满面睿智。德米特里费了许多周折才弄到这张照片，因为欧文的肖像在哪儿都找不到，谁都没有。他写过三封信，两个收信人没找着老人，第三个才找到。真是把老人折腾了好一番，才拍成这张真正出色的照片。当德米特里收到照片和他称之为‘圣贤老人’的来信时是多幸福啊，欧文根据他讲的话，在信中夸赞了我。瞧，他还有另一件奢侈品：我的画像。他用了半年的积蓄，请来一位优秀画家，他和这青年画家也把我折腾了好一番。两幅肖像，他的奢侈品仅此而已。买几幅像我房里挂着的那种版画和照片，难道就是很大的破费吗？他房里也没有花，我房里却挺多。为什么他不需要花，我却需要？难道因为我是女人的缘故？这算什么原因！”

也许因为他这人严肃博学吧？但基尔萨诺夫也是严肃博学的人，他房里既有版画，又有鲜花。

欧文（一七七—一八五八），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进步青年中颇有影响。

“为什么他为我多花时间就闷闷不乐呢？我也知道他挺勉强。难道因为他这人严肃博学吗？但是基尔萨诺夫……不，不，他是个好人，好人，他事事都为我做到了，而且他事事都心甘情愿地为我去做！谁能像他这样爱我？我也爱他，我也事事都乐意为他去做……”

“韦罗奇卡，你怎么不睡了，我亲爱的朋友？”

“我亲爱的，为什么你房里没有花？”

“好吧，我的朋友，我一定买，明天就去。我就是恰恰没想到房里有花好。有花确实很好。”

“我还想求你买些照片挂房里，也许，花和照片让我出钱给你买更好。”

“那我太高兴了。我本来就喜欢这些东西，要是你送给我的，我就更喜欢了。不过，韦罗奇卡，刚才你在想心事，你在琢磨你的梦。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个梦，把你吓得那么厉害的梦，给我更详细地讲讲？”

“我亲爱的，现在我不去想它了。回想起来太不好受。”

“可是，韦罗奇卡，也许我知道了这个梦有好处。”

“好吧，我亲爱的。我梦见我因为没能去看歌剧而觉得烦闷，心里老想着歌剧，想着博齐奥。突然有个女人来看我，我起初把她当作博齐奥，她总是躲着我。她强迫我念自己的日记，日记中尽写着我俩彼此怎样相爱，可是她的手一碰到纸页，那上面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字句，说是我并不爱你。”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还要问你一句：你只是做梦梦见的吗？”

“我亲爱的，如果不仅仅是做梦梦见的，难道我还不告诉你吗？当时就会告诉你了。”

她这话说得那么温柔，那么诚恳，那么朴实，洛普霍夫心里立刻涌上一股甜蜜的暖流，凡是有幸体验过这种激动的人，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遗憾的是，只有少数，只有极少数丈夫能够了解这种感情！比起幸福爱情中的种种欢乐来，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什么，这种感情使人心里总是充溢着最纯洁的满足和最神圣的自豪感。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话小透着几许伤感，听起来还带有责备的味道，但这责备的意思不过是：“我的朋友，难道你不知道

你已经获得了我的完全的信任？做妻子的本该对丈夫隐瞒自己内心的隐秘的活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如此。可是，我亲爱的，你为人那么好，在你面前无需有任何的隐瞒。我可以对你敞开心扉，正如对我自己一样。”这才是丈夫的成功所在，只有高尚的品德才能赢得如此丰厚的回报。谁要是获得了这份回报，谁就有权利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瑕的人，他就可以大胆地指望：不管现在或将来，他永远能够问心无愧，无论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勇敢地面对，在任何一次考验当中，他将始终泰然自若，无比坚定，命运几乎支配不了他的心灵世界，从他得到这份回报的殊荣时候起，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管他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他都会因为意识到自己人格高尚而感到幸福。现在我们对洛普霍夫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他并非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即使他也被妻子这几句话感动得脸红了。

“韦罗奇卡，我的朋友，你责备我了。”他的声音发抖，这是他生平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他的声音第一次发抖是由于他怀疑自己的揣测是否是真的，现在发抖却出于喜悦，“你责备了我，可是这顿责备我听起来比所有的情话更为珍贵。我提的问题叫你觉得委屈，但是，也算我有福气，我那个愚蠢的问题竟给我换来这样一顿责备！你瞧，我已经流泪了，童年时代不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掉泪！”

他的目光整晚没有离开过她，这一晚她一点都不感觉他的温存是勉强的，这一晚是她生平，至少迄今为止，最快乐的一个晚上。在我对你们讲述她的故事以后过了几年，她又经常享有过这样的好时光，天天、月月、年年如此，那时她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了，她会看到他们都是配享幸福的幸运者。这种快乐超过了一切其他的个人快乐，任何其他个人的快乐中罕见的、极乐的瞬息，在这种快乐中不过是每个寻常日子的寻常水平。但这也都是后话了。

二十一

可是，当妻子坐在他的膝头睡着了，当他把她放到她的小沙发上以后，洛普霍夫却苦苦思索她的那个梦。他认为关键不在于她是否爱他。这是她的事，她还主宰不了自己，他，正像他看到的，也主宰不了。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没必要去想它，除非闲得没事。

现在他并不空闲，现在他该做的是弄清为什么她会产生“不爱他”的预感。

他不是头一回长久地陷入到对这问题的沉思默想之中了，好几天以来他就看出他是留不住她的爱了。损失惨重，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能够改变自己的性格，像她的天性所要求的那样总是情不自禁地对她体贴温存，那自然另当别论了。可他看出这种尝试是徒劳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有某种爱好，或者现实生活也并未违反他本人的意愿而给他养成那种爱好，那么他是不可能凭着意志力硬把它创造出来的。要是他没有爱好，做任何事都不能到位。这样洛普霍夫的问题业已解决。其实关于这一点他从前也考虑过。现在自己这方面既已考虑完毕（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总是首先想到自己，只有无需再想自己时才想想别的人），他可以开始考虑别人，也就是替她来

考虑考虑了。

他能够为她做些什么呢？她还不明白自己心中发生的事情，她内心的体验不如他丰富。

对，这本来也挺自然：她比他小四岁，在青春初期，“四岁”之差可事关重大。他经验更丰富，难道还弄不清她无法弄清的问题吗？到底该怎样解释她的梦呢？

洛普霍夫很快作出了推测：她这思想来源于她做梦的背景。做梦的原因该是跟梦的内容有某种关联。她说她烦闷是因为没能去看歌剧。洛普霍夫开始反复考虑自己的以及她的生活方式，于是对他来说一切都渐渐明晰了。原先她也像他一样，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的。随后发生了一个变化，她经常去娱乐消遣。如今又恢复了原先的孤独。而她却已经不能无所谓地来忍受这份孤独了，那违背她的天性，恐怕也违背绝大多数人的天性。这儿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理解的。这与他的推测已然很接近了。全部问题的谜底就在于她跟基尔萨诺夫的亲近，以及后来基尔萨诺夫的疏远。基尔萨诺夫为什么疏远呢？原因不言自明：时间不够，工作太多。不过，一个诚实而有修养的、生活经验丰富的、尤其是善于运用洛普霍夫所信奉的理论的人，决不会被任何花言巧语所欺骗。

他可能由于疏忽大意而上当，可能不注意事实：当基尔萨诺夫头一次回避时，洛普霍夫就是因此而没看对，但是，说句老实话，当时热心探求基尔萨诺夫疏远的原因，对他并无好处，因此他也没有那份闲情逸致。他觉得重要的只是检查一下是不是他的过错导致了友谊的破裂，那显然不是，所以他尽可不必多想。他又不是基尔萨诺夫的叔叔，也不是教育家，他不负有引导人走正路的重任。何况那人理解事情的能力不低于他。其实他何需探求这疏远的原因呢？难道在他跟基尔萨诺夫的关系中，有什么对他特别重要的东西吗？假如你是好样的，而且希望我敬爱你，我是很乐意的。否则的话，十分遗憾，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都无所谓。世上多一个傻子或者少一个傻子，区别并不大。我误把一个傻子当成了好人，固然很难过，但也仅只是难过而已。假如一个人的行为与我们的利益无关，而我们为人也还认真严肃的话，他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大会引起我们注意的，只有两种情况除外。况且也是只有那些习惯于在极端狭隘的“日常计算”的考虑中来理解“利益”一词的人才会视之为例外。第一种情况，如果从理论方面看，这些行为，作为能够说明人的性格的心理学现象，对于我们是饶有兴味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迪智慧的满足。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我们对他的行为毫不在意的话，自然会感到内疚，也就是说，我们若关心这些行为，就可以从中得到良心上的慰藉。然而在基尔萨诺夫当时的愚蠢言行中，没有一点是洛普霍夫不了解的，他了解那都是常见的、对时髦风习的附庸风雅。具有正派信念的人迁就于庸俗的时髦风习的现象也并不鲜见。至于说洛普霍夫能在基尔萨诺夫的命运中起什么重大作用，洛普霍夫是不能够想象的：为什么基尔萨诺夫需要他来关心？因此：去吧，我的朋友，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我干吗需要关心你的事？可是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了：基尔萨诺夫的举动涉及到洛普霍夫心爱的女性的利益，看来具有重大关系。他不能不对其举动仔细地加以考虑。而在一个具有洛普霍夫那种思想方法的人看来，对事实加以仔细考虑跟搞清它的原因，差不多就是一回事。洛普霍夫认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分析人的内心活动的正确无误的方法，老实说，在这

一点上我也同意他。在我一直视此理论为真理的漫长的岁月中，它从未引我走入迷途，并且总是顺利而轻易地为我揭示出真相，无论人间世态是多么讳莫如深。固然，这个理论本身不大容易掌握，必须既有一定的阅历，又进行过一番思考，才能够理解它。

经过半个钟头左右的沉思默想，洛普霍夫便把基尔萨诺夫与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关系中的一切全弄明白了。但是他还久久地坐在那儿，想来想去总是那件事。事情已经无需解释了，却仍然颇具兴味。尽管这个发现已经被揭示得详尽无遗，可是它还那么具有诱惑力，使得他久久不能入睡。

不过他到底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神经搞乱，而忍受失眠之苦呢？已经三点钟了。如果还是睡不着，就该吃一点吗啡。他吃了两颗吗啡丸药，“我只要再看一眼韦罗奇卡。”但他不是走近跟前去看，而是把自己的扶手椅移到她的小沙发旁边，然后坐了下来，拿起她的手来吻了一吻。“我亲爱的，你工作得太累了，这都是为了我。你真好，我真爱你。”她在梦中说道。精神上受到的任何打击都抵挡不住足够数量的吗啡，这一次两颗丸药足够了，瞌睡已经把他征服了。于是，按照洛普霍夫的唯物主义观点，心灵所受的打击，论强度约莫等于四杯浓咖啡，因为洛普霍夫要消除四杯浓咖啡的效力也是一颗丸药嫌少，三颗丸药却又嫌多。他嘲笑着这种类比，酣然入睡了。

二十二

理论性的谈话

第二天，基尔萨诺夫从医院回来，吃过他那顿晚点的午饭以后，刚刚躺到床上，手中拿着一支雪茄，消闲地读着书，洛普霍夫走了进来。

“不速之客比鞑靼人还讨厌”，洛普霍夫用戏谑的口吻说，结果又不大像戏谑的口吻。“我打搅你了，亚历山大，可是没有办法，只好叫你受惊了。我必须跟你认真地谈一谈。我本想早点儿来，但是早上睡过了头，怕来了碰不见你。”洛普霍夫说话已经不带有戏谑的口吻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猜到啦？”基尔萨诺夫想。--“我们谈一谈吧，”洛普霍夫一边接着说，一边坐下来，“你看着我的眼睛。”

俄罗斯谚语。

“对，他想说的是那个，毫无疑问。”基尔萨诺夫心里想，然后用更为严肃的语调说道：

“听我说，德米特里，我跟你是朋友。可是有些话连朋友也是不该说的。我请你停止这次谈话。现在我不乐意作严肃的谈话，并且任何时候都不乐意。”基尔萨诺夫的眼睛充满敌意注视着对方，仿佛怀疑他面前这个人有意行凶作恶似的。

“不能不谈，亚历山大，”洛普霍夫用平静但是近乎有点沙哑的声音继续说道，“我看穿了你的表演。”

“闭嘴，我禁止你说，如果你不愿把我变成你的宿敌，如果你不愿失去我的敬重，那就别说了。”

“你从前却不怕失去我的敬重，你记得吧？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当时我

没注意。”

“德米特里，我请你走，要不就是我走。”

“你不能走。你以为我是关心你的利益吗？”

基尔萨诺夫不作声。

“我的处境是有利的。你跟我谈话的时候，你的处境却不利。在大家眼中我在完成一桩崇高之举呢。其实这全都不值一提。按照常理，我不能不这样行动。我请求你，亚历山大，你的表演该收场了。那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怎么？难道已经晚了吗？原谅我。”基尔萨诺夫急促地说，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了，“那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这句话在他心中引起的是喜悦还是痛苦。

“不，你不太了解我的意思。并不算晚。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至于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看见的。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什么。不过，亚历山大，我不懂你说的什么，你同样也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我们互相都不懂得对方的意思，是吗？我们也没必要弄懂，是不是？你厌恶这些你不懂的哑谜。实际都是无中生有，就算我什么都没说过，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你的了。给我一支雪茄吧，我不经心，忘带了。我点支烟抽，咱们来开始讨论学术问题吧。我本是为这才来的--没事可干，就谈谈学术。你对于人造蛋白质这个奇特的试验有什么看法？”洛普霍夫把另一张扶手椅挪到跟前来搁腿，这样坐得更舒服些，同时点起雪茄抽起来，还继续说着。“照我看，假如能有根据证明，这将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你重新做过试验吗？”

“没有，但是必须重做。”

“你掌管着一个正规的实验室，真幸运。请重做吧，做时再仔细些吧。要知道这将涉及到人类的食物和全部生活问题的一次彻底变革--由工厂直接用无机物来制造主要的营养品。这是当今最伟大的事件，可以和牛顿的发现相媲美。你同意吗？”

“当然。不过我非常怀疑这试验的准确程度。毫无疑问，我们迟早都会达到这一步的，科学正在朝这方向前进，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眼下恐怕还没有达到。”

“你这么想吗？我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吧。再见，亚历山大。”

但是，分别之际，我请求你常到我们家去，像从前那样。再见。”

基尔萨诺夫的眼睛一直充满敌意盯着洛普霍夫，现在更是闪现出怒火。

“德米特里，你似乎有意让我依旧认为你心怀叵测。”

“我完全无意弄成这样。你应该上我们家去。这有什么特别的？我们跟你本来是朋友嘛。我的请求有哪点特别？”

“我不能去。你打算做的事情既不明智又轻率，因此也叫人厌恶。”

“我不明白你讲的什么事，我必须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谈话，正如两分钟以前你不喜欢一样。”

“我要求解释一下，德米特里。”

“用不着。其实也没有什么，没必要解释，也没必要明白。不过是件无聊小事，却叫你发火了。”

“不，我不能就这样放你走。”基尔萨诺夫抓住洛普霍夫的胳膊，他正打算走。

“坐下。你提起的话真多余。你对我的要求简直莫名其妙。你应该把话

听完。”

洛普霍夫坐下了。

“你有什么权利，”基尔萨诺夫开始说，声音比刚才还要愤怒得多，“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去做一件使我痛苦的事情？我对你负有什么义务？再说，干吗要这样？这真荒唐。好好清除掉你脑子里那些浪漫的狂想吧。只有社会上的观念和习俗变革以后，你我所认可的正常生活才能出现。社会应该加以改造，这的确如此。它也正在生活的发展中得到改造。经受过改造的人会帮助别人的。这的确如此。但是在社会还没有得到改造之前，还没有彻底变革的时候，你没有权利拿别人的命运去冒险。要知道这件事太可怕了，你是不懂呢，还是疯了？”

“是的，我一点也不懂，亚历山大。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想要从你朋友一个普普通通的请求中看出什么了不起的用意来，而他只不过是怕你忘了他，因为他乐意在自己家里看见你。我不懂你为什么耍激动。”

“不，德米特里，在这种谈话中你不可能轻易地把我甩掉的。必须给你点破，你是个疯子，你想做的是一件缺德事。不被你我认可的东西可不少。我们并不认可挨耳光是什么可耻的事，说它可耻，只是一种愚蠢的偏见、一种有害的偏见而已。但是你现在有权利让一个男子汉挨耳光吗？要知道，从你这方面说，这是下流的作恶行径，你破坏了一个人的平静生活。傻瓜，这点你懂吗？你懂吗，如果喜欢这个人，你却要求我给他一记耳光，尽管无论我或你都认为挨耳光算不上什么事--你懂吗，如果你这么要求，我会把你当作一个心怀叵测的傻瓜，如果你强迫我这样做，我就杀死你或者我自己，看谁更为没用就杀死谁，我宁可杀死你或者我自己，也决不肯照你的话去做。傻瓜，你懂吗？我说的是男子汉和打耳光，打耳光固然是无聊小事，却会暂时破坏一个男子汉的平静生活。世上除了男子还有女人，她们也是人；除了打耳光还有其他同样会破坏人的平静生活的无聊小事--不仅在你我看来是，而且实际上也是无聊小事。你懂吗，叫任何人，即使是女人，遭遇到这些在你我看来是，而实际上也是无聊小事中的任何一桩，嗯，随便哪一桩都一样，你懂吗，只要遭遇到那么一桩，都会感到厌烦、憎恶、不光彩的。你听着，我说你的想法是不光彩的。”

“我的朋友，你说的什么光彩啦、不光彩啦，都是大实话。但是我不知道你说它干吗，也不明白它跟我能有什么关系。我根本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打算拿任何一个人的平静生活去冒险，就连类似的话也没说过。你不过是在胡思乱想罢了。我只是请求你，我的朋友，别忘了我，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我乐意跟你共度时光。你能答应我这友好的请求吗？”

“我对你讲过，你的请求是不光彩的。我不干不光彩的事。”

“你不干倒是值得赞扬的。可你刚才发脾气，全是由于胡思乱想，还谈起理论来了。”

你大概要空谈理论，完全不应用到实际上去。我也照样谈谈理论吧，完全是无的放矢。

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除了说明一个抽象的真理之外，它跟任何事情都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把它应用到任何人身上。假定有谁能使别人快乐，自己又没有什么不愉快，那么依我看，他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一定会使别人快乐的，因为他自己也将从中得到快乐。

对吗？”

“这是胡扯，德米特里，你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什么也不想说，亚历山大，我只是研究理论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某人心里产生了某种需求，我们努力压制他这需求能有什么好结果吗？你怎么看呢？不就该是这样的吗：不会有好结果的，这种努力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只能使需求过度的膨胀，这是有害的；或者引它走上错误的方向，这又有害又卑劣；或者它在受压制的时候把勃勃生机也随之压抑了，这是很可惜的。”

“问题不在这儿，德米特里。我用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个理论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去冒险也觉得挺好的话，别的人是否有权利让他去冒险？你我都知道，总有一天，每个人天性中的一切要求都能完全得到满足。但是我俩又同样确切地知道，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现在明智的人只要能够自由地生活，也就满足了，即使在那个自由生活的环境中他的天性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作为一种抽象的设想，我假定有一个明智的人存在，又假定这个人女人。还是作为一种抽象的设想，我假定她的自由生活的环境是她婚后的环境，又假定她满意这个环境。那么我要说：在这些条件下，根据这个抽象的设想，谁有权利让她去冒那失掉她所满意的好环境的危险，只是为了看看这个女人能否获得更好的、并非失此就难以轻松度日的环境呢？德米特里，我们知道，黄金时代一定要到来，但那还是将来的事。铁器时代正在过去，差不多过完了，可是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照我抽象的设想，如果这个女人有什么强烈的需求--就假定是爱情上的需求吧，这也不过是举例罢了--完全得不到满足，或者只得到少许的满足，我决不反对她自己采取冒险行动。但仅仅是这样的冒险我不反对，而绝对不是由旁人唆使的冒险。如果这女人终于找到一个满足自身需求的好办法，那么就连她自己也无需去冒险了；我在抽象的意义上假定她不愿冒险，那么我要说：她不愿冒险是对的、明智的。我说：谁要让这个不想冒险的人去冒险，他的行为便是恶劣的、不明智的。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反驳这个设想的结论吗？什么办法也没有。你要明白，你无权反驳。”

“我若处在你的地位，亚历山大，我也会说你说的这些话。我说什么你在这个问题中也占有着一定的位置，不过是像你一样为了举例罢了。我知道这个问题并不涉及我俩中间的任何一人。我们只是作为学者来谈论我们共同认为正确的一般性学术观点中有趣味的方面。依照这种观点，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去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而他的立场又取决于他个人与事情的关系，我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若处在你的地位，也会说你说的这些话。你若处在我的地位，也会说我说的这些话。从一般的学术观点看，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真理。A处在B的地位就成了B，如果他处在B的地位而又没有成为B，那就是他还没有占有B的地位，他还有某些差距，不足以占有B的地位。不是这样吗？因此，你对此没必要加以反驳，正如我也没必要反驳你说的话一样。但是我也照你的样子，只提出抽象的假设，而不把它应用到任何人身上。首先让我们假定有三个人--这假定不是完全不能发生的--假定其中的甲有个秘密，他希望瞒住乙，尤其是瞒住丙。假定乙猜到了甲的这个秘密，并且对甲说：照我要求你的去做，不然我就向丙说出你的秘密。你对这件事有何想法呢？”

基尔萨诺夫脸色有点发白，久久地捻着他的小胡子。

“德米特里，你对我太恶了。”他终于说道。

“难道我必须对你好不成，难道我对你感兴趣不成？再说，我实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跟你谈话是学者跟学者谈话，我们互相提出各种各样抽象的学术问题。最后，我向你提出一个叫你思考的问题，于是我作为学者的自尊心就得到满足了。所以我想结束这次理论性的谈话。我有许多工作，不少于你的。那么，再见吧。顺便提一句，我差点儿忘了：常来我们家，亚历山大，来看看我们--你的好朋友，我们随时都高兴见到你，像过去几个月那样经常来吧。你能答应我的请求吗？”

洛普霍夫站了起来。

基尔萨诺夫坐在那儿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手指，仿佛每个指头都是一个抽象的假设。

“你对我太恶，德米特里。我不能不答应你的请求。可是我也给你加上一个条件：我会去你们家的，但是，如果我不是单独一个人离开你们家的话，那么我上哪儿你都得陪着我，而且不用我叫你。听到吗？不用我叫，你自己就来。没有你，我哪儿也不去，不去歌剧院，不去熟人家，哪儿也不去。”

“这个条件不是叫我难堪吗，亚历山大？难道我把你当小偷了吗？”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不会这样委屈你，以为你可能当我是个小偷。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把我的脑袋交到你的手心里，但愿我有权利企盼你也能如此对我。可是我有我的一定之规。你只管去做好了。”

“现在我也有我的一定之规：是的，你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现在还要进一步精心巧安排。好吧，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对的。是啊，必须对我加以强制。但是，我的朋友，尽管我非常感激你，这也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自己也尝试过强制我自己。我也具有像你一样坚强的意志，我用起计谋来并不比你差。不过，光凭算计，光凭责任感，光凭意志力，而不是凭着天性的爱好做出来的事情，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用这个方法只能扼杀什么，正如你对你所做的那样，却不能赋予人勃勃生机。”洛普霍夫听了基尔萨诺夫说的“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这句话后，大为感动。“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跟你从来没有接过吻，怎么样，现在你也许有这种愿望吧？”

如果洛普霍夫审视一下他作为理论家在这次谈话中的表现，他便会高兴地说道：“‘利己主义耍弄人’这个理论可是千真万确。他把最主要的东西隐瞒起来，却说‘假定这个女人满意自己的处境’，当时我本该说：‘亚历山大，你的假定不正确，’而我却沉默不语，因为说出这个于我不利。一个做理论家的人看到他的利己主义在实践中玩出多么巧妙的把戏来，是挺愉快的。你退出这件事情明明是由于你觉得事情已不可挽回，而利己主义却改变你的姿态，使你硬充作牺牲自我、无比高尚的好汉。”

如果基尔萨诺夫审视一下他作为理论家在这次谈话中的表现，他便会高兴地说道：“这个理论可真是正确啊。我自己要保持自己的平静，安于现状，而我却讲什么‘你没有权利拿一个女人的安宁去冒险’。这句话的意思（你自己该明白）是说：我为了某个人和你--我的朋友们的安宁，自己去受苦，确实做到了牺牲自我，无比高尚，因此你对于我这博大的胸怀该顶礼膜拜吧。一个做理论家的人看到他的利己主义在实践中玩出多么巧妙的把戏来，是挺愉快的。你退出这件事明明是为了不使自己变成傻瓜和坏蛋，而你却竟然兴高采烈，似乎你又宽宏大量、又无比高尚，能像英雄似的牺牲自我。你一开头就不接受邀请，免得再烦扰自己，失去这种由于自己的无比高尚而体验到的甜蜜的愉悦，可是利己主义却改变你的姿态，使你硬充一个坚持高尚精神、

勇于自我牺牲的好汉。”

但是无论洛普霍夫或基尔萨诺夫都无暇顾及去当什么理论家，去作这些愉快的观察：他们俩的实际工作已经相当繁重了。

二十三

基尔萨诺夫恢复他的经常访问，说起来是很自然的：他有四五个月脱离业务，落下了不少工作，因此这一个半月左右以来他不得不埋头苦干。现在他把这些落下的工作完成了，就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了。事情再明白不过了，几乎无需来加以解释。

事情确实是又明白又堂而皇之，没有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心中引起任何想法。另一方面，基尔萨诺夫仍用他从前那种无懈可击的演技，扮演了他所担任的角色。他担心，跟洛普霍夫作过学术性谈话之后再去找他这位朋友家会做出不得体之举：也许他初次见到韦拉·巴夫洛夫娜时由于激动会脸红，也许他避免瞧她却做得太惹眼，诸如此类的事难免发生。其实不，他仍旧挺满意自己跟她见面的最初一刻的表现，并且有充分的权利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脸上带着愉快友好的微笑，那是一个人在不得已与老友分别一段时间后重逢时所常有的兴奋的微笑，他的眼光平和，谈话轻松活泼，他心中毫无保留，信口开河把意见统统讲出来。即使您是个最恶毒的长舌妇，极力想在他身上找到不那么检点的地方，您还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您只看见一个兴致勃勃的人，他兴奋，是由于他清闲无事，可以有个晚上跟好朋友一起愉快地度过了。

既然最初的一刻他扮演得这样好，那么在那一晚的其余时间，他要演好又算得了什么？既然第一晚他能扮演，那么在以后所有的晚间，他扮演起来还会有什么难的呢？没有一句话他不是轻松自如款款而谈的，没有一道目光不是透射出他内心的善良、单纯、对人的坦诚和友好。

虽然他表现得不比先前差，韦拉·巴夫洛夫娜那一双紧盯着他的眼睛，还是想从他身上发现其他任何人的眼睛都看不到的许多东西。不错，那是其他任何人的眼睛都不可能发现的，连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认为生来就该做包税人的洛普霍夫，看了基尔萨诺夫每时每刻所表露出的极其自然的神情，也不禁为之惊叹，他作为理论家，从观察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多方面的观察使他不由自主地关注于从科学观点来看是属于这一现象所包含的心理特点。但是梦中那位作为歌唱家的女客人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唱歌和强迫她念日记，不是无缘无故的。当女客人向她悄声耳语时，她的眼睛就变得异常敏锐了。

连这一双眼睛也看不出什么来，可是女客人低声说：你连这点都看不出吗？虽然照我自己看，他身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不过我们还是试着瞧瞧吧。于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两眼凝视着，尽管她什么都没有看见，然而单只是两眼凝视这本身，就足以使她觉察出这里面有点不对劲儿。

比方说吧，韦拉·巴夫洛夫娜和她丈夫以及基尔萨诺夫经常去参加梅察洛夫家定期的小型晚会。为什么基尔萨诺夫在这个不拘礼节的小型晚会上不跳华尔兹舞呢？就连洛普霍夫也跳了，因为这儿有个共同遵守的规矩：即

使你是个七十高龄的老头子，到了这儿以后也得跟其他人一块疯玩疯闹，在这儿，谁也不管别人，每个人只有一个念头：多热闹热闹，多折腾折腾，就是说，让每个人，让所有的人更能尽兴玩乐玩乐。那么为什么基尔萨诺夫不跳舞呢？他终于开始跳了。但是为什么他没在头几分钟就开始跳呢？难道还需要花好几分钟的时间来考虑开始还是不开始这一重大举措吗？如果他不跳，事情立即就暴露了一半。如果虽然跳却不跟韦拉·巴夫洛夫娜跳，事情便马上完全暴露了。

但他在扮演角色时是一个过于灵活的演员，他本来不想跟韦拉·巴夫洛夫娜跳，可是他立刻明白这会引人注意的，因此，他那与韦拉·巴夫洛夫娜或世上任何人都显然毫不相干的片刻的犹豫，仅仅在她的记忆中微微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疑问，单只这么个小疑问，也并未能使曾由女客人低声提示过的她很在意，假如那位女客人没有把那么多的问题凑在一起悄悄暗示给她的话，虽然都是些根本不足挂齿的、极其微小的问题。

例如，当他们从梅察洛夫家回来，商定第二天上歌剧院看《清教徒》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对丈夫说：“我亲爱的，你不喜欢这出歌剧，你会感到无聊，我同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去。他无论听什么歌剧都感到是一种享受，假定我或者你写了一部歌剧，他大概也会去听的。”--基尔萨诺夫为什么不支持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意见，不说“德米特里，真的，我就不给你买票了”呢？这是为什么？亲爱的还是去了，这当然没有引起什么疑问：因为自从她有一次请求他“多用在身上些时间吧”以后，他就一刻也没有忘记这句话，妻子上哪儿，他总是陪着她，因此他这次去不说明什么，不过表示他人好，应该爱他罢了。这一切本来顺理成章，但是基尔萨诺夫并不知道个中原因，他为什么不支持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意见呢？当然，这是无所谓的事，几乎没有人会在意它，韦拉·巴夫洛夫娜也都快不记得它了，可是这些细沙粒虽说无人会在意，却使一边的天平盘不断往下坠。至于下面这样的谈话，比方说吧，那就已经不是细沙粒，而是硕大的谷粒了。

清教徒，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一八一八—一八三五）所作歌剧。

第二天，他们坐着一部四轮轿式出租马车（因为这比雇两部小马车便宜）上歌剧院的时候，除了谈别的事情外，也有几句涉及昨晚拜访过的梅察洛夫夫妇。他们称赞这对夫妇的和睦生活，说这是很难得的。三人都谈到了这点，包括基尔萨诺夫也说：“对了，梅察洛夫还有个优点，就是他的妻子可以无所顾忌地向他坦露心事。”基尔萨诺夫只说了这点，其实这点是他们三个人都想说的，结果却偏偏由基尔萨诺夫说出来了。他干吗要这样说？这表明什么意思？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话，那又是怎么回事？那是要颂扬洛普霍夫，要赞美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洛普霍夫的幸福。当然，他说这话时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梅察洛夫夫妇以外的人，不过假定他在想到梅察洛夫夫妇的同时也想到了洛普霍夫夫妇的话，那就表示他是直接针对韦拉·巴夫洛夫娜说的了，他这么说是有什么用意呢？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有意寻求什么，他在哪儿都能发现他所寻求的东西。

即使什么蛛丝马迹都没有，他也能看出明显的迹象。即使连影子都没有，他也能看出他所要找的东西的影子，不仅如此，他还能看出他所要找的东西的全部，他看见了它们最为实在的影像，并区每看一眼，每有一个新的想法，这影像就越发明晰起来。

此外，这儿的确有着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它本身就包含着那桩事情的全部谜底：无疑的，基尔萨诺夫是尊重洛普霍夫夫妇的，可为什么他却跟他们断绝往来两年多之久？他无疑地是个十足的正派人，怎么却又一度显得俗不可耐呢？当韦拉·巴夫洛夫娜不需要来思考这矛盾现象时，她就不去思考它，正如洛普霍夫不去思考它一样；现在她却兴致勃勃来思考一番了。

二十四

这个新的看法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就在她心中成熟了。有关基尔萨诺夫言行的零散的、快要被遗忘的印象渐渐地汇拢起来，这些言行是任何旁人都会注意的，连她本人也几乎没有察觉，只不过全是她的推测和猜想罢了。她对问题的兴趣慢慢增长：为什么将近三年来他一直躲避着她？有一个想法却逐渐确定了下来：像他这样的人疏远她，不会是由于无聊的虚荣心作祟，因为他绝对没有虚荣心。随着这些飘忽不定的思绪，一个模糊不清的念头从她生命的隐蔽深处渐渐地浮现到她的意识中来：我为什么想着他？他算是我的什么人？

一天午饭后，韦拉·巴夫洛夫娜坐在自己房里，一边做针线，一边想问题，她很平静，她想的完全不是那件事，而是关于家务、工场和她所任课程方面的种种问题，可是她的思绪却渐渐转到了那桩不知何故越发经常地使她牵挂的事情上面了。回忆涌上心头，本来不多的琐碎问题不断地增加着，变成了数不清的问题聚集在她的头脑里，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着，无数的问题终于汇成了一个问题，它的形式越发地清晰了：“我到底怎么啦？我在想什么？我有什么感觉？”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手指忘了做针线活，活计从下垂的手中掉了下来，她的脸有点发白，接着是红一阵，白一阵，仿佛是一团火光照得她满脸通红，一霎那间这张脸又变得像雪一样白了。她六神无主地跑进了丈夫的房里，扑过去坐在他的腿上，猛地一下子搂住了他，把头搁在他的肩膀上面，好用来支撑着她的头和遮掩住她的脸，她喘吁吁地说道：“我亲爱的，我爱他。”于是就大声哭了起来。

“这是怎么啦，我亲爱的？你这有什么可伤心的呢？”

“我不愿叫你难过，我亲爱的，我愿意爱你。”

“你努力努力再看，如果能行，那固然最好。别激动，过一段时间再看，什么能行，什么行不通。你不是对我感情很深吗，你怎么会叫我难过呢？”

他抚摩她的头发，吻她的头，握着她的手。她长时间地无法自控，一直在抽抽搭搭地痛哭着，但还是渐渐平静下来了。他对于她的这番供认早已有了思想准备，所以能够冷静平和地接受，不过她却没有看清他的脸。

“我不愿跟他见面，我要对他说别再来我们家。”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你自己考虑吧，我的朋友，怎么对你更好就怎么办。等你平静了我们再商量。无论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不是还可以做朋友吗？把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瞧你握得有多紧。”他说每句话之前都有一次长久的间歇，间歇时他不停地抚摩着她的头发，爱抚她，犹如一个哥哥爱抚悲伤的妹妹。“我的朋友，你可记得我们成了未婚夫妻以后你对我说的话？‘你把我释放了出

来！”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和爱抚。“你可记得，你我头一回怎样谈论‘爱一个人’这句话的？‘爱一个人’就是说，只要对他好的事，都应该高兴地去做，凡是为了他好而必须做的一切，都是要乐于去做的。对吗？”又是一阵沉默和爱抚。“凡是你觉得好的，也都使我高兴。不过你要看看你觉得怎样更好。你为什么伤心呢？如果你没有不幸，我还会有什么不幸？”

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复着，重复一遍照例会有些细微的变异，这样消磨了不少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洛普霍夫和韦拉·巴夫洛夫娜都同样地不好受。但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总算是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呼吸也比较轻松了。她紧紧地搂着丈夫，反复说着：“我愿意爱你，我亲爱的，只爱你一个，除了你我不愿爱任何人。”

他没有对她说这已经由不得她作主了：必须再过一段时间，等她拿了主意，她的精力才能恢复过来。至于是什么主意倒没有关系。洛普霍夫写了一张条子交给玛莎，等基尔萨诺夫来时好给他：“亚历山大，现在别进来，而且不到时候你也别来。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会有的。只是需要休息一下。”“需要休息一下”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这两句话搭配得很好。基尔萨诺夫来了，他看完条子，对玛莎说：他正是为这张条子才来的，现在他没有工夫进去，他要上别的地方，等他办完这条子上所托付的事返回时再来。

晚间看来过得挺平静。前半晚，韦拉·巴夫洛夫娜支走了丈夫，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房里，后半晚他坐在她的身旁，还是来回说那几句话安慰她。当然，主要不是靠话语，而是靠他那平和镇静的嗓音，他的嗓音自然是不大快活的，可也并不悲伤，或许还透着几分深沉，他的面容也是一样。韦拉·巴夫洛夫娜听着这声音，看着这面容，便开始认可了--也并不是完全认可，而是有那么几分认可，不，不是有几分，是差不多完全认可了--本来没有什么严重的事，她只不过把一个幻想。几天以内就会烟消云散的幻想当作了强烈的爱情罢了。也许她是这样思前想后的：“不，我不认为这是幻想，我感觉这不像是幻想，对，这不像是幻想。不，这是幻想，是幻想，”她越来越坚定地认为那是幻想，于是她真的完全认定了。况且，听着这轻轻的、平和的、一再表示着“没有什么严重的事”的嗓音，她怎么能不这样认定呢？她听着这声音终于平静地睡着了，她睡得挺熟，没有梦见那位女客人，醒来时天色已晚，睡醒后感到精力充沛。

二十五

“忘掉烦心事的最好方法是工作。”韦拉·巴夫洛夫娜想道，她想得完全正确。

“在我去掉这心病以前，我要整天待在工场。这对我会有效的。”

于是她开始整天待在工场。头一天她确实从重重的心事中解脱出来了。第二天她只觉得很累，解脱得很有限，第三天可就根本无法解脱了。这样过了一星期左右。

斗争是艰苦的。韦拉·巴夫洛夫娜脸色变得苍白，但是表面上还非常

平静，甚至竭力装得很快活，而且几乎无时无刻都装得那么出色。尽管任何人都没有发觉什么，只是认为她脸色苍白是由于身体欠佳缘故，而洛普霍夫可不这样想，他即使不看，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他根本不用看也全明白。

“韦罗奇卡，”过了一个星期他说话了，“你我的生活应验了古时的蒙昧传说：鞋匠总是没鞋穿，裁缝穿衣不合身。我们教别人按照我们的经济原则来生活，我们自己却不想按照这些原则来安排生活。一个大家庭不是比几个分散的小家庭过得省吗？我希望把这个规律应用到我们家庭来。如果我们跟别人伙着过，我们差不多能节约一半开销，跟我们伙着过的人也如是。那样，我光靠工厂的薪水生活就够用了，可以把令人民烦的可恶的家馆通通辞掉，我想要休息休息，搞搞科研，重抓专业。只要跟伙着过的人关系处好就行。你以为怎么样？”

韦拉·巴夫洛夫娜早就用充满猜疑和愤怒的目光死死盯着丈夫好久了，正如作理论性谈话那天基尔萨诺夫看他的目光一样。他说完话时，她的脸通红通红的。

“我请你停止这种不得体的谈话。”

“怎么不得体呢，韦罗奇卡？我只是说说节省钱的方法。像你我这样不太富裕的人对此可不能忽视。我的工作很繁重，其中的一部分还叫我厌恶。”

“你不该这么跟我讲话，”韦拉·巴夫洛夫娜站了起来，“我不许别人含糊糊地跟我讲话。你想说什么就大胆直说吧！”

“我只想说，韦罗奇卡，考虑考虑我们的利益，对我们有好处……”

“还说！住嘴！谁给你管束我的权利呢？我会恨你的！”她很快地离开，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房门。

这是他们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吵嘴。

韦拉·巴夫洛夫娜锁着房门，一直坐到了深夜，然后又来到丈夫房里。

“我亲爱的，我跟你说了好多过分厉害的话，你听了可别生气。你看，我正在斗争。

你不但支持我，反而帮助我的对立面，我希望，是的，我希望能挺得住。”

“原谅我，我的朋友，我开头太鲁莽了。不过我们不是和好了吗？我们谈一谈吧。”

“对啊，和好了，我亲爱的。但是可别跟我作对，我跟自己斗争已经相当不易了。”

“那是白费工夫，韦罗奇卡。你也花了工夫分析过自己的感情，你看，它比你当初预料的更为严重。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

“不，我亲爱的，我愿意爱你。不愿，不愿使你难过。”

“我的朋友，你愿意我好。那么，你以为我会乐意或者需要看着你继续折磨自己吗？”

“不过，我亲爱的，你是太爱我了！”

“当然，韦罗奇卡，我很爱你，这还用说。但是我俩都懂得什么叫爱情。爱情不就是你所爱的人快乐你也快乐，他痛苦你也痛苦吗？你折磨自己就是折磨我啊。”

“不错，我亲爱的，但是假如我听任这种感情发展，你一定会感到痛苦，唉，我真不懂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情！我诅咒它！”

“怎么会产生和为什么产生，这无关紧要，反正是不可逆转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么是你痛苦，我也受你拖累而痛苦，要么是你不再痛苦，我也好过啦。”

“可是，我亲爱的，我不会再痛苦，那会过去的。你可以看到，那会过去的。”

“感谢你所作的努力。我敬重你这番努力，因为它表示你有毅力完成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不过你要知道，韦罗奇卡，只有你才觉得该做，我可不这么看。我作为旁观者，对你的处境比你看得更清楚。我知道这无济于事。如果力量够用，你就斗争吧。但是不要管我，别以为你会使我难过。你不是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吗，况且你也知道我对处理这件事的主张决不会动摇，而且它确实是正确的，这一切你本来都知道。难道你会欺骗我？难道你会不再尊重我？我可以进一步说：难道你对我的感情改变性质以后便会减弱？不是正好相反吗？由于你发现我对你没有敌意，这感情不是会变得更强烈吗？别怜惜我，我的命运丝毫用不着怜惜，因为你决不会受我拖累而被夺去幸福。但是说到此为止吧。这样的事再说下去要难过的，你听着就更加不好过了。只是你可要记住我刚刚说过的话，韦罗奇卡。原谅我，韦罗奇卡。回到你房里想一想，不过最好还是睡觉。别管我，顾你自己吧。只有顾你自己，你才不致于给我造成无谓的苦恼。”

二十六

过了两个星期，当洛普霍夫坐在他的工厂办公室的时候，韦拉·巴夫洛夫娜却在异常激动的心情中度过了整整一上午。她先是扑到床上，双手捂住脸，过了一刻钟霍地跳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继而又倒人扶手椅中，坐下了。然后又迈着急促的步子，踉跄不稳地走动起来，接着重又扑到床上，重又下地走动。她几次三番走近写字台，可是站一会便跑开了。最后她坐下写了几句话，封上信封，过了半个小时，她却拿起那封信，撕碎烧毁了。她又慌乱地转来转去好半天，重新写了一封信，又把它撕碎烧毁了。

她又乱转了一阵，重又写了一封，刚刚封上，还顾不得写地址，就急急慌慌地飞快地跑进丈夫房里，把信扔在桌子上面，跑回自己的房里，倒在扶手椅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捂住脸。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后，门铃响了。这是他。她马上奔往书房去拿信，想要撕毁烧掉它。可是信在哪儿？信没有了，到底跑哪儿去了呢？她急忙在各种文件中翻找：信到底在哪儿？这时玛莎已经开了门，洛普霍夫在房门口看见韦拉·巴夫洛夫娜神情恍惚，脸色苍白，正打他的书房出来一闪身朝她自己屋里跑去。

他没有去追她，直接进了书房。他冷漠地、慢悠悠地察看了一下桌子和桌子近旁的地方。是的，他已有好几天都在盼望着类似的情况发生--一次谈话或一封信。现在信就在眼前，没写地址，可是盖着她的印章。当然，她也许来找过这封信，想把它销毁，也许是刚刚扔下。不，她找过：文件都给翻乱了。可是她怎么能找得到呢？她扔下信的时候那样慌乱不安，仿佛猛然甩掉一块烫手的煤块，那封信掠过整个桌面，掉到桌子后边的窗台上了。他几乎无需来读它，便知道其中的内容了。但他还是不能不读：

我亲爱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眷恋你。我就是为你而死也心甘！啊，如果我的死能使你生活得更幸福，我会含笑去死的！可是我没有他却活不下去。我伤透了你的心，我亲爱的，我折磨坏了你，我的朋友，而我并不愿意这样。我违反了自己的初衷。原谅我吧，原谅我。

洛普霍夫站在桌前，俯身瞧着椅子的扶手，大约有一刻钟或一刻钟以上。虽然这打击是预料到的，他还是感到痛苦。虽然他事先已经想好并且决定了在接到这种信件或听到这种内心呐喊以后他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他还是不能够一下子把思想集中起来。不过他最终还是把思想集中了起来。他走进厨房对玛莎说：

“玛莎，请等一等再开饭，一会我通知您，我不大舒服，必须在午饭以前吃药。您不要等我，自己先吃吧。不用着急，耽误不了，我过一会才能吃饭呢。到时候我通知您。”

他从厨房走到妻子屋里。她躺着，脸埋在枕头里，他进来时她全身猛然哆嗦了一下：

“你找到那信啦，读过啦！我的天，我真是疯了！我写的什么呀，这全是假话，我热昏头啦！”

“当然，我的朋友，对那些话不必当真，因为当时你过于激动。这类事情不能随随便便做决定。你我还来得及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平心静气地多考虑考虑，多谈它几次。

现在我只想对你讲讲我的工作，我的朋友。我在工作中进行了不少改革，我很满意。你听着吗？”不用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在听，她只能说无论她是否在听，但她总还是听到了一些什么，可是她听到了什么呢，却顾不上搞清楚。不过她毕竟还是听到并且听清楚了一点：即他谈的是跟信件毫不相干的另一码事，她慢慢地开始倾听起来了，因为她很想把精神集中在什么事情上，而不再考虑那封信。虽然她听了好久还听不明白，但是丈夫的冷静而踌躇满志的嗓音毕竟还是使她平静了下来，随后她甚至能够听懂了。

“你听一听吧，在我看来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事。”丈夫问完“你在听吗？”然后就不间断地说下去，“是的，这些改革使我感到很愉快。”于是他细致入微地讲述着。这些事有四分之三她本来就知道，不，其实她通通都知道，可是没关系，让他讲吧，他这人真好！他什么都说：他对教家馆如何早就厌烦啦，为什么厌烦，在哪一家教课或者教哪些学生时他觉得厌烦，他对于办公室的工作怎么会并不厌烦（因为这个工作重要，对全厂的人都有影响），他怎样能在工厂做出了一些成绩：他培养了一批热心于扫盲的人员，教会了他们如何进行扫盲，并且迫使厂方付给这些教员酬金，他证明工人经过扫盲会减少对机器的损坏，使工作少受损失，因为经过扫盲旷工和酗酒的现象也可以减少。当然，扫盲的酬金微不足道。他又诱导工人改掉酗酒的毛病，为此经常出人于他们就餐的小饭馆。诸如此类的事他干得真不少。但主要的是他办事的干练机灵已被厂里公认了，他渐渐地把整个厂务统统抓到了自己手中，所以在讲话的结尾，也就是洛普霍夫的兴致所在，便是：他获得了副厂长的职位，至于厂长，那只有同事中间有声望、薪水高的人才能担任。而实际管事的却是洛普霍夫。那位同事只在这个条件下才肯接受厂长的职位，他说：“我不行，我哪成！”--“您挂个名就行，这个职务必须由一位大家尊敬的人士来担任，您什么都不用过问，由我来做好了。”--“如果这样，那还可

以，我就权且接受这个职务。”其实洛普霍夫并不在乎权力，他看重的是能拿到三千五百卢布的薪水，这要比他原先教家馆、偶然接受的杂七杂八的文字工作、以及他在厂里的原职所得相加的全部收入几乎还要多一千卢布。现在他尽可把工厂以外的兼职统统辞掉，那可真棒极了。他讲了半个多小时，等他讲完的时候，韦拉·巴夫洛夫娜已经能够开口说话了，她说这确实挺好，她还整了整头发，就去吃饭了。

午饭后，玛莎拿到八十银戈比的车费，因为她一共得去四处地方为洛普霍夫送便条，条子上说：今晚有空，欢迎各位光临。没过多长时间，可怕的拉赫梅托夫来了，随后渐渐地聚集了一大群年轻人，开始了一次激烈的学术性的座谈，每个人的意见中种种矛盾的观点，几乎都遭到了所有其他人异常尖锐的揭露，有些不愿再接着进行高雅争辩的，就陪着韦拉·巴夫洛夫娜来打发时间，晚上的时间过了一半，她才明白过来玛莎外出的目的。他心肠真好！这一次韦拉·巴夫洛夫娜由衷地欢迎她的年轻朋友们，虽然她没有跟他们疯玩疯闹，而是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可她非常欢喜他们，连拉赫梅托夫她也想热烈地吻一吻。

客人直到深夜三点钟才散，散得这么晚再好不过了。韦拉·巴夫洛夫娜由于白天过于激动，已经疲惫不堪了，可是她刚刚睡下，丈夫就进来了。

“我的朋友韦罗奇卡，我刚才谈工厂的时候，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关于我的新职务的事，这事其实无关紧要，不值得专门提它，不过顺便说说罢了。只是我有个请求：我困了，你也困了，如果关于工厂的事还有什么没谈完的，就让我们明天再谈，现在我只简单说两句。你知道，我接受副厂长职务的时候谈妥了这样一个条件：我愿意什么时候上任就什么时候上任，即使再过一个月，再过两个月也行。现在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回梁赞探亲，我已经五年没见到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了。再见，韦罗奇卡。别起来。明天还有时间谈。睡吧。”

二十七

第二天韦拉·巴夫洛夫娜走出自己的房间时，丈夫和玛莎已经在往两只手提箱里装东西了。玛莎一直没有离开过：洛普霍夫给了她那么多东西要她包扎、叠放，她哪里忙得过来呢？“韦罗奇卡，你也来帮帮我们。”于是他们三人一边喝茶，一边清理和收拾东西。韦拉·巴夫洛夫娜刚开始清醒过来，丈夫就说：“十点半啦，该上站了。”

“我亲爱的，我跟你一道去。”

“我的朋友，韦罗奇卡，我要带两只箱子呐，车里坐不下。你跟玛莎坐一辆车吧。”

“我不是说去车站。是去梁赞。”

“噢，要是这样，那就让箱子随玛莎走，我俩坐一辆吧。”

人在街上谈话不会太动感情，而且路上各种声响十分嘈杂，有许多话洛普霍夫都没能听全，他的回答对方又多数听不清楚，因此有时他索性就不回答了。

“我跟你一道去梁赞。”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停地重复说。

“可是你没有准备行装啊，怎么能去呢？如果想去，得准备准备：随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办吧。不过我请求你一件事：等我来信以后再说。明天信就能到，我写好以后在路上寄出。你明大就可以收到，等一等，求你啦。”

她放他进车厢前，在车站的走廊上紧紧地拥抱着他，吻着他，泪如泉涌。他却尽谈他厂里的事，说这些事他是如何地喜欢干，又说他的年老父母亲看到他会多么地高兴，还说世间最宝贵的就是健康，其他的全是白扯，她应该保重身体，临别的时候，他隔着车上的栅门对她说：“你昨天的信上说你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眷恋我。这是真的，我亲爱的韦罗奇卡。我对你的眷恋也不亚于你。但是你我清楚地知道，喜欢一个人必定会希望他幸福。而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幸福可言。所以你不愿束缚我，我也不愿束缚你。如果你因为有了我而把自己束缚起来，那我会苦恼的，所以你可不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对你更好，就怎样做。我们以后再看。等我要回来的时候，你给我去封信。再见，我的朋友，第二遍铃响了，不能耽搁了。再见吧。”

二十八

这是四月底的事。六月中，洛普霍夫回来了。他在彼得堡约莫待了三个星期，然后就去了莫斯科，据他说是为了厂里的事情。他是七月九日离去的，而七月十一日早晨在莫斯科火车站旁的旅馆里，便发生了那件由于一个来住宿的客人不起床而引出的疑案，过了大约两小时的工夫，又出现了石岛别墅中的一场争吵。现在敏感的男读者可不会猜错这自杀的人是谁了。“我早就料到是洛普霍夫。”敏感的男读者因为自己的神机妙算而眉飞色舞地说。那么他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他的制帽的帽圈怎么被子弹打穿的呢？“无关紧要，这全是他的鬼点子，他还用渔网去打捞他自己呐，这鬼精灵。”敏感的男读者还在拼命地说。好，上帝保信你，由你说去，跟你没理可讲。

二十九

一个特别的人

基尔萨诺夫离去以后大约过了三小时，韦拉·巴夫洛夫娜才清醒过来，她头脑中出现的头一个念头是：决不能这样就把工场放弃。是啊，虽然韦拉·巴夫洛夫娜喜欢向人家证明工场是在自行运转，其实她也知道这种想法只是自我欺骗罢了。实际上工场需要领导，否则全都垮掉。不过现在事业已经很牢靠，领导起来麻烦可能不多了。梅察洛娃有两个孩子，但是她一天还是可以拨出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来，况且有些天还能多拨出些时间。她一定不会拒绝，因为眼下她在工场已经在于很多的工作了。韦拉·巴夫洛夫娜开始清理东西，准备变卖，又亲自派玛莎前往梅察洛娃家，先请她来，然后再去找那买卖旧衣和杂物的小商贩拉赫莉。拉赫莉是个绝顶精明、极会赚钱的犹太女人，却是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女相好，拉赫莉对她绝对诚实，几乎所有的犹太小商

贩对所有的正派人都如此。拉赫莉和玛莎应该去城里的寓所，把留在那儿的衣物归拢在一起，再顺路去找皮货商，韦拉·巴夫洛夫娜交给过他几件皮大衣，请他夏天保管保管。然后她们便带上这堆东西回到别墅，让拉赫莉好好估个价，按批发价一齐收购走。

玛莎出门时碰见拉赫梅托夫，他已经在别墅附近溜达了半个来小时了。

“您出去吗，玛莎？去很久吗？”

“是的，没准夜里才能回来呐。有很多事得办。”

“韦拉·巴夫洛夫娜一个人在家？”

“一个人

“那么我去坐坐，替您陪会儿她，说不定有什么事需要我呢。”

“请吧，要不我真为她担心。我倒忘了，拉赫梅托夫先生：请把邻居家的厨娘或保姆叫过来一个，她们都是我的朋友，叫她们来给开开饭，她还没吃午饭呐。”

“没关系。我也没吃，我们自己开饭好了。您吃过啦？”

“吃过啦，不吃饭，韦拉·巴夫洛夫娜不会让我出去的。”

“这还算好。我还以为她尽想着自己的伤心事，把您吃饭的事给忘了呢。”

除了玛莎以及那些心灵单纯、穿著朴素得跟她一样或更有甚之的人之外，谁都有点惧怕拉赫梅托夫。就连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甚至那些胆大包天、谁都不怕的人，见了他都不免生出几分敬畏来。他不大跟韦拉·巴夫洛夫娜接近，她认为他毫无情趣，他从来不入她那圈子。玛莎却喜欢他，虽然他不像所有其他客人跟她那么亲切，那么爱说话。

“我不待邀请就来了，韦拉·巴夫洛夫娜，”他开口说，“不过我已经见过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了，情况我全知道了。因此我考虑或许有什么事情需要给您帮帮忙，我可以在您这儿待一晚上。”

本来他马上就可以帮忙的，眼下是帮韦拉·巴夫洛夫娜清理东西。任何别人处在拉赫梅托夫的位置上，准会依照她的请求或是自告奋勇立即着手于这件事。但他并未自告奋勇，更无人来请求。韦拉·巴夫洛夫娜只是握握他的手，真心实意地说，她很感激他的关怀。

“我待在书房，”他回答，“如果需要我帮忙，您就招呼我。要是有人来，我去开门，您自己就不用费心了。”

讲完这几句话，他不慌不忙地走进书房，从衣袋中掏出一大块火腿和一片黑面包--大约总共有四俄磅--坐下来津津有味地咀嚼着，他全都吃光了，又喝了半瓶水，然后走到书架旁边开始查找，想挑一本书来读读：“这本我知道……”、“缺乏创见……”，“缺乏创见……”，“缺乏创见……”，“缺乏创见……”。这“缺乏创见”是针对麦考莱、基佐、梯也尔、兰克和盖尔文努斯的著作说的。“啊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看到几册厚书的书脊上有《牛顿全集》的字样，说道。他急忙翻看起那几册书来，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地方，他由衷地笑着，说：“就是这，就是这，”原来那是《Observations on the Prophecies of Daniel and the Apocalypse of St. John》，即《评但以理预言书与圣约翰启示录》。“的确，至今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还缺乏深厚的功底。牛顿写这篇评论是在晚年，当时他已半健全，半癫狂。关于疯狂与智慧混合掺半的问题的一部经典性文献。这本来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从所有的一切事件中，从几乎所有的书本和几乎所有的人的头脑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混合掺半的现象。但它在这儿一

定会具有样板式的形态：第一，牛顿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智者中最富天才和最合标准的智者；第二，跟他的智慧混合掺半的疯狂，却又是公认的、毋庸置疑的疯狂。因此，那是这方面的一本主要的书。这一普遍现象的最细微的特点，在这本书中应该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表现得更鲜明，同时谁也不能去怀疑，这正是那种‘疯狂与智慧混合掺半’的现象的特点。一本值得研究的书。”他兴致勃勃地开始读那本书，近一百年来，除了校对，恐怕未必会有人读过它。除了拉赫梅托夫，对任何人来说读这本书犹如嚼沙子、啃锯末。可他却读得津津有味。

一俄磅合四九·五克。

麦考莱、基佐、梯也尔、兰克和盖尔文努斯系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史学家。

但以理预言见《旧约·但以理书》，圣约翰启示录见《新约·启示录》。牛顿的这篇著作发表于一七三三年，当时他已去世。

上述牛顿著作作用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宗教问题，同时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像拉赫梅托夫这样的人很少，迄今为止，这种典范我只见过八个，其中有两个妇女。

除了有一点相同，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类似之处。他们当中有的人厚道温柔，有的人却严厉呆板；有的人郁郁寡欢，有的人却快快活活；有的人忙忙碌碌，有的人却斯斯文文；有的人容易动感情流眼泪（一个面孔严肃，喜欢肆无忌惮地嘲笑人；另一个面无表情，沉默寡言，对一切都漠然。他俩在我面前痛哭过好几回，好像歇斯底里的妇女，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事情哭，而是漫无边际地聊着聊着就哭起来了。我相信他们单独相处时会常常哭的），也有的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处事不惊、镇静如常。除了有一点相同，他们彼此没有任何类似之处，不过，单只是这个相同点已经足以使他们构成同类，区别于一切其他人了。我跟他们中的几位曾很接近，当我跟这些人单独相处时，我取笑他们。

他们或者生气，或者不生气，可是他们也同样取笑自己。他们确实有许多可笑的地方，他们身上主要的一切，致使他们成为特殊一类人的一切，全都是可笑的。我喜欢取笑这类人。

我在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圈子里见过他们中间的一个，我这儿要讲的就是这一个。

他是个活的人证，证明对于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第二个梦中提到的洛普霍夫和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关于土壤性质的议论是需要有所保留的，那就是，无论土壤如何，至少总可以在其中找到一小块能长出健康麦穗的地方。说真的，我的小说的主角韦拉·巴夫洛夫娜、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的家谱是无法回溯到祖父母之前的。也许勉强能再添上个曾祖母，曾祖父必定早已被人忘却了，只知道他是曾祖母的丈夫，名叫基里尔，因为祖父叫格拉西姆·基里雷奇。拉赫梅托夫出身的家族从十三世纪起就已闻名于世，不但是我国，也是全欧洲的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从前有些鞑靼万人长--军长--在特维尔连同他们下属的武士一并被杀，据编年史记载，他们被杀似乎是由于他们企图叫人民改信伊斯兰教（他们大概不曾有过这种企图），实际上还是因为他们施横暴。他们当中有一个拉赫梅特。这拉赫梅特娶了个俄罗斯妻子，她本是特维尔一位内廷总管即宫廷事务大臣兼元帅的侄女，被拉赫梅特霸占。他们

有个年幼的儿子，人家看他母亲的情面，宽恕了他，而且将他的原名拉蒂夫改为米哈伊尔。拉赫梅托夫上族的祖先便是这拉蒂夫--米哈伊尔·拉赫梅托维奇。他们在特维尔当过大臣，在莫斯科只做过御前侍臣，上世纪在彼得堡却当了上将，当然，远非全族的人都能如此：因为这个家族支脉颇多，即使把上将军衔都授予他们家族，也是不够分配的。我们的拉赫梅托夫的高祖是伊凡·伊凡诺维奇·舒瓦洛夫的朋友，由于跟米尼赫有私交而失宠被黜，后来就是舒瓦洛夫帮他复职的。

曾祖父是鲁勉采夫 的同事，升至上将，却在诺维 附近阵亡了。祖父曾随亚历山大去提尔西特 ，他本来前程远大，能超过任何人，但是由于他跟斯彼兰斯基 有私交，便很早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父亲在仕途上无大起大落，四十岁时以中将衔退休，从位于熊河 上游他的多处田庄中选出一处定居下来。这些田庄不算很大，共有两千五百来名农奴，而他在乡下赋闲期间所添的孩子却有八个之多。我们的拉赫梅托夫排行倒数第二，他下面还有个妹妹。因此我们的拉赫梅托夫已然不可能拥有巨额遗产了，他仅仅能分得将近四百名农奴和七千俄亩 田地。谁也不知道他怎样处置了这批农奴和五千五百俄亩田地 ，也不知道他给自己留下了一千五百俄亩，而且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地主，以及他把留下的一份田地租出去还有近三千卢布的收入。当他生活在我们中间时，谁也不知道这些，这是我们后来才打听出来的。不过当时我们自然已经认定他是与那个拉赫梅托夫同宗同族。他们之中有许多富有的地主，他们全族人在熊河、霍表尔河、苏拉河和茨纳河 的上游总共拥有近七万五千名农奴，他们一直担任着那些地方的县贵族长，并且还经常有人担任他们拥有着农奴的上游三个省份的省贵族长，不是这一省，就是那一省。

我们知道我们的熟人拉赫梅托夫每年的花销约为四百卢布，这个数目对当时的大学生来说已很可观，但是就拉赫梅托夫家族的地主来说，却又是微乎其微了。我们当中谁都很少去打听这类事情，我们不去打听也可以断定：我们的拉赫梅托夫源出于拉赫梅托夫家族中败落的、丧失了田庄的一支，他是省税务局里一个参议官的儿子，这参议官给孩子们留下了一笔不多的财产。而我们对这类事确实不感兴趣。

特维尔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末叶起长期受鞑靼蒙古人统治，一二四六至一四八五年为特维尔公国首府，后来并入莫斯科大公国。

舒瓦洛夫（一七二九—一七九七）俄国国务活动家。

米尼赫（一六八三—一七六七）俄国国务活动家，宫廷政变后，伊莉莎白女皇登位（一八四一），他作为安娜女皇的宠信被流放。

鲁勉采夫（一七二五—一七九六）俄军著名统帅。

诺维，意大利北部城市。一七九九年俄军著名统帅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奥联军在诺维战役中击败法军。

一八 七年，依法在普鲁土的提尔西特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

斯彼兰斯基（一七七二—一八三九），俄国国务活动家，因其自由主义的改革遭到宫廷贵族的强烈反对，于一八一一年被免职，后被流放（一八一二—一八一六）。

熊河，顿阿支流。

一俄亩合一． 九公顷。

暗示他把这些田产无偿地分给了农民。

霍表尔河，顿河支流；苏拉河，伏尔加河支流；茨纳河为特维尔附近一条小河。

现在他二十二岁，他十六岁就当大学生，可是几乎有三年离校外出。他念完二年级，回到田庄，打消了监护人的抗拒，处置了自己的产业，尽管他受到兄长们的诅咒，甚至姐夫妹夫都禁止他的姐妹提他的名字。然后他便采用各种方式漫游俄国：走过旱路，也走过水路，无论走旱路还是走水路，既用平常的办法，又用不平常的办法，例如步行，乘“拉斯希瓦”，驾柳叶小舟。他有过多冒险经历，全是他自己有意安排的。顺便说说，他送进喀山大学两人，送进莫斯科大学五人，他们的费用由他提供。而在他自己打算居住的彼得堡，他却没有送任何人上学，因此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的收入不是四百，而是三千卢布。这是到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只是发现他长期下落不明，直到他坐在基尔萨诺夫的书房里阅读牛顿对《启示录》的解释以前两年，他才回到彼得堡，进了语文系，早先他念的是自然科学系。我们知道的仅此而已。

“拉斯希瓦”，两端尖的大木帆船（多为平底，航行在伏尔加河及里海）。

虽然拉赫梅托夫在彼得堡的熟人当中谁也不了解他的亲属关系和财产关系，可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两个外号，其中一个读者已经在这部小说里见到过了——“严肃派”。他听到后总是像平常那样微微一笑，欣然接受却又略带苦涩。而当人家叫他尼基图什卡或洛莫夫，或者用外号的全名尼基图什卡·洛莫夫去称呼他时，他却开朗地、甜蜜地笑了。他这样笑有充分的缘由，因为他享有使用这个千百万人所颂扬的光荣名字的权利，并非由于自然禀赋，他是凭着自己的坚强意志取得的。不过这个名字只在这片南北伸延八省、有一百俄里宽的狭长地带以内传扬开的，因此我还得向俄国其余各地的读者解释一下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尼基图什卡·洛莫夫是二十至十五年前伏尔加河上的一名纤夫，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他身高两俄尺零十五寸1，长得虎背熊腰，体重十五普特，不过他只是壮实，并不肥胖。他究竟有多大力气，只要说出一点就足够证明：他一人拿四个人的工钱。每逢船舶抵达一个城市，他一来到市场——伏尔加河流域叫“集市”，——远处条条胡同都传出小伙子们的喊声：“尼基图什卡·洛莫夫来啦，厄基图什卡·洛莫夫来啦！”于是大家全跑到从码头通往集市的大街上，一大群人跟随在他们英雄的身后蜂拥而去。

一俄尺合 .七一公尺。

一普特合一六.三八公斤。

当拉赫梅托夫十六岁来到彼得堡时，就这方面说只是一个平常的少年。他个子挺高，长得相当结实，但是力气却毫不出众，在他碰见的同龄人中间，十个里面总会有两个能对付得了他。可是到了十六岁半，他忽然想起必须具有极佳的体质。于是开始下工夫。

从此他就热中于做体操，这自然很好，不过体操只能增强其体质，首先却还得给身体打基础。所以有一阵，他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比练体操多一倍的时间去干种种需要力气的粗活如打水、搬柴、劈柴、锯木料、凿石头、翻地、打铁。他干过许多活儿，经常变换工种，因为每一种新的活儿和每一次变换工种，都会使他的某些部位的肌肉更加发达。

他按照拳击手的食谱进食，专门给自己食用那些以能够增强体力而著

称的东西--正是专门给自己食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半生的煎牛排。此后他一直这样生活着。如此锻炼了一年，他才外出旅行，旅行途中他有更多的机会来增强体力：他种过庄稼，做过木匠、摆渡的船夫以及各种对健康有益的行业中的工人；有一回他甚至作为一名纤夫走遍了伏尔加河流域，从杜博夫卡直到雷宾斯克。如果他宣称想当纤夫，船主和纤夫们都一定觉得他绝顶荒唐，不会收留他的。但是他仅仅作为一名乘客上船，先跟大伙儿交上了朋友，然后再帮忙拉拉纤，过了一个星期，他拉得就跟一个地道的纤夫一模一样了。人家很快地注意到了这个新手不弱，开始跟他比起力气来，他竟然胜过了三个甚至四个最壮实的伙伴。当时他才二十岁，他的纤夫伙伴们便给他取名为尼基图什卡·洛莫夫，来纪念那位当时已退出舞台的英雄人物。第二年夏天他乘轮船外出，聚集在甲板上的平民乘客中，有一个是他去年拉纤的伙伴，这么一来，同行的大学生才知道该叫他尼基图什卡·洛莫夫。他确实力大无比，并且不惜花费工夫保持住这大力气。“需要这样，”他说，“这样会得到老百姓的敬爱，这有好处，可能会有用的。”

杜博夫卡，伏尔加河下游市镇，离察里津不远。雷宾斯克，伏尔加河上游市镇，在雅罗斯拉夫尔境内。

这一点从他十六岁起就深深地植根在他的脑子里了，因为一般来说，从那时起他的特性已开始发展起来了。他十六岁来彼得堡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刚从中学毕业的好学生，一个平常的、善良诚实的少年，他像一般大学新生通常那样度过了三四个月。可是他渐渐听说大学生中间有些特别聪明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与众不同。他打听出来四五个这类人的名字，当时他们的人数还少。他们引起他的兴趣，他设法去结识他们。他偶然邂逅基尔萨诺夫，于是从平常人到一个特别的人的变化开始了，他一直变到后来的尼基图什卡·洛莫夫和严肃派。第一晚，他贪婪地听着基尔萨诺夫说话，他哭着，喊着，高声诅咒那早该灭亡的事物，热烈祝福应该长存的事物，他激动兴奋地打断着对方的话语。

“我从哪些书读起呢？”他问。基尔萨诺夫为他指点迷津。第二天早晨八点钟起，他就在涅瓦大街上来回踱步，从海军部码头走到警察桥，等着随便哪一家德国书店或法国书店最先开门，他便进去购买他所需要的书，回家一连读了三天三夜还不止，从星期四上午十一点到星期日晚间九点，总共八十二个小时。头两夜他不睡还没事，第三夜喝了八杯最浓的咖啡，到第四夜，无论什么咖啡都不管用了，他倒在地板上，一睡就是十四五个小时。隔了一周，他来找基尔萨诺夫，要求再指定一些书，并进行解释。他和基尔萨诺夫做朋友之后，又通过基尔萨诺夫结交了洛普霍夫。过了半年，虽然他才十七岁，而他们都快二十一了，但是他们并不把他看得比自己年幼，他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人了。

在他已往的生活中有些什么缘由，使他成了这样的人物呢？缘由不多，但确实有。

他父亲性情专横，却聪明，有教养，可又是个极端的保守派，像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似的一个极端的保守派，但是比她诚实。他当然受不了他的父亲。单是父亲这样倒还没有什么。他母亲偏偏又是个温文尔雅的女人，难以忍受丈夫那乖僻的性情。乡下的情况他也都见识过。这毕竟都不算什么。可还有一件：他不到十五岁时爱上了父亲的一个情妇，结果倒了霉，她自然是首当其冲。他怜惜这个为他饱受折磨的女人。万千思绪掠过脑海，

此时的基尔萨诺夫对于他来说，犹如当时的洛普霍夫对于韦拉·巴夫洛夫娜。

在他已往的生活中是有一些缘由的，可是要成为这么一个特别的人，主要的当然还在于他的天性。在他离开大学，回到田庄和漫游俄国之前，他在物质生活，道德生活和智力活动中采用自己独特的原则已有一段时间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这套原则就发展成为他始终不渝奉行的完整体系了。他对自己说过：“我决不沾酒，我不碰女人。”但他的性格热情奔放。“这样苦自己为了什么？根本不用这样走极端呀。”--“需要这样。我们要求人们充分享受生活，但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我们的这个要求并非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并非为了自己个人，而是为所有的人，我们说话只依据原则，不凭爱好，依据信念，不凭个人的需要。”

暗示拉赫梅托夫了解农奴制的危害。

情妇多半是农奴。

因此他开始在各方面建立起最严格的生活方式。为了成为尼基图什卡·洛莫夫，并能把这称号保持下去，他必须吃牛肉，多吃牛肉，他也的确吃了不少。但是除了牛肉，他舍不得花钱买任何别的食品。买牛肉他可以叫女房东买优质的，并且专门给他挑最好的部位，而他在自己家里所吃的其余东西都是最便宜的。他在家不肯吃白面包，只吃黑面包。他一连几星期不知糖滋味，一连几个月连一只水果也不进口，更不进食小牛肉或肥母鸡肉了。他决不自己花钱买这类食品：“我没有权利花钱来满足锦上添花的奢侈要求，”虽然他是精美食品喂养大的，口味很高，这从他对菜肴的品评上可以看出来。他在别人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在自己家里不肯吃的许多菜肴，他也会吃得津津有味，但是还有些菜他在别人家也照样不吃。区别对待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哪怕老百姓只能偶然尝一尝的，只要有机会我也吃。老百姓永远无法企及的，我也不应该吃！我需要这样做，这至少能让我多少体会体会，他们的生活跟我比是多么艰难。”所以，假如端上一盘水果，他绝对是吃苹果而不吃杏儿。他在彼得堡才肯吃橙子，一到外省便不吃，您要知道，彼得堡的老百姓能吃上橙子，外省却不能。酥皮肉饼他肯吃，因为“优质馅饼不比酥皮肉饼差，酥皮点心老百姓司空见惯了，”可是他不吃沙丁鱼。他穿得很寒酸，尽管他喜欢高雅精致之物。在其余各方面，他也是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比方说，他不许自己铺床垫，只睡一条毡褥子，甚至不让把毡褥子折成双层。

他曾有件受良心谴责的事--他没能戒烟：“离开雪茄我就不能思考。如果的确如此，我还有理，不过这兴许就是意志薄弱吧。”而他又不能抽劣等雪茄，要知道他可是在贵族环境里长大的。他那四百卢布的开销中，倒有将近一百五十卢布买雪茄抽了。“一个可恶的弱点”，正像他自己说的。惟独这个弱点方给人留有几分回击他的余地。假如他的指责使人难以忍受时，对方便回击道：“十全十美本来就不可能，你还抽烟呢。”这时拉赫梅托夫会加倍凶地指责起来，但是矛头多半转向了自己，原先那被指责的人倒不挨那么多指责了，虽然拉赫梅托夫并未由于自己有弱点而完全地姑息他。

他干的事多得惊人，因为他在支配时间方面也不许自己奢侈浪费，正像在物质生活中一样。他一个月中花费在娱乐上的时间连一刻钟都不到，他不需要休息。“我的工作杂七杂八，变换工种就是休息。”他的朋友们聚会的地点是在基尔萨诺夫家和洛普霍夫家，他也参加，但是去的次数只停留在能维系住与这个圈子的密切联系，决不多去：“我需要这种联系。每天发生的

事情都证明，跟某个圈子的人保持密切联系是有好处的。

必须有个随时了解各种消息的方便渠道。除了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以外，他从来不去任何人家，除非有事。而且事情一办完就走，连五分钟也不多待。他不在自己家中接待任何人，如果对方不能遵守同样的规矩，他是不让留下来的。他直率地对客人说：“我们已经谈完您的事情，现在让我干别的事吧，因为我应该珍惜时间。”

在他转变的最初几个月，他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读书。可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半年多一点。当他看到自己已经掌握了那种他认为是符合于正确原则的思想方法体系时，他立刻对自己说：“现在读书成了次要的事情，我已在这方面为生活做好准备。”从此他只在没事的空余时间来读书，而这样的时间在他是很少的。虽然如此，他还是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现在他才二十二岁，可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功底深厚的人了。

因为他在这件事上也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排除任何奢侈品和任性要求，专看必读书。

什么叫必读书呢？他说：“每种学科的主要著作并不多，这少数著作阐述的内容都相当充分，相当清楚了，而所有其余的书不过是把那些内容加以重复、冲淡和篡改罢了。必读书只是那少数著作，读任何别的东西都是白费工夫。拿俄国小说来讲，我说首先该读果戈理。在几千篇别人的小说中，我从任选的五页书上各选五行，我看到的除了一个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果戈理之外，一无所获，那我为什么要读这种小说呢？科学也是同样，在科学著作里，这个界线甚至还更为分明。如果我读过亚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知道这个学派发展的脉络以后，就无需去读那成百上千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中的任何一个的著作，无论他们多么著名。我从任选的五页书上各选五行，就看得出我不会从他们那儿找到任何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见解，尽是剽窃和歪曲。我只读有独创性的东西，并且仅止于此。”因此不管用什么力量也无法迫使他读麦考莱，他挑几页书看上一刻钟，就断定说：“我知道这堆碎布都是来源于什么料子。”他读过萨克雷的《名利场》，感到心悦诚服，而当他开始读《彭登尼斯》时，读到第二十页就合上了书本：“全是《名利场》里面说过的了，看来也不会再有什么新鲜的了，不用再读了。”——“我读过的每本书都是这种有独创性的，这省得我再去多读几百本书了。”他说。

亚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李嘉图（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和穆勒（一八一六—一八七三）都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

《彭登尼斯》是英国作家萨克雷（一八一—一八六三）于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写成的小说。

体操、锻炼力气的粗活和读书，是拉赫梅托夫的私事。不过他返回彼得堡以后，这些私事只占了他四分之一的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干别人的事，或者干那不是专属任何人的事。他平日也遵守着他在阅读中的规矩：不把时间花在次要的人和事上，而只用于主要的。次要的事和被支配的人随主要的变化而变化，不用他管。比方说，他在自己的朋友圈子以外，只跟那些对别人有影响的人物结交。您若不是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无论用什么办法也别想跟他结交，甚至谈一次话也不可能。他会说：“请您原谅，我没工夫”，就走开了。同样，如果他想要结交您，那您用什么办法也躲不开。他索性来

找您，说明他要干什么，他这样开门见山地说：“我想认识您，这是必要的。如果您觉得不合适，那就另外再指定一个时间、”您的琐细的小事他决不在意，即使您是他的亲朋好友，并且曾一再恳求他体察您的困难：“我没有工夫。”他说罢转身便走。但是他认为有关重大的事情必须他来过问时，他是定要管的，即使谁也不希望他过问：“我应该过问。”他会说。在眼下这种场合中他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谁也无法猜测了。

就拿我跟他结识的经过为例吧。当时我已经不算年轻，生活过得还好，因此有五六位省里的青年同乡时不时地到我家来聚会。于是在他看来，我就是个难能可贵的人物了。这些青年看出我对他们友好，对我也就怀有好感，由此，他也听说了我的姓名。但是我在基尔萨诺夫家初次碰见他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他，那是在他旅行归来不久。他是在我之后才进来的。在这个圈子中，我是他唯一不认识的人。他一进屋，马上就把基尔萨诺夫拉到一边，用眼光瞄了瞄我，说了几句话。基尔萨诺夫回答了他两句，就走掉了。过了一会，拉赫梅托夫在我正对面坐下，我们之间只隔着沙发旁边的一张小桌，他从这个离我只有一俄尺半远的地方使劲地盯着我的脸看起来。我很气忿：他不讲礼貌地审视我，仿佛他面前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幅肖像。我皱了皱眉头，他好像没事人似的。盯了两三分钟，他才对我说：“N先生，我需要跟您认识认识。我知道您，您可未必知道我。”

您向主人和这个圈子里您特别信任的其他人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吧。”随后他起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这个怪人是谁？”--“他是拉赫梅托夫。他希望您了解一下，他是否值得信任。绝对可信。还有，他是否值得注意。他比我们这儿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还重要。”基尔萨诺夫说，其他的人也肯定了他的看法。过了五分钟，拉赫梅托夫回到大家坐着的房间。他没再跟我谈话，跟别人也谈得很少，因为大家的谈话既不带学术性，也无关紧要。“哎呀，已经十点钟了，”过了一会，他说，“十点钟我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事。N先生，”他转向我，“我有几句话得跟您讲。当我把主人拉到一边，向他打听您是谁的时候，我用眼光瞄过您，因为反正您会看出来我在探问您是谁，所以我在提问时也无需注意这种自然动作了。您几时在家？我好去看您。”那时我不喜欢结交新相识，这种硬凑上来的我更不喜欢。“我只在家里过夜，白天整天都不在家。”我说。--“在家里过夜吗？您什么时候回家过夜？”--“很晚。”--“比方说呢？”--“两三点钟。”--“这没有关系，请指定一个时间。”--“如果您非来不可，那就定在后天三点半吧。”--“当然，我应该把您的话当作开玩笑和蛮横不讲礼，不过也许您有您的理由，也许还是值得赞许的理由呐。不管怎样，后天早晨三点半我准上您家。”--“不，既然您这样坚决，那么最好稍后一点儿来。我一上午都在家，一直到十二点。”“好，我十点钟左右来。您一个人在家吗？”--“嗯。”--“好。”他来了，然后同样单刀直入地一下子就提到那件使他认为必须跟我结识的事情上来。我们谈了半个来钟头。谈的什么这倒无关紧要，我只讲一点就足够：他说“您必须这样”，我说“不”，他说“您应该如此”，我说“完全不必”。过了个半小时，他说道：“继续谈下去显然也是徒劳无益。您不是相信我这个人绝对值得您信任吗？”--“是啊，大家都对我这么说，现在我亲眼看到了。”--“您仍然坚持您的意见？”--“仍然坚持。”“您知道该从这儿得出什么结论？您不是撒谎专家就是大坏蛋！您看竟然有人这么说话呢！如果别人对我讲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对待他？恐怕会提出决斗吧？但是他的语调中没有丝毫的个人情绪，他犹如一位历史

学家，冷静地下判断不是为了贬损谁，而是为了坚持真理，加上他的样子又那么怪异，你若生他的气就太荒唐了。我只能一笑了之。“撒谎专家和大坏蛋原是一样的啊。”我说。--“这一次并不一样。”--“这么说，也许我既是撒谎专家又是大坏蛋吧。”--“这一次不可能二者兼备。不过两者必居其一：也许您想的、做的和您嘴巴说的不是一码事，那么您就是个撒谎专家。也许您想的、做的确实跟嘴巴说的一个样，那么您就是个大坏蛋。两者必居其一。我认为您是头一种。”--“您乐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继续笑着说。--“再见。无论如何，您要知道，我还对您保持着信任，并且愿意恢复我们的谈话，您什么时候乐意都可以。”

暗指革命活动。

虽然这件事不合情理，拉赫梅托夫却是完全对的：他这样开始是对的，因为他先把我的情况打听清楚了，然后他才开始行动。他这样结束谈话也是对的，我跟他说的确实不是我心里想的，他确实有权叫我撒谎专家，用他的话说，“这一次”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委屈，甚至也没有觉得面子过不去，因为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而他也确实仍旧对我保持着信任，或许还有敬意。

是的，尽管他的态度不合情理，大家仍旧相信拉赫梅托夫的行动正是最为明智、最为利索的行动。他说话时，言辞之激烈，斥责之严厉简直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但是最富理智的人听了也不会怪罪他，他虽然异常粗暴，心地却是非常温和的。他的开场白大致是这类话--每逢他解释一个棘手的问题时，总是这样开始：“您知道，我讲话丝毫没有个人情绪。如果我的话听了不顺耳，那么请您原谅。但我认为，凡是认真负责的肺腑之言，您听了都不该见怪，因为那毫无侮辱人之意，而只是出于需要才说。不过，只要您觉得继续听我说下去没有用处，我马上就停止说。我的原则是：“该提出自己的意见时我总要提出的，但绝对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真的不强加于人。当他认为必须对您说出他的意见的时候，您是决计不能不听的，他一直要说到您对他讲的事情和他的用意理解为止。但是他用两三句话概括说明之后就会问您：“现在您已经知道谈话的内容是什么，您认为进行这样的谈话有用处吗？”假如您回答“不”，他便欠欠身走开了。

他就是这样说话行事的，他的事情多得没底，却全跟他私人无关，他根本没有什么私事，这谁都知道。可是他到底有什么事情，圈子里的人也不知道，只见他忙个没完。

他很少在家，老是跑来跑去，四处奔波，步行的时候多。而他家里也断不了人，有一些老朋友，也有不少新相识。因此他给自己规定两点到三点之间总要在家里，好利用这段时间谈。工作和吃午饭。但是他常常几天几天地不在家。那时就由他的一位朋友待在他家里替他接待来访者，这人对他绝对忠诚，却总是缄默无语，犹如一座坟墓。

我们看见他坐在基尔萨诺夫书房中阅读牛顿对《启示录》的解释以后，约莫已过了两年光景，他离开了彼得堡，他告诉基尔萨诺夫和其他两三位密友说，他在这儿再也无事可做，能做的他都做了，再过三年左右他才能再有事可做，今后这三年是他的空闲时间，他想着利用这段间。采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给未来的活动做些准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曾经返回他原先的田庄，卖掉了他留下来的土地，得到三万五千卢布，上了一趟喀山和莫斯科，把将近五千卢布分发给了那七名受他接济的学生，好让他们能够完成学业。从此他的这段真实可信的故事就结束了，至于他离开莫斯科以后的去向，那

谁也说不清了。在他失去音讯的几个里，比大家更多了解他的人也不再为他保密了，把他在我们中间生活时按照他的要求一直没讲过的事情都透露出来。我们圈子里的人这才知道有好几名同学靠他接济，才知道了我上面讲过的有关他私人方面的大部分的事情，还知道了许多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远没有把一切解释清楚，甚至什么也没有解释明白，只是将拉赫梅托夫描绘成一个使我们这圈子人都感到更为神秘不解的人物。这些故事或者以其怪诞离奇而令人惊诧不已，或者跟圈子里的人对他的看法完全相悖，我们总认为他对儿女私情十分冷漠，他没有一颗属于他个人的心，能为私生活的体验而怦然心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此处把所有这些故事都讲述出来显然不得体，只引用其中的两个，两类当中各引用一个：一个属于不合情理的一类，另一个是跟圈子里的人原先对他的看法相悖的一类。我从基尔萨诺夫所讲的故事中来挑选吧。

在拉赫梅托夫第二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离开彼得堡之前一年，他对基尔萨诺夫说道：“请给我大剂量的治刀伤的创口贴药膏。”基尔萨诺夫给了最大的一罐，他以为拉赫梅托夫要把这药送给本作坊或其他易受刀伤的工匠的作坊。第二天早晨，拉赫梅托夫的女房东惊恐万分地跑来找基尔萨诺夫，说：“医生老爷，我不知道我那位房客出了什么事啦：他的房门上着锁，半天不出来，我往门缝里一看，他整个儿人倒在一摊血里。

我喊起来，可他隔着房门对我说：‘没关系，阿格拉费娜·安东诺夫娜。’什么没关系！

救救他吧，医生老爷，我怕出人命啊。你知道，他对自己下毒手。”基尔萨诺夫急急忙忙赶去。拉赫梅托夫打开房门，开朗地微笑着，笑中有一丝苦涩，基尔萨诺夫看到了一件不止会叫阿格拉费娜·安东诺夫娜惊奇无奈的怪事：拉赫梅托夫整件内衣（他只穿一件内衣）的后背和两侧衣襟都沾满了血，床底下有血，他睡的毡褥子上也有血。原来毡褥子上扎着几百枚小钉，钉子帽向下，钉子尖朝上，从毡褥子下面伸出将近半俄寸长，拉赫梅托夫在这些小钉子上躺了一夜。“这是怎么回事？哪能这样干，拉赫梅托夫？”基尔萨诺夫惊恐地说。--“一个试验。需要这样。当然是不合情理，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我看我能吃得住。”足见除了基尔萨诺夫看到的之外，女房东大概还可以大量地讲出拉赫梅托夫种种奇闻边事来。但是这位心地纯朴、衣着寒酸的老太太疼爱他，简直达到发疯的程度，从她那儿当然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就是这一次她跑去找基尔萨诺夫，也完全是拉赫梅托夫自己让她去的，好叫她放心：她以为他是想自杀，竟痛哭不已。

过了两个来月，拉赫梅托夫有一个星期或者一个多星期下落不明，可是当时谁也没理会，因为失踪几天在他并不罕见。这是五月末的事。现在基尔萨诺夫讲出了下面的故事，讲明拉赫梅托夫怎样度过这许多天的。这是拉赫梅托夫生平的一段爱情插曲。恋爱来源于一起事故，这起事故足以表明他不愧为尼基图什卡·洛莫夫的称呼。一天，拉赫梅托夫从帕戈洛沃一村步行进城，一边走一边沉思，照他的习惯，眼睛多半望着地上。

走到林学院附近，传来一个女人的绝望的惊叫声，他一下子从沉思中猛醒过来。他一看，一匹马驾着一辆轻便车飞奔过来，车上坐着一位太太，她自己赶车，却驾驭不住了，缰绳拖在地下，那马离拉赫梅托夫只有两步远了。他奔到了路当中，可是马已经从他身边飞驰而过，他没能抓到缰绳，只来得及扳住马车的后轴，把车子煞住了，可他也跌倒了。

人们跑来帮太太下车，扶起拉赫梅托夫。他的胸部有好几处伤，主要的是车轮刮掉了他腿上一大块肉。太太清醒过来以后，派人把他送往自己的别墅，别墅离出事地点不过半俄里远。他也同意了，因为他感到虚弱无力，但是他要求一定去请基尔萨诺夫，不请任何其他的医生。基尔萨诺夫认为胸部的受伤处虽不要紧，但却使得拉赫梅托夫失血过多而虚弱不堪。他躺了十来天。那位被救的太太当然亲自看护他。他虚弱得任什么别的事也不能做，只能跟她谈谈天，反正这段时间也是白费了，两人越谈话越多，谈兴越浓。

太太是一位十九岁左右的寡妇，一个聪明、正派，不算贫穷，一般来说完全能够自立生存的女人。拉赫梅托夫那些火一般的话语当然没有涉及爱情，但却使她听得入了迷，“我梦见他被光轮环绕着”--她对基尔萨诺夫说。他也爱上了她。她从他的衣着和种种方面看，认定他是个身无分文的赤贫的人，因此当他在第十一天起床下了地，说是可以回家去的时候，她便首先向他表白爱情，并且提出结婚。“我对您比对别人更加坦率。

您看，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任何人的命运跟我自己拴在一起的。”“对，这是实话，”她说，“您不能结婚。不过您还是可以爱我到必须离我而去时。”--“不，我连这个也不能接受，”他说，“我应该抑制住我心中的爱情。对您的爱会拴住我的双手，就是不恋爱，我的手也不能很快地松开，已经给拴住了。但是我一定要松开，我不应该恋爱。”这位太太后来怎么样了？她的生活应当发生一次转折，她大概自己也变成一个特别的人了吧。我本想打听的，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基尔萨诺夫没有把她的名字告诉我，他自己也不知她的下落。拉赫梅托夫请求过他别再跟她见面，也不要查问她情况：“如果以后我猜想您会知道她的什么消息，我就忍不住要问起您，而这样做又不妥。”听到这个故事，大家才回忆起来，当时拉赫梅托夫有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也许两个多月比平日更加阴郁，无论人家怎样指责他那可恶的弱点，即抽烟，他也不再激昂慷慨地埋怨自己，人家用尼基图什卡·洛莫夫的名字讨他欢心，他也不再那开朗甜蜜的笑容了。

我记起了更多的事：我们初次谈话后没多久，他就喜欢上了我，因为我跟他单独相处时总爱跟他开个玩笑。那个夏天，他跟我谈话有三四次之多，在回答我的玩笑话时，每次都情不自禁地说出这样的话：“好，可怜我吧，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渴望生活的人啊。”接着又补充道：“算了，没什么，会过去的。”事情也确实过去了。可是有一次，在深秋季节，我跟他开玩笑过多，深深地触动了，又引发他说出了这几句。

敏感的男读者也许由此而推论道，我对拉赫梅托夫的了解比我说出来的要多。也许是这样，我不敢反驳他，因为他很敏感。假定我知道得多，可是我知道的，而你，敏感的男读者，永远不会知道的事难道还少吗？不过，我真的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如今拉赫梅托夫在哪儿？他的情况怎样？有朝一日我还能否再见到他？关于这些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或推测，也就是掌握他的所有的熟人知道的那些情况。他离开莫斯科之后有三四个月下落不明，我们大家猜想他是到欧洲旅行去了。这种推测看来是对的，至少可以由这件事证明：拉赫梅托夫失踪后一年，基尔萨诺夫的一位熟人在从维也纳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碰见一个俄国的年轻人，他自己说曾游遍各斯拉夫国家，所到之处跟各个不同的阶级接触，每到一国都要停留下来，以便充分了解当地居民中全部主要成员的观点、习俗、生活方式、生活设施以及富裕程度，为此他在城市里住过，也在乡下待过，常常步行着走村串乡，就像结识罗马尼亚

人和匈牙利人那样，乘车或步行游历德国北部，由此再到南方，进入到奥地利境内使用德语的各省份，现在他正在往巴伐利亚去，接着到瑞士，经过符腾堡和巴登入法国，同样遍游法国后到英国，这还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如果这一年还有富裕的时间，他就去看看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如果时间不够，也就做罢，因为这并不那么“需要”，他“需要”考察的是上述的那些国家。为什么？“为的是加以对比”；再过一年，他无论如何“需要”到美国去，他更“需要”研究美国，这比研究任何其他国家更为迫切。他将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也许一年多，也许就定居了，如果他能在当地找到事情做。但是再过三年左右他大概会回到俄国的，因为看来，不是现在俄国“需要”他回来，而是过三四年之后才“需要”。

这一切都很像拉赫梅托夫，就连叙述者头脑中储存的那么多的“需要”也很像他的口气。就叙述者所能记起来的，那旅客的年龄声音、外貌都跟拉赫梅托夫很一致。不过叙述者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自己的旅伴，况且相处的时间也不长，总共才两小时：他是在一个小城上的车，到一个村庄就下去了。因此叙述者只能用很一般的话来描述他的外貌，不是完全可信的：这多半就是拉赫梅托夫，但有谁知道他呢？也没准不是他呐。

还有一个传说，说有个俄国的年轻人，本来是地主，他去拜访十九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新哲学之父、一个德国人，并对他这样说道：“我有三万泰勒，我只需要五千，其余的请您拿去用吧。”（那位哲学家生活十分贫困）--“因为什么？”--“好用来出版您的著作。”哲学家自然没有拿，但那俄国人好像还是用他的名义把钱存进了银行，然后给他写信说：“请随意支配这笔钱吧，即使把它扔到水里，这钱您已无法退还给我了，您不可能找到我了。”这笔钱好像至今还存在银行里响。假如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毫无疑问，去拜访哲学家的一定是拉赫梅托夫。

指费尔巴哈。

泰勒，旧时德国一种银币，一泰勒合三马克。

此刻坐在基尔萨诺夫书房中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先生。

不错，这位先生是个特别的人，是极为罕见的，我所以要如此详尽地描写这么一位极其罕见的人物，并不是为了教会你，敏感的男读者，用你全然不知的礼貌态度去对待这种人，这样的人你连一个也没看见过。你的眼睛不是为了去看这样的人物而造的，敏感的男读者。对你来说，他们是看不见的，只有诚实而大胆的眼睛才能看见他们。我给你描写这个人的目的，是让你哪怕能够风闻到世界上有了怎样一批人存在。至于这种描写对女读者和普通男读者的作用，他们自己是会知晓的。

不错，拉赫梅托夫这样的人荒唐好笑。我说他们荒唐是针对他们自身说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怪可怜的。我这话也是针对那些为他们而着迷的高尚的人们说的，我说：不要追随着他们：高尚的人们，因为他们召唤你们走的是一条缺少个人欢乐的道路。但是高尚的人们不听我的话，却说：不，个人的欢乐并不缺少，而是很多的，即使有某处空白，这处空白地段也不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跨越它，去到那充满欢乐、辽阔无垠的地方。

那么，敏感的男读者，你这就知道了吧，我说拉赫梅托夫这类人荒唐，并不是对你说的，而是对另一部分读者说的。对你，敏感的男读者，我要说：这是些很好的人。因为我不说你自己不能明白。是的，这是些很好的人。他们人数虽少，却能使大家的生活如花似锦，没有他们，生活就要凋敝、衰朽。

他们人数虽少，却能让大家自由地呼吸，没有他们，大家都会憋死。正直善良的人数目众多，而这种人却寥寥无几。可是他们在人群当中犹如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群众的力量和精神底蕴都源于他们。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

耶稣称他的门徒为“世上的盐”，意指社会中的优秀分子而言，见《新约·马太福音》第章。

三十

“好，”敏感的男读者琢磨着，“今后拉赫梅托夫将成为主角、强者，韦拉·巴夫洛夫娜会爱上他，基尔萨诺夫就要重蹈洛普霍夫的覆辙了。”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敏感的男读者。拉赫梅托夫将待一晚上，跟韦拉·巴夫洛夫娜谈一谈，我不会对你隐瞒他们谈话中的只言片语。但是你很快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不愿把这次谈话转告诉你，隐瞒起来是轻而易举的，同时我的故事情节的进程也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我还要预先告诉你，等拉赫梅托夫跟韦拉·巴夫洛夫娜谈完话离开以后，他也就从这篇故事中完全消失了，既没有当我的小说的主角，也没当次要角色，什么角色都没有他了。那么为什么他要被放进小说里来，并且我还这样详详细细地描写他呢？你试着猜一下，敏感的男读者，你猜得出吗？关于这一点，在下面几页，马上可以告诉你，等我写完拉赫梅托夫和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谈话以后再说吧。他一走，我就在本章末尾告诉你。现在请你猜猜我会在那儿说些什么。很容易猜出来的，只要你对于你如此喜爱议论的艺术性有稍许的了解。

可是你哪里猜得着！让我把大部分的谜底暗示给你：用心地描绘拉赫梅托夫，是为了体现艺术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要求，是专为满足这项要求的。好，好，现在你来猜猜看，现在你就来猜吧：这项要求是什么呢？要满足它应该怎么办？既然拉赫梅托夫并未于预这个故事的进程，对之又毫无影响，那么他的出现怎么会满足这项要求呢？好啦，你猜吧。从不奢谈艺术性的女读者和普通男读者都懂得这个，你是聪明人，请试着猜一猜。

我给你时间，特意在这儿做个醒目的标记，停顿下来：你看，我对你有多么关心啊。你停在这儿想一想，看猜得出来不。

梅察洛娃来了，她伤心了一阵，说了些安慰的话，她表示乐意把工场接办下去，但不知道能否胜任。当她帮忙清理东西的时候，又伤感起来，说了些劝慰的话。拉赫梅托夫请邻居的女仆去买面包，他自己生茶炊，端上茶，于是大家喝起来。拉赫梅托夫陪着两位太太坐了半个来小时，他喝下五杯茶，同他们一起往茶里倒进了大半罐子奶油，他先吃了两个普通圆面包来垫底儿，又吃了大量的饼干：“我有权来享受这一切，因为我牺牲了整整十二个小时。”他一边享受，一边听着两位太太悲痛欲绝的话语，他再三表示意见，说“这是精神失常”，但他不是指太太们的极度悲痛，而是自杀，不管自杀出于何种原因，至于得了痛苦难忍的不治之症，或者为了免受某种注定了的痛苦死亡，例如碟刑才自寻短见除外；他每次都习惯地用简短有力的三言两语来表达这个意见。接着他斟上了第六杯茶，将剩下的奶油倒进了茶里，

抓起剩下的饼干--太太们早就喝完了茶--鞠了个躬，便带着这些食物，重又回到书房，体验那物质享受的快乐去了。为了尽情享受享受，他躺在了一张长沙发上。本来大家都睡沙发，可是那对于他却简直像是加普亚式的奢侈。

“我有权享受这份安逸，因为我牺牲了十二或者十四个钟头的时间。”结束了物质享受后，他又恢复了精神享受--阅读《启示录》评论。八点多钟，一名警官将自杀案件通知了自杀者的妻子，现在此案业已完全查清。拉赫梅托夫对他说，死者的妻子已经知道，无需再跟她谈什么了；警官也愿意避免一个刺激性的场面。后来玛莎和拉赫莉来了，清理衣物的工作开始了。拉赫莉劝阻韦拉·巴夫洛夫娜变卖那件好皮袄，免得三个月后又要做新的，她当即就同意了。拉赫莉说她可以出四百五十卢布买下所有其余的衣物，连梅察洛娃心里也相信更高的价确实不可能有了。因此，不到十点钟买卖便成交了：拉赫莉先付了两百卢布，她没有更多的钱了，过两三天她再托梅察洛娃把其余的款子送来。她拿起东西就走了。梅察洛娃还坐了一个来小时，直到该回家给孩子喂奶才走。她临走时说，她明天要来给韦拉·巴夫洛夫娜送行。

加普亚的奢侈，加普亚位于意大利境内，迦太基所率的军队大胜罗马军，进驻加普亚。其部厂耽于淫逸，放纵无度。

梅察洛娃走了以后，拉赫梅托夫合上牛顿的《启示录》评论，整整齐齐地放回到原处，随即叫玛莎去问韦拉·巴夫洛夫娜：他能否进她房间看看她。她说可以。他像平常一样从容镇静、不以为然地走进她的房间。

“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我才有可能好好地安慰您了。现在可以，早先却不成。

我预先告诉您，我的这次来访总的结果一定会使您安心的，您知道我不讲空话，因此您该先放下心来。让我按照顺序讲述这件事吧。我告诉您了我见到过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全部情况我都知道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确实见过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而且确实全部情况都知道了。但我并没有说我都是从他那儿知道的，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的确不是从他那儿，而全是从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那儿知道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在我家里待了两个来小时，他事先通知我说他要来我家，所以我没出门，他来了以后写了那封使您十分难过的短信，又待了两个或者两个多小时才走的。就是他请求我……”

见正文第七页。

“您明知他想做什么，却没有阻拦他？”

“我请求过您放心，因为我这次来访的结果一定能使您安心的。不错，我没有阻拦他，因为他的决定挺稳妥的，您自己一会儿就明白了。我开头已经说了：就是他请求我今晚上待在您家里，他知道您会难过的，所以委托我到您这儿来。他偏要挑我做中间人，是由于他了解我的为人：我只要接受了人家的委托，就会不折不扣地去完成，不论多么强烈的感情，不论怎样苦苦的请求，都阻拦不了我去认真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他预料您会央求我违反他的意愿，而他希望我实现它，别因您的哀求而动恻隐之心。我要实现他的意愿，因此事先请求您：我说什么，您也不必求我作任何的让步。他的委托是这样，当他为了‘退出舞台’而离去的时候……”

“我的天，他干的什么事！您怎么能够不制止他？”

“责备我为时过早了。您得深入领会领会‘退出舞台’这个词语的表述。他在您收到的那封短信上用过这词语，对吗？我们也正要用它来表述，因为

它选得恰到好处，精当极了。”

韦拉·巴夫洛夫娜眼里开始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态，她头脑中越发清晰地呈现出问题：“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我到底该怎么理解呢？”虽然他说话时那种煞有介事的态度显得十分滑稽，他却是个办事的天才，大大才！他还是一位大心理学家，他懂得并且善于依照循序渐进的规律来行事。

“这样，借用他那精当的词语来说，当他为了‘退出舞台’而离去之时，他给我留下一张写给您的字条……”

韦拉·巴夫洛夫娜跳了起来：

“字条在哪儿？快给我！您怎么可以在这儿待了一整天还不交给我？”

“我可以不交，因为我知道没必要交。您很快就会赞成我不交的理由了。理由挺充分。但是我首先应该向您解释一下在我最开头说过的那句话：‘结果一定能使您安心的’。

所谓结果能使您安心，并不是指您收到字条这件事说的，这儿有两个理由，第一，光是收到字条还不能足以使您放心，还谈不上安心，对吧？要说安心，必须有更多的东西。

因此，能够使您安心的应该是字条的内容。”

韦拉·巴夫洛夫娜又跳了起来。

“您放心吧，虽然我不能说您判断有误。我预先把字条的内容告诉了您，现在我请您听完我的第二个理由，为什么我说的‘结果能使您安心’不是指您收到字条这件事本身，而应该是指字条的内容。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内容的性质，它事关重大，我只能让您看看字条，不能把它交给您。您可以读，但是不能取走。”

“怎么？您不能把字条交给我？”

“不能。他偏偏挑了我，正是由于任何别人处在我的地位都会交给您的。这张字条不能留在您手里，因为它的内容特别重要--我们已经确定了内容的性质--它不该存放在任何人的手里。如果我交给您，您一定想保存起来。所以，为了不至于再从您那儿用强力硬抢回来，我不交给您，只让您看一看。不过您得坐好，双手交叉起来放在膝盖上，而且保证不动手，我才让您看。”

假定这儿有个局外人，无论他如何多情善感，当他看到这一整套程序的庄严郑重，尤其是这套程序末尾那种举行仪式般的生硬规定，他也情不自禁地会笑起来吧。这确实滑稽。可是，当我们听到重大消息的时候，能保持住拉赫梅托夫遇事不惊、胸有成竹的气派，哪怕十分之一也行，那对锻炼我们的神经该是多么的有益啊。

韦拉·巴夫洛夫娜并不是局外人，她当然只能感觉到这种不慌不忙、慢悠悠的态度中叫人心烦的一面，但她自己摆出的姿势旁观者看了也会忍俊不禁的：她立刻就坐了下来，急忙顺从地把双手交叉起来放好，用最可乐的声音，也就是说，用痛苦难忍、急不可待的声音，喊起来：“我发誓！”

拉赫梅托夫把一张信纸摊在桌上，上面写有十行到十二行字。

韦拉·巴夫洛夫娜刚刚朝那几行字瞥了一眼，脸一下子就全涨红了，誓言也都忘光了，霍地跳起来，一只手闪电般掠过，去抓字条，可是字条已离得老远，被拉赫梅托夫高高地举在手中了。

“我料到您这一着了，所以一直用手捏着字条呐，如果您注意观察，就能看出来的。

等信纸再放到桌上的时候，我还是要像刚才那样一直捏住它的一只角，

不放手。所以无论您怎样动脑筋想抓字条，都是白费劲。”

韦拉·巴夫洛夫娜重又坐下来，将两手交叉着放好，拉赫梅托夫也重又在她眼前摊开字条。她激动地反复读了不下二十遍。拉赫梅托夫很耐心地站在她的椅子旁边，手里捏住信纸的一只角。这样过了一刻来钟。韦拉·巴夫洛夫娜终于心平气和地抬起了手，捂住眼睛，分明没有抢信的非分之想了。“他真好，他真好哇！”她说。

这张字条的内容是说他决心假装自杀，使她能摆脱婚约的束缚，在法律上获得自由。

“我不完全赞成您的意见，为什么不赞成，回头再说。这已经不是执行他的委托了，而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在我跟他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已经说过。他托我的事其实只有一件，那就是给您看字条，然后烧掉。这字条您看够了吧？”

“再看看，再看看。”

她重新把手交叉放好，他也重又摊开字条，并且像先前一样耐心地站了整整一刻钟。

她又用手捂住脸，反复地说：“啊，他真好，他真好啊！”

“您已经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过这张字条了。假如在您心情平静的时候，您这样全神贯注地看了这么长时间，您不但能够背诵，连每个字母的形状都会永远铭刻在您的记忆中。但是像您现在这么激动，您的记忆力可能不听您使唤了，多半不灵了，您破坏了记忆的规律。我预先估计到有这种可能，所以抄录复制了这张字条，您什么时候想要看这个手抄的副本，随时都可以来我这儿看。过一段时间，大概我才会认为可以交给您。现在我认为原信已然可以烧掉了，一烧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

“再让我看看。”

他重又摊开字条。这一次，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断地抬起头来望着别处，她显然是在背诵字条，并且检查自己记得牢不牢。过了几分钟，她叹了口气，目光不再离开字条了。

“现在我看已经行了吧。别再看了。都十二点了，我还想跟您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因为我认为您了解了我的看法对您有好处。您同意吗？”

“同意。”

话音还没落地，顷刻之间，字条就在烛火中烧掉了。

“哎呀！”韦拉·巴夫洛夫娜惊呼起来，“我说的不是那个，您干吗烧掉？”

“不错，您只是说您同意听听我的意见。不过没有关系。总有一天要烧掉的。”拉赫梅托夫说着，坐了下来，“何况还留了字条的副本。现在，韦拉·巴夫洛夫娜，我要向您发表我对这件事的意见。我从您讲起吧。您想离开。为什么呢？”

“我留在这儿很痛苦。许多地方都叫我想起过去，触景生情，不能不伤心。”

“不错，这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是您到别的地方难道就能好受得多吗？只能稍许好受些。其实您这是干什么呢？为了图一时的解脱，您就把五十个人抛下不管，听任她们走哪算哪，可她们的命运却取决于您呐。抛下她们不管，这样好吗？”

拉赫梅托夫那沉闷的、庄严郑重的语调消失不见了！他说得生动、轻松、朴素、简洁，充满活力。

“可是我想求求梅察洛娃。”

“这不行。您并不知道她能不能接替您管工厂，因为她这方面的能力还没有经受过考验，而管工厂需要的是颇不寻常的能力。我看别抱多大希望，没人能接替您，您离开会使工场遭殃。这样好吗？您会葬送掉五十个人的幸福，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为了图自己一时的合适。这样好吗？为图自己一时的解脱考虑得那么细致入微；可对别人的命运却那样漠不关心！对于您处理事情的这一面，您看该怎么说好？”

“您为什么不劝阻我呢？”

“您未必听得进去。再说，我知道您很快就会回来的，所以事情没有什么严重的。”

“您有错吗、”

“我完全错了。”韦拉·巴夫洛夫娜有几分开玩笑似的，也有几分--甚至不止几分--认真地说。

“不，这还只是您的过错的一个方面，全部过错还要大得多。但是只有帮助您改正另一个尚可改正的过错，才是对您的悔悟的最好的奖励。你现在平静了吧，韦拉·巴夫洛夫娜？”

“嗯，差不多了。”

“好。您以为玛莎睡了吗？您现在需要她做什么事吗？”

“当然不需要。”

“您既然已经平静下来，那么有可能想到该提醒她睡觉了，都十二点多啦，她早上又得起早。谁应该想到这件事呢，是您还是我？我去告诉她，叫她睡觉。您又有所悔悟了，对于新的悔悟该有新的奖励：我这就顺便去搜罗搜罗，看那儿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您当晚饭。您到这会儿还没有吃午饭，我想您现在胃口该好了吧。”

“是好了。经您一提，我看不但好了，而且好极了。”韦拉·巴夫洛夫娜畅快地笑着说。

拉赫梅托夫拿来中午吃剩的凉菜--玛莎只给他了于酪和一个罐蘑菇，这份小吃配得很开胃--还带来两份餐具，都是他自己搞来的。

“您看我多能吃，拉赫梅托夫，看来我是饿了。先前我并不觉得饿，我不仅忘了叫玛莎吃，连自己也忘了吃，所以我虽有过错，可都不是有意害人的。”

“不错，是我替您想到了您的胃口，其实我并非那种只关心别人的怪人，我自己也饿了，我午饭没吃饱，虽然我吃了很多，足够别人吃一顿十的，甚至还不止呢，不过您知道，我的饭量抵得上两个庄稼人。”

“啊，拉赫梅托夫，您是一个善良的天使，您不仅只关心我的胃口。不过您为什么待了一整天都不给我看那张字条？您为什么要这么长久地折磨我？”

“理由很充分。必须让人看见您是多么悲伤，再把您悲痛欲绝的消息传扬出去，由此那件使您悲伤的事情才能令人信服。因为您是不愿意装假的。何况任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天性，天性的表现还是要令人信服得多。现在有三条渠道可以证实那件事：玛莎、梅察洛娃和拉赫莉。梅察洛娃是特别重要的一条渠道，她会将消息传给您所有的熟人。

我很高兴您能想到把她请来。”

“您真狡猾，拉赫梅托夫！”

“对，这招真高：一直等到深夜才说。不过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他自己。”

“他多好啊！”韦拉·巴夫洛夫娜感叹道，可是老实说，这感叹声中没有伤感，只有感激。

“哎哟，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们以后再去评说他吧。最近他确实样样事都考虑得挺周全，干得也很出色。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的一些过错，而且是很大的过错呢。”

“不许您这样说他，拉赫梅托夫，您听见了吗，我要生气啦。”

“您发脾气？这可得受罚。还要我继续罚您吗？你的罪状书才刚刚说了个开头呢。”

“罚吧，罚吧，拉赫梅托夫。”

“听话有赏。听话总会得到奖赏的。您这儿一定能找出一瓶酒来，您喝点酒没坏处。”

“上哪儿去找？餐柜还是碗橱里？”

“餐柜里。”

餐柜里有一瓶白葡萄酒。拉赫梅托夫硬叫韦拉·巴夫洛夫娜喝了两杯，他自己却抽起雪茄来。

“可惜我也不能陪您喝三四杯，我挺想喝。”

“难道您也想喝吗，拉赫梅托夫？”

“也馋得慌，韦拉·巴夫洛夫娜，也馋得慌，”他笑着说，“人是软弱的。”

“您还软弱，真没治了！但是拉赫梅托夫，您使我感到惊奇。您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为什么您老是像个怪物那样阴沉沉的？现在您这人可是又亲切，又愉快。”

“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我正在执行着一个愉快的任务，怎么还能不愉快？可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很难遇上的。一般看见的全是些不愉快的现象，怎么能不变成阴沉沉的怪物？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既然碰巧看到了我也愿意总能保持这种愉快的心境，我们又敞开心扉无所不谈，那就请把当个秘密，别叫人知道我不是心甘情愿当个阴沉沉的怪物的。我自己除了希望执行我的任务之外，还希望享受生活的欢乐，当人们没有注意到这点时，我比较容易执行我的任务。他们本来想方设法邀我一起娱乐，现在也死心了，我也无需为拒绝各种邀请而耽误时间了。为了让您容易把我想象成只是一个阴沉沉的怪物，我还要继续审问您的罪过。”

“您这还不够？您已经找出两条了：对玛莎漠不关心，对工场漠不关心。我都表示悔过啦。”

“不关心玛莎只是个疏忽，不能算罪过：即使玛莎把她那困得睁不斤的双眼再揉上一小时，她也不至于死掉，如今怀着愉快的心情这样做，因为她觉得她在尽自己的责任。”

“但是提到工场，我的确想责骂您。”

“您不是责骂过了吗？”

“责骂得还不够，我要痛快淋漓地骂您一顿。您怎么能撒下工场不管，任它毁掉呢？”

“可我不是已经悔悟了吗，况且我也没撒下工场不管：要知道梅察洛娃答应接替我啦。”

“我们已经谈过，您打算请她来接替您，这是不足以来谅解您的。这是

搪塞，只能暴露您的新罪过。”拉赫梅托夫渐渐地又改用了严肃的、虽然不算阴沉的语调。“您说由她接替您，这件事决定了吗？”

“是啊。”韦拉·巴夫洛夫娜预感到事情的确有些严重，说话时再也没有原先那种戏谑的口吻了。

“那么情看。事情是谁决定的？是您和她。根本不问问那五十个人是否同意这样的变动，她们有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她们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就作出了决定。这就是专制啊，韦拉·巴夫洛夫娜。您已经有了两大罪状：冷酷和专制。可是第三条罪状更加严重。您的那个机构相当切实地符合人们对生活方式的合理设想，它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实例，证明了其设想是有可能实践的，而能够证明这方面的实例又相当少，因此每一个实例都是弥足珍贵的。您却使这个机构冒着毁灭的风险，使它从一个表明您的信念有可能实践的例证，变为表明您的信念无法实行和荒谬可笑的证据，成为批驳这一有益于人类设想的手段；您给黑暗和邪恶的维护者提供了反对您那些神圣原则的口实。现在我不必去说您破坏了五十个人的幸福--五十个人无关紧要！您还危害了人类的事业，背叛了进步的事业。这，韦拉·巴夫洛夫娜，用教会的话语来表述叫做亵渎圣灵罪，人们说，对人的任何其他罪过都可以宽恕，惟独这个罪过却绝对不能，永世不能。对吗，罪人？不过好在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您仅仅是思想犯罪。可是您还真的脸红了，韦拉·巴夫洛夫娜。好，我来给您些安慰吧。如果您还不太痛苦，您就连在思想中也不会犯罪的。

所以肇事的真正罪犯是那个使您悲痛欲绝的人。而您却居然没完没了的说：“他真好，他真好！”

“怎么？您认为我的痛苦是他的罪过吗？”

“不是他还有谁？毫无疑义，他对整个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这是完全不应当有的。”

“对，我不应该有这种感情。但是它却不召自来，我还努力压制过它呢。”

“瞧您说的，什么不应该。您错在哪儿，您并没看出来，丝毫错也没有，为什么要怪罪自己呢！这种感情是您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这两个人的性格凑在一起的必然产物，不是这样产生，就是那样产生，它终究是要滋长起来的。在这儿决定性的感情完全不在于您爱上了别人，爱别人只是一个结果，决定性的感情是您对你们原有的感情不满足了。这种不满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增长呢？如果您和他两个或者只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是没有修养的鲁莽的粗人或坏人，那它只能通过寻常的方式来增长：夫妻不和。如果两个人都不好，你们会吵架对骂，要不就是一个骂人，另一个挨骂。总之，家庭成了相互折磨的场所，正像我们在大多数人的夫妻生活中看到的。这场所当然不会妨碍对别人爱情的增长，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出在相互折磨、吵架对骂上。您的不满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俩都是正派人，它只能通过最轻松、最温和、最不伤感情的方式来增长，那就是爱情转移到别人身上。所以这里我们没必要谈论对别人的爱情，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这儿。问题的实质在于对原先的处境不满，不满的原因是性格不合。你俩都是好人，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当您的性格成熟起来，不再像小孩那样不定型，而具有了一定的特点时，您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便显得不太适应了。你俩中间是谁有什么地方该受责备呢？您瞧，我也是个好人，但是您能跟我过得了吗？您跟我苦不堪言，会上吊的，您认为您能跟我过多少天？”

“最多几天工夫。”韦拉·巴夫洛夫娜笑道。

“他虽不是像我这样阴沉沉的怪物，您和他也还是很不协调的。谁该首先发觉这一点？谁年纪大？谁的性格定型得早些？谁具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应该预见到这点，让您做好准备，不致于惊慌失措和过度悲伤。而他直到那时才懂得这点，他早该料到却不曾料到，那时不但这种不满的感情已经充分滋长出来，就连这种感情引起的后果--另一种感情也产生了。为什么他没有预见到，没有发觉呢？他笨吗？他够聪明的了。不，他由于粗心、疏忽，韦拉·巴夫洛夫娜，忽视了他跟您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您却没完没了地说：他真好，他爱我！”拉赫梅托夫渐渐兴奋起来，说话已颇为激动。但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打断了他。

“我不该听您的，拉赫梅托夫，”她用强烈不满的口气说，“您把我感激不尽的人骂得狗血喷头。”

“不，韦拉·巴夫洛夫娜，如果您不要听这个，我就不再说了。难道我是今天才看到这点吗？难道我从今天开始才能够指出这点吗？您要知道，假如我觉得需要跟人谈话，那是谁也无法躲避的。我本来是能够早就向您指出的，但是我一直沉默着。而现在我既然开口了，那就是需要开口了。不到时候，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您已经看到我把那张字条在口袋里揣了整整九个小时，虽然我看着您觉得可怜。但是需要沉默，我就保持沉默。因此，现在我既然说出来，那就是该说了，其实我老早就考虑过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跟您的关系这个问题。”

“不，我不愿听啦。”韦拉·巴夫洛夫娜异常激动地说道，“我请您住口，拉赫梅托夫。我请您走。我很感激您为我用去了一个晚上，但是我请您走。”

“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

“好啦，”他笑道，“不，韦拉·巴夫洛夫娜，摆脱我可不大容易。我预料会有这种可能，所以采取了措施。烧掉了的那张字条是他自行写的，这儿还有一张是我求他写的。这一张我可以留给您，因为它算不上凭证。请拿去吧。”拉赫梅托夫递给韦拉·巴夫洛夫娜一张字条：

亲爱的朋友韦罗奇卡：

你要听完拉赫梅托夫对你说的一切。我不知道他想对你说些什么，我也没有托他转告什么，他想对你说些什么，他甚至没有向我暗示过。但是我知道他从来不说多余的话。

您的德·洛

七月十一日夜二时

韦拉·巴夫洛夫娜把这张字条吻了不知多少遍！

“您干吗不先交给我？您也许还有他的什么东西吧？”

“不，再也没有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需要的了。我干吗不先就交给您吗？不需要它的时候，没必要交给您。”

“我的天，怎么不需要？我们分手以后，能够见到他的几行字，我也感到欣慰。”

“好，既然只是为了这个，先给后给也就无关紧要了。”他微笑着说。

“唉，拉赫梅托夫，您存心要气死我！”

“那么，这张字条义要成为我们之间争论的导火线罗？”他又笑着说，“如果这样，我就把它从您手里抢过来烧掉算了，您要知道，人家都说像您这类人心目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事物，我们可以任意横行，什么恶事都能去干的。”

怎么样，我可以接着往下讲吗？”

他俩都冷静些了，她是由于拿到了字条，他则是因为当她吻字条时他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是的，我必须听您说。”

“他没有发觉他应该发觉的事情，”拉赫梅托夫用平静的语调开始说，“这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即使不为此而怪罪他，可毕竟也不能原谅他。即使他不知道这恶劣的后果是您和他的性格间这种关系的实质必然产生出来的，他还是应该考虑到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让您对这类事做好准备，只当做是迎接意外事件一样。人不该希望有意外，也没必要期待它，但它总是可能发生的：人绝对没法担保将来会出什么意外。这个“任何意外都能发生”的道理，他大概是知道的吧。他怎么还能让您保持这种思想状态，以致事情发生了您却没有准备呢？他没有预见到发生这事，那是由于他的疏忽，疏忽固然使您感到委屈，但它本身却无关紧要，说不上好坏。他没有使您对意外情况做好准备，却出于一种纯粹的坏动机。他这样做当然是不自觉的，可人的天性正是在这些不自觉地于出来的事儿中才能表现出来的。让您做好准备与他的利益相悖，因为有了准备就会削弱那种于他不利的感情的抵抗力。您心中发生了如此强烈的感情，您下最大力气抵抗也无济于事了。不过它来得这样强烈却又是意外。假如被人唤起的这种感情不是名副其实的爱情，虽然也是一种敬爱之情，那么这种感情就不会那么强烈。而这种强烈得使任何抵抗它的斗争全归无效的感情，只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至于那些能够加以克制的感情，只要是抵抗力完全没有被削弱，它们产生的机会却多得多了。他不愿削弱您的抵抗力，就是为了叫您能应付出现的一切可能性。这就是他让您毫无准备并且使您遭受到这么多痛苦的原因。您看这样的事该怎么说呢？”

“这不对，拉赫梅托夫。他没有对我隐瞒他的思想。我跟您一样深知他的信念。”

指婚姻自由的信念。

“那当然，韦拉·巴夫洛夫娜。隐瞒这点就太过分了。为了不让一种跟他自己的信念相一致的信念在您心中得到发展，竟然否认自己想过，装出没有想到的样子，这简直是可耻的行径。您决不会爱上这样的人。难道我说过他是坏人？他这人很好，怎么不好呢？您让我夸他多少遍就夸多少遍。我只是想说他在事情发生之前的表现，事情发生以后，他表现得挺好，但发生以前他对您却不行。您为什么痛苦？他说--其实不必说什么，事情本身已很明显--您痛苦是因为您不愿使他难过。您怎么能持有这种想法，以为这会使他非常难过呢？您不应当持有这种想法。这有什么可难过的？真是愚蠢，干吗有这么强的嫉妒心！”

“您否认嫉妒心吗，拉赫梅托夫？”

“有修养的人不应当有嫉妒心。这是一种畸形的感情、扭曲的感情、卑鄙的感情，这跟我不让别人穿我的内衣、用我的烟嘴同属一类现象。这种感情来源于把人当作自己的财产，视为物品的观点。”

“不过，拉赫梅托夫，假如否定嫉妒心，那就要造成可怕后果了。”

“对于一个有嫉妒心的人，后果是可怕的，而对于一个没有嫉妒心的人，后果不但毫不可怕，甚至微不足道。”

“您是在宣扬十足的无道德论啊，拉赫梅托夫！”

“您跟他共同生活四年以后还这么想吗？这正是他的过错。您每天吃几

顿午饭？一顿。如果您想吃两顿，会有人反对吗？大概没有。那么您为什么不吃两顿？您怕别人不乐意吗？大概只是因为您不需要这样做，您不愿意这样做。吃饭本是件惬意的事，可您的理智，主要还是您的胃，会告诉您：吃一顿午饭是惬意的，再吃一顿就不舒服了。但是，假定您有一种要吃两顿午饭的怪癖念头或者病态的欲望，您是否怕别人不乐意就忍住不吃？不，假定有人因此不乐意或者不许您吃，您只会躲起来吃，吃起来丑态百出，您慌慌张张去抓食物，把两手弄得脏兮兮的，您把食物藏在衣袋里，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您只会这样。这儿的问题根本不在有无道德，只在于私下偷吃是不是个好办法。有谁把嫉妒视为值得尊敬和可以谅解的感情，从而想到‘唉，要是我这样做，我会使人家难过’，因为持有这个观念就克制自己，强迫自己在内心斗争中白白地受苦呢？只有少数最高尚的人才做得到，绝对不用为这些人去担心，怕他们的天性会把他们引到不道德的路上去。至于其余的人，这套谬论完全无法来约束住他们，只能迫使他们耍滑头和行骗，就是说，使他们变成真正的坏人。瞧，我这就全都告诉您了。难道您这都不知道？”

“当然知道。”

“既然知道，您怎么还能发现嫉妒心的道德妙用？”

“可我跟他也总是这样来谈论的。”

“恐怕不尽然吧，或许你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可是互不相信对方说的这些话，不相信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你们在其他各种问题上，可能也在这个问题上，不断从别人那儿听到另一种论调，否则您怎么会痛苦这么长时间？为什么痛苦？一丝涟漪就会引起波涛翻滚！你们三个，特别是您，韦拉·巴夫洛夫娜，有过多少不愉快！其实你们三人本来可以照一年前那样安安稳稳地生活，或者大家搬进一处住宅里，或者按另外的方式搬动一下，或者看当时的情形而定，只是完全不必有任何的不愉快，三人照一年以前那样一起喝茶，一起去看歌剧。这些痛苦从何而来？这些不幸从何而来？全是由于他以前对您施行的坏办法，使您处于毫无准备之中，而心里仅存着的一个概念就是：‘我这样做会伤透他的心。’要是准备好的话，就根本不会有这种观念。是的，他给您造成了很多无谓的痛苦。”

“不，拉赫梅托夫，您尽说些耸人听闻的话。”

“又是‘耸人听闻的话’！我认为耸人听闻的倒是为鸡毛蒜皮而痛苦不堪，由于区区小事惨遭不幸。”

“那么，照您看，我们的这个故事不过是一出荒唐的传奇剧？”

“不错，是一出十足无聊的传奇剧，还有着十足无聊的悲剧色彩。本来是几次内容极平和的简单的谈话就能解决的事，结果却上演了一出叫人痛苦得撕心裂肺的传奇剧，这正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过失。他在传奇剧中的正直行为刚够抵偿他先前所犯的罪过--没有为了防止这出传奇剧的上演而让您（也许还有他自己）做好准备，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一切，把这一切视为无足轻重的小事，小到连多喝一杯茶或少喝一杯茶这样的事都比不上。他的过失很严重，不过他所得的报应也够大的了。您再喝一杯白葡萄酒就去睡吧。现在连我这次来访的最后一个目的也达到人已经三点钟了。如果没有人叫您，您一定能睡很长时间。我告诉玛莎，十点半以前别叫醒您，这样一来明天您一喝完早茶就得去赶火车了。行李来不及全部收拾好也不要紧，反正您不久就会回来的，或者再给您运去。您想该怎么办，是让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随后就去呢，还是您自己回来？现在您该怎样应付玛莎可是件棘手的

事，因为个能让她看出您已经平静了。不过，半个小时当中，要匆匆忙忙准备动身，她哪会看得出来？而应付梅察洛娃还要难办得多。我一清早就去告诉她别来这儿了，请她直接上火车站去，就说因为您睡得晚，不便早叫醒您。”

“对我真是体贴入微啊！”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您可别把这份功劳也记在他头上，这是我自己想到的。不过，我只骂他从前的做法--在他面前，我自然说得更多也更狠些--我只说这一切无谓的痛苦是由他的过失造成的，而在承受这无谓的痛苦期间，他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

三十一

同敏感的男读者谈话·他被驱逐

“现在拉赫梅托夫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在我的小说中出现了。敏感的男读者，你说说，为什么我要引出个拉赫梅托夫来呢？你早就从我这儿知道了，他是个游离于情节之外的人物……”

“不对，”敏感的男读者打断我的话，“拉赫梅托夫是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不是他带来了那张字条……”

“在你所喜好的审美评论方面，你实在显得水平太低了，阁下，”我也打断了他的话，“除他之外，你认为玛莎也是个重要角色吧？小说一开始她也带来过一封信，那封信使得韦拉·巴夫洛夫娜失魂落魄的。拉赫莉也该算重要角色罗？她给过一笔贷款，没有这笔钱，韦拉·巴夫洛夫娜便走不成。N教授也是重要角色吧？因为他曾经介绍韦拉·巴夫洛夫娜到B太太那儿当家庭教师，没有这档子事，就不会出现从近卫骑兵林阴道回来后的场面。恐怕连近卫骑兵林阴道也算重要角色吧？因为，如果没有它，便不会有在这条路上的幽会以及从那儿回家后的场面。豌豆街恐怕是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因为没有这条街就不会有街上的房子，那么也就不会有斯托列什尼科夫的房子，那么也不会出现管房屋的人，更不会出现管房屋的人的女儿，于是整部小说根本不会存在了。不过，就假定像你所说的，近卫骑兵林阴道和玛莎拉赫莉和豌豆街全算是重要角色吧，可是小说讲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时，只用了五句或者还不到五句话，因为他们所起的作用小，不值得花费五句以上的笔墨，那么请看小说中为拉赫梅托夫用了多少篇幅啊。”

“哦，现在我知道了，”敏感的男读者说，“引出拉赫梅托夫，是为了批判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洛普霍夫，为了来安排一次跟韦拉·巴夫洛夫娜谈话。”

“啊，你水平太低了，阁下！你把问题正好理解反了。难道需要引出一个特别的人来，让他说出他对别人的看法吗？你的那帮伟大的艺术家也许就是根据这种需要在作品中把人物领进领出的吧。我虽然是个水平低的作家，可我对于艺术性的条件还是理解得较为深入些。不，阁下，小说所以需要拉赫梅托夫完全不是为了这个。韦拉·巴夫洛夫娜、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本人对自己的行为与相互关系，不是多次表示过看法吗？他们这些人并不笨，他们自己就能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们在这一点上无需别人来提示。难道你以为，这些天当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有了空闲忆起往昔那段乱纷纷的日子时，她不会责备自己忘记了工场，如同拉赫梅托夫责备她一样？难道

你认为，洛普霍夫就不曾想到过他与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关系问题，以及拉赫梅托夫在韦拉面前说他的那番话？他统统都想过。正派人自己就会想到人家可能责备他们的一切，所以他们才成其为正派人呀，阁下，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你在揣摩正派人的思想时显得水平太低了，阁下。我还要对你说：难道你认为拉赫梅托夫跟韦拉·巴夫洛夫娜谈话时，他的表现与洛普霍夫没有关系吗？不，阁下，他只是洛普霍夫的工具，而且当时他自己也非常清楚，他只是洛普霍夫的工具，过一两天，连韦拉·巴夫洛夫娜也猜到了，如果当时她不是过于激动的话，拉赫梅托夫一开口她便会猜到的。其实就是这么回事，难道你连这都不明白？当然，洛普霍夫在第二张字条中说得全是实话：无论他对拉赫梅托夫或者拉赫梅托夫对他，事先只字未提过拉赫梅托夫跟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谈话内容。但是洛普霍夫与拉赫梅托夫相知很深，他知道拉赫梅托夫对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在何种场合会如何讲话，正派人之间无需解释也能相互了解。洛普霍夫几乎能够一字不差地预先写出拉赫梅托夫要跟韦拉·巴夫洛夫娜说的全部内容，正是因此，他才请了拉赫梅托夫做中间人。是否需要把他们内心更深层的秘密揭示给你呢？他现在想到的有关他自身的一切，拉赫梅托夫也会想到的（梅察洛夫、梅察洛娃以及在岛上跟他摔过跤的军官也能想到），再过些时候连韦拉·巴夫洛夫娜也会想到的，即使没有任何人把这告诉她。只要她最初那狂热的感激之情一消失，她马上可以看出这点。‘所以，’洛普霍夫盘算着，‘归根到底，我没有因为叫拉赫梅托夫去找她而受到任何损失，尽管他要骂我一通，反正不久她自己也会对我持有这种看法。相反地，我倒能赢得她的尊敬，不久她就会猜测到我预先知道拉赫梅托夫跟她谈话的内容，并且猜测到是我安排了这次谈话和为什么安排。她会这样想：‘他真是一个高尚的人啊，他知道，在最初那些激动不安的日子里，我对他的感激之情近乎病态地压迫着我，他企图使我心中尽快产生一种可以减轻我的精神负担思想。

虽然我曾经为了拉赫梅托夫骂他而生气，可是当时我就懂得拉赫梅托夫其实说出了真相。

过一个星期我自己也能想到这一层，不过那时候这对于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我无论如何也该平静了。而由于头一天便有人对我说出了这些思想，我才避免了可能持续一星期之久的内心痛苦。在那一天，这些思想对我是至关重要、十分有益的……是的，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这就是洛普霍夫一手安排的策略，拉赫梅托夫只是他的工具罢了。你要知道，敏感的男读者阁下，高尚的人士有多狡猾，利己主义在他们身上如何表现呢，反正不同于你们。阁下，因为他们感到快乐的事就不同于你们，阁下。你可知道，他们的最大的快乐是使他们所尊敬的人把他们当作高尚的人，阁下，他们为此奔波忙碌，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真是处心积虑，那份积极不亚于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耗费的心血。只是你们各自的目的全然不同，因此你们想出的办法也就各不一样了：你想出的是些卑劣的、损人的招数，他们想出的却是正当的有益于人的办法。”

“可是你怎么敢对我说话粗暴无礼？”敏感的男读者向我大声嚷道，“我要控告你，宣布你心术不正！”

“请原谅，阁下，”我回答道，“既然我尊重您的品格像尊重您的才智一样，岂敢对您粗暴无礼？我只是不嫌冒昧，就您所喜好谈论的艺术性问题启发您罢了。您在这一点上没看对，阁下，您认为引出拉赫梅托夫来，似

乎只是为了批判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洛普霍夫。没有这个必要：他所讲述的对他们的全部想法，没有任何一点我不能告诉你的。阁下，其实这都是洛普霍夫本人对自己的想法，就是韦拉·巴夫洛夫娜过些时候也会产生的对自己和洛普霍夫的想法，即使没有拉赫梅托夫的讲述也会产生的。现在，阁下，我有个问题问你：我为什么还要把拉赫梅托夫跟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谈话告诉你呢？如果我告诉你的不是洛普霍夫和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想法，而是拉赫梅托夫跟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谈话，那么我需要告诉你的就不仅是构成谈话主旨的想法，却正就是谈话本身--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需要告诉你的恰恰是这次谈话？因为这是拉赫梅托夫跟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谈话。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还不明白吗？你可真行。你的理解力太差了，太差了。好，我来帮你弄清楚：假定有两个人在谈话，那么从谈话中或多或少地总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性格。你明白这样写的用意吗？在这次谈话以前，你是否充分了解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性格？是的。你从这儿并没有了解到关于她的任何新情况。

你早已知道她爱脸红、开玩笑，她也不反对美美地大吃一顿，恐怕也不反对喝一小杯白葡萄酒。看来需要安排这次谈话并不是为了表现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性格。那到底为了表现谁的性格呢？一起谈话的只有她和拉赫梅托夫两个人，不表现她的性格那是表现谁的呢？你猜猜！”

“拉赫梅托夫！”敏感的男读者叫道。

“这就猜对罗，好样的，我真喜欢你。那么你可以看到，事情跟你原先设想的完全相反。引出拉赫梅托夫来不是为了进行一次谈话，而是为了通过这谈话让你更多地了解拉赫梅托夫，这才是引出他的唯一目的。你从这次谈话中知道了拉赫梅托夫很想喝白葡萄酒，虽然他没有喝；知道了拉赫梅托夫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沉沉的怪物’，相反地，每逢他碰到什么愉快的事情，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种种忧虑和难耐的哀愁时，他也会插科打诨，谈笑风生的。‘不过我难得快活，’他说，‘我痛苦，是因为我难得快活，我自己也不乐意做一个‘阴沉沉的怪物’，可是环境如此，像我这种热心向善的人，就不能不变成‘阴沉沉的怪物’，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我也许整天连唱带跳，有说有笑的了。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敏感的男读者，虽然我用了许多篇幅来正面描述拉赫梅托夫是怎样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书中还有多得多的篇幅是专门在向您介绍他，介绍这个根本不算我的小说的主要人物。现在你给我说说，为什么我要引出这么个人物并且如此详尽地描述他呢？你记得，我当初对你说过：‘唯一的原因是为了满足艺术性这一首要的要求。’你想想，这要求是什么？它怎么会由于拉赫梅托夫这个人物的登场而得到满足？想明白了吗？不，你哪想得明白，还是听我说吧。不，你不必听了，听也听不明白，干脆走开吧，我拿你开心也开够了。现在我再不跟你谈话，要跟一般读者认真地谈谈了。

“艺术性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这样来描写对象，使得读者能够想象出它们的真实的样子来。比方说，如果我要描写一座房屋，那就必须做到让读者觉得它正是一座房屋，而不是茅屋，也不是宫殿。如果我想描写一个平常的人，那就必须做到使读者不会觉得他是株儒或巨人。

“我想描写新的一代中平常的正派人，这种人我足足碰见过好几百。我写了三个这样的人：韦拉·巴夫洛夫娜、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我认为他们是这种平常人，他们自己这样认为，他们所有的熟人--即是跟他们同类的

人--也都这样认为。我在什么地方不是这样谈论他们呢？我讲过什么别样的话呢？我怀着敬爱之情描写了他们，因为每个正派人都值得敬爱。但是我在何处曾向他们顶礼膜拜过呢？我笔下有哪一行字流露过一丝一毫这样的意思，表示过他们已经不知有多么崇高和优秀，我无法想象还有比他们更崇高、更好的人，他们已是人之楷模了？他们在我小说里的行为正好与我想象中的他们一致：也不过是新一代中正派人的所作所为罢了。他们有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吗？他们不干卑鄙勾当，不胆小怕事，他们具有平常心、正直诚实的信念，并且努力依照这信念去行动，也就仅此而已。确实，这算得了什么英雄行为呢！是的，我想表现的是这样一群人物，他们跟他们那种典型的所有平常人一样地行动，我希望我已经做到这一点。

我希望读者中熟悉这种典型的活的原型，从本书一开头便能不断发现：我的主要人物们绝对不是理想人物，决没有超过同一典型的人们的一般水平，他们这一典型的每个人在他所经历的无数事件中的表现，绝对不次于他们在我这部小说里的表现。可以想见，别的正派人所经历的事件，并不跟我所讲述的事件相雷同，因为这儿绝对没有迫不得已或美妙诱人的原因足以使成双成对的夫妻纷纷离异，因为决不是每个正派女子都在内心中热烈地暗恋着自己丈夫的朋友，也不是每个正派男子都在抑制他对一位有夫之妇的恋情（何况抑制了整整三年之久），也不是任何一个男子都被迫在桥上开枪自杀，或者像敏感的男读者所说，从旅馆中消失后就不知去向了。每个正派人若处在我所描写的这些人的位置上，也会如此行动的，一旦发生此类事件，他是绝对准备这样做的，然而他决不认为这是英雄行为。有许多次他遇到了类似这样棘手的事或者更甚，他也都表现不错，可他还是不把自己当作非凡的人物，他只是认为自己也不过是个平常人，老实正派而已。

这种人的好朋友们（也还是类似他那样的人，因为他跟别种类型的人没有交情）也是这样地认为：他是个好人，不过要向他顶礼膜拜，那是连想象也不可能的。他们又暗自琢磨：我们也都是和他一样的人啊。至于我所希望的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就是使每个新一代的正派人都能从我这三个主要人物身上，认出他的好朋友们中平常人的那类典型来。

“可是，从小说开头起就对我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持以这种看法：‘是啊，这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像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对我的主要人物们持以这种看法的人在读者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读者还远远低于这个典型的水平。除了茅屋什么也没有见识过的人，会把一幅画着简单的平常房屋的小画儿当作是宫殿的素描。要使这种人觉得那座房屋确实是座房屋，而不是宫殿，可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在画着房屋的那幅画上至少画出宫殿的一角，他将从这一角看到，宫殿这应当完全是另一种规模的玩艺，不同于小画儿上所画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的确应当仅只是一座简单的、平常的房屋，人人都该住上这种房屋或者比这更好的房屋。如果我不亮出拉赫梅托夫这人物，大多数读者都会对我的小说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发生误解。我敢打赌，大多数读者直到念完本章的最后几节，也还会觉得韦拉·巴夫洛夫娜、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都是英雄，都是品格最崇高的人，甚至也许是理想的人物，甚至也许，由于他们过于高尚了，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不，我的朋友们，我的色厉内在的坏朋友们，你们想得不对，不是他们站得太高，而是你们站得太低。你们看到，他们就站在地面上，你们之所以觉得他们是在云端中飞翔，那是因为你们坐在地狱般的坑里。他们

站立的那个高处，是人人都该站得上去，而且能站上去的。至于我和你们、我可怜的朋友们所无法企及的那种最崇高的人物，却不是这样的。我淡淡地给你们描画出了他们当中一个人的侧面轮廓，你们看到，他的面貌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们完全能够跟我描写得极为充分的那三个人达到同样水平，只要你们愿意在自己的修养上面下工夫。谁若低于他们，谁就是劣等。从你们的坑中走上来吧，我的朋友们，走上来并不难，走到自由的天地中来，在这儿好好地生活，道路又平坦又诱人，试一试吧：修养、再修养。你们要观察、思索，要阅读那些告诉你们什么是高雅的生活乐趣，告诉你们人可以是善良而幸福的著作。读吧，这些著作会娱悦人的心灵，观察生活吧，观察生活是有趣的；思索吧，思索问题是吸引人的。这就足够了。无需牺牲，也不必吃苦，全不需要。怀抱着做一个幸福的人的愿望吧，惟独需要的是这个愿望，为此你们要满心欢喜地关注自己的修养：幸福寓于修养之中。啊，有修养的人多么快乐！甚至别人觉得是牺牲和痛苦的事，他也从中感到满足和快乐，他的心儿坦荡、欢畅，喜悦溢满胸膛！试试看，可真好啊！”

—

柏林，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日

仁慈的女士韦拉·巴夫洛夫娜：

我跟已故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洛普霍夫的接近，使我存有希望，想您能够惠然接受我这个于您完全陌生、但是深深地尊敬您的人作为您的一个朋友。无论如何，我冒昧地揣想，您不致于责备我过分强求吧：我和您通信，只是为了实现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遗愿；您可以相信，我奉告的消息完全可靠，因为我是用他本人的话来转达他的想法的，就像他亲口说出的一样。下面是我要写这封信的主旨，即转达他对那件事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

“我的想法造成的结局震惊了跟我接近的人（我讲过了，我是在传达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原话），但这些想法是在我心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我的主意在确定了最终的形式之前，曾几经改变。这些想法的由来，在于当时的情况。直到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指的是您）惊惶失措地来告诉我那场噩梦的那一刻，这情况方才意外地被我发觉到。我觉得这场梦至关重要。作为一个从旁观察她的感情状态的人，我顿时明白了她的生活中正在出现一场变故，它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变我跟她原有的关系。可是一个人濒临绝境之时也还要极力维持他习惯的状态，在我们的本性中深藏着保守的因素，不到必要时，我们总是舍弃不了。我认为，我最初的设想从这儿可以得到解释的：当时我情愿认为并且也确实认为，这个变故随着时间的流逝便会过去的，于是我们还能保持原有的关系，还能和好如初。她尽量地跟我亲近，希望以此来避免变故的发生。我也鬼迷心窍，有好几天竟以为她的希望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了。然而不久我就深信不疑，这希望纯属白日梦，到头来一场空。其实原因还在于我的性格。

“一个过着正常生活的人，他的时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劳动、享乐、休息或消遣。享乐也像劳动一样需要休息。在劳动和享乐中，人的共性因素

压倒了一个人的特性：劳动时，我们的行动主要是受合理的外部需要所支配；享乐时，我们的行动主要受人的本性中其他的，同样是共性的要求所支配。休息或消遣却是个人在紧张的劳动和纵情的享乐中消耗了储存的生命力之后，借以恢复力量的一个要素，是个人自行引进生活中的一个要素。在这儿，人希望按照他自己的特性，根据他个人的方便来决定活动。在劳动和享乐中，人们由一种强大的、超越于他们个人特性之上的共性力量而互相吸引着，在劳动中是谋共同利益的考虑，在享乐中是机体的相同要求。在休息中却不然。休息不牵涉那抹煞个人特性的共性力量，休息是最富个性色彩的事，在这儿，天性要求有最大的自由，在这儿，人是最个性化的，要充分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只需看看他觉得哪种休息方式更为轻松愉快就行了。

享乐，除物质享受外，也包括精神上的享受。

“就这方面说，人分为两大主要类别。一类人认为跟别人在一块休息或消遣更愉快。

本来每个人都需要独处，他们虽然也需要，却只把独处当作特殊的情况，他们的常规是跟别人一块生活。这类人数目众多，远远超过另一类。另一类人的需要恰恰相反，他们觉得独处比跟别人在一块更自由。这一差别已被人们普遍注意到，并用两个词来表述：爱交际的人和孤僻内向的人。我属于不爱交际的人，她属于爱交际的人。这便是我们这次变故发生的全部秘密。原因既然找到了，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当中无论是谁都没有什么该受指责之处。同样无可指责的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预先对付这种差别。人无力违抗自己的天性。

“每个人是很难去了解别人的个性特点的，大家都根据自己的个性去想象所有的人。

我不需要的东西，我就以为别人也不会需要，我们的个性引导我们这样来思考。必须具有极为明显的征兆，我才会从反面去思考。反之，在我看来是轻松自由的，我总以为别人也会这样来看。这种思想情绪颇为自然，这也就可以把所以这么晚才发觉我和她天性上有差异的理由解释清楚了。下面的事实也大大助长了我的错误：我们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她把我的水平看得太高，当时我们之间还没有平等可言，她那方面对我过于尊崇。我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目中简直已成为楷模，把我个人的特点看作了人的共性，一时间竟着了迷。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没有修养的人当中内心生活的不可侵犯性很少受到尊重。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尤其是年长的人，都可以毫不客气地干预您的私生活。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秘密会由此泄露出去：秘密总是弥足珍贵的，您决不会忘记保密，况且又不是人人都有秘密，许多人对自己的亲人根本无密可保。但是每个人都希望他的内心生活中有一个不容任何人潜入的角落，正如人人希望有一个自己独用的房间。没有修养的人对这两者都并不在意：即使您有个独用房间，人们仍旧会潜入的，他并非存心进来窥探或者缠磨人，不，只是因为他还不具备‘打扰人’的意识：他以为只有当您十分厌恶他，您才会不愿看见他无缘由地突然来到您面前。他不懂他可能使您厌烦，可能妨碍您，纵然您对他抱有好感。其实任何人未经房主同意都无权跨过他的门槛，而我们这里，只有在一个房间里，即家长的房间里，门槛的神圣性才被国人承认。因为任何人如果擅自闯到家长跟前，家长就可以掐住他的脖子轰他出去。其余所有的人，只要年长于他们或家庭地位跟他们相当，都能够随时想闯就闯到跟前去。

您的内心生活世界也像房间一样。任何人都可以仅只为了任何无聊琐事，或者常常只为了拿您的私事给他嚼嚼舌头，就毫无必要甚至毫无目的地在这个世界上。钻进钻出。一个姑娘有两件日常穿的连衣裙，一件白的，一件粉红的。

她穿了粉红的，于是人家便可以拿她这桩私事来嚼舌头了：‘你穿了粉红的，阿妞塔，你为什么穿它？’阿妞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穿它，她总得穿件衣服呀。再说，如果她穿了白的，也还会是同样的结果。‘不为什么，妈（或者姐）。’‘你穿白的更好些。’为什么好些？连那个跟阿妞塔谈话的女人自己也不知道，她只不过想嚼嚼舌头罢了。

‘你今天怎么啦，阿妞塔？好像不高兴。’阿妞塔根本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但是对于没有看见过却又不存在的事又为什么不可以打听打听呢？‘我不知道。不，我好像没有什么。’——‘不，你是有点不高兴。’过了两分钟：‘阿妞塔，你坐下弹弹钢琴吧。’干吗要弹？谁也不知道。整天都是如此等等……。您的私事好比一条街道，每个坐在窗口的人都可以来瞧一瞧，不是因为他需要在那儿看见什么，不，他甚至知道看不见什么需要的或新奇的东西，他只是闲得没事，既然瞧不瞧都无所谓，那干吗不瞧它一眼？对于一条街道，这确实无所谓，但对一个人来说，老被死死地钉着看却是很不自在的。

‘这种毫无目的和用意的纠缠自然可能引起逆反心理：只要那个人的环境容许他独处，在一段时期中他是会在独处中找到乐趣的，即使他的天性喜欢交际，而不喜欢孤独。’

‘就这方面说，她结婚以前处于极其难堪的境地：人们死死纠缠她，打探她的隐私，不仅是因为无事可做和没有分寸而偶然打听打听，而且是长期不断、死乞白赖、一刻不停、冒昧鲁莽、肆无忌惮地打听，居心叵测地打听，不但用毫不客气的手段，还用非常残暴和极其卑鄙的手段去打听，因此她的逆反心理就很大。’

‘所以人们不应该严厉指责我的错误。有好几个月——或许是一年——我并没犯错误：当时她实在需要和乐意独处。而这个时期，我对她的性格已然形成了一种看法。她那迫切的暂时需要跟我的一贯需要恰恰一致，我把一个暂时现象当作她性格上的经常特点，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人人都喜欢以己之心去猜度别人啊！’

‘我犯了错误，而且是很大的错误。我不责备自己，不过我还是想辩解一下，这表明，我感觉，别人对我不会像我自己对自己那么宽大为怀。为了减轻我所受的指责，我应该略微多介绍介绍我的性格，说说我的性格中她和跟别的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的方面，这些方面如果不加解释便可能被误会了。’

‘除了在独处中休息，我不知道其他的休息方式。我认为跟别人在一块简直就是在干事——工作或享乐。只有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才感到自己完全自由了。这该怎么解释？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一种人是由于性格内向，第二种人见人就害羞，第三种人经常郁郁寡欢，第四种人因为对人缺乏同情心。我身上似乎全没有这些缺点。我坦白直爽，愿意永远快活，根本不知郁闷。我喜欢多见人。但是在我看来，‘见人’跟工作或者享乐是连系在一起的，我见人以后就需要休息，照我的看法就是需要独处。据我所理解，独处不过是我对于独立与自由的向往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而已。’

‘于是，她对她从前在娘家时那个恶劣环境的逆反心理，才使她暂时接

受了一种不符合她的恒久爱好的生活方式，她对我的尊敬更助长了这点，并且使之持续了这么长久。

在这个长时期内，我对她的性格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把她暂时的特点当作固定不变的特点，所以以为可以万事大吉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方面是犯了错误，但把这个错误并无恶意，她那方面则是完全无辜的。然而这结果给她造成了多少苦难，也使我落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

“她做了噩梦后惊惶失措的那副样子，才使我明白了她的感情状态，可是这时再来纠正我的错误为时已晚。如果我们早一点发觉，我和她也许会坚持克制自己，使我们能永远地相互满意吧？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即使克制成功了，也不会有多大的意思。就算我们彻底改造了各自的性格，根除了为我们的关系而感到苦恼的原因，但性格的改造只有针对不良方面时才是件好事，而她和我需要改造的那几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爱交际比爱孤独好在哪儿？坏在哪儿？反过来相比也如是。性格改造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强制、激变。有许多东西在激变中丧失了，有许多东西在强制下麻痹了。我和她可能（只是可能，还不一定）得到的那点儿东西还不如失去的多。我俩的鲜明个性会部分地褪色，我们会多多少少地扼杀自己鲜活的生命力。为了什么呢？仅仅为了维持既成的夫妻关系。

要是我们有孩子，可又另当别论了，那时就必须多多考虑孩子的命运会由于我们的离异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假定会变坏，那就值得尽最大的努力来防止，结果是令人高兴的，因为我们做出了所必须的努力，为着给所爱的人留住最好的命运，这样的结果是对你的全部努力的补偿。可是现在，做这一切有什么现实的目的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错误或许甚至还带来好处呢：由于犯了错误，我俩也就无需更多地改变自己。错误固然带来了许多痛苦，但是，没有错误，痛苦恐怕要更多，结果也不会这么圆满了。”

这便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说的话。关于事情的这一面他讲了很多，而且语气很坚决。从这语气中，您不难看出：他，正像他自己说的，这方面叫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并且于他不利。他坦率地补充说：“我感到，在那些分析此事时对我缺乏同情的人的眼中，我还是不完全对的。可是我相信她会同情我，她对我的评价甚至比我的自我评价还要高，而我认为自己是做得完全对的。当然，这是我对她做梦以前的那段时期的看法。”现在我再转告您，自从您那场梦向他暴露了您和他之间的关系中有缺陷以后，他的感情和想法是怎样的：

“我说过（这都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话），一听到她关于噩梦的最初几句话，我就明白了，一件会改变我们原有关系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我预料这件事将有重大作用，因为不可能有别种的结果，既然她的性格是那么充满活力，而她当时的不满情绪由于深埋的时间过长，已经非常强烈。但在最初，这个预料还是以一种对我最轻易、最有利的形态出现的。我是这样判断，她对别人的狂热爱情只是暂时的，过一两年她就又会回到我的身边。我是一个很好的人，碰见这样一个好人的机会极少（我心里怎样估计自己就怎样说，直截了当。我不贬低自己的长处：没有虚伪的自谦）。爱情得到满足后会失去它的几分冲动，她将看见虽然她跟我在一起生活，还不能满足她的某一方面的天性，但是就全部复杂的生活来说，她跟我在一起生活却比别人在一起轻松些、自由些，那么一切都会恢复到以前那样。我会从经验中

取得教训，将对她更加体贴入微，她对我也会产生新的敬意，会比以前更爱我，我们将比以前更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可是（说明这件事必须很慎重，而我又不能不加以说明），可是我对于我俩恢复关系这个问题的前景怎样设想呢？恢复了关系，这会使我高兴吗？当然高兴。光是高兴？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负担，当然是愉快的、非常愉快的负担，但终究是个负担。我热烈地爱着她，我可以改变自己去更好地适应她。这将给我带来快乐，不过我的生活毕竟要受到限制。在我由于第一个印象而放下心来以后，我就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没有被迷惑。当她希望我极力保持住她的爱情的时候，她让我体会到了这一点。迎合她这愿望的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月。不，这里并没有什么痛苦可言，这句话完全不符合实情，纯粹是荒唐。我的明显的感觉是，迎合她的时候，我所体会到的只有快乐，但是我心里烦闷。她企图维持对我的爱而终于失败的秘密正在于此。我迎合她就感到烦闷。

“初看起来这似乎有些奇怪，为什么花费了无数个晚上给那些大学生我却并不烦闷，其实我本来没有必要为他们太多地劳神费心；为什么我为一个女人仅仅花费了几个晚上便感到疲惫不堪，何况我爱她甚于爱我自己，甘愿为她去死，不但为她去死，还为她去承受任何的苦难。这似乎有些奇怪，但这是因为有的人对我跟那些占用了我很多工夫的青年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并不了解。第一，我跟这批青年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当我和他们待在一块的时候，并不感觉自己面前有人，我只看到几个抽象典型在相互交流思想。我和他们谈话，跟两人对坐沉思默想没有什么不同。我身上只有一个方面、最少需要休息的一方面——思想——在活动，其余一切方面都处于酣睡状态。再说，这类谈话都具有着实际的、有益的目的：帮助我的青年朋友们提高心智生活，品德修养和毅力干劲。这是一种劳动，却是非常轻松的劳动，它适于用来恢复被其他劳动消耗掉的力量，它不叫人感到疲劳，反而使人精神焕发，因此人并没有提出休息的要求来，虽然它毕竟是一种劳动。在这里我所寻求的是效益，不是安宁，我让我身体的各个方面都进入睡眠状态，只让思想活动。而思想活动又没有掺杂丝毫对于我的谈话对手的私人关系，所以它感到正像两人对坐沉思默想一样，自由自在。这些谈话可以说并未把我从独处中吸引出来，这跟那种需要全力投入的交往是完全不同的。

“我知道说出‘烦闷’这个词是多么不好张口，可是我的良心不容许我隐瞒。是的，尽管我很爱她，然而当我后来确信她和我之间已不可能建立一种适合于我们照旧生活的关系时，我倒感觉松快了。我开始确信这一点，大约是在她发现迎合她的愿望在我是件苦差事的时候。于是未来在我面前展现出了新的、让我比较愉快的形态。我已然看出来，我们原先的关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便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快地——我又得说一句难以启齿的话了——怎样才能更快地摆脱开那个使我烦闷的境地。有的人竟然觉得我宽宏大量，秘密就在于他们甘愿为足以表示谢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或者跟我不接近、看不透我的最深层的动机。是的，我只是单纯地想脱离开那个使我烦闷的境地。我并不虚伪地否认自己的美德，我不想否认我有着希望她好的动机。但这只是第二个动机，就算它的作用大吧，它的作用还是远远不及第一个动机、主要的动机——希望摆脱烦闷：这才是真正的缘由。在这真正的缘由的影响下我开始注意地观察她的生活方式，并且轻而易举地发现了，她的感情的变化是由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的，而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的出现和疏远

在这变化当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使我不由得想到他，我这才明白了我从前没有注意的他的那些古怪举动的原因，从这以后我的思想便获得了新的样式——让我比较愉快的样式，如问我上面说过的。我看出她不仅在寻求热烈的爱情，而且已经产生了爱情，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罢了。她的感情给予了一个可尊敬的、总之足以能够代替我的人，同时这人也热烈地爱着她，于是我高兴极了。的确，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好受的，任何重大的变化都是跟某种伤感连系着的。现在我才看出我不能，凭良心说，认为自己是她所需要的人，而我已经习惯认为她需要我，说实话，这使我感到愉快。丧失这种关系必然会有它痛苦的一面。但是这痛苦的一面仅只在最初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占了另一面、叫我高兴的一面的上风。现在我相信她会幸福，也不用为她的命运担心了。这是巨大的快乐的源泉。但是如果认为主要的快慰都在这里，那也想错了。不，个人的感情仍然重要得多：我看到我已经摆脱束缚，完全自由了，我说这话可没有那样的意思，好像我觉得独身生活比家庭生活自由或者轻松。不，如果夫妻之间相互呵护时，无需丝毫勉强，全属自然的流露，如果他们没有任何人为的努力，双方也能相互满意，如果他们互相呵护而又完全无意，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愈亲密，他俩也愈轻松、愈自在。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所以，对我来说，离异便是自由。

“由此可见，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所做出的举动，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举动也有高尚的一面，但做出这举动的动力却是我自身天性中希望有利于自己的欲望。因此我才能够做出这些可以说是良好的举动：不动摇，不出尔反尔，不给别人制造无谓的忙乱和烦恼，不背弃本身的责任。这是容易做到的，只要责任跟自己天性中的欲望完全一致。

“我上梁赞去了。过了些时候，她叫我回去，说是我在那儿已经不再妨碍她。我知道我还是会妨碍她。据我理解，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看到她认为她感激不尽的人，她会痛苦。她在这一点上是错了，我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她感谢的，因为我那样做主要是为自己，并非为她。她的想法却不一样，她对我怀有热烈的谢忱。这种感情是痛苦的。虽然其中也有令人愉快的一面，但是这一面只有在谢忱不太强烈时才能压倒痛苦的一面。

谢忱一强烈，她心里就感到很沉重的。第二个原因呢——说来又有点难于开口，不过我必须讲讲我的想法——我找出的第二个原因是，从社会条件方面来说，她所处的尴尬的地位令她不快，她为社会方面不肯正式承认她有权占据这个地位而感到痛苦。所以我意识到我在她身边生活会叫她痛苦。我不愿隐瞒，这个新的发现里还有一面，这一面比起我在事发前期所体验过的种种感情更叫我痛苦难忍。我对她依旧怀着深深的好感，我仍然愿意做她的密友。我希望能够这样。当我看到我不该这么想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悲哀，并且个人所能得到的任何利益也抵消不了我这悲哀。可以说，我下定我的决心，我最后下定决。心的唯一原因只是由于爱她，希望她好，完全是出于无私的动机。但是我对她的关系从来——连最好的时期在内——也没有像这个决心所给予我内心这么大的快乐。这时我是在一种高尚精神的驱使下来行动的，说得更确切些，是高尚的考虑，在这考虑中只有一般的人性法则在起作用，而不必附带靠着个人的特点来加强。我这才感受到那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快乐，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的举动是个高尚人的举动，即任何人——不管是伊凡，还是彼得，不管姓甚名谁，任何人都必定这样做的：如果他感到自己仅只是作为一个人，不是伊凡，也不是彼得，而只是作为一个人，仅仅

是作为人——那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快乐啊。这种感情过于有力，升华为这种感情的次数过多时，像我这样的庸夫俗子就承受不了了。但是能偶然地品尝一下它，却是很惬意的。

“我的举动中有一个方面无需解释，如果我的对手是别人，那么我的举动就未免太冒失了，可是我让位给他的那个人的性格，再明显不过地证明我做得对。当我去梁赞的时候，她和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还没有互相表白感情；当我最后下定决心时，无论对他或者对她我都一点没透露。可是我深深地了解他，我无需向他了解也能知道他的看法。”

我在前面说过，我是一字不差地忠实传达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话的。

我对您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但是我为了实现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遗愿而和您私人通信，您大概很想知道这个跟您毫无关系、专谈已故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内心生活的通信者是谁吧。我原先是个医科大学生，关于我自己也没有更多可奉告您的了。

头些年我住在彼得堡。几天前，我忽然想起去旅行，并在国外给自己找个新的职业。我是在您知道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噩耗的第二天，离开彼得堡的。由于情况特殊，我手头没有护照，只好借用别人的证件，这证件是靠您我的一位共同朋友热心想办法、为我弄到的。他给我证件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委托我在路上办几件事。如果您有机会见到拉赫梅托夫先生，麻烦您告诉他，说委托我办的事都办好了。最近我大概要去德国转转，考察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我身边还有几百卢布，我想玩一玩了。玩够了便找个工作，随便干什么都行。去哪儿找呢？走到哪儿算哪儿。我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也能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我非常喜欢这种生活。

您很可能乐意赐一回信。但是我不知道一星期后我会在哪里，可能在意大利，可能在英国，可能在布拉格。现在我可以依照自己的幻想来过生活了，不知幻想将把我带往何方。因此您就在信封上写上下述地址：Berlin Friedrichstcasse, 20, Agentur von H. Schwigler，您的信装入信封后，再放入这个信封里。里面的信封不用写任何地址，只标上数字 12345 即可，希威格莱经销处就会知道那封信该转给我。

德语：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二十号，希威格莱经销处。

善解人意的女士，请接受一个与您毫无关系，可是对您无限忠诚的人所表示的深切敬意，他自称为：

一个原医科大学生

一个原医科大学生指洛普霍夫。

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阁下：

根据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遗愿，我应该向您转达他的看法，并说服您相信：他觉得他的最佳状态就是把位置让给了您。引起这场变化的种种原因，是三年当中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您几乎杜绝去他家做客，因此您跟这一变故完全无关，唯一的原因只是他俩性格不合，后来您还竭力撮合他们，但无济于事，由于这种种原因，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眼下的结局了。显而易见，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决不会认为这结局是由您造成的。说明这点当然毫无必要，不过——多半只是为了走走形式——他还是托我向您说明一下。他无法占有的位置，反正总会有人要占的，别人所以能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只是因为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不能占有它。恰恰又是您出现在那个位置上

了。按照已故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看法，这正是对大家来说最好的结局了。紧握您的手。

一个原医科大学生

“可是我知道……”

怎么回事？一个耳熟的声音……我回头一看，真就是他！就是他，敏感的男读者，前不久被赶走的，那是由于他对艺术性一无所知，真太不光彩了。他又回来啦，还是像从前那样的敏感，又在炫耀他知道了什么啦！

“啊哈！我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

我急忙抓起手边最先碰到的一件适用的东西——一块餐巾，因为我刚抄完那个原医科大学生的信，正坐下来吃早饭呐——于是我抓起餐巾堵住他的嘴巴：“呸，你知道就知道吧，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呢？”

二

彼得堡，一八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阁下：

您会了解您的来信叫我何等快慰。我衷心感谢您给我写信。您跟已故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亲密关系，使我有权把您也当作我的朋友——请允许我使用这个称呼。从您所转达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每句话里都能看出他的性格来。他经常探索他的行动的隐秘原因，并且乐意将这些原因归结为他的利己主义理论。不过这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所有人的共同习惯，我的亚历山大也喜欢用这个理论来分析自己。如果您能听到他是怎样来解释他这三年来对我和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该多么好！

照他的话说，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于利己的考虑，为了自身的快乐。我也早已养成这个习惯。不过我和亚历山大对这个理论的兴趣不如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那么大，我们跟他的兴趣虽然完全一致，但是他更为热衷于这个理论。如果有人听到我们谈话，他会觉得我们三人都是世上从未有过的大利己主义者。也许这是事实吧？也许早先不曾有过这样的利己主义者吧？大概是不曾有过的。

可是除了我们三人这个共同特点以外，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话里还有一个属于他自身地位的特点：他进行那番说明的用意显然是要安慰我。并不是他的话不够诚恳——不，他说的话从来都是由衷之言——只是他太强调事实中能够安慰我的那一面了。我的朋友，我为此十分感激他，不过我也是个利己主义者呀，我要说，虽然他一心只顾来安慰我，可这全是白费心思。我们进行自我辩护，远比别人为我们辩护便当得多。说实在话，我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我还要进一步说：我甚至不认为自己就该感激他。我看重他那高尚的品格，我是何等看重它啊！但我知道他高尚不是为我，而是为他自己。我也同样，如果说我没有欺骗他的话，那么，我也不是为的他，而是为我自己，不是因为欺骗他对他不公正，而是因为我自己厌恶欺骗的做法。

我说过我不责备自己，正如他一样。可是我也像他一样，有一种自我辩护的冲动。

借用他那句很正确的话来说，这表明我预感到别人无法像我自己这样轻易地原谅我，不来指摘我的行为中的某些方面。我根本不愿意去辩护他为自身辩护的那部分。相反地，我只愿意为他辩护那无需辩护的部分。谁也不会说我在做梦以前有什么过错，这，我知道。但是后来使事情带上传奇剧的色彩，造成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原因不就是由我引起的吗？当我的梦最初向我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展示了我俩的处境时，变化已经无法避免了，我那时不是就应该把我跟他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的变化看得简单些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自杀的第二天晚上，我跟严峻无比的、实际上是非常和气善良的拉赫梅托夫长谈过一次。他告诉了我有关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许多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用一种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友好的语气来代替拉赫梅托夫那生硬的、似乎含有敌意的语气，把这些事情重复讲一遍，这些事情或许就显得合情合理了。我猜测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一定十分清楚拉赫梅托夫会对我说些什么，那是与他的想法一致的。的确，当时我需要来听听这些，听了以后我果然平静多了。无论是谁安排了这次谈话，我都是很感激您的，我的朋友。可是连严峻无比的拉赫梅托夫也不得不承认，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对于事情的后半段处理得非常好。拉赫梅托夫要责备他的只是他想为自己辩护的前半段。

我要进行辩护的是后半段，尽管谁也没有指摘我在后半段有过错。然而我们——我说的是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整个圈子，当中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比拉赫梅托夫更严格的批评者，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理智。

是的，我的朋友，我知道，如果我把事情看得简单些，不赋予过多的悲剧色彩的话，大家都会轻松得多。照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看法，还应该进一步推论出：如果那样，他就根本无需安排那种具有轰动效应的、叫他非常痛苦的结局了，他落到这般地步，完全是因为我过于惊慌紧张的缘故。我知道他一定会同意这种看法的，虽然他并没有托您转告我。正因为他对我的好感没有因为这种看法而减弱，我才珍惜这份好感。可是请听我说吧，我的朋友，这看法不完全公正，甚至完全不公正：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所以不得不饱尝那他称之为万分痛苦的一切，并非由于我的过错，并非由于我的过度惊慌。

固然，如果我不把我们关系的变化看得过分严重，他就可以避免梁赞之行了。但是他说这次出走在他并不痛苦，因此并非我那过激的看法酿成的大祸。对于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来说最痛苦的只是他不得不自杀。他用两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非做出这个决定不可：我苦于对他一直怀着无限的谢忱，我苦于无法对亚历山大确立起社会所要求的那种关系。在他去世以前，我还不能十分平静，我为自己的处境而苦恼，不过他没有猜中真正的原因。他以为他的出现会叫我难过，因为我对他的谢忱对于我是一个过重的思想负担。其实不完全如此，人总喜欢寻找一些理由以减轻自己的思想负担。当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认为有必要自杀时，这个理由早已不存在了：我对他的谢忱早就慢慢减弱，并且变成了一种愉快的感情了。可是这个理由还跟我原先对事情的过激看法有点儿关联。

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列举的第二个理由是，希望能使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被社会承认。

这个理由却跟我对事情的看法毫无关系，而是社会观念的产物，面对这个理由我束手无策。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根据这个理由而推测他的出现

会使我痛苦；这推测完全错了。

不，即使他不死，我也很容易推翻这个理由，假如有必要的话，假如我认为这样也未尝不可的话，是容易取得社会的承认的。只要丈夫和妻子住在一起，就足以防止社会对妻子风言风语，无论她是否跟别人有染。这就该说是功德无量了。我们看见过许多例子，靠了做丈夫的高尚品格，问题便如此这般地解决了。只要遇到此种情况，社会从不干涉妻子，任其自由。现在我认为，这是解决我们这类问题时对大家来说最为省力的、最佳办法。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从前向我提过这个办法，我那时思想过激，拒绝了他。我不知道如果我那时候接受了会怎么样。如果社会不来干预我，不对我风言风语，不过问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而我也就会感到满意了。那么，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向我提出的办法当然对我已经尽够了，他也无需决定去自杀。那么，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希望正式确定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了。但是我觉得，这样来处理类似于我们的这种情况，对大多数人来说，会是很圆满的；而对对我们来说，却未必适宜，因为我们的情况具有一种罕见的偶然性，就是三个人正好势均力敌。如果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感到亚历山大比起他来具有着才智、修养或者性格方面的优势，如果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亚历山大就等于对一种精神力量的优势甘拜下风，如果他放弃位置并非出于自愿，而仅仅是弱者在强者面前的退缩，啊，那我当然就没有什么可难过的了。同样，如果我在才智或者性格方面比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强得多，如果他在我和亚历山大的关系发展之前是笑话中惟妙惟肖讲述过的那种人物——你记得吗，我的朋友，那个笑话引得我们大笑不止：它说的是有两位先生在歌剧院休息室相遇，闲谈了一阵，彼此谈得很投机，都愿结交结交，“我是某某中尉，”一位自我介绍道。另一位却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泰德斯科夫人的丈夫。”如果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是“泰德斯科夫人的丈夫”啊，那么他当然根本用不着自杀，他会对我顶礼膜拜，百依百顺，如果他又是个规矩人，他更不会认为他的顺从会有丝毫使自己受屈辱的，于是万事如意。他对我以及对亚历山大的关系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丝毫不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弱或者差，这，我们知道，他也知道。他的让步不是由于软弱无能，啊，完全不是！那纯粹是由他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对吗，我的朋友？您无法否认这点。那么我才看清了我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中呢？问题的实质都在这儿，我的朋友。我看到自己处在依从于他的意志的境地，因此我觉得我的处境挺难堪，这样他才认为必须做出那个高尚的决定——自杀。不错，我的朋友，迫使他走到这一步的固然是我的感情，这感情的原因却隐藏得比他在您来信中所解释的深得多。我对他的谢忱已达不到成为思想负担的程度了。满足社会的要求其实也不难，只要采用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自己向我提过的那个办法就行。况且我才不在意社会的要求呢，我生活其中的小圈子根本就没有这种要求。但是我仍然要依附于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我的处境只能以他的意志作为基础，是不能独立的，这才是叫我难堪的原因。现在请你想一想，我对我们之间关系变化的看法能够防止这个原因的产生吗？这儿重要的不在我的看法，而在于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是个独立自主的人，他这样或那样行动全凭自己的意志，全凭意志！是的，我的朋友，您一定了解并且赞许我这种感情：我不愿俄从于任何人的意志，即使是对我最忠实的人，即使是我所最尊敬的人，我信赖他不亚于信赖我自己，我清楚地知道他永远乐于为我做我所需要的一切，他比我自己还要珍惜我的幸福。

是的，我的朋友，我不愿依附于他，我知道您赞成我这样做。

韦拉习惯地又以“你”相称了。

泰德斯科夫人（一八二六一—一八七五），著名的意大利歌剧演员。

不过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为什么要剖析我内心最隐秘的、谁也无法发现的感情动机？对我和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来说，这种自我暴露却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够说：我没有过错，问题是取决于一件由不了我的事实。我记下这些是因为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爱听这样的意见。我想来讨好讨好您，我的朋友。

可是这方面已经说得够了。您对我怀着那么深切的同情，竟不惜花费好几个钟头来写您那封对我弥足珍贵的长信。从这一点我看出来——瞧我用辞多么委婉得体，正像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或者您用辞一样——是的，从这一点，只有从这一点，我才看出来您一定很想知道，在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跟我分手去了莫斯科以及返回自杀之后，我的境遇如何。他从梁赞回家，看出我挺尴尬的，我的这种尴尬只是在他回家以后才暴露得最强烈。他在梁赞的时候，老实告诉您，我倒并不时常想他，不，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时常想他，您是根据他回家看到的情况做出的判断。不过在他要上莫斯科的时候，我看出他正在策划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看来，他是要从彼得堡的事务中脱身，有一个来星期，他显然是在等着事务了结好离开，后来，在他走前头几天，我有时发觉，他满脸愁容。虽然他善于隐藏自己内心的秘密，但怎能不发觉呢？我预感到一件严峻的、决定性的事马上就要酝酿成熟了。他上火车时，我是那样的伤心，伤心透顶。第二天我还是忧伤满怀，第三天早上起床时我更加伤心，突然间，玛莎给我送过来一封信，您知道，那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时刻，多么痛苦的日子。因此，我的朋友，现在我比从前更加了解了我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爱情的力量。我自己也没想到这爱情如此强烈。是的，我的朋友，现在我才知道它的力量，您也会知道的，因为您当然知道那时我就决定过不再跟亚历山大见面了。我整天觉得我这一生已经彻底毁掉了，再也没有快乐了，您也知道，我看见我那位好朋友的字条时真是像个孩子那样高兴，那张字条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您看我用词多谨慎，您该满意我了，我的朋友）。这一切您都知道，因为拉赫梅托夫送我上了火车后才去给您送行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和他说得对，我还是应当离开彼得堡，以便造成那么种印象，为了造成那种印象，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竟然不惜让我在极度的痛苦中熬过一整天，我真是感谢他的这种残酷无情啊！他和拉赫梅托夫又劝亚历山大别来家看我，别送我上车站，这也都是对的。但是我已经无需前往莫斯科了，只要离开彼得堡就行，所以我在诺夫戈罗德停留下来。过了几天，亚历山大也到了那儿，随身带去了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死亡证明，我们在他去世后一星期结了婚，随后又在铁路线上的丘多沃住了一个来月，这样亚历山大上班方便，他每周要去医院三四次。

昨天我们才回彼得堡，我这样久没给您回信，是因为玛莎把您的来信放在抽屉里，她完全给忘了。您久久接不到回信，大概瞎猜测了吧。

拥抱您，亲爱的朋友！

您的韦拉·基尔萨诺娃

造成以为洛普霍夫已然自杀的印象。

紧握你的手，我亲爱的。不过至少对我，请你别再说什么恭维话，否则我也要滔滔不绝地倾吐对您的高尚气度的由衷赞美。当然，再也没有比这

做法更叫你厌恶的了。你听我说吧。你只给我写了短短几行，我给你写的也不多，这证明我和你在某种程度上脑筋都没有转过弯来，证明我和你仿佛都有点儿难为情。但是这在我姑且说还可以谅解吧，可你是为什么呢？下一次我希望跟你毫无拘束地谈谈，我要给你写一大堆本地新闻。

你的亚历山大·基尔萨诺夫

三

这些信虽说写得十分恳切，却又像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觉察到的，有几分片面。

两个通信者当然都在对方面前极力减弱已经受到的强烈震撼，啊，这些人真狡猾！我经常从他们那儿，也就是从这些人和类似的人那儿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在他们热烈地下保证时说“这对我根本不算什么，我很轻松”，我就立刻哈哈大笑起来。自然，只有在他们当着我这个局外人下这个保证，并且只有两人交谈的时候，我才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们把这同样的话说给一个有必要听这番话的人时，我却要随声附和说：“这确实是不值一提的事情。”正派人都是些滑稽的人物，我经常嘲笑我所认识的每个正派人。

这些滑稽的人物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就拿这些信来说吧。在我跟这些女士和先生交友的过程中，对于这类事情多少已经看惯了。但是它对一个刚刚涉世纯真无邪的人，比方说，对敏感的男读者，该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敏感的男读者早已从嘴巴里掏出那块餐巾，他摇晃着头说：

“真缺德！”

“好样的！猜得对！”我夸他，“好，来两句这样的妙语，让我高兴高兴。”

“连作者也是个缺德的人，”敏感的男读者说道，“你瞧，他赞成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呀。”

“不，我亲爱的，你错了。在这件事上，我有许多地方不赞成。甚至可能全都不赞成，如果我老实对你说的话。这一切还是弄得太玄乎、太浪漫，现实生活可是要单纯得多。”

“那么你还会更缺德吗？”敏感的男读者惊讶地瞪着两眼问我，他从我身上看出，人类道德沦丧到了何等不可思议的地步。

“还会缺德得多呢。”我说，谁也不知道我是认真的呢，还是在跟敏感的男读者开玩笑。

通信还继续了三四个月，基尔萨诺夫夫妇挺积极，对方却写得很少而且草率，后来索性不再给他们回信了。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只是想要把他第一封长信中记下来的洛普霍夫的想法转告韦拉·巴夫洛夫娜和她丈夫，完成这项任务以后，他便认为继续通信已无必要。基尔萨诺夫有两三次都没接到回信，也就明白其意，不再给他写信了。

四

韦拉·巴夫洛夫娜正在她的软沙发榻上休息，等待着丈夫从医院回家吃午饭。今天她只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会，给午饭添了些甜食，她想尽快躺下休息休息，因为今天上午她干了许多工作，已经筋疲力尽了，长久以来，她天天上午都有干不完的工作，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为她在市区的另一头又开办了一家缝纫工场。洛普霍夫的妻子韦拉·巴夫洛夫娜住在瓦西利岛。做了基尔萨诺夫的妻子以后，韦拉·巴夫洛夫娜却住在谢尔吉耶夫街，因为丈夫的居所必须离维堡区近些。梅察洛娃非常适合于在瓦西利岛的工场工作，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她早就了解工场，工场也熟悉她。韦拉·巴夫洛夫娜回到彼得堡以后，看出自己即使有必要去这家工场，那也只是偶尔过去看看，无需待太长时间，即使她还差不多天天去，那其实也只是因为她和工场两情依依，相互眷恋的缘故。在短期内，她去工场看看或许还不是毫无用处的，梅察洛娃有时总也还需要跟她商量商量。可是那花不了多大工夫，并且这样的事也越来越少了。梅察洛娃很快就会取得足够的经验，根本不再需要韦拉·巴夫洛夫娜了。的确，早在韦拉·巴夫洛夫娜重返彼得堡的初期，她对瓦西利岛的工场来说更像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而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该做些什么事呢？显然该在她的新居附近，在市区的另一头，再来创办一家工场。

于是，在蓄水池街和谢尔吉耶夫街之间的一条胡同里，创办起了一家新工场。办新场可比办老场容易得多了，从老场调来五名女工作为基于人员，她们空出的位置由新人顶替；新场的其余人员是老场裁缝们的好朋友。这就是说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团体中全体成员都熟悉工场的宗旨和秩序，新女工一进场就希望从开始起便能确立第一家工场逐渐才形成的那种体制。啊，现在体制问题比当初进展得快了十倍，而麻烦却少了三分之二。不过毕竟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所以韦拉·巴夫洛夫娜如今仍然像头两天一样劳累，像两个月来一样劳累。她不过也只是累了两个月，虽然从她第二次结婚算起，已经过去了半年多。这没什么，她本来也该给自己放个婚假，而她这段消闲时间也不算短了。现在她可以动手工作了。

是的，今天她足足干了一番，此刻正值休息，并且想到许多的事情，主要想的还是眼前的事：眼前是这样美满和充实，这样生机勃勃，她很少有空闲时间去回忆往事。回忆留待以后的时日吧，留待遥远的将来，甚至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而是还要推后，遥遥无期。现在还不是回忆的时候，很长一段时期也不是回忆的时候。但就是眼下，她还是会偶然地忆起往事来的，例如今天，她便想起了一件在这些难得回忆起来的事情中还能够有时被想起的事。这就是她的回忆：

五

“亲爱的！我跟你一起去！”

“可是你随身没带行装啊。”

“我亲爱的，如果你今天不肯带我一起走，那我明天随后就赶去。”

“你想想，瞧着办吧。等我来信。明天就能寄到。”

于是她返回家。当她跟玛莎乘车回家时，她有什么感觉？从莫斯科站

到中街这条漫长的路上，她怀有伺种心情？产生过何种想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被事情的急转直下震撼住了，他在他房里发现她的短信还不到一昼夜——是的，过两小时才够一昼夜——他便离开了，有多快！多突然！夜间两点钟她还什么都没料到呢，他趁着她由于当天早晨的焦虑不安，正觉得疲惫不堪，因得支撑不住的时候，走进来说了几句话，那简短的几句话不过仅仅是他想说的话的一个含糊不清的开场白而已：“我很久就没见我的老父母亲了，我要去探亲，他们一定高兴。”一说完立即走了。她紧跟他身后跑出去，虽然他进屋里来时她保证过不这样做。她跑出去追他，可他在哪儿呢？“玛莎，他跑哪儿去了，他跑哪儿去了？”这时客人们刚走，玛莎正在收拾茶具，她答道：“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出去了。他从我身旁经过时说：我去散散步。”她该去睡觉了。真奇怪，她怎么睡得着呢？可是她哪里知道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他就要走了。他说过他们还有工夫全面地交流交流想法。可她刚一醒来；便到了上火车站的时候了。是的，这一切只在她眼前一闪而过，仿佛这件事并没发生在她身上，仿佛有人急匆匆地告诉了她这是别人的事似的。只有现在，当从火车站回家以后，她才明白过来，开始思考：现在她发生了什么事，将来又会发生什么事？

对，她要去梁赞。要去，不能不去。但是他的信呢？信里会写些什么？不，干吗要等他来信才作决定？她知道信里会写些什么。可还是应该把决定推迟到他来信再说。为什么推迟？她要去。是的，她要去。她想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足足想了三四个小时。

可是玛莎早饿极了，已经是第三遍叫她吃午饭了。而且这一遍哪里是在叫她，简直更像是在命令她。也好，这可以使她放松放松。她却想：“可怜的玛莎，我把她饿坏了。”于是说：“您用不着等我，玛莎，要不是等我，您早吃完了。”——“这怎么行，韦拉·巴夫洛夫娜？”接着她又想了一两个小时：“我要去。对，明天就去。但是得等他来信，因为他是这样求过我的。不过无论信里写什么——我原也知道信里写什么——无论写什么都没关系，我反正是要去。这件事她来回想了一两个小时。她第一个小时想的是这个，第二个小时还在想这个吗？是的，想的虽然都是这个，可是她还想出了六个字，是这样普普通通的六个字：“他不愿意我去。”这六个极普通的字越来越萦绕在她心中，直到太阳下山，她还在想着原先这事和这六个极普通的字。缠磨人的玛莎又进来请韦拉·巴夫洛夫娜喝茶了，正巧她来之前，从这六个极普通的字中突然派生出另外五个极普通的字：“我也不愿去。”缠磨人的玛莎来得正好！她赶跑了这五个极普通的新字。

但是就连善良的玛莎也不能把这五个普通字永远赶跑。最初那五个字还不敢亲自露面，却送来了一句驳斥自己的话：“可我该去”，目的却只是借驳斥来做掩护，自己好能重新露面：虽然跟驳斥的话同时又出现了最初的那六个极普通的字：“他不愿意我去，”可同一瞬间，六个普通字又转换成了五个普通字：“我也不愿去。”她想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后，这六个普通字和这五个普通字竟开始随意来改换原来的字句、原来最主要的字句，这样“我要去”这三个最主要的字派生为“我要去吗？”四个字，字虽然还是同样的字，意思可是大不相同了。瞧字句是怎样增减和变化的！但是玛莎又来了：“我已经给了他一个卢布，韦拉·巴夫洛夫娜，这儿写着：要是九点以前送到，就给一个卢布，送晚了只给半个。这信是个列车员送来的，韦拉·巴夫洛夫娜，是乘夜车来的。

他说他许诺人家就要做到，为了速度快，他还雇了一辆马车。他的信！果然不错！她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不要来，”可她还是要去，她不愿听从信里说的，她不听他的话，她还是要去，要去。不，信里写的不是那个。这就是信里说的，她不能不听从：“我去梁赞，但不是直接去。我还有许多厂务事要在路上办。我必须在莫斯科逗留一周左右，处理一大堆事务，此外，在到莫斯科以前，我要去两个城市，去过莫斯科以后还有三个地方得去，然后才能去梁赞。在什么地方待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这都无从确定，我只说一个原因你就明白了：除了其他的事务外，我还要向我们的商务代办处收款。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的确，信里就这么写的：“我亲爱的朋友”，写了好几遍，这让我看出来，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地喜欢我，他对我没有丝毫的不满意，韦拉·巴夫洛夫娜回忆道：“当时我还吻过“我亲爱的朋友”这几个字呢——的确，信里这么写的：“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为了收款，你原来预计只逗留几个小时的地方，常常不得不等上好几天。因此我根本不能知道何时到达梁赞，不过大概不会很快。”她几乎把信里的一字一句都记住了。他这是怎么回事？是的，他是要叫她根本无法抓住他，不能留在他身边。她现在怎么办呢？原来那句话“可我该去他那儿”变成了“我还是不该跟他见面”，这后一个“他”已然不是她头一句里所想的那个人了。这句话代替了原来所有的话，她把它想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还是不该跟他见面。”但不知这句话何时起了变化，怎么起的变化，突然变成：“难道我想跟他见面？——不。”当她快要睡着的时候，却又变成了“难道我还能跟他见面？”可是答案跑哪儿去了？答案什么时候找不到了？后来这句话几乎就要变成“难道我不能跟他见面？”而且果然变成了这句话。等她黎明入睡时，她就伴着“难道我不能跟他见面？”这句话进了梦乡。

指基尔萨诺夫。

她早晨醒得挺晚，原先所有的字句都没影了，只剩下“不见面”跟“见面”两句话在互相较量着，这样一直较量了整个上午。在这场较量中，一切都被遗忘了，都被遗忘了，那“见面”二字总是想把极普通的“不”字留在自己身边，于是揪着它，拽着它，结果就成为了“不见面”。而极普通的“不”字却总是在躲避，逃跑，总是在躲避，逃跑，这样就又成为了“见面”。“见面”这个有分量的字竭力把极普通的“不”字留在自己身边，在这场不懈的努力中一切都被遗忘了，都被遗忘了，“见面”果真留住了“不”字，还又叫了个“不”字来帮忙，使原先的“不”字无处可躲：“不，不见面，”……“不，不见面。”是的，现在这“不”字和“见面”两个字把那个狡猾易变的“不”字紧紧地夹在中间了，它无处可溜，被挤在二者之间：“不，不见面，”“不，不见面，”……“不，不见面。”但是她却在做什么呢？——她戴上了帽子，本能地往镜子里瞧了一眼，看看头发是否服帖整齐。不错，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已经戴上了帽子，那本来牢牢地长在一起的四个字当中只剩了一个“不”字，但又添了“回头”这两个字：“不回头”。

不回头，不回头。“玛莎，您别等我吃午饭，我今天不在家吃。”

不再回到洛普霍夫身边。

“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还没从医院回来，”斯捷潘平静地说。也难怪他那么平静漠然地对她说话，她来这里本没什么特别的：从前，还在不久以前，她常来常往，不是稀客。“这我早料到了，不要紧，我坐一会儿，您别告诉他我来了。”她拿起一本杂志。

是的，她还能读进去，她知道她能读进去。既然“不回头”，既然主意已定，她就心平如镜了。当然，她只读了一点，可以说根本没读，她倒是把房间环视了一下，然后就像一个主妇似地收拾起房间来。当然，她只是略微地收拾了一下，可以说根本算不上收拾，不过她却多么平静啊：她能够阅读，也能够干事情。她发现烟灰缸里的烟灰还没倒，呢绒桌布需要铺铺好，这张椅子离开了原来摆放的位置。她坐在那儿想道：“不回头，无可选择。新的生活开始啦。”她想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新的生活开始啦。他会多么惊喜，多么幸福啊。新的生活开始啦。我们真幸福。”门铃响了，她的脸微微红了，露出笑容。脚步声响，房门开了。“韦拉·巴夫洛夫娜！”他站不住了，是的，站不住了，他抓住门上的把手。可是她已经跑到他的身边，拥抱他：“我亲爱的，我亲爱的！”

他真是高尚！我真是爱你！没有你，我不能生活！”后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是怎样穿过那个房间的？她不记得，她只记得她跑到他的身边，吻了他，但他们是怎样穿过房间的，她不记得，他也不记得。他们只记得他们绕过扶手椅和桌子以后的情形，至于他们又是如何离开房门口的……是啊，这一吻吻得他俩有好几秒钟头晕目眩，天昏地转，“韦罗奇卡，我的天使！”——“我的朋友，没有你，我不能生活。你爱了我那样久，却一直藏在心中！你真是高尚！他真是高尚，萨沙！”——“告诉我，韦罗奇卡，这是怎么回事？”——“我对他说，我没有你不能活。第二天，就是昨天，他就走了。我本想追他去，昨天一天我都打算追他去，但是现在，你看，我却已经在这儿坐了这么久啦。”——“这两个星期你可瘦多啦，韦罗奇卡，你的手好苍白！”他吻着她的手。——“是的，我亲爱的，这是一场艰苦的较量！现在我只能估量出来，为了不扰乱我的安宁，你经受了多少痛苦！你怎么能有那样大的自制力，使我竟然一点也看不出呢？你一定饱尝了许多痛苦！”——“是的，韦罗奇卡，这不容易。”他一直在吻她的手，一直在瞧着这双手，突然间，她哈哈大笑道：“啊哈，我对你真是不关心！你不是累了吗，萨沙，也饿了呢！”她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跑掉了。“你上哪儿，韦罗奇卡？”但她没有回答，径直跑进厨房里，急促快活地对斯捷潘说：“快点儿开饭，要两份，快！盘子什么的都在哪儿？让我拿去摆桌子，您端吃的。亚历山大在医院累坏了，得快点儿给他开饭。”她捧来一摞盘子，盘里放着的刀、叉和勺子叮叮当当碰得直响。“哈哈，我亲爱的！”

一对恋人初次会面的首要事情，就是赶快吃饭！哈哈！”他也笑了，他帮她摆桌子，帮忙不少，可是添乱更多，因为他不停地吻她的手。“唉，韦罗奇卡，这双手好苍白！”还是不停地吻着。他们相互笑着亲吻。“好啦，萨沙，规规矩矩坐下吃饭吧！”斯捷潘端上汤来。吃饭的时候，她给他讲了事情的原委。“哈哈，我亲爱的，你看我们这对恋人多能吃！真的，我昨天一点东西也没吃。”斯捷潘进来上最后一道菜。“斯捷潘！由于我您恐怕没饭吃了吧？”——“不错，韦拉·巴夫洛夫娜，我得再上小铺买点儿什么。”——“没关系，斯捷潘，往后您就知道了，除您自己的一份，还得再准备两份。萨沙，你的雪茄盒子在哪儿？给我。”她亲自为他切雪茄，亲自点上了。“抽吧，我亲爱的，我趁你抽雪茄的时候去煮咖啡，也许您想喝茶吧？不，我亲爱的，我们的伙食应当改善，你和斯捷潘对伙食也太不注意了。”过了五分钟，她就回来了，斯捷潘紧随着送来茶具，但她回来时看见亚历山大的雪茄已经熄灭。“哈哈，我亲爱的，我出去的时候，你一定又想入非非了！”

他也笑了。“抽吧！”她又替他点上了雪茄。

韦拉·巴夫洛夫娜到今天一想起这一切还不免要发笑：“我们的爱情故事真不浪漫！”

初次会面的情景：先喝汤，再接吻，这初吻吻得头直晕，然后又饱餐一顿；这就是恋爱场面！真可笑极了！是的，当时他的眼睛亮闪闪！其实现在也同样明亮。他掉了多少眼泪在我的手上啊，那时这双手是多么苍白啊——现在自然不苍白了。我的手确实好看，他说的是真话。”于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又看了看她的双手，把手放到了膝盖上，膝盖的轮廓在薄薄的大罩衫下面清晰地显露了出来。她又想到：“他说的是真话。”然后微笑着，一只手慢慢挪动到胸口，紧贴在胸前，韦拉心里想：“他说的是真话。”

“嗨，我为什么想起这个，我这是干什么呢？”韦拉·巴夫洛夫娜想着想着笑了起来，“仿佛那手跟这些回忆有什么联系似的！不，这初次会面非常独特：又是吃饭，又是吻手，我俩笑着，他还为我苍白的手掉泪。我坐下倒茶：‘斯捷潘，你们没有奶油吗？在什么地方能买到好奶油？不，现在没工夫去买，也未必买得到。算了吧，明天我们再去办。抽烟呀，我亲爱的，你总是忘了抽烟。’”

茶还没有喝完，便响起一阵急促的门铃声，跑进来了两名大学生，他们匆忙间甚至竟没有看见她。“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一个疑难病人！”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刚送来，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并发症。”天知道他们用了个什么拉丁文术语来说明那人的病症。“太特别了，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需要紧急抢救，时间宝贵，我们还是坐马车赶来的。”——“快点儿，我亲爱的，快去！”她说。这时两名大学生才注意到她，向她点头致意，随即把他们的教授领走了。动身前他准备得很仓促，他身上还穿着制服呢，何况她直催他。“你从医院上我那儿去吗？”分别的时候她问。——“去。”晚上她等了很久，到十点钟他还没来，直到十一点，已经不必再等下去了。这可是怎么回事呢？她当然丝毫不担心，他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不过就是说他被那疑难病患者耽搁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可怜的病人怎么样了？现在他还活着吗？萨沙把他救过来了吗？是的，萨沙给耽搁得太久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他才来，四点钟之前他一直待在医院：“这个病例真是种疑难病，韦罗奇卡。”“救过来了吗？”——“嗯。”——“你怎么起得这么早？”——“我没睡。”——“没睡？你怕来晚了就彻夜不眠！荒唐！快回家去，一定要睡到吃午饭才行，希望见到你的时候，你还在酣睡。”他只待了两分钟，就给赶跑了。

这便是他们头两次会面的情形。但第二次吃午饭时已经很正常，他们已然能够有条有理地互诉个人经历，可是昨天，真不知道他们都讲了些什么。现在他们时而相视而笑，时而默默沉思，时而互相心疼，他俩都觉得对方忍受的痛苦更大……过了一个半星期，他们在石岛租下一座不大的别墅，就搬过去住了。

韦拉·巴夫洛夫娜并不常常回忆她这次的浪漫史。是啊，目前是如此沸腾的生活，她很少有工夫去回忆。可是当她回忆过去的时候，她会偶然感到一种不满。最初确实只是偶然地，后来却越来越经常，每一次回忆都如此。最初的不满还是微弱的、短暂的，而且模糊不清的：对谁不满？对什么不满？现在她才渐渐清楚起来，原来是对自己不满。

为了什么？于是她又看出这不满来源于她性格上的一个特点：她很自尊。但她只是对过去的自己不满意吗？最初是这样，后来又发觉她对现在的自己也很不满意。当这种不满情绪的性质逐渐弄清楚时，才发现这性质有多么奇怪：仿佛这并非她韦拉·巴夫洛夫娜·基尔萨诺娃个人感到不满，而是千百万人的不满在她身上反映出来，仿佛不是她个人对自己不满，而是千百万人对他们自己不满，只是通过她表现出来而已。这千百万人又是谁呢？为什么他们对自己不满？如果她还像从前似的多半时间都是独自待着，独自思索，这一点大概就不会如此迅速地明朗化。现在她却经常跟丈夫一块待着，他们总是一同思索，她的全部思绪都掺和着他，这大大有助于她弄清自己的这种情绪，至于他自己简直根本无法来破译这个谜：连她都感到这种情绪来得莫名其妙。他自然更加感到糊涂。

他甚至难以理解，怎么能产生出这种不满情绪来呢？它丝毫无损于个人的安乐，就是与她个人也毫不相干。他觉得这是件怪事，比起她来，这事对他来说更是百倍地费解。不过她经常想着丈夫，经常跟他待在一起，看着他，和他一同思索，这对她毕竟是很有帮助的。她逐渐发觉，她的不满情绪总是伴随着“比较”而产生，她不满是由于她总把自己和丈夫做比较，于是她的头脑中闪过这样一句话：“差距，使人感到屈辱的差距！”她现在才终于明白了。

七

“萨沙，这个 NN 真好（韦拉·巴夫洛夫娜说出一个军官的姓来，她曾在自己的那个噩梦中想通过此人的关系去结识汤贝利克），他给我送来一首新诗，这首诗近日还不能发表，”韦拉·巴夫洛夫娜吃午饭的时候说，“我们一吃完饭立刻就开始来念它，好吗？我总是在等着你，恨不得干什么跟你在一块，萨沙。我早就想要朗诵了。”

“这是一首什么诗？”

“你这就能听到了。让我们来看看，他这首东西写得成功不成功。NN 说，他——我是说作者——自己还算满意。”

于是他们在她屋里坐了下来，她开始念道：

哎，小货箱儿满上满，
又有花布，又有锦缎。
我的小情人呀，你可怜可怜，
可怜我小伙儿这双肩！

“现在我可以看出来，”基尔萨诺夫听了几十行以后，说道：“他这首诗虽然采用了崭新的风格。不过仍旧能看出这是他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对吧？”

谢谢你总是等着我。”

指涅克拉索夫的《货郎》。此诗发表于一八六一年。译文摘自《涅克拉索夫文集》第三卷（魏荒弩译）

“当然要谢我啦！”韦拉·巴夫洛夫娜说。他们把这首不算长的诗念了两遍，由于他们认识作者的一个熟人，这首诗在发表以前三年左右就传到了他们手中。

“你可知道哪几行诗对我影响最大？”韦拉·巴夫洛夫娜和丈夫又反复地念了诗中的某些章节，然后说道，“这几行虽不属于诗中的主要章节，却特别地吸引我的注意。

当卡佳等待未婚夫归来的时候，她愁闷不已：

要是有时间独自悲哀，
这难以抚慰的姑娘早该愁坏，
而农忙时节，急如星火，——
一时间得干十件活。
尽管姑娘愁得慌，
干起活来顶顽强，
青草在镰下纷纷落，
黑麦在镰下闪金光。
大清早上场去脱粒，
浑身的力气全使上，
大傍黑她把亚麻铺，
铺在露水滢滢的草地上。

“这几行诗在故事情节中不算是主要的部分，只不过是一段开场白而已，主要的部分是这个可爱的卡佳幻想着自己跟凡尼亚在一块生活。可我的思绪恰恰也是集中在这几行诗上。”

“不错，这个画面是全诗描写得最好的画面之一，但是这几行诗在诗中不占据最显著的位置。可见它一定是跟你最热衷的思想完全一致。你的想法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萨沙。我和你常常说，女子的机体未必不如男子，因此，当强权统治结束以后，女子在智力活动方面恐怕会把男子挤到次要地位上去。我俩从对生活的观察中得出了这个十分可能的结论。在生活中碰见的天资聪颖的女子要多于聪明男子，我俩都是这样看的。你还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各种细节证实了这个结论。”

“你说的话对男子是怎样的一种侮辱啊，韦罗奇卡，其实这主要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我为这感到屈辱。好在你我预言的那个时代还遥遥无期，不然的话，为了避免退居次要的地位，我就要彻底放弃自己的见解了。不过，韦罗奇卡，这本来只是个具有可能性的结论，科学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正面肯定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亲爱的。我们也说过，为什么直到今天历史事实还是与这个结论相矛盾，尽管根据对人们的私生活和身体构造的观察，这个结论是极可能成立的。女子所以至今在智力活动中起着如此微不足道的作用，那是因为强权统治剥夺了她们提高修养的可能性，也使她们丧失了渴求修养的动力。这个解释已足够了。可是还有一个同样的情况：论体力强弱女子远远不如男子，但是她们的身体却更强健，对吗？”

“这种说法比起那个天生的智力高低问题无可辩驳多了。对，女子的身体能够更坚强地抵御物质破坏力——气候、天气、劣质的饮食。医学和生理学还很少对这点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但是统计学早已概括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普遍适用的答案：女子的平均寿命长于男子。由此可见女子的身体更强健。”

“要是估计到女子的生活方式一般比男子对健康还要有害得多，这一点就看得越发分明了。”

“生理学提出一个更为有力的判断，使这个结论更加明显了。女子达到成年年龄比男子略微早些。假定说女子到二十岁发育成熟，那么男子却要到二十五岁——按照我国的气候条件和我们的民族情况来看，大致是这样。又假定说女子中能活到七十岁的和男子中能活到六十五岁的，其百分比大致相等。如果我们考虑到男女发育有早有晚，那么女子在身体强健程度上所占的优势，比统计学家推测的更要明显得多，统计学家没估计到发育成熟有早有晚。七十岁是二十岁的三倍半。六十五岁需要用二十五岁来除，结果是多少呢？商数是二点五略多一些，对了，是二又十分之六。可见，女子活自己的三个半成年期，同男子差不多只活自己的两个半成年期那么容易。男女身体的强健程度用这个比例就可以测量出来。”

“其实这个差别比我在书本上读到的还大。”

“是的，不过我只是举例说说，凭着记忆引用了几个整数。但结论的性质还是跟我说的相同。统计学已经表明女子的身体更强健，你读到的仅仅是从寿命统计表上得出的结论。如果在统计学的事实上面，再加上生理学的事实，那差别还要大得多。”

“对，萨沙。你看看我曾经想过的，现在我觉得更加清楚了。我想过：既然女子的身体能更为坚强地经受住物质的破坏作用，那么女子也就非常可能更为容易、更为坚强地承受精神上的震动，而我们实际看到的却不是这样。”

“不错，这很有可能。当然目前这也只是一个假设，人们还没有进行研究，专门的事例也还没有搜集。但你的结论几乎是从不容辩驳的事实中得出来的，所以的确叫人难以怀疑。身体的强健和神经的坚强是密切相关的。女子的神经大概更富于弹性，有着更为坚固的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应该更为容易、更为坚强地承受住各种震动和痛苦的感情。可实际上我们却看到了许许多多相反的例子。男子容易忍受的事，女子却常常为之苦恼不堪。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看到的现象跟我们从身体构造本身所应当得出的结论相矛盾，这原因人们还没有好好研究过。但有一个原因是明显可见的，它甚至贯穿于全部历史现象和我们当今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那便是偏见的作用、不良的习惯、虚幻的希望，虚幻的恐惧。假如一个人尽想着‘我不行’，那他果然就不行了。”

人们对妇女反复说：‘你们真弱，’于是她们也就感到自己很弱，并且果然变得很弱了。

你知道这样的例子：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只因为老想着‘我一定会日渐衰弱而死掉’因之就会变得极度衰弱，不久果然死了。还有些例子牵涉到的是广大群众、各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战争史便是最好的例证之一。中世纪的时候，步兵总以为自己无力对抗骑兵，于是它果然就对抗不了骑兵了。整军整军的步兵像一群绵羊似的，仅仅遇上几百名骑兵，就被赶得四处逃窜，

这情形一直继续到英国步兵登上欧洲大陆为止。英国步兵个个都是傲气十足、有独立精神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可没有那种恐惧心理，他们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习惯不战而退，他们心中毫无偏见，从不认为见着骑兵就该逃跑。这批人来到法国，每次交锋，都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就连数量占绝对优势的骑兵也不例外。你知道，法国骑兵军在克勒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的著名战役中，都是被英国步兵击败的。当瑞士步兵想到他们完全不必认为自己弱于封建骑兵的时候，同样的历史又重演了。奥地利骑兵和人数更多的勃艮第骑兵先后跟他们交锋，每一次都吃了败仗。后来所有其他的骑兵试着跟他们较量过，也常常被击败。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步兵比骑兵要强’；当然要强。可是足足有好几个世纪，步兵比起骑兵来要弱得多，唯一的原因就是自甘示弱。”

此处所提的是英法“百年战争”（一三三七—一四五三）中的几个重要战役。这些战役均以法国骑兵军败北告终。

勃艮第今属法国。

“是啊，萨沙，这是实话。我们弱是由于我们自甘示弱。不过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要说说我自己和你。你说，我亲爱的，你没有跟我见面的那两个星期，我真的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吗？当时你太激动了。也许我的变化并不像你所感觉的那么大，也许我的变化的确很厉害，你现在回想起来怎么样？”

“是的，当时你的确瘦了，还很苍白。”

“你看，我亲爱的，现在我才明白，正是这一点伤了我的自尊心。既然你热烈地爱着我，可为什么这场斗争却没有在你身上表现出同样明显的症状？在你跟我断绝往来的那几个月里，谁也没有看见你变得苍白和消瘦。你怎么能这样轻而易举地挺住了呢？”

“这我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对卡佳借干活来排遣烦闷的诗句那么有兴趣。你想知道我是否自身体验到了那段话的真确性？是的，那完全符合真实。我相当轻易地经受了斗争，是因为我没有工夫多去理会它，当我把注意力转向它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痛苦。

但是日常工作逼得我大部分时间不能去想这些。我得照看病人，准备课程，这时我不由自主地从思念中解脱了出来。在那空闲较多的少数日子里，我可感到力不从心了。我觉得，如果放任自己随心所欲地遐想，只消一个星期我就会发疯了。”

“对，我亲爱的。我最近才明白，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别的全部秘密。人必须有一项舍弃不了、搁置不下的事业，才能够变得无比坚强。”

“可是你当时不是有许多事儿，现在也照样有吗？”

“唉，萨沙，难道这是离不开的事儿吗？我愿意干的时候才干，愿意于多少就于多少。头脑一热，我可以削减掉很多，或者干脆丢开不管。如果心烦意乱的时候去干，我就得在意志上付出特别的努力，强制自己去干。没有一种‘此事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

比方说，我做家务活，花了很多时间，但这段时间有十分之九是我自愿花费的。假如有个好女仆，我自己不用怎么干，事情差不多也会照样做好的，难道不是吗？我花费大量时间干的结果比我花费少量时间干的结果好不了多少，那么谁还需要我那么干呢？谁也不需要，只是出于我的自觉自愿。心绪平静时我才来干这些事，心烦意乱时，就扔下不管了，反正不管也过得

去。人总是为了重要的东西而扔下次要的。可是当感情非常激动的时候，便也顾不了这类事情。我在教书，这倒是多少比较重要些的事：我总不能任意地丢下不教呀。不过这还不是那么回事。我想认真教就认真教，即使教课时思想不大集中，课也坏不到哪儿去，因为教这种功课太容易了，它不能使我的心思全部投入。再说，难道我真是以教书为生的吗？难道我的地位取决于教书吗？难道维持我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教书吗？不，我的经济来源是靠德米特里的工作，现在是靠你的工作。

教书使我的独立感得到了满足，而且确实也不无益处。但它对我来说毕竟不是切身需要的。于是，为了试着赶走那些折磨我的思念，我就比平时更多地去照管工场。可我这样做也还只是凭着我的意志力。我本来知道我只需要在工场待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如果我继续待下去，我就只能来承担一些人为了给我安排的活计，这些活计虽然也有益处，对事业却毫无必要。再说这事业本身吧，难道对我这类平常人来说，它可以成为重要的支柱吗？至于拉赫梅托夫他们，可又是另一类型的人了。他们已经跟共同的事业融合为一，事业对他们来说是贯穿于全部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事业甚至取代了他们的个人生活。而我们，萨沙，却达不到这种境界。我们不是像他那样的精英，个人生活才是我们必不可少的。难道办工场是我的个人生活吗？这个事业不是我的事业，是别人的。我干这件事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或许也是为我的信念吧。不过，当一个人——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是精英——在自己很痛苦的时候，难道还能顾得上别人？当一个人经受着感情折磨的时候，难道还会关心信念？不，我需要的是一项个人的事业，一项必不可少的、能托付我自己生命的事业，一项切身的，用来维系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经济来源、我的整个社会地位、与我的整个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业，它比我所迷恋的一切情欲都更重要：惟有这样的事业才能成为我跟情欲斗争时的支柱，惟有它才不会被情欲从生活中挤掉，却反而能够克制情欲，惟有它才能给我力量和安宁，我希望有这样一项事业。”

“好，我的朋友，说得好，”基尔萨诺夫一边热情地说着，一边吻着他那兴奋得两眼闪闪发光的妻子，“是的，我至今都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虽然这道理是那么简单。我没有注意到！不错，韦罗奇卡，任何别的人都不能为我们自己着想。谁要是希望自己好，他就得自己为自己着想，自己关心自己，其他任何人都是代替不了的。如果你自己不讲明白，就是像我这样爱你的人也不了解你！可是，”他一边笑着继续说，一边还吻着他的妻子，“为什么你现在认为需要有一项事业？难道你打算爱别人了吗，韦罗奇卡？”

韦罗奇卡哈哈大笑，他俩笑得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的，现在我俩都能对此有同感了，”她终于开始说，“我现在也可以像你一样确切地知道，无论你，无论我，都不可能再发生类似的事了。但是，不开玩笑了，你知道我现在有什么想法吗？我亲爱的：如果说我过去爱德米特里，那还不是一个成熟女性的爱，那么他爱我也不是像你我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爱’，他对我的感情是这样一种混合物，一方面有着对朋友的热烈的眷恋，另一方面有着对女人的情欲的冲动。他对我怀着友情，这份感情只是给与我的；而情欲的冲动所寻求的却只是女人，至于是不是我这个女人，那却关系不大。不，这不是爱情。难道他经常想着我吗？不，他的心中没有我。是的，他对我也像我对他一样，其实没有真正的爱情。”

“你说这话对他不公正，韦罗奇卡。”

“不，萨沙，这是实话。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恭维他毫无意义，我俩都知道我们对他评价有多么高。无论他怎样一再声称：他轻松地度过了那段日子，其实他并不轻松啊。”

你大概也可以说，你跟自己的情欲作斗争那会儿也挺轻松，这都非常好，而且也不是假装的；可是对于这些坚决的保证不应该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啊，我的朋友，我了解你饱尝了多少痛苦……我深知这点……”

“韦罗奇卡，你把我搂得出不来气啦。你显示了你的感情力量以后，还想显示自己的体力，对吗？是啊，你力气很大，有这样的胸脯，哪能没有力气呢……”

“我亲爱的萨沙啊！”

八

“萨沙，你没让我把事情说完，”约莫过了两个来钟头，他们坐下喝茶的时候，韦拉·巴夫洛夫娜开口说道。

“我没有让你说完？赖我吗？”

“当然赖你。”

“是谁先胡闹的？”

“你这样说不害羞吗？”

“怎样说？”

“说我先胡闹的呀。哼，你自己冷淡漠然，却反倒责怪我做妻子的不庄重。”

“是吗？我还以为你要讲平等呢，如果讲平等，也应表现在主动性方面。”

“哈哈！真会咬文嚼字！可是你居然怪我言行不一吗？难道我在主动性方面不是力求能跟你讲平等吗？好，萨沙，现在我就采取主动来继续上一次的严肃谈话，我们都把它忘了。”

“你采取主动吧，我可拒绝听你的，我现在倒要采取主动把它彻底忘掉呢。把手伸过来。”

“萨沙，总得把话说完呀。”

“明天再说也来得及。你要知道，现在我就想仔细瞧瞧你这只手，真是想极了。”

九

“萨沙，我们把昨天没有谈完的话谈完吧。这是必须谈的，因为我打算跟你一块去医院，你总得知道我为什么去啊。”第二天早上，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跟我一块？你跟我一块去？”

“当然。你问过我，萨沙，为什么我需要一项真正能托付自己生命的事业，我珍视它正如你珍视自己的事业一样，它像你的事业一样叫人离不开，

而且一样地要求全身心的投入。我亲爱的，我需要这样的事业，因为我很自尊。长久以来，只要回忆起当时那场感情斗争在我身上影响那么明显、以至于我忍受不了的情形，我就觉得羞愧难熬。你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怨斗争太艰苦——你的斗争对你来说不是也一样不轻松吗——斗争的艰苦程度是由感情强烈程度决定的，我现在并不抱怨斗争太艰苦，因为这等于是抱怨感情太强烈。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拥有一根坚实的精神支柱，能以此来对付这强烈的感情呢？我希望拥有一根同样的支柱。不过这件事只是引起了我的这个想法，真正的要求当然还是我现在要说的。这就是：我希望在各方面都跟你平等；这是主要的。我给自己找到了一项事业。昨天跟你分手以后，我考虑了好久，这件事还是昨天早上我突然想到的，当时你不在家。昨天我就想跟你这个好人商量商量，我以为你靠得住，你却辜负了我的信赖。现在来商量着实太晚了，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是的，萨沙，今后我必定会给你增添许许多多的麻烦。我亲爱的，如果我看到自己有能力担当这项事业，我们将是多么高兴啊！”

不错，现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给自己找到了一项事业，这是她以前无法想象的。她的亚历山大的手经常放在她的手中，因此她行走起来挺轻松。洛普霍夫只是丝毫不限制她的自由，好像她对他那样。不，不止如此，当然远不止如此。她一向深信不疑，无论她遇到什么情况，需要依傍他的手时，他的手，连同他的头，都会归她支配的。但他只会手脑并用，他可以不惜为她献出头颅，就像他可以不辞辛劳地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一样。

换句话说，只有碰到重大事件或紧急关头，他的手才准备帮助她，跟基尔萨诺夫的手一样，而且同样靠得住。他的结婚十分有力地证明了这点，当时他为她牺牲了自己对科学事业怀抱着的全部珍爱的理想，甚至不怕有饿死的危险。是的，一遇到重大的事情，他的手就伸过来了。而平时，这只手却离她老远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开办了工场，假如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协助，他欣然来相助。可是为什么他几乎没为她做过什么事？他只是不妨碍她，赞许她，心中为她高兴罢了。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会，她又有她自己的。现在却不同。基尔萨诺夫不等她要求，便投入了她从事的一切活动。他像她本人似的关心她的全部日常生活，她也关心他的全部生活。这已经完全不是她跟第一个丈夫之间的那种关系，因此，她才感到自己充满了新的活力，因此，过去她仅只在理论上熟悉、实质上并未触动她的内心生活的那些思想（无法办到的事情，人是不会认真去思考的），这时才开始真正在她心中显现，对她来说才有了实际的需要。

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才开始真切地感觉到，并且成为了她的工作动机的，就是下面种种思想：

十

“公民生活的条条道路，几乎都是正式对我们封闭了的。甚至在那些没有给我们正式设置障碍的社会活动的道路上，实际上也有很多——几乎是全部——是不对我们开放的。在生活的广阔的天地中却只留给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隅之地，我们只能挤在家里，做其中的一员。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事什么职

业呢？差不多只有一项是面向我们的——当家庭教师；也许还可以教教男子们不屑于从我们手中夺取的什么家馆。我们都在这唯一的一条路上，我们互相妨碍，因为我们太密集了。走上这条路也不可能使我们获得独立，因为愿意提供这方面服务的妇女太多了。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谁看来都是无所谓的，说来说去，还是我们人数太多。谁会重视一个家庭教师呢？只要您说一句您想聘位家庭教师，马上就会聚拢过来几十名、几百名妇女，互相争抢这个位置。

教家馆的教师只到学生家上课，课毕即离去。家庭教师则必须住在学生家中。

“不，当妇女还不曾致力于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道路之时，她们不会获得独立。当然，开拓一条新路谈何容易，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占据了一个特别有利的地位。不好好利用它，我于心有愧。我们缺乏准备去从事重要的职业。我也不知道为了做好准备，我将对一位指导者需要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知道，无论我需要他的经常帮助到什么程度，他总是在这儿，跟我在一起。并且这对他不是一种负担，他跟我会同样地感到愉快。

“独立活动的道路没有被法律给我们封闭掉，却被习惯封闭了。但是仅只被习惯所封闭的各条道路，我却可以走我愿走的任何一条，只要我下决心顶住最初起来抵抗的习惯势力。其中有一条道路比别的任何道路都要离我近得多。我的丈夫是医生，他把他的全部空闲时间都奉献给了我。我有这样一个丈夫，很容易来试一试我能否当个医生。

“假如终于出现了一批女医生，那可事关重大。她们对于全体妇女将大有种益。妇女跟妇女说话比跟男人说话方便得多。到那时可以避免多少痛苦，死亡和不幸！我一定要试一试。”

十一

韦拉·巴夫洛夫娜跟丈夫谈完话，便戴上帽子，和他一起到医院去考验自己的神经，看她怕不怕见血，能不能从事解剖。凭着基尔萨诺夫在医院的地位，她做这种测验当然不会遇到什么障碍。

我已经大大地毁坏了韦拉·巴夫洛夫娜的诗意形象，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于心不安。

譬如说，我并不隐讳：她天天吃午饭，而且总是吃得喷喷香，此外每天还喝两次茶。可现在我写到这样一个情节，尽管我的思想非常下流鄙俗，还是有一种畏惧情绪袭上心头，“对此事缄默不提岂不更好？人家对于一个有本领研究医学的女性会怎样来看？她的神经该是多么粗劣，她的心肠该有多么冷酷！这不是女人，简直是屠夫！不过，一想到我本来无意于把我的人物们塑造成完美无瑕的理想化的楷模，我便心安理得了：人家说韦拉·巴夫洛夫娜性格粗野，愿意说就让他们说去吧，粗野就粗野呗，碍我什么事？

因此我冷静地说：她发现，对事情袖手旁观和为自己与别人的利益而积极去干的事情，结果会大不相同。

我记得，当我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火灾的不满十二岁的孩子时，有一天被异常强大的火警警报声吵醒，我真是害怕死了。火光冲天，一片红彤彤。

烧焦的木头满城横飞——一个外省的大城市——城里到处都是可怕的喧哗声、奔跑声和呼叫声。我浑身战栗，好似在发寒热病。亏得我趁着全家忙乱之际，及时赶到了火场。火灾发生在堤岸沿线（其实只是天然的河岸，哪里算得上什么堤岸呢？）。岸上摆放着劈柴和树皮制品。一群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正在分头把这些东西搬开，运往远离着失火房屋的地方去。我也动手搬起来，结果恐惧心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干得挺带劲，直到有人对我们说“好啦！”

危险过去了”的时候才罢手。从此我就知道，如果大火使你害怕，你就应该立即奔赴火场去工作，那么你就一点也不害怕了。

工作着的人既没有工夫害怕，也没有工夫感到厌恶。

于是韦拉·巴夫洛夫娜研究起医学来了，她是我所知道的最早投身于我国这项新兴事业的妇女之一。此后她俨然以另外一个人自居了。她曾有一个想法：“过几年我才真正能够自立。”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没有完全的独立就没有完全的幸福。可怜的妇女，你们当中享有完全幸福的人为数不多啊！

十二

韦拉·巴夫洛夫娜和基尔萨诺夫结婚已经一年。再过一两年她的生活还是像结婚一年后的现在，像刚结婚的那一年。假如不发生什么特别情况，再过多年也依然如故。谁知道将来怎样呢？可是当我写到此为止，并没有发生这类特殊情况，所以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生活仍旧跟当初、跟她和基尔萨诺夫结婚后的头一两年一模一样。

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突发奇想要研究医学，并自认为能够研究这件使她声名狼藉的事发生以后，我讲什么都不为难了，因为其余的事再也不会像这件事那样把她在读者心目中大大地贬低了。因此我应该说，韦拉·巴夫洛夫娜住在谢尔吉耶夫街，还像她从前住在瓦西利岛一样每日三餐：早茶、午饭和晚茶。不错，她还保留着这些缺乏诗意的习性，天天吃午饭，喝两次茶，而且视之为一大乐趣。总之，她保留了自己的全部缺乏诗意、不够风雅和格调不高的习性。

还有许多别的、在从前那个平静的时期形成的习性，仍然保留到了目前这个新的平静的时期。房间还是分成中立的和非中立的两种，未经许可互相不得进入非中立房间的规矩也保留了下来。保留下来的规矩还有：假如对方对提出来的问题回答是“不许问”，那就不能再问了；这样的回答使你完全无心再去想你所提的问题，而把它忘却了，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仍然相信，如果值得回答，那么无需提问，对方老早就都告诉你了，要是人家缄默不语，便表示这件事一定毫无意思。这些习性都是从前那个平静时期养成的，到了新的平静时期仍旧保留了下来。不过在目前的新的平静时期，这一切发生了些微的变化，或者也可以说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是毕竟跟从前不完全一样了，生活更是全然不同了。

譬如，中立房间和非中立房间还划分得挺严格，但是他们又严格地规定了每天在一定的时间才可以进入非中立房间，因为三餐中有两餐是搬到非

中立房间去吃的。业已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早茶在她房里喝，晚茶在他房里喝。用晚茶无需什么特别的程序，仆人——还是那个斯捷潘——只要把茶饮和茶具送进亚历山大的房里就算大功告成。早茶却有着独特的方式：斯捷潘先把茶炊和茶具搁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卧室旁的中立房间的桌子上，再对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说一声“茶炊端来啦！”——如果看到了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在他的书房里的话。如果碰不见他呢？那么斯捷潘就用不着提醒了，什么时候该喝茶，他们自己也会想起来的。于是他们又照这个惯例定下一条规矩：早晨韦拉·巴夫洛夫娜等着丈夫来，丈夫不用询问是否许可，因为这时她不能缺少萨沙，等我说出她起床的情形，任何人都都能明白其原因了。

她醒来以后总要赖在自己暖和的小床上懒懒地躺一躺，她懒得起床，时而想事，时而不想，像是打盹，又不是打盹。如果想事，就是在想那些正巧与这一大或这些天有关的事，关于家务、工场、熟人、关于如何安排这一天的计划，这当然不是打盹了。此外还有两个题目，婚后三年左右有了第三个题目——这就是她手里的孩子米佳，她给他起名叫“米佳”，当然是为了怀念好友德米特里。其他两个题目，一个是能使她在生活中获得完全独立地位的学业，她一想起这来，心里就甜滋滋的；其次是想她的萨沙，这甚至称不上是专一集中的思想，她无论想什么事必定想到他，因为在她的生活中他是无所不在的。可是这种思想，这种虽不能专一集中，却常常存在的思想也会单独留在她的脑海里，而且单独停留的时间很多很多。那时该怎样说呢？这是想事还是打盹？她是睡着还是醒着？她的眼睛半睁半闭，脸上泛起微微的红晕……对，这是打盹。现在你们自己可以看到，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时间常常是这样度过的，所以她还没有来得及起床入浴（现在沐浴起来很方便，当初是相当麻烦的：必须把厨房的冷水管、热水管接到她房间里来。老实说，这么奢侈一口所费的劈柴非常可观，不过也算不了什么，现在她有能力来享用了），萨沙就来了。不错，韦拉·巴夫洛夫娜常常还是赶在萨沙来之前入浴，沐浴后再悠闲地躺下小憩。但更经常的是，她那样地若有所思，半睡半醒着，以致她还没有准备入浴，萨沙却已经进屋了。

每天早晨沐浴是多么舒服啊：最初的水很热很热，然后她把热水龙头关上，又拔掉排水口的塞子，冷水龙头却仍旧开着，浴缸里的水在不知不觉中变凉了，这可真舒服！

她泡在浴缸里洗上半个小时，有时半个小时，有时整整一个小时，还舍不得离开浴缸。

她样样事亲自动手，不用女仆干，穿衣也是自己穿，这样好得多。这是说，如果她没有睡过时间，她都是自己来做，如果睡过了头呢？那就不能避免——为什么要避免？——叫萨沙履行女仆的职责！萨沙可笑至极！也许，即使那位向她低声耳语的女歌唱家客人用手触摸过以后，也不会想象的日记上显现出“这简直是一种屈辱！”这句话来的。不管怎样，萨沙总是承担了准备早茶的任务。

而且也没有别的办法，萨沙做得对，他应该这样做，茶杯里几乎全是滚烫的奶油，只加了一点浓浓的茶，在床上喝早茶更是特别惬意。萨沙出去拿茶具——是的，他很少直接把茶具带进来——好一番忙活张罗，她却仍旧悠闲自得地躺在那儿，喝完茶以后，她还要半躺半靠地坐一会，可已经不在床上了，而是坐到了一张宽大的、主要优点是软和得像绒毛褥子似的沙发上，

坐到十点、十一点，直到萨沙该上医院或医学院附属医院，或者上医学院的课堂时为止。可是在萨沙喝完最后一杯茶，点起一支雪茄的时候，他俩中间总会有一个提醒对方道：“开始干活吧，”或者说：“好了，好了，现在该干活了。”干什么活呢？当然是给韦拉·巴夫洛夫娜讲解或补习大学的功课，萨沙是给她补习医学课程的教师。不过，她在准备那些应试的中学课程时更需要他的帮助，她独自来学太乏味。尤其可怕的一门还是数学，几乎再没有比拉丁文更乏味的了。但是又不能不学，非硬着头皮苦读不可，好在不必念得很多：没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人入医学院需要考试，但入学考试要求极低极低。比方说，我不敢担保韦拉·巴夫洛夫娜有朝一日精通拉丁文，哪怕能翻译科尼流斯·尼波斯的两行著作呢，但是她现在已经能够看懂在医学书中碰到的拉丁文句子，因为这知识是她所需要的，而且又并不难学。但是话说到这里就足够了，我知道我已经使韦拉·巴夫洛夫娜名誉扫地，也许敏感的……科尼流斯·尼波斯，一世纪罗马史学家。

十三

蓝袜子 插叙

蓝袜子，专指不带脂粉气、不好修饰、爱钻研书本或附庸风雅的女性。

“蓝袜子！简直是登峰造极的蓝袜子！蓝袜子叫我无法忍受！蓝袜子又愚蠢又乏味！”敏感的男读者激愤异常而又带着不无稳重的神气说。

我跟敏感的男读者真是心心相印。他大骂过我一顿，我拽着他的脖子把他两次赶出去，而我和他还是不能不在一起互诉衷肠。两颗心总是暗暗地相吸，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敏感的男读者啊，”我告诉他，‘你讲得对，蓝袜子确实又愚蠢又乏味，叫人受不了。这点你算看得准。可你没有看出谁才是蓝袜子。你马上就能看到的，好像照镜子一样。蓝袜子喜欢十分无聊地装腔作势，洋洋自得地谈论文学或学术著作，其实他对这些一窍不通，他这么谈不是由于他真正对它们有兴趣，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聪明（凑巧他生来并不聪明）自己的崇高志趣（跟他所坐的那把椅子同样高）和自己的教养（跟一只鸚鵡的教养同样高）。你看，镜子里这个粗野恶俗的丑八怪或者这个油头粉面的大人物是谁？就是你呀，朋友。是的，无论你的胡子留得多么长，或者多么细心地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你，毫无疑问地，无可争辩地，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蓝袜子，所以我才拽着你的脖子把你两次赶出去，唯独因此蓝袜子才叫我受不了，我们男人中间的蓝袜子要比女人中间的多上十倍。

“一个人如果抱着切合实际的目的去干一项事业，那么无论这是什么事，也无论这人穿的服装——男装还是女装，这人只是个单纯干事业的人，也就如此而已。”

十四

对敏感的男读者十分有益的关于蓝袜子——也就是关于他自己的插话，使我中断了关于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的日常生活的故事。“现在”究竟是指什么时候呢？指她自从搬到谢尔吉耶夫街以来直到如今。不过有什么必要继续描写下去呢，我只是一般地来介绍介绍；韦拉·巴夫洛夫娜住在瓦西利岛时，跟基尔萨诺夫恢复交往以后，在她的晚间活动中出现的那个变化，现在大大地发展了起来，现在基尔萨诺夫夫妇成了很多家庭的中心，这些家庭由青年夫妇组成，他们同基尔萨诺夫夫妇一样生活过得和睦幸福，观点也跟他们一致，每一家人全部空闲的夜晚都是在音乐和歌声、歌剧和诗篇、各种游乐和跳舞中度过。因为每天晚上，不在这家就在那家，都有聚会或别的什么安排，来满足他们不同的爱好。这个圈子中通常有半数的人参加这些聚会和其他种种活动，在一起消磨时光，基尔萨诺夫夫妇也像其他人那样，有半数晚上是在这类热闹的活动中的。

可是这也无需多说，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有一件事，糟糕得很，对绝大多数人必须极为详尽地来进行解释，他们才能明了。每个人即使没有亲身体会，至少从读过的许许多多的书本上可以知道：对一个少女或少男来说，与情人一起去参加晚会跟单独一人去参加，有心爱的人坐在身边一同观赏歌剧跟独自聆听，这其间有多大的差别。差别很大。

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只有极少数人体验过这一点：爱情赋予一切事物的魅力，其实不应该是人生中稍纵即逝的现象，这一道绚丽夺目的生命之光不应该仅仅照耀着寻觅和追求——我们暂且叫做求爱或求婚吧——的时期，不，这个时期其实只相当于一天的黎明，黎明虽然可爱、美丽，不过也只是白天的序幕，到了白天，那光和热却比黎明时分强大得多，白天的光和热持久不断地增长着，不停息地增长着，热的增长尤为长久，晌午过后很长时间还在增长。从前可不然：一对情侣结了婚，爱情的诗意也就飞逝而去了。今天的所谓现代人却完全不同。爱情把他们结合起来以后，他们在一起生活越久，被爱情的诗意照耀和温暖的时间也越长，一直要到黄昏时分，当对子女成长的操劳大大占据了他们的身心时为止。那时这种操劳比他们自身的欢爱更甜蜜，远远超过了这份欢爱，可是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它却是不断地增长着的。前人只能领略短短几个月的东西，现代人却能长年长年保存在心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面有个诀窍，我可以泄露出来给你们。那是一个不错的诀窍，利用好了更妙，而且也不难，不过你必须拥有一颗纯洁的心和一个诚实的灵魂，具有人权的现代观念，能够尊重那个与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仅此而已，再没有什么其他的诀窍了。把妻子当作未婚妻来看待，要知道，她每时每刻都有权对你说：“我对你不满意，给我滚开！”你能这样看待她，即使婚后十年，她还会在你心中唤起一种仿佛未婚妻唤起的诗意的感情，不，甚至更诗意、更理想——最佳意义上的理想。你必须坦率地、正式地、不附加任何条件地承认她的自由，如同承认你的朋友拥有着愿不愿与你维系友谊的自由，那么婚后十年、二十年，对她来说，你依然像未婚夫般地亲切可爱。现代人中间夫妻便是这样生活的。很令人羡慕。不过他们可是相互忠实。即使婚后十年他们依然情深意笃，他们之间的爱情更强烈，更富有诗意，胜似新婚时节。可要知道这十年当中，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给过对

方一个虚情假意的亲吻，也没有讲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语。“他从来不说谎。”有一个人描写一个人道。“他心里没有半点虚假。”有一本书——也许就是同一本书——上描写一个人说。读者读书的时候琢磨着：“他具有多么惊人的道德水平啊！”作者写书的时候也琢磨着：“我们写出的人物应该给大家一个惊奇。”写书的人既没料到，读书的人也不了解：现代人决不接受任何一个缺少这种心灵的人做自己的朋友的，他们也并不缺少朋友，同时他们认为他们的朋友只是一些良好的现代人，但又都是最普通最平常不过的了。

唯一遗憾的是，当今现代人仅占老派人的十分之一，如果不是更少的话。其实这也很自然的，古老世界必然拥有它的老派居民。

十五

“你我在一块生活已经有三年（从前她说一年，后来说两年，再往后就要说四年，以至更多），可我们还是像一对难得幽会的情侣一般。萨沙，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当没有什么东西妨碍两人完全属于对方的时候，爱情反而会减退？这些人不懂得真正的爱情，只知道肉欲的满足或者肉欲的饥渴。真正的爱情恰恰是从两人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才开始的。

“你是不是从我身上看出这点来的？”

“我从你身上看出的东西更有趣得多呐：过这么三年，你就会忘掉你的医学了，再过三年，你连读书都不会了，你在智力活动方面的全部本事将只剩下一个‘观看’，而且除了我，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类谈话不长，次数也不多，可是他们毕竟有过这样的谈话。

“是的，爱情一年比一年强烈。”

“你知道鸦片烟鬼的故事，据说他们的瘾头一年比一年更大。谁只要有过一次领略了它所带来的乐趣，他的瘾头儿就永远不会变小，只会越来越厉害。”

“一切强烈的欲望都是这样，总在不断地发展，越发展下去越强烈。”

“满足！欲望不知道什么叫满足，它只能满足那么几个小时。”

“知道满足的只有空洞的幻想，而不是内心的感情；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而是脱离生活、沉溺于梦想腐朽没落的梦想家。”

好像由于我没有挨饿，而是每天都可以好好地、毫不费难地吃上饭，那么我的食欲就要减退罗？我的味觉就要迟钝罗？恰恰相反，正因为我吃的是美味佳肴，我的味觉才能发达。我的食欲也只能跟我的生命一同丧失，没有食欲，人没法活。”（“这真是粗俗的唯物主义，”我和敏感的男读者异口同声地说。）

“照人的天性说，难道依恋之情只能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却不能增强吗？友谊在什么阶段更牢固、更亲密呢：是友谊开始后的一个星期还是一年，还是二十年？重要的只是朋友们相处融洽、亲密无间，彼此真正适于做朋友。”

这类谈话经常有，可是次数不多。简短而且次数不多。确实，关于这点为什么要常常谈论个没完呢？

这类谈话次数较多，也颇为冗长：

“萨沙，你的爱情给了我多大的支持啊。由于你的爱，我才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我才摆脱了对任何人的依赖，甚至也包括对你的依赖。但是我的爱情给你带来些什么呢？”

“给我？并不少于给你的。它对于我的神经是一种经常的、有益的强刺激，它必然使我的神经系统发达起来（“粗俗的唯物主义”我和敏感的男读者又异口同声说道），因此爱情使我的智力不断提高，精神力量大为增强。”

“不错，萨沙，我听到人人都这么说--可我自己在这件事上倒是一个睁眼睛，我的眼睛已经被爱情迷住了；可是人人都看出你的眼睛变得越发明亮，你的目光更有神采、更加敏锐了。”

“韦罗奇卡，我何必在你面前自吹自擂或者谨言慎行呢？我俩是一个人啊。不过这确实要反映到眼睛上来的。我的思想变得强有力多了。每当我要从观察中得出结论，把许多事实进行综合概括时，从前要思考好几个小时的问题，现在一个小时就可以找到答案了。现在我所能掌握的事实比从前多得多，我得出的结论也更广泛、更全面。假如我身上蕴含着某种天才的萌芽，韦罗奇卡，有了这份爱情之后，我就会变成伟大的天才。

假如我生来能够在科学上略有小小的创新，那么有了这份爱情，我就有力量来改造科学。

但我生来只是一个干粗活的，一个不体面的、卑微的劳动者，我只会零敲碎打地研究些局部问题。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这样。现在你知道，我可不同了。大家开始对我抱有较大的期望，他们认为我可以改造科学中整整的一个庞大的部分--关于神经系统的机能的全部学说。我觉得我是能够不负众望的。一个人二十四岁的时候，他的革新精神本来该比二十九岁（后来又讲：三十岁三十二岁，等等）时的思路更开阔、更有气魄，可是当时我的革新精神的程度还不如现在。我现在觉得我还在进步，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停步不前了。我们开始共同生活之前那两三年，我已经没有多大的长进了。你使我那青春初期的朝气重又复苏，使我有力量大大超越我有可能在那里停歇的地方，并且当你不在我身边时我也真的是在那里停歇过。

“还有工作的精力，韦罗奇卡，难道意义不大吗？一个人的高度兴奋也会注入到他的劳动中去，如果他的全部生活已经是这样安顿下来的话。你知道咖啡或一杯酒对于脑力劳动者的精力有怎样的影响，但是它们给人带来的力量只能维持一个小时，紧接着便是与这表面的、短暂的兴奋成反比例的疲乏，而我身上现在经常出现这种兴奋，我的神经本身就经常是这么强壮、活跃。”（“又是粗俗的唯物主义，”我们说道。）

这类谈话次数较多也颇为冗长：

“谁要是没有体验过爱情是怎样激发起人的全部力量，他就不懂得真正的爱情。”

“爱便是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我。”

“对于离开爱情就失去活动能力的人，爱情赐与他活动能力。对于有活动能力的人，爱情赐与他力量，以便运用这活动能力。”

“只有那帮助所爱的女性提高到能具有独立地位的人，才是真爱。”

“只有那因为爱情而变得思想明晰、双手矫健的人，才是真爱。”

这类谈话次数很多：

“我亲爱的，我正在读卜伽丘（“多么不道德！”我和敏感的男读者说道，“女人竟读卜伽丘！只有我们才许读。”但是我还得指出一点：一个女子

五分钟内从敏感的男读者嘴里听到的文雅的淫秽话语，比她在卜伽丘全部作品中发现的还要多，当然，她从他嘴里是听不到明快、新鲜、纯洁的思想的，一点也听不到的，而这种思想在卜伽丘笔下却源源不断)：你说得对，我亲爱的，他拥有巨大的才能。我认为，就心理分析的深刻和细腻的程度而论，他有些故事写得不亚于莎士比亚的最好的剧本。”

卜伽丘(一三一三—一三七五)，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十日谈》作者，他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道德。

“他的喜剧故事写得那么直露，你怎么会喜欢读呢？”

“有一些蛮有趣，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故事挺无聊的，正像一切过于粗俗的滑稽剧。”

“可是这也应该原谅他，他生活距今已经五百多年了。我们现在觉得过于淫秽、过于下流的事，当时认为无伤大雅。”

“无需五百年，我们今天的许多习惯和我们的整个生活基调也要显得粗俗肮脏了。”

但是这没有什么意思，我只谈他那些认真描写热烈崇高的爱情的优秀故事。他的伟大才能在那些故事中表现最明显。不过我原来想说的是，萨沙：他描写得固然精彩，很有力度，但根据他所写的来判断，可以说当时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懂得爱情的欢愉，当时还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过爱情，虽然人家说那是一个最充分地享受爱情的时代。不，不可能，他们享受爱情的强烈程度还不到现代人的一半。他们的感情太肤浅，他们迷恋得还太微弱，也太短暂。”

“感觉的强弱，要看这感觉是从机体深层的什么地方产生出来的。如果它完全是由外在的对象、外在的原因引发的，那么它总是十分短暂，而且只能涉及人的生活的个别方面。谁如果仅仅因为别人向他敬酒才喝酒，他就难以领略到酒的甘醇，他能从酒中享受到的乐趣也就微乎其微了。假定享受的根源来自某种幻想，假定他是靠着他的幻想去寻找享受的对象和口实，这样的享受可要强烈得多。这时他血液的冲撞更猛烈得多，血液中分明有一股暖流，使他感到很大的欢愉。然而这跟下面的情形相比还是很微弱，那就是，如果享受是来源于精神生活的深层的话。这时的兴奋劲会充满整个神经系统，使得它长久地、非常猛烈地激动着。这时那股暖流会充满整个胸膛，这已经不只是幻想所引起的心的跳动，不，整个胸膛都感到非常清新和轻松，仿佛人所呼吸的大气正在变化，仿佛空气变得清洁得多，含氧量也多得多了。这种感觉类似人在风和日丽的天气时的感觉，好像晒太阳时的感觉，可是其中又大有区别：这股暖流和清新感是在神经本身里增长起来的，它们直接为神经所接受，不至由于中介物而对其爱抚力有任何程度的减弱。”

“我很满意，总算及时改掉了这个有害无益的习惯。对，必须让血液循环不受任何阻碍。可是为什么改掉后人们赞叹不已，说我的肤色比从前变得鲜嫩了，这本该如此的呀。况且又是多么不值得的原因造成的，小小原因使腿部受的损害真不小，应当让袜子本身松松快快地贴在腿上。我腿部的线条已经变得正常匀称了，袜带勒出的印痕正在消失。

“印痕消退得不快。我只穿过三年紧身胸衣，我跟你共同生活之前就不穿了。可是老实说，就是不穿胸衣，我们的服装还是紧紧束缚着腰身。不过腰部的印痕也会消退的，就像腿部恢复正常一样，对不对？对，已经消退掉一些了。总会完全消退的，我挺满意。”

我们的服装式样穿着真叫人难受！我们早该懂得希腊妇女是比较聪明的，衣服就该像她们过去所穿的那样，从肩部起就十分宽松。我们的服装式样真是损害我们的身体！但是我身上的线条正在恢复，我真高兴！”

“你多漂亮，韦罗奇卡！”

“我多幸福，萨沙！”

他的语调轻灵，

好像幽泉泻韵，

他握过我的手呀，

啊，他的嘴唇！

亲爱的人！冷却吧

火热的吻，还是一样销魂：

纵然没有这些热吻，

看到你，热血也会似火燃烧，

纵然没有这些热吻，

见到你，脸上也会泛起红晕，

胸膛也会起伏如潮，

眼珠儿也亮晶晶地闪耀，

犹如一颗明星高挂在深宵。

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部，一八 页。

引自诗人柯尔卓夫的《俄罗斯歌谣》（一八四一）

十六

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

韦拉·巴夫洛夫娜又做了一个梦，仿佛是：

一个熟悉的--现在多熟悉啊--声音 由远处传来，越来越近--

俄国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是指韦拉第三个梦中那位女歌唱家的声音，她在本节中叫“光明美人”。

Wie herrlich leuchtet

Mir die die tur !

We glänzt die Scne !

Wie lacht die Flur !

自然多明媚，

向我照耀

太阳多辉煌，

原野含笑！

（歌德《五月之歌》，见《野蔷薇》，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九页）

韦拉·巴夫洛夫娜看见这是真的，全是真的……

田间泛着金光，原野上开遍了鲜花，原野四周的灌木丛中百花争奇斗艳，高耸在灌木丛后面的森林郁郁葱葱，沙沙作响，并且也点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田间、草地、灌木丛和森林中布满的野花散发着芳香。鸟儿在枝头

飞来飞去，几千种鸟儿啼啭的声音连同香气一齐从枝桠中飘洒出来。在田间、草地、灌木和森林背后，又可以看见同样泛着金光的田亩、布满着野花的草地和灌木丛，一直到那被阳光照耀下的森林覆盖着的远山为止。山顶上处处是浅色的、银色的、金色的、紫色的和透明的云朵，云朵的变幻不定的颜色微微衬托出了地平线上的晴朗的碧空。太阳升上来了，大自然充满欢乐，也使人们欢乐不已，大自然把光和热、芳香和歌声、爱和幸福倾注到了人们的胸膛之中，同时人们也从胸膛中唱出欢乐与幸福之歌。爱与善之歌：“哦，大地，太阳，幸福，欢欣！”

哦，爱啊，爱啊，灿烂如金，你仿佛朝云，漂浮山顶！”

歌德：《五月之歌》。见上页注。下面是这节诗的原文。

O Erd' ! O Sonne !

O Gluck ! O Lust !

O Leb' , O Liebe ,

So goldenschon ,

Wie Morgenolken

Anf jenen Hoh'n !

“现在你认识我了吧？你认识我的美色了吧？可是你还不认识，你们当中谁也不认识我的全部的美色。你看看过去、现在和未来。你听一听，看一看吧：

Wohl perlet im Glase der purpurne Wein ,

Wohl glanzen die Augen der Gaste...

紫红色的美酒在杯中荡漾，

宾客的眼睛闪闪发光……（引自席勒的《四个时代》）

在山脚下，森林的边缘，在两旁长着开花的灌木丛和茂密的高树的林荫路之间，耸立着一座宫殿。

“我们上那儿去。”

她们走着，在空中飞着。

一个豪华的宴会。酒在杯中冒泡，参加宴会的人眼睛闪亮。喧哗和喧哗声中低低的耳语，笑声，背地里握手言欢，有时还在偷偷地静悄悄地接吻。“诗歌！诗歌！没有诗歌总是不能尽兴！”一位诗人站了起来。他的脑门和思想被灵感照得发出亮光。大自然对他揭示了自己的奥秘，历史对他阐明了自己的意义，几千年来的生活犹如一幅幅的图画，在他的诗歌里飞掠而过。

（一）

诗人吟哦起来，于是出现了一幅图画。

游牧人的帐篷。在帐篷周围有绵羊、马匹和骆驼在放牧着。远处是橄榄树和无花果树林子。在西北地平线的尽头耸立着有两重高山峻岭。山顶覆盖着积雪，山坡上长满雪松。这里的牧人比雪松长得还要俊秀挺拔，他们的妻子比棕榈更匀称苗条，他们在悠闲安逸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恋爱，他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地都消磨在爱抚和情歌之中。

“不，”光明美人说道，“这里说的不是我。当时妇女是奴隶；而我尚未出世。没有平等的地方也就没有我。那个女皇叫阿斯塔耳忒。她来了。”

阿斯塔耳忒，古代叙利亚的爱神兼丰收女神。

一个盛装的女人。她的手上和脚上戴着沉甸甸的金镯子，脖子上挂着镶有珍珠和珊瑚的沉甸甸的金项链。她的头发涂了秀发油，满脸的淫荡相和

奴才相，一双眼睛显得淫荡而呆滞。

“要服从你的主人，在他战事间歇之时供他消闲解闷。你应该爱他，因为他买下了你，如果你不爱他，他会杀死你。”她对面前的一个倒在尘土中的妇女说。

“你看见了吧，这不是我。”美人说。

(二)

诗人又吟诵出一连串充满灵感的诗句。出现了一幅新的图画。

一座城市，远处，往北和往东是山，东南两面的远处和靠近城西的地方是海。一座奇妙的城市。城里的房屋不太高，外观也不豪华，然而却有多少美妙的神殿！特别是在那个山丘上：一道阶梯穿过一座座的奇丽壮观的大门通往那里，整个山丘全是神殿和公共建筑物，其中的任何一座都足以给当今最雄伟的京都增色生辉。几千尊雕像坐落在神殿中，分布在城内四处。博物馆中若能安放上其中的一座，它就会在全世界成为首屈一指的了。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的人们长得多么漂亮啊：这些少男、少女和少妇当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作为雕像的模特。他们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活泼愉快，他们的生活无限光明，无比美好。这些房屋外观虽然并不豪华，内部却处处高雅不凡，说明主人很会享受：每一件家具和器皿都可以供人赏玩。这些人全是那么漂亮，那么懂得美，他们为了爱而活着，为了效力于“美”而活着。例如，一个放逐者回到了推翻掉他的政权的城市，大家知道他回来是为了恢复他的统治。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他呢？原来有个美女跟他一起坐在马车上，把他指给人们看，请求人们接受他，还对人们说她要庇护他。这美女甚至在美女如云的全城中间也显得惊人的美丽，人们拜倒在她的美色面前，把统治他们自身的权力交还她所爱的庇西特拉图。再说法院吧，法官是些阴沉严峻的老头子，人们可以受诱惑，他们却不知什么叫诱惑。阿雷乌泊果斯是以严酷无情和铁面无私而闻名的，神仙和神女们都来找他裁决自己的案件。一个被公认为犯有弥天大罪的女人要来受审，她这个危害了雅典的罪犯应该处死，这是每个法官心里所作出的裁决。但被告阿斯帕霞一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竟拜倒在她的脚下，说道：“你不能受审判，你太漂亮了！”这不是一个美的乐土吗？这不是一个爱的乐土吗？

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六——一五二七），雅典僭主，曾两度被流放。

阿雷乌泊果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

阿斯帕霞以聪明、貌美著称的希腊女子，有人认为她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五世纪）失败负有罪责，这次战争使雅典从此走下坡路。

“不，”光明美人说，“当时我尚未出世。他们崇拜妇女，却不承认她跟自己是平等的人。他们只不过把她当作享乐的工具供奉起来罢了，他们并未承认她有着人的尊严，凡是不把妇女作为人来尊重的地方，就不会有我。那位女皇叫阿佛洛狄忒。她来了。”

阿佛洛狄忒，希腊的爱与美之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这位女皇身上没有任何装饰品，她长得那么漂亮，她的倾慕者们不愿意她穿衣服，她美妙绝伦的体形不应该被遮盖住，以致于他们那一双双艳美的眼睛无法一饱眼福。

她对那个跟她自己差不多漂亮的、把神香扔在她祭坛上的女人说了什么话呢？

“做男人享乐的工具吧。他是你的主人。你活着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

他。”

她的眼睛流露出的只是肉欲享受的快感。她仪态高贵，一脸傲气，但是她引为骄傲的只有她那肉体的美。在她统治的时代，妇女注定怎样来生活呢？男人把妇女关在闺房里，只有他作为主人能够享有这专属于他的美色，非他莫属。她没有自由。还有另外一些妇女，她们自诩是自由人，可是她们出卖对自己的美色的享用权，还出卖自己的自由。

不，她们也没有自由。连这位女皇也还一半是奴隶。没有自由的地方就没有幸福，也没有我。

（三）

诗人又吟诵起诗句来。出现了一幅新的图画。

城堡前有一个比武场，周围是圆形看台和雍容华贵的观众。比武场上有几名骑士。

城堡的阳台上坐着一位姑娘，俯身望着比武场。她手里拿着一条围巾，谁获胜，围巾就归谁，同时谁就可以去吻她的手。骑士们殊死相拼，结果托庚堡 胜了。“骑士，我爱您，犹如亲姊妹。别样的爱可别强求于我。您走来的时候我并未怦然心动，您离开的时候我也是心平如镜。”--“我的命运已然注定。”他说，于是乘船远航来到巴勒斯坦。

他的显赫功名在整个基督教界传扬着，可是他见不到他心中的女皇就无法生活。旧情并没有在战斗中被遗忘，他还是回来了。“别敲门，骑士，她已经进了修道院。”他给自己盖起一座小屋，早晨她打开修道院的窗户时， he 可以从自己小屋的窗口瞧见她，却不会被她看见。他的全部生活就是等待她这个光辉的太阳在那小窗旁露面，他能看看自己心中的女皇，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生活。在他的生命枯竭之前，他的确不曾有过别的生活了。直到他的生命熄灭的那一刻，他依然坐在自己那座小屋的窗旁，心里只琢磨一件事，我还能再看见她吗？

托庚堡是席勒所写的故事诗《骑士托庚堡》的主角。作者用散文转述了诗中的故事。

“这完完全全说的不是我，”光明美人说，“他没有占有她的时候，他爱她，等到她做了他的妻子，可就沦为他的奴仆了。她必定怕他。他把她关了起来，不再爱她。他行猎，打仗，跟伙伴们饮宴，强奸女奴，而他的妻子却被丢弃，被关押，遭轻蔑。女人一旦被男人占有，男人就不再爱她了。不，当时我尚未出世。那位女皇叫‘贞洁女皇’。

她来了。”

她谦虚、和顺、温柔而美丽，她的美貌超过阿斯塔耳忒，也超过阿佛罗狄忒，可是她却心事重重、忧郁、悲伤。人们在她面前双膝跪拜，向她献上玫瑰花冠。她说：“我已悲痛欲绝，一把利剑刺穿了我的心。你们也很悲痛，你们很不幸。大地浸透着泪水，是一片苦海。”

“不，不，当时我尚未出世。”光明美人说。

（四）

不，那些女皇可不像我。她们还继续统治着，但是她们的统治已经衰败，随着新一代女皇的诞生，前一代女皇的统治便开始衰败。她们中间最后一代的统治开始衰败时，我才问世。从我问世以来，她们的统治更快地衰败下去，而且一定会完全崩溃。她们当中继起的新女皇不能顶替以往的历代女皇，新女皇继位时，历代女皇的统治仍旧残留下来。我却可以顶替她们所有

的人，她们将统统消逝，惟独留下我来统治全世界。但是她们的统治必定早于我。因此，没有她们统治的时代，我的时代也不可能到来。

以前，人跟动物一样，自从男子开始珍视妇女的美以后，人就不再是动物了。但是妇女在体力上弱于男子，男子很粗野。那时候体力决定一切。男子把他所珍视的美女占为己有，于是她成了他的财产、他的物品。这是阿斯塔耳忒的朝代。

当男子比较成熟的时候，就开始比以前更加珍视妇女的美，拜倒在她的的美色面前。

但他珍视的也仅只是她的美色而已。她的觉悟还不高，她的思想只是他的思想的复制品。

他说惟独他是人，她不是，于是她只把自己看作一件属于他所有的精美的珍稀宝物，并不认为自己是人。这是阿佛洛狄忒的朝代。

后来妇女渐渐觉醒，认识到她也是人。即使在她心中刚刚萌发出人的自尊心时，她该多么地悲伤啊！因为她作为还没有被认可，男子只希望她做一个女奴与他为伴。于是她说：我不愿做你的伴侣！然而他又遏制不住情欲，不得不哀求她，向她屈服，他忘了自己并未把她当人看，他爱她，爱这个守身如玉、不可侵犯的贞洁少女。可是她刚一相信他的哀求，他刚一占有她，她就苦不堪言！她落入他的手中，这双手比她的手有力，而他又很粗鲁，他终于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奴隶，轻蔑她。她苦不堪言！这是圣母 悲伤的时代。

圣母，指贞洁女皇。据说圣母生下耶稣后，仍未失去童贞。

许多世纪过去了，我的姐姐 做了她该做的事情。你认识她吧？她比我先见到你，她先于所有的人问世。她一直在世间，世上有了人就有了她，从此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她的劳动很艰苦，收效却不快，但是她无休止地工作着，成效便增大了。男子变得更为理智，妇女越发坚定地认识到自己是跟男子平等的人，于是我问世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指洛普霍夫的“未婚妻”，也就是“姊妹们的姊妹，未婚夫们的未婚妻”。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啊，这就是刚发生的事。你知道是谁首先发觉我的问世，然后把这消息告诉给别人的吗？这是卢梭在他的《新爱洛伊丝》中宣告的。人们从他的书中第一次听到了我。

法国作家卢梭在他的著名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一七六一）中叙述了妇女自尊心的觉醒。

从那时起，我的统治扩大了。由我管辖的人还不多，不过我的统治正在迅速扩大，你已经预料到我总有一天会统治全世界。只有那时人们才能充分领略我的美色。目前那些承认我的权力的人还不可能服从我的全部旨意。他们被那些敌视我的全部旨意的群众所包围。如果他们了解和实现了我的全部旨意，群众就要折磨他们，迫害他们至死。而我需要的是幸福，我不希望任何人遭受苦难，所以我对他们说，别做那种使你们遭受苦难的事，现在你们对我的旨意能了解多少算多少，免得贻害你们自己。

“可是我能够完全了解你吗？”

“是的，你能够。你的境况很幸运，你无需害怕，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但是即使你了解了我的全部旨意，我也不愿由你去做任何有害于你自己的事情：只要有可能给那些不了解我的人以口实对你施加迫害的事情，你都不要想着去做，你也不会想着去做。”

目前你完全满足于你拥有的一切，你不想别的事和别的人，将来也不会去想，我可以向你敞开心扉。”

“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你告诉过我历代女皇的名字，可是从来没有提到你自己的名字。”

“你要我告诉你我自己的名字吗？你瞧着我，听我说吧。”

（五）

“你瞧着我，听我说。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你认得出我的面孔吗？你见过我的面孔吗？”

不，韦拉·巴夫洛夫娜还没有见过她的面孔，根本没有见过她本人。她怎么又好像觉得见过了呢？自从她常跟他（指基尔萨诺夫）在一起谈心，自从他总是瞧着她、吻她，这一年以来她经常看见这位光明美人，而且美人也不回避她，正像她不回避他一样，美人常常是整个身子出现在她面前。

“不，我没有见过你，我没有见过你的面孔。你曾来到过我的面前，我看见过你，但是因为你被笼罩在光轮之中，我看不清你，我只看出你比任何人都漂亮。你的声音我听说过，不过我只听出你的声音比任何声音都悦耳。”

“你瞧，我要为你暂时减弱我的光轮的灵光，我的声音叫你听起来也暂时失去它往日的魅力。对你来说，我暂时不再是女皇了。你看见吗？你听见了吗？你认出来了吗？好了，我又是女皇，并且永远是女皇了。”

她重新被她的光轮的全部亮光环绕着，她的声音又变得难以形容地动听了。可是她不再当女皇了，好让人家能认出她来--暂时不当，难道是真的吗？韦拉·巴夫洛夫娜难道看见了这面孔，也听见了这声音吗？

“好，”女皇说，“你想知道我是谁，你已经认出来了。你想打听我的名字，我没有自己个人的名字，我的名字跟作为我的化身的那个女性是一个名字，我的名字就是她的名字。你看出我是谁了。什么也比不上人更崇高，什么也比不上女性更崇高了。我就是作为我的化身的那个女性，正在爱着，并且被爱。”

不错，韦拉·巴夫洛夫娜看见的正是她自己，正是她自己，而又是一个女神。女神的面孔正是她自己的面孔，正是她的活生生的面孔，她的面孔远非完美无瑕，她每天都能看到不止一张比它漂亮的面孔。这是她的面孔，当它被爱情之光照亮时，它的美貌竟然超过了古代雕刻家和伟大绘画时代的大画家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标准美人。不错，这正是她自己，然而被爱情之光照亮了的。即使在美女匮乏的彼得堡，比她貌美的人也有千百个，而她的美貌在此时此刻却超过了卢浮宫的阿佛洛狄忒雕像，超过了我们至今所知的一切美人。

即米罗岛出土的维纳斯雕像。

“你在镜子里只能看到你本人的模样，看不到我。你在我身上看到的你自己，正是那爱你的人所看到的你。在他看来，我和你已融为一体。在他看来，任何人都不如你美貌，一切艺术典范在你面前全都黯然失色了。对吗？”

对，对啊！

（六）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你要了解，我……

我跟阿斯塔耳忒一样享受着爱情，她是我们所有接替她的女皇的始祖。我跟阿佛洛狄忒一样为自己的美被人观赏而陶醉。我跟“贞洁女皇”一样对贞洁充满着虔敬的感情。

可是我心中这一切情感跟她们的不同，而是更充分、更崇高、更强烈。“贞洁女皇”跟阿斯塔耳忒，跟阿佛洛狄忒的情感已在我心中融合为一。并且，这些力量中的每一种，由于跟别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缘故，而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精良了。但使这每一种力量获得更大的、更强大得多的气势和魅力的，却是唯我所独有而为前代任何一个女皇所不具备的新东西。我身上这个新东西便是我与她们不同之处：相爱的人们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作为人相互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仅仅凭这样新的东西，我的一切就比她们的美好得多，美好得多了。

当一个男子承认妇女享有跟他一样的平等权利时，他才会抛弃那种把妇女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的观点。那时她爱他也像他爱她一样，仅仅因为她愿意爱，如果她不愿意，他便没有任何权利强迫她，正如她没有权利强迫他一样。因此我享有自由。

有了平等和自由，历代女皇遗留给我的东西，也获得了崭新的性质和高度的魅力，这种魅力，在我之前人们是没有领略过的。跟它相比，前人所领略到的一切简直算不了什么。

在我之前，人们不懂得充分享受爱情，因为如果没有两相爱慕者双方的自然的吸引，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怡然心醉。在我以前，人们也不懂得充分享受自己的美被人观赏时所获得的愉悦。因为如果美不是由于自然吸引而被发现的话，人就不可能在被观赏时怡然心醉。缺乏自然吸引的享受和愉悦，比起我的享受和愉悦来是平淡乏味的。

我的贞洁超过那位只讲肉体贞洁的“贞洁女皇”：我的心灵也贞洁。我是自由的，所以我不骗人，也不会装假，我不会说一句言不由衷的话，也不会没有好感就跟人亲吻。

可是我身上的新东西、那使历代女皇产生高度魅力的东西，它本身便构成了我的一种超凡的魅力。有仆人在旁边，主人觉得拘束，在主人面前，仆人也觉得拘束，人只有跟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人在一块才会感到完全轻松自然。同一个比自己低下的人在一起太乏味，只有跟与之平等的人在一起才会十分快乐。因此，在我以前，连男子也不懂得美满爱情的幸福。他们在我以前所体验到的还称不上是幸福，只不过是短暂的迷醉罢了。

至于妇女，在我以前的妇女多么可怜！那时候她们是受人支配、任人奴役的角色。她们感到胆战心惊，她们在我以前对爱情几乎全然不懂：有恐惧的地方就没有爱情……

所以，假如你想用一个词来说明我是什么人，这个词便是“权利平等”。没有它，肉体享受和美的观赏都是平淡乏味、令人厌恶、卑鄙下流的。没有它，就不会有心灵的贞洁，即使有肉体的贞洁，也只是用来骗人而已。有了它。有了平等，我才有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我。

我把一切都告诉给你了，你也可以去告诉别人，包括我现在的情况。不过现在归我统治的国家还小，我还应该保护自己人，不使他们被那些不了解我的人诽谤，我还不能向所有的人表白我的全部意旨。可是我会向所有的人说明它的，当我的国家统治了所有的人，当所有的人都变得体魄健美、心灵纯洁的时候，我将向他们展示我全部的美。但是你特别幸福，你的命运特别好。我不会让你感到困惑，也不会使你受到不良影响，我可以告诉你，等到不是像现在这样为数极少的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承认我是他们自己的女皇的时候，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有关我的未来的秘密。

你要信守秘密，你听着吧。

(七)

.....
.....

(八)

“啊，我亲爱的，现在我了解你的全部旨意了。我知道它定会实现。但是它将怎样实现呢？那时候人们将怎样生活呢？”

“我一个人不能给你讲清楚，需要我的姐姐来帮忙，你早已见过她了。她是我的主人，又是我的仆人。我只能成为她要我成为的样子，不过她又是在为我工作。姐姐，来帮帮忙。”

“姊妹们的姊妹，未婚夫们的未婚妻”来了。

“你好，妹妹，”她对女皇说，“你也在这儿，妹妹？”她对韦拉·巴夫洛夫娜说，“你想看看我调教出来的女皇统治所有的人的时候，人们将怎样生活吗？你瞧吧。”

一座庞大的建筑物，这种建筑物就连在今天最大的京城里也只有几座，或者干脆说，今天连一座也没有！它高耸在田野和草场、花园和树林之间。田野里长的都是我们俄国的庄稼，不过又跟我们的不大一样，而是长得密密实实，茂盛丰饶。难道这是小麦？谁见过这样的麦穗？谁见过这样的麦粒？今天只有温室里才能长出这样饱满的麦粒和密实的麦穗来。田野就是我们俄国的田野，可是这样的花朵今天只能在我们的花圃中见到。

花园中有柠檬树和检子树、桃树和杏树。怎么都生长在室外呢？哦，周围还有许多柱子呢，对了，这是几个被掀掉屋顶过夏的温室，是为了让这些树在夏季见见天日。树林倒是我们俄国的树林：橡树和椴树、槭树和榆树，是的，树林跟今天的相同。都受到很细心的照料，其中没有一棵病树，但还是那些树林，只有它还跟今天一样。然而这座建筑物--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建筑式样？今天没有这种式样。不，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塞屯汉山丘上的宫殿：到处是铸铁和玻璃，只见铸铁和玻璃。不，不只是铸铁和玻璃，这仅仅是建筑物的外壳，它的外墙，里面才是真正的房屋，一座极为高大的房屋：它被由铸铁做骨架通体透明的建筑物像套子似地罩着，它的每层楼都有宽阔的游廊与那建筑物衔接在一起。这内屋的建筑有多么精巧，窗间墙多么狭长，窗子可又宽又大，跟楼层一般高低！内屋的石墙像一排壁柱，无异于给那些面对游廊的窗子镶上了框架。这是什么样的地板和天花板啊？这些房门和窗框是用什么制做的？这是什么？银，白金？家具也几乎都是这样。这儿摆上些木头家具只是独出心裁，不过为了别有一番情趣而已，但所有其余的家具、地板和天花板都是用什么做的呀？“你试着动动这把扶手椅子。”年长的女皇说。这种金属家具比我们的核桃木器还轻巧。这到底是什么金属呢？哦，现在我知道了，萨沙让我看过同样的一块小板子，它像玻璃那么轻，现在已经有这种材料制做的耳环和胸针了。对，萨沙说过，铝迟早总会代替木材的，也许还可以代替石头呐。

这种铝制品真多！遍地都是铝、铝。自与窗之间的空隙挂满了大镜子。地板上铺着多好的地毯！这间大厅的地板有一半是光露着的，从这里看得出它也是铝做的。“你看，这块地板质地不光。因为小孩要在这儿玩，大人也跟他们一起在这儿玩，这样地板就不能太滑溜了。那间大厅也没有铺地毯，那是舞厅。”处处是南方的树木和鲜花，整座房子好比一间宽敞的大暖房。

北国气候寒冷，柠檬等树只能种在温室中。

塞屯汉，在伦敦北郊。一八五一年英国政府为举办盛大的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建造了一座用铸铁和玻璃制做的展厅，称为“水晶宫”。一八五四年，这座建筑物移至塞屯汉山丘。

这座比宫殿还要富丽堂皇的房子里究竟住着些什么人？“这儿住着许多人，许许多多的人。走，我们能看见他们。”她们来到一个从最高层的游廊伸出去的阳台上。韦拉·巴夫洛夫娜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这些田野上布满一群一群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小孩们混杂相间，到处都是人。不过还是青年占多数，老头儿很少，老太太更少，小孩比老人多，可还是不很多。小孩大半留在家中干家务活，他们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活，他们很喜欢于这个。有几位老太太同他们在一起。老头儿和老太太很少，是因为这儿的人衰老得晚，这儿的生活又安定，又有益于健康，能使人保持旺盛的精力。”田野上干活的人群差不多都在唱歌。不过他们在于什么活呢？哦，他们是在收庄稼。他们干得真快！他们怎能干得不快，他们怎能不歌唱！原来机器几乎代替了他们的全部劳动--从收割、打捆到运送，人几乎只要走动走动，管管机器就行。而且他们给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天气炎热，可是对他们毫无影响：他们在干活的那块田地上支起一个大凉篷，活儿子到哪儿，凉篷也推进到哪儿，他们给了自己一片凉爽！他们怎能干得不快不开心！怎能不歌唱！连我也愿意这样来生活！他们的歌唱不完，永不断，他们唱的是我不熟悉的新歌，但是他们也想起了唱我们俄国的歌，我知道这首歌：

我们俩会像贵族老爷一样生活：

那些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只要你心里有什么希求，

我和他们统统都能弄到手……

引自柯尔卓夫的《逃》（一八三八）

活一干完，所有的人都朝着那座建筑物走去。“我们再走进大厅里，看看他们怎样吃午饭，”姐姐说。她们走进一间最宽敞的大厅。大厅中有一半地方摆放着餐桌--桌子已经摆好，准备开饭--餐桌真多！有多少人在这儿用餐呢？有一千人或者更多：在这用餐的还不是所有的人，有愿意单独吃的就可以在家吃。不下田的老太太、老头儿和小孩来准备这一切：“做饭、干家务活、收拾房间，这些活儿对于其他的人来说是太轻松了，”姐姐说，“那些还没有能力、或者已经失去能力做其他事情的人才应该干这些活。”餐具精美，全是铝和水晶制品。宽大的餐桌中央摆着一瓶瓶鲜花，一字排开，菜已经端上了桌子，下田干活的人进了大厅，他们坐下来和做饭的人一同用餐。

“谁来侍候他们呢？”--“什么时候？用餐的时候吗？干吗要人侍候？总共有五六道菜，热菜都放在不致凉的地方，你看，壁凹处就是一箱箱开水，可供温菜用。”姐姐说道：“你的生活过得好，你喜欢吃得好，你能经常吃到这样的饭菜吗？”--“一年能吃几次。”--“在他们，这是家常便饭。谁要愿意吃得更好，吃到他想吃的也能办到，但是得单独付钱。如果不要吃特殊的小灶，他就连一个钱也不用付。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凡是靠集体的钱财人人能享用的东西，个人一概不用付钱。如果你需要一件特殊的東西，或者满足一种特殊的需求，那就得自己付钱。”

“莫非这是我们俄国人吗？莫非这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吗？我听到了我们的俄国歌曲，他们说的是俄语。”--“对，你看见不远处的那条河，就是奥卡

河。这些人都是我们俄国人，要知道，跟你在一起的我，就是一个俄国人啊！”
--“这一切全是你做的？” --“这一切全是为了我做的，我是鼓励这样做的，我是鼓励干工作精益求精，不断完善的，但做这些的是她，我的姐姐。她是一名女工，而我光是享受。” --“将来所有的人都这样生活？” --“是的，”姐姐说，“那对于所有的人都永远是春天和夏天，永远欢乐无穷。不过我们只给你看了一天的工作当中，属于我的这半天的结尾和属于她的那半天的开头。我们再来看看两个月以后一个晚上的情景吧。”

(九)

百花凋谢，树叶枯萎飘零，景色日渐凄凉。“瞧，满眼看去叫人心烦，住在这儿问得发慌，”妹妹说道，“我不愿这样。” --“大厅空荡荡，田野上和花园里也没有人了，”姐姐说，“我这么安排是遵照女皇妹妹的旨意。” --“莫非宫殿真的走空了？” --“是啊，这儿又寒冷又潮湿，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这儿原来有两千人，现在只剩下一二十个喜爱标新立异的人，这一回他们要留在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瞧一瞧北方的秋景，他们觉得这另有一番情趣。过些时候就是冬天，这儿的人员总是在不断地更迭，冬游爱好者们会三五成群的前来，照冬季的游乐方式消磨几个冬日。”

“可是现在他们在哪儿呢？” --“在各个温暖宜人的地方。”姐姐说，“夏天这里活计多，气候好，大批形形色色的客人从南方涌入。我们上次去过的那所房子里，全是你们一伙俄国人。但也有许多房于是为招待客人建造的，还有一些房子是供主人和各族客人合住的，谁乐意，谁就可以加入这个群体。夏天你们接待大批客人，还有帮工，每年气候变坏的季节，你们自己也要到南方住上七八个月，去哪儿住按各人意愿。可是你们在南方也有个特别的地段，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到那边去。那个地段就叫新俄罗斯。” --“是敖德萨和赫尔松所在的地段吧？” --“这是你那个时代的老皇历了，而现在，你瞧，这就是新俄罗斯的所在地。”

新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时黑海北岸和亚速海沿岸一带的总称，包括敖德萨和赫尔松在内。

山上布满了花园，山与山之间是狭长的深谷和辽阔的平原。“这些山从前是光秃秃的岩石，”姐姐说，“现在给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山上各个花园之间长着一片片树林，树木特别高大。下面那潮湿的凹地是咖啡树种植场，上头有海枣树和无花果树。

葡萄园和甘蔗种植场混杂相间。田里也有小麦，不过水稻更多。” --“这到底是什么国度？” --“我们再往高处走一小会儿，你就看得见它的边界了。”在遥远的东北方有两条河流，它们汇合之处正是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站立的地点的正东边。她再朝南看，发现东南方有个又长又宽的海湾。南方有一片陆地向远处延伸开去，它夹在这个海湾和另一个狭长海湾之间，越往南扩展得越大。西面的狭长海湾构成了陆地的西部边界，它跟远处西北面的大海中间有一条窄窄的地峡。“我们是在沙漠的中央吧？”韦拉·巴夫洛夫娜好奇地问道。 --“不错，是在旧有的沙漠的中央。而现在，你可以看到，从北方，从东北方那条大河起，这整个地区已经变成一片最肥沃的地方，像大河以北的沿海一带那样富庶，沿海一带曾经很富庶，现在重又富庶起来，古人说它到处‘流奶与蜜’。你看，我们离这个耕作区的南部边界不很远，半岛上的山区仍旧是一片多沙的不毛之地，在你那个时代，整个半岛全是这样。你们俄国人年年都把沙漠的边界往南推移。

别的人在别的国家里干活，人人都有很多的居所和足够干的工作，又自由，又富有。是的，从东北的大河起，往南到半岛中部止，整个地区草木翠绿，鲜花遍地，也像北方一样，处处耸立着高大的建筑物，三里一个楼，四里一座屋，仿佛一个巨型棋盘上摆着无数硕大棋子。” --“我们下去看一座建筑物。”姐姐说道。

这里描写的是阿拉伯半岛，两条河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东南方那个又长又宽的海湾指波斯湾，西面的狭长海湾即红海，西北大海为地中海，窄窄的地峡是苏伊土地峡。

指阿拉伯沙漠。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章第八页。

又是一座通体透明的高大的房屋，不过它的圆柱呈白色。“柱子是铝做的，”姐姐说，“因为这儿天气热，白色的东西在阳光下吸热少些，铝比铸铁贵一点，可是用在这里更相宜。”他们还想出一个做法：离这座水晶宫四周很远的地方，竖起了一排排细细的、老高老高的杆子，杆头撑着一块白色的凉篷，高高地罩在整个宫殿和方圆半俄里的地面上。“凉篷上不时地喷水，”姐姐说，“你看，从每根柱子中都往上喷出小小的喷泉，喷得比凉篷还高，然后又像下雨似地撒落在四周，因此住在这儿挺凉快。你看，他们简直可以随意改变气温了。” --“如果有人偏爱热天和此地的灿烂的太阳呢？” --“你看，远处有那么多亭子和帐篷。每人都是可以按自己的心愿生活，我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那么，城市也是为那些喜欢生活在城市的人保存下来的罗？” --“这种人不很多。城市比从前少，差不多只是作为交际和货运的中心，全部位于良好的港口附近和其他的交通枢纽上，可是这些城市比从前更大、更为壮观了。人人都爱进城小住几天，换换口味。大部分城市居民经常地变化更迭，他们到那儿去是为了进行短期的劳动。” --“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常住城里呢？” --“那就常住好了，正像你们住在你们彼得堡、巴黎和伦敦一样，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谁会妨碍他们？每个人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不过绝大多数人，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都像我和我妹妹指给你看的那样生活，因为他们觉得那样较为愉快，较为有益。可是，进宫殿去吧，天色已经相当晚，该去瞧瞧他们了。”

“不，我首先想要知道这是怎么办到的。” --“什么？” --“就是那片不毛的沙漠地带怎样变成了良田沃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人每年都要在那儿度过三分之二的时光。” --“这是怎么办到的？这有什么费解的？这不是一年也不是十年之内办到的，我是逐步地把工作向前推进的。他们拥有很多大马力的机器，从东北大河两岸和西北大海沿岸运来粘土，把它跟沙子粘合在一起，并且开运河，进行灌溉，于是草木变得一片翠绿，空气中的湿度也增加了。他们一步一步地前进，一年前进几俄里，有时只前进一俄里，他们现在还是这样继续朝南方推进，这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只不过是学得聪明了，开始把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来为自己谋福利，而从前他们是人财两空，对自己毫无益处，而且简直还有危害。我的工作不是徒劳无益，我没有白白地教导他们。困难的只是让人们懂得什么事才算有益，在你那个时代，他们还是那样一群粗鲁的、残酷的、莽撞的野蛮人，可是我反复地教导他们，当他们渐渐理解以后，实行起来便不难了。你知道，我是一点都不会难为人家的。你也在照我的意思为我做一些事情，难道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当然没有。想想你的工场吧，难道你们拥有很多的资金？难道比别人资金多吗？” --

“不，我们有什么资金？” --“别人拥有的资金跟你们同样多，可是你的裁缝生活得比他们舒服十倍，生活乐趣比他们多二十倍，遇到的麻烦却比他们少一百倍。你自己证明了：即使在你那个时代，人们也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必须做到的只是能理智地考虑问题，妥善地安排，了解怎样使用资金更为有利。” --“对，对。这我知道。” --“再去稍微瞧一瞧，你早已明白的事情被人们开始理解以后不久，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十)

她们走进一所房子，又是那么一间极其宽敞的金碧辉煌的大厅。晚会开得自由欢畅，人人都十分尽兴，太阳落山已有三个小时了，正是娱乐的好时光。是什么东西把大厅照得通明？可哪里都看不见枝形烛台或吊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厅的圆屋顶上有一大块磨砂玻璃，光线是从那儿洒射出来的，当然会完全像阳光似的呈白色、明亮而又柔和，是啊，这是电灯。大厅里将近一千人，其实多容纳两倍的人也还是绰绰有余的。

“常常有这么多人，有客人来的时候，人数就更多。”光明美人说。--“那么这又是什么？难道不是舞会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普通的、平常的晚会？” --“当然。” --“可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简直是一个宫廷舞会，妇女的服饰非常奢华，是的，这是另一个时代，从衣服的式样也看得出来。有几位太太还穿着我们的服装，可她们这么穿这样服装分明是为了换换花样，为了逗乐。是的，她们在闹着玩，拿自己的衣服开心。其他的人穿着其他各式各样的服装，东方式的和南方式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全比我们的雅致。

不过占优势的衣服都近似于希腊妇女在雅典最注重美的时代所穿的：很轻巧，很宽松。

男子的衣服也是宽宽大大的，没有腰身，像是法衣、披风。这分明是他们平日在家穿的便服，这种服装多么朴素，美观！它是多么优雅地影影绰绰显出了体形，给人的动作增添了多少儒雅洒脱的风韵！还有那一百多名男女演员组成的乐队，特别是那合唱队，真棒！” --“是的，你们全欧洲不曾有过十名这样的歌手，而你仅仅在这一间大厅里就能找到足足一百名，而且其他每一间大厅也能找得出。这儿的生活方式不同，既有益于健康，同时又很高雅，因此人的胸部发育得更好，声音也更悦耳。”光明女皇说。但是乐队与合唱队的人经常更换着，一批人走了，另一批人来顶替他们，歌手去跳舞，舞蹈演员来唱歌。

广泛使用电灯照明在俄国是在二十世纪初。

他们举行晚会，平常的、普通的晚会，他们天天晚上这样娱乐和跳舞。可是我哪里见过娱乐起来劲头儿这么足的？但是他们怎么能没有这么一股子劲头儿呢？尽管我们不曾有过。他们一清早便于许许多多的活。谁若不是干活干得酣畅淋漓，他就不会调动起他的神经，去尽兴地体验娱乐时全部的欢快。现在，当平民百姓能够娱乐的时候，他们的娱乐比我们的更欢快、更活跃、更有朝气。不过我们的平民百姓没有钱娱乐，这儿的人却比我们富有。并且我们的平民百姓娱乐时总会受到不愉快的回忆的困扰，他们会回想起以往的简陋的居所和贫穷的生活，忆起种种灾祸和痛苦，他们对未来怀有的同样不祥的预感还使他们感到困惑不安。娱乐能使人暂时忘却穷困和哀愁，可是穷困和哀愁难道就真的能被全部遗忘了吗？难道荒漠上的沙石不会卷土重来？难道沼泽地的瘴气不会污染这一小块夹在荒漠和沼泽地之间的、空气清新的干净土地？这儿的人既没有关于穷困或哀愁的回忆，也没有对此的忧

虑。他们能回忆起的只有自觉自愿的自由劳动、富足生活、幸福和享受，他们对未来也是怀着同样的希望。多么鲜明的对比！还有，我们的劳动者的神经仅只是坚强，所以固然能够经受许多欢乐，却还是粗陋的，并不善于感受。

这儿的人呢，他们的神经坚强得像我们的劳动者，又发达和敏锐得像我们。在这些人身上，有着我们所没有的惟独强健的体格和体力劳动才能产生的对娱乐的精神准备，对娱乐的合理而强烈的渴望，这些都跟我们所具有的敏锐的感觉结合了起来。他们具有和我们同样的精神修养，同时又有着和劳动者同样强健的体格，因此他们的娱乐、他们的享受和激情当然要比我们的更富有朝气、更为强烈、更广阔开阔、更使人心说神怡了。幸运儿啊！

不，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欢乐，因为还没有那种能使人享有欢乐所必需的生活，也没有那种人。只有那样的人才能尽情欢乐，才能领略享受的全部乐趣！他们是长得何等强壮有力，何等标致文雅，他们的面貌又是何等生气勃勃，富于表情！他们都是幸运的美貌男女，他们劳动和享乐过着自由的生活，幸运儿们，幸运儿们！

他们中间有一半人正在大厅里嬉戏打闹，另一半在哪儿呢？“其他的人在哪儿？”光明女皇说，“他们无处不在。许多人在剧院，有的当演员，有的做乐师，剩下的就做观众，谁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些人在讲堂和博物馆里自娱，待在图书馆读书。也有人在花园的林阴道上，还有的人在自我的房里独自休息或者跟孩子们一起，但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在这儿呢？这是我的秘密。你在大厅中见过人们脸颊怎样滚烫发烧，眼睛怎样闪闪发亮。你看见他们时来时往。他们离开是由于我吸引了他们，这儿每个男女的房间都是我的栖身之所，在那些房间里，我的秘密是不会泄露出去的，门帘和华贵的地毯把声音都吸收了，所以那儿挺安静，那儿隐藏着秘密。他们所以返回是由于我叫他们从隐藏着我的秘密之国回到轻松的娱乐上来。是我统治着这个地方。

“我统治着这个地方。这儿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人们劳动是为我储备充沛的精力和鲜明的感受力，他们娱乐是准备迎接我的到来，或者是作为我到来后的休息。在这儿，我就是生活的目的，在这儿我就是全部的生活。”

（十一）

“我的女皇妹妹享有最高的生活幸福，”姐姐说，“但是你看，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幸福，个人可以享有自己所需要的幸福。在这儿，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在这儿，人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无拘无束的自由。

“我们先前指给你看的一切不会很快地充分发展起来，不会一下子变成你现在见到的样子。你预感到的前景要经过好几代人的更迭才能全部实现。不，无需经过好几代人：现在我的工作进展挺快，一年比一年更快，可是你毕竟还没有走进我妹妹的这个完美的国度。但你至少看见过它，你能知道未来。未来是光明的、美好的。告诉所有的人：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未来是光明美好的。爱它吧，向着它奔去，为它工作，使它尽快到来，使未来成为现实吧：你们使未来越早来临，你们的生活就会越发亮丽、温馨，会充满越多的欢乐和享受。奔向未来，为它工作，使它尽快来临，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吧。”

本节是根据作者的初稿译出的，出版时作为附录之一（见《PTO Denab》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四二页一三四八页），作者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这篇小说时，受审查条件的限制，写了另一节来代替此节，其译文见书末附录。

过了一年，新的工场已经完全安排就绪。新旧工场之间联系密切，还相互转让订货。

有时这家工场接活过多，于是另一家就替它来完成一部分。它们中间有一份经常来往的账目，它们资金数额是那么庞大，如果双方来往更为密切，便可以在涅瓦大街合开一个门市部。这又够让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梅察洛娃奔波张罗好一阵子的。虽然两家的女工关系密切，虽然她们彼此熟悉，虽然两家常常互访做客，虽然她们夏天常常一起去郊游，但两个不同的企业联营的主意毕竟是个崭新的想法，需要长时间地向她们解释才行。不过，在涅瓦大街设立门市部显而易见是有利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梅察洛娃为两个企业联营问题奔忙了几个月，终于达到了目的。于是涅瓦大街上出现一块新的招牌：Aubontravail.Magasin des Nouveautees 。

法语：精工时装店。

涅瓦大街的门市部开办以后，赢利明显地比从前增加了。门市部的售品十分走俏，它的市场并不在上层社会--怎么可能在上层社会呢--但毕竟也是些相当富裕的、也就是说能够经常照顾有利可图的生意的老主顾。

过了两三个月，门市部开始出现一些求知欲强的顾客，但是他们求知的态度有点儿不自然，连他们自己似乎也觉得很尴尬，他们渴求知识时抱有的想法，似乎不同于求知欲强的人渴求知识时通常伴随着的想法：“既然我关心你所关心的事，那么你大概会用友好的眼光来看我，并且尽量设法来点拨我的吧。”不，他们似乎有别的想法：“当然，你用怀疑的目光看我，竭力对我隐藏自己的尾巴，可你毕竟也骗不了我。”这样的顾客有那么两三个，每一个来过三四次。在他们的“渴求知识”中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约莫一个半月以后。基尔萨诺夫的一位似曾相识的同行来找他，东拉西扯地谈到种种的疑难病症，主要还是讲这位客人，当时奉行的一种疗效神奇的方法，这方法便是几天不给病人进食任何饮料：“因为各种疾病都是由于体液不良，而体液又是源源不断地从身体内分泌出来的，所以，如果杜绝了这些分泌物的来源，那么不良的体液必然会消耗殆尽，这样一来，病自然就会痊愈。”后来他又说他还要顺便把一项邀请通知基尔萨诺夫：一个有的人物久慕基尔萨诺夫的大名，希望跟他结识。基尔萨诺夫答应第二天就去看那有学问的人。

这事应大力肯定。据我的一位好友说，有个医生便是用这种方法治病的。现在这个医生已经奉行另一种方法，那恐怕是他十五年前采用“干涸法”治病以来的第五种方法了。——作者注

这个有教养的人，说得更准确些，应该称做有学问的要人，尽管他没有娶太太。

总之，这个有学问的要人确实是有学问的要人，因为当时，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已经是文明教化的时代。当时虽然还有些毫无知识的人，不过已为数极少，只有在那帮不能真正称之为要人（即使他们已娶了太太）的

人中间才碰得见。而在真正本意上的要人，即本身就是要人，因为是要人才被称做要人，并非因为有了太太才被称做要人--在这样的要人中间，找不到毫无知识的人：当时这些要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有学问的。

俄文中的“要人”又作丈夫解。

这位要人接待了基尔萨诺夫，当然是像有学问的要人接待自己愿意认识的客人时所应做的那样殷勤、有礼貌。他让了座，亲自把椅子挪近了一点，敬烟，恰到好处地恭维了几句，说他很高兴有机会认识“您，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因为他久闻“大名，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深知“您是我国医学界值得骄傲的杰出人物之一，而医学正是国家所迫切需要的事业”，等等。这番恭维话确实说得极为得体，尤其是他称呼了基尔萨诺夫的教名和父名--这就叫有教养，真是件宝！接着进行了一场有关医学的十分内行的谈话，最后才终于谈到了这次结识的目的，谈到那令人愉快的事情了。

“我对你有个请求，”有学问的要人在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知识渊博和礼貌周全以后，才说道，“劳驾，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尊夫人在涅瓦大街开设的是一家什么商店？”

“时装商店。”基尔萨诺夫说。

“可开商店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才是关键问题。”

“跟所有的那些专卖女装的普通时装商店目的是一样的。”

有学问的要人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了瞧客人，基尔萨诺夫也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了瞧有学问的要人。有学问的要人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着的时候，瞧出他热心结识的客人不够爽快洒脱，必须对他狠狠地使劲压一压才行。

“我必须奉告您，基尔萨诺夫先生（有学问的要人为什么突然忘记了客人的教名和父名啦？），外面尽是些有损于尊夫人的商店的传闻。

“这是很可能的，我们这儿的人喜欢造谣中伤。我妻子的商店办得有了一点成绩，也许就有人看着它眼红，这就是我给您的解释。但是我很想知道，究竟听到了什么有损于她的商店的传闻。关于时装商店倒是有这样的谣言，往往是说它成了情人幽会的场所。

是不是这样说的？这可纯粹是无稽之谈。”

有学问的要人又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了瞧基尔萨诺夫，他相信他的客人不仅不够爽快洒脱，简直是极不爽快洒脱。

“哪儿的话，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谁敢用这种无耻诽谤来侮辱尊夫人？你们两位要是背上嫌疑，当然比这要重大得多。再说，假如我所讲到的传闻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我就没有理由设法跟您认识了，因为正派对这类事从不关心。我希望跟您认识，却是由于我高度重视您的科学工作给国家带来的利益，我希望对您有所裨益，所以请允许我恳求您，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您要当心一些。社会，甚至可以说国家，都是很重视您这样的科学家的，因为科学的发达是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的第一位的要求，因此他们应该自重，还可以说得严重些，这是他们的义务，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

“根据我本人对自己的了解，我的一言一行并没有违背我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自重。”

有学问的要人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了瞧基尔萨诺夫，他看出他的客人不仅极不爽快洒脱，而且完全僵化了。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为什么两个有教养的人不能彼此敞开心扉呢，在内心深处，我自己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读起

普鲁东的著作，爱不释手。然而……”

普鲁东（一八一八—一八六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请容许我讲几句，免得我们中间留下误会。您说您‘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个‘也是’大概指的是我吧。您凭什么认为我是社会主义者？也许我根本不是。除了社会主义者，还有关税保护主义者，还有萨伊的信徒，还有拉乌的历史观的信徒，以及政治经济学中其他五花八门的许多派别的信徒。要把一个人归入到某一派的信徒，总得有什么根据吧。”

萨伊（一七六七—一八三二），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拉乌（一七九二—一八七〇），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我有根据把您基尔萨诺夫先生归为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知道尊夫人那家商店所实行的体制。”

“各个派别的信徒在严肃认真地讲话时，都认为可以实行这种体制。其中有些人--现在已经为数极少了--也攻击它，那是当他们和任何其他派别的信徒进行论战时感到有这种必要的话。然而他们也只是在进行论战时才去攻击它。在平和的、纯学术性的论述中，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著作家敢不承认它对社会是有利无弊的。我要是说得不对，就请您给我举出一个反证的例子，一个足矣。”

“基尔萨诺夫先生，我们来这里又不是为了进行学术辩论。您得同意，我没有闲工夫来干这个。基尔萨诺娃女士的商店具有危害性倾向，我劝她，尤其是劝您，要当心一些。”

“既然有害，就该查封，把我们送审。不过我很想知道，危害究竟在哪里？”

“随处可见。就从招牌来说吧。这 Au bon travail 是什么？简直就是革命口号。”

“这翻译过来是‘精工’的意思。一家时装商店向顾客承诺精益求精地完成订货，这里有什么革命的涵义？我不明白。”

“这几个字的涵义不是那样。意思是说，一切商店都必须这么组织，对工人阶级才有好处。‘travail’这个字本身，显然是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取过来的，这是个革命口号。”

那位“要人”实际上是“第三厅”的一个高级特务，认为“travail”（工作，劳动）这个字是暗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们的著名口号“droit de travail”（“工作权”或“劳动权”）。他猜得对。

“我想从法国人开始会耕地，追溯得更早一点，从他们开始狩猎的时候起，他们就已经是在从事某种劳作，那时不使用这个字就已经无法进行交谈了。这是一个古字，我担保它比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年长一千来岁。”

“但总而言之，何必在招牌上做出什么承诺呢？写上‘X记时装商店’就足够了。”

“写有各种词语的招牌，在涅瓦大街上多的是。‘Au pauvre Diable’啦，‘Al'Elegance’啦，难道还少吗？您费神在涅瓦大街走一趟，就都看到了。”

“我没有工夫跟您争辩。我请您换一块招牌，上面只写‘X记时装商店’。直截了当说，这实际上就是我的意思，您应该照办。”

“现在我不争辩，我只能说：这可以办到。不过，我虽然在您面前代我

妻子答应一定照办，我却还必须声明，这个变动会严重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损害是两方面的：第一，店名的任何变更都会极大地破坏商店的声誉，使一个商业企业火红的生意回落萧条下去。第二，我妻子跟我姓，我的姓是个俄罗斯姓，给时装商店冠上一个俄罗斯姓氏，简直是砸它的牌子。我妻子的经济利益必定受到严重损失。可是她能服从需要。”

旧俄时有许多商店在招牌上冠以外国姓氏，即使店主是俄国人。

有学问的要人带着一副深表同情的样子，沉思起来。

“贵店真是一个商业企业吗？这种看法值得注意。行政机关理应保护人们的经济利益，鼓励他们发展商业。可是您能够向我下保证，担保尊夫人的店铺是个商业企业吗？”

“我向您担保：是的，那是个商业企业。”

“请告诉我，怎样才可以减少尊夫人--令人感到遗憾--势必蒙受的经济损失呢？为了减轻这个无法避免的打击，我准备批准，甚至可以说，我会心悦诚服地批准一切可行的办法。但是您要明白，这块招牌是不能保留了。”

“我想出个办法来了。招牌上‘traval’这个字显得不妥当，应该用我妻子的名字来代替。这就是社会利益所要求的吧？”

“嗯。”

“我十分重视提出这项要求的重大理由，我认为可以满足这项要求，而且能够避免那两种巨大损害中的第二种--招牌上字尾带‘off’的店名使商店遭受的可怕打击。我妻子名叫韦拉。这个字可以译成法文‘foi’。假如只做必要的变动，保留下‘don’字，仅仅改动‘travail’这个字，那么新的招牌就是‘A la bonne foi’。本义是‘诚信商店’但在法文词语中甚至还带有保守的色彩，因为‘foi’的意思是‘韦拉’，那似乎是跟否定的倾向相对立的了。”

“韦拉”意为“虔信”、“信教”。

有学问的要人沉思着。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初看起来，您的愿望似乎是可行的，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

可是我此刻不想给您一个最终的答复，需要再考虑成熟一些。”

“我不嫌冒昧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想法吧：在平庸的人身上，‘当机立断’和‘深思熟虑’这两个方面兼而有之，当然不容易，但是我不怀疑我在生活中倒也碰见过一些人，他们的见解一下子就把问题的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形成一个完全正确而成熟的最终结论。这是多数行政人员具有才能。”

“我只向您要求几分钟工夫，”有学问的要人严肃地说，“我确实需要几分钟。”

在无言的沉默中过了几分钟。

“好，现在我考虑过问题的各个方面了，可以采纳您的折衷的办法。为了社会的利益，甚至还可以说，为了对社会秩序有利，我被迫不得不十分遗憾地让您的利益多少受些损害，这，您一定会谅解的。但是我同样希望您以公正的态度，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承认我愿意尽一切可能，在采取那个必要措施的时候，尽量通融。”

“请您相信，我也同样重视您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以及您尽量设法保护我们私人利益的一片苦心。”

“那么，让我们友好地分手吧，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我很高兴，因

为我准备充当国家的需要和私人利益之间的调停人，这主要是出自我对您的敬意，把您看作我国最值得受尊重的科学家之一，不但社会应该珍视你们，甚至还可以说，连政府也很敬重你们。”

有学问的要人跟他所敬重的科学家握手惜别。

后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和她丈夫有相当长的时间一想起就往往禁不住地感到可笑：涅瓦大街有几千块招牌，其中一块上面的“travail”一字给换成“foi”，再相应地改变一下形容同的性，而社会--或者说：社会秩序--居然就因此而转危为安了，实际上这决不是件可笑的事。这一次门市部总算很轻易地脱了身。这当然是真的。但是显而易见，它毕竟需要紧缩再紧缩，尽量做到不惹眼，今后至少有一个长时期，企业不必再想着有什么发展了，虽然它迫切要求不停步地前进。在未来的许多月份以内，或者还不止一年，他们可能碰到的最好的运气也不过是把事业能继续维持下去，别想有所扩充了。这当然叫人难过。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他们没有预料到吗？好在事情至少已经在受阻之前抢先发展到了这一步，其实阻力可能来得早得多。又好在出现的只是一种遏制性的阻力，而不是毁灭性的障碍，毁灭原也是意料中的事。

不用说，人家既然注意上了门市部，就不会轻易放过它。但在门市部里总是安安静静，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人人行为端正，除此之外，确实找不出什么来。因此他们也只停留在注意注意而已，可这一注意不要紧，结果是使门市部不得不动不动地停步在开始注意它的那个阶段上，用停步不前来换取继续生存。

但是这些麻烦事无论如何也没法摆脱，特别是，只要人家一旦想要找你的碴，而人家既然想要找碴，招牌就首当其冲了。

比方说，假定我想去涅瓦大街散散步，必定有人要想到：“他为什么去涅瓦大街散步？这意味着什么？”可是我不去涅瓦大街散步，那人因此大概又要想道：“从来没见过他在涅瓦大街散过步，这意味着什么？”您别以为我在说笑话，决不是笑话。您也别认为我用了个“大概”便表明我可能没有把握认为自己想得准对。不，其实我只是为了使语气缓和些才用“大概”的，我确实知道这个，我有证据。老实对您讲吧，这三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紧张地思考如何处理去不去涅瓦大街散步的问题。那么我就去散散步吧，虽然我根本不愿这样做。可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认定了一散步事情更糟。“从前他不散步，现在却散起步来，这意味着什么？”您得同意，这对我的名誉的损害更要大得多。如果一个人这么安分地过日子，除了他不散步（或者散步也一样，反正人家要找个题目来琢磨你并给自己的猜疑下个结论，这是极为方便的）这一点以外，就根本想不起来任何别的事情了。如果这样的人竟然还成为人家琢磨和猜疑的对象长达几年之久，那么妻子在涅瓦大街开店的基尔萨诺夫，更是绝对逃脱不了这种厄运了。

于是那位曾用“干涸法”治过病的医生不时地去拜访他，向他表示敬意，劝告他要镇静，劝告他要小心。这一切都说得亲切得体，而且不论是用“干涸法”治病的医生或者有学问的要人，一般的确都是好心好意地对他，要人们也的确又有学问又善良，处处与人为善，时时为人着想，决不愿意损害谁，欺压谁。

说实在的，他们既没有损害基尔萨诺夫，也没有欺压他。

这件事对工场的影响是，工场还继续存在着，当然没有发展，而是尽

量设法收缩，但是它毕竟还能维持下去，可见要人们的与人为善对工场的效果是好的，不是坏的，那的确是与人为善，甚至可以说，他们保护了工场，使它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不过事业现在虽然无法扩充，还是可以安排得越来越好的。当然，在这方面也要小心谨慎，免得明显的成功又会引起怀疑。当然，停止扩充必定会大大阻碍内部的发展，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扩充外部的规模和增加内部的改进措施，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但是事业毕竟见到了成效，尽管比在别的条件下产生的成效要慢得多。

在第二家工场创办以后三四年，第一家工场创办以后七年左右，这个事业的情况怎么样呢？有关这一点一位大约在此时期认识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姑娘在写给她的一位住在莫斯科的女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

十八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波洛佳娃的信

圣彼得堡，一八六一年八月十七日

亲爱的波莉娜：

不久以前我发现了一件新鲜事，我完全被它吸引住了，目前我自己正在十分热衷地干这件事，我想给你描写描写。我相信你也会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但主要的是，你自己也许有机会找到一件类似的事情去干。那可真是愉快啊，我的朋友。

我想给你描写的是一家缝纫工场，确切地说，是两家缝纫工场，这两家全是按照同一原则由一个妇女创办起来的，我两星期前才认识她，可已经跟她成了好朋友。现在我给她帮忙，条件就是她日后要帮我也创办一个同样的缝纫工场。这位太太叫韦拉·巴夫洛夫娜·基尔萨诺娃，还很年轻，人也好，性情开朗，跟我很合得来，就是说，她像你的地方，波莉娜，比像你那温顺的卡佳的地方要少：她是一位泼辣活跃的女士。我偶然听说了她的工场--他们只给我讲到一家工场--没有任何人的介绍，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便直接去见她，只说我对她的缝纫工场感兴趣，我们一见面就很谈得来，尤其因为我发现她丈夫基尔萨诺夫就是那个基尔萨诺夫医生，你记得吧，五年前他施予我那样大的恩惠。

卡佳，卡捷琳娜的小名。

韦拉·巴夫洛夫娜跟我谈了半个来小时，她看出我对这些事的确十分赞赏，便领我去看她自己的、由她亲自经管的那家工场（另一家办在这家之前，由她一个好友负责，那也是一位很好的年轻太太），我把我这初次参观的印象讲给你听吧。我的印象是那么新奇，当时我就写进了日记本。我早已不记日记了，可是最近由于出现了特殊的情况--过些时候我也许会告诉你的--我又恢复记了。我很庆幸当时记下了这些印象，不然的话现在会忘掉许多的，那些事当时令我惊叹不已，而今天，才过了两个星期，却已经显得平平常常了。那本来也是不值得那么惊异的。可是这件事越平常，我也越热中，因为它太美妙了。那么，波莉娜，我就开始摘录我的日记，同时再补充一些

后来才知道的细节。

照你的猜测，我看到的该是个什么缝纫工场呢？我们在正门口停下车来，韦拉·巴夫洛夫娜领我登上一座华丽的楼梯，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经常有侍者站立在一旁的很气派的楼梯。我们走上三楼，韦拉·巴夫洛夫娜拉了拉门铃，于是我就置身于一间大厅之中了，那儿有钢琴，家具相当好，简单说：从大厅的外观来看，仿佛我们进了一个每年开销四五千卢布的家庭住宅。“这是工场吗？这也是裁缝能用的房间吗？”--“不错，这是一间接待室兼用来开晚会。我们到裁缝的宿舍去转转，现在她们正在工作间，我们不会妨碍谁的。”

下面便是我走过那些房间时看见的情况，以及韦拉·巴夫洛夫娜向我做的解释：

工场包括三套房子，全在同一层楼上，房子之间有几道门相通，连成了一整套。原先这三套房子每年分别付租金七百、五百五和四百二十五卢布，共计付一千六百七十五卢布。但是根据一张为期五年的租约整套出租，房东同意给他们减到一千二百五十卢布。

工场总共二十一间房，其中两间很大，各有四扇窗，一间当接待室，另一间作饭厅。还有两间也很大，是工作间。其余的都是宿舍。我们走过六七间女工宿舍（我说的都是我初次参观的情形），这些房里的家具也很像样子，是红木或核桃木做的。一些房里有落地镜，另一些房里有漂亮的壁镜，还尽是些做工精致的扶手椅和沙发。各个房间的家具都不一样，几乎全是偶然碰到的廉价商品，陆续购置的。这些宿舍的外观，近似于我们在中级官吏家里--上了年纪的处长或者快要晋升处长的青年科长家里所看到的。比较大的房间各位三个女工，有一间甚至住了四个，其他的每间住两个。

我们走进工作间，我觉得在那儿干活的女工也穿戴得跟那些官吏的女儿、姐妹或年轻的妻子一样。有的穿着用普通丝织品缝制的连衣裙，其余的穿轻罗和薄纱。她们的面孔长得如此柔嫩，一看就知道生活富足。你可以想象到这一切叫我有多么惊奇。我们在工作间停留了好久，我立刻结识了几名女工，韦拉·巴夫洛夫娜向她们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她们的文化程度并不一般齐，有的张口讲话已经纯粹是有阶层的语言，像我们的大家闺秀似的诸熟文学，而且对历史、域外情况也相当了解，还懂得我们上层社会小姐们一般都掌握的知识，有两名女工甚至博学多识。其余的人进工场不太久，文化水平较低，不过你跟她们每个人一交谈，都会觉得这些姑娘是受过一定教育的。总之，女工文化程度的高低，跟她进场时间的长短成正比。

韦拉·巴夫洛夫娜工作忙，只能间或来看看我，我就跟女工们攀谈起来，这样一直谈到吃午饭。平日午饭是三道菜。那一天有菜粥、炖鱼和小牛肉，饭后又上了茶和咖啡。

午饭挺不错，我吃得很快，能吃上这样的午饭，我认为也算不得太苦。

你知道，我父亲至今还有一名好厨子呐。

这便是我初次参观的一般印象。人家对我说过，同时我自己也知道：我要去的地方是裁缝起居作息的工场，带我看的是裁缝的房间，我将见到的是一批裁缝，吃的是裁缝吃的饭菜。可事实上，我看到的并不是穷人的寒酸的居所，而是连成一片的套房，我遇见的女工都像中级官吏家或收入较少的地主家的小姐，我吃到的饭菜虽不丰盛，却也颇为可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可能呢？

我和韦拉·巴夫洛夫娜回到了她家，她和她丈夫向我解释说，这毫不稀奇。顺便说一句，当时基尔萨诺夫为了举例，在一张纸片上给我写下了一份小账目，它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我的日记本中，我可以抄给你看看。不过抄之前，我先还得说几句话。

富足取代了贫穷，整洁--简直带着几分奢侈--取代了肮脏，良好的教养取代了粗野。发生这些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裁缝的收入有了增加，另一方面是她们在支出上做到了最大的节约。

你知道她们为什么能获得较多的收入：她们干活靠的是自己出的本钱，她们自身就是老板，她们得到了本来该留给老板的那份利润。可是还不止于此，她们用自己的本钱为自己的利益干活时，原料和时间都节省得多：干得更快，花得却更少。

当然，她们在生活开支上也节省了好多。她们买东西都是大批量买，付现款，所以她们买来的东西比零买和赊购的便宜。她们挑选东西很细心又在行，还都咨询调查过，因此她们购买的各种东西不仅比穷人们一般买的便宜，而且质量也更好。

此外，有许多开支要不是大大减少，要不就是完全免掉了。比方说，你想想：每天走上两三俄里去商店采购，会多么费鞋和衣服。我给你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例子虽小，却能说明这方面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雨伞，你会因衣服被雨水淋坏蒙受不小损失。现在请听听韦拉·巴夫洛夫娜对我说的话吧。假定一把普通的粗布雨伞值两卢布。

工场住着二十五名裁缝。为每人买一把伞，共计花费五十卢布，谁若没伞，她的衣服所受损失还不止两卢布。不过她们都住在一块，每个裁缝只有在自己需要出去时才出门，因此，天气恶劣时是不会有许多人出门的。她们认为有五把伞足够用。这些伞都是优质的绸伞，每把值五卢布。雨伞总共用去二十五卢布，或者说，每个裁缝只出一卢布。你看，她们每个人却可用上好伞而不用次伞，可这项开支还省去一半，诸如此类的许多小事凑在一起，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对住房和伙食也都照此办理。比方说，我给你描写的那顿午饭，得花五卢布五十戈比或五卢布七十五戈比，面包在内，除了茶和咖啡之外。

吃饭的有三十七个人（不算我这个客人和韦拉·巴夫洛夫娜），固然其中有几个小孩。

五卢布七十五戈比分到三十七个人头上，每人还不到十六戈比，一个月不到五卢布。韦拉·巴夫洛夫娜说，假如一个人单独开伙，这些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除了买点儿面包和小摊上出售的那种难以下咽的食品。据韦拉·巴夫洛夫娜说，这样一顿午饭（不过做得不那么干净）在小饭铺里要卖四十银戈比，三十戈比的还要差得多。这中间的差别一目了然：一个小饭铺的老板准备二十或者不到二十人的饭菜，他自己要靠这笔进账过活，他得有房住，雇伙计。在这儿，这些多余的开支却几乎一笔勾销，或是少得多了。两位老太太--两个裁缝的亲属--的工钱就是付给炊事人员的全部开支。现在你该能明白我第一次去基尔萨诺夫家时他给我写下做例子的那份账目了。他写完以后对我说：

“当然，我不可能告诉您一个精确的数字，这是很难估算出来的，因为您知道，在每个商业企业、每家店铺、每所工场，它的各项收支之间都有其

各自的比例，就像每个家庭中各项开支的节约程度不同，各项开支之间的比例都有其自家的特点。我记下一些数字，只是为了举例而已。但是为了让这份账目更有说服力，我特意把数字压得偏低，低于我们的体制所拥有的实际效益，这只是跟绝大多数商业企业，跟绝大多数贫穷的小家庭的实际开支比较而言。

“一个商业企业从售货得到的收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基尔萨诺夫继续说，“一部分用于给工人发工资；第二部分用作企业中其余的开支：房租、照明、原料；第三部分是留给老板的利润。假定全部进款在这三部分中间是这样分配：工人的工资占进款的一半，其他开支占四分之一，余下的四分之一算利润。这就是说，如果工人得一百卢布，那么用于其他开支的便是五十卢布，留给老板的也是五十卢布。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体制下，工人该得多少。”基尔萨诺夫开始念他那张小纸片，上面写有数字：

她们应得的工钱.....一百卢布
她们自身是老板，因此她们又可以得到给老板的利润
.....五十卢布
她们的工作间就设在宿舍内，所以比单独租用一处工场要便宜；她们又节省原料。这两项在节约中就占去很大的比例，我估计占一半，可是我们假定它只占三分之一，她们就
又从原定的五十卢布开支中省下了.....
.....十六卢布六十七戈比
共计.....一六六卢布六十七戈比作为利润

“我们已经结算好了，”基尔萨诺夫继续说道，“我们的工人如果可以收入一百六十六卢布六十七戈比的话，在另一种体制下，她们却只能拿一百卢布。但是她们得到的还多呐：她们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她们干起活来便加倍努力，因此更有成效，速度也更快。假定只是一般努力、甚至不够努力时她们能做五件东西（在我们的例子中是五件衣服），现在她们就能做出六件。这个比例还太小，不过我们就假定如此吧。于是，别的企业挣到五卢布，我们的企业却挣了六卢布。

由于干活速度快和劲头儿大，收入增加了五分之一。一百六十六卢布六十七戈比的五分之一是三十三卢布三十三戈比，因此要另加.....三十三卢布三十三戈比
加上原有的.....一六六卢布六十七戈比
共计.....一百卢布

“所以，我们的工人收入比人家多了一倍。”基尔萨诺夫继续说，“现在再谈这笔收入是怎样使用的。她们拿到的钱比人家多一倍，对钱却会用得多。您知道，这“会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她们买东西都整批地买。假定这样可以便宜三分之一，某种东西，零买和赊购得花三卢布，她们只花两卢布就行。事实上她们所占的便宜还要多，我们拿住房作例子吧：如果把每个房间分片出租，那么，有两扇窗的房间共十七间，每间住三四个人，假定说总计五十五人；有三扇窗的房间是两间，每间住六人，共住十二人，有四扇窗的房间也是两间，每间住九人，共住十八人--总计三十人；再加上前面所说的住小房间的五十五人，整座住宅能容纳八十五人。每人每月付三个半卢布房租，全年就要付四十二卢布。这么说来，靠分片出租这些房子维持生计的小房东们，竟可以拿到三千五百七十卢布（ $42 \times 85 = 3570$ ）。而我们的工人租

这个住宅，才花一千二百五十卢布，几乎便宜三分之二。很多事都是如此，几乎所有的事都是如此。就是我说节省了一半，恐怕还没有说足那真正的比例，可是我也只假定节省了三分之一。还不仅如此，在这种生活制度之下，她们不需要开支许多，或者说，她们需要的东西比人家少得多，韦罗奇卡已经拿鞋子和衣服给您举了例子。如果她们所买东西的数量可以因此减省四分之一：人家需穿四双鞋子，她们只要三双就足够，或者说，她们穿三件衣服的时间顶得上人家穿四件那么久。这个比例又估算得太小，不过请看从这些比例中会得出什么结果吧：

由于采购时善于计算，她们买到的东西能便宜三分之一，就是说，假定人家买三件东西得付三卢布，她们却只付两卢布。但是在我们的体制之下，这三件东西至少能当人家的四件用。这就是说，我们的裁缝花两百卢布能买到的东西，在别的体制下的人至少要花三百卢布，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体制下给她们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人家至少要用四百卢布才能得到.....四百卢布

“请把一个每年花一千卢布的家庭跟一个花四千卢布的同样的家庭的生活做个比较，您会发现二者大不相同，对不对？”基尔萨诺夫继续说，“在我们的体制下也是完全同样的比例，即使不是更大些的话：收入比人家多一倍，而使用这笔收入时又可得到双倍的效益。您发现我们的裁缝完全不像通常体制下的裁缝所过的生活，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呢？”

这就是我看到的奇迹，我的朋友波莉娜，你瞧，它给解释得有多么简单。现在我对它已经很习惯，我倒是对自己当时的惊异感到奇怪了，我竟没有料到我将要得到的一切正跟我曾经见到的一模一样。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有可能做我现在准备做的事：创办一个采用这种体制的缝纫工场或者别样的工场。这是件很愉快的事，波莉娜。

你的卡·波洛佐娃

我完全忘了谈另一家工场--暂且如此，下次再谈。现在我只说一点：老的缝纫工场发展更完善，所以各方面都超过了我给你描写的这一家。在制度的细节上，两者之间有许多差别，因为一切都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

波洛佐娃在给她那位女友的信中说，她感激韦拉·巴夫洛夫娜丈夫给予她的许多恩惠。为了解释这一点，必须说说她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波洛佐夫是一名退役骑兵大尉或上尉。在职期间，他依照那旧时代的习俗，花天酒地，把一个相当大的祖传庄园挥霍掉了。挥霍完毕，他才死心塌地，辞职赋闲，打算重起炉灶，置份产业。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点积蓄归总起来，发现还有一万纸卢布——当时通用纸币——于是开始用这笔钱去做小宗粮食生意，搞了各种各样小型的承包业务，只要他力所能及，资金够用，任何有利可图的事他都不放过。过了十来年，他的资本就很可观了。他名声不错，被公认是一位稳健而机灵的人，又有官衔，还是当地的望族，现在他

完全可以在他所经商的那两个省份中，选择一位中意的富商之女做未婚妻了，于是他郑重认真地选中了一位拥有五十万（还是纸币）陪嫁的姑娘。当时他四十来岁，那还是我们见到他的女儿跟韦拉·巴夫洛夫娜成为好友之前二十多年的事。有这样的一笔巨款加到了他原先的资产上面去，他就进一步大规模地拓展他的事业，又过了十来年，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当时开始用银币计算）。这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她习惯了外省生活，在世时一直不让他搬往彼得堡。现在他终于迁居彼得堡来了，他的事业也发展得更快，又经过了十来年，人家估计他拥有三四百万了。姑娘们和寡妇们，年轻的、年老的，纷纷向他献殷勤，他却无意续弦，部分的原因是他对亡妻矢志不渝的感情，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不愿给他的爱女卡佳找一个后母。

波洛佐夫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他肯干包税这一行，那他的家财早就不止三四百万，而是上千万了，可他厌恶这一行，认为只有一般货物的承包和供货才是正经业务。

他的富豪朋友嘲笑他看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并没有说错。他虽然错了，还是一再重复自己的意见道：“我只做生意，决不愿靠掠夺发横财。”但是在他女儿跟韦拉·巴夫洛夫娜结识以前一年或一年半，却出现了一个极为明显的证据，证明他的商业跟包税很少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他自以为两者差别很大。他大批承包粗麻布或是粮食，或是制靴用的皮革——我不太清楚——可是由于他的岁数、一帆风顺的经历和日益增长的威望，他一年比一年更固执和傲慢，他跟一位要人吵翻了，他发火，骂人，结果很糟糕。过了一个星期，人家对他说：“你就服个软吧。”——“我不服。”——“那你会破产的。”——“破产就破产，我不愿服软。”过了一个月，他们还对他这么说，他的回答依然如故。他服软倒是没有服软，破产可真是破产了。他的货物被认为不合格，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过错或不良的企图被发现了，于是他那三四百万全部不翼而飞，波洛佐夫到六十岁时成了穷人。那是说，跟不久以前相比，他是一个穷人。假如就生活而言，不去跟以前做比较的话，他过得还是很不错的：他在一家硬脂工厂里留有股份，他并没气馁，做了这家工厂的厂长，得到了很优厚的薪俸。此外，由于某种运气，他还保全下好几万卢布。如果他能在十五年或者十年以前拥有这样一些余款，也就足够他重新振作，发展事业，再攀高峰了。可是波洛佐夫已年逾六十，攀登起来会有困难，他认为再做这方面的尝试为时已晚，力不从心。现在他只想赶快盘出工厂，因为工厂的股票几乎没有收益，信用和业务也难以改进。他的判断是明智的，他及时地向其他的大股东解释说，快快盘掉工厂，这是挽回在股票上损失的资金的唯一办法。他还想到了要安排女儿出嫁，但主要的是盘掉工厂，把所有的资金都兑换成当时最为流行的五厘息的证券，安度晚年，追忆昔日的辉煌，即使失掉了这昔日的辉煌，他也依然精神矍铄，乐观而坚强。

二

卡佳的父亲疼女儿，没把她交给贵族气派太重的家庭女教师，怕她们

把姑娘管得太死，他反对束腰，反对矫正各种各样的姿势等等；卡佳十五岁时，他甚至同意可以不用英国女教师，法国女教师。这样卡佳就完全不受折腾了。她在家里有充分的自由，当时对她来说，所谓自由就是没有人妨碍她读书和幻想。她的女友不多，只有两三个最知心的，求婚者却不计其数，因为她是波洛佐夫的独生女啊，说来都吓人，她拥有四百万家产！

但是卡佳只是读书幻想，叫求婚者失望不已。卡佳已经十七岁，她还是读书啊，幻想啊，也没恋爱，可是她突然地开始瘦下去，脸色苍白，终于病倒了。

三

基尔萨诺夫虽然没有开业行医，可是他认为自己不该拒绝参加会诊。而这个时期，也就是他当了教授一年以后，同韦拉·巴夫洛夫娜结婚之前一年，彼得堡的那些开业名医就开始多次邀请他去参加会诊。原因有两个。第一，在世上确有个克劳德·贝尔纳，住在巴黎。有一位名医不知何故竟怀着研究学问的目的到了巴黎，亲眼见到了克劳德·贝尔纳——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克劳德·贝尔纳。他向这个克劳德·贝尔纳做了自我介绍，从官衔、职称、得过的勋章和他给医过病的知名人士都一一谈到。克劳德·贝尔纳听他介绍了不到半小时，就说道：“您到巴黎来研究医学真是白费工夫，您完全没有必要从彼得堡来这里。”那位名医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工作的鉴定书，回彼得堡后经常提到克劳德·贝尔纳的名字，一昼夜不下十次之多，并且至少有五次要在名字前面加上“我那位博学的朋友”或者“我那位有名望的科学同行”。从此以后，人们怎能不邀请基尔萨诺夫参加会诊呢？不能不请。第二个原因就更为重要了：所有的医学名人都看到基尔萨诺夫不会去抢他们出诊的机会，不仅不会，即使强求他，他也不接受。谁都知道，在开业名医中有这样一种风习：假如一位名医诊断出某个病人由于命运的恶意拨弄，患了不治之症，无论是矿泉水还是外国的疗养地都无济于事，他已在劫难逃，那么就该把这病人推给别的医生，只要你接受，那名医说不定情愿自己给病人来出钱呢。那些想推出病人的名医找到基尔萨诺夫的头上，他也很少接受，经常总是介绍给自己开业的朋友，而他自己只看一些从医学方面来说最有趣的病例。怎么能不邀请这样一位同行来会诊呢？连克劳德·贝尔纳都知道他，而他又不会抢别人的机会。

百万富翁波洛佐夫请的就是医界泰斗之一，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病危时，会诊一直都是请名医参加。最后，病情恶化，名医们只好下决心邀请基尔萨诺夫。在名医们看来，这确实是个难题：病人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体力却日渐衰竭。必须找出病来。

主治医师想出了一个“atrophia nervorum”——“神经营养中断症”。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这样的病症，如果真有，那么就是我也能明白它必定是不治之症。如果明知无法治却偏得治，那就让基尔萨诺夫或者他的朋友中那些不管不顾的毛头小伙子去治吧。

于是又举行了一次有基尔萨诺夫参加的会诊。他们检查病人，还进行

盘问。病人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回答。可是基尔萨诺夫刚听了几句便停了下来，只是在一旁观看名医们对她的检查和盘问。当他们完成了此种场合的礼仪要求后，自己已累得筋疲力尽，病人也被折磨得苦不堪言，这才问基尔萨诺夫：“您认为怎样，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他答道：“我还没有好好地检查过病人。我要留下来，这个病例很有意思。如果还需要再进行一次会诊，我会告诉卡尔·费多雷奇的。”卡尔·费多雷奇就是那位主治医生，他为可以从这个“atrophia nervorum”中脱身，而喜形于色了。

大家都走了，基尔萨诺夫坐到了病人的床边。病人略含讥讽地微微一笑。

“可惜我跟您不熟，”他开始说，“一个医生需要信任，我也许能够得到您的信任。”

他们都不了解您的病，治您的病需要一点灵气。听听您的胸部，给您些药水，都没有用处。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弄清您的情况。跟您一起考虑出个什么办法来。您可以在这方面帮帮我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愿跟我谈话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大概是想叫我走开吧。我只求您让我待十分钟。要是过十分钟后您还像现在一样，认为我待在这儿也无济于事，那我就走开。您知道吗？您只是忧愁，没有什么大毛病。您知道吗？如果您这种精神状态持续下去的话，再过两三个星期，也许不用两三个星期，您就没救了。也许连两个星期您也活不到了。现在您还没有肺病，可是肺病眼看不远了，您年轻轻的，又是处在这种条件下，肺病发展得会非常之快，只要几天就能丧命。”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回答，您依然无动于衷，可见我的话对您并不新鲜。您不回答就等于默认。”

您知道，任何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他会跟您父亲去说。要是我跟您父亲谈谈倒有可能挽救您，不过如果您认为不妥，我就不这样做。为什么？我遵循的原则是：决不违反一个人的意愿去为他做任何事。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要是您不愿意我去了解使您陷人这种险境的原因，我就不去了解。即便您说您想死，我也只是请求您给我解释一下，您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即使我觉得您的原因不能成立，我也还是没有权利来干涉您。如果我觉得您的原因能够成立，我就应该而且准备帮助您。我准备给您毒药。

我担保了这些条件，再请求您把病因告诉我。”

病人默不作声。

“您既然不愿意回答，我也没有权利追问了。但是，我可以请您容许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吗？那对于增进我们彼此的信任会有些帮助。可以吗？谢谢您。不论是什么原因，您总会很痛苦的吧？我也同样，我狂热地爱着一个女人，可她甚至都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我爱她。您同情我吗？”

病人还是默不作声，却略带伤感地微微一笑。

“您默不作声，可是您掩饰不住我的这几句话已经比原先的那些话多少引起了您的一点注意，这就够了。我看出您痛苦的原因是跟我一样的。您是愿意死吗？我很了解这点。不过害肺病而死拖的时间长，太痛苦。我准备帮助您死，如果我不在别的方面帮助您的话。我说过我准备给您毒药，一种

最好的毒药，吃了能死得快，毫不痛苦。您愿不愿意在这项条件下给我提供一个了解您的真实处境的办法，您是否真像您感觉的那样走投无路？”

“您不骗人吗？”病人终于说话了。

“您仔细瞧瞧我的眼睛，就会看出我不会骗人。”

病人迟疑了一会。

“不行，我对您毕竟了解太少了。”

“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说使您感到痛苦的那种感情是十分美好的感情。我还不会这样说。您父亲知道您的感情吗？请您记住：没有您的许可，我不会跟他谈这个的。”

“他不知道。”

“他疼爱您吗？”

“嗯。”

“您猜我现在要对您讲些什么？您说他疼爱您。我听说他是个明白人。您根据什么认为坦白地告诉他您的感情是徒劳无益的，认为他就不会同意呢？我认为，如果障碍只在于您的心上人生活清贫，您是可以解除顾虑试着去说服您父亲，求得他同意。这表明您认为您父亲对他的印象极坏，所以您在他面前绝口不提，不可能再有别的原因了。对吗？”

病人又默不作声了。

“看来我没有错。现在我怎么想呢？您父亲这个人很有生活经验，他会看人，您却没有经验。假如他觉得某人坏，您觉得好，那么多半是您看错了，而不是他。您看，我应该这么想。您要知道我为什么对您讲叫您不快的话吗？我这就告诉您。您听了我的话可能会生气，恨我，但您还是会对自己说：他想什么，就说什么，心口一致，他不装腔作势，不愿欺哄我。我会赢得您的信任。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对吗？”

病人又迟疑起来：不知回答还是不回答。

“您是个怪人，大夫。”她终于说道。

“不，怪是不怪，就是不像骗子。我怎么想的，就照直说出来。不过那只是我的猜测，也许是我错了。您给我一个机会查问查问。请把您那喜欢的人的名字告诉我，然后我就跟您父亲谈一谈，只要您同意。”

“您对他能说什么？”

“他熟悉那人吗？”

“嗯。”

“既然这样，我就对他说，请他同意您的婚事，不过有个条件，别马上确定婚期，过两三个月再说，好让您有时间冷静地考虑考虑，您父亲的看法是否正确。”

“他不会同意的。”

“多半会同意的。如果不同意，我再照我说过的那样来帮助您。”

基尔萨诺夫就这样说了半天，终于使病人把那人的名字告诉了他，而且准许他跟父亲去谈。可是说服父亲比说服她更困难。波洛佐夫听说他女儿体力衰弱是由爱情无望所致，感到很惊异。等到他听到她爱上的那人的名字，就更惊异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与其嫁他还真不如死了好。她若死掉，这无论对她或对我，痛苦都会更小些。”事情非常难办，特别是当基尔萨诺夫听完波洛佐夫的理由以后，发现真理果然是在老人一边，不在女儿一边。

四

成百的求婚者紧紧地盯着这笔巨额财产的女继承人，他们聚集在波洛佐夫的餐桌旁和晚会上，那伙人身份令人生疑，那优雅的外表也令人生疑。他们还充斥在所有类似波洛佐夫之流的富豪的客厅里。这些富豪超越了自己出身的那个相当体面，却并非上流社会的圈子，而他们在同样相当体面的真正的上流社会中，既无亲属关系，又无熟人往来，却变成了那些外表极不体面、更不必说内在品行的花花恶少和纨绔子弟的豢养者。因此，当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的追求者中间出现了一个风度翩翩的真正的上流社会人物时，她自然对他就发生了兴趣：他的举止比所有其余的人都高雅得多，谈吐也比他们聪明得多，有趣得多。做父亲的早已发觉她对那人格外垂青，作为一个干练、果断和坚强的人，他一发觉立刻就向女儿说破：“卡佳，我的孩子，索洛夫卓夫在向你大献殷勤。你得提防他，他是个大坏蛋，冷酷无情的家伙。你跟他结合可就倒大霉了，我宁愿看见你死，也不愿看见你嫁给他，死了无论对我还是对你倒好受些。”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敬爱父亲，习惯于尊重他的意见。他从没限制过她的自由，她知道他说这话完全出于爱她，而主要的是，按她的性格，她首先考虑那些疼爱她的人的意愿，而不是她自己的任性想法，她喜欢对自己亲近的人说：“您怎么想，我就怎么做。”于是她回答父亲说：“我喜欢索洛夫卓夫，不过假如您认为我最好疏远他，我一定做到。”当然，如果她真爱他，她是做不到的，况且，按她的性格，她从不撒谎，那么她也就不会这样说了。可是当时她对索洛夫卓夫的感情还不很强烈，几乎还根本不存在，他只不过比别人多引起她的一点兴趣罢了。她对他开始冷淡了。一切本来可以十分顺利地解决了，但她父亲性情急躁，做得过火了，虽然只是稍微有点过火，可这对于机灵的索洛夫卓夫已经足矣。他看出他必须扮演一个自我牺牲者的角色。找个什么引子来表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呢？碰巧有一回波洛佐夫对他说了句刻薄话，索洛夫卓夫脸上露出自尊和悲伤的神情，跟他告辞离去，从此不再露面。过了一个星期，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接到了他的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异常谦恭的信，意思是说他从未指望过她的回报，对他来说，只要能偶尔见见她——甚至不跟她说话，光是见一见——他便够幸福的了，他说现在他连这份幸福也舍弃了。但他毕竟也还是幸福的，可也很不幸，等等。他没有提任何的要求或希望，甚至没有请她回信。这样的信源源不断地寄来，终于奏效了。

然而并未很快生效。在与索洛夫卓夫疏远后的初期，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丝毫不感到难过，也不是满腹心事的样子，那以前她已经对他挺冷淡，而且很平静地接受了父亲的劝告，在提防他了。因此，过了两个来月，当她开始愁容满面时，他父亲怎么能够想到是那个索洛夫卓夫捣的鬼，他早已把这个人忘掉了。“你好像有点不快活，卡佳。”——“不，我挺好，没什么。”过了一两个星期，老人甚至问她：“你不是生病了吧，卡佳？”——“不，挺好的。”再过了两个来星期，老人索性说道：“你需要找医生看看，卡佳。”卡佳开始就医，老人完全放心了，因为医生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的症状，只不过是身体虚弱，有着某种程度的精力衰竭而已，他用十分充分的理由，证明

那个冬季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的生活方式易于导致人疲惫困倦，每天晚上会要开到两三点钟，甚至经常到五点才散。这种精力衰竭的现象就会消失的。但是它没有消失，反而加剧了。

为什么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一点不向父亲透露呢？她相信这是徒劳无益的：当时父亲对她说得那样坚决，他是不讲空话的。他不喜欢在涉及人们的问题时发表模棱两可的意见。他决不会同意她跟一个他认为是坏蛋的人结婚。

于是，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一面阅读索洛夫卓夫的谦恭绝望的来信，一边幻想这，幻想那，读了这么半年的信，差不多就快要得肺病了。而做父亲的从她的任何一句话里，都觉察不出病因出自他处理欠妥的那件事情，因为女儿对他还像过去那样的温柔。

“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吗？”“没有什么不如意的，爸爸。”——“你没有什么苦恼吗？”——“没有，爸爸。”她显然没有什么苦恼，就是打不起精神来，这是由于虚弱，由于生病的缘故。医生也说她有病。那么病因呢？当医生认为病势不大要紧了，于是骂骂跳舞和紧身衣也就心安理得了，等到他发觉病情危急时，这才抓住一个“神经营养中断症”——atrophia nervorum，当作救命稻草。

五

虽然开业名医们同意波洛佐娃小姐得的是 atrophia nervorum，病势所以日渐严重是因为那违反她的爱好沉思幻想的性格、并伤了其元气的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但基尔萨诺夫无需对病人多作检查，便看出她体力衰弱是由于某种精神上的原因引起的。主治医师在会诊以前对他讲明了病人各方面的情况：她在家没有什么苦恼，父女关系融洽。但是父亲不知道她心烦意乱的原因，因为主治医师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过，既然姑娘能够这么久地掩盖她内心的烦乱，而且一直不给父亲任何机会猜到她心烦的原因，那么可见她的性格是十分坚强的。从会诊时她那从容不迫的回答的语调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她的坚强性格。她没有丝毫的怒意，她坚定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基尔萨诺夫看到这类姑娘值得去关心，他不能帮她一把吗？他认为他必须介入。当然，即使没有他，事情反正总是会真相大白的，但到那一天不就太晚了吗？肺病临近眼前了，真得了肺病，再怎样关心也无济于事了。

于是他费尽唇舌，跟病人谈了两个来小时，总算及时打消了她的疑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并得到她的许可，去跟她父亲商谈此事。

老人从基尔萨诺夫口中听到女儿的病因是由于她爱上了索洛夫卓夫，感到很惊异。

这是怎么啦？当初卡佳那样冷静地接受了疏远他的劝告，以后他不来了，她也仍然无所谓。她怎么会爱他爱到不要命？况且一般地说，人能够为爱情而死吗？在一个一向极端实际地过日子、一向用冷静的理智态度对待一切的人看来，这样的狂热似乎不可能是真实的。基尔萨诺夫跟他磨烦了好半天，他还是说：“小孩子的天真烂漫罢了，她难过一阵子就会忘掉的。”基

尔萨诺夫再三跟他解释，最后才使他明白了：正因为她还是小孩子，她才不会忘掉，而会去送命的。波洛佐夫给说动了，信服了，可是他没有让步，握起拳头往桌上使劲一敲，坚定不移地说：“死就死，让她死去！死总比活着受罪强。”

“这样我好受些，她也好受些！”这正是他半年前对女儿讲过的话。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认为跟他去谈徒劳无益，她没有说错。

“您为什么这么固执？我非常相信他不是个好人，可是难道他真的坏到这般地步，跟他共同生活不如死了好？”

“他真是那样坏，他冷酷无情。我这女儿善良，文雅，他却是个下流的淫棍。”接着，波洛佐夫便开始描写起索洛夫卓夫来了，他描写得真实可信，基尔萨诺夫找不出话来反驳了。确实，他怎么能不同意波洛佐夫的看法呢？原来索洛夫卓夫就是那个约翰——当年在斯托列什尼科夫求婚之前，跟谢尔日以及朱丽在一次看完歌剧后共进晚餐的那个约翰。这是完全正确的：一个正派姑娘死了都远比嫁给这号人强。他的卑鄙下流会玷污那正派女子，使她学坏，变得麻木冷酷，她远不如死了好。

基尔萨诺夫沉思了几分钟。

“不，”随后他说，“我为什么果真受了您的迷惑呢？正因为他太坏了，这件事才不会有危险。只要您给她时间，让她静下心来仔细地观察，她不可能看不出来。”他开始坚持向波洛佐夫推行他的计划，他当初对波洛佐夫的女儿说出这个计划时，还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未必靠得住的推测：假设她所爱的人果真很坏，她自己也会拒绝他。现在他对这一点已经确信无疑了，因为她所爱的人确实很坏。

“如果冷静地看待婚姻，婚姻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妻子不幸福，为什么不能跟丈夫离婚呢？可是我不会对您这样说的。您认为离婚是不能容许的，您女儿也受的是这种观念的教育，您和她都以为离婚是一种真正无法弥补的损失，并且，她还来不及转变观念时，她就要叫这个人给折磨死了，这样死比生肺病而死更糟。不过我们得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为什么您不信赖您女儿的理智？她不是疯子吧？永远要依靠理智，只要您让理智自由活动，它决不会对一件正当的事情做出错误的判断。您自己不该束缚您女儿的理智。还理智自由吧，如果真理在您这一边的话，理智一定会引导她到您这边来，激情遇到障碍会使人晕头转向，排除了障碍，您的女儿才能理智起来。给她选择爱或不爱的自由，她就会看出这个人是否值得她爱了。让他来当回未婚夫吧，过些时候，她自己就会不要他的。”

这种看待事情的方法对于波洛佐夫来说是太新奇了。他毫不客气地回答道，这是胡说，他不会相信的，他深谙世事，见过人们中间的许许多多轻率行事的例子，因此他不敢指望人们的理智，更何况指望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的理智，那就更加可笑了。基尔萨诺夫白费气力地反驳说，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轻率行事：或者正在火头上，凭着一时的冲动，或者当一个人没有自由，被阻力刺激产生逆反心理的时候。这类见解在波洛佐夫看来完全莫名其妙。“她是疯子。听任这样一个娃娃去掌管自己的命运，真荒唐，让她死了更好些。”——他无论如何不肯放弃这些看法。

当然，一个陷入迷误的人，不管他的思想多么固执，假如另外一个更有修养，对事情看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的人坚持进行努力，争取使他从迷误中走出来，那么迷误也就不会存在下去了。这是对的。不过同他据理力

争要花费多少时间啊？今天的交谈当然也不会毫无结果，尽管现在还看不出它对波洛佐夫有什么影响，老人总会考虑基尔萨诺夫说的那些话的。这是必然的。假如继续跟他这么谈下去，他便会改变主意了。可是他自恃有经验，认为自己不会出差错，他坚强、固执。用言语来说服他无疑是可能的，尽管不会很快生效。但是任何拖延都有危险，长期拖延也许会招致死亡。而采用按部就班的据理力争的方法之后，长期拖延是不可避免的了。

必须采取激进的办法。那自然要冒风险，但是使用激进的办法只是冒点风险而已，否则却必定会招致死亡。其实，这里面的风险完全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因为这些人对生活规律的了解不如基尔萨诺夫透彻。风险并不大，但是不能轻视。全部彩票中只有一张空票。抽上它可能性不大，可是万一抽上了呢？谁要去冒险，就该做好准备：即使拍上空票，眼睛眨都不眨。基尔萨诺夫见过那位姑娘泰然自若、不动声色的坚强态度，并且因此而抱有信心。但是他有权让她冒险吗？当然有权。现在对她来说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不致因此事毁掉身体，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能性很快死掉。如果采用激进的办法，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于她有害。就让她抽个彩冒冒险吧，那看起来较为可怕，因为结局来得快，实际上的危险要小得多。

“好，”基尔萨诺夫说，“既然您不愿意采用您能掌握的办法治好她，我就用我的办法来治。明天我再召集一次会诊。”

他回到病人身边，告诉她她父亲挺顽固，比他预料的还要顽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行动起来对付他。

“不行，无济于事。”病人伤心地说。

“您确信这点吗？”

“嗯。”

“您准备死吗？”

“嗯。”

“要是我决定让您冒险去死，怎么样？我为了赢得您的信任，曾对您顺便提到过，我说凡是您需要做的，我都会同意；现在我再重申一遍。要是不得不给您一包毒药，怎么样？”

“我早已看出我只有一死了之，还剩下几天的时间了。”

“如果明天早上就死呢？”

“那更好。”她非常镇静地说。

假如只剩下一个法子才能有救——以一死的决心来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那么这个精神支柱差不多总能管用。如果您说：“你得让步，不然我就死掉。”那么差不多对方总会让步的。不过您要知道，人不应当拿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当儿戏。另外，也决不能丢自己的面子，如果对方不肯让步，那您也非死不可。他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计划，从这些谈论看出，他的计划已经有了眉目。

六

假如在别的情况下，基尔萨诺夫当然连想也不会想到采取这类冒险办

法的。最简单不过的是：把姑娘从家里带走，让她跟她的心上人结合。可是这一回，由于姑娘的传统观念加上她所爱的人的特点，事情变得错综复杂了。在她的观念中妻子是不能和丈夫离异的，因此即使她已经看出跟他共同生活只有痛苦，她也要死抱住这个恶棍不放。让她跟他结合比杀死她更糟。因此只剩下一个办法：要不杀死她，要不给她一个醒悟的机会。

第二天召集了一次会诊，参加的都是上层开业医生中名望最高的人士，竟然包括了五位极重要的人士，否则怎么能影响波洛佐夫呢？作出的裁决必须是他认为无法驳回的。

基尔萨诺夫讲了话，他们煞有介事地听着，又煞有介事地随声附和着。他们不附和也不行，因为诸位都记得，世上有个克劳德·贝尔纳，住在巴黎，除此以外，基尔萨诺夫讲的话又是那么高深莫测——叫这些毛头小伙子见鬼去吧！——他们连听都听不明白，怎能不随声附和呢？

基尔萨诺夫说，他仔细地检查过病人，他完全同意卡尔·费多雷奇的话：这是不治之症。而这种病的临终挣扎是挺痛苦的，总之，病人多活一个小时，就多受一个小时的罪。所以他认为参加会诊的医生有责任作出决定，应以仁爱为怀，使用大剂量的吗啡终止病人的痛苦，她也可以从此长眠不醒了。讲了这样一席话后，他才主持会诊，又对病人做了一次检查，以便确定采纳还是否决他这意见。医生们一边检查，一边不知所措地眨巴着眼睛听基尔萨诺夫那些犹如冰雹袭来般的莫测高深的解释，他们回到原来会诊的那间远离病人卧室的大厅里，决定给病人服用致命剂量的吗啡终止病人的痛苦。

他们作出决定之后，基尔萨诺夫拉铃召唤仆人，要他请波洛佐夫到会诊的大厅来。

波洛佐夫走了进来。神医中最关键的人物用彬彬有礼、悲凉而又略带庄严的词句、低沉而又稍显高亢的声调，向他宣布了医生们的决议。

这对于波洛佐夫无异于当头一棒。尽管他预料女儿死期已临近，但并不知道是否马上到来，现在他却听说再过半个小时她就不在人间了——这两件事可完全不同啊。基尔萨诺夫紧张地注视着波洛佐夫，他完全相信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然而这事毕竟够刺激神经的。老人惊呆了，沉默了两分钟才说：“不行！她快叫我这顽固老头害死啦！我什么都同意！她能好吗？”——“当然。”基尔萨诺夫说道。

如果名医有时间发怒，就是说，如果他们有时间相互交换一瞥，就会看出“我这些同行也跟我一样，明白自己上了当，做了这个毛头小伙子手里的玩偶”，那么他们准会大发雷霆，可是基尔萨诺夫不让任何人有工夫观察到“别人对我怎样看的”。基尔萨诺夫告诉仆人把泄了气的波洛佐夫领出去，然后对名医们表示了谢意，感激他们凭着自己的洞察力，猜中了他的意图，明白了病因全在于精神上的痛苦，所以必须吓唬一下那顽固老头，不然他真的会把自己的女儿毁掉的。之后名医们满意地离去了，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学识和洞察力在所有其余的人面前再次得到了证明。

基尔萨诺夫匆匆给他们做了鉴定，随即跑去告诉病人说，事情成功了。她刚一听到他开头的几句话就抓住他的手，他好容易及时挣脱开，没有让她吻着。“可是我不会马上让您父亲来对您宣布这件事，”他说，“让他先到我这儿，听听我教他如何为人处事。”他告诉她，他要劝导劝导她父亲，在他认真进行劝导之前，他决不离开他。

老人被会诊的结果所震惊，已经大大泄气了，他已不再用昨日的眼光

看待基尔萨诺夫，而是用当年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梦见洛普霍夫当了包税商时的眼光看洛普霍夫那样。昨天在波洛佐夫的头脑中还自然地呈现出这样的想法：“我比你年纪大，经验多，世上没有比我更聪明的了。至于你这乳臭未干的穷小子，我就自然更不用听你的了，我凭着自己的聪明挣了两百万（准确地说，实际上他只有两百万，不是四百万），等你来挣吧，挣足了再说话吧，”可现在他却想：“好一只熊，居然扭转了局面。真会整治人。”他越跟基尔萨诺夫谈，便越加生动地想出另一幅画面来加以补充，那是一段早已被遗忘的关于骠骑兵生活的回忆：驯马师扎哈尔琴科骑在格罗莫博伊身上（当时茹科夫斯基的故事诗在小姐们中间很时髦，又由于她们的缘故而在一部分风流的文武官员中间流行），格罗莫博伊在扎哈尔琴科驾驭之下驯顺地跑跳着，不过它的嘴唇已经给撕扯得稀烂，上面全都是血。波洛佐夫有几分恐惧地听着基尔萨诺夫怎样回答他提的头一个问题：

格罗莫博伊，茹科夫斯基一篇同名故事诗（一八一）。

“莫非您真要给她服用大量的吗啡，要她的命吗？”

“当然！那还用说。”基尔萨诺夫冷冷地回答。

（“好一个强盗！他说起话来，就像厨子谈论宰鸡一样。”）“您有这么大的勇气？”

“这点勇气还没有，难道我是个废物！”

“您这个人真可怕！”波洛佐夫反复地说。

“这表明您还没见识过可怕的人。”基尔萨诺夫露出宽容大度的样子，微笑着作答，心里在想：“让你见见拉赫梅托夫就好了。”

“但是您真会调遣那些医生！”

“调遣这种人还不容易！”基尔萨诺夫做了个不太明显的鬼脸，答道。

波洛佐夫想起扎哈尔琴科对骑兵上尉沃雷诺夫说的话：“牵来叫我驯服的就是这匹耷拉着耳朵的马吗，大人？我骑上去都难为情。”

基尔萨诺夫打断了波洛佐夫诸如此类没完没了的问题，开始劝诫他该怎样为人处事。

“请记住，一个人只有完全不受干扰的时候才能思考，只有受不到刺激的时候才不会发火，只有当人家不来打破他的幻想，而让他自己看清楚这些幻想的利弊的时候，他才不会把它当回事。如果索洛夫卓夫真像您描写的那么坏——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您女儿自己也看得出来。不过您千万别去干扰，别使她产生误会以为您在设法暗算他，拼命拆散他们。一句对他不满的话也别说，说一句会把事情弄糟两个星期，多说几句就永远糟下去了。您应该完全采取旁观的态度。”他又给他的劝诫增加了这样的论据：“强迫您做您所不愿意做的事情，难道容易吗！可是我就强迫您了，这表明我懂得该怎样处理事情，您总相信了吧：我怎么说，就该怎么做。我说的话心里有数，您只要听从就是了。”对付当时的波洛佐夫那种人，只有采取强硬的措施逼他服从，不能用别的办法。波洛佐夫被严厉训导过以后，只好答应照基尔萨诺夫的话去做。但是波洛佐夫虽然相信基尔萨诺夫言之有理，必须听从他，却仍旧弄清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既站在他的一边，同时又站在女儿一边；他强迫他听从女儿的，却又希望女儿改变想法。这怎么能一致起来？”

“很简单，我只不过希望您别妨碍她理智地思考问题罢了。”

波洛佐夫给索洛夫卓夫写了一张便条，请他前来商量一件要事。晚上索洛夫卓夫来了，他对老人亲切温和却又充满自尊地作了解释，他当即被宣

布为未婚夫，三个月以后成婚。

七

基尔萨诺夫不能丢下事情不管，既要帮助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快清醒过来，走出误区，更需要来监督她的父亲，鼓励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他所接受的不干涉政策。可是基尔萨诺夫认为，在危机刚过的头几天马上便去波洛佐夫家是不妥的：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自然还处于狂热状态，如果他发现（那应当能料想到）未婚夫是个坏人，那么不但直言不讳地进行批评，即使以沉默来表示他对未婚夫的不满，也会给她带来害处，使她更加狂热。基尔萨诺夫过了一周半左右才去看她，他一清早就去了，避免直接与未婚夫相遇，而是先要征得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的同意。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已经大大见好，她还很瘦弱苍白，却十分健康，虽然原来那位名医仍旧在忙着给她开药治病。基尔萨诺夫又把她托付给他了，事先告诉她：“请您给他医治吧，现在您尽管吃他开的药，他给您开的任何一种药对您都是无害的。”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兴高采烈地迎接了基尔萨诺夫，可是当他说明来意以后，她用吃惊的目光看了看他。

“您救了我的性命，居然还需要我允许才来我们家么！”

“如果有他在的时候我来看您，您可能以为我擅自故意来干涉你们的交往。您知道我的原则：我决不做任何不合别人意愿的事情，即使是为他好。”

基尔萨诺夫第二天或第三天晚上又来了，他发现未婚夫果然是像波洛佐夫描写的那样的人，但波洛佐夫却还叫人满意：被严厉训导过的老头没有干扰女儿。基尔萨诺夫坐了一晚，却没有发表对未婚夫的任何意见，跟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告辞时，也没有做出丝毫是否喜欢他的暗示。

这已经足够引起她的好奇和怀疑了。第二天，一个念头总是悬在她心中：“基尔萨诺夫对我还没有提过他一句。要是他给了基尔萨诺夫好印象，基尔萨诺夫会对我讲的。

难道不喜欢他？他能有什么地方叫基尔萨诺夫不喜欢呢？”晚上未婚夫又来了，她观察他的态度，琢磨他的话。她给自己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使自己确信，基尔萨诺夫不应该也不可能在他身上找出任何缺点来。这的确是她的愿望。但是她要使自己确信她所爱的人没有缺点，结果却事与愿违，缺点很快就会给看出来的。

过了好几天，基尔萨诺夫对她还是没有一句话提到他是否喜欢未婚夫。这一次她可忍不住了，晚间聚会结束时她问：

“您的意见呢？您为什么总不说话？”

“我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我的意见，也不知道您会不会认为我的意见是公正的。”

“您不喜欢他？”

基尔萨诺夫默不作声。

“您不喜欢他？”

“我没说过这话。”

“这是能看出来的。为什么您不喜欢他？”

“我要等一等，等到您也能看出为什么我不喜欢他。”

第二天晚上，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更仔细地观察索洛夫卓夫。“他什么都好，基尔萨诺夫不公平。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出他哪里叫基尔萨诺夫不喜欢呢？”她埋怨自己不善于观察，她想：“莫非我就这么胡涂？”她那被刺激起来的自尊心势必对未婚夫构成极大的威胁。

基尔萨诺夫过了几天再来的时候，已经看出有可能采取比较激进的行动了。本来他一直避免跟索洛夫卓夫交谈，怕过早的干涉会惊扰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现在他已坐在靠近她和索洛夫卓夫的一群人当中，有意谈起一些事情，能叫索洛夫卓夫显露出其性格来，并且诱使他来加入谈话。他们谈到财产，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觉得索洛夫卓夫对钱财看得太重。他们谈到妇女，她感到索洛夫卓夫说起妇女时态度过于轻浮。他们谈到家庭生活，给她的印象是，做妻子的跟这样一个丈夫在一块生活，恐怕会感到冷冰冰，不好过。她尽力地想要把这个印象从脑子里驱赶出去，但是驱赶不掉。

危机来了。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久久不能入睡，一味地哭。她抱怨自己，认为她这种想法冤枉了索洛夫卓夫。“不，他不是个冷冰冰的人，他并不轻视妇女，他爱我而不是爱我的财产。”如果这些反驳意见是针对别人的评语而作的回答，那么在她心中还能固执地坚持下去。可她是在反驳自己。而一个人要否定他自己发现的真相，他是不能长久坚持，这个真相是他自己看出的，它跟他切身有关，他无法怀疑其中有什么计谋。

第二天晚上，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亲自考验了索洛夫卓夫，就像昨天基尔萨诺夫考验他一样。她给自己解释说她只想确认一下是她平白无故地冤枉了他；可是她自己也感到她已经不信任他了。她又久久不能入睡，这一次却是怨恨他了：为什么他说的话没有打消她的疑虑，反而使它有所增长？她也怨恨自己，但是从这怨恨中明显流露出一种情绪：“我怎么会这么眼瞎呢？”

过了一两天，她的心被一种恐惧的念头攫住了：

“如果我看错了他，我很快就会失去改正错误的机会了。”

基尔萨诺夫再一次来时，他看出可以跟她谈一谈了。

“您问我对他的意见，”他说，“我的意见可不如您的意见重要。您认为他怎么样呢？”

现在是她默不作声了。

“我不敢追问。”他说，于是谈起了别的话题，不一会就走开了。

过了半个小时，她主动来找他：

“给我出个主意吧：您看，我的思想在动摇。”

“既然思想动摇，您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办，何必要别人出主意呢？”

“坐等着思想不再动摇吗？”

“您自己知道怎么办。”

“我把婚期推迟。”

“如果您认为推迟更好，为什么不推迟？”

“不过他会怎样来看待这件事呢？”

“等您知道了他怎样看待的时候，再来考虑怎样做更好。”

“可是我难于向他说出口。”

“如果这样，那就拜托您父亲去跟他说好了。”

“我不愿躲在别人身后。我要亲自去说。”

“如果您觉得您有能力亲自去说，那当然要好得多。”

假设对方是另外一个人，譬如说是韦拉·巴夫洛夫娜，这么慢腾腾地处理事情自然不合适。但是各种气质的人都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如果说，急性子的人对于慢腾腾的按部就班的作风会发火，那么一个文静的人听到粗暴尖锐的言辞也是要生气的。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跟未婚夫解释获得的成功超出了基尔萨诺夫的期望，他原以为索洛夫卓夫精于计算、谨言慎行，用恭顺的态度与谦和的央求把事情拖延下去。不，索洛夫卓夫尽管有自我克制的能力，可是他眼看着一大笔财产要从他手中滑掉，也沉不住气了，于是他自己放过了留给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他粗暴地连连不断地埋怨波洛佐夫，说他有意跟他捣乱。他又对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说，她太受她父亲的控制，说她怕他，眼下正是在照他的命令行事。其实波洛佐夫还不知道女儿推迟婚期的决定呢。女儿时时都感到他使她享有着充分的自由。未婚夫对她父亲的不公正的指责使她感到难过，感到受了侮辱，因为这表明在索洛夫卓夫眼中她不过是一个既没有意志又没有性格的人。

“您大概认为我是别人手里的玩偶吧？”

“正是。”他怒气冲冲地说。

“我当初连父亲都不顾，准备为您去死，您对这一点都不明白！从现在起，我们一刀两断。”她一说完，就飞快地冲出了房间。

八

这件事发生以后，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曾长期心情郁闷。不过她的郁闷虽然由于这件事而加重了，却不可全归咎于这一个别事情上。对于有一类人来说，个别事情的本身不大重要，只能起到激发他们去探寻普遍性思维的作用，后者对他们的影响要强有力得多。如果这类人拥有很高的智慧，他们就能成为普遍性思维的改造者，要是在古代，他们甚至会变成伟大的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没有深入研究过任何个别问题，他们觉得个别问题太乏味。这当然只是就男子而言的，因为妇女缺乏大才大智，照今天的说法就是：您要知道，造物不肯把很高的智慧赋予她们，正像它不肯赋予铁匠鲜嫩的脸色，赋予裁缝匀称的身材，赋予鞋匠敏锐的嗅觉一样，这全是造物的安排。因此妇女中间没有大智者。弱智而又具有这种性格倾向的人往往消极冷漠得近乎麻木。具有寻常智慧的人爱好沉思和宁静的生活，总之，他们爱幻想。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沉溺于幻想：有许多人想像力很弱，但他们是脚踏实地的人，他们只不过喜欢静静地沉思罢了。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因为索洛夫卓夫的情书而爱上他，几乎死于那纯属用幻想构筑起来的爱情上。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她有多么强烈的浪漫主义情绪。然而跟波洛佐夫家往来的尽是一些庸夫俗子，他们的喧闹生活决不会使人钟情于狂热的理想主义。可见她的这个特点是源出于她本身的天性。她早已苦于这种喧闹，她爱好读书和幻想。现在不仅是财富引起的

喧闹使她心烦，连财富本身也开始叫她感到苦恼了。不要由于她拥有这份感觉便把她视为非凡的女性：所有性格谦逊和文静的富家女子都熟悉这种感觉。那在她心里只是成熟得比一般人更早而已，因为她早早地就吃了一个严重的教训。

“我能够相信谁？我能够相信什么？”索洛夫卓夫事件以后她问自己，她看到，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相信。她父亲的财富把全城人的贪欲、狡诈、谎言都诱发出来了。

她被一群自私自利、喜爱撒谎、阿谀奉迎之徒所包围。他们对她说每一句话时，都在觊觎着她父亲的几百万家财。

她变得越来越严肃了。她开始注意对她有极大干扰的财富以及使别人遭受痛苦的贫穷这些普遍性问题。她父亲给了她很多零用钱，她像所有的好心的妇女一样，常常用来救济穷人。可是经过读书和思考，她才发觉她的这种救济所带来的好处，远远不如应当带来的那样大。她看到假装的或者卑劣的穷人骗她骗得太多，甚至对于那些该当帮助的、善于使用她所给的救济款的人，这笔钱也决不能持久地给他们带来好处，它只能使他们暂时脱贫，过个一年半载，这些人还是照样受穷。她开始想道：“这腐蚀人的财富是为了什么创造出来的？为什么贫困总是困扰穷人？为什么我看见许多穷人跟富人同样轻狂，同样卑劣呢？”

她是一个梦想家，但她的梦想是静谧的，正像她的性格，幻想中缺少才华也像她本人。她喜爱的诗人是乔治·桑。然而她不把自己想象成雷丽亚、印第安娜、卡瓦尔康蒂甚至康絮爱萝。在她的梦想中，她是贞娜，更常常是热娜维埃弗。热娜维埃弗是她心爱的女主人公。她在田野上漫步，采集花朵做她刺绣的样本，于是碰到了安德烈。是多么平静的会面啊！他们发现他们相爱着。这也是她的梦想，她自己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但她还喜欢想象南丁格尔小姐的命运多么令人羡慕，人们都知道，这个文静谦逊的姑娘成为全英国敬爱的女性的原因，至于她其余的一切，谁也不知道，并区也没必要知道。她年轻吗？她富有还是贫穷？她本人幸福不幸福？关于这些，谁也不提，谁也不去想，人们只是为这个姑娘祝福，因为她是克里米亚和斯卡特里的英国军医院中一名替人分忧解难的天使，战争结束以后，她还护送几百名由她救治过的人回到祖国，继续照看病人……这便是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渴望实现的梦想。她的梦想没有超出做一个热娜维埃弗和南丁格尔小姐。难道仅凭此就能够说她想入非非吗？能够叫她梦想家吗？

雷丽亚、印第安娜、康絮爱萝和贞娜是乔治·桑所作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卡瓦尔康蒂，她的小说《心腹秘书》的女主人公；热娜维埃弗和安德烈，她的另一小说《安德烈》的主人公。

南丁格尔（一八二〇—一九一〇），英国护士，克里米亚战争时，曾组织看护队赴战地救护伤兵。

假如热娜维埃弗处在狡诈之徒与花花恶少的喧闹的庸俗圈子中，南丁格尔小姐处在骄奢淫逸的环境中，她们能不觉得无聊和郁闷吗？因此，当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的父亲破产的时候，她几乎是喜大于悲。看到他从一个身体结实的、还不算年迈的人变成了老头子，她心疼他。她感到遗憾的还有一件事：她能用来资助别人的钱大大减少了。

头一次看见曾在她的父亲和她面前卑躬屈膝、竭力巴结过的人抛来的白眼，她很难受，可是她也感到痛快，因为那一群无聊的、可恶的庸碌之辈

已经离他们而去，不再使她的生活感到憋闷，不再用虚伪卑劣的行径使她恼怒。现在她十分自由，心中燃起了对幸福的希望：“今后如果我发现有人钟情于我，那就真是爱慕我，而不是爱慕我父亲的几百万财产了。”

九

波洛佐夫想把他占有股份并由他经管的那家硬脂工厂盘出去。经过半年或半年多尽心竭力的寻访，他才找到了买主。买主的名片上写着“Charles Beaumont”，但不是念作“夏尔·博蒙”，像不深知情况的人所念的那样，而是念作“查理士·比蒙特”。

自然是该这么念法：买主是伦敦一家专门收购脂油和硬脂的霍奇逊—洛特公司的代理人。

在财政拮据，管理不当的情况下，那个入股集资的硬脂工厂不能得到发展。如果掌握在一家强大的公司手中，工厂却一定会创高效益的，只要花个五六十万卢布，公司每年就可望有十万进项。代理人办事认真，他首先仔细视察了工厂，详细查阅了它的账目，才向公司建议受盘。然后他开始跟厂方就工厂出盘事宜进行谈判，谈判拖延了很久，那是我国入股集资的企业的特点，就连最有耐心的希腊人，曾经围攻特洛伊十年之久而毫不气馁的，跟它们谈起来也会生厌的吧。在这期间，波洛佐夫按照对待用得着的人的老习惯，对代理人百般讨好，常常向他发出来家用餐的邀请。代理人对此采取回避态度，一再谢绝邀请。可是有一回，他跟工厂董事会谈判时间过长，又累又饿，才终于答应到波洛佐夫家用午饭了，其实他们同住在一层楼上。

“夏尔·博蒙”是法语的念法。

传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在爱神阿芙罗狄蒂帮助下将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之妻海伦拐到特洛伊，希腊大军前往争夺，围攻特洛伊城十年始破。

十

查理士·比蒙特正如所有的查理士、约翰、詹姆士、威廉一样，不喜欢跟人亲密无间，表露个人内心感受。可是别人询问的时候，他会简单扼要地讲述讲述自己的经历。

他说他的家庭原籍是加拿大。的确，加拿大居民中大概有一半是法国移民的后代。他这一家就是法裔，因此他的姓氏是法式的，他的面貌与其说像英国人或美国人，不如说像法国人。但是，他接着说，他的祖父从魁北克附近迁到了纽约。这种事并不罕见。这一家移居的时候，他父亲还是个小男孩，后来自然长大成人。这时我国农界一位有钱的进步人士突发奇想，竟要在克里米亚南岸经营棉田，而不种葡萄园。他托人给他从北美找一个管理人，结果找到了这个加拿大出生的纽约居民詹姆士·比蒙特，就是说，此人对棉田十分陌生，他没有见过棉田正像我和读者您在彼得堡或库尔斯克见不到阿拉

拉特山一样。这在诸如此类的进步人士中都是常有的事。固然，事情给弄糟完全不是由于美国管理人不懂植棉技术，而是因为他在克里米亚种棉是跟在彼得堡种葡萄一样异想天开。这一点弄清后，美国管理人被解除植棉管理工作，到坦波夫省一家酒厂做了酿酒师，他差不多在那几度过了他的余生，还跟人姘居生下查理士，儿子出世不久，他的情妇就去世了。将近六十五岁时，他已经攒下一笔钱养老，却忽然想回美国，于是就回去了。那时查理士二十来岁。父亲死后，查理士想回俄国，因为他生在坦波夫省乡下，又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他感觉自己是俄国人。跟父亲住在纽约时，他在一个商人的经理处当职员。

父亲死后，他转到伦敦霍奇逊——洛特公司的纽约经理处，他知道这家公司和彼得堡有业务往来，于是大显身手，连忙推销自己，表现出了他是希望在俄国谋到一个职位的，他说他对俄国的了解犹如自己的祖国。有这样一名职员常驻俄国，自然对公司有利，他被调往伦敦经理部接受考核，考核通过，就来到彼得堡，给这家专做脂油和硬脂生意的公司担任代理人，年薪五百镑——那是在他上波洛佐夫家吃饭的前半年左右。情况与这段经历完全相符，比蒙特，由于他出生在坦波夫省，又在那儿住过近二十年，当时他在方圆二十、五十甚至一百俄里以内只能碰见一个美国人或英国人，那就是他的父亲，而父亲却整天都待在工厂里——情况也符合于这段经历，查理士·比蒙特说俄语正跟土生土长的俄国人一样，英语虽然也说得流利、漂亮，但还是不够地道，一个人到了成年才在英语国家待上那么几年，本来也就只能如此而已。

阿拉拉特山，一译阿勒山，在土耳其东部，靠近俄罗斯和伊朗边境。

十一

比蒙特发现餐桌上只有三个人：除了自己，便是老人和他那非常可爱而又略带几分忧郁的金发女儿。

“我当时哪里想得到，”波洛佐夫吃饭时说，“这些工厂股票会对我这么重要！人到老年遭受这样的打击，是很痛苦的。还算万幸，尽管我糟蹋了卡佳的财产，可她承受住了，而且很不以为然。就是我活着的时候，这笔财产与其说属于我，不如说该属于她，因为她母亲留给她一大笔钱，我的钱很少。当然，我把每个卢布都变成了二十个，所以，从另一方面说，这笔财产里头靠我挣来的辛苦钱比继承到的钱更多，我真是付出了多少心血！那需要怎样的才干啊，”老人自嘲地说，他用这种口吻谈论了许久，“我靠血汗，更主要的是靠聪明才智挣钱。”他终于说完了，在结束时他又重复了一遍开头所讲的话，说遭受这样一个打击挺痛苦，如果卡住再为此哭哭啼啼，他恐怕早疯了，可是卡佳不仅自己不心疼，还给了他老头子安慰和支持。

或许由于美国的习惯如此，无论对一个人摇身变巨富，或是破产成穷汉，都不见怪，或许是由于自己的个性，比蒙特既不愿恭维那挣过三四百万的雄才大智，也不愿为他破产而扼腕叹息，何况破产以后还有能力雇用一名好厨师。可是他又必须讲点儿什么，表示他赞成这长篇演说中的某些看法，

因此他说：

“是的，全家同舟共济来承受苦难，那就轻松多了。”

“您的话似乎还值得商榷，卡尔·亚科夫利奇。您以为卡佳忧愁是因为她心疼那笔财产吗？不，卡尔·亚科夫利奇，不，您冤枉了她。我和她另有苦衷：我俩丧失了对人的信心。”波洛佐夫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正像阅历丰富的老者谈起小孩子善良可又难免幼稚的看法那样。

比蒙特的俄式名字和父名。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脸红了。她不乐意让父亲谈起她的感情。但是这也不能怪她父亲，除了父爱驱使他说以外，还有另一个人所熟知的情由：如果没有话说而屋里却正好有一只猫或狗，人们就谈猫谈狗；如果猫狗都没有，就谈孩子；实在没有任何谈话资料的时候，就只能屈尊来谈谈天气了。

“不，爸爸，您不用拿这么高尚的理由来解释我的忧愁：您知道，我天生来的一副不快活的性格，所以才感到烦闷。”

“快活不快活这倒是凭个人了，”比蒙特说，“可是烦闷，依我看是不能原谅的。”

在我们的兄弟英国人那里，烦闷是一种流行病；我们美国人可不知道烦闷这一说。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烦闷，我们的事情太多了。我认为，我觉得（他改正了他的美国式词语），俄国人民也应该看到自己正是处于同样的境况，依我看他们手上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而我在俄国人身上看到的确实完全相悖：他们很容易忧郁。在这方面，连英国人也远远比不上他们。英国社会是世界上最沉闷的社会，这个坏名声传遍全欧洲，包括全俄国在内。其实英国社会比起俄国社会来还是要有生气、活跃、快乐得多，就像法国在这方面又超过英国一样。而你们的旅行家还对你们说什么英国社会沉闷！我不懂，这些人怎么闭着眼睛不看看自己的国内！”

“俄国人忧郁不是他们的过错，”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说道，“他们有什么事可做呢？他们无事可做，于是就不得不抄起手来待着。您指给我一件事来做，我大概就不会烦闷了。”

“您想找事干？啊，事情是不会缺少的吧。您可以看到，您周围的人是那么愚昧无知——请原谅我如此评论贵国，你们的祖国（他改正了他的英国式词语），然而我自己也是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的，我把它看作自己的祖国，我才能够对它不客气——您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像土耳其似的愚昧无知，像日本似的孤立无援。我要摹仿你们的诗人对你们说：我恨你们的祖国，正因为我爱它，如同爱我自己的祖国一样。但是这儿有许多事需要做呢。”

“不错，可是单独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儿家，能够做什么呢？”

“可你不是在做吗，卡佳？”波洛佐夫说，“我向您泄露她的一个秘密吧，卡尔·亚科夫利奇。她为了消除烦闷，正在教一群女孩子读书呐。她的学生天天来，她陪着她们从十点忙到一点，有时候还不止。”

比蒙特带着尊敬的神情瞧了瞧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

“这才像我们美国人——当然我所指的美国人只是北部自由州的人。南部各州却比墨西哥还糟，情况几乎跟巴西一样恶劣（比蒙特是一个激烈的废奴主义者），——这才像我们啊。可是既然有事干，您为什么还烦闷呢？”

指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北美洲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们。

“难道这算得上什么重要的事吗？比蒙特先生？不过是为了消遣罢了，我是这么想的。也许我想错了，也许您会叫我唯物主义者……”

“人们认定我们民族的唯一目标和心思就是捞钱，您难道能从这个民族人的口中听到对您这样的责备吗？”

“您在开玩笑，我可是真害怕，怕对您说出我的意见，这意见看来近似于蒙昧主义者所鼓吹的教育无用论。”

比蒙特想道：“原来如此！难道她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吗？这倒挺有意思。”

“我自己就是个蒙昧主义者，”他说，“我拥护南部各州不识字的黑奴，却反对他们文明的主人。原谅我，这种美国人的憎恨感情使我离题远了。但是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意见极为平庸，比蒙特先生，不过这是生活使我认识到的。我觉得我现在干的事情太片面，而且它所关注的那个方面还不是希望为人民谋利益的人应该关心的首要方面。”

我这么想：只要解决了吃饭问题，人们自己也能学会读书。必须从吃饭问题入手，否则我们白费工夫。”

“您为什么不从您认为必须做的这件事入手呢？”比蒙特问，他已经有点儿兴奋了，“这是能办到的，我知道一些例子，在我们美国。”他补充道。

“我对您说过：我一个女儿家能着手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起步。就算知道，我哪有可能去做？女孩子在各方面都受到束缚，我只有在自己房间里才是独立自主的。可我在自己房间里能干出什么来呢？只有在桌上摆本书教人家读读罢了。我一个女儿家能到哪儿去？我一个女儿家能够见到谁？我一个女儿家能够做什么事？”

“你似乎把我看成一个专制魔王了吧，卡佳？”她父亲说，“自从你给了我那个教训以后，我在这方面可再没有犯什么过错啦。”

“爸爸，我真不好意思，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啊。不，爸爸，您很好，您没有限制我，限制我的是社会。比蒙特先生，听说美国的女孩子不受什么限制，是真的吗？”

“是的，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地方。当然，就是在我们这儿，也还远远不是像应该有的那么好，但是和你们欧洲人相比，还是强多了。你听说我们的妇女很自由，那确是真的。”

“爸爸，比蒙特先生一盘下您的工厂，我们就上美国去吧，”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开玩笑说，“我要到那儿干点什么。啊，那我会多高兴！”

“在彼得堡也可以找到事情干。”比蒙特说道。

“请指点。”

比蒙特迟疑了两三秒钟，心想：“我干吗来这儿？通过谁去了解更好呢？”

“您没有听说？已经有人试验着把最新的经济学的原则运用于实际中了，您知道这些原则吗？”

“嗯，我读过。这大概是很有意思，很有益处的。我也能参加吗？哪儿可以找到？”

“这是基尔萨诺夫太太创办的。”

“她是谁？她的丈夫是医生吧？”

“您认识他？他没有对您讲过这件事？”

“那是很久以前了，当时他还没结婚。我得了一场重病，他来看过几次，救了我一命。啊，他真是了不得的人！他太太像他吗？”

但是怎样才能跟基尔萨诺娃认识呢？由比蒙特出面把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介绍给基尔萨诺娃？不行，基尔萨诺夫夫妇连他的姓氏都没听说过。其实什么介绍也不需要，基尔萨诺娃大概是会欢迎这样的志同道合者的。住址必须到基尔萨诺夫工作的地方才能打听出来。

十二

波洛佐娃便是这样认识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她第二天一清早就去她那儿了，比蒙特也极感兴趣，当晚就跑来了解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是否喜欢这个新相识和新工作。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十分兴奋，连丝毫忧郁的影子都不见了，忧愁被欢乐所代替。她兴致勃勃地给比蒙特讲述着早上的所见所闻——她本来已经对父亲讲过，可是讲一遍还嫌不够——而巨不停地讲个没完。是的，现在她心里充实了，她找到了一件切实可行的事情！比蒙特仔细听着她讲。不过，难道可以就这样一味地听着吗？她几乎是生气地说：

“比蒙特先生，我对您很失望：这件事给您的影响莫非就那样做不足道，您仅仅是对它觉得有趣而已吗？”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您忘了这一切我在我们美国都见过，只有某些细节还使我感兴趣，至于事情本身，我是太熟悉了，它在你们这儿挺新奇。而使我能感到新鲜有趣的只是把这项事情做成功的那些人。比方说，关于基尔萨诺夫太太，您能告诉我点儿什么吗？”

“噢，我的天，我自然非常喜欢她罗，她那么热情地给我讲解了一切。”

“这您已经说过了。”

“那您还要知道什么呢？我还能对您说什么呢？我眼前有这样一项工作的时候，我还能顾得上去想她？”

“是的，”比蒙特说，“我明白了：一人关注于工作的时候，就会把人统统都忘了。”

不过，关于基尔萨诺夫太太，您还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开始汇集她对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所有的回忆，可是她只能想起韦拉·巴夫洛夫娜给她的第一个印象。她很生动地描述了她的外貌、讲话的态度，以及她跟陌生人会面时最惹眼的地方。其余的呢，其余的事确实几乎想不起什么与韦拉·巴夫洛夫娜有关的了。工场、工场、还是工场，再加上韦拉·巴夫洛夫娜关于工场的讲解。这些讲解她会记得，可是在见面最初寒暄之后那一段时间内的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怎样，她却不记得了。

“我本来期望从您嘴里多了解些基尔萨诺夫太太的情况，那么这一次全落空了。可是我不会放过您，过几天还要来向您打听她的事情。”

“既然她这样叫您感兴趣，为什么不亲自去跟她认识认识呢？”

“我是想这么做的，也许总有一天会办到的。可我首先得多打听打听她的情况。”比蒙特停了一会儿，“我想过，是求您好，还是不求您好？看来还是求求您更好：如果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碰巧提到了我的姓名，请不要说

我向您打听过了她，也不要说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认识他们。”

“这开始像是打哑谜了，比蒙特先生，”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用严肃的口气说道，“您想通过我去打听他们的消息，您自己却不想露面。”

“是的，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怎样给您解释才好呢？我害怕跟他们认识。”

“这真叫人纳闷，比蒙特先生。”

“对。我更坦白地告诉您吧：我怕的是他们不高兴。他们没有听说过我的姓名，但是我可能曾经跟他们的某位亲友或者他们本人有过什么矛盾——至于跟谁有过矛盾那就无所谓了。总之，我必须搞清他们是否乐意跟我认识。”

“这真叫人纳闷，比蒙特先生。”

“我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我敢向您担保，我从来没想损害您的名誉。我跟您见面仅仅才两次，可对您已经十分敬重了。”

“我也看出您是个正派人，比蒙特先生。但……”

“您既然认为我是正派人，就会允许我常到您家里来，等您充分信任我的时候，我可以再向您问问基尔萨诺夫夫妇的情况。或者，最好是您自动地谈起他们，假如您觉得可以满足我现在提出的请求的话，这个请求我是不会再提的了。您允许吗？”

“好的，比蒙特先生，”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微微地耸了耸肩，说道，“但是您得承认……”

她又不想说下去了。

“您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自然会引起您的某种怀疑吧？对。不过我可以等您的怀疑消除以后再说。”

十三

从此比蒙特就开始常常到波洛佐夫家来了。“为什么不可以呢？”老人琢磨着，“他是个合适的配偶。从前卡佳当然能找到的不是这等样的未婚夫。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她也并不曾贪图实利，爱慕虚荣。现在决不能指望有比他更佳的人选了。”

比蒙特的确是个合适的配偶。他说过，他想定居在俄国，因为他把俄国视为他自己的祖国。他为人踏实可靠，虽然出身寒微，但三十岁上便有了一个很好的职位。如果他是俄国人，波洛佐夫当然乐意他是个贵族，然而对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无需加这个头衔。至于美国人，那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美国，一个人今天还是鞋匠的学徒或者庄稼人，说不定明天就成了将军，后天就当上总统，以后又退下来做一名办事员或律师。这完全是个特殊的民族，他们只问一个人有没有钱和头脑。“这才更合理呐，”波洛佐夫继续琢磨，“我自己正是这样的人。我做过生意，娶的也是个生意人的女儿。主要的就是钱，头脑也重要，因为没头脑挣不到钱。他能挣钱，他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他盘下工厂，再当上厂长，往后那家公司也要吸收他入股。他们的公司可跟我们的不同。将来他也会掌握几百万……”

波洛佐夫梦想他的女婿成为商界的百万富翁，这个梦想多一半实现不了，正如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梦想过她的第一个女婿会做包税商，结果并没有实现一样。不过比蒙特对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来说毕竟是个好配偶。

可是波洛佐夫预料比蒙特将做他的女婿，他的料想没有错吧？假如老人对于这一点还存有什么怀疑，那么，当比蒙特在开始来造访两个来星期后对他说，工厂受盘的事可能要推迟几天，这疑虑便消除了。不过推迟未必就是由于比蒙特准备求婚，而是因为等待洛特先生的到来，他再过四天才能到达彼得堡。如果洛特先生不来，双方要拟好合同的最后条款，恐怕至少也得在一个星期以后了。

“从前我跟您没有私交的时候，”比蒙特说，“我本想亲自来成交这笔生意。现在这样做就不方便了，因为我们太熟悉。为了往后不致发生什么误会，我给公司写了封信，说我在谈生意的期间，认识了您这位几乎把全部财产都入了股的厂长，我要求公司另外派人来代我成交这笔生意，所以，您可以看到，洛特先生就要来了。”

办得谨慎而周全。同时这也清楚表明比蒙特有意娶卡佳：一般的交情是不足以提出采取这种防范措施的充分理由来的。

十四

比蒙特后来的两三次访问，开头总是受到冷遇，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对他相当冷淡。她实在有点儿信不过这个相知不深的人，他神秘地希望探听一个家庭的情况，据他说他不认识他们，又害怕认识他们，因为他不敢确信这一家会乐意跟他结识。但是就在他最初的几次访问中，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对他存有疑虑，另一方面却又情不自禁地被他所吸引，很快跟他热烈地攀谈起来。在她过去的的生活里，当她认识他和基尔萨诺夫以前，她还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他那么倾心于她感到兴趣的一切，又那么深刻地了解她，甚至跟亲密的女友波莉娜（不过她实际上只有这一位，女友远嫁莫斯科的一个工厂主，早已迁居莫斯科）谈话的时候，也没有这样无拘无束，轻松畅快。

至于他，他最初来这儿显然不是为了她，只是为了通过她去打听基尔萨诺娃的消息。

但从最初结识、从他们谈到烦闷和摆脱烦闷的办法的那一刻起，便可以看出他是尊敬她、同情她的。第二次会面时，他看见她为自己找到了一项工作而狂喜，对她便十分倾慕了。

现在她觉得，他对她的好感随着每一次的会面更越来越明显了。他们之间很快地建立起了一种最单纯、最温馨的友情，过了一个星期，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已经给他讲基尔萨诺夫夫妇的事了，她相信这个人不可能有什么歪心眼、邪念头。

固然，当她说起基尔萨诺夫夫妇时，他阻止她说：

“干吗这样急？您了解我还太少。”

“不，足够了，比蒙特先生。我知道，如果您不愿意对我解释您叫我纳

闷的那个愿望，那大概是因为您没有权利对我说。人总是有不少难言之隐的。”

可是他却说：“您看到，我现在已经不像原来那样急于打听我所想知道的关于他们的情况了。”

十五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的兴奋心情还在持续下去，没有减弱，只是变成了一种稳定的、平常的心境，这是一种朝气蓬勃、积极奋发、快乐开朗的心境。她觉得，正是她这种积极奋发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比蒙特。关于她，他也已经想过很多，这是再明显不过了。听她讲了两三次基尔萨诺夫夫妇的事以后，等她第四次讲时，他就说：

“我所需要知道的，现在我知道了。谢谢您。”

“您知道了什么呢？我只不过告诉了您，他们彼此相爱，夫妻关系很美满。”

“知道这一点足够了，其实这一点我自己一向都知道。”

于是他们转向了别的话题。

他第一次问起基尔萨诺娃的时候，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的第一个念头当然是：他对韦拉·巴夫洛夫娜着迷了。现在明显可见根本没有这回事。据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现在对他的了解，她甚至认为比蒙特不会迷恋于什么女人。“他能爱的，这是对的。

但是假如眼下他爱上什么人了，那就是爱我。”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想道。

十六

不过他们是否相爱了呢？暂且从她说起吧。有一件事表现了她对比蒙特的关心，但这件事是怎样结束的呀！完全是始料所不及的。比蒙特天天必到波洛佐夫家来，有时待上老半天，有时待上一小会儿，可毕竟是天天都来的。正是根据这一点，波洛佐夫才确信他要向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求婚了。波洛佐夫抱有这个希望，并没有别的根据。

但是有一次，晚上都过去了，仍不见比蒙特来。

“您知道他有什么事吗，爸爸？”

“没听说过。大概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工夫来吧。”

第二天晚上又过去了，比蒙特还是不见来。第三天早晨，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打算出门去。

“你上哪儿，卡佳？”

“没有什么，爸爸，办点个人的事情。”

她去找比蒙特。他穿一件宽袖大衣，正坐着看书呐。房门打开时，他

的眼睛才离开了书本。

“是您呀，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我很高兴，谢谢您来看我。”语气跟迎接她父亲一样。不，还是要亲切得多。

“您怎么啦，比蒙特先生，为什么这样久不去我们家？真叫我为您担心，再说，也让人间得慌。”

“没出什么大事，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您看，我身体挺好。您不喝茶吗？您看，我在喝茶。”

“好吧。您干吗这么些天不去？”

“彼得，拿个杯子来。您看，我身体挺好，可见不要紧。是这么回事：我陪洛特先生去工厂，对了，我向他解释一件事的时候，不注意把手搁在螺丝杆上头，螺丝杆一转动，我这袖子和手就给刮破了。头两天，我穿不了常礼服。”

仆人名。

“让我瞧瞧，不然我又会担心不是刮破表皮，是受了重伤了。”

“我的两手都能活动（彼得给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拿来了杯子），算什么重伤？不过，请瞧瞧吧！”他把袖子拉到肘部。“彼得，倒掉这些烟灰，再把书房桌上的雪茄盒拿来。您看，不要紧，只要敷一点英国膏药就足够了，别的什么药也不需要了。”

“是的，可还是有红肿。”

“昨天比这还厉害得多呢，明天就没事了（彼得倒掉烟灰，递上雪茄盒，走开了）。

“我不愿像个负伤的英雄似的，出现在您面前。”

“您给我写封信就好了，怎么可以连封信都不写呢？”

“当时我本来以为第二天，也就是前天，准能穿常礼服，前天又以为昨天能穿，昨天又以为今天能穿。我想用不着惊动您。”

“其实是惊动得更厉害了。这不好，比蒙特先生。您这笔生意几时成交？”

“唔，大概就在这几天，您要知道，拖延的原因并不在我和洛特先生，是在工厂方面。”

“您在读什么？”

“萨克雷的新小说。他这么有天才，可是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那是因为思想贫乏的缘故。”

指萨克雷一八五九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弗吉尼亚人》。

“我已经读过。确实是……”她还谈了等等、等等的感想。

他们对于萨克雷的退步表示惋惜，又围绕着此类其他问题谈了半个来小时。

“不过我该去看韦拉·巴夫洛夫娜了，您到底什么时候才跟他们认识呢？两位极好的人。”

“最近就准备想个办法去结识一下，请您帮帮忙吧。谢谢您来看我。这是您的马？”

“嗯，是我的。”

“怪不得您父亲从不用它，是匹好马。”

“也许是吧，我不识马。”

“真是好马啊，老爷，怎么也能值个三百五十卢布呐。”车夫说。

“几岁口啦？”

“六岁口啦，老爷。”

“走吧，扎哈尔，我坐好了。再见，比蒙特先生。今天来吗？”

“大概不行。不，明天一定来。”

十七

恋爱中的姑娘可以自己去看望情人吗？她们去看望时会是这样行动吗？不待说，一个有教养的姑娘永远不肯去做这类事的，如果肯做，结果就一定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的行为违背了道德的话，那么，这种所谓不道德行为的内容，更是背离了人们普遍都能接受的有关男女关系的一切观念。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和比蒙特不是人，而是鱼，或者说，即使是人，血管里也是流着鱼的血，这还不明显吗？她平日在自己家里见到他时，对他的态度也完全跟这次会面时一样。

“我说话说累了，比蒙特先生，”如果他坐得时间过长，她就说道，“您再陪爸爸坐坐，我想回我房里去了。”说完便走开了。

他有时回答：

“再坐一刻钟吧，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

“好的。”遇到这种情况时，她回答道。不过他的回答往往是：

“那么再见，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

这两位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希望知道。我还希望知道他们会不会纯粹就是这样两个品行好的人呢？由于谁也不妨碍他们见面，他们可以随时见面，随便见几次；谁也不妨碍他们结婚，只要他们想要结；所以他们用不着那么疯狂。可是他们相互间的冷淡态度还是使我感到不安，我与其说为他们难为情，不如说为我自己而惭愧：难道我这个小说家命里注定，就是在有教养的人士面前给我自己的全体男女主人公抹黑吗？他们中间有的吃吃喝喝，还有的决不没有缘由地发疯，多没劲！

十八

同时，波洛佐夫老人却相信婚期就在眼前了。臆想的未婚妻对臆想的未婚夫持以这等冷淡态度，还说婚期就在眼前！莫非他没有听见他们谈话？固然，女儿和臆想的未婚夫并不总在他面前转悠。他们跟他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少，单独在另一个或另几个房间里坐着或走动的时候多，可是他们的谈话并不因两人单独待着而有丝毫不同。任何洞悉人类心灵（尽管洞悉人类的心灵实际是不可能的）的人听了这些谈话，都不敢再指望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和比蒙特能成婚了。不是说他们彼此完全不谈感情，不，他们也谈，好像在谈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那样，可是他们谈得很少。谈得很少倒没关系，主要是谈的什么和用什么语调来谈！语调冷静得叫人气愤，内容又荒谬绝伦得令人发指。下面举个例子，这是发生在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使比蒙特一

再道谢的那次访问的一个星期以后，他们结识的两个来月以后。那时工厂出盘已经办妥，洛特先生打算第二天动身回国（他就动身离去了，您别以为他会在这门婚事上无事生非，节外生枝。他正如一位巨贾应做的一样，做完了生意，便宣布比蒙特已由公司任命为厂长，年薪一千镑。这原是意料到的，他只做生意，不管别的。他何必要多管闲事呢？您自己想想吧），工厂的股东们，包括波洛佐夫在内，明天就可以拿到钱（他们真的拿到了手，您别以为会节外生枝：霍奇逊—洛特公司是一家有经济实力、可靠的商号），一半拿现金，还有一半是三个月后兑现的期票。波洛佐夫对此甚为满意，坐在客厅中一张桌子旁边重新查看这些有价证券。每当女儿和比蒙特走过客厅，他多少也能听到一点他们的谈话，他们正在临街的四间相通房子里来回走动。

“如果一个女人或姑娘被世俗偏见所困扰，”比蒙特说，他已经不用英国式或者美国式的词语，“那么连男子——我说的是正派男人——也会因此而感到非常为难。您说吧，一个姑娘没有体验过在接受求婚后的那种普通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关系，人家怎么能娶她呢？她没法断定，她将来是否喜欢跟她未婚夫那种性格的人一块持家过日子。”

“但是，比蒙特先生，如果她跟这个人的关系在他求婚以前就带有持家过日子的性质，这毕竟能给予她和他一定的保证，保证他们往后仍然会互相满意。”

“一定的保证，不错。可是，假如她的体验更丰富、更多方面，总会更可靠得多。”

她毕竟凭经验不能知道由她加入的男女关系的性质；因此结婚对于她还是经历一场可怕的冒险。就她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对于她所嫁的那个正派男子同样也是冒险。一般地说，他还能够判断他将来是否满意：他深知各种性格的妇女，体验过哪种性格更适合于他。而她却不然。”

“但是她可能观察过自己家里和熟人家里的生活以及家人和熟人的性格，她可能反复地考虑过。”

“这一切都好得很，不过还不够。无论什么也不能代替亲身的经验。”

“您以为只有寡妇才有资格出嫁，对吗？”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笑着说。

“您可说到家啦。只有寡妇。姑娘们该禁止出嫁。”

“对。”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认真地说。

波洛佐夫最初听见这些偶然传入他耳中的谈话或谈话片段，他感到很刺耳，可是现在已经听惯了。他想：“那也没有什么，我自己就是个没有世俗偏见的人。我做了生意人，娶的也是生意人的女儿。”

第二天，谈话中的这个部分——这原只是谈话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他们平日根本不谈这个，而是谈其他各种各样的题目——昨天谈话中的这个部分又这样继续下去了：

“您对我讲过您跟索洛夫卓夫的恋爱史。这算什么呢？这是一种……”

“如果您不是一定得走动，那我们就坐下吧。我走累了。”

“好的……一种幼稚的感情，它不能给您任何保证的，只能叫您回忆起来觉得可笑，也可能觉得可悲，因为这儿有着很可悲的一面。您所以幸免于难，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特殊机遇：幸亏这件事碰到了亚历山大来处理。”

“谁？”

“马特韦伊奇·基尔萨诺夫，”他补充道，仿佛他本来就不是只说到“亚历山大”这个名字便停下来的：“没有基尔萨诺夫，您早被肺病或者被那个坏蛋给毁了。可以从这件事得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看法：您过去的社会地位对您是有利的。您能够得出这个看法。这一切都挺圆满，但是这一切仅仅使您变成一个更审慎、品行更好的人，却没有给予您任何一点经验，使您能够辨别哪种性格的丈夫才对您合适。不是坏蛋，而是正直的人——您也就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固然挺好，可是，难道一个正派女子所挑选的未婚夫，不管其性格如何，只要是正直，就能够使这正派女子满意吗？需要更准确细致地了解这人的性格和男女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需要完全另外的一套经验。昨天我们还说，借用您的话，就是只有寡妇才有资格出嫁。您可算什么寡妇呢？”

比蒙特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某种不满情绪，最后一句简直有些恼恨的味道了。

“对，”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有点泄气地说，“可是我总不能骗人呀。”

“您也骗不了人，因为没有经验是装不出有经验的样子的。”

“您尽说我们姑娘家没有办法做出适当的选择。一般来说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不需要这套经验也能保证适当的选择。假如一个姑娘不是太小，她定会了解自己的性格的。比方说，我就了解自己的性格，而巨看来我的性格不会变了。我今年二十二岁。我知道我需要的幸福是什么：平平安安地过生活，谁也不来妨碍我的安静生活。此外也不需要别的了。”

“对，这是看得出来的。”

“要看出某人性格上有没有使我幸福所必须具备的特点，难道就真是那么困难吗？其实只要交谈几次就看出来了。”

“对。但是您自己也说这是例外的情况，一般规律不是那样。”

“一般规律当然不是那样。不过，比蒙特先生，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下，我们所说的那种在我们的观念和风俗中，不能指望一个姑娘具有男女方面日常关系的必需的知识，也就是我们说的，缺了那种知识，一个姑娘很可能会冒着择偶不当的危险了。她在今天条件下所处的境况已是走投无路。在这些条件下，无论她进入了怎样的男女关系，都几乎绝对得不到那份经验。她不能指望从中获益，而危险却颇大。这个姑娘可能很容易真的失去自尊，学会卑劣的欺骗，因为她必定得欺骗亲属和社会，对他们进行隐瞒，而这离开那真正损害她的品格的欺骗已不算远了。她甚至很可能真的把人生看得过于轻易。”

随随便便。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她保持完美无瑕，那么她心里必定是很痛苦的。而同时，她在持家过日子的经验方面几乎还是十分无知的，因为这些对她的性格有危害或者折磨她的心灵的男女关系毕竟是装模作样、欢庆佳节似的，不像持家过日子那么乎平常的。

您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您的劝告绝对行不通。”

“那当然，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可是正因为这样，才说我们的生活太糟了。”

“我们在这一点上看法自然是一致的。”

这算什么啊？照一般人的观念，不待说，纯属胡言乱语，但就他们个人关系来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男的说：“我怀疑您能不能做我的好妻子。”女的却回答道：“不，请向我求婚吧。”脸皮出奇地厚！或者，也许不

会是那样？也许男的是说：“我不必考虑我跟您在一起我是否幸福，不过您即使在挑选我的时候也要慎重。您已经选中我，可是我请求您再考虑考虑。这可事关重大。虽然我很爱您，但是假如您缺乏缜密慎重的研究，您连我也别相信。也许女的回答：“我的朋友，我看得出您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我考虑。您说得对，我们姑娘家真是太可怜，我们受人欺骗，我们被人蒙住眼睛牵着走，容易上当。可是您不用替我担心，您不会欺骗我，我的幸福靠得住。我对自己是有把握的，正如您对自己一样。”

“有一件事叫我奇怪，”第二天比蒙特继续说（他们又在那几间房里来回走动，波洛佐夫坐在其中的一间），“有一件叫我奇怪，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还有美满的婚姻。”

“您说话的口气，仿佛您对世上有美满的婚姻感到懊恼似的。”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笑道。现在她明显地常常发笑，总是那么愉快的微微一笑。

“美满的婚姻确实会引起可悲的想法：即使姑娘家只能用这种可怜的办法来判断自己的要求和男子的性格，而她们还总是能作出合适的选择，那么这表明妇女是有着怎样清醒健全的头脑啊！妇女生来有着多么精确、有力而敏锐的智慧啊！但是这种智慧没有给社会带来益处，社会排斥它、压制它、扼杀它，假如这种智慧没有被排斥、被扼杀，而能够尽其发挥作用，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会加快十倍。”

“您在为妇女唱赞歌，比蒙特先生。能不能简单地用‘机遇’来解释这个现象？”

“机遇！有很多事您可以用‘机遇’来解释，但是如果机遇大量地出现，那么您知道，其中除了一部分是靠偶然性造成的，另一部分则应该是由一个共同原因引起的。在这儿不能想象还有任何别的什么共同原因，除了我的这个解释：妇女择偶适当全靠她们有力而敏锐的智慧。”

“您在妇女问题上是不折不扣的斯陀夫人，比蒙特先生，她证明黑人是一切种族中最有才能的种族，他们的智力高于白种人。”

“您在开玩笑，我可完全没这意思。”

“您生我的气了，恐怕是由于我没对妇女表示崇拜吧？可是，请您原谅，人没法给自己下跪呀。”

“您在开玩笑，我的懊恼可是认真的。”

“该不是抱怨我吧，妇女没能做到您认为必须做到的事，这我是没有过错的。不过假如您愿意的话，我也可以认真地告诉您我自己的一个严肃的意见，但并不是关于妇女问题（我不愿做自我评说），是关于您本人的，比蒙特先生。您是一个善于自持的人，但您一谈起这个就很激动。由此可见，您在这个问题一定有什么切肤之痛。大概有一个您所谓的没经验的姑娘在择偶上犯了什么错误，而致使您承受了痛苦。”

“也许是我，也许是跟我亲近的其他人。不过您考虑一下吧，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等我得到您的答复的时候再告诉您这件事。三天之后请您答复。”

“答复您没有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吗？难道我对您了解得那样少，竟需要考虑三天？”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停下步来，用一只手搂住比蒙特的脖子，使他的头挨近自己，然后吻了吻他的额头。

照一切惯例，甚至只照礼貌本身的要求，比蒙特应当拥抱她，该吻她的嘴唇。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只是握住了她那只搂着他脖子上垂下来的手。

“好，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但您还是考虑一下吧。”

他们又走动起来。

“谁告诉您我没有用比三天多得多的时间来考虑过这问题，查理？”
她回答，没有松开他的手。

即查理士。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早已看到。那么我还是现在就告诉您吧，这可是一个秘密。”

我们到那间房里坐下谈，免得他听见。”

他们走过老人身旁的时候，这段开场白已经讲完了。老人头一次看见他们手挽着手走着，心想：“他求过婚了，她也答应了。好啊。”

“说您的秘密吧，查理，这儿说话爸爸听不见。”

“我似乎一直都在为您担心，这看来很可笑，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我当然用不着担心。可是等我把我的一个实例告诉您，您就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来警告您了。您当然会看出我跟您可以在一块生活。不过我怜惜她。她经受过那么多痛苦，有那么多年失去了她所需要过的那种生活。真可怜。我亲眼见到的。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全一样，假定在纽约、波士顿、费城——您知道，反正都一样。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认为她丈夫也是个很好的人。他们非常地相爱。可是她又不得不在痛苦中度日。哪怕对她的幸福有一点增进，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也情愿，而她跟他在一起还是不感到幸福。幸亏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但是她挺难过。您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还没有得到您的答复。”

“我可能从谁那儿听到过这个故事吗？”

“有可能。”

“可能从她本人那儿？”

“有可能。”

“我还没有给你答复呢？”

“没有。”

“你知道我的答复吗？”

“知道。”比蒙特说，于是开始了未婚夫妻之间应有的常见的亲热拥抱场面。

十九

第二天三点钟左右，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去看韦拉·巴夫洛夫娜。

“我后天结婚，韦拉·巴夫洛夫娜，”她一进门就说，“今天晚上我领我的未婚夫来看您。”

“一定是比蒙特吧？您早已爱他爱得发疯了。”

“我？我爱他爱得发疯？我一向是非常平静和理智的。”

“我非常相信您跟他谈话是平静和理智的，可跟我却不然。”

“真的吗？这倒奇怪了。不过更奇怪的是，他很喜欢你们，你俩，不过他喜欢您，韦拉·巴夫洛夫娜，更远远超过喜欢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

“这有什么奇怪呢？您一对我谈起他就满心欢喜，只要您对他谈起我来那份欢喜劲有十分之一，那当然……”

“您以为他是从我这儿才知道您的吗？问题正在于不是从我这儿，而是他自己知道的，他对您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

“这可真新鲜！这倒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这就告诉您。他从来彼得堡的第一天起，就焦急地盼着跟您见面。”

可是他觉得最好把结识您的时间向后推迟，推迟到他不是一个人，而是跟未婚妻或太太一道来的时候。他觉得，您看到他俩比看到他一个人会更愉快些。您要知道，我们能够结婚，是因为他希望跟您结识。”

“他娶您的目的是为了结识我！”

“娶我！谁说他娶我的目的是为了您？不是啊，我们结婚当然不是由于喜欢您。可是，难道他来彼得堡以前，我和他就知道世界上有我们这样两个人啦？假如他不来，我和他怎么能认识？而他来彼得堡却是为了您。您真滑稽！”

“您说过他讲俄语比英语讲得好，是不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激动地问道。

“他讲俄语跟我讲得一样好，讲英语也跟我讲得一样。”

“卡坚卡，我的朋友，我多高兴啊！”韦拉·巴夫洛夫娜跑过去拥抱她的客人。

“萨沙，过来！快！快！”

卡坚卡，卡捷琳娜的爱称。

“什么事，韦罗奇卡？您好，卡捷琳娜·瓦……”

他还没来得及说完她的名字，客人已经吻他了。

“今天是复活节，萨沙。对卡坚卡说一声：他真的复活了。”

复活节，基督教中这一节日同基督复活的神话有关，纪念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的节日，教徒在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始行庆祝，（此节一般在俄历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

教徒在复活节相遇时，一个说“基督复活了，”另一个答道：“真的复活了，”同时互相拥抱，接吻。此句中的“他”指洛普霍夫。

“这倒底怎么回事？”

“坐下，让她讲，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来龙去脉呢。得了，你们吻够了，还当着我的面！讲吧，卡坚卡。”

二十

晚上当然更为喧闹，当秩序恢复以后，比蒙特根据两位新相识的要求，开始讲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他直接从到美国时讲起。“我一到那儿，”他说，“就想着怎样才能尽快地取得美国国籍。为此我必须跟人家交朋友，跟谁交呢？当然是跟废奴派。我写过几篇文章，论述农奴制对俄国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登在《Tribune》上。这给废奴派反对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度提供了一个挺有力的论据，于是我变成马萨诸塞州一名公民了。”

我到美国不久，又通过废奴派的关系，进了他们在纽约开设的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商店中的一家，在经理办公室得到一个职位。”再往后就是我们熟悉的那段经历。可见，至少比蒙特自传中的这一部分是不该怀疑的。

指《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报创办于一八四一年，系美国废奴派的机关报。

二十一

当晚他们商定，两家找两套相邻的住所。在寻找合适的住所和布置房屋期间，比蒙特夫妇暂住工厂：依照公司的指示，厂里为厂长安排了住所。这样离城远居乡间，可以说替代了一次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原是一种良好的英国习俗，现在已经流行于全欧洲了。

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们找到了两套紧挨着的舒适的住所，基尔萨诺夫家住进了一套，比蒙特家住进了另一套。波洛佐夫老人却宁愿留在工厂的住所，住所很宽敞，还能使他依稀想起他昔日的显赫。他乐意留在那儿还有一个原因，他已经成了当地方圆三四俄里以内最可敬的人物。有无数的迹象表明，他在本厂和城郊四邻各厂的工头、同业公会会员、以及按社会地位来说不如工厂的工头或略微超过他们些的近郊的其他从业人员中间享有着崇高的威望。他差不多是心满意足地、家长似地接受了人们公认他是该地区首要人物的表示。他的女婿几乎每天早晨都来工厂，女儿也几乎天天陪同丈夫来。夏天他俩就把工厂当别墅，完全搬过来住。在每年的其余时间，老人除了早晨接待女儿和女婿（他依然是个北美人）以外，还常常，每周一次或更多，十分快活地接待那些跟卡捷琳娜和她丈夫一同来参加晚会的客人们——有时只有基尔萨诺夫夫妇和几个年轻人，有时人数多些，工厂变成基尔萨诺夫和比蒙特国内人经常进行郊游的一个吸引人的地点了。

每逢客人一拥而入的时候，波洛佐夫感到心满意足，他怎能不心满意足呢？一个不失其家长威严的主人的角色是由他来担任的啊。

二十二

两家中每一家都按自己最喜爱的方式来过生活。平日总是一边比较热闹，一边比较清静。他们像一家人似的常见面，有时候一天竟见上十次，但是每次不过一两分钟；有时候一边屋子整天都空着，人全跑到另一边去了。这要酌情而定。有时来了一帮客人，又要酌情而定：有时两家的房门还是关着的，因为连接一家的大客厅跟另一家的小客厅的几扇门平时都锁着，经常不锁的只有韦拉·巴夫洛夫娜和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两个卧室之间的那一扇门。总之，有时连接两间客厅的门还是关着。这是朋友来得不多时的情形。假如参加晚会的人数太多，这些房门就要敞开了。客人们简直不知道自

已是来谁家做客，是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家呢，还是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家。连两位女主人对此也分不大清楚了。也许只能勉强来分一分：年轻人想坐一坐的时候，大多就到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那一边去了，不想坐的话，就多半待在韦拉·巴夫洛夫娜这一边了。不过年轻人算不上客人，他们是自己人，韦拉·巴夫洛夫娜可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赶到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那边去：“各位先生，你们烦死我了，找卡坚卡去，她永远不会烦人的。为什么你们在她面前更听话？我好像还比她年长呢。”——“您听了别不舒服，比较起来，我们更喜欢她。”——“卡坚卡，干吗他们更喜欢你？”——“他们在我这儿挨剋少，更随便。”——“是啊，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把我们看作是老成持重的人，所以我们在她面前也能稳重自持。”去年冬天，他们想出了一个在家的新玩法，当只有年轻人和最亲近的朋友聚会的时候才常常玩的，效果很不错。他们把两家的两架钢琴挪到一块，叫两位女主人各弹一架钢琴，面对面而坐。年轻人们抽过签分成了两个合唱队。每个合唱队站在各自的领唱人背后，同时唱歌。韦拉·巴夫洛夫娜领着她的合唱队唱《La donna e mobile》，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领着她的合唱队唱《我早已被你抛弃了》。或者，韦拉·巴夫洛夫娜跟她的合唱队唱贝朗瑞的一首《莉泽特之歌》，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就跟她的合唱队唱《叶辽穆什卡之歌》。今年冬天又时兴另一种玩法：原先的两个领唱人根据自己的爱好，通力合作改编了《两位希腊哲学家关于美的论争》，开头是这样：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两眼朝天看，无精打采地叹息一声说：“绝妙的席勒，我的心为你陶醉了！”韦拉·巴夫洛夫娜郑重端庄地反驳道：“但是科罗辽夫鞋店的缎纹面料的鞋子也同样美呀。”随即向前伸出一只脚来。

年轻人中如果有谁在她们辩论时发笑，便罚他站屋角。辩论结束，十至十二个人中间往往只剩下两三个没有挨罚。当他们把比蒙特哄来跟他们一块玩，再打发他站屋角的时候，更是乐得不可开交了。

《我早已被你抛弃了》（一八五五），涅克拉索夫作词。

《莉泽特之歌》指法国诗人贝朗瑞（一七八一—一八五七）所作的《不，你不是莉泽特》。俄文译者为著名讽刺诗人库罗奇金。

《叶辽穆什卡之歌》由涅克拉索夫作词（一八五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民众青年中十分流行。

《两位希腊哲学家关于美的论争》（一八五四），科齐马·普鲁特科夫（任丘日尼科夫兄弟和阿·康·托尔斯泰的共同笔名）的一篇讽刺作品，旨在嘲笑“纯艺术”论者。

还有什么呢？各缝纫工场还继续存在着，彼此友好相处。现在已经有三家工场。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早就单独办了自己的一家，她现在在许多方面都能代替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工场的工作，不久她一定会完全顶替她，因为韦拉·巴夫洛夫娜今年——请原谅她吧！真的要参加取得医生资格的考试，那时她简直就完全没有工夫管理工场了。

“可惜这些工场没有机会发展，能发展该多好。”韦拉·巴夫洛夫娜有时候说。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根本不作答，但是眼睛露出愤怒的目光。“你太急躁，卡佳。你比我还糟呢，”韦拉·巴夫洛夫娜说道，“幸亏你父亲还有点钱，这很好。”——“是啊，韦罗奇卡，这很好，我这就可以对儿子放心了。”（可见她有了一个儿子）——“不过，卡佳，你叫我不知该怎么想。我们会平平安安的。”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沉默不语。——“是的，

卡佳，你就为着我，说一声‘是的’吧……”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笑了。“这不取决我说‘是的’或者‘不是’，但是为了让你高兴，我就这么说一句，是的，我们会平平安安的。”

他们担心自己可能被捕，或受到沙皇政府其他形式的迫害。

他们果然平平安安地生活着。他们过得和睦融洽，过得又宁静又热闹，又快活又讲实效。可是还不能得出结论说，我这篇讲述他们的故事到此结束了。不。他们四个人都还年轻、精力充沛，虽然他们过得和睦融洽、舒适安定，但是他们的生活决没有因此就引不起人家的兴趣，远非如此。我还有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呢，我担保，我接下去所要讲的故事比先前讲过的还饶有趣味得多。

二十三

他们生活得快乐而融洽，他们工作、休息、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展望未来时虽然不是毫无忧虑，却怀着坚定的、完全有把握的信心，相信会越来越越好。他们这样度过了前年和去年的时光，今年也是同样，今年的冬天几乎过去了，积雪已经开始融化。韦拉·巴夫洛夫娜问道：“还有没有结冰的日子，哪怕一天，好让我们至少来安排一次郊游呢？”谁也回答不了她的问题。但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尽是化雪解冻的天气，冬季郊游的希望一天比一天减少。可是终于盼来了（正当失望的时候，降下了一场真正的冬雪，也不再化冻了，却是出现了令人心旷神怡的、微微的寒意）。天空清澈无云，晚上定是个好天。郊游！郊游！太仓促了，来不及找别人，就举行一次小规模的郊游吧！不邀请外人来的郊游吧。

当晚有两辆雪橇驶了出来。一辆雪橇上有说有笑，另一辆雪橇上的人简直是毫无顾忌：他们刚出门便放开喉咙大声唱起来，而且唱的什么呀：

有个年轻的姑娘
走出了新大门，
走出了新的槭木门，
走出了栅栏门，
“我的亲爹可真叫人害怕，
他待我才严呐！
不许我游逛到天晚，
不许我跟单身少年玩耍。
只要能让你小伙子高兴，
爹爹的话也去他的吧……”

引自一首俄罗斯民歌。

不必说，他们是找到了一支好歌曲！只是仅此而已吗？他们慢慢地驶着，落后了四分之一俄里，但是他们却突然疾驰起来，高喊着尖叫着赶了过去，他们赶过的时候，把许多雪球往那辆开心活跃可又不失其沉稳的雪橇上扔去。沉稳平和派吃了这么两三次亏以后，决定自卫他们放过豪放乐天派的雪橇往前边去，自己抓起一把把刚落下的雪，他们小心翼翼地积攒着雪，因

此豪放乐天派没有发觉。这时豪放乐天派又放慢了速度，落后了，沉稳平和派颇有心计，虽然储备了武器，可是追过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豪放乐天派又狂呼乱叫地追了上来，沉稳平和派准备出其不意地给他们一个狠狠的反击。然而这是怎么了？豪放乐天派的雪橇向右转了，越过一条水沟，完全不当回事，从相距五俄丈的地方跑过去了。“是的，这是她猜到了我们的计谋，她亲自抓起缰绳站立着赶车，”沉稳平和派说，“不行，不行，我们得追上！报仇！”是一场不顾死活的赛跑。他们能不能追上？……“追上！”沉稳平和派异常兴奋地说，“不行，”随后却绝望地说道——“追上，”又是一阵兴奋。——“他们追上啦！”豪放乐天派绝望地说。“追不上！”接着又兴奋地说。他们能不能追上呢？

沉稳平和派的雪橇上坐着基尔萨诺夫夫妇和比蒙特夫妇。豪放乐天派的雪橇上有四个年轻小伙子和一位太太，豪放乐天派所以那么豪放乐天，全因为她的缘故。

“你们好，mesdames 和 messieurs，我们又看到了你们，非常商兴，”她站在工厂门口的台阶上说，“各位，扶两位太太下雪橇。”旅伴们，补充说。

法语：女士们和先生们。

赶快，赶快进屋去！大家的脸都冻得通红了！

“您好，老头！可是他根本算不上老头！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您为什么对我瞎说，说他是个老头？他将来还会跟我调情呐。您会吗，亲爱的老头？”那位豪放乐天派的太太说。

“会的。”波洛佐夫笑道，她亲热地摸了一摸他的连鬓白胡子，他已经被迷上了。

“孩子们，他跟我调情，你们许可吗？”

“许可。”小伙子中的一个说。

“不许，不许！”其他三个说。

但是豪放乐天派的太太为什么穿一身黑衣？她这是服丧，还是想来个独出心裁？

“不过我累了，”她说，随即就扑倒在一张土耳其式沙发上，那张沙发跟大厅的一面墙同样长短，“孩子们，再拿几个靠垫来！不是光给我一个人用！我想别的太太们也累了。”

“是啊，您把我们也弄得筋疲力尽了。”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说。

“在这样坑洼不平的路上，跟在您后头猛跑，颠得我快散架子啦！”韦拉·巴夫洛夫娜说道。

“好在当时离工厂只有一俄里地！”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说。

两人都疲惫不堪地在带靠垫的沙发上坐下来。

“你们真笨！大概难得乘雪橇快跑吧？要是像我那样站起来就好了，有坑洼也没关系了。”

“连我们也累得够受。”基尔萨诺夫为他和比蒙特说话，他们坐在各自的妻子身边。基尔萨诺夫搂住韦拉·巴夫洛夫娜，比蒙特握着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一只手。

好一副充满诗情画意的图画！看到美满的婚姻是愉快的。可是穿丧服的太太脸上掠过一丝阴影，阴影转瞬即逝，因此除了她的一位青年旅伴，谁也没有发觉。他走到窗前，凝神注视着寒气在窗玻璃上轻轻勾勒出的冰凌花。

“Mesdames，你们的经历很有趣，可是我没有完整地听过，只知道它很

动人，听了开心，结局又美满，我喜欢这个。老头在哪儿？”

“他在忙家务活，准备小吃。他总是对那些事感兴趣。”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说。

“噢，那么就随他去吧。你们请讲吧，不过要简短些。我喜欢人家讲得简短。”

“我可以讲得很简短，”韦拉·巴夫洛夫娜说，“从我开始吧。轮到别人的时候，再让他们讲。不过我要预先让您知道，我的经历结尾有些秘密。”

“那有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先生赶出去。要不要现在就赶呢？”

“不，现在他们还可以听。”

韦拉·巴夫洛夫娜开始讲自己的经历了。

“哈哈！这个可爱的朱丽！我很喜欢她！她能屈膝下跪，也能破口大骂，行动举止毫不拘礼！可爱！”

“好啊，韦拉·巴夫洛夫娜！‘我跳窗！’好啊，各位！”穿丧服的太太鼓起掌来。

仿佛一声令下，小伙子们也发狂地拍起手，大声叫喊“好啊”、“呜啦”。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过了两三分钟，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惊恐地问道。

“不，没有什么，不要紧。给我一点水，不用费心，莫索洛夫已经去拿了。谢谢，莫索洛夫。”拿水来的是原先站窗前的那个青年旅伴。她接过水来，“你们看，我把他调教得多好，他什么事都能早知道。现在我全好了，请继续说下去，我听着。”

“不行，我累了。”过了五分钟左右，她又说，同时镇静地从沙发旁边站起来。

“我需要休息休息，睡一个到一个半小时。你们看，我不顾礼貌地走了。莫索洛夫，我们去找找老头，他会给我们安排的。”

“请问，为什么不让我来安排照料呢？”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说。

“不必费心了吧？”

“您要丢下我们吗？”一个年轻人做出演悲剧的姿态，说，“要是我们早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会随身带着匕首来。而现在我们没办法自杀。”

“小吃一端上来，我们就用叉子自杀！”另一个年轻人说，他为自己突然想出办法而感到喜悦。

“不行，我不愿让祖国希望之所系英年早逝，”穿丧服的太太同样悲壮地说，“想开些吧，我的孩子们，莫索洛夫，把那只小些的靠垫搁到桌上！”

莫索洛夫把靠垫搁在桌上。穿丧服的太太摆出一副庄严的姿态站在桌旁，慢悠悠地将一只手放在靠垫上。

年轻人都毕恭毕敬地吻了吻她的手。

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安顿这位疲倦的女客去睡觉了。

“可怜的女人！”她们离开大厅以后，其余三个属于沉稳平和派雪橇上的人齐声说。

“她了不起！”有三个年轻人说道。

“这才说对啦！”莫索洛夫扬扬得意地说。

“你跟她认识好久了吧？”

“三年左右。”

“跟那男的 也很熟？”

指她在狱中的丈夫。

“很熟。请你们别担心，”他转向三个属于沉稳平和派雪橇上的人，补充道，“她完全是因为累了。”

韦拉·巴夫洛夫娜疑惑地跟丈夫和比蒙特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摇摇头。

他们认为，“穿丧服的太太”离开众人不是为了去歇乏，而是要独自排遣心头的烦恼。

“别瞎说！什么累了！”基尔萨诺夫说。

“我向您担保，她完全是因为累了，睡一觉，就会好的。”莫索洛夫心平气和地、用安慰人的口气重复一遍。

过了十来分钟，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回来了。

“怎么样？”六个人同声问道。莫索洛夫没有提问。

“一躺下就睁不开眼睛了，现在大概已经睡着了。”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莫索洛夫说，“没有关系。”

“毕竟太可怜！”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说，“以后当着她的面，我们不要成双结对，我跟你在一起，韦罗奇卡，查理跟萨沙在一起。”

“我们这样也不受限制，”莫索洛夫说，“我们照样可以唱歌啦，跳舞啦，大喊大叫啦。她睡得很熟。”

真的，既然她已经睡着，既然没有关系，那又何必总惦着她呢？穿丧服的太太在那一刻钟造成的悲戚的印象，虽然没有完全过去、消失、被遗忘，可也差不多了。她不在场，晚会就渐渐恢复了以前一切同类晚会的活动，终于完全正常了，进行得挺愉快。

愉快，可是不十分愉快。至少，两位太太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互相交换了五六次目光。韦拉·巴夫洛夫娜两次悄悄地对丈夫说：“萨沙，万一我碰到这种事，会怎么样呢？”第一次，基尔萨诺夫不知该怎么回答好。第二次他才想出：“不，韦罗奇卡，你不可能碰到这种事。”——“不可能？你有把握？”——“是的。”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也两次悄悄地对丈夫说：“我不会出这种事吧，查理？”第一次，比蒙特只是微微一笑，但是那微笑并不快活，不能叫人宽慰。第二次，他也想出了：“大概不会；大概。”

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反应，而且仅仅是最初的反应。总的来说，晚会进行得很愉快，过了半个小时，简直是十分愉快了。他们聊天、玩耍、唱歌。莫索洛夫担保说，她睡得挺熟，于是带头玩起来。况且他们确实不可能打扰她：她睡觉的房间离大厅很远，要经过三个房间、一条走廊、一座楼梯，然后又是一个房间才能走到。那完全是在住宅的另外半边了。

这样晚会气氛完全好转了。

年轻人像平常一样，时而加入到其余的人当中去，时而分开，时而全体一块，时而不是全体。比蒙特有一两次自己去找他们，韦拉·巴夫洛夫娜有一两次把他们全体从他身边引开，使他们离开严肃的谈话。

聊天聊了很久，大家又聚在一块议论，但是时间并不长。

所有的人都坐在一起。

“可是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呢：是福还是祸？”做出过悲剧姿势的年轻人问道。

他们在谈论“穿丧服的太太”的丈夫是否有希望出狱。

“祸多福少。”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为什么呢，韦罗奇卡？”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问。

“不管怎么样，生活很难免掉灾祸的。”比蒙特说。

“那是必然的。”基尔萨诺夫确认。

“否极泰来嘛。”原先发问的人肯定地说。

国内情况愈糟，革命来得愈快。

他们其余三个同伴点头说：“讲得好，尼基京。”

年轻人都坐在一边。

“我不认识他，尼基京。你大概认识吧？”莫索洛夫问道。

指拉赫梅托夫。

“我当时还小。见过他。”

“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怎么样？他们说的可是真话？不是因为友谊关系才美化他？”

“没有。”

“以后没有人见过他？”

“没有。不过当时比蒙特不是在美国吗？”

“真的！卡尔·亚科夫利奇，请过来一下。您在美国碰见过他们说的那个俄国人吗？”

“没有。”

“是他回国的时候了。”

“是啊。”

“我心里有个绝妙的想法，”尼基京说，“他跟她正是天生一对。”

指拉赫梅托夫跟“穿丧服的太太”。

“各位，来一个人跟我一起唱。”韦拉·巴夫洛夫娜说，“来两个？那更好。”

只剩下莫索洛夫和尼基京了。

“我可以让你看一件有趣的事，尼基京，”莫索洛夫说道，“你以为她睡着了吗？”

“没有。”

“可别出去。往后你跟她更熟些了，你可以告诉她。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说。她会不高兴的。”

住所的窗子挺低。

“你瞧，有灯光的地方一定是窗口吧？”莫索洛夫望了一眼。“是窗口。看见吗？”

穿丧服的太太把一张扶手椅挪到了桌子旁边，坐在那儿。她的左臂肘支在桌上，手托着稍稍歪着的头，遮住太阳穴和一部分头发。她的右手平放在桌面，手指机械地抬起又放下，仿佛在弹奏一支乐曲。她脸上的神情有些木然，露出一种严峻多于悲伤的沉思来。两道眉毛时而微微皱起，时而又稍稍分开来。

“她一直是这样的吗，莫索洛夫？”

“你看见了，可还是走吧，不然我们会着凉的。我们已经站了一刻钟了。”

“你心肠好狠！”他们走过前厅中的一盏反射灯旁边的時候，尼基京凝视了一下他同伴的眼睛，说道：

“我瞧惯了，这在你还是头一回见。”

小吃端上来了。

“一定是上等伏特卡，”厄基京说，“味儿真冲！我喝得都快呛着了！”

“嗨，简直是个小姑娘！连眼睛都红啦！”莫索洛夫说。

大家开始奚落厄基京。“要不是呛了一口，我是能喝的。”他为自己辩解道。有人问现在几点钟。才刚刚十一点，还可以聊它半个小时，不用急。

过了半个小时，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去叫醒穿丧服的太太。太太在门口遇到她，太太刚睡醒，还在伸着懒腰。

“睡得好吗？”

“好极了。”

“觉得怎么样？”

“挺好。我本来对你们说过不要紧：我累了，因为胡闹得时间太长了。从现在起，我要矜持些了。”

不，她可矜持不起来。才过了五分钟，她又在那儿挑逗波洛佐夫，对年轻人发号施令，用两只叉子把儿在桌上敲出进行曲或者此类的曲调。但是她催着要走，而其他的人看到她重又胡闹起来，个个更加快活，并不急于走了。

“车马准备好了吗？”她从餐桌旁边站起，问道。

“还没有，刚吩咐套车。”

“真受不了！不过既然这样，韦拉·巴夫洛夫娜，您就给我唱点儿什么吧，我知道您有一副好嗓子。”

韦拉·巴夫洛夫娜唱了一曲。

“以后我要经常请您唱唱。”穿丧服的太太说。

“现在该您啦，现在该您啦！”大家磨上她了。

但是她不等人家磨，就在钢琴旁边坐了下来。

“好吧，不过我不会唱啊，可是这不妨碍我唱，没有什么能妨碍我！mesdames 和 messieurs，我唱歌可完全不是为了你们，我唱歌是为了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别笑话妈妈啊！”她弹弹和弦，自己配了一支伴奏曲，“孩子们，不许笑，我是带着感情来唱的。”然后她尽量提高调门，开始唱道：

一只灰蓝色的鸽子

年轻人出乎意料之外，听到这支歌曲都噗哧地笑了，其余的同伴也笑了起来，连歌手自己也忍俊不禁，但是她竭力抑制着，加倍高亢地唱起来：

不分昼夜地悲啼：

它那心爱的情人……

这是感伤主义诗人兼寓言作家德米特里耶夫（一七六一—一八三七）所作《小鸽子》（一七九二）中的一段，第四句是“已经远远飞去。”

唱到这个字的时候，她的声音果真颤抖起来，随后便中断了，“唱不出来了，唱不出来最好，下一句本不该唱，还是唱点别的更好。我的孩子们，听从母亲的教导：别恋爱，要知道，你们本不该结婚。”她用雄浑的女低音唱道：

我们的山庄有许多貌美的姑娘，

星星在她们双眸深处闪着光芒；

甜蜜地去爱，是可艳羨的好运道！

不过，——

“这个‘不过’是蠢话，孩子们——”

不过独身的自由更加快乐美妙，

见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这不是反对的理由，这个理由是蠢话，不过你们都知道为什么：

不要结婚啊，年轻人，

你要听我的话！

见莱蒙托夫的长诗《伊兹麦尔—贝》（一八三二）。

“后面说的都是蠢话，孩子们，或许连这几句也是蠢话。可以的，孩子们，恋爱是可以的，结婚也是可以的，只要经过选择，不能撒谎骗人，孩子们。我要给你们唱一支讲我自己怎样出嫁的歌，这是一支古老的情歌，我也已经是个老太婆。我坐在我们达尔顿城堡的阳台上，要知道我是苏格兰人，白皮肤，浅色头发。附近有森林和布里纳尔河。

我的情人向阳台走来，当然是悄悄地走过来。他贫穷我富有，我是男爵的女儿，领主的女儿。但我很爱他，我对他唱道：

美丽的布里纳尔有着陡峭的河岸，

周围是一片绿色的林海；

在那里白天隐藏着我和我的旅伴，

“因为我知道他白天要躲藏起来，并且天天变换住处。

它比我父亲的老屋更可爱。

“我父亲的老屋确实不太可爱。于是我对他唱道：我要跟你一起出走。

你们猜他怎么回答我？

姑娘，你愿意做我的妻子，

愿意忘掉你的门第和地位，

“因为我原是一个贵族。

不过你首先要能猜到

上天给了我什么命运。

“你是个猎人吧？”我说，——“不，”“是溜进人家领地的偷猎者吧？”——“差不多猜中了，”他说。

当我们这些歹徒聚在一起，

“因为我跟你们，孩子们，还有 mesdames 和 messieurs，全是歹徒。

相信我，我们就应该忘记：

从前我们是什么人，

现在我们又是什么人。

“他这样唱道。‘我早猜到了，’我说，‘你是强盗。’嗯，不错，他是强盗。对吗？他是强盗。他怎么回答呢，各位？他说：你看，我不配跟你结婚：

姑娘啊，我不是你的好伙伴

我是荒野绿林中的一个居民；

“一点也不错，他是荒野绿林中的一条好汉，所以他说：别跟我走，

我的生活充满着危险，

“因为荒野绿林中有野兽，——

我的结局会是很悲惨

这不对，孩子们，他的结局不会悲惨，可是当时我和他都那样想的。

不过我还是回答道：

美丽的布里纳尔有着陡峭的河岸，

周围是一片绿色的林海；

在那里白天隐藏着我和我的旅伴，
它比我父亲的老屋更可爱。

以上引自苏格兰小说家兼诗人司各特（一七七—一八三二）的诗《罗比克》（一八一三），其俄译为女作家巴夫洛娃（一八一—一八九四）。

“确实是这样，可是我并不懊悔：他事先就告诉了我，我所选择的道路。既然如此，那是可以恋爱和结婚的，孩子们，他没有骗我。你们要善于选择啊。

月亮升起了，
宁静又安详；
一个年轻的战士，
即将赴战场，
骑手将子弹上了膛，
姑娘对他讲：
‘听天由命吧，
再勇敢些，我的情郎！’

见莱蒙托夫的《伊兹麦尔一贝》，但与原诗略有出入。

“跟这样的姑娘可以恋爱，也可以结婚。

（“忘掉我对你说过的话，萨沙，你听她说！”一位太太握住对方的手，低声说。

——“为什么我没有对你说这些呢？现在我要说了。”另一位太太低声说。）

韦拉和卡佳最初为各自丈夫的安全担心，现在为“穿丧服的太太”的豪迈精神所鼓舞，赞成丈夫献身进步事业。

“这样的姑娘我允许你们去爱，而且为你们祝福，孩子们：

听天由命吧，
再勇敢些，我的情郎！
“跟你们在一起，我心里真舒畅，既然舒畅，就该喝它几杯。

喂，我的酒店老板娘，
倒点儿蜜，倒点儿酒，

“我们唱唱蜂蜜，因为不能把这个‘蜜’字从歌词中删掉呀。还剩下有香槟吗？有？好极了！开瓶！

喂，我的酒店老板娘，
倒点儿蜜，倒点儿酒，

让我心舒畅
让我心舒畅！

“谁是酒店老板娘？我是酒店老板娘：

黑眉毛的老板娘
皮靴后跟钉铁掌！”

以上出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其内容是记述一六三七年对波兰人的战役。

她霍地站了起来，摸了摸眉毛，又顿了顿脚后跟。

“我已经斟满，准备好啦！mesdames 和 messieurs、老头儿、孩子们，举杯，让心里头舒畅舒畅！”

“为老板娘干杯！为老板娘干杯！”
“谢谢！我为自己的健康于杯。”然后她又边弹边唱道：
让忧愁消失得无影踪！
“那一定会消失的。
让无限的欢乐
充满这复苏的心灵，

以上三句引自涅克拉索夫的《新年》（一八五一）。
“一定会这样，这是很明显的：
不祥的恐怖跑掉了，像个影子，
逃离开了明亮的白天；
光明、温暖和芳香，
迅速地驱赶开黑暗和寒冷；
腐朽的气息愈来愈弱，
玫瑰的芬芳愈来愈浓……”

见英国民主主义诗人胡德（一七九九—一八四五）的《诗篇》。此诗的俄译者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作家兼翻译家米海洛夫（一八二九—一八六五），当时他正在西伯利亚流放地。

第六章 布景的转换

“上拱廊市场！”穿丧服的太太说，不过现在她已经不是穿着丧服，而是换上了鲜艳的粉红连衣裙、粉红帽子和雪白的短斗篷，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她不是单独跟莫索洛夫乘车。莫索洛夫和尼基京坐在马车前部的长凳上，车夫台上高高坐着第三个青年，太太身边又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太太多大年纪呢？难道真是像她自己所说的二十五岁，而不是二十岁吗？如果她多说了几岁，那就是她的良心问题了。

拱廊市场位于涅瓦大街，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那里的一间大厅内经常举行公开演讲会和辩论会。

“是的，我亲爱的，我盼望这一天已经有两年了，或者两年多了。我认识他（她用目光指了指尼基京）的时候，还只是预感而已，谈不上能盼到。当时还只是一个希望，可是不久我就有了信心。”

“对不起，对不起！”读者——不仅是敏感的男读者，而是所有的读者——越想越不明白，说道，“她认识尼基京两年多啦？”

“对。”我回答。

“她不是在今年冬末这次郊游会上认识尼基京的吗？不是跟她认识基尔萨诺夫夫妇和比蒙特夫妇同时的吗？”

“完全对。”我回答。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您在开始讲一八六五年的事啦？”

“是的。”

“这可能吗？哪能呢！”

“如果我知道的话，为什么不能讲？”

“够了，谁听您的！”

“您真不愿听？”

“您把我当什么人啦？当然不愿。”

“如果您现在不愿听，我自然只得推迟到您愿意听的时候再继续讲我的故事。我希望很快能等到这一天。”

一八六三年四月四日

附录

第四章第十七节定稿译文

过了一年，新的工场已经完全安排就绪。新旧工场之间联系密切，还相互转让订货。

有时这家工场接活过多，另一家有时间来完成它。它们中间立有一份来往账目。如果双方更为接近，其资金数额是足够在涅瓦大街上合开一个门市部的。这又够让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梅察洛娃奔波张罗好一阵子的。虽然两家的女工关系融洽，虽然两家常常互访做客，虽然她们常常去郊游，但两个不同的企业联营的主意毕竟是个崭新的想法，需要长时间向她们多方面地进行解释。不过，在涅瓦大街设立门市部显而易见是有利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梅察洛娃为两个企业联营问题奔忙了几个月，终于达到了目的。于是涅瓦大街上出现了一块新的招牌：“Au bon travail. Magasin des Nouveautés”。门市部开设以后，业务发展得比从前更快了，盈利也越来越多。梅察洛娃和韦拉·巴夫洛夫娜谈话时已经在幻想着，再过两年左右，这两家缝纫工场就会变成四家、五家，不久更会变成十家、二十家了。

门市部开设后三个来月，一位似曾相识的医学界同行来看基尔萨诺夫，谈了许多各种疑难病症，而谈得最多的是他自己的一种医疗方法的奇效，这方法便是在病人的胸口和腹部放上两只装满碎冰的狭长口袋，每只口袋都用四块餐巾裹着。最后他才说，他有一个熟人希望能跟基尔萨诺夫认识认识。

基尔萨诺夫满足了这个愿望；这次结识是挺愉快的，他们谈了许多，顺便谈起了门市部。他解释说，门市部的开设确实是以商业为目的的。他们就门市部的招牌、就招牌上写有“travail”一字合适否的问题谈了很久。基尔萨诺夫说，“travail”的意思是“工作”，“An don travail”便是“精工”。他们讨论，是否用人的姓氏来代替这个词语更好些。基尔萨诺夫说，他妻子的俄罗斯姓氏会造成营业上的损失。最后，他想出这样一个办法：他妻子叫韦拉，“韦拉”相当于法文“foi”。假如招牌上能用“A labonne foi”代替“An bon travail”，那不就是可以了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诚信商店”，什么破绽也找不到，并且女主人的名字也在招牌之中了。他们经过考虑，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基尔萨诺夫费了极大的努力才把谈话转到这些问题上来，总算是取得了成功，因此他回家的时候很满意。

但是无论如何，梅察洛娃和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梦想已无法展翅飞翔了，她们关心的只是维持，而不是往前迈进了。

这样，由于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梅察洛娃多余的热情冷却了，缝纫工场和门市部虽然还继续存在着，却已经不再发展了，可是能够继续存在已是

值得庆幸的了。基尔萨诺夫继续结交新朋友，这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这样又过了两年或两年多，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

第四八二页初稿译文

“……现在他在哪儿？”

“据说，有人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维也纳到慕尼黑的途中，他说，他过一年要去美国。”

“比蒙特在美国没有碰见他？”

“没有。”

“结果没人知道他在哪儿吗？”

“没人知道。”

“该是他回国的时候了。”

“是啊，是时候了！”

“不用担心，他不会贻误时机的。”

“可是，假如他不回来呢？”

“那又怎么样？（你知道，重要的岗位不会空的。）如果要干事情，是不会缺人的--，总可以找到别的人--有面包，就有人来吃。”

“磨坊正在磨面，用力地磨，准备做面包”。

喻革命即将到来。

